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四卷

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9 年秋至 1873 年 5 月这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以及他们所作的札记和摘要等等。内容包括对 1848—1849 年革命的论述和总结，对政治经济学著作和理论的研究，对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探讨，以及有关军事和第一国际的文章和资料。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至十八卷的补充。

本卷开始部分收进了恩格斯评述 1848—1849 年革命的三篇文章：《法国来信》、《德国来信》和《革命的两年》。

恩格斯的《法国来信》和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对法国所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作出了一致的分析和评价。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七月王朝的阶级性质，分析了法国各政治派别由于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在二月革命中和革命后所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提出了农民必须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思想，并指出当时法国农民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绝境中解放出来”（见本卷第 8 页）。恩格斯还指出法国无产阶级不再满足于小资产阶级和共和主义者夸夸其谈的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不再信任曾经欺骗过他们的各种派别的领袖人物，而要求在思想

上和政治上摆脱旧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恩格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更确切地反映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

在《德国来信》里，恩格斯叙述了 1849 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革命力量失败后德国的情况：中央政权机构软弱无力，各邦分离倾向加剧，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专制制度加强，但革命精神正在德国各地迅速复活。在统一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采取联邦国家形式的主张，认为根据德国文明发达的程度，只能采取“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式”（见本卷第 30 页）。后来恩格斯曾打算把这些内容改写后作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最后一章，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在《革命的两年》一文中，恩格斯向英国工人介绍了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的内容，摘录了其中许多段落，强调指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所阐述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

恩格斯 1851 年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蒲鲁东的重要著作之一。1848—18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而蒲鲁东的思想在工人中影响很广，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因此，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阻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言行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参照马克思的大纲写的，在他们生前未曾发表过。

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蒲鲁东的错误观点，指出他把资产阶级看作中世纪以来一贯的革命领导者，因而呼吁资产者给革命提供“保证”，提供“经济复兴计划”；指出他不理解交换、竞争、分工、信贷等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形式”，不理解

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却侈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克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使它们得到均衡，使劳动成为“有组织的”，使“普遍的福利”得到“保障”，进而消除“法国社会的病痛”。恩格斯还批判了蒲鲁东否定国家、反对权威、主张废除政府的一切职能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批判了他妄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社会清算”来建立理想社会的荒谬主张。

1848—1849年革命后，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并重新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卷发表的《关于大·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反思》就是这一时期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五十年代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摘要表明，马克思那时已接近于认识到创造商品的劳动本身不是商品，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及其特殊能力。他还进一步加深了对资本本质的理解，指出李嘉图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指出“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见本卷第111页）。这样他就把资本看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还在评论李嘉图的同时揭穿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来源于流通的错误理论，指出“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见本卷第109页），剩余价值“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见本卷第140页）。这些思想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大大系统化和具体化了。

《反思》这一手稿看来是马克思针对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而写的。小资产阶级认为经济危机来源于金银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他们热衷于搞银行改革以消除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试图从生产领域探索危机的根源。这一手稿包含着未来的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要素,如把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第一部类起主导作用,而消费品的生产归根到底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的界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 1857—1858 年手稿和 1861—1863 年手稿中发展成为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时间里对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评注和札记。这些材料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待当时国际冲突、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政策中的种种情况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方针。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是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所写的关于欧洲外交史的重要著作。1856 年马克思发现了一些可以说明英国政府同沙皇俄国从彼得一世起就开始秘密勾结的文件,他曾想利用这些文件写一部揭露这种卑鄙行为的著作,但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只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即现在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马克思在这篇导言里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四件秘密书函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北方危机》、《防御条约》、《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并加了详细的批注,“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22 页)。马克思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俄国的政治历史,剖析了莫斯科公国王公窃取权力的狡诈手腕,着重揭露了沙皇彼得一

世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和沙皇俄国侵略政策的继承性。同时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没有英国的姑息和纵容,沙皇俄国不可能顺利地称霸波罗的海。马克思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证明英俄勾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期,英国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就日益倾向俄国,千方百计地支持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卑躬屈节地为沙皇效劳,充当了俄国的代理人。马克思在这里逐字逐句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彼得一世的一篇未发表的至今仍未找到的文章,因此这篇著作反映了他们对沙皇俄国的共同观点。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的一大组军事文章和短评。在这些材料中,恩格斯准确地估计和预测了当时各国之间的军事活动和战争的进程及结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些事件的经验,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恩格斯在《俄国军队》、《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的军事潜力取决于工业发展水平和经济资源开发的水平。他认为,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更高水平,能够弥补他们在军事组织方面较沙俄军队不足之处;“美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见本卷第484页)。

本卷收入的有关第一国际的材料,对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为这两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进一步阐明并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表明他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宗派势力所作的不懈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为声援公社流亡者和捍卫公社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

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因为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捍卫者”（见本卷第 594、554 页）。马克思还在 1871 年 12 月 19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亲自揭露英国政府企图迫害公社流亡者的行为。

七十年代初，经过各级组织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国际在西欧一些国家获得了迅速发展。《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关于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具体地反映了国际如何排除外来干扰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修改草案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经验，在草案中加进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这一条，明确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独立政党的问题，指出：“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建立政党的目的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见本卷第 577 页）。草案还对组织条例作了修改，加强了纪律性和集中。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为依据，一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翻译的。俄文版没有收入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我们按 1969 年英国莱斯特·哈钦森编辑的单行本把该文译出编入本卷，并编写了有关的注释和人名索引。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目 录

说明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49年12月—1873年5月

弗·恩格斯。法国来信	3—27
一	3
二	7
三	10
四	13
五	15
六	18
七	19
八	23
弗·恩格斯。德国来信	28—38
一	28
二	30
三	3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启事	41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弗·恩格斯。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	42—63
弗·恩格斯。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的战争	64—67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 一文中有关德国的草稿	6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德国 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钱款的声明草稿	69—70
卡·马克思。* 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 原理》（摘录、评注、笔记）	71—153
卡·马克思。反思	154—163
弗·恩格斯。* 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一书的批判分析	164—196
卡·马克思。克拉普卡将军	197—199
卡·马克思。* 关于凯里	200—203
卡·马克思。戴维·乌尔卡尔特	204—205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	206—212
弗·恩格斯。俄国军队。致《每日新闻》编辑	213—21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219—222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	223—225
弗·恩格斯。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	226—228
卡·马克思。中央洪达	229—232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	233—240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	241—243
卡·马克思。外交上的失礼	224

目 录

卡·马克思。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245—247
卡·马克思。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集会	248—250
卡·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	251
卡·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253—330
一	255
二	267
三	287
四	297
五	306
六	321
卡·马克思。普鲁士（“军事国家”）	331—346
卡·马克思。威尼斯	347—351
弗·恩格斯。* 山地战的今昔（第二篇文章）	352—356
卡·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	357—366
卡·马克思。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 的小册子	367—382
卡·马克思。* 关于东方问题（草稿）	383
卡·马克思。* 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 十八世纪）	384—389
弗·恩格斯。阿本斯堡	390
弗·恩格斯。阿克	391
弗·恩格斯。阿克齐	392—393
弗·恩格斯。阿兰群岛	394
弗·恩格斯。阿耳登霍文	395—396
弗·恩格斯。亚历山大里亚	397—398

弗·恩格斯。阿尔梅达	399
弗·恩格斯。阿穆塞特炮	400
弗·恩格斯。安特卫普	401—402
弗·恩格斯。阿尔贝雷	403
弗·恩格斯。卞尼格先和巴克莱	404—406
弗·恩格斯。炮击	407
弗·恩格斯。CARTOUCH	408
卡·马克思。毕洛夫	409—410
卡·马克思。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	411
弗·恩格斯。把军队运往印度	412—418
卡·马克思。法国革命的新宣言	419—424
卡·马克思。约翰·布莱特先生	425—428
卡·马克思。* 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429—430
卡·马克思。* 发表所谓《关于俄国的报告书， 呈当今皇上》的文件的按语	431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1859年	432—433
卡·马克思。意大利的未来	434—437
卡·马克思。* 论分工	438—439
卡·马克思。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	440—447
卡·马克思。* [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 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摘录	448—480
弗·恩格斯。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	481
卡·马克思。论大赦问题	482—483
弗·恩格斯。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	484—492

目 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讣告	493
卡·马克思。* 威廉·沃尔弗简历	494—495
卡·马克思。*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496—497
卡·马克思。* 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参加国际的手续 的决议	498
卡·马克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	499
卡·马克思。* 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 突的便函	500—503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 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	504
卡·马克思。*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札记	505
卡·马克思。* 关于在 1866 年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 大会的决议	506
卡·马克思。* 关于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程序的决议	507
卡·马克思。* 关于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出席日 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	508
卡·马克思。* 常务委员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 的建议	509—510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511—512
卡·马克思。* 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513
卡·马克思。*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关税税率问题上 的立场	514
卡·马克思。* 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决议之前的一段话	515

卡·马克思。*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	516—521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522—523
卡·马克思。* 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	524—525
卡·马克思。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	526
弗·恩格斯。《每日电讯》的前通讯员罗伯特·里德 ...	527—5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529—541
卡·马克思。*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 1871年 9月 9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542—54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 1871年 9月 11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545—546
弗·恩格斯。* 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 10月 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摘要	547—548
卡·马克思。* 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	549
弗·恩格斯。* 关于意大利的状况。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 11月 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550—553
弗·恩格斯。* 罗马工人代表大会。——倍倍尔在国 会中的演说。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 11月 14日总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554—557
卡·马克思。声明	558—559
弗·恩格斯。* 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 12月 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560—561
卡·马克思。美国的分裂	562—571

目 录

卡·马克思。* 1872 年夏总委员会批准的国际工人 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572—585
弗·恩格斯。* 小委员会关于米·亚·巴枯宁和同盟 的决议	586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 开代表大会的答复	587—588
弗·恩格斯。关于里米尼代表会议	589
卡·马克思。国际代表大会	590—598
卡·马克思。* 1870 年 6 月—1872 年 4 月总委员会 记录摘要	599—601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的决议	6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 1872—1873 年总 委员会驻在地的迁移及其成员的建议	603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604—615
弗·恩格斯。* 《国际先驱报》上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 简讯	616—628
弗·恩格斯。* 关于大陆情况的报道	629

附 录

* 发给恩格斯的瑞士出境许可证	633—634
收据	635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现款收据	636
摘自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	639—641
* 弗·恩格斯 1850 年 4 月 5 日在“民主派兄弟协会” 为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的集会上的	

讲话记录	642
1850年4月8日流亡者委员会会议	643—644
辟谣	645
* 弗·恩格斯在1850年9月1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 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	646—647
* 弗·恩格斯在1850年12月3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 的新年晚会上上的讲话记录	651
*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	652—653
* 委托书	654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 报道	655
* 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 上的讲话记录	656
* 入会团体的证件	657—658
*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 的决议	659
*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集会 地点的发言记录	660—661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取得的成就的 发言记录	662
* 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	663—664
* 总委员会致纽约罗·威·休谟的信	665—666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 战争中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667—679
* 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的发言记录	680—684
* 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	

目 录

的发言记录	685—686
*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87
*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688—696
* 弗·恩格斯关于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	697
* 卡·马克思在 1871 年 9 月 17 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	698
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	699—700
弗·恩格斯。*更正	701
卡·马克思。*关于格莱斯顿政府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702
发给卡·马克思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703—704
发给弗·恩格斯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705—706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707—713
*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卡·马克思 1872 年 9 月 8 日 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	714—715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	716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信	717—721
*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	722—725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 1873 年 6 月 1—2 日	726
国际和工会	727—733
注释	737—851
人名索引	852—925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926—949
已改名的地名表	950—951

—
插 图

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的扉页，以及载有弗·恩格斯的 《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篇文章的两页	25
海·贝克尔关于出版卡·马克思《选集》两卷本（1850） 的启事的第一页（出版计划完全没有实现）	39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的一页手稿和会战平面图	235
弗·恩格斯（1856年）	368—369
1864年到1866年总委员会在伦敦希腊街举行会议的 房子	504—505
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法文版的一页，上面 有卡·马克思的修改	575
卡·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法国领取的赴英国的 护照	637
卡·马克思1850年6月或8月记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名字和住址	649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9年12月—1873年5月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¹

—

1849年12月20日于巴黎

当前大家最关切的问题是立法国民议会正在讨论的“酒税”。²这个问题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并且实际上充分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因此，这封信专门来谈论它是非常适宜的。

酒税有很长的历史。它是十八世纪君主制度财政体制主要的特点之一，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人民不满的基本原因之一，所以它也就被那次革命废除了。但是，大约1808年，拿破仑以稍加改变的形式恢复了这种税，当时他忘记自己是由革命起家，而把在欧洲古老的皇室王族当中建立自己的王朝当作主要目的。这种税是如此的为人民所憎恨，以致在拿破仑垮台后，波旁王朝答应立即废除它。拿破仑本人在圣海伦岛上说过，是这种税而不是别的什么造成了他的垮台，它使得法国的整个南部都起来反对他。不过，波旁王朝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履行自己的诺言，于是这种税也就一直保留到1830年革命，这时又有人向全国作出允诺说要废除它。这次诺言和上次一样没有履行，结果，这种税到1848年革命爆发时还存在着。临时政府没有立即废除它并代之以对大资本家、大土地占有

者课高额所得税,而只是许诺如果不废除至少也要加以修订;制宪议会则更甚,甚至决定将这种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是在它存在的最后几天,当保皇主义空前猖獗时,该议会的“正直的”和“温和的”议员们才投票赞成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³

十分清楚,这种税实质上属于法国的君主制传统。当人民群众占上风时,这种税便废除;一旦权柄落入以路易十八或路易-菲力浦之流为代表的贵族或资产阶级手中时,这种税便恢复。甚至拿破仑,——尽管他在许多问题上既反对贵族,也反对资产阶级,并为他们的合伙阴谋所推翻——甚至这位伟大的皇帝也认为自己必须恢复君主制法国的古老传统的这一特点。

全国各个阶级分担的酒税是极不均衡的。对穷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而对富人来说,它所添的麻烦却微乎其微。法国大约有一千二百万酿酒者;他们不纳这种税,因为他们消费的酒是自己酿造的;其次,一千八百万人住在农村和人口不到四千人的城镇中,他们每一百公升酒要纳六十六生丁到一法郎三十二生丁的税;最后,约五百万人住在人口超过四千人的城镇中,他们通过入市税⁴为他们所消费的酒纳税;这种税在城门口征收,而且各个地区都不一样,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前一类人纳的税高得多。其次,最低级的酒和较昂贵的酒税额都一样;每百公升卖二、三、四法郎的酒和每百公升值十二至一千五百法郎的酒交同样多的税金;这样喝高级香槟酒、克拉列特酒和勃艮第酒的富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而喝劣等酒的工人却要向政府交纳相当于这类酒原价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有时甚至百分之五百或百分之一千的税金。在征收的这种税金中,有五千一百万法郎来自较贫穷的阶级,只有二千

杂志原文如此。——编者注

五百万法郎出自较富有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这种税使法国酒类生产遭到莫大的损害。这种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城镇,对于一个酿酒者来说,成了真正的异乡国土,他要出售自己的产品,就得交纳规定的关税,税金相当于酒的原价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千。在另一部分市场——农村地区,税金至少是原价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这种状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国家各酿酒地区的破产。诚然,尽管存在着这种税,酒的生产还是在不断增长,但人口的增加以快得多的速度超过了这种增长。

为什么在中等阶级政府的统治下竟会把这种令人憎恨的酒税保留下来了呢?你会说,在英国,即使科布顿和布莱特也会早就把它取消了。是的,他们的确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法国,企业主们既找不到坚定不移和不屈不挠地维护他们利益的科布顿和布莱特,也找不到一个能把他们的要求付诸实现的皮尔。法国财政制度,尽管被议会中的多数吹得天花乱坠,却是所能想象的最混乱的、纯属人为制造的大杂烩。英国在 1842 年后实行的各项改革,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没有一项是打算实行的。在极美好的基佐时代,邮政改革几乎被看成是亵渎神灵。无论是当时或现在,这种税则都既不是自由贸易制性质的,也不是单纯财政性质的,既不是保护关税性质的,也不是禁止性关税性质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除自由贸易制以外所有其他税则的一些特征。旧的禁止性措施和高额关税,执行多年来毫无成果,而且无疑地对贸易是极其有害的,这些却贯穿于这种税则的所有部分。但是谁也不敢触动它们。在所有人口超过千人的城镇中地方税是间接的,从运往当地的商品中抽取。这样,甚至在国内,贸易的自由每经过十或十五英里都要遇到一种内地税关的阻碍。

这种即使对于中等阶级政府来说都是耻辱的状况，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依然如故。尽管各种沉重的税收聚敛了十四、五亿法郎，可是一到年底总是出现赤字，并且每隔四、五年就要发行一次公债。国库的这种可悲状况成了巴黎交易所投机商牟取暴利、尔虞我诈和投机倒把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伙构成两院的大多数，因而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总是要求新资金的流入。而且，如果不采取广泛措施，使预算达到平衡，使税收的分配得到改变，并通过向交易所投机商本人征税，使中等阶级的其他集团在政治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财政改革就不可能实现。至于说在路易·菲利浦腐败透顶的政府当政的情况下这些改革的后果如何，那么，你根据那个引起二月革命的、比较微不足道的原因⁵，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这次革命没有导致任何一位能对法国财政制度进行改革的人上台。攫取了这个部的《国民报》派的老爷们⁶感到自己被庞大的赤字捆住了手脚。为逐步实行改革作了许多尝试；如果不算废除盐税和邮政改革的话，所有这些尝试都是没有成果的。最后，制宪议会在绝望之下表决通过了废除酒税的决议，可是现在“正直的”和“温和的”秩序党人⁷在当前这个珍贵的议会上却要恢复它！而且这位部长还打算恢复盐税并重新增加邮费；这样，在最近的将来，法国就会重新出现陈腐的财政制度及其永恒的赤字和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巴黎交易所的无限权力及其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和追逐暴利的行径。

不过，对于这项措施——恢复对穷人的最必需物品的沉重赋税，一种几乎不触及富人的赋税，人民未必会服服贴贴地遵照执

行。在法国农业地区,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已得到惊人的广泛传播,而这项措施将使剩下的几百万在十二个月前还投票拥护路易-拿破仑这个徒务虚名的偶像的人⁸转到社会民主派这方面来。社会民主派一旦把农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红旗将会在土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⁹的上空迎风飘扬。只有在那时,才能一举结束国家债务,实行直接的累进税制,并采取其他同样坚决的措施,从而彻底粉碎陈腐的专制的财政制度。

二

红色共和主义光辉成就的鲜明证据!¹⁰

1850年1月21日于巴黎

自从上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由于大多数读者已从日报和周报上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再从头至尾地重述了,在这封信里我只就国内形势谈一些总的看法。

在最近这十二至十五个月里,革命精神在整个法国极其高涨。那个因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在文明社会中最大限度地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阶级,那个被以前的君主制立法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利的阶级,那个从来不看报、可是却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阶级,终于迅速觉悟过来。¹¹这个阶级就是小农,男女和儿童总共约二千八百万人,其中小土地所有者八、九百万人,他们以自由农¹²的身分占有法国全部土地的至少五分之四。从1815年起,这个阶级便受历届政府的压迫,临时政府也不例外,它规定对这个阶级的土地税每一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¹³,而法国的土地税本身

已经是很重的了。这个阶级还受到一帮高利贷者的压榨，他们的财产几乎全部都以特别高的利息抵押给这帮人了。就是这个阶级终于开始懂得：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虽有一块不大的份地却愈来愈受痛苦和饥饿煎熬的绝境中解放出来。这个阶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 1789 年的革命，并且是拿破仑的庞大帝国产生的基础。就是这个阶级现在有绝大多数的人开始站到巴黎、里昂、卢昂以及其他法国大城市的革命党派和工人方面来。农民们现在十分清楚地知道路易·拿破仑如何欺骗了他们，在总统选举中他们给了他至少六百万张选票，而他回报他们的却是恢复酒税。所以，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时机一到，就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横暴统治。这个被二月风暴吓得丧魂落魄的阶级重新掌握了政权，其统治甚至比它在亲爱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统治还要专横得多。

最近几个月来的事件为这一极端重要的事实提供了无数证据。例如奥普尔部长给宪兵队的通令，它责成宪兵队甚至在边远的穷乡僻壤也要实行谍报制度；再如反对教师的法律，法国农村的学校教师一向是最能代表这些地区的舆论的，现在他们要由政府来摆布了，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持社会民主派的观点。¹⁴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事实。但是最鲜明的证据之一是不久前加尔省的选举。这个省众所周知是“白色分子”即正统派的最古老的据点。它是 1794 年和 1795 年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对共和派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这里也是 1815 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当时对新教徒和自由派进行了公开的杀戮，而这些牺牲者的妻女姐妹则受到正统派匪帮的最卑鄙的污辱，这帮家伙以出名的特雷斯塔永为首并受到正统的路易十八政府的庇护。就是在这个省份要

选出一位议员代替一位去世的正统派议员；选举结果，大多数票投给了一位完全红色的候选人，而两位正统派的候选人得到的票却显然很少。¹⁵

新教育法¹⁶是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的这一联盟迅速取得成就的又一证据。资产阶级人士中最顽固的伏尔泰主义者，甚至梯也尔先生都明白，只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理论和原则并使教育听命于僧侣，才能阻挠联盟取得成就！

再者，现在所有的报纸和社会活动家，只要不是公开反动的，都在争先恐后地设法捞取一度受人蔑视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声。社会主义的最老牌的敌人现在都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国民报》，甚至《世纪报》，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是君主主义的报纸，现在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无耻地背叛了1848年的马拉斯特，现在也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以期保证自己当选，尽管这是枉费心机。不过人民并不是那么好愚弄的；绞索已经给这个坏蛋准备好了，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

今天国民议会正在讨论关于杀害残存的四百六十八名被囚禁的六月起义者的法案，杀害的办法是把他们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对健康极为有害的地区去做苦工。¹⁷毫无疑问，法案将会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劳动大搏斗的不幸英雄们到达那注定将成为他们葬身之地的大海彼岸之前，人民的新的愤怒浪潮会把那些投票赞成这一屠杀革命者法案的人们席卷而去，并且，也许会把今天处于多数地位的代表中能够逃脱人民的更为迅猛、

德·博恩。——编者注

法旺。——编者注

格雷尔和卢尔杜艾。——编者注

更为严峻和最为公正的报复的那些人送到那个流放地去。

三

时代的象征。—— 迫近的革命¹⁸

1850年2月19日于巴黎

我不得不把这封信的篇幅稍加限制，不过，一个月来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地触目惊心，它们自己将会表明自己的重要意义。革命来得这么快，任何人都一定看到它已迫近。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无不在谈论革命行将到来，所有外国报纸，甚至敌视民主的，也都宣布革命已不可避免。而且，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言：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事件改变社会事态的发展，在联合起来的秩序党和绝大多数人民之间发生严重的对抗，看来，不会晚于今年春末。而这一对抗的结局是毫无疑问的。巴黎居民都确信，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革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因此在他们当中到处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避免一切细小冲突，凡不涉及你的切身利益的一概听之任之！”这样，在前几天砍倒自由之树的时候，政府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仍未能挑起工人的哪怕是零星的街头骚乱。而围着圣马丁门的自由之树跳舞的人们——你们的《伦敦新闻画报》把他们的样子画得叫人非常害怕——乃是警察局的一帮密探，他们由于人民沉着冷静而白白忙了一整天。¹⁹总之，本月24日²⁰将会极平静地过去，尽管政府报纸说得恰恰与此相反。政府准备使用几乎所有的招数来使巴黎发生骚乱，并在外省制造一些虚假的密谋和起义，以便在首都和那些因递补在凡尔赛被判有罪的

议员²¹而定于3月10日补选新议员的省份实行戒严。

下面简略地谈谈新的军事独裁体制。为了牢牢控制各省，政府发明了一种新的统帅体制。它把法国所有十七个军区合并为四个大军区，各由一个将领统辖；这样一来，这个将领就几乎拥有东方暴君或罗马总督的无限权力。这四大军区是这样分布的，它们好似一道铁箍，把巴黎和整个法国中部团团围住，使之不得反抗。然而，之所以采取这个非法措施，不仅是针对人民，而且也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现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路易-拿破仑为他们服务得很不好。他们所以需要他，只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用过之后可以扔掉的工具。而今他们看到，他在为自己追求王位，而且在进展上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快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目前君主制毫无希望，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可是路易-拿破仑却竭尽全力要把事情搞到底，并且宁愿冒险进行革命（这可能要他拿脑袋作代价），而不愿坐等时机。他们也知道，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奥尔良派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优势，以致其胜利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必然；正象1848年12月10日以前那样，他们需要一位新的中立派的人物，以便此人能在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时候按照两派共同的利益进行管理。这样，这两派，即秩序党仅有的两大派别，现在都反对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尽管四个月以前他们会为了争取到这一点而拚其全力；他们这一次又重新主张共和国建立在中立的基础上，让尚加尔涅将军当总统。看来尚加尔涅也参与了密谋。拿破仑不信任尚加尔涅，但又不敢剥夺他的巴黎总督之职，于是使用自己的四个军区象镣铐一样地把他钳制起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多数人能够极其耐心地听完了帕斯卡尔·杜普拉先生（曾

叛卖 1848 年六月起义，而现在重又在猎取名声了) 反对新军事体制和反对路易-拿破仑本人的演说。当时发生了两起很有趣的事件。照一家报纸的说法，当着杜普拉先生谈到路易-拿破仑只能或者选择他伯父的立场，或者选择华盛顿的路子时，会场左边有人喊道：“或者选择海地皇帝苏路克的路子！”把法国王位僭望者比作一个给巴黎所有的《喧声报》提供笑料最多的人物，引起哄堂大笑，甚至议会议长都未加制止。这就是那高贵的多数派对路易-拿破仑的评价！这时陆军部长站了起来，朝着会场左边发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结束时说道：“现在，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开始干，我们准备奉陪！”²²部长的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向诸位表明，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场猛烈的冲突。

就在这时候，社会民主派正积极地准备选举。尽管在巴黎——这里已有约六万工人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从选民名单中勾掉了——“正直的和温和的”人们只有一两个候选人可能当选，可是，毫无疑问，在各省，社会主义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政府本身预料到这一点。因此，它已拟定了一项措施准备消灭现在被公开地称作“普选权”阴谋的东西。它希图实行间接选举，由选举人选举数目有限的复选人，再由复选人提出代表。这样，政府才有把握取得多数的支持。但既然这等于公开推翻宪法（宪法在 1851 年以前不能修订，而且不能由为此目的选出的议会来修订），政府可以预料到人民一定会强烈反对。这样一来，就需要用外国军队来吓唬老百姓，这些军队应在这一提案提交议会时出现在莱茵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发生的话——看样子，路易-拿破仑之蠢是足以

杜班。——编者注

德·奥普尔。——编者注

干出这种冒险勾当的——，那你们大概很快就会听到诸如革命风雷一般的东西。而那时，就让上帝去赦免所有的什么拿破仑、尚加尔涅、秩序党人之流的灵魂去吧！

四

选举。——红色分子的光荣胜利。—— 无产阶级的优势。——秩序党的沮丧。 ——对革命进行镇压和挑拨的新计划

1850年3月22日于巴黎

胜利了！胜利了！人民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而且喊得是这么响亮，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阴谋的人工堆砌的大厦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卡诺、维达尔、德弗洛特——巴黎的人民代表，以十二万七千至十三万二千张票当选了。这就是人民对政府和议会多数的卑鄙挑衅的回答。卡诺是《国民报》派中在临时政府时期唯一没有向资产阶级拍马，因而惹得资产阶级大为憎恨的人物。维达尔是早就出名的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德弗洛特是布朗基俱乐部的副主席，1848年5月15日冲进议会事件的第一批积极参加者之一，是同年6月街垒战中的先锋战士之一。他被判处放逐，现在却从运载囚犯的船上径直走进立法议会之宫。真的，这样的人选是意义重大的¹³它表明：如果说红党的胜利是由于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同无产阶级结成了同盟的话，那么，这个同盟所借以建立的基本条件，较之那个曾导致君主政体覆灭的暂时联合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正是这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即小

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尤其是在制宪议会中占优势，并且很快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现在则相反，工人是运动的领导者，而那个同样遭受资本压迫并给搞得倾家荡产的、由于在 1848 年 6 月效了劳而受到破产之奖的小资产阶级，则不得不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步伐行进。农业主也是这种情况。这样，现在反对政府的那些阶级的全体群众——他们构成法国人的绝大多数——便都在无产者阶级领导下，由它率领前进，而且他们认识到，他们本身从资本枷锁下的解放不得不取决于工人的完全彻底的解放。

各省的选举也是对红党极为有利的。红党的候选人有三分之二当选，而秩序党只有三分之一。

这个党，或者党派的大杂烩，十分清楚地理解人民的这一明确的暗示。他们现在懂得，如果容许 1852 年的普选——包括议会的选举、也包括新总统的选举——仍按现在的选举体制办理，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不可避免的灭亡。他们明白，人民是如此迅速地团结在红旗的周围，他们哪怕是只把政权执掌到任期届满都是不可能的了。一方面是总统和议会，另一方面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组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方阵，一天比一天壮大。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秩序党等待愈久，人民胜利的希望也就愈大。他们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们一定会尽快地给予坚决打击。他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尽快地挑起起义并与之进行最后决战。此外，在 3 月 10 日的选举以后，“神圣同盟”对于它究应奉行什么方针也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现在瑞士根本不在话下。²⁴一个雄伟威严的革命的法国重又屹立在它的面前。因此，必须进攻法国，并且要尽快地干。“神圣同盟”的现金越来越不足了，而现在要想使这种令人爱好的商品得到新的补充，希望又是那么小。每一个国

家单靠国内已不能把军队继续维持下去——要么把军队解散，要么叫他们靠敌人供养。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在上一封信中关于革命和战争迅速临近的预言正为事态发展所全部证实。²⁵

秩序党暂时又放下了他们的内部争吵。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向人民进攻。他们更换了巴黎卫戍部队，因为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投了红党的票²⁶；而昨天，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关于恢复报纸印花税的法案，提出的第二个法案规定把所有报纸的保证金增加一倍，第三个法案要求废除竞选集会自由。²⁷在这些法案之后还将有其他一些法案：其中之一是赋予警察局以把任何一个非巴黎出生的工人驱逐出巴黎的权利；其二，是允许政府可以不经审讯把据信犯有参加秘密社团罪的任何公民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去，此外还有许多法案，而这一切必然以对普选权的比较直接的攻击为收场。可见，他们是以消灭劳动者阶级的一切权利来挑动起义。起义是要爆发的，而且，与广大的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的人民，定将很快地抛开这个不光彩的阶级政府，这家政府虽说除了进行卑鄙无耻的压迫以外别无他能，可是却敢厚颜无耻地以“社会救星”自诩!!!

五

1850年4月20日于巴黎²⁸

在3月10日选举之后本已不可避免的革命，由于政府和目前领导巴黎运动的人们的怯懦而推迟爆发了。3月10日的选举和一再得到证实的军队中的叛乱情绪，使政府和国民议会吓破了胆，以致它们不敢立即做出什么结论。它们下决心通过我在上封信里向

你们列举的那些新的镇压法；但是，如果说内阁和多数派的某些领导人对这类措施是信得过的，那么，大多数议员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就连政府也很快又对这些措施丧失了信心。因此，这些镇压法中的一些较严厉的法案，至今还没有提出来，甚至那些已经提出来的法案——出版法和竞选集会法——，多数派的态度也是犹豫不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党没有象应该做到的那样，从这次的胜利中得到好处。其原因十分简单。这个党不只是由工人组成的，目前它又吸收了大量小店主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比无产者的社会主义要温和得多。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非常清楚，只有无产者的解放才能使他们免于破产，他们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也懂得，如果无产者通过革命夺得了政权，他们这些小店主就会完完全全地靠边站，并处于工人阶级能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只好接受什么的境地。相反，如果现政府被和平地推翻，那么，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这个目前所有反对阶级中最不可憎的阶级，就可以很从容地插手进去并掌握政权，同时把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政权给予工人。因此，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就象政府害怕自己的失败一样，害怕自己的胜利。他们看到一场革命正在他们眼前展开，于是就立即尽力加以制止。他们具有达到这一目的的现成手段。公民维达尔除在巴黎当选外，同时也在下莱茵地区当选。他们怂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这样，巴黎就必须举行新的选举。很清楚，只要人民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他们决不会去呼吁“准备战斗”，然而一旦人民被挑动起来举行起义，即使胜利的机会极少，他们也要进行搏斗。

新的选举规定在本月 28 日举行，而政府很快就利用了可爱的小店主们创造的有利形势，内阁阁员们搬出了陈旧的警察条例，以便把一定数量暂时没有工作的工人赶出巴黎²⁹；他们直接禁止一切竞选集会，表明即使没有已向议会提出的反对竞选集会法，他们也能够对付过去。人民知道他们的斗争在选举之前是不会有成效的，于是便屈服了。完全掌握在小店主手中的社会主义报刊，自然尽一切可能来稳住群众。自从“自由之树”事件以来，这种报刊的行为就是极端无耻的。在这期间，人民起义的机会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报刊总是鼓吹和平和安定，同时，小店主的代表在选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中，经常为人民的愤懑寻找和平发泄的出路，力求减少巷战胜利的机会。

红党被迫采取的违背原则的立场和秩序党从新的选举中得到的好处，在两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红党的候选人欧仁·苏是善良的、“甜言蜜语的”、伤感的小店主社会主义的卓越代表，这种社会主义决不承认无产者的革命使命，宁愿用小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的善意庇护来给无产者以可笑的解放。欧仁·苏作为政治人物是渺小的。为了显示力量而提名他为候选人，是从 3 月 10 日占领的阵地上后退了一步。不过应该承认，如果说伤感的社会主义注定要在今天时髦起来，那么，在能够被提名的人中间，苏的名字是最孚众望的，而且他很有希望当选。

另一方面，秩序党恢复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它用六月起义中的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勒克莱尔先生³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对抗欧仁·苏这个默默无闻或名气很小的人物。勒克莱尔是对德弗洛特的直接回答，也是比其他任何名字更为直接的对工人的挑衅。提出勒克莱尔作为巴黎的候选人，就是重复奥普尔将军的话：“现

在，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乐意上街，我们都准备奉陪！”

正象你们所看到的，巴黎的重新选举没有给无产阶级的党提供什么好处，相反，已经给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还应当指出这样一个事实：3月10日的选举是按旧名册进行的；4月28日的选举将按照4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过的1850年选民名册进行；而在这份修订过的名册中，有两万到三万工人在种种借口下被勾掉了。

然而，即使秩序党这一次将得到微弱多数，它也不会获胜。事实毕竟是事实，只要普选权还存在，秩序党就不能够再管理法国了。事实毕竟是事实，社会主义的病原体已广泛侵入军队，一有机会这支军队就要公开叛乱。事实毕竟是事实，巴黎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结束目前的状态。他们过去从来都没有象这次这样公开地、趁竞选集会还没有被禁止时，在竞选集会上发表意见。而政府加紧攻击普选权，将给人民提供进行战斗的机会，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无疑将获得胜利。

六

[1850年5月底于巴黎]³¹

如果无产者容忍他们的选举权被剥夺，他们就会听任二月革命获得的涉及他们利益的成果化为乌有。对于他们，共和国将不再存在。他们将被关在共和国的门外。他们能容许这样做吗？

这个法案是一定会通过的，它丝毫不会放宽。多数派已明确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决心。³²按照目前的状况，谁都无法估计后果将会怎样——是人民起来抛弃政府和议会，还是人民将等待另一

个适宜的时机。巴黎看来是平静的，没有革命行将到来的直接征兆；但是，一个火星就足以燃起熊熊烈火。

要不是那些除了鼓吹“和平”、“安静”和“庄严的宁静”³³就无所事事的有名望的领袖们的叛变行径，烈火早就燃烧起来了。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法国的形势是高度革命的形势。秩序党不能停留在原有的阵地上。为要守住阵地，他们必须每天前进一步。如果这一法案通过了而没有激起革命，他们将对宪法和共和国发动新的、更加疯狂和更加公开的进攻。秩序党要的是叛乱，而得到的将是革命，并且很快就会得到。因为必须记住，这是几星期的问题，也可能是几天的问题，而不是几年的问题。

七

1850年6月22日于巴黎

选举“改革”法案通过了，巴黎的人民却安然不动。普选权的废除没有引起任何一点骚动或示威游行，法国工人重新沦为路易-菲利浦时代那种没有应有的权利、没有表决权、没有武器的政治上受鄙视的人。

的确，十分有趣的是，法国1848年轻易争得的普选权，1850年更轻易地被废除了。然而，这种起伏不定完全符合法国人的性格，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英国就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在那里，普选权一经确立就永远不会被废除。哪一届政府都不敢触动它。只要想想看，若是哪个大臣蠢到如此地步，竟当真想要恢复谷物法，那他就会被全国人民的哈哈大笑声轰下台。

毫无疑问，巴黎人民犯了严重错误，他们错过了废除普选权所提供的举行起义的时机。军队的情绪是好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不得与人民并肩前进，而山岳党，甚至还有卡芬雅克党都懂得，在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因此而受到一阵子罪，不管他们是否同人民在一起。因此，一旦起义爆发，至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山岳党在道义上的支持，在这次是有保证的，而这就可以粉碎相当一部分军队的反抗。但是，良好的时机被错过了：一方面这是由于议会领袖和报刊的怯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巴黎人民现在的特殊情绪。

首都工人现在处于过渡状态。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工人中间讨论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已不再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应该承认，把法国所有社会主义体系放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真正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多次被自己的带头人蒙骗过的人民，对所有曾经充当过他们的领袖的人，都极不信任，甚至对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也不例外³⁴，因此，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使这些人之中的某个人掌权。这样一来，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即将具有另一种非常革命的性质了。人民一旦开始独立思考，摆脱了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很快就会找到那样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准则，它们比各种体系的创立者和夸夸其谈的领袖们为人民臆造出来的一切，是更加明确地反映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人民会因此而成熟起来，到那时，他们会重新利用前领袖所具有的一切才智和勇敢，而不做这些领袖中任何人的尾巴。巴黎群众的这种情绪，也就是人民对废除普选权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决定性的战斗要拖到国内两股竞争势力的一方或双方，总统或国民议会试图推翻共和国的那天才开始。

而这一天应该很快到来。你们还记得,各家反动报刊怎样吹捧总统和多数派之间达成的真诚的协议。现在,这种真诚的协议简直变成了竞争双方的最残酷的斗争。为了使总统同意选举法,花费的代价是:允许给总统的年俸增加三百万法郎(十二万英镑),负债累累的路易-拿破仑对此极为需要,此外,他又认为这是把自己的总统任期延长十年的先行步骤。选举法刚刚通过,部长们就出来干涉并索取三百万法郎的年俸。但多数派突然害怕了。他们不再认为低能的路易-拿破仑是个合乎条件的王位僭望者,并且根本打算同意延长他的总统任期,相反却希望尽快摆脱他。多数派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这一提案作报告,而委员会表示反对通过这一提案。³⁵爱丽舍宫极为慌乱。拿破仑以辞职相威胁。一场国内两大势力之间最严峻的冲突迫在眉睫。内阁、许多银行家、还有其他一些“秩序之友”,都出面调停,但毫无结果。提出了好几个“协议”方案,也都徒劳无益。最后采取了一个看来各方都比较满意的修正案。多数派不完全相信同总统决裂的后果,并且至今仍未最后签订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为一个政党的协议,他们仿佛有点要改变主意并打算同意采取另一种形式来支付这笔钱。辩论应当在星期一进行,谁都不能预料结果将会怎样。可是我认为,真正同拿破仑决裂,目前还不符合保皇主义多数派的政策。

关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波旁王室幼系和长系联合的协议,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讨论的对象。的确,关于这个问题正在进行非常积极的谈判。梯也尔先生、基佐先生等人去到圣莱昂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没有别的目的。我不准备再向你们叙述有关这件事的情况和上述行动所取得的结果的种种说法。各种日报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已经够多了。然而有一点是确实的,在法国,奥

尔良派和正统派差不多已就条件达成了协议,而唯一的困难是要使竞争的两个派系都接受这些条件。波尔多公爵亨利应该成为国王,而因为他无嗣,把巴黎伯爵,即路易-菲力浦的孙子和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收为王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困难。此外,还应当把三色旗保留下来。人们期望中的年老的路易-菲力浦之死,或许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一些。他似乎已向这种解决办法屈服了,而波尔多公爵,看来也接受了协议的条件。好象唯有奥尔良公爵夫人、巴黎伯爵的母亲及其夫兄茹安维尔是解决道路上的障碍。人们打算付出数千万现款来摆脱路易-拿破仑。

毫无疑问,这种或与这类似的协议将最终达成;而一俟达成协议,向共和国的直接进攻就会开始。同时,各省议会也将开始发起战斗。各省议会刚刚提前召开了,估计它们会向国民议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正是这个问题,去年也曾讨论过,但当时各省议会都认为那样做还为时过早。这一次,各省议会无疑将表现出更大得多的勇敢精神,尤其是对选举权进行了成功的打击之后。而那时,也将是人民出来表态的时候,他们将表明,如果他们在某个时候未曾显示出自己的威力,那也决不是甘愿被拉回到最卑鄙丑恶的复辟时期。

又及。我刚刚读完了一本定价三个苏(半便士)的小册子,这是随《共和国报》一起免费送来的。其中极其惊人地揭露了保皇派自1848年春以来的种种倾轧和密谋。作者博尔姆其人,是布尔日的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审判案中的证人。他承认自己是领取报酬的保皇派代理人,在这一案件中提供了大量伪证。他断定整个1848年5月15日的运动是由保皇派发动的,并透露出其他许多

十分有趣的事情。³⁶还有一些事情涉及《泰晤士报》。³⁷博尔姆说出了名字和地址。他住在巴黎。这本小册子必定会引出更多的揭发材料来。望你们对此严加注意。

八

1850年7月23日于巴黎

正象我在上封信中所预见的，议会终于通过了拨给路易·波拿巴一笔补助金的决议，这实质上是向他提供了他所盼望的款项，而形式上却使他在全体法国人面前大大出了丑。³⁸此后，议会就恢复了自己的镇压活动，通过了出版法³⁹。不管这个出版法出自作者巴罗什先生之手时是多么严厉，同议会多数派的憎恨使之发生的变化相比，它是无害而没有恶意的。多数派出于对报刊的强烈却又无力的憎恨，几乎是盲目地进行打击，全然不顾打击的对象是“好的”报刊还是“坏的”报刊。这样，“憎恨法”通过了。保证金增加了。报纸的印花税恢复了。对“连载小说”、对报纸的小说栏征收特别的印花税，这种措施，如果不是对欧仁·苏（他的社会主义小说的影响还没有被多数派忘记）当选的报复，那就完全不可理解。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不一定篇幅的所有文章，都和报纸一样要征印花税。而最后，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短文都要有作者的署名。

多数派的盲目憎恨所促成的这样的法律，不仅将严重打击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报刊，而且也将严重打击反革命报刊，对反革命报刊的打击，还可能比对反对派报刊的打击要厉害得多。共和主义政论家是极其著名的，因此不管他们在自己的短文中署名还

是不署名，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权力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将不得不披露其撰稿人的名字，这些报纸的社论即使在固定的读者中也会立即失去一切影响。大的日报、特别是已经发行很久的大日报的名称，对于可尊敬的公众来说，从来都是代表可尊敬的报馆；但是，只要这些报馆——贝尔坦之流，维隆之流，德拉马尔之流——一旦披露出代表他们的著作家的名字，只要这些神秘的“之流”一旦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现金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老朽的、卖身求荣的雇佣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愚蠢的老儒夫，只要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并抛出冗长文章的小家伙一旦按照新法律而被公诸于世，这些可尊敬的报馆就会在你们面前现出一付多么可怜的样子。

毫无疑问，在新法律下，由于报纸涨价，广大读者将被剥夺这一消息来源。许多工人，尤其是大多数农村居民就会既得不到报纸和廉价期刊，也得不到其他大众出版物。但是，报刊从来就只是影响农民的辅助手段，这个阶级对自己的物质困难和增加税收，比起对报刊的夸夸其谈，反应要强烈得多，而只要目前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能找到——它永远也不能找到——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高利盘剥和税收负担的办法，不久前觉醒了的这个阶级就会继续表现出不满和“革命倾向”。至于城市工人，要完全堵塞他们读报的渠道是不可能的，即使禁止发行廉价期刊，他们也会通过增加秘密团体、秘密辩论俱乐部等的活动来填补这块空白。但是，如果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减少革命小册子和期刊的数量，它付出的代价则是整个出版事业和书籍贸易的毁灭，因为在新法律规定的种种限制下，它们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很可能这将大大促进秩序党

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的扉页,以及载有弗·恩格斯的
《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篇文章的页

在议会内外的分裂。

出版法刚一通过,议会就又一次向路易-拿破仑明确地暗示他不应当超出宪法为他规定的范围。波拿巴派的《权力报》刊登了一篇以不十分赞许的口气评论议会的文章。复辟时期的旧法律被搬出来了,于是,《权力报》的出版者便被指控为破坏特权并被处以五千法郎(二百英镑)的罚金⁴⁰,这笔罚金当然立即就支付了。这种惩罚不算过分严厉,但议会的这项决定本身,意义极为重大。一个议员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我们打击下面,但是想击中上面。”

然后,议会决定从8月11日起延期三个月再召开会议。根据宪法规定,议会应当选举一个由二十五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它应当留在巴黎并对行政权实行监督。多数派的领袖认为路易-拿破仑已经够卑躬屈膝的了,便提出了一个只包括多数派成员的候选人名单,即包括奥尔良党人、温和的正统主义者、几个波拿巴分子,却没有一个共和主义者或极端正统主义者。可是在表决时,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落选了,反倒选了几个比较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和极端正统主义者。议会从而又一次表示,它根本无意去搞路易-拿破仑梦寐以求的政变。

我认为任何重大情况都要到试图推翻共和国之后才会发生,不管进行这种试图的是谁,是总统还是保皇集团之一。这无疑会把人民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而这一事件必定会在今天到1852年5月之间发生,但确切的日期是无法预料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12月20日
—1850年7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0年1—8月《民主评论》杂志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⁴¹

—

1849年12月18日于科伦

“秩序统治德国”。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们当前主要的口号,不管他们是君主、贵族、资产者,还是那个新近成立的、用英语可以叫作秩序迷(ordermongers)⁴²的党的任何其他派别。“秩序统治德国”,可是,德国从来没有,甚至在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也从来没有象现在“秩序”统治时这样乱七八糟。

1848年革命以前,在旧制度下,我们至少知道是谁统治我们。以前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曾经用反对出版自由的法律,用特别法庭甚至用限制某些德国人借以自我安慰的、可笑的宪法来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现在呢!我们自己简直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中央政府。首先我们有帝国摄政王,他是已解散的国民议会⁴³拥立的,尽管没有一点权力,却死抱住自己的职位不放。其次有临时协议⁴⁴,——这是什么,谁也不确切知道,但看来是旧议会的复活,是在普鲁士过去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这个临时协议正

约翰。——编者注

在对老朽的摄政王(他多少代表奥地利的利益)施加压力,要他把
自己的位置让给它。⁴⁵可是他们两者都没有一点权力。第三,有国
民议会临终前在斯图加特选出的“帝国摄政政府”⁴⁶,以及该议会
的残余——“坚定左派”和“极左派”。这两个“左派”和“摄政政府”
一道代表德国“温和的和哲学的”民主派和小店主。这个“帝国”政
府在瑞士伯尔尼的一家酒馆举行自己的会议,它的权力大概同上面
两家不相上下。第四,有所谓的三王联盟,或者说是“有限的
〔Confined〕(或是改良的〔Refined〕,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联邦
国家”,成立它的目的是要使普鲁士国王成为凌驾于德国所有小
邦之上的皇帝。⁴⁷它所以被称为“三王联盟”,是因为除普鲁士国王
外,所有的国王都反对它!而它之所以自称为“分娩中的 联邦国
家”,是因为它虽然从今年5月28日起就不时感到分娩前的阵
痛⁴⁸,却没有任何希望能生出有生命力的东西!!第五,有四位国
王⁴⁹,即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国王,他们决心
随心所欲,而不屈服于上述任何一个“无力的中央政府”。最后,有
奥地利,它极力要保持它在德国的最高地位,因此支持四个国王为
摆脱普鲁士权势而做的努力。目前,真正的政府,即拥有权力的政
府,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府。它们用军事专制统治德国,随意发
布和取消法律。在它们的领地和属国之间,有一个所谓中立地带
——上述的四个王国,正是在这里,特别是在萨克森,这两个大国的
权利将发生碰撞。但是,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奥地
利和普鲁士都很清楚,要遏制在整个德国、匈牙利和属于它们的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原文是“Confined”除“有限的”意思外,也有“分娩”的意思。——译者注

恩斯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威廉一
世。——编者注

部分波兰土地上发展的革命情绪,它们的力量以后也必须联合在一起。此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敬爱的妹夫”⁵⁰,全体俄罗斯人的信奉正教的沙皇,会进行干预,禁止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理人互相争吵。

可是,这种在政府、权利、要求和德国联邦法律方面的史无前例的混乱,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德国的共和党人直至今天分为联邦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两派;前者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每一次力图把德国改造成联邦国家所引起的混乱都明显地证明了,任何这样的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和愚蠢的,因为德国的文明已经很发达,除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式,它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

我本来还想就瓦尔德克和雅科比的无罪释放⁵¹说几句话,因为篇幅有限,只好作罢。不过要指出,至少在最近几个月内,普鲁士政府不可能对政治案件作出有罪的判决,除非在一些偏僻角落,陪审团象奥尔斯脱的奥伦治会会员⁵²一样狂热,才有这种可能。

二

关于德国暴君的有趣揭露。 ——蓄意对法国进行的战争。 ——未来的革命

1850年1月20日于科伦

在我给你们寄出上封信的第二天,这里就传来了关于谁应统

治整个德国的“问题获得解决”的消息。由两名奥地利代表和两名普鲁士代表组成的临时协议,终于制服了老朽的约翰大公,迫使他引退。结果他们取得了政权,然而这不是无限期的。这一授权到今年5月期满,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预料,期满以前就会发生某些“不利事件”,把这四位德国临时执政者赶走。这四位军事专制主义的走卒的名字是很值得注意的。奥地利派来的是梅特涅手下的财政大臣屈贝克先生和刽子手拉德茨基的得力助手雪恩哈耳斯将军。普鲁士的代表一个是拉多维茨将军,他是耶稣会教徒,国王的宠臣,并且是使普鲁士暂时得以把德国革命镇压下去的主要阴谋策划者,另一个是伯蒂歇尔先生,他在革命前是东普鲁士省的省长,那里的人们至今还亲切地(?)记得他是公众集会的“镇压者”和侦察系统的组织者。这么一伙恶棍会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用不着对你们细说。我只举一个例子。维尔腾堡政府为革命所迫,曾和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签订合同——你们知道,这位公爵撇开各邦政府,垄断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信件邮递和旅客运送。⁵³正如我说的,维尔腾堡政府曾和这个强盗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合同,给他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以换取他把垄断权让给上述政府。当那些靠抢劫国民财富为生的人的境遇一得到改善,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就认为他的垄断权比合同上规定的钱数更有价值,而不愿放弃这些权利。维尔腾堡政府已不受任何外来的压力,认为这种主意的改变合乎情理;于是双方都去找临时协议——公爵是公开地找,上述政府则是秘密地找。临时协议利用1815年旧法中的一条为借口,宣布这个合同无效和非法。事情就这样妥了。甚至图尔恩-塔克西斯先生能把他的特权再保留几个月就更好了;当人民结束全部特权时,他们不仅要无偿地夺走他的垄断权,而且还要迫使他退

出至今从他们身上掠取的全部钱财。

奥地利的军事专制主义一天比一天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报刊几乎全被消灭,所有的公民自由都被取消,整个国家充斥着密探——监禁、军事法庭和鞭笞遍及全国,——这就是政府有时出版的那些各省宪法⁵⁴的实际意义,他们在这些宪法出版的当时就毫不介意地加以破坏。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要到头的,甚至戒严状态和匕首统治也不例外。军队要花钱,而钱这个东西,即使最有权力的皇帝也是不能随意制造出来的。奥地利政府迄今一直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勉强保持财政上的收支平衡。但是这也到头了。有一位普鲁士尉官曾经因为我对他说,无论哪个国王或皇帝都不能想印制多少纸币就印制多少纸币,而要与我决斗⁵⁵,与这位尉官的愿望相反,与这位博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愿望相反,奥地利皇帝还是看到了,他的纸币——尽管不兑换——比银币贬值百分之二至三十,比金币几乎贬值百分之五十。他原来打算发行的外债由于科布顿先生的努力而落空。外国资本家只认购了五十万镑,他要的是这个数目的十五倍,而他的财力枯竭的国家已经不能为他提供任何资金了。去年9月底一千五百万镑的赤字现在可能已经增到二千万至二千四百万镑了,而且匈牙利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必须在1849年最后一个季度付清。这样,奥地利就只有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要么破产,要么对外作战,使军队负担自己的花费,并且借助胜仗、征服的各个地方和战争赔款来恢复商业信誉。这样,科布顿先生借口保卫和平而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外债(因为俄国和奥地利处于同样困厄的境地)⁵⁶,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加速了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联合进军,这种进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拖了。

在普鲁士,我们目睹了“国王良心”的又一表现。你们知道,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从不食言的人在 1848 年 11 月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 并且把一部合他心意的宪法强加给了他的人民⁵⁷，你们知道他曾同意让这件美丽的艺术品由第一次召集的议会进行修订；你们知道 这个议会的第二议院（众议院）甚至还未着手修订就被解散了 而另一个新的选举法又被强加到人民身上 这个选举法巧妙地删去了普选权 保证了由土地贵族、政府官吏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多数当选⁵⁸ 由于所有民主派都拒绝参加这个议院的选举 所以它只是由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选出的。这个议院与原来的第一议院一道着手修订宪法 自然 它们把它弄得比国王原来提出的本子还要更合国王的心意。现在他们已经几乎完成此事。你们以为现在国王陛下会高兴接受这个修改过的宪法 并就此宣誓吗？他才不呢！他给他忠实的议会写了一封御函 上面说 他非常满意两个议院为他的宪法所做的一切 但在其“国王良心”允许他宣誓以前 需要对自己的宪法做十来处修改。⁵⁹这是些什么修改呢？国王陛下真够谦虚 他除了下面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外 就再无所求了。1. 现在由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选举的第一议院 应该成为真正的贵族院 其成员中应包括各个亲王、陛下挑选的约一百名世袭贵族、大土地所有者选出的六十名贵族、大资本家选出的三十人、各大学选出的六人。2 大臣们应对国王和国家负责 而不是对议会负责。3 现在预算上规定的一切税收应永远征收 议会无权废除。4 应成立“明星院”⁶⁰或最高法院来审判政治案件——根本没提陪审团。5 应颁布一项规定和限制议会第二议院的权力的特别法等等。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陛下强加给善良的普鲁士人一部新宪法 又要让议会进行修订。他的议会进行了修订 即把残存的一点点公民权利统统勾销。而国王还不满足 宣布说 若不作上述补充修改 。

他的“国王良心”就不允许他接受那部按照他自己的利益修订了他的自己的宪法。这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国王的”良心！甚至目前这个可笑的议会都不大可能屈从于这种无耻的要求。结果将是解散议会，普鲁士将暂无任何议会。所有这一切的奥妙在于预期会发生上面提到的联合大战。坐在普鲁士王位上的这位“有良心的”大人，期望在三、四月份会有成百万的亚洲野蛮人充斥他那叛逆的国家，他们将和“他自己的光荣军队”一道进军巴黎，征服这个生产他如此心爱的香槟酒的美丽国家。一旦共和国被消灭，圣路易的后代在法国重新登极，那时候国内的宪法和议会还有什么用呢？

目前，革命精神正在德国各地迅速复活。1848年3月以后曾站在国王方面反对人民的最顽固的前自由派现在也认识到了，正如德国谚语说的，虽然他只把他的一个小手指头尖伸给魔鬼，可是这位大人却已把他的整只手抓住。陪审法庭对政治审判案不断做出的无罪判决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方面的新事例每天都有。例如，几天前，曾经在1849年5月为了阻止向起义的爱北斐特运送军队而毁坏铁路的缪尔海姆工人在科伦被宣布无罪。⁶¹在南德意志，财经困难和越来越高的赋税使每一位资产者都认识到，目前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在巴登，正是这些背叛上次起义，欢呼普鲁士人到来的资产者被这些普鲁士人和在这些普鲁士人保护下使他们破产和绝望的政府所折磨和激怒。各地的工人和农民都在警惕地等待着起义的信号，这次起义一定要使无产者的政治统治和社会进步得到保证，否则决不会平息下去。这场革命已经临近了。

尚博尔。——编者注

康普豪森。——编者注

三

普鲁士国王宣誓忠于宪法和
“侍奉上帝！”——神圣同盟的
大阴谋。——日益临近的对瑞士的
进攻。——征服和瓜分法国的计划！

1850年2月18日于科伦

普鲁士国王陛下终于宣誓忠于所谓的“宪法”了。⁶²这场君主的闹剧，要不是能提供一个演讲的机会，无疑是不会上演的。喜好演讲的陛下，为了能够演讲，决定咽下宣誓这颗苦药丸。他过去曾当着众人的面咽下过不少难咽的东西，例如，大家都知道1848年3月19日，柏林人曾对他高喊“摘下帽子！”他这次决定宣誓，也和过去表现得一样恭顺。宣誓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一个国王，特别是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么一个人的宣誓！主要的是演讲，而这篇演讲也的确精彩。试设想一下这个场面，普鲁士国王陛下在十分严肃地宣称，同时，他以及在场的任何其他人谁都没有发出笑声，听他宣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准备拿出他最宝贵的东西，即提供国王的保证！但是，他在使用了許多稀奇古怪的辞令之后，继续说道，他提供这种保证必须有一个条件：使他能够用这个宪法进行统治和实现他三年前许诺的“我和我全家将侍奉上帝”的诺言⁶³。

这个新式的“正直人”所谓用宪法统治和侍奉上帝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次宣誓闹剧之后，陛下的大臣们一是

提出了两条几乎完全废除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公众集会权利的法律；二是提出了拨一千八百万塔勒(二百五十万镑)用于扩军的要求。这中间的意思很清楚。首先逐步消灭这个出色的宪法贗品留给人民的不多几种虚假的自由,然后使军队达到战时水平,并同俄国和奥地利一起去进攻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议院无疑会赞同这一切,从而使国王能够用宪法进行统治,并同全家一道侍奉上帝。

把普鲁士“为了应付可能在春天发生意外事件”而举借的军事贷款和神圣同盟的其它措施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看穿他们的阴谋。除了上述的这一千八百万以外,普鲁士还正在以修建东部大铁路为借口商谈一千六百万的贷款。在俄国贷款的事情以后,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修建铁路成了神圣同盟中的各国政府弄钱的极好借口。这样,普鲁士将很快弄到五百万镑,全部交陆军部处理。俄国除了已弄到的五百万镑以外,正准备签订另借三千六百万银卢布即五百万镑的协定。唯有奥地利在经过不久前设法弄钱的可怜结局之后,不得不满足于她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数目。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她的赤字一年实际上已经达到两亿弗罗伦(二千万镑)!因此,俄国和普鲁士弄钱是为了打仗,奥地利则为了弄钱而不得不打仗!

无疑,如果法国不发生意外事件,下个月就要开始对瑞士,或许还对土耳其的“神圣”战争。俄国在波兰及其邻近地区驻有三十五万随时准备出动的军队。它已经订购了大批食物,规定在下个月交货,但不是送往波兰,而是送往普鲁士的但泽。现在大约有十五万人的普鲁士军队,通过征召后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一个月内就可以扩充到三十五万人。奥地利军队——约六十五万人——从未缩减过,相反,由于收容匈牙利战俘而扩充了。这些可用于对外作

战的军队总数大约是一百万人，但是三分之二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都染上了民主病，一有机会就很可能转到敌人方面去。

进攻瑞士的第一个借口是那个国家里居住着德国流亡者。这个借口很快就不会存在了，因为联邦政府懦夫式的迫害在直接或间接地迫使所有的流亡者离开瑞士。现在这个国家里大概还有六百名流亡者，他们也将很快不得不离去。可是还有另一个借口——普鲁士要求恢复普鲁士国王在前公国纽沙特尔的权势，这个公国在 1848 年宣布成立了共和国。⁶⁴即使这个要求满足了，根据新的联邦宪法又会发生宗得崩德⁶⁵问题，这个新宪法在 1848 年取代了得到神圣同盟保障的 1814 年旧的反动协议。因此，瑞士是逃不过这场战争和外国占领的。

但是，神圣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和瓜分法国。为一下子结束这个伟大的革命中心而构想的计划如下：法国被征服后，将划分成三个王国——西南部的王国叫阿克维塔尼亚（首府波尔多），将交给波尔多公爵亨利；东部的王国叫勃艮第（首府里昂），将交给茹安维尔亲王，而北部的王国即法兰西本土（首府巴黎），将送给路易·拿破仑，以奖励他为神圣同盟立下的卓越功勋。这样，法国被弄成几世纪前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将变得毫无力量。这个美好的计划无疑是普鲁士国王的“历史”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你们对它能说些什么呢？

但是，请相信，神圣同盟在筹划时没有予以考虑的人民，很快就会制止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只要神圣同盟一开始实现自己的计划，人民立刻就会予以制止。因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人民都保持着警惕，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一旦要进行全面的、决定性的和公开的斗争，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压倒自己的一切敌人。那

时民主的敌人们将恐惧地看到，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与那场将把欧洲的旧制度烧光，并照耀着胜利的各国人民走向自由、幸福和光荣的未来的遍地大火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2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1850 年 2 月 18 日

载于 1850 年 1—3 月《民主评论》杂志

海·贝克尔关于出版卡·马克思
《选集》两卷本（1850）的启事的第一页
（出版计划完全没有实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启 事⁶⁶

《新莱茵报》第一期的出版由于不取决于编辑部的情况而脱期了。因此，第二期的出版不迟于第一期出版后两星期，其中将包括以下几篇文章：

卡尔·马克思：1848—1849年。二、1849年6月13日。三、六月十三日对大陆的影响。四、英国的现状。⁶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三、普法尔茨。四、为祖国捐躯。⁶⁸

第三期，其中还包括下面几篇文章：

卡·马克思：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财产？二、地产——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⁶⁹

威·沃尔弗：德国议会的最后几天。

普鲁士的财政状况，等等。⁷⁰

将采取措施使杂志今后每月1—10日出版。

编辑部⁷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2月中旬

原文是德文

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一期——1850年1月，1850年
伦敦、汉堡、纽约版

弗·恩格斯 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⁷²

在1848年和1849年，科伦出版了一家德文日报——《新莱茵报》。这家由卡尔·马克思任总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斐·沃尔弗和威·沃尔弗等人任编辑的报纸，作为德国唯一代表无产者利益的刊物，英勇无畏地捍卫最先进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很快就获得了非凡的信誉。普鲁士政府利用去年5月间莱茵河各省起义的失败，对编辑们进行种种迫害来使这家报纸停刊。结果他们便离开了德国，以便到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或进行中的各种运动里去找寻新的活动场所。他们有几个人去了巴黎⁷³，那里形势即将有决定性的转折（6月13日），他们就在法国民主的中心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有一人进入了当时正被卷入起义的德国国民议会；还有一人去了巴登，在革命军队中同普鲁士人打仗⁷⁴。这些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就在英国、瑞士和法国过着流亡生活。由于暂时没有可能重新创办一家日报，便在情况允许他们在本国的日报重履旧职之前，办起了一个月刊作为他们的机关报。

这个刊物的第一期刚刚拿到。刊物的名称与过去的日报一样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卡尔·马克思主编。

第一期只收入三篇文章。开头的一篇是主编卡尔·马克思写的论述过去两年的革命事件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接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叙述去年5月、6月和7月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起义运动。最后是卡尔·布林德（前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大使）写的关于巴登各党派情况的文章。后两篇文章中虽然有许多重要的揭露，但主要对德国读者有意思。第一篇文章写的则是所有各国读者，特别是工人阶级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一题目由公民马克思来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合适的。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应该在有限的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以摘录的形式刊载。

此处所讲的这篇文章写的是二月革命、它的起因和结果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直至1848年6月的大起义。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只是革命政党的一些非革命成分，陷于灭亡的是造反的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多少带有非革命性质的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主要由于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造反的政党只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革命政党”（同上）。——编者注

有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成真正革命的政党。”

这就是公民马克思在文章中发挥的主题。他首先揭示二月革命的起因，他对这些起因的解释比以前任何论述这一问题的作家都远为深刻。所有研究最近二十年法国国内大事的历史学家都普遍认为：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整个资产阶级是法国的统治力量；1847年揭露出的丑闻⁷⁵是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直接斗争。在公民马克思的笔下，这些断言虽然没有遭到直接的断然否定，但是却作了重要的修改。

这位德国历史学家证明，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政权并不是集中在整个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集中在这一阶级的一小部分人手里，这部分人在法国称为金融贵族，在英国则叫做银行巨头、交易所巨头、铁路巨头如此等等或者叫做金融资本家，以区别于工业资本家。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的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矿山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工业资产阶级本身愈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毫无成果的起义⁷⁶之后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所有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阶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各次起义被血腥镇压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编者注

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这种金融贵族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一切公共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利益，他们把国家看作只是用来增加他们财产的工具和财源。公民马克思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下列事实：这种丑恶的制度在法国竟存在了十八年之久；国家债台高筑、政府开支增加、没完没了的财政困难和国库亏损，都成了许许多多为财阀私囊增添财富的源泉，这些财源被狂吸猛吮，一年超过一年，国家的资源也就更加迅速地被耗尽；政府、陆海军、铁路及其它公共工程的开支为金融家们提供了成百上千的机会，他们就贪婪地抓住这些机会用弄虚做假的合同欺骗公众，如此等等。总之——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为数可观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乔治·赫德逊——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⁷⁷。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同样卖淫，同样无耻欺诈，同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社会的上层，不健康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小市民阶级”一词。——编者注

“为数可观”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资产阶级社会”（同上）。——编者注

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这种形式的满足，在这种形式下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1847年戴斯特、普拉兰、居丹、杜亚里埃等人丑事的败露，把这种事态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法国政府在克拉科夫问题上和对瑞士宗得崩德关系中的无耻行径，极大地伤害了法国的民族自尊心；而瑞士自由派的胜利和1848年1月巴勒摩的革命则鼓舞了反对派的士气。⁷⁸

“最后，两个带有普遍性的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使普遍不满情绪的爆发发展成了起义。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1847年的那个接近于饥荒的局面，在法国也象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引起了许多流血的冲突。这边是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边是人民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⁷⁹，而在巴黎贵族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工商业总危机。1845年秋季英国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法的废除等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1845年和1848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激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7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1847年的物价腾贵”（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编者注

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 1847 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行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在法国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资产阶级中的反对派在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中联合了起来，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在巴黎，商业危机迫使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国外市场上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开设起大的零售公司，使大批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表现出了革命性。”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的作用引起了二月革命的爆发。临时政府成立了。所有的反对党都有代表参加这一政府：王朝反对派（克雷米约、甚至还有杜邦-德勒尔），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马拉斯特、马利、加尔涅-帕热斯），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和无产阶级（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共同起义及其假想的成果、幻想、诗意和豪言壮语。按他的地位和观点，他属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新政府里占大多数。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98 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工业危机”（同上）。——编者注

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云云。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战斗权的篡夺。”无产者强迫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他声明，如果两小时内不照办，他就要率领二十万武装工人回来。结果，两小时期限未到，共和国就宣布成立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和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二月共和国首先只能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全面，即让法国的一切有产阶级都获得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摆脱了1830年革命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给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这一广大阶级（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是资本家，因为土地已经抵押给他们了）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显露出来了。正如在1830年的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1848年的二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9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七月王朝”（同上，第400页）。——编者注
“土地”、“这一广大阶级”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 1830 年的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1848 年的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从共和国那里争到手了。”

“劳动权”和卢森堡委员会(由于设立了这个委员会,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实际上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实权则掌握在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手里)就是这些社会机构中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工人们落到这样一种处境:他们不是在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情况下,而是在同资产阶级互不相干并排共存的情况下去谋求自己的解放。交易所和银行依然存在,只是在这两个资产阶级大礼拜堂旁边设立了卢森堡委员会这个社会主义礼拜堂;工人们相信他们能在不触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解放,而且他们也同样相信他们能在不触犯欧洲其余的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解放。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工业的那种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将成为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最后根蒂,从而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从共和国那里”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而是“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2 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物质根蒂”(同上)。——编者注

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但是二月革命首先反对金融贵族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前还没有在法国占据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为自己的产品夺得了世界市场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国内市场的范围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保护关税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其他各地,他们只是集聚在里昂、利尔、牟罗兹、卢昂这样几个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因此,充分发展的和决战式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抵押制,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一句话,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在革命进程把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即既非资产者又非无产者、构成法国国民大众的农民和小

下面恩格斯略去了:“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2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文章中接着是:“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国内市场的范围”,而是“国家的境界”(同上)。——编者注

这几个地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充分发展的现代形式的、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编者注

资产者 发动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 ,并迫使他们参加无产者行列 以前 ,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 ,不能丝毫触动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到那时 ,而且只有到那时 ,工人们才能够不是在不触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是宣布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革命利益 ,并把它作为与资产阶级利益直接相反的利益加以维护。⁸⁰工人们只能用 1848 年 6 月可怕的失败做代价走向 这个胜利……

于是 ,并非在现实中 ,而是 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 ,在根本否认有互相敌对的 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君主制 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 ,—— 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 ,一切保皇党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共和党人 ,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和阶级利益 的这种在想象中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 ,就是博爱—— 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一切现存的阶级对抗 ,这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 ,而是“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3 页) 。—— 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 :“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它”(同上) 。—— 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 :“来换得”(同上) 。—— 编者注

“并非在现实中 ,而是” 是恩格斯加的。—— 编者注

“互相敌对的” 是恩格斯加的。—— 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 “君主立宪制” 。—— 编者注

接着删去了 :“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伪善的句子里”(同上) 。—— 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 “阶级和阶级利益” ,而是 “阶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4 页) 。—— 编者注

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尘世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互相斗争的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要求成立一个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

我们将在下一期继续进行摘录。那时将评论临时政府的措施，国民议会的召开和六月的起义。

在本刊4月号上，我们对公民马克思关于二月革命的述评的介绍，进行到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它最先采取的措施。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个政府里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足够力量来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行事，并且能够利用巴黎无产者对自己的真正利益和促进这种利益的手段的无知而捞到好处。下面我们继续进行摘录：——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最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着手解决这一任务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就已经瘫痪，商品流转已有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当然又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

是以确信财富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末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本身——无产阶级的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的斯芬克斯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寒暑表。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届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傲然自信的精神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银行 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编者注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这里指卢森堡委员会。——译者注
这里和以下几段中不带有任何定语“银行”，英文原文是“the Bank”，马克思文章中的德文是“die Bank”，显然是指法兰西银行。——译者注

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私人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私人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象洪水泛滥一样立刻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不是也一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吗？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象皮特在 1797 年那样，中止现金支付，把银行券规定为法定货币。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金融贵族的权势！”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商业信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6 页）。——编者注

“象皮特在 1797 年那标，中止现金支付”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银行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7 页）。——编者注

众所周知，政府对交易所和银行的金融巨头那样宽大，而对构成社会另一极的各阶级却是这样干的：对工人和小商人是没收他们在储蓄银行的存款，对农民则是在四种直接税中每法郎再加征四十五生丁。¹³

“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被没收，并宣布为统一公债。这就激起了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领到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公债券，他们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而他们进行二月革命正是为了反对这些高利贷大王！！

……四十五生丁税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承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使它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等于这项可恨的税收，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1789 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一切封建负担，而 1848 年的革命，却首先就对这个阶级加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现任财政部长，高利贷银行家富尔德曾向赖德律-洛兰提出过这一补救方法，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原已处境困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6 页）。——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为了使资本不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8 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农民”（同上）。——编者注

而这位公民，如他自己在国民议会所述，对这样一个建议则严辞驳斥，其义愤填膺之状人们记忆犹新。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 !!!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受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份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旧账，反而陷进了被逼着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资产阶级社会，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才能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词句——都已成了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是不断反对恢复信用（以绝对承认现存的阶级对抗为基础的信用）。所以，一定要一劳永逸地把工人干掉才行。”

二月革命后军队已经被逐出巴黎，国民自卫军，即武装的资产阶级，巴黎唯一的武装部队，它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凭本身的力量

“现任财政部长……”这句话，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8页）。——编者注

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在伊甸园中有一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因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而禁止人们摘食。——译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8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同上）。——编者注

“一劳永逸地”是恩格斯加的。在5月号的《民主评论》上登到这里为止。——编者注

同无产者进行战斗。这支部队,尽管它极力抵制,还是搀进了工人的成分。因此,临时政府别无其他办法,只有用工人来反对工人了。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二十四营别动队,每营一千人,主要由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源泉,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特点不同而有所不同,处在临时政府征募他们时的青年时期,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鄙的盗匪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用每天一法郎五十生丁薪饷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共和国牺牲的高调把他们迷住了。人民就把这二万四千名刚刚离开街垒的健壮、蛮干的青年士兵当作自己的军队,当作与旧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相反的真正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文化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9页）。——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察罗尼的特点”（同上）。——编者注

恩格斯用这句话代替了下面一段话：“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蛮干的二万四千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同上）。——编者注

有情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十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二十三苏（十一个半便士）一天的工资雇用工人去干枯燥、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之类的活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整个工人阶级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要求建立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谣传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巴黎资产阶级、法国和欧洲的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厂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

“（十一个半便士）一天”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工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0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同上）。——编者注

有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同上）。——编者注

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一下子把他们的全部仇恨和不满都发泄到这些国家工厂的头上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消耗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的小资产者,巴黎小店主了。这样,正当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每天都收到激动人心的新的革命消息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它同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把所有的优势,所有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把社会的各个中间阶级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必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一系列道义上的胜利。虽然无产者在 3 月 17 日明显地占有优势,但示威的真正目的,即迫使临时政府服从无产者的意志,并没有达到。4 月 16 日则是无产者的一次决定性失败,而且接着就是军队开回巴黎。不久,国民议会的选举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

接着删去了:“而毫无得救希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1 页)。——编者注

“巴黎小店主”是恩格斯加的(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或者从意大利,或者从德国,或者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欢欣,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同上)。——编者注

“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只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同一观点、同等智力的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法国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中各个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跟着现在又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走。然而，普选制虽不如自欺的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迅速地一步一步从幻想走向失望；它一下子就把资本家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过去在君主制下所戴的骗人的反对派假面具。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

“现在又”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中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页）。——编者注

“一步一步”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损害资产阶级中一定集团的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蒙上反对派的荣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413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唯一合法的”（同上，第413页）。——编者注

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相反地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整个法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明确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从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做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建立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因此必须在巷战中战胜和镇压这些无产者…… 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做些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5月15日的冲突⁸¹、6月23日、24日、25日、26日四天的战斗，它们的直接原因和与这些原因有关的事件是人所共知的。六月失败暂时地解决了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力量解决这个任务。《通报》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共和国可以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此处还有：“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第414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争得”（同上）。——编者注

屈从他们的‘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他们的失败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他们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那是毫无希望的……

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靠工人们的鲜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迫使它一下子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不可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靠拢无产阶级。”

如果说六月失败在法国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那末在别的大陆国家它却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六月起义以后资产阶级到处都和封建王朝结成公开的联盟，这种联盟就被王朝利用来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同上）。——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同上）。——编者注

“……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各邻国保持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配之下。

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这个舞台才能允许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自由地发展。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⁸²

简介恩格斯写于1850年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0年4—6月《民主评论》杂志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同上）。——编者注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战争

1850年7月21日于科伦

在德国，现在人们普遍谈论的自然是什么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在你们国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很少理解，请允许我对此做一个简略的述评。

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德国周围的小独立国家都是以或多或少的自由派形式出现的反动势力的主要集中地。例如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就是第一个抵挡住二月冲击⁸³，第一个宣布戒严令和宣判爱国者死刑的国家。⁸⁴又如瑞士，就以很不体面的方式度过了这场革命风暴，它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躲在中立的万里长城后面，当反动派在整个欧洲重新得势时，又充当神圣同盟的卑躬屈膝的打手以对付手无寸铁的流亡者。显然，这些弱小国家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必然要迫使它们主要依靠早就建立的亦即反动的政府的支持，况且它们不可能不知道任何一场欧洲革命都会使它们的民族独立成为问题，这种独立只有旧政治制度的拥护者才有心思去捍卫。

丹麦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独立的优越感

和进行扩张的极大欲望。丹麦是个全靠用海峡税⁸⁵掠夺世界贸易为生的国家，对它的独立和强大感兴趣的只有俄国和某些英国政治家。由于上世纪签订的一系列条约⁸⁶，丹麦简直成了俄国的奴隶，俄国通过丹麦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达达尼尔海峡。英国的老派政治家也关心丹麦的领土扩张，因为这符合他们把中欧支解成许多互相敌对的小国，从而使英国能够对它们实行“分而治之”的原则的老政策。

与此相反，各国革命派的政策总是要使迄今为止一直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大民族巩固地团结在一起，保证民族的独立和强大，但并不是保证象丹麦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等那些细小的民族（每一个这样的民族起初只有一百万到三百万人），或者象瑞士人和比利时人那些混合的假民族的独立和强大，而是保证现在被欧洲统治制度压迫的人数众多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的独立和强大。欧洲的共和国联盟只能由象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那些力量均等的大民族组成，而绝不能由象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瑞士人等这些弱得可怜的所谓民族组成。

此外，革命派是否允许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阵地——波罗的海的入口——永远为自私的丹麦人控制？他们是否允许丹麦人依靠向每一艘通过松德海峡和贝耳特海峡的商船征收重税来支付国债的利息呢？当然不会。

丹麦凭借把人民视作动产的宝贵继承权，吞并了德国的两个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公国各有自己的宪法，内

很少人知道，1848—1849年瑞士曾多次讨论把萨瓦并入瑞士，并且瑞士人希望这件事能够由于意大利的革命失败而得以实现。（恩格斯原注）

容彼此相同，还有它们的君主们所赐给的早已规定的权利，“两国应该永远统一而不可分割”。此外，丹麦的王位继承法和这两个公国的不一样。⁸⁷ 1815年在声名狼藉的维也纳会议上，民族被宰割和拍卖，霍尔施坦被并入了德意志联邦，而什列斯维希则没有。此后丹麦民族党就力图把什列斯维希并入丹麦，但未得逞。1848年终于来到了。3月哥本哈根爆发了民众运动，民族自由党上台执政。他们立即颁布了宪法，并把什列斯维希并入丹麦。其结果是在两个公国爆发了起义，在德国和丹麦之间发生了战争。

当德国兵在波兹南、意大利和匈牙利镇压革命时，在什列斯维希的这场战争却是德国进行过的唯一的革命战争。问题在于什列斯维希的居民是否将被迫把自己的命运同弱小的半开化的丹麦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成为俄国的奴隶，还是他们将有可能同当时正在为争取自身的自由、统一，也就是为恢复实力而斗争的四千万人的民族重新合并。德国的君主，特别是戴王冠的普鲁士酒鬼对这场战争的革命意义了解得太清楚了。大家都知道普鲁士公使维登布鲁赫少校有一个照会⁸⁸，他在其中向丹麦国王建议进行装样子的战争，使战争只是限于让双方都作为志愿军参战的丹麦和德国的革命积极分子互相残杀。因此，战争对德国方面说来是接连不断发生的一连串叛卖行为。甚至在弗雷德里西亚会战⁸⁹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个万人共和军团遭到了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被三倍于它的丹麦军队歼灭，而当时有四万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军队离他们只有几英里，却没有在困难时刻前去支援。最后甚至在柏林搞了一个叛卖和约⁹⁰，允许俄国在什列斯维希驻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扎军队，允许普鲁士去霍尔施坦镇压叛乱，这个叛乱是普鲁士自己至少曾用官方的形式援助和挑唆过的。

如果过去对哪一方是捍卫革命利益，哪一方是维护反动利益有疑问的话，那么，现在这些疑问都不存在了。俄国派遣自己的舰队去同丹麦加强友谊，并且共同封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海岸。所有“世上的强者”都起来反对这个不到八十五万人的小小德国部落；这个不大的然而勇敢的民族所得到的援助，只是各国革命者的同情。他们无疑会失败；他们也许能抵抗一段时间，甚至推翻普鲁士所强加的资产阶级叛卖政府，他们也许能打败丹麦人和俄国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要失败的，除非肯定要进入霍尔施坦的普鲁士军队拒绝行动。如果这些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你们会看到德国将完全变样。那时那里可能爆发全面的起义，而且是 1848 年完全不能与之比拟的那种起义，因为神圣同盟的行动已经给了德国人民足够的教训；如果在 1848 年甚至连联邦共和国也是不可能的话，那么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不到六个月就要成为社会的共和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7 月 21 日
载于 1850 年 8 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卡 · 马克思

*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国际述评（三）》一文中
有关德国的草稿⁹¹

1 .俄国明显占上风。普鲁士和奥地利分享霸权。由于它们竞争，各小邦重新得到巩固，尽管是形式上的巩固。然而，在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各小邦（例如，黑森、⁹²巴登）的君主蒙受了耻辱，而且，这样一来 1848 年还非常强烈的要求重视种族和地区的差别（Stamm- und Städtendifferenzen）的企望也受到致命的打击。由于 1848 年运动，一切现存的官方权力也都威信扫地了。

2 普鲁士。资产阶级得到了一切，甚至比 1847 年敢于要求的还多，虽然它被赶出了政府，降低了身分，只得到宪法 62 的外表。

3 .奥地利。至今农民一直受到重视，农民获得革命的果实。对银行的保护政策。⁹³

4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分歧。在普鲁士自由贸易派是贵族，而在英国自由贸易派是工业资产阶级。

卡 · 马克思写于 1850 年 10 月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
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⁹⁴
的钱款的声明草稿⁹⁵

1 .由于政治情况所造成的流亡(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先生出自财政考虑乐意接纳流亡者代表),由于接纳不缴纳任何会费的人作为有表决权的名誉会员,协会⁹⁶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把钱付给协会只会使这些钱被用来直接对抗最初的宗旨。

2 .我们作为协会的受托人收纳钱款。受托人的地位英国法律已有规定。受托人可以酌情使用钱款,只要他在按一般手续预先通知之后能支出钱款的话。

3 .至于临时支用钱款,那么现在出于特殊考虑而坚决主张支款的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公民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协会背后背着大多数会员很久以来就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它拥有支配协会基金的无限权力。沙佩尔先生尤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多次为个人目的通过这个委员会从协会那里领取钱款。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协会提供了钱款,然而,由于协会在它似乎同意我们的建议之后,突然把我们告到法院——没有结果——,我们才将钱款转交给一位伦敦公民,只要协会对于用款

可能是威·普·罗伯茨。——编者注

要符合最初宗旨没有提出充分的保证，钱款就将一直保存在他的手里。

5. 至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拒绝，那么这种声明在法律上不会有任何意义。甚至书面声明不会使署名者对法人负有任何法律责任。书面声明只能有一个目的——用它作为反诉。

署名者是工人。根本不容许他们象沙佩尔先生那样靠剥削协会过活，或者象维利希先生那样利用流亡者的基金为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
1850年12月底

原文是德文

马克思在草稿末尾写有：“巴黎的鲍威尔（8）、普芬德（7）”。——编者注

卡·马克思

—

* 关于大·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摘录、评注、笔记)⁹⁷

写于 1850 年 12 月，1851 年 3—4 月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附录》1941 年
莫斯科德文版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
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
(货币学说)⁹⁸

(1) 金银价值 的变动

[—55]“金银价值之所以波动,是由于发现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矿藏;……是由于开发矿场 或采矿本身 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进;……是由于矿的产量的锐减”(第6页)[10页]。“可能易于将这些金属运往市场”(第77页)[第71页]。“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同上)[第70—71页]。金银价值的这些波动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和自然的(第78页)[第71页]。但是同其他任何商品相比,它们的变动最小(第79页)[第71页]。“虽然金银也是可变的尺度,……但是它们是作为可以表示、估计其他物品的价值这样一种尺度出现的”(第79、78页)[第71页]。

从这方面来看,金银是价值的标准,计算的工具、单位,比较点。

在手稿上是“价格”,但在下面正文中到处说的是黄金和白银的价值。——编者注

本卷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六角括号〔 〕内的页码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72年中文版的参看页码。——译者注

(2) 《货币价值的变动所引起的不同后果》⁹⁹

如果工资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而提高,那么,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就会同时提高;所以,劳动和一切商品之间的比例没有变动,变动的只是货币(第47页)[第38页]。

除了上述经常的原因所引起的变动外,货币的价值也由于货币在不同国家之间“按比例”进行不同的分配而不断变动的,“因为这个比例是随着商业和机器的每一进步,随着”生产“食物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日益困难而不断变动的”(第48页)[第39页]。

“不论货币价值的变动有多大,它都不会引起利润率任何变动”;假定工厂主的商品价格从1000镑上涨到2000镑,即涨价100%,如果他的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他的资本和对产品的价值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同样涨价100%，“他的利润率将照旧不变,因而工厂主所能支配的劳动产品的数量也仍与过去一样多”(第51页)[第41页]。

(3) 金货币与银货币及对外贸易

- () 每个国家按其贸易水平把金银占为己有。
- () 在不同国家中引起金银价值变动的不同原因。
- () 汇率。

“因为金银已被选为一般的流通手段,所以商业竞争使它们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比例适应于假如没有这两种金属存在、各国间的贸易纯然是物物交

在手稿中不是“价值”而是“产品”,但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说的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如果他的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资本的影响和对产品价值的影响是一样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和存货也上涨百分之百,那么他的利润率会照旧不变。——编者注

换时所出现的那种自然贸易状况。例如,英国的呢绒所以会输出到葡萄牙,只是因为在那里出售比在这里出售可以得到更多的黄金;反过来,葡萄牙的葡萄酒所以会输出到英国,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贸易是纯粹的物物交换,那么,只有当英国能够制造便宜的呢绒,以致用一定量劳动制造呢绒,比种植葡萄能获得更多的葡萄酒时,或者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结果时,这种贸易才会继续下去。现在假定,英国发明了一种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因而自制比输入更为有利,那么它自然会把它一部分资本从对外贸易中转移到国内贸易上来:它将停止为出口生产呢绒,而开始为自己酿造葡萄酒。因此,这两种商品的货币价格也就会得到调整:在英国,葡萄酒的价格下跌,呢绒的价格不变,而在葡萄牙,这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呢绒在某一时期内还会从英国输入葡萄牙,因为它的价格在葡萄牙仍然比在英国贵;但是用来换取呢绒的将是货币而不是葡萄酒,直到英国的货币积累和葡萄牙的货币数量的减少影响了两国呢绒的相对价值,致使呢绒的输出无利可图为止。[.....]在英国由于改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它的相对价格将下跌,而呢绒的相对价格由于货币的积累而上涨。[假定]在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得到改进以前,在英国,葡萄酒的价格为每桶 50 镑,而一定量呢绒的价格为 45 镑,而在葡萄牙,同量葡萄酒的价格为 45 镑,同量呢绒的价格为 50 镑。从英国输出呢绒和从葡萄牙输出葡萄酒,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获得 5 镑的利润。商人 [— 56]可以在英国以 45 镑买进呢绒,并以 50 镑在葡萄牙将它出售,用他以葡萄牙货币购买的汇票来支付货款。[.....]当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时,葡萄牙的葡萄酒出口商就成为汇票的出售者,购买这种汇票的或者是呢绒进口商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的汇票出售给他的人。这样,两国的出口商都不必把货币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就可以获得他们商品的价款”。

(英国的进口商支付给英国的出口商,而葡萄牙的进口商支付给葡萄牙的出口商。)

“为此两国的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不需要任何直接的交易。但是即使葡萄牙的葡萄酒的价格使葡萄酒不能出口到英国,呢绒的进口商仍将购买汇票 向谁?,但是汇票的价格将较高,因为汇票的出售者知道,市场上没有方向相反的汇票他能够用来最终清算两国间的交易。他可能知道,他出售自己的汇票所得的金或银,必须实际输出到英国,给他的往来户,以便后

者有可能偿付他授权后者提出的汇票,因此,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以及他的一般利润都包括在他汇票的价格中。因而,如果这汇到英国去的汇票的溢价等于进口呢绒的利润,那么,进口当然就停止了。但是,如果汇票的溢价只有 2%,如果在葡萄牙必须支付 102 镑才能偿还英国 100 镑的债务,而成本为 45 镑的呢绒在葡萄牙却可卖 50 镑, [那么,呢绒就会进口,] 汇票就会有人购买,货币就会外流,直到货币在葡萄牙的减少和在英国的积累所造成的价格情况,使继续进行这种交易不再有利可图为止。但一国货币的减少与另一国货币的增加,不会只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而会影响一切商品的价格。因此,葡萄酒和呢绒在英国都会涨价,在葡萄牙都会跌价。例如,呢绒的价格在葡萄牙将从 50 镑跌到 49 镑或 48 镑,在英国将涨到 46 镑或 47 镑,因此,在支付了汇票的溢价以后,这样的价格就不会有足够的利润足以吸引任何商人去进口这种商品了。因此,货币在各国的分配数量刚好只是调节有利的交换率 所必需的数量。因此,一旦交换不再有好处时,货币将不再自一国流入另一国,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将停止。两国将自己生产呢绒,自己生产葡萄酒,但同时也产生了贵金属的重新分配。在英国,虽然葡萄酒将比较便宜,但呢绒将涨价,因而消费者买呢绒就得花更多的钱,而在葡萄牙,呢绒和葡萄酒的消费者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得这些商品。在改进了生产方法的国家中,物价将会上涨,而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一种有利的对外贸易部门被剥夺的国家中,物价将会下跌。但是,这对葡萄牙来说只是表面上的利益,因为葡萄牙所生产的葡萄酒和呢绒的总量会减少,而英国所生产的总量却会增加。货币的价值在英国将下跌,在葡萄牙将上涨。以货币计算,葡萄牙的总收入将减少,而英国的总收入将增加。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改良,会改变贵金属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情况,因为它会使实现了这种改良的国家的商品量增加,同时会使一般物价上涨。但是,两国间的交易不只限于如呢绒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而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商品进口和出口;货币从一国外流并在另一国积累,会影响一切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会鼓励货币以外的许多商品出口,因而也就防止了在其他情况下两国货币价值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第 143—150 页) [第 115—119 页] “除了生产和机器上的改良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不断地影响着贸易的自然进程,并扰乱货

马克思在这里不用李嘉图的用语“物物交换”(trade of barter),而用“交换率”(rate of barter)。——编者注

币的平衡和货币的相对价值。出口或进口奖励金，新的商品税，有时直接地，有间接地会扰乱物物交换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必须输入或输出货币；[.....]这样的结果不仅产生于存在这种扰乱平衡的原因的国家，而且在或大或小程度上产生于世界市场上。这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货币价值，说明在工业繁荣的国家“农产品 [价格] “所以较贵”，是因为“这些国家有技术和机器，能以它们的商品作交换来输入大量的货币”（第 150—151 页）〔第 119—120 页〕。

[—57] 因此，“除了货币价值上普通的变动和整个商业世界所共有的变动之外，在有些国家中货币也会发生局部的变动。两个国家的货币价值从来不会是相同的，因为它取决于赋税、工业技能、天然财富、气候条件的差别，以及其他许多原因..... 但是货币不论是流入或外流，都不会影响利润率。资本不会因流通的货币量的增加而增长 因为利润、地租、工资是同流通的货币货按照同一比例增加的。因此，当地租和工资提高 20%，但同时农场主资本的名义价值也提高 20%时，利润 [率] 仍然不变（第 151—152 页）〔第 120 页〕。

“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业不甚发达，各国的产品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是体积庞大的和最通用的商品，各国货币的价值，主要是由它们与生产贵金属的矿山的距离决定的。但是随着社会上技艺的日益进步和越来越采用新的技术，而各国都在某些工业部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虽然矿山的距离还在考虑之列，但贵金属的价值主要是由这些工业部门的优越性来决定。”（第 153 页）〔第 121 页〕“只有两个原因”——距离金矿的远近和工业技能与机器方面的优劣——“决定世界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因为赋税虽然会破坏货币平衡，但是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收税的国家丧失了它在经验、技能和气候方面的某些有利条件”（第 154—155 页）〔第 122 页〕。

（这里强调的是下述差别：商品是庞大、笨重的，还是体积小而包含着很大价值的；因而强调的是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差别。）

因此，在那些工业特别发达的国家中“货币的价值要比在其他国家中较低，而谷物和劳动的价格则较高”。在情况较差的国家中，因上述原因而引起

的“这种较离的货币价值不是由汇率决定的。虽然一国的谷物和劳动的价格会比另一国的提高 10%、20% 或 30%，但汇票仍可按平价流转。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的差异是事物的自然现象，并且只有在流入工业发达的国家的货币量足以使它的谷物价格和劳动价格相应提高时，汇率才能够是平价的。如果外国禁止货币出口，而且能强迫服从这样的法律，那么，它们就确实能够阻止工业国的谷物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因为假定不使用纸币，这种上涨只有在贵金属流入之后才会发生。但是这些国家却不能防止汇率变得对它们十分不利。如果英国是这样的工业国，并且能够防止货币的输入，那么，它对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汇率就会发生 5%、10% 或 20% 的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差价。当货币的流通被迫停止，货币不能达到适当的水平时，就限制不了汇率可能发生的变动。其结果就同把不能兑现的纸币纳入流通一样。这些货币必然只限于在发行国流通，因为即使它们的数量过多，也不能广泛地分散到其他国家中去。流通的水平被破坏了，汇率对流通手段量过多的国家将是不利的。金属货币的流通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贸易的趋势促使货币流往其他国家时，采取强制手段，施行无从回避的法律不让货币外流的话。当每个国家都恰好具有它应有的货币量时，实际上一国货币的价值也不会与另一国货币价值相同，因为就许多商品来说，可能有 5%，10% 甚至 20% 的差额，但汇率将是平价的。英国的 100 镑或价值 100 镑的银，将在法国、西班牙或荷兰购买 100 镑的汇票或等量的银。当谈到各国的汇率和货币的不同价值时，我们完全不必去管各国用商品估计的货币价值。汇率绝不是通过用谷物、呢绒或任何其他商品来估计不同的货币价值而确定的，而是通过用别国的流通手段来估计本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确定的。它也可以 [— 58] 通过同两国所共有的某种标准相比较来确定。如果在英国兑付的 100 镑汇票在法国或西班牙所能购买的商品的数量，与在汉堡兑付的 100 镑汇票相等，那么，英国和汉堡之间的汇率就是平价的。如果在英国兑付的 130 镑汇票能够买到的商品并不比在汉堡兑付的 100 镑汇票多，那么汇率就对英国发生了 30% 的不利差价。假定在英国，100 镑可以买到一张在荷兰收款 101 镑，在法国收款 102 镑，在西班牙收款 105 镑的汇票或权利，那么，英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汇率就对荷兰发生 10% 的不利差价，对法国发生 2% 的不利差价，对西班牙发生 5% 的不利差价。这表明这三国的货币流通的水平高于它们应有的水平，因而，减少这三国的流通手段量或增加英国的流通手段量，这三国的

通货和英国的通货的相对价值马上就会恢复平价”。近十年来，汇率对英国的不利差价一直在 20% 至 30% 之间波动，这个时期的英国货币贬值了，这并不是因为，同各种商品相比较时，一国的货币的价值不能比另一国的货币价值高，而是因为，“当英国的 130 镑以汉堡货币或荷兰货币计算，价值不高于 100 镑的金银条块时，如果不贬值，它们就不可能保留在英国。把成色十足的 130 英国金镑运往汉堡，即使要花费 5 镑，我在汉堡仍然会有 125 镑；如果不是我的金镑成色不足，我怎么会同意付 130 镑去购买一张在汉堡只能得到 100 镑的汇票呢？——这些金镑已被磨损，内在价值已经降到汉堡的金镑以下，即使花费 5 镑实际运到那里，[它们]也只能卖 100 镑。如果用的是金属镑，谁也不会否认，我的 130 镑将在汉堡得到 125 镑，但用纸币我就只能得到 100 镑；可是有人坚持认为，130 镑纸币等于 130 镑金币或银币”（第 156—160 页）〔第 123—125 页〕。

可见，李嘉图关于汇率的见解是：既然货币是按各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它们的由这种发展所引起的输出的水平，自然而然地分配于各国之间的，所以不利的汇率只是表示，汇率不利的国家没有把相应数量的贵金属输往汇率有利的另一个国家。在汇率有利的国家中，流通手段的总量增加了，因为它没有输入数量与其贸易水平相适应的贵金属。在汇率不利的国家中，流通手段贬值了，因为它把超过其贸易水平所需数量的贵金属保留在国内。如果强制地破坏平衡的原因没有从中干扰，那么，对一国不利的汇率只能提高到这样的界限，即输出金银比汇票的溢价便宜，或者说，这种溢价不会超过直接输送金银的费用，否则实际上就会引起金银的输出，从而通过这种活动使汇率恢复平价。如果发生的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或者是强制地禁止输出金银，从而强制地增加流通的金属货币量，或者是过多地发行纸币，使该国流

在手稿中笔误为 125 镑。——编者注
指的是纸币。——编者注

通中的货币贬值，所以汇票的溢价不是提高到输出贵金属所需的费用，而是超过了纸币的贬值和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的总量。汇率就是用一国的流通手段来表示另一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的。如果汇率不是平价的，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国货币的价值低于或高于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相反地，而是因为，不允许两国之中任何一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同其他国家的相比，处于被商业交易制约的较低或较高的水平上。

但是，如果说李嘉图总是从汇率不利的国家的通货过剩中得出不利的汇率的，那么，(1) 他把实际的汇率与名义上的汇率混为一谈了；(2) 对只有金属流通，并且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贵金属输出的国家来说，决不会有不利的汇率；(3) 因此，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汇率表明，货币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它的流通手段量超过了 [正常的] 水平，而是因为它是另一国的债务人。这里重要的只是：各国货币在价值上的差别不会影响汇率。

(4) “货币只充当一种尺度，用来表示相对价值”，
表示用一种商品去换另一种商品所付出的数量
(第 180、181 页) [第 139—140 页]

(5) 黄金税。(或问题：黄金生产困难的增大如何影响它的价值?)

[—59] “黄金税总是落在具有货币财产的人的身上，直到因赋税而引起的

黄金生产费用的增加，使货币量相应地减少为止。”“对货币的需求，不象对衣服或食物的需求那样有一定的数量。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定的，而货币的价值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

（以后又说，货币的数量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的。）

“如果黄金的价值增大一倍，那么只要一半数量的黄金就可以在流通中执行同样的职能，如果价值减少一半，那么要执行这些职能，黄金的数量就得增加一倍。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因课税或生产更加困难而增加 $\frac{1}{10}$ ，那么这会不会影响谷物的消费量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有一定的数量。“至于货币，则对它的需求与它的价值成正比。任何人都不能消费两倍于他平日”为满足其需要所必需的谷物量，“但是每个人在购买和出售同样多的商品时，他可能不得不用比过去多一倍、两倍或者几倍的货币量”。这里所说的是“用贵金属作为货币”而纸币尚未创立的国家……“因为纸币的数量是易于减少的，虽然其本位是黄金，其价值却可以和黄金本身的价值一样地迅速增长……如果货币的价值下跌，则对外贸易就会迫使”一国“无限制地增加货币的数量，如果货币的价值提高”，它“就只能减少货币的数量……如果 [由于赋税]，从矿山中只获得现在所生产的黄金量的 $\frac{1}{10}$ ，则这 $\frac{1}{10}$ 的价值就同现在生产的 $\frac{10}{10}$ 的价值相同……一切商品的市场价值和自然价值的一致，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增加或减少商品供应即生产的方便与否。就黄金、房屋、劳动以及其他许多商品来说，是不可能很快收到这样的效果的”（第 216—221 页）〔第 162—165 页〕。

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市场价值”。——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维持生活”。——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说的是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一致。——编者注

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难道说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增加不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吗？如果流通的只是价值高的货币，那么，它们对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交易以及对生产来说，都是不够的。例如，如果流通的只有票面为 500 镑的银行券，情况就是这样。

(6) 货币 [借贷] 的利息

“利息率归根到底总是由利润率决定的。但是它也会发生种种暂时的变动。商品的价格随着货币的数量和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例如，“当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货币价值的提高而下跌时”，工厂主和商人都愿意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大量的商品就会积压在他们手中。“他 [工厂主] 过去总是靠出售自己的商品来应付日常付款的，现在就得多方设法借款，因而常常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利息。”（第 349—350 页）〔第 253—254 页〕

可见，货币量的减少提高了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也就随着货币价值的提高而相应地下跌，因此对信贷的需求增加了，从而利息率也提高了。李嘉图为了考察利息率，他在这里如往常一样，首先是让货币量 [的变动] 直接影响商品的 [价格]，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

(7) 货币，输出和输入

[—60] “一国中一切便利输出的因素会促进货币的积累，而一切妨碍输出的因素会促使货币的数量减少。”（第 373 页）〔第 269 页〕

(8) 论货币流通与银行。纸币。恐慌。
国家发行银行券。谁有权发行纸币：
国家还是某个贸易公司？后一种
办法对贸易是否必要？黄金。

黄金所以比白银贵十五倍,是因为要生产一定数量的黄金需要十五倍的劳动(第421页)[第301页]。

一国所能使用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价值。如果流通的只是黄金,那么,需要的数量等于仅用白银于同一目的时所需白银数量的十五分之一(同上)[第301页]。“通货决不会多到泛滥的地步;流通手段价值的降低,会导致其数量的相应增加,而流通手段价值的提高会使其数量相应地减少。”(第422页)[第301页]

“在只有国家能铸造货币的时候,国家所课的铸币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通过减少铸币的数量,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到任何可能的程度。这一原理是纸币流通的基础。一切与纸币有关的费用都可看作是铸币税。纸币虽然没有内在价值,但是[限制纸币的数量],它的交换价值就会与面值相同的铸币或该铸币中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相等。由于这一原因,通过限制铸币数量的办法,也能使成色减低的铸币如同足重的铸币一样地流通。”(第422页)[第302页]

“为了保证纸币的价值,并不需要纸币能兑换为铸币,只须根据宣布作为其本位的金属的价值来调节它的数量就行了。如果这个本位是一定成色和一定重量的黄金,那么,每当黄金的价值下降,或者这样说也一样,每当商品价格上涨时,就可以增加纸币的数量。”(第424页)[第303页]

[李嘉图]认为,防止滥发纸币的

“最适当的办法莫过于使纸币发行人负有以金币或金条兑现的义务。”(第426页)[第304—305页]“为了使公众确信,流通手段的价值除了货币

本位本身的价值变动之外，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变动，同时又能用最低廉的手段来进行流通，也就是说，因而使货币流通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只要“规定 [英格兰] 银行兑现它的银行券时按照铸币厂规定的价格和成色支付金银条块而不支付基尼就行了。通过这种办法，只要银行券的价值跌到金条的价值以下，银行券的数量一定会随之减少。为了防止银行券的价格超过金条的价值，也应当规定银行有义务按照”铸币厂“价格用它的银行券来兑换本位黄金”（第 427 页）〔第 305 页〕。同时应当允许金条的输出和输入有充分的自由（第 428 页）〔第 305 页〕。

“当一国发生普遍恐慌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取得贵金属作为实现和隐藏自己财产的最好的手段。对于这种恐慌，银行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是无法防止的；银行必然要经受恐慌，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任何银行或任何国家永远不会具有国内的货币所有者有权要求提取的那么多的铸币或金条。如果所有的存户都在同一天向他们的银行家提取存款余额，那么，这时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常常“不足以满足这些要求”（第 429—430 页）〔第 306 页〕。这种制度¹⁰⁰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由于用极其廉价的流通手段代替价值极高的流通手段，国家就有可能把相等于这 [游离出来的] 数额的资本用于生产（第 432 页）〔第 308 页〕。“当货币流通完全由纸币构成，而纸币的价值又与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货币流通就是处于最完善的状况。用纸币代替黄金，就是用最廉价的流通手段代替价值最贵的流通手段，因而使国家不让任何个人遭受损失而把过去用于流通目的的所有黄金都用来交换原料、工具和食物。”（第 432—433 页）〔第 308 页〕

但终究只是银行没有贮藏在它的地下室里的黄金数量吗？

“假定装备一支远征军需要 100 万镑。如果国家发行 100 万镑纸币以代替 100 万镑铸币，那么，这支远征军的装备费用就无需由人民负担。但是，如果这 100 万镑纸币由银行发行，按 7% 的利率借给国家，那么国家就得不断地每年征税 70000 镑；付税的是人民，而收税的是银行…… 与公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发行纸币的机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商人 [或银行家] 的公司。”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那就把流通中现有的银行券增加多少倍也不够应付这种要求”。——编者注

但是由政府发行却有较大的危险性，因为政府可以抛弃流通的限制（货币可以兑换黄金等等）…… 李嘉图建议委派特别的全权代表，由他们向议会负责 [行使发行纸币的权力]（第 433—435 页）[第 309—310 页]。

[—61] 李嘉图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发行纸币的英格兰银行必须通过票据贴现和贷放货币来促进商业。他的论点如下：

贷放货币不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这样做，因为市场利润率和市场利息率不取决于纸币的发行量，而取决于实际财富的多少等等。市场利息率不是由银行决定的，不取决于银行是以 5%、4% 还是以 3% 的利息率贷款，而是取决于完全与货币的数量或价值无关的资本的使用。“无论银行是贷出 100 万、1000 万还是 1 亿，它都不能持久地改变利息率。它只会改变这样发放出去的货币的价值。”“如果银行贷款的利息率低于市场的利息率，那么，不论有多少货币都能贷放出去；如果利息率高于市场利息率，那么，只有挥霍无度的人才会向银行借款。”“有人说，过去二十年间英格兰银行以货币资助商人而大大帮助了商业，那么，其原因就在于，银行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始终是以低于市场的利息率，即低于商人能从其他地方获得借款的利息率贷款的…… 假如有一个机构定期给一半的呢绒厂主供应羊毛的价格低于市场的价格，那我们将怎么说呢？…… 这不会减低呢绒对消费者的价格，因为这种价格是由条件最不利的那部分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唯一的结果是，使一部分呢绒厂主利润的增长，超过了通常的利润率”…… 这样，银行就使“部分工业家不公平地并且在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和那些完全受市场价格影响的人相比，有可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贸易手段。整个社会所能开展的全部工业活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资本的数量，即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机器、食物、船舶等等的数量。确立了调节得当的纸币流通之后，这些东西的数量既不会因银行的作用而增加，也不会因之而减少。因此，如果国家发行纸币，即使它一张票据也不贴现，一个先令也不贷给公众，生产的规模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也有可能，等额的货币”按不同的利息率，“如 6%、7% 或 8%，贷出，这取决于借贷双方竞争的结果”（第 435—439 页）[第 311—312 页]。

“在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常常宁愿以黄金偿付债务，因为这对债务人有利。”（第 442 页）[第 314 页] 因为这比较便宜。“如果两种金属 金和

银 中任何一种都同样是合法的偿付债务的手段,可以偿付任何数额的债务,那么,主要的标准价值尺度就会不断改变。这种尺度有时是黄金,有时是白银,这取决于这两种金属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当两种金属中的一种不再是尺度时,它就被熔化而退出流通,因为它的条块的价值大于它的铸币的价值。”(第 443 页)〔第 315 页〕

(9) 关于富国与穷国的黄金、 谷物和劳动的相对价值

“当我们谈到不同国家中的黄金或白银的价值高低时,我们总是应当指出,是以哪一种尺度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否则我们的命题便没有任何概念。”例如,用橄榄油来估计,黄金在西班牙比在英国贵;用呢绒来估计,黄金在英国比较贵(第 453 页)〔第 322—323 页〕。[—61]

* 关于李嘉图对土地税观点的评注¹⁰¹

与社会地位有关的赋税

[33]地租税。“对实际地租的赋税由地主负担。”对名义地租¹⁰²的赋税“由 [原料的] 消费者负担” (第 193 页) [第 147 页]。

什一税。“应当提高原产品的价格” (第 195 页) [第 149 页]。
(这样,既不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也不由租地农场主负担。)

土地税。如果它是按地租征收的,就是地租税。如果它是按土地的肥力征收的,那就等于是什一税。如果不问土地的肥力如何,每一英亩土地都征收固定的数额,这就是特别赋税¹⁰³。这种赋税使较优土地只缴纳与较劣土地同样的赋税;因为它把较优土地和较劣土地的产品价格都提高了,结果,先是把租佃较优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在他整个租佃期间)应缴纳的追加赋税,其次又把土地所有者应缴纳的追加赋税,转嫁到公众身上(第 201—203 页) [第 153—154 页]。

对原产品的课税。提高生产费用,因而使产品的价格提高,也就是说,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第 169—170 页) [第 132—134 页]。 [33]

* 李嘉图著作名目索引草稿¹⁰⁴

[a]¹⁰⁵生活资料的价格对工资的影响(第 176—183 页)[第 134—140 页](第 360、361 页)[第 260—261 页]。

利润与工资成反比(第 23、152、153、500 页)[第 22、121、352 页]。

资本积累(第 94 页)[第 83—84 页]。

人口与工资第 93、94、95 页[第 81—84 页]。[a]

[34]关于工资(第 7、8 页)(第 151 页)第 176、177、178、179、180、181、182、183、360、361、461 页[第 11、12、120、136、137、138、139、140、260、261、327 页]。

关于利润与工资(第 21 页)(第 23 页)第 500、152、153 页[第 20、21、352、121 页]。

对外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第 135、136、137 页[第 110、111、112 页]。也论国内贸易第 138 [.....] 310、311 页[第 112、225、226 页]。

赋税(第 198 页)(第 205、206 页)(第 210 页)(第 184 页)(第 185 页)(第 384 页)[第 151、154—156、158、159、277 页]。影响第 276 页,第 242、243 页[第 204、180、181 页]。

扩大耕作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 361 页）〔第 260—261 页〕。

谷物价格并不调节其他商品的价格（对论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篇的补充）（第 364 页）〔第 262—263 页〕。

市场价格（第 504 页）〔第 349—350 页〕。

实际价格¹⁰⁶（第 460、481、499、505 页）〔第 327、329—340、351—352、356—357 页〕。

总收入与纯收入（第 512、513 页）〔第 362、363 页〕。

农业和工业上的改良对部分现存资本发生贬值的影响（第 318 页）（第 321 页）〔第 230、232—233 页〕。

第二部分地租（第 315 页注）〔第 229 页注〕。

资本（第 327 页）〔第 237 页〕。

对外贸易第 481 页〔第 339—340 页〕。

个别价格与自然价值之间的差别。

[.....] 及价格。

[.....] [34]

(大·)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1821年伦敦第三版¹⁰⁷

() 论价值

[—19]某种物品的效用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第 1 页) [第 7 页]。“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第 2 页) [第 7 页]“商品从两个源泉获得它的交换价值 : (1) 它的稀少性和 (2) 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有些商品,它们的数量不可能通过劳动来增加;所以它们的价值不会因供给增加而降低,而只是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的。它们的价值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爱好而一起变动。”(同上) [第 7—8 页] 天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其情况就不同了。当我们说到价值规律时,指的就是这些商品。“劳动能使这些商品的数量增加,而它们的生产则是通过无限制的竞争来实现的。”(第 3 页) [第 8 页]

李嘉图在规定价值时的前提就是这样。

因此,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它们的不同数量,或者是相应地体现在它们中的劳动量。因而,只要这种劳动量增加,就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劳动量减少,就降低了商品的价值(第 4 页) [第 9 页]。劳动的价值和 [这劳动所生产的] 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相等的,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因此,劳动的价值不象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第 5 页) [第 9—10 页]。因此,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现在的和过去的相对价值”(第 9 页) [第 12 页]。

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

是困难的。但是估计这些差别的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第 13 页）（第 15 页）。

（李嘉图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

在短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各种不同劳动的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第 15 页）（第 17 页）。

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包括为提供用于生产的资本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第 16 页）（第 18 页）。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第 18 页）（第 19 页）。随着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资本中的劳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很大变化（同上）（第 19 页）。“节约使用劳动总是使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不论节约的是制造商品本身所需的劳动，还是构成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本所需的劳动，都是一样。”（第 19—20 页）（第 20 页）采用象黄金这样的尺度，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原理（第 23 页）（第 21—22 页）。

“花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第 25 页）（第 23 页）¹⁰⁸第一，是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不同，第二，是维持劳动的资本与投在机器、工具、厂房上的资本的不同比例。这两种情况决定了：除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外，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也影响商品的价值（第 25—26 页）（第 23—24 页）。资本损耗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第 26 页）（第 24 页）。此外，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例如，“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第 26—27 页）（第 24 页）。“因此，两种行业使用的资本可能相等，但其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划分却大不相同。”（第 27 页）（第 25 页）工资的提高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这两种资本：一种是几乎全部预支在工资上，另一种是几乎全部投在机器上（同上）（第 25 页）。两个工厂主可能使用同量的固定资本，但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却不同（同上）（第 25 页）。此外，在这里，对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说，要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而那些几乎只用流动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出售时所获得的利润，则随着商品本身的出售就已花费在个人需要上了…… 或者也可以说，“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第 29—30 页）（第 26—27 页）。就是说，例如，有一个工厂主，他花 5000 镑

来维持劳动，花 5000 镑来购买机器 [利润是 10%]，[在第一年年底] 他的商品的值为 5500 镑，这就是说，到第二年，他靠这投在机器上的 5500 镑的利润必定又可以多得 550 镑。¹⁰⁹ [预付资本上] 又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既然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的比例量，所以包含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就可以互相交换。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 [—20] 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商品的相对价值不会受利润与工资的比例的影响 (第 21 页) [第 20—21 页]。工资的变动决不会引起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如果工资提高，那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制造商品需要更多的劳动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同样的劳动时间要支付更多的报酬而已。如果一个资本家因此就想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那么另一个资本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因而，不论在工资提高以前还是提高以后，各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主的相对状况仍然不变。工资可能提高 20%，利润按同样的程度下降，这丝毫也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化 (第 23 页) [第 22 页]。因此，工资提高，利润就下降。但是，同以前一样，主要用流动资本生产的商品将按同样的价格出售。下降的只是，例如，预付了 5000 镑的农场主的利润。因此，需要“机器或很贵的厂房”来生产商品，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商品送到市场”的工厂主，要为自己的固定资本加上较少的利润，因为利润率普遍下降了，因而与主要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相比，他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了。

在这里，假定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都一样。

……但是，这个原因的作用只是很小的，至多 [降低商品的相对价格] 6—7%，因为“利润可能经受不了比这更大的普遍而又持久的下降” (第 32—33 页) [第 28 页]。

(应当指出，李嘉图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阐明这个问题：假定一种商品只用流动资本来生产，另一种商品只用固定资本来生产。两人 [工厂主] 都使用 5000 镑资本。如果现在工资增加 10%，如果前一个工厂主原来在原料等上花费了 3000 镑，在工资上花费了 2000 镑，那么，他现在支付的工资就增加到 2200 镑。如果他

的商品过去按 10% 的利润卖得 5500 镑，那么，现在他可以卖得 5700 镑。¹¹⁰ 他的利润仍然等于 10%。而 [后一个] 工厂主的商品可以卖得 5500 镑。他的利润也仍然是 10%。但是与前一个工厂主的商品相比，他的商品的价值下降了，虽然花在两种商品生产上的劳动时间仍然一样。或者，如果前一个工厂主商品的价格不变，那么，后一个工厂主就得降低他商品的价格。这个比例作为平均数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平衡不是立即就产生的，所以资本家们都竞相采用机器。)

“持久的利润率的任何大变动，都是经过多年才发生影响的那些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却是天天都发生的……因此，商品相对价值的一切巨大变化”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引起的（第 33—34 页）〔第 29 页〕。

“花费了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会不相等……”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各种商品中某一种商品的价值较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较长……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的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的，这个差额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公正的补偿”（第 34—35 页）〔第 29—30 页〕。

可见，提高工资会引起那些主要用固定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跌，而且“固定资本量越大，商品价格也就下跌得越多”（第 35 页）〔第 30 页〕。

（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有名无实现象。第一，如果资本的大部分是由固定资本或较持久的资本所构成，或者它的商品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运到市场上，因而它出售的商品较贵，那么，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李嘉图自己所说，只是由于利润被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这就等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第二，工资的提高又反作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交换价值”。——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格”。——编者注

于固定资本,使之贬值。完成的死劳动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而死劳动所带来的利润同样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此,这里在价格上所表现出来的,在第一种场合¹¹¹是看不到的。租地农场主按同一价格出售他的产品,但他的利润率下降了。工厂主按较低的价格出售他的产品。例如,他的固定资本为1000镑。这个资本和劳动一起,生产2000镑的商品。如果现在工资提高10%,或者利润下降,那么,他必须仍然以2000镑出售他的商品;同时我们认为,在工资上[最初]花费500镑,也就是说,[利润率为]33 $\frac{1}{3}$ %。如果现在工资提高10%,那么它就是提高了50镑,即提高到550镑。因此,现在[—21]资本家的利润只剩下450镑,因为,虽然他仍然以2000镑出售他的商品,但是他得到的只有1450镑,而花在劳动上却有550镑。所以,现在资本家的利润大约只有30%,而他的1000镑不是增长到1333镑,而只是增长到1300镑。如果工厂主完全没有在直接劳动的形式上使用流动资本,这种情况就会显示出来。但是,现在在这里既然已经花了1000镑在一定劳动上,这个从他利润中的扣除额就表现为商品价格中的扣除额,因为对这个创造出来的资本来说,对完成的劳动来说,如果不改变商品的价值,这个扣除额就不再可能表现为工资的提高和与此相应的利润的下降。所以这种现象无非是价值规定对完成的劳动的反作用;这一点还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刚才假定,两个生产部门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不相同。现在我们假定,两个部门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相同,但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越低,它在性质上就越接近于流动资本。

在手稿中是1500镑,但是在上文和下文中文马克思都是根据工厂主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等于2000镑来论述的。——编者注

在手稿中错写成1033和1030,而不是1333和1300。——编者注

它将在较短时间内被消费掉，它的价值也将在较短时间内被再生产出来，以便保持工厂主的资本…… 耐久程度较低的固定资本，每年需要较多的劳动，以保持其原来的有效状态。但这样使用的劳动，可以看作是实际花费在成品上的劳动，因此，这种成品必然具有同这种劳动成比例的价值。”——“如果为维持机器的有效状态所需要的劳动量为每年50个工人，那么，我就要求为我的商品提供追加价格，其数额等于雇用50个工人来生产其他商品而完全不使用机器的其他任何工厂主所得的价格。工资的提高，对于用损耗得快的机器生产的商品和用损耗得慢的机器生产的商品，影响是不同的。在生产前一种商品时，有大量劳动会不断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上去，而在生产后一种商品时，这样转移的劳动却很少。因此，只要工资有所提高，或者也可以说，只要利润有所降低，那些用耐久程度较高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降低，而那些用损耗较快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则会相应地提高。工资下降的作用则恰好相反。”（第36—38）〔第31—32页〕因此，古老的國家总是不断地被迫采用机器，而新兴的國家则使用劳动。提供生活资料越困难，“劳动 [的价值] 必然越提高，而劳动价格每有提高，采用机器就有新的诱因。在古老的國家中，提供生活资料这种困难是经常存在的，而在新兴的國家中，人口可能有很大的增长，而工资却不会提高。在这里，提供700万、800万、900万人的生活资料，常常是如同提供200万、300万、400万人的生活资料一样地容易”（第39页注）〔第33页〕。“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代理人”即机器“所用的劳动，总是比它们所代替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通过机器的影响，食物价格的上涨就会少使一些人受到损害；这种节约表现为”机器“价格的降低”（第40页）〔第33页〕。“因此，在还没有大量使用机器或耐久资本的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会具有几乎相等的价值，只是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有了增减，这些商品彼此相对地说才会有提高或降低。但是，在采用了这些昂贵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就会具有极不相等的价值；虽然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的增减，它们的价值彼此相对地说仍然会 [提高或] 降低，可是由于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它们还会发生另一种变动，虽然是较小的变动。”（第40—41页）〔第34页〕因此，劳动价格上涨，

在李嘉图著作中不是“机器”，而是“生产的商品”，但紧接着却说，机器的实际价值不会由于工资增加而提高。——编者注

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而劳动价格下跌,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但那些主要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却下跌了(第45页)[第34页]。

有两种商品,生产其中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值1000镑,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值2000镑,这两种商品价格的比例为1:2。但不能因此就说,这两种商品是按照1000镑与2000镑的价格出售的。即使它们也按1100镑与2200镑,或者按1500镑与3000镑出售,问题的实质,它们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第46页)[第37页]。[—21]¹¹²

[—29]“判断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能根据某一农场全部产品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情况,而不能根据以一种变化不定的尺度——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值”。决定利润率、地租率与工资率的,不是这些阶级中某一阶级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是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农业和工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如果地租、利润和工资也增加一倍,那么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但如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量不均等地[而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分享上述的增加额,那么,虽然它分得的份额绝对地增加了,它还是减少了(第48—49页)[第39—40页]。从地租率、利润率、工资率的观点来考察,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变动只是它们在全部分产品中占份额变动的结果(第52页)[第41页]。

() 论地租

李嘉图研究地租,是为了弄清楚亚·斯密的下述观点是否正确:

“对土地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租的产生,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而不管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如何。”(第53页)[第55页]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

在手稿中是“不按比例地”。——编者注

“地租就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土地产品。”应当把地租与资本的利息及利润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是为使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第53—54页)(第55页)。“富于丰饶土地的地区最初拓殖时,人们是不会支付任何地租的……正如使用空气和水无须付酬一样……如果所有土地都具有同一特性,如果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质量也完全相同,那么使用它们时就无须支付任何代价,除非它所处的位置特别有利。使用土地所以要支付地租,只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质量或位置较差的土地也被投入了耕种……人口的日益增长迫使国家不得不利用质量较差的土地时,就使肥沃程度较高的土地的地租增加”……最初,“全部纯产品都属于耕者,这就构成了他所投资本的利润”……当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与原有资本]相等的追加资本而获得较少的产品时,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原因: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利润率”。如果第一份资本1000镑给租地农场主带来100夸特小麦,第二份资本1000镑只带来85夸特小麦,那么,在租约满期后,土地所有者就要索取15夸特的地租。如果租地农场主能够为他的1000镑找到更为有利的用途,他就不会为取得85夸特而使用1000镑。“一般利润率就是这样的比例,如果第一个租地农场主拒绝支付地租,那么会有另外的人愿意把超过这利润率的全部多余利润交给土地所有者……在这两种场合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使用等量资本,或者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两个等量资本而生产出不等量的产品,最后使用的资本不支付任何地租……地租总是由于使用追加的劳动量所获得的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生的”……当质量较差的土地被投入耕作时,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价格)就会提高,因为生产产品所需的劳动增加了。“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条件……在最好的土地上,花与过去一样多的劳动,仍然会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提高了,因为在较瘠薄的土地上使用新资本和新劳动的人所得的产品减少了……肥沃土地优于瘠薄土地的利益没有消失,而是从耕种者或消费者手中转到土地

所有者手中。但由于耕种较差的土地需要较多的劳动,而且由于我们只能从这种土地上获得必需的原产品的追加量,所以 [— 30] 这种产品的相对价值始终高于先前的水平…… 因此,产品 [价值] 提高的原因,不是由于给土地所有者支付了地租,而是由于生产最后获得的那部分产品所花的劳动量增加了。谷物的价格 是由在下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生产谷物所花的劳动量决定的。谷物昂贵不是因为支付地租,支付地租是因为谷物昂贵…… 土地以地租形式提供的剩余产品”,不是土地的优点,而是它的缺陷,是地力的减退…… 土地的与众不同只在于它的 [生产] 力的有限性…… 新制造的机器的生产效率并不低于旧机器的生产效率;否则,后者就会带来租金了…… “在农业中,自然劳动所以索取报酬,不是因为它做得多,而是因为它做得少”…… 人不得不汗流满面地辛勤劳动,而自然则劳动较少…… “自然的赐予愈吝啬,它为它的工作索取的代价就愈大。在自然慷慨赐予的地方,它是白白地劳动的”…… 与亚·斯密的意见相反,“在工业中”,自然为人做了很多工作。“风力和水力推动我们的机器并帮助航运。大气压力和蒸气压使我们能够推动惊人的发动机,就是自然的赐予,更不用说热在软化和融化金属时的作用,空气在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中的分解作用了。在任何工业部门中,自然都帮助了人,而且是无代价的…… 地租的增加是一国财富日益增加和为它的人口提供食物发生困难的结果。这是财富的征兆而决不是财富的原因”。财富可能迅速增长,而 “地租仍然不变或者下降。当可用土地的生产力减退的时候,地租增加得最快。在可用的土地最肥沃,输入限制最少,由于农业的改进,产量增加,劳动量并不相应增加,因而地租增加缓慢的那些国家中,财富增长得最快…… 因此,地租并不是价格的组成部分”…… 凡是“使最后的那份资本”和劳动 “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因素,都会使地租减少”…… 一国资本的减少就有这样的作用,因为随着资本的减少,人口和对谷物的需求也会减少,其结果是价格下跌,耕地面积缩减…… “资本和人口的增长,如果伴随着农业上这样的改良,其效果是” 减少耕作较贫瘠土地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财富往往是在地租稳定甚或降落的时候增加得最为迅速。”——编者注

“和劳动”一词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

的必要性,或者不必花等量的资本去耕作较肥沃的土地,那也会有这样的作用…… 不管怎样,过了一定时期之后,原产品价格的下落,[会导致]利润和积累的增加,从而导致工人就业率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对谷物的需求提高,最后,重新使地租提高到甚至超过从前的水平…… “农业的改良有两种:一种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另一种是通过改良机器使我们能用较少的劳动取得”同量的“产品”…… 属于第一类改良的是,“例如,更合理的轮作制或更好地选择肥料。这些改良使我们能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获得同量的产品…… 但要地租降低,不必要使土地休耕。只要陆续投在同一土地上的各份资本取得不同成果,并把取得成果最小的那份资本抽回就行了…… 农业上的改良使较贫瘠的土地能用较少的费用来耕作”…… 第二类改良,是“对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构成的改良,而不是对土地本身耕作的改…… [由于改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将减少,换句话说,劳动将减少,但为了获得同量的产品,则必须耕种同一面积的土地…… 这些改良会降低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下减少谷物地租,虽然它们也使货币地租减少了”。这些改良是否会减少“谷物地租,这取决于用各份不同资本所获得的产品的差额是增大了,保持不变还是减少了…… 如果这些改良能够把所用的那份生产效率最低的资本全部节省下来,那么,谷物地租立即就会下降,因为生产效率最大的资本和最低生产效率资本之间的差额缩小了,而形成地租的就是这个差额”…… 因此,“一切事物,凡是会使陆续投在同一土地上或新的土地上的各份资本所获得的产品 [—31] 的差额缩小的,都有降低地租的趋势,而一切事物,凡是会使这种差额增大的,必然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 由于生产的困难,土地所有者获得双重的利益。第一,他获得较大的份额。第二,偿付给他的商品具有较大的价值”(第 55—74 页)[第 55—69 页]。确定土地地租的因素,同样也是确定矿山地租的因素(第 76—79 页)[第 70—72 页]。“地租总是由消费者,而决不会由租地农场主负担。”(第 113 页)[第 96 页]“地租税完全落在地租上,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

“甚至超过从前的水平”一语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

“同量的”一词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以较少的劳动”。——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相对”。——编者注

会转嫁到任何消费者阶级身上……地租税不会阻碍新土地的耕种,因为这种土地不支付地租,因而不纳税……地租税也会阻碍土地的耕种,因为它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的利润税……对于土地所有者因有人使用他投在农场上的资本而得到的报酬所课的这种税,在进步的国家中,就要落到原产品的消费者身上”……投在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等等上的资本必须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但如果此税¹¹³不是由租地农场主负担,资本就不再提供这种利润,如果是他负担,那么他除非能把此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否则也不能得到他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第 191—194 页)(第 146—148 页)。“什一税是对土地总产品课的税。它落在不受地租税影响的土地上,并且使地租税所不能改变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切土地都按它所生产的产品量交纳什一税。所以什一税是平等的税”……在停滞的社会状况下,谷物价格不变动,这种税也不变动。在这种场合,什一税与原产品税是一样的。在退步的社会状况下,或者在进步的社会状况下,当农业有改良时,什一税的货币价值下降。[在农业]没有重大改良的进步的社会状况下,谷物价格上涨,什一税按其货币价值来说是较重的税……“随着总收入一起增加并落在纯收入上的赋税是难以负担的。什一税是土地总产品的十分之一,而不是纯产品的十分之一。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什一税在总产品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变,但在纯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必定愈来愈大。”(第 195—198 页)(第 149—151 页)“土地税。按地租课税,并随地租的变动而变动的土地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地租税……

在这种场合,它不影响原产品的价格,而完全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但如果土地税课在一切已耕土地上,那么它就是产品税,因而会提高”谷物的“价格”……最后耕种的土地,如果不提高产品的价格,它不会给租地农场主带来普通利润……“这种税不能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因为根据假定,土地所有者是不收地租的。这种税可以按照土地的质量和它产品的充裕程度征收,这样它就与什一税没有任何区别,或者它也可能是一种固定的税,不问土地的质量如何,在所有已耕土地上按英亩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税“将按照最劣等土地的耕种者所付的税额提高谷物的价格……因此,赋税就被转嫁到谷物消费者身上,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而且是为了在较好土地的租地农场主租佃期间每年付给他例如 100 镑 如果最坏土地生产 1000 夸特,那么,100 镑的赋税就会使每夸特谷物的价格提高 2 先令。同量资本投在较好的土地上,生产 2000 夸特,这就使它的产品的 [价格] 提

高 200 镑，虽然它与第一个资本一样，只支付 100 镑 [税款]，而后又使土地所有者增加 100 镑地租”。所以这种税“从人民钱包里所取得的多于它给国库带来的收入。法国革命前的代役税就是这类赋税”…… 这种税是按每英亩土地征收的，不是与它的实际产品成比例，而是与生产效率最低的土地的产品成比例（第 201—204 页）[第 153—154 页]。

原产品税

原产品税使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增加，因而使这种产品的价格提高…… 因而，这种税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 “按照原产品在其他商品中所占的比例，其他商品的价值也提高了…… 原产品税引起工资的提高，而工资的提高引起利润相应的降低”…… 因此，原产品税会影响利润，但不影响地租和资本的红利…… “凡其成分中不包含原产品的商品，如金属制品和陶器，它们的价格将下跌”…… 因为原产品加入各种不同商品的比例极不相同，所以“原产品税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也极不相同。在发生这种影响的时候，就会刺激或阻碍某些商品的输出，并且正如任何课税都有流弊一样，它也会破坏各种商品价值之间的自然关系。而这就妨碍全世界的资本得到最好的分配”（第 169—190 页）[第 132—145 页]。

[—32]“谷物出口奖励金使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降低，但不会长期影响它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 谷物出口奖励金使租地农场主“在国外”出售“谷物的价格低于 [这些国家的] 生产费用。因此，国外对英国谷物的需求增加，而对本国谷物的需求下降。这种对英国谷物需求的增长，会使谷物的国内市场价格暂时上涨，而且也使这一时期谷物的国外市场价格不致降到出口奖励金力图使其达到的水平”…… 因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将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 所以，“奖励金起着促进农业的作用，资本就会被从加工工业中抽出来投到农业上，直到国外市场上扩大了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为止”，结果，国内市场的价格和利润又下降了。“谷物供应增长影响国外市场时，也会使输入国的谷物价格下跌，从而把出口商的利润率限制到他刚能进行这种贸易的最低限度”…… 归根到底，降低谷物对外国人的价格，“如果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以往并不比国内市场低，那么降低的程度就等于全部奖励金；如果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高于国外市场的价格，那么，下降的程度

就较小”(第 354—356 页)〔第 255—258 页〕。“持续不断地奖励谷物出口,就会造成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因而使地租提高,因为有较差的土地被投入了耕作(第 368—369 页)〔第 266 页〕。无论是租地农场主还是工厂主,“虽然他们都关心他们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可是对提高他们商品的自然价格并不感兴趣。但土地所有者对此却很关心,因为这样就能创造地租……“奖励谷物输出和禁止谷物输入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并迫使我们耕种较贫瘠的土地,这就必然增加生产的困难”(第 370 页)〔第 267 页〕。

地租(反对亚·斯密关于地租的学说)

亚·斯密承认,矿场能否提供地租,取决于矿场的相对生产率和它们的位置(第 391 页及以下各页)〔第 281—283 页〕。可是他认为,例如就煤矿来说,决定一切矿山的产品价格,是最丰富而不是最贫乏的矿山。

关于这一点,李嘉图说:

“如果老矿不能提供必需数量的煤,那么煤的价格就要上涨,而且将继续上涨,直到较贫的新矿的所有者发现,开采这种矿他也会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为止。如果他的矿还算丰富,那么,价格无须大涨,他就可以投资获利。但如果矿并不丰富,那么很显然,煤的价格必然继续上涨,直到使他能够补偿他的开矿费用为止。”(第 393 页)〔第 282 页〕

可见,在这里,李嘉图承认,首先是价格上涨,然后比较贫瘠的土地才被投入耕作,所以这种土地是否被投入耕作取决于价格的上涨。因此,不是生产费用的增加(生产费用的增加也会引起较肥沃土地的[产品]价格上涨),而是肥沃土地的[产品]价格的上涨才使得增加生产费用来耕作土地成为可能。因此,在这里,首先发生的事情是市场价格的上涨超过实际价格,而当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相当大的程度,而且是经常需求的结果时,〔提高了的〕市场价格才会由于对坏地的耕作而固定下来。李嘉图也承认,现在问题还在于,是否真正非耕坏地不可,谷物价格是否不会重新降到它以前的水平:

“谷物种植的扩大和市场增长的需求的满足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维持劳动的基金增加，工资就会提高。工人有了舒适的生活，就会促使他们结婚，于是人口也就增加，而对谷物的需求又使谷物的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有所提高。把更多的资本用在农业上有利可图，资本继续流入农业，直到供求平衡时为止。那时，价格便会回跌，农业和工业的利润又会重新处于同一水平。”（第 361 页）〔第 261 页〕

因此，李嘉图认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实际价格的任何余额，只要是由于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土地耕作上困难的增加而产生的，它就作为利润为租地农场主所得。但是，这整个论点是大有问题的。

[— 33]“如果马铃薯象某些国家中的大米那样成了人民的普通的和一般的食物，那么，因为 [按亚·斯密的观点]，1 英亩马铃薯提供的食物将三倍于 1 英亩小麦提供的食物，现耕地的 $\frac{1}{4}$ 或 $\frac{1}{2}$ 就会立即休耕，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不可能增长到把以前耕种小麦的土地上生产的全部马铃薯都消费掉的程度。于是地租下降，只有在人口增加了一倍或两倍以后，才会重新耕种同样数量的土地并支付与过去同样高的地租。”（第 395 页）〔第 283—284 页〕“这种生产增长的全部利益首先由工人、资本家和消费者分享，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利益将逐渐转归土地所有者所得。在这些改良¹¹⁴中，社会可以立即得到利益，而土地所有者则可以在将来得到利益。除此以外，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永远是同消费者及工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第 399 页）〔第 286 页〕“土地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同商业交易毫无相同之处，因为在商业交易中，可以说，卖者和买者都同样得到利益；而在土地所有者与消费者的交易中，一方承担全部损失，另一方获得全部利益。”（第 400 页）〔第 287 页〕

地租（反对马尔萨斯的地租观点）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 这种价值纯粹是名义上的，因为它丝毫不增加社会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 100 万夸特小麦过去值 400 万镑，现在值 500 万镑，因为 1 夸特的价格不是 4 镑，而是 5 镑了。“其结果是使谷物和 [其他] 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者手里

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地租丝毫不增加国家的资源……它只是价值的转移,只对土地所有者有利而使消费者受到相应的损失。”(第 485—486 页)[第 342—343 页]

“所谓高昂的谷物价格”应理解为“不是每夸特或每蒲式耳的价格,而是全部产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余额……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下,每夸特为 3 镑 10 先令的 150 夸特谷物,比每夸特为 4 镑的 100 夸特谷物提供更多的地租”(第 487 页)[第 343—344 页]。“地租不是和耕地的绝对肥力成比例,而是和耕地的相对肥力成比例。”(第 490 页)[第 346 页]。“土地……肥力的提高”只是“使土地在将来能够支付更高的地租……非常肥沃的土地上的实际地租,可能比产量只是中常的土地上的实际地租要低……地租与产品的价值成比例,而不是与产品的多寡成比例。”(第 491 页)[第 346 页]“不论土地的性质如何,高额地租必定取决于高昂的产品价格,但如果高昂的价格是既定的,那么,地租的高度必定与产品的充裕程度成比例,而不与产品的稀少程度成比例。”(第 492 页)[第 347 页]“马尔萨斯认为,‘食物本身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认为保证居民的食物供给,就会促使他们结婚,而没有考虑到,人口的普遍增长是由资本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食物的生产只是这种需求的结果。”(第 493 页)[第 348 页]马尔萨斯认为,“如果生活资料,即最重要的土地产品,不具有使其需求随其增加的数量而增加的特点,那么,这增加的数量就会引起它们的交换价值的下降。”

李嘉图因此作出了正确的评论：

“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增加的数量是什么呢?谁去生产它呢?在存在对追加量的需求以前,有谁想去生产它呢?”(第 495 页)[第 349 页]“农业上和分工上的改良是一切土地所共同的;它们使从每块土地上所获得的原产品的绝对量增加,但恐怕不会大大破坏它们之间原来存在的比例。”¹¹⁵(第 501—502 页)[第 354 页]“影响谷物产量的,不是谷物能据以生产的价格,而是它可以出售的价格。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农业的资本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第 505 页)[第 356 页]。“公债券持有人因谷物价值大跌而得到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第 516 页)[第 365 页]

输入谷物对地租和租地农场主利润的影响

[— 34] “地租既是谷物价格高昂的结果，地租的减少便是谷物价格低廉的结果。外国的谷物决不会与国内生产的、能提供地租的谷物进行竞争。价格的下跌不可避免地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损失，直至他的全部地租都被吞没为止。如果价格下跌更多，那么，它甚至不能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就会离开土地而寻求其他用途，而过去在该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只是在那时不会更早，就会被输入的谷物所代替。”（第 519 页）〔第 367 页〕

自由输入谷物对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资本的影响

“每当谷物的供应量增加，因而谷物的价格下跌时，资本就被从较贫瘠的土地上抽出，而现在不再支付地租的比较肥沃的土地就会成为调节谷物的自然价格的新的尺度……但是有人说，资本不可能从土地上抽出，因为资本是以肥料、排水设备、篱笆等这样的形式花费的，在这些形式中，资本不可能被抽出来。这种说法部分地是正确的；但是体现在牛、羊、干草和禾堆、车辆等等上的资本是可以抽出”、出售和转移到某个其他部门的……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资本都不能从土地上抽出，那么，租地农场主就得继续生产谷物，而且要尽可能大量地生产，而不管他出售谷物的价格如何……否则，“他不可能从他的资本中得到任何收入。谷物不会被输入”？……这种低廉的谷物价格，只会影响不带来地租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较好土地的地租将下降；工资也将下降，而利润则将增加”……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这样的好处：“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的部分将较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的部分将减少……但是，如果能够从土地上抽出大量资本，那么，只有当这部分资本”在其他生产部门“能带来巨大收入的时候，它才会被抽出”……资本所有者肯放弃那部分不能与土地分离的资本，是因为他用剩下的那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比他不放弃那部分不能与土地分离的资本时更多。这里的情况正如高价买进的机器，被后来发明的更好的机器所排斥，以致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大大下跌一样。在这个场合，工厂主应该决断的问题是：究竟是要放弃旧机器，采用改良的机器而损失旧机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总是生产完全相同的数量”。——编者注

的全部价值呢,还是继续用旧机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劝他不要采用较好的机器,说这样做将会减少或消灭旧机器的价值呢?那些主张禁止谷物输入的人的看法正是这样,他们认为,输入谷物就会减少或消灭租地农场主那部分永远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第 314—318 页)〔第 228—231 页〕

不是由土地的相对肥力产生的第二部分地租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本来意义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因支出自己的资本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各种好处而在地租名义下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一旦用来改良农场,就同土地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并会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所以,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报酬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而且受一切地租规律的支配。无论这种改良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租地农场主出钱进行,当初所以进行这种改良,只是因为收入很可能”将处于资本利润的平均水平上。“但是只要进行这种改良,得到的收益就会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将经历地租所经历的一切变动。但是这种费用中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改良土地,不能长久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比如说,这种费用如果用于建筑物或其他临时性的改良,就需要不断更新,因此它不能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地租持久地增加。”(第 306 页注)〔第 223 页注〕

李嘉图在这里承认,自然肥力只能暂时地和人工肥力分开。但是必须指出,某部分的土地改良,是整个时代的成果,所以不向任何人支付报酬。例如,用现代手段耕作的地块与八世纪的地块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人为此得到任何报酬。甚至未耕地也分享到这种成果,因为未耕地也分享了那些使耕作和开荒容易十倍的现代手段。这一科学的成果已成为一般的标准了。

“任何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当租佃期满时,都必然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属于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在重新出租他的土地时由于这一资本而得到的任何报酬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但是,如果用一定量资本能从国外购得的谷物比在国内这种土地上生产的多,那就不会有人支付地租……但无论用在这土地上的资本有多大,这都没有什么害处。支出这种 [— 35] 资本,只

是为了增加产品量，这就是目的。只要社会能获得更多数量的年产品，即使社会有一半资本的价值降低或者甚至完全被消灭，对社会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在这种情况下为损失资本而叹惜的人，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第 315 页注）〔第 229 页注〕

（ ）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由生产上所需劳动时间决定的各种商品的相应数量，即为交换某一商品需要支付的数量，就是该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它并存的还有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偶然地和暂时地背离自然价格。供给不会完全与人的需要和愿望相一致……“正是由于这些变动，资本才能恰如其份地分配于各种不同的商品生产上。随着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利润就提高到它的一般水平之上或〔降低到〕它的一般水平之下，从而促使资本进入或退出某些工业部门……一切资本家都想放弃利润较低的行业而转入利润较高的行业的这种不会止息的愿望，产生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使大家的利润率平均化，或者把大家的利润固定在当事人看来可以抵销一方所享有的或看来享有的超过另一方的利益的那种比例上。这种变化的发生，不是通过工厂主完全改变他的行业，而只是通过减少他在自己企业中的投资。在一切富裕的国家中，有所谓货币所有者阶级，这些人不从事任何行业，只靠他们资本的利息生活，把他们的资本用于期票贴现或者借给社会上更有企业精神的人。银行家也把大量资本用于同样的目的。这样使用的资本形成巨额的流动资本，全国各行业或多或少地都使用它。一个工厂主不论怎样富有，大概也不会把他的营业限制在仅仅他自己的资金所容许的范围以内。他会经常使用这种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本的增减取决于对他的商品的需求的强弱。当对丝绸的需求增加而对呢绒的需求减少的时候，毛织厂主并不会把他的资本转到丝纺织业中去，而是解雇一部分工人，不再向银行家和货币所有者借款。丝织厂主的情况则相反，他会借更多的货币，于是资本就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而工厂主不必中断他通常经营的行业”……这就保证了大城市商品的合乎比例的供给……为了补偿现实的或想象的好处，例如安全舒适、清洁等等，利润率上的差别就被固定下来了……现在，大战¹¹⁶结束之后，“欧洲原来存在

的企业活动领域的划分被大大破坏了,每个资本家在现在已成为必要的新的划分中还没有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正是这种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这样调节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致在支付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工资和其他一切为维持所使用的资本的原有效率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剩下的价值即价值余额,在每个行业中都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成比例”(第 80—84 页)〔第 73—76 页〕。

如果时尚的改变(等等)增加了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但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相对量不变,那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上涨,而另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下跌;一个部门的利润就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而另一部门的利润就降低到一般水平以下。这两个不同部门中的工资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然后又出现了平衡(第 83—84 页)〔第 75 页〕。

李嘉图说:“偶然的原因在资本的各种使用领域中,可能对商品的价格、对工资和资本利润发生暂时的影响,而对一般商品价格、一般工资或一般利润则不会发生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同样发生作用。在我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在论述支配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这些与偶然原因完全无关的现象的规律时,我们现在打算完全不去考虑这些暂时影响。”(第 85 页)〔第 76 页〕

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東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都是本质的东西。

价值(自然价格)与财富的区别

“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工业中 100 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同的财富。”

(但是,价值究竟怎样增长的呢?如果撇开地租不谈,那么,很显然,不是让 100 万人而是让 200 万人劳动。也就是说,由于

人口增长的结果，即相同的生产活动倍增的结果。为此，产品不必花费比过去更多的劳动。为此，只须增加人口。增加能使人就业的资本。增加劳动部门。)

……“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裕程度。这些东西无论对货币、谷物或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高还是低，它们总是同样能满足其所有者的需要。由于价值概念和财富概念的混淆，才会有人认为：减少商品数量，就能增加财富……占有稀有商品的人如果因此而能支配更多的必需品”等等，他就更为富有，但这只是由于其他的人所占有的份额相应地减少了……如果由于某种发明，使用同量的资本和劳动可以使一国的一切商品的生产，包括黄金的生产增加一倍，那么，财富也就加倍，但价值仍保持不变……“因此，可以〔—36〕通过两种方式来增加国家的财富：通过使用更大部分的收入来维持生产劳动，——这不仅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增加商品的价值；或者通过提高同量劳动的生产率而不追加劳动量，——这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如果原先是用10人推磨，而现在发现，利用风力或水力可以节省这10个人的劳动，那么，一部分由磨粉机生产的面粉的价值，立即就会按节省的劳动量相应地下降。而社会就会按10人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量而更加富裕；用来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则丝毫没有减少……萨伊毫无根据地指责亚·斯密，说他忽视了自然要素和机器赋予商品的价值，因为他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人类的劳动……

亚·斯密并未忽视这些作，但是他很有论据地指出，虽然自然要素和机器增加使用价值（因为它们使产品更加充裕，使人更加富裕），但是，并没有增加交换价值，因为对空气、热和水的利用不支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是白白地完成它们的工作的”（第320—337页）〔第232—244页〕。

（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骗，——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是，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

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现在我们完全不谈贬值,留待以后再考察。如果 [产品的增长] 是均匀地发生的,那么,价值就永远不会变动,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就没有任何刺激了。正因为这不是均匀地发生的,所以一切冲突就发生了,但同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关于资本,李嘉图说:

“资本是用于将来生产的目的地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样的方法增加。追加资本,不论是通过提高技术和改良机器获得的,还是通过在生产上使用更多的收入获得的,它在将来财富的生产中都有同样的效力。因为财富总是取决于生产的商品量,而与获取生产上所用工具的便利程度完全无关。一定数量的衣服和食物所能维持并雇用的人数是相同的,因此,不论它们是由 100 人还是 200 人的劳动生产的,都能够保证完成相同的工作量;但是,如果在它们的生产上花费了 200 人的劳动,它们的价值就会增加一倍。”(第 327—328 页)〔第 237 页〕

第一,现在假定 100 个工人生产了过去 200 个工人所生产的同量的商品。因此,这 100 人的劳动能完成 200 个工人的工作。那么,现在劳动的这 200 工人的产品是否就因为它是 200 工人的产品,前者只是 100 工人的产品而比上述 100 人的产品具有大一倍的价值?

第二,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

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如果利用机器等等生产出追加的商品量，因而能推动追加的工人，那么，这样并没有创造任何追加的资本，而只是提高了原有资本的生产力。如果资本家用同样的 100 塔勒能够推动更多的工人，他决不会因此说他拥有追加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增加，[— 37] 因为利润率和工资相比相对地提高了，原有资本的较大部分，以资本的形式，而不是以对工人的支出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这种利益只能持续到具有同样生产率的各方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超额利润平均化为止。在相反的情况下，就应该把这看作是财富的增加，但不应看作是资本的增加。在这种平均化之后，使用价值诚然依旧增加，但资本却不再按同一比例增加了。如果同一生产部门及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的生产效率都同样地提高了，那么，虽然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资本并未增加。一国的资本将仍然不变，但将生产出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即更多的必需品等等。因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总是片面的，就是说，首先，也是价值的增长（这里，最好的机器分享中等生产效率的机器的 [产品] 的价格，正如最坏的土地也分享最好土地的 [产品] 的价格，从而也如同地租的情况一样，这里是创造价值），其次，因为资本家用同样的资本能够推动更多的工人，他也就使劳动量增加了，例如，他让 200 万人而不是过去的 100 万人进行劳动，从而也就增加了价值。

在李嘉图那里，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而同时又不象地租的情况那样，一人的所得就是他人的所失。要使价值增加，除了必须增加人口，提高资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减

低工人的相对工资，节约已完成的劳动外，首先还必须按比例地增加劳动的使用方式。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1) 要在某一生产部门中推动更多的工人，(2) 这就在与该部门进行交换的其他部门中引起相应的劳动。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工厂所能够交换的劳动不能造成 1000 个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它们就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种可交换性和等价物的创造。李嘉图在另一个地方说：

“可以认为这是普遍的永远正确的原理：只有商品的市场价格 超过它的自然价值或必要价值，才是刺激商品增产的唯一因素。”（第 504 页）〔第 355—356 页〕

可见，李嘉图在这里承认，问题不在于生产他所理解的“财富”，而在于生产“价值”。“自然价格”是在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这种斗争与李嘉图的简单的平均化毫无共同之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经常发生工业所有权对土地所有权的侵吞（也以分裂为 [农业和工业] 国家的形式），因此，一方发财，另一方贫困，所以市场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斗争，在现象上，在程度上，都和现代社会里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市场价格经常超过实际价格。

论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

（按照我们在此以前曾听说的，资本家之间为争取最有利地使用资本而进行的斗争，经常使市场价格降低到自然价格的水平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市场价值”。——编者注

——把资本按比例地使用到各不同的生产部门。但是资本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又是由需求的变化决定的。就是说，由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正是在供求范围内实现的，因为供求范围决定着各不同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

“在商品的供给未按需求的增减而增减以前，供求比例对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如果减少帽子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帽子的需求增加一倍、两倍或者三倍，帽子的价格最后总要降到其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

如果黄金的 [价值] 降低到它的生产费用的一半，那么，以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就会提高 100%，虽然对商品的需求并未增加，只是因为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与黄金相比提高了，或者说，黄金的相对价值降低了二分之一…… 罗德戴尔所提出的可以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减的八种情况；例如，A 对 B 和对 C (货币)。如果 A 的数量减少，那么，和 B 相比，[它的价值] 增加；如果 A 的数量增加，那么，和 B 相比，[它的价值] 减少；如果 A 的 [数量] 不变，而 B 的 [数量] 减少，那么，[和 B 相比]，A 的 [价值] 减少；如果 A 的 [数量] 不变，而 B 的 [数量] 增加，那么，[和 B 相比]，A 的 [价值] 增加，A 和 C 之间关系的四种情况也是如此…… 李嘉图说，“这就垄断商品来说是正确的 [— 38]，而就其他一切商品来说，在有限的时期内也是正确的。”

(当然，总是假定，需求不变而 [商品] 的数量增加或减少，或者商品数量不变，而需求增加或减少。)

……即使某种商品的生产费用降低了，如果对它的需求没有增加，它的供给量也不会因此而更多；因为“商品所以有供应，不只是由于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而是由于存在着对它的需求…… 受竞争影响而其数量又能适当增加的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不取决于供求的比例，而取决于它们的生产费用的

增减”（第 460—465 页）〔第 327—330 页〕。

决定所生产的商品量的不是它们的生产费用，
即它们的实际价值，而是它们的市场价格

（实际价格是商品能据以生产的价格，市场价格是商品能据以出售的价格。）

“影响谷物产量的不是谷物能据以生产的价格，而是它能据以出售的价格。资本受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要看谷物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的大小如何。如果这种超额对投于农业上的资本提供的利润大于资本的一般利润，资本就会投到土地上来，如果小于一般利润，资本就会被从农业中抽出。”（第 505 页）〔第 356 页〕

农业和机器的改良所起的贬值作用

“一切农业上和工业上的改良，以及一切机器的发明……当它们被采用的时候，必然会减少或消灭租地农场主或工厂主一部分现有资本的价值。”（第 318 页）〔第 231 页〕

“我们假定，用一定量的资本，一定人数的劳动可以生产 1000 双袜子，由于发明了机器，同数的人可以生产 2000 双袜子，或者 1000 双袜子和 500 顶帽子。在这种情况下，2000 双袜子的价值或 1000 双袜子和 500 顶帽子的价值，不会大于采用机器以前 1000 双袜子的价值，因为它们是等量劳动的产品。但是商品总量的价值却会减少，因为……在改良以前已经生产但尚未消费的那部分商品将受到影响；这些商品的价值将降低，因为它们的价值必须下降到在这种改良的一切优越条件下所生产的同量商品的价值水平。就整个社会来说，商品量虽然增加了……但它所拥有的价值额却减少了。通过不断增进生产的便利，我们虽然不只是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还提高将来的生产力，但我们却不断地降低过去生产出来的某些商品的价值。”（第 320—322 页）〔第 232—233 页〕

谷物价格不是其他商品价格¹¹⁷的调节者

撇开货币的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谷物 对其他物品的交换价值会不会提高呢?如果会提高,那么,谷物的价值调节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这种说法就不正确了,因为要调节其他商品的价值,它对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就得是不变的。如果不会提高,那么,必须证明,“不论谷物是从肥沃土地上还是从贫瘠土地上获得的,所用劳动量是多是少,使用还是没有使用机器,它总是可以交换到等量的其他商品。”(第 364—365 页)〔第 263 页〕

(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 [价值的] 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 [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

[— 39] (这说明李嘉图为什么要反驳谷物 [作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的调节者的定义],以及劳动价格即工资——不言而喻不是劳动本身——的定义。)(同样,他也反驳货币的 [定义]。)

“实际价格,与某些人的断言相反,不取决于货币的价值;也不取决于对谷物、劳动或某种其他商品,或所有全部商品的价值关系。”(第 499 页)〔第 352 页〕

([实际价格] 不取决于任何商品,而取决于生产商品的活动。因此,也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不取

在手稿中错写为“货币”。——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必须说”。——编者注

决于本身是商品的劳动，而取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

对外贸易和交换价值

“因为一切外国商品的价值是以和它们相交换的本国的土地与劳动的 [产品] 数量来衡量的, 所以, 即使由于新市场的发现而使本国一定量的商品能够换得的外国商品数量增加一倍, 我们所得的价值也不会更大。如果一个商人出售英国商品¹¹⁸得到 1000 镑, 他所换得的一定量外国商品在英国市场上可以卖到 1200 镑, 那么, 他这样使用他的资本就可以获得 20% 的利润; 但是他的利润以及他所输入的商品的价值都不会因为他得到的外国商品数量的增减而有所增减。不管他输入的葡萄酒是 25 桶还是 50 桶, 如果一次出售的 25 桶和另一次出售 50 桶同样能卖 1200 镑, 那么, 他的利润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两种情况下, 他的利润都只限于 200 镑, 或他的资本的 20%, 而且在两种情况下输入英国的价值都一样。如果 50 桶葡萄酒能卖得 1200 镑以上, 那么, 这个商人的利润就会超过平均利润率, 资本就会流向这有利的行业, 直到葡萄酒的价格下跌, 使一切都恢复原先的水平为止。”(第 131—132 页) [第 108 页]

为了证明外国商品的价值是由本国的土地和劳动的 [产品] 数量来衡量的, 李嘉图说:

“购买外国商品所用的那部分”英国的“土地和劳动 [产品] 可能不变, 或较多些, 或较少些。如果所用的那部分产品不变, 那么, 对”本国商品”就仍然存在着同样的需求, 而生产它们所用的那部分资本也仍然和过去一样。如果由于外国产品跌价, 可以用本国产品的较少部分来购买外国商品, 那么”本国产品中就有较大部分可以用来满足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如果所用的那部分本国产品较多, 那么, 生产本国商品所用的资本就较少, 对本国商品的需求也就较少。这样, “就有资本腾出来去购买外国的商品, 因此, 在任何情况下, 对外国和本国商品的需求的总和, 就价值来说, 要受到一国的收入和资本的限制。如果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 那么, 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就必然减少” (第 133—134 页) [第 109—110 页]。

(这是对的。例如, 土地和劳动的 [产品] 价值为 1000 镑; 就

是说，如果用 800 镑购买外国商品，那么，购买本国商品就只能用 200 镑；如果用 800 镑购买本国商品，那么，购买外国商品就只能用 200 镑，等等。这无非是说：我们所能交换的只是我们的劳动，我们劳动的产品。因为这是一定的总额，所以，在两个部门中，如果我们在这一部门用去了总额的一部分，我们在另一部门就只能用该总额的剩余部分。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在交换时不能得到更多的价值。李嘉图在这里认为，我们在交换时所得到的价值，必须立即在本国内被消耗，被交换，因而它受到国内存在的价值的限制。但是，如同一切商业民族曾做过的那样，如果我们交换时所得到的更大的价值找不到直接的等价物，我们就把例如黄金积累和储存起来。不然的话，下述一般论点也是正确的了：我们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只能创造使用价值，因为新价值是由现有劳动产品和劳动决定的，是由它必须与之交换的现有价值来衡量的。因此，现有价值永远不能增加。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新的劳动吗？难道货币只与已经创造的价值成比例，或者 [也] 与能够被创造的价值成比例？难道一国对另一国不 [— 40] 能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进行偷盗吗？

但是李嘉图说，只可能有三种情况。

我从外面或者输入商品，

或者输入货币，

或者输入收入，所以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我在交换时将得到年收入。

所有这三者，我都得在国内进行交换。但是和什么交换呢？和现有的劳动和土地的 [产品] 交换。因此，所有这三者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和土地的 [产品] 的价值来衡量的。可见，价值永远也

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

所以，原来贫穷的民族，例如荷兰人，通过对外贸易永远不可能积攒交换价值并按资产阶级的意义发财致富。李嘉图提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

当然，如果我把我自己从国外得到的新价值去交换旧价值，那么，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可以：

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我总是一而再地以新价值交换新价值，再生产全部过程；

使本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成为交换对象，赋予它以价值；把一部分 [价值] 重新输出国外，并把另一部分与我输出国外获利的同一价值相交换。这样，商业民族就能发财致富。

或者，从劳动时间来看，我所输入的多于我已经输出的。

如果李嘉图正确地断言，生产商品所以有一定的费用，并不是因为它用这些费用生产出来的，而是因为它可以 [按这些费用] 出售，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商品所以具有价值，并不是由于它的生产费用，而是因为它能和 [其他商品] 的一定的生产费用相交换。

如果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即和某一第三个量相交换的商品数量的尺度，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价值尺度本身不是价值，不是被衡量之物，因而，为了能够衡量商品互相交换的数量，首先必须商品互相交换。因此，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任何可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因此，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

这里所指的李嘉图著作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上面曾引用过（见本卷第 114 页）。——编者注

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因此，交换的能力创造新的劳动，并使新的土地投入耕作，所以交换的能力不是由劳动和土地来衡量的。不然的话，这就等于说，似乎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提供的，所以，即使商品还不是可以被交换的，它也是价值。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商品，最初是由于可交换性而得到价值的。起初，完全是由于可交换性。因为后来它们很快就要被消费掉，所以劳动必须再生产它们，如果最初它们的价值是偶然决定的，那么，现在它们的价值则由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因此，如果交换的源泉断绝，那么，生产就会停顿，就是说，李嘉图所认为的衡量交换的尺度，即“土地年 [产品] 和年劳动”也将不再存在了。)

各国的交换价值的规定

“调节某一国商品的相对价值的规律，不能调节各国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在贸易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在能获得最大利益的生产部门……这导致了最有成效和最经济的分工，因为它增加产品总量，使人们普遍得到好处，并以共同利益和交往的纽带把文明世界所有各国结合成一个全世界的社会。”(第 138—139 页) [第 112—113 页] [—40]

[—43]¹¹⁹ “一般来说，在同一国家内，利润总是处在同一水平上，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比另一个资本在使用上的安全和令人合意的程度有高低，才会发生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情况不是这样”……在利润可能有差异时，资本很快就会从伦敦转移到约克郡，“但是，如果由于资本和人口的增加，工资提高而利润降低，那么，资本和人口并不一定就从英国转移到利润较高的荷兰、西班牙或俄国”……如果在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呢绒需要 90 人，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要 80 人，而在英国，生产呢绒需要 100 人，生产葡萄酒需要人，那么，葡萄牙将出口葡萄酒，而英国则将出口呢绒……“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呢绒，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

的,情况不象两种商品都在英国或都在葡萄牙生产那样……即使葡萄牙输入的商品在该国生产时所花的劳动少于英国,这种交换也仍然会发生。虽然葡萄牙能够用 90 人的劳动生产呢绒,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 100 人的劳动生产呢绒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来说,与其挪用生产葡萄酒的一部分资本去生产呢绒,还不如用它的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它可以用葡萄酒从英国换得更多的呢绒。因此,英国是以 100 人的劳动产品去换取 80 人的劳动产品。这样的交换在同一国家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国家同许多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是很容易说明的,只要我们注意到,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以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是如何困难,而另一方面,在同一个国家里资本却可以很灵活地不断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情况就很清楚了。由此可见,一个在机器和技艺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因而可以用比邻国少得多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比输出国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行业上都比另一人强一些,但在制帽上他比他的对手强 20%,在制鞋上强 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阻碍着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是:资本不在它的所有者监督之下时所产生的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同时,任何人自然都不愿意背井离乡,断绝旧的联系,带着已经养成的习惯去服从异国的政府和新的法律。金和银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分配比例,适应于假定根本不存在这两种金属,从而各国间的贸易纯粹是物物交换时将出现的自然交换状况……一国生产上的改良,力求改变贵金属在各国间的分配状况:它力求增加商品数量,同时又使已经发生改良的国家内平均价格提高。”(第 139—149 页)〔第 113—119 页〕“各国分配到的货币数量刚好只是为调节有利的物物交换所必需的数量。”(第 147—148 页)〔第 118 页〕

(按照这种说法,物物交换不仅会引起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殖民地贸易对价格的影响

对于殖民地的限制,可以使宗主国得到特殊的利益(第404页)[第289页]。“亚·斯密自己也认为,两国间劳动分配的不善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有利于其中的一国,而另一国则受到损失。但是这一点证明,能给殖民地带来很大损害的措施,可能部分地对宗主国是有利的。”(第405页)[第290页]“关于通商条约,亚·斯密说,如果一个国家受条约的约束,某些商品只允许从某一国家进口,而不准从其他国家进口,或者只对某一国家的商品免税,而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商品都征税,‘那么如此受惠的国家的工业家和商人就会得到极大的利益;他们在’受条约束缚的‘国家中享有一种垄断的地位’。‘这个国家就成为他们商品的更广阔和更有利的销售市场,其所以更广阔,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被禁止输入,或被课以重税,数量将大大减少;其所以更为有利,是因为受惠国的商人享有一种垄断权,他们常常能以很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这在有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时是不可能的。¹²⁰因此,如果两个国家中,一个是殖民地,而另一个是宗主国,那么,宗主国压迫殖民地可以得到利益。”(第405—406页)[第290—291页]当然,一方面,(如果贸易不是为一家公司所独占)这[垄断]就会被宗主国本国商人之间[—44]的竞争所破坏……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地最多也只能按宗主国的自然价格购买商品,“而在自由贸易的场合,殖民地也许能按低得多的其他国家的自然价格购买同样的商品。”(第406—407页)[第292—293页]

“因此,这就形成了总资本的不利的分配,受到损害的将主要是受条约约束而不得不购买”生产效率最低国家的“商品的国家”(第407页)[第291—292页]。

宗主国的利益“在于:如果英国不独享供应这一特殊市场的特权,英国就不会为出口而生产这些商品;因为自然价格较低的国家的竞争将夺去英国出售这些商品的一切机会。如果英国确有把握在法国市场上或其他市场上出售同样数量的它所能生产的其他商品,得到同样的利益,那么,这就没有重大意义了”。例如,英国想购买价值5000镑的法国葡萄酒,为此,它想出售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在最不利的市场上”。——编者注

价值也为 5000 镑的自己的商品。“如果法国让英国垄断呢绒市场，那么，英国就会立即输出呢绒，但如果贸易是自由的，那么，其他国家的竞争，就会使英国呢绒的自然价格不能低廉到足以使它能够通过出售它的呢绒来获得 5000 镑。因此，英国的工业就必须转而生产其他商品，但在现存的货币价值下，英国也许不能按其他国家的自然价格出售自己的任何商品。因此，为了购买葡萄酒，英国就要向法国输出 5000 镑货币。于是，货币价值在英国上升，在其他国家下降，从而英国工业所生产的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也下跌了。英国现在可以出口商品来获得 5000 镑了，因为在它们的自然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它们现在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竞争。而现在必须按降低的价格出售更多的商品才能获得这所需的 5000 镑，但这 5000 镑已不能换得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因为法国的货币量的增加使商品 [其中包括] 葡萄酒的自然价格提高了。因此，在贸易完全自由时，为交换英国的商品而输入英国的葡萄酒”将比英国受通商条约特惠时少。法国的利益在于得到较多的英国商品，而英国的损失在于得到较少的法国商品（第 407—409 页）〔第 292—293 页〕。

“因此，不论各国生产上的相对困难程度如何，对外贸易是通过改变各国能据以生产商品的自然价格（不是自然价值）而得到调节的。而自然价格的改变，是贵金属分配的改变所引起的。”（第 409 页）〔第 293 页〕

（因而，李嘉图在这里把自然价格和自然价值区别开来。自然价格可能改变，而自然价值却并未改变。自然价格是以货币尺度表现的自然价值，这一表现可以随着货币价值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殖民地贸易如果受 [通商条约] 的约束，它“可能比完全的自由贸易更对宗主国有利。如果单个的消费者受到限制，只能与一家商店交易，这对他是不利的，如果消费者的整个国家受到限制，只能向一个国家购买商品，这对它也是不利的。”（第 410 页）〔第 293 页〕

供求对交换价值的影响

“某种商品是绝对必需品，它的生产费用的增加，不一定会使它的消费减少，因为，消费者的一般购买力虽然会因任何商品价格的提高而降低，但他们可以放弃生产费用未曾提高的某种其他商品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供应

量和需求量都仍然与过去一样，增加的只是生产费用，但价格将提高，而且必须提高，才能使生产费用已增加的的商品的生产者的利润处于“平均水平上”（第 410—411 页）〔第 294 页〕。

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所以采用改良的机器就能降低价格，并使商品在国外市场上能以较低廉的价格出售。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采用机器，而所有其他国家都采用机器，那么，它就只得输出货币，而不是输出商品，直到它把它的商品的自然价格降到其他国家的价格水平为止。但这个国家就可能不得不以两天的劳动去交换外国一天的劳动¹²¹（第 481 页）〔第 339—340 页〕。李嘉图说，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象采用机器的邻国那样明智（第 481—482 页）〔第 340 页〕。

由此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一个 [—45] 国家的明智，在于它首先借助保护关税在国内采用机器，使自己不致被迫经常以自己两天的劳动去换取别国一天的劳动？²²

总的评论。李嘉图在考察价格的调节时，太不注意数量，正如他在考察地租的调节时总是只看到一夸特的价格。但是 [商品] 能按什么价格出售，同时也取决于能够出售的数量的多少。因为某一工厂的产品的总价格 X，不管是能按 4 先令的价格出售 1000 码，还是按 2 先令的价格出售包含着等 [量] 劳动的 2000 码，总价格都一样。但在这两个场合，工厂主必须在一个场合出售 1000 码，而在另一场合出售 2000 码。商品的总价格决定于它的单位（公升、码、夸特等等）价格乘以出售的数量。

（ ）论 工 资

“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在数量上可以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第 86 页）〔第 77 页〕

“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人大体上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在人数上不

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工人养活自己以及养活家庭的能力，不取决于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量，而取决于他用这些货币所能购买的食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食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价格…… 因此，随着食物、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因为调节劳动自然价格的一种主要商品由于生产困难不断增大而有涨价的趋势。但是，由于农业的改良”，甚至从国外的进口，能使食物的价格下跌，因而会阻止它的价格的上涨。对劳动的自然价格也有同样的影响。“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下降的趋势。”诚然，制造商品所用的原料会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销而有余。”（第 86—87 页）〔第 77—78 页〕

“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缺乏时就昂贵，充足时就便宜。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工人的境况就幸福…… 但如果由于高工资刺激人口的繁殖，工人的人数增加，那么，工资又会降到它的自然水平，而且由于反作用”，常常“还会低于这一水平。在后一种场合，工人的境况最惨…… 只有在贫困使工人的人数减少，或者对劳动的需求增长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提高到它的自然水平”…… 在日益进步的国家中，〔劳动的〕市场价格在一段不定的时期内可能高于它的自然价格：“因为增加的资本推动对劳动的新的需求之后，新增加的资本又会产生同样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资本的增加是逐渐地、不断地发生的，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就会不断地推动人口的增长”（第 87—88 页）〔第 78 页〕。

工资和花在商品生产上的 劳动量之间的差别

“如果工人的报酬总与他所生产的产品的多少成比例，那么，花在商品上的劳动量就与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相等…… 但后者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的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商品的实际价值”。——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有时”。——编者注

价值却会发生同样多的波动”（第 5 页）〔第 10 页〕。“在同一国家中，生产一定量食物和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可能比另一个过去时期所需的劳动量大一倍，但工人的报酬却可能减少甚微”……因为工人所得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量，可以说是维持他的生存所必需的，所以，虽然这个数量的价值增长了，还是必须给他的…… 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这样。“在美国和波兰的最后投入耕作的土地上，一定数量的人一年所生产的谷物，要比在英国类似的土地上所生产的谷物多得多。现在假定，这三个国家的其他一切必需品都同样便宜，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给予工人的谷物量在每个国家中都与生产上的便利程度成比例，那就会是极大的错误。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良，工人的鞋子和衣服只用现在所需劳动的 $\frac{1}{4}$ 就能生产出来，它们〔按价值〕可能会下降 75%，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工人将得到四双鞋或四件衣服而不是一双鞋或一件衣服。更为可能的是，他的工资受竞争的影响和人口增长的刺激，将很快就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自然价值相适应。如果这些改良扩及〔一 46〕工人的一切消费品，那么，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在数年之后，工人所拥有的舒适品纵使有所增加，也是为数很少的。”（第 7—8 页）〔第 11—12 页〕“如果降低维持人的生活的食物和衣服的自然价格，从而减少人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生活费用，尽管对工人的需求可能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会降低。”（第 460 页）〔第 327 页〕

资本增加对工资的市场价格 和〔劳动的〕自然〔价格〕的影响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资本的数量可以随其价值的增加而同时增加。但资本也可以在其价值不增加，甚至”不断“减少时增加”。当生产追加的食物和衣服量需要更多的劳动时，就会发生第一种情形；需要同量的劳动，或者借助于机器而只需较少的劳动时，就会发生第二种情形。“在第一种场合，劳动的自然价格提高，在第二种场合，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变或者降低；在两种场合，工资的市场价格都提高了，因为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

相应地增加。对于做工的人的需求的增加，与要完成的工作量成比例。在两种场合，市场价格都有符合于自然价格的趋势，但在第一种场合，这种符合实现得较快，因为食物和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会把工人增加的工资吞掉很大的部分。因此，小量的劳动供给或小量的人口增长，将使劳动的市场价格降到当时已上涨的自然价格。在第二种场合，工人的境况将会大大改善……只有在人口大大增加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降到它的自然价格……但劳动的市场价格是否长期地提高，这取决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自然价格是否已经提高。”（第 89—91 页）〔第 78—80 页〕

劳动的自然价格的变动

“不能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 [其他] 必需品来计算也是一样。劳动的自然价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动，而在不同的国家会有很大差别。它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 现在在英国农舍中享用的许多舒适品，在我国历史的较早时期可能会被认为是奢侈品。”（第 91 页）〔第 80—81 页〕“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品 [自然价格] 不断下降，而原产品 [自然价格] 则不断上涨，所以形成了这些商品相对价值上的这样一种不相称的比例，以致富裕国家中的工人只要牺牲很少数量的食物，就能绰绰有余地满足自己其他一切需要。”（第 92 页）〔第 81 页〕

（因此，由于例如自由贸易会消灭这种不相称的比例，所以它会消灭使工人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自己其他一切需要”的源泉。在上文中（第 89—91 页）〔第 79—80 页〕，李嘉图曾认为，劳动自然价格的提高对工人的好处是很少的，而在这里，他又认为这种提高是扩大工人消费的主要源泉。）

“在劳动阶级需要最小并满足于最低廉的食物的国家中，人民遭受最大的痛苦与贫困。他们无从躲避灾难；不能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上寻求安身之所，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无法再降低了。在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缺乏时，他们只能求诸为数很少的代用品，而物价的昂贵使他们遭受饥饿所带来的几乎全部灾难。”（第 95 页）〔第 83—84 页〕

工资和地租

我们已经看到,谷物、食物的价格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涨的。因此,以货币表现的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但不是按比例地提高,所以,“在这些商品的 [价格] 上涨之后,工人买不到以前那么多的舒适品 [和必需品]。如果以前工人每年的工资为 24 镑,或者说,谷物价格每夸特 4 镑时的 6 夸特谷物,那么,如果每夸特的价格上涨到 5 镑,工人也许只得到 5 夸特。但这 5 夸特将值 25 镑”。所以虽然他的货币工资增加了,但他的谷物工资却减少了,他购买“他和他的家庭以前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能力也降低了。“但是,尽管工人的报酬实际上大不如前,工厂主的利润却减少了”。所以可以看出,是同一个原因引起工资和地租的提高。但在土地所有者那里,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同时提高,“而每一一定量的谷物又会交换到更多的”价格“没有提高的其他一切商品”;而在工人那里,虽然他的货币工资增加了,但他的谷物工资却减少了,因而他要把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维持在自然价格之上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谷物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工人也不能用降低了的谷物工资购买以前那么多的商品,因为以原产品制造的其他商品的 [价格] 提高了,他必须为此支付更多的钱,“因而他的生活状况 [— 47] 恶化了”(第 96—99 页) [第 84—87 页]。

劳动自然价格的上涨 和商品的货币价格

黄金或者铸造货币用的其他金属,是否是在工资由于食物价格提高而提高的国家内,即在工资的货币价格和食物的货币价格同时提高的国家内生产的,这一点无关紧要……如果工资价格“提高,那么,一般说来,这是由于财富和资本的增长引起了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而这种现象又会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增加。为了这些数量增加的商品的流通,即使其价格仍与过去一样,也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为了使这些商品流通,就需要更多的用以铸造货币而且只

有通过进口才能获得的那种外国商品。¹²³如果一种商品的需要量比过去增加,那么,它和那些用它来购买的商品相比,它的交换价值就会上涨”。因此,如果对黄金的需求增加,那么,同用它来购买的商品相比,黄金的 [价格] 将提高。

(这和价格不提高,需求可能增加的说法不大符合。)

“但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说商品 [价格] 提高是因为工资增加,那就会陷入明显的矛盾:因为我们一方面说,黄金的相对价值由于需求而提高,另一方面又说,黄金的相对价值由于物价的上涨将降低,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说商品的价格上涨,就等于说货币的相对价值下降,因为黄金的相对价值是以各种商品来测定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的价格上涨,黄金就不可能从国外流入来购买这些昂贵的商品。相反地,黄金将被输出国外去购买比较便宜的外国商品。因此,不论 [货币] 金属是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外国生产的,工资的增加都不能使商品价格上涨。货币数量不增加,一切商品的 [价格] 就不能同时上涨。可是货币量的增加不可能获得…… 黄金的输入是和一切用以购买黄金或支付黄金价款的国产商品的涨价绝对不能相容的。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不会改变这个问题,因为纸币必须和黄金的价值相符合”,因此,使纸币价值提高的原因,也就是使黄金价值提高的原因(第 99—101 页) [第 87—88 页]。

因此,除了因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引起的货币工资的涨跌外,“工资的涨跌有两种原因:(1)工人的供给与对他们的需求;(2)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第 92 页) [第 81 页]。

人口与工资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资本或雇佣劳动的资金的积累速度是有快有慢的,而且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当肥沃的土地为量很多时,劳动生产力一般也最大,在这种时期中,积累往往十分迅速,以致使工人的供给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资本。在有利条件下,人口可以在二十五年内增加一倍,但在同样有利条件下,一个国家的资本却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就会上涨,因为对工人的需求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当然,在发展进程中,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随着对土地的

连续的、效果日减的投资，生产率会下降，而人口 [繁殖] 力却是始终不变的。因此，有很多肥沃土地的国家，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发”而十分贫困，正如马尔萨斯所说，“那里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了压力，只要”发展文化，刷新政治等等，就能保证资本的增加大大超过人口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绝对不会增加得太快”。相反，在一些古老的国家中，“人口增加得比维持人口所需的基金还快。生产的任何增长，如果不伴随着人口繁殖率的降低，就只能助长灾害，因为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除了减少人口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第 92—94 页）〔第 81—83 页〕。

“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工资就其受供求关系的调节来说，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工人的供给将继续按照相同的比率增加，而对他们的需求则增加得较慢。例如，如果调节工资的资本增加率是每年 2%，那么，当资本仅按 1.5% 的比率积累时，工资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将会随着积累率的每一次下降而继续下去，“直到资本从而工资停滞不变为止而且将只够维持现有的人口”（第 95—96 页）〔第 84 页〕。

[—48]“工资正象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济贫法 直接产生的明显趋势是和这些明确的原理直接相反的。它没有按立法者善良的意图改善贫民的状况，而是使富人和贫民的状况都恶化了。它不能使贫者变富，而会使富者变穷。因此，只要现行济贫法继续有效，维持贫民的基金自然就会日益增加，直到国家的纯收入全部被吞尽为止。”（第 101—102 页）〔第 88 页〕

原产品价格对工资的影响

在不同情况下，原产品价格上涨对工资产生很不相同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并不引起工资的任何上涨；“在另一些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先于谷物价格的上涨，在某些场合，它对于工资的影响很慢，在另一些场合则很快。食物价格昂贵可能由于四种原因：(1) 供给不足；(2) 需求的日益增加，它最终会引起生产费用的增加；(3) 货币价值下降；(4) 对必需品的课税。歉收会使食物价格腾贵，而食物价格腾贵是迫使消费符合于供给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人们说”。——编者注
手稿中是“谷物法”。——编者注

情况的唯一方法。如果一切消费者都很富裕,那么,[谷物]价格就可能上涨,直到最不富裕的人不得不放弃他往常消费量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减少消费,需求才能下降到供给的限度以内。在这种情况下,最荒谬的办法,就是按照食物的价格来强制地调整货币工资……这种办法不能真正解救工人,因为其结果是使谷物更贵,工人最后仍然不得不根据减少了的供给来限制自己的消费。工资的提高对于领受工资的人来说,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它加剧谷物市场上的竞争,其最后的结果是增加谷物生产者和谷物商人的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事物的自然进程中,工资不会有任何上涨……工人的困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输入更多的谷物或采用最有效的代用品,立法才能对此有所帮助。如果高昂的谷物价格是需求增加的结果,那么,先于它的是工资的增加,因为人民用来购买所需物品的手段不增加,需求就不会增加……增加的工资并不总是立即花在食物上;首先花在其他享受上。但是,工人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他结婚,成立家庭,而这又引起对食物的更大的需求……“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将超过一般的水平,直到必需的资本量投放到谷物生产上为止”。如果新耕种的土地[同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肥沃程度相同,那么,“谷物价格就会降到以前的水平;如果它比较贫瘠,谷物价格就会持续地高于以前的价格”。只要得到必需的工人的供给,那么,工资是否降低到以前的水平,或者仍然高于这一水平,那就取决于上述耕作情况了……“当人口受到刺激时,所产生的结果往往超过当时情况所需要的程度:尽管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人口与维持工人的基金的比例将比资本增加以前大。于是,就会发生一种反作用,工资就会降低到自然水平以下,并一直继续到供给和需求恢复往常的比例时为止。”最后,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和对原产品的课税,谷物价格会上涨,但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并未改变[产品]的产量和工人人数,所以劳动的货币工资会提高;这对实际价值并无影响……对[原产品]的课税使工人受到的损害,等于任何其他赋税使他们遭受的损害:“赋税可能侵占维持劳动的基金,从而妨碍或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第176—181页[第136—141页],上面关于赋税的影响的引文的最后一部分在第183页[第141页])。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工人的实际报酬”。——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工人阶级”。——编者注

“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规则地增加时，工资会提高，而谷物价格依旧不变或上涨得较少；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减少时，工资会下降，而谷物价格依旧不变或下降得很少，并且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原因在于，劳动这种商品的数量不能随意增减。”如果对帽子的需求增加，帽子的价格就会上涨，但是 [—49] 时间不会很长，因为很快就会得到相应的供给。但工人的情况就不同：工人人数不可能迅速随着资本的增减而增减…… “因此，当维持劳动的基金迅速增加时，却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才能严格地调节劳动价格。”（第 181—182 页）〔第 140 页〕

（ [工人人数] 可能由于机器的采用而“十分迅速地”增加，因为机器的采用会相对地增加工人的人数。）

“如果工人只消费谷物，如果他所得到的那份谷物额是最低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些理由假定，付给工人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再减。但是，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时，劳动的货币工资”往往“完全不增加，而且从来也不会按比例增加，因为谷物虽然是工人消费品中的重要部分，但毕竟只是一部分。假定工人的工资，一半用在谷物上，另一半用在肥皂、蜡烛、燃料、茶、糖、衣服等等上，也就是用在 [价格] 没有上涨的商品上；那么，在每蒲式耳谷物值 16 先令的时候，他得到 $1\frac{1}{2}$ 蒲式耳小麦或 24 先令，和在每蒲式耳谷物值 8 先令的时候，他得到 2 蒲式耳小麦或 16 先令，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工资只增加 50%，而谷物的价格则上涨 100%”（第 360—361 页）〔第 260 页〕。

（这一点应该知道，特别是关于赋税的地方，因为李嘉图自己也承认，工资是能够经常被压低的。甚至由谷物构成的那一部分工资，尽管它已达到最低限度，仍然可以进一步压低，因为可以用马铃薯代替谷物，或者象在苏格兰那样，可以用黑麦代替小麦等等。）

机器对工资的影响

李嘉图说，当初，他原先的看法是这样：

由于采用机器，商品变得便宜了。因此，工人阶级就有可能“用同样的货币工资买到更多的商品。工资不会降低，因为资本家仍然能够需求和雇佣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虽然他也可能不得不用它来生产新的商品，或者至少是用它来生产多少有些不同的商品。如果由于使用机器，等量的劳动所生产的袜子等于以前的四倍，而对袜子的需求只增加了一倍，那么，一部分工人就必然会从织袜业中被解雇。但是，由于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继续存在，而且资本的所有者把资本投在生产上对自己有利，所以我认为，这种资本会被用来生产其他有用的商品，面对这种商品也必然会有需求的”。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不变，工资不变，而商品的价格由于采用机器而降低了（第 467—468 页）

〔第 332 页〕。“但我现在深信，用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往往是极为有害的。”（第 468 页）〔第 332 页〕“我的错误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假定社会的纯收入增加时，其总收入也会增加。但是，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从中取得他们的收入的那种基金可能增加，工人阶级所依靠的另一种基金却可能减少。由此可见，使国家纯收入增加的那种原因，同时也能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第 469 页）〔第 332—333 页〕

现在，〔李嘉图〕证明，

在采用机器的时候，首先可能生产较少的总产品（工人是依靠总产品来维持的），并且同样人数的工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又能找到工作：“生产的增加以纯产品的形式所提供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同从前以总产品的形式存在的数量相等”（第 471—472 页）〔第 334 页〕。在采取机器以后，工厂主生产的产品将会比以前减少；“因为产量中为支付大批工人工资而出卖的那一部分，现在雇主已经用不着了”（第 472—473 页）〔第 334—335 页〕。“工人阶级认为采用机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并非基于成见与错误，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使用改良的机器”。——编者注

而是符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的……如果生产手段由于采用机器而得到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增加得很多,以致总产品不减少,那么,一切阶级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大大改善,原因是:(1)对家庭仆役的需要会增加;(2)纯产品如此丰富,可以刺激人们将收入积蓄起来;(3)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一切消费品价格低廉。”(第474—475页)[第336页]。“用收入而不是用国家的资本来进行的战争,有助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第477页)[第337页]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参加到跟其他劳动者的竞争中去,因此,“工资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同上)[同上]。[—49]²⁴

[—53]“如果我在我的农场本来雇用100人,后来发现,把原来给与50人的食物用来养马,在付了买马资本的利息以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原产品,那么,用马来代替人对我有利,于是我就会这样做。但这对于工人将是不利的,除非我所得的收入增加很多,足以使我”兼用人和马,“否则显然人口将会过剩,工人的生活状况就会普遍下降。”(第478页)[第337—338页]但是,改良的机器的“发明是逐渐出现的,其作用与其说是使资本从现在的用途中转移出来,不如说是决定被积蓄和被积累的资本的用途”(同上)[第338页]。“资本和人口每有增加,食物的[价格]就会因为生产它们更加困难而普遍上涨。食物[价格]上涨的结果是工资的提高,而工资每有提高,就有一种倾向,把被积蓄起来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投在机器的采用上。机器和劳动经常在竞争,劳动[价格]上涨之前,机器往往是不会被采用的。在容易取得人类食物的美洲和其他很多国家里,采用机器的吸引力不象在英国那样大,因为在英国食物很贵,而生产食物需要很多劳动。劳动[价格]提高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因此,资本每有增加时,其中大部分总是用在机器上。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继续[增加],但不会与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比率必然是递减的比率。”(第478—479页)[第338页]²⁵“改进机器的结果,总是使按商品计算的纯收入增加,这种增加会导致新的积蓄和积累。这种积蓄是逐年进行的,不久必然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数额远大于当初由于机器的发明而引起的总收入的损失。这时,对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第480页)[第339页]

工 资 税

“工资税使工资提高，因而”使资本的利润“降低”。“对必需品的课税必然使必需品的价格提高，而工资税则不然。因此，负担工资税的，是 [劳动] 的雇主，而不是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也不是任何别的阶级。工资税完全是利润税，必需品税则部分是利润税，部分是对富有的消费者的课税。所以，工资税的最后结果同直接利润税的结果完全一样。”（第 245 页）〔第 183 页〕“商品的市场价格最后总是由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的，而后者本身又取决于生产的便利程度，但产量却不与生产的便利程度成比例。”（第 248 页）〔第 185 页〕“‘劳动价格可以清楚地说明社会对于人口的需要’ 马尔萨斯语……但是，如果工人的工资原来只能供养必要的人口，那么，对工资课税以后，就不够” 抵补这笔开销了…… “因此，只有提高工资，劳动的供给才不致中断。”（第 250—251 页）〔第 186—187 页〕“如果对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减少，而其数量又不能减少，那么，它的价格就不能与税额成比例地上涨，这是没有疑问的…… 同样的原因也往往影响到工资。工人人数不能按照雇用他们的基金的增减的比例而迅速地增减，但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对劳动的需求未必会减少，即使减少，也不会与税额成比例。课税所得的款项也由政府用于维持工人。”（第 252 页）〔第 187—188 页〕

“只有一小部分赋税会因对劳动需求减少而由工人自己支付。因为每一种赋税都有使劳动需求减少的趋势。”（第 269 页）〔第 199 页〕

（李嘉图在这里，象在别处一样，总是谈到不变资本，它可以从一个企业撤出，投入另一个企业。例如，李嘉图认为：

如果盐税使法国的盐的生产减少一半，那么，资本也只能有以前的一半用在盐的生产上，而另外一半则用于其他商品的生产。¹²⁶

然而，正是在象法国那样的国家里，大部分资本是由同农民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少量的农民固定财产构成的。因此，如果象盐税那样的赋税把盐的生产缩小了，那么，资本就化为乌有，而决不会游离出来作其他某种用途。）

再论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货币工资并不随着原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因为工人可以满足于较少的享受品。诚然,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能本来就很高,因而经得起某种程度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下降就会被遏止,但是,不可能设想,在必需品价格逐渐上涨时工资的货币价格却下降或者保持不变”(第117—118页)[第99—100页][—53]。¹²⁷

() 论 利 润

利润率的不不断变动。

产品价格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56]“耕种调节[谷物]价格的那一等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和生产[工业品]的工厂主,他们的商品的全部价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工资。”(第107页)[第92页]“假定谷物和工业品始终按同一价格出售,那么利润的高低就会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如果现在谷物价格提高是因为生产谷物需要更多的劳动量,那么,工资就会提高,利润就会降低。”如果工厂主出售他的商品得到1000镑,那么,他的利润就取决于工资是800镑还是只是600镑。原产品[价格]的提高同样也影响到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为为此“他要支付地租,或者为了得到同量产品而使用追加工人”,而原产品价格的上涨只够弥补这两种追加的开支之一,但“不会为他补偿工资的提高”(第108页)[第92—93页]。“无论归于农场主的产品是180、170、160、还是150夸特,他总是得到”——无论是起初从180夸特那里,以及后来从170夸特等等那里——“720镑¹²⁸,因为谷物价格的上涨与数量成反比。”(第112—113页)[第96页]“利润决不能高到从这720镑中取出那样大一部分,以致余数不足以给工人提供绝对必需品;但工资也决不能提高到使这个总额不剩下一部分作为利润。”(第113页)[第96页]

在手稿中是“原产品”。——编者注

“我们没有考虑年成好坏所引起的偶然变动，也没有考虑人口状况受到突然影响而造成的需求增减所引起的偶然变动。我们所谈的是谷物的自然的和不变的价格。”（第 114 页）〔第 97 页注〕“因此，租地农场主保持低的原产品自然价格对他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使用者（第 114 页）〔第 97 页〕。

“只有少数商品的价格不受原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为总有一部分原料”是商品的构成成分。商品〔价格〕“所以上涨，是因为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花费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工厂主对其雇用的工人支付了更多的工资。在一切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在商品上花费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珠宝制品、铁器、银器和铜器不会涨〔价〕，因为它们的成分中没有地面上的原产品”（第 117 页）〔第 99 页〕。

“用工资购买的，除开食物以外的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利润产生一样的或者大致一样的影响。”（第 118 页）〔第 100 页〕如果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自然价格，那么，这个特殊生产部门中的利润当然就超过一般的利润水平。“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结果。”（第 118—119 页）〔第 100 页〕“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需品的价格，而必需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第 119 页）〔第 101 页〕

“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了生产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种重力作用，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由于农业科学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生产费用降低（第 120—121 页）〔第 101 页〕。随着食物的自然价格的生长，“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也上涨，这种上涨是制造这些商品所用原料的价值增加的结果，自然会进一步使工资提高，并使利润下降”（第 122—123 页）〔第 103 页〕。

“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不能生活。他们的积累动机随着利润的每次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能相应地补偿”他们用于生产的资本必然会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的动机就会完全停止”（第 123 页）〔第 103 页〕。此外，利润率的降低比上面计算中假定的要迅速得多，因为如果产品的〔价值〕大大提高，那么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须由许多价格已经增加的商

品组成。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他原有资本的 6%，那么现在就只有 3%。例如，3000 镑按 6% 计算为 180 镑 [利润]，6000 镑按 3% 计算也是 180 镑 [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持有 6000 镑的新租地农场主要经营农业就只有接受这种条件”（第 123—124 页）〔第 103 页〕。

一部分工厂主同样会得到一些补偿。“啤酒业者、烧酒业者、毛织厂主、亚麻厂主减少的利润，由于他们储存的原料和成品 [—57] 价值提高，会得到部分的补偿”；但是，金属制品、珠宝制品等等的工厂主以及其资本完全由货币组成的人，他们就得不到这样的补偿（第 124 页）〔第 104 页〕。

另一方面，“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 10 万镑，而利润率从 20% 降到 19%，18%，17%，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 20 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 10 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 30 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20 万镑的 19% 大于 10 万镑的 20%；30 万镑的 18% 大于 20 万镑的 19%；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又降低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额减少。例如，假设积累达到 100 万，利润为 7%，利润总额就是 7 万镑；如果现在 100 万镑再加上 10 万镑，而利润降到 6%，那么，虽然资本总额从 100 万镑增加到 110 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 66000 镑，或者说，少了 4000 镑。”（第 124—125 页）〔第 104 页〕“但是，只要资本提供利润，资本的积累就不能不既增加产品的数量，又增加产品的价值。多投 10 万镑的追加资本，并不使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降低其生产力。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一定会增加，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不仅由于在原有产品量上加上了追加量的价值，而且还由于生产最后那一份土地产品的困难加大而使全部土地产品得到了新价值。不过，在资本的积累已经很大时，尽管有这种增加的价值，其分配方式会使归于利润的价值比以前少，归于地租和工资的价值将增加”…… 在一定的阶段上，“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所得到的比这一追加的产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的地位，甚至能够侵占资本家原有利润的一部分…… 唯一得到利益的是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得到”更多的产品，而且产品又包含着更大的价值……

增加的工资，对工人来说，是有名无实的，而 [实际工资] 甚至下降……“虽然生产出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后所剩余的部分中被生产者消费的却占更大的比例，而规定利润的正是这个比例，而且也唯有这个比例…… 支付地租以后留下来准备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产品中归工人所有的将占更大的比例。每一工人所得到的可能减少，但随着租地农场主所保留的全部产品的增加，工人就会增加，所以在全部产品中就会有更大部分的价值为工资所吸收，而作为利润的那部分的价值则会减少。”（第 125—128 页）〔第 104—106 页〕

因此，利润率“都取决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生产“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因此，积累的效果是因国而异的，并且主要是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第 128 页）〔第 106—107 页〕。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黄金是本国的产品，还是非本国的产品，“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但是，我们假定，发生了另外的情况，即商品的价格由于工资的提高而上涨，那么，工资的提高仍然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假定制帽业者、织袜业者、制鞋业者每人都多付了 10 镑工资”，他们的产品的 [价格] 也都上涨了 10 镑，因此，“他们的景况并未变得更好些。如果织袜业者出售自己的袜子所得到的是 110 镑而不是 100 镑，那么，他的利润还是同以前一样的货币额，但是他”用这 110 镑“所能交换到的帽子、鞋子或任何其他商品都将减少 $\frac{1}{10}$ ，并且因为他用以前的积蓄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因工资增加而减少，所能购买的原料也因价格上涨而减少，所以他的景况并不会比他在货币利润实际减少，但一切物品都保持原有价格时更好……

事实上，只有用来估量价格和利润的中介物的价值降低了”（第 129—130 页）〔第 107 页〕。

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工资可能提高 20%，而利润也因此按或大或小的比例降低，但这不会引起”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的任何变动”（第 23 页）〔第 22 页〕。

“利润取决于工资，不过不是名义工资，而是实际工资；不是一年内付给

在李嘉图著作中加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资本”。——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为工人提供”。——编者注

工人的镑数，而是为获得这些镑所必需的工作日数。因此，虽然一国的工人每周得 10 先令，而另一国的工人每周得 12 先令，两国的工资仍然可以恰好相等 [—58]，工资对地租以及对从土地所取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也可以恰好相等。”（第 152—153 页）〔第 121 页〕

“工资分得的份额越小，利润分得的份额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第 500 页）〔第 352 页〕

李嘉图的大多数论敌，例如象威克菲尔德¹²⁹等人，都断言他不能说明 [价值] 的余额。例如，一位工厂主把 30 镑用在原料上，20 镑用在机器上，50 镑用在工资上，总共用了 100 镑。他出售他的商品得到 110 镑。这 10 镑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定工厂主现在把 50 镑用在机器上，30 镑用在原料上，20 镑用在劳动上，总共用了 100 镑，他出售自己的商品仍然是得到 110 镑。这 10 镑同工资有什么关系呢？须知工厂主的利润取决于他的 100 镑卖到多少镑，而不取决于劳动花去他多少镑。那么，利润是取决于商业吧？可是，是谁把这 10 镑支付给工厂主呢？是商人。然而这位商人又是从谁那里取得这偿付的 10 镑的？是从另一位商人那里。这另一位商人又是从谁那里取得的呢？归根到底，是从消费者那里。但谁是这个消费者？必然是土地所有者、工厂主或工人。如果是土地所有者，他是用什么来支付的？是用他的地租。如果是工厂主呢？他是用自己的利润来支付。如果是工人，他是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但是，地租和工资，本身就是工厂主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他能在商业中得到 100 镑之外的 10 镑，只是因为他或另一个工厂主当初在生产中已经创造了这 10 镑。这是十分清楚的。商人们，最后还有生产者，可能互相欺骗。如果全部余额是 100，在交换中，一个人可能从这全部余额中得到 20，第二个人得到 40，第三个人得到 10，第四个人得到 8，第五个人得到 6，第六个人得

到 4，第七个人得到 2% 等等。但是，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

同样 [可以说]，一个阶级即工业家阶级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级进行欺骗而使一个国家里的利润不断地增大。但是，每一个有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是利润或工资中的一个扣除额。

或者，也许有人会说，总产品增加了。资本家在生产中投入了 100，而得到的是 110 的产品。因此，他在抵偿自己的一切费用之后，在他手里还留下 10。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为了使利润的价值增长，必须存在着降低了价值的第三者。如果说，资本家在 100 当中，以 30 用于原料，20 用于机器，50 用于工资，然后把这 100 出售而得到 110，那么，人们忘记了，如果资本家不得不支出 60 用于工资，在出售价格为 110 的情况下，他就根本得不到任何利润，无论是 8 或 2% 等等。他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别的产品，而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比如说，他出售包含着 20 个工作日的产品，换来别的产品。余额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

实现。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 20 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 10 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¹³⁰。

资本的积累

[—59] “当人口对生活资料发生压力时，仅有的补救办法是，或减少人口，或更迅速地积累资本。在一切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富庶国家中，后一种补救办法既不是十分切实可行的，也不是非常值得向往的，因为这种办法如果推行过度，其结果会使所有的阶级陷于同样的贫困状态中，但在贫穷国家中，这是消除灾害的唯一办法。”（第 94—95 页）〔第 83 页〕

贸易对利润的影响

对外贸易的影响。

“资本积累有两种方法：增加收入或减少消费。如果我的支出照旧不变，而我的利润由 1000 镑增加到 1200 镑，那么，我每年的积累就会比以前多 200 镑。如果我的利润照旧不变，而我从支出方面节省 200 镑，也会发生同样的结果：在我的资本上每年增加 200 镑…… 如果由于采用机器而使我用收入所购买的全部商品的 [价值] 下降 20%，我就能够象我的收入增加 20% 时同样有效地进行积蓄；但在一种情况下，利润率是停滞不动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提高 20%。如果由于输入“外国的粮食”，“我能够节省我的支出 20%，其结果就完全象机器降低了它们的生产费用一样，但利润不会增加。因此，虽然市场的扩大可以同样有效地增加商品的总量，从而使我们能够增加为维持劳动和为 [获得] 劳动所利用的原料之用的基金，但利润率的提高却不是市场扩大的结果…… 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者由于机器的改良，工人的食物和必需品能按降低了的价格送上市场，那么利润就会增加”。否则，利润就不会增加…… “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及其他贵重商品的价格即使降低 50%，工资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利润也会保持不变。所以，对外贸易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廉价的外国商品”。——编者注

虽然对国家极为有利，因为它增加了用收入购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并且由于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而为节约和资本积累提供刺激，但是，如果进口的商品不属于用工资购买那一类商品，就根本没有增加、提高利润即利润率 的趋势。”（第 135—138 页）〔第 110—112 页〕

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从商品产地取得商品，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它的地点。所以商业使我们能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这话说得对，但是，商品是怎样取得这个追加的价值呢？是在生产费用上首先加上运费，其次再加上商人预付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之所以有更大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增加的原因一样，因为它在被消费者买去以前，在生产上和运输上已经费去更多的劳动。这不能算作商业的一种好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商业的全部好处归结为使我们能够取得更有效用而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的一种手段。”（第 309—310 页注）〔第 225 页注〕

国内贸易的影响。

“以上关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利润率决不会由于分工的改进、机器的发明”，交通的进步，“或者在商品制造或运输上采用任何节约劳动的方法而提高。所有这些原因都影响价格，对于消费者极为有利”，因为他用同样的劳动或用同样劳动的 [产品的] 价值换来更多的商品；“但是，它们对于利润却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工资的任何降低都使利润提高”，

（所以，〔—60〕即使工资降低是由食物 [价格] 下降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也是一样），

“但是对于商品价格毫无影响。前一种情况对一切阶级都有利，因为一切阶级都是消费者；后一种情况只对生产者有利；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一切物品的价格仍旧不变”（第 138 页）〔第 112 页〕。

贸易进程中的突然变化

“在富强的国家，大量的资本都投在机器上；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按比例

来说,固定资本较少,流动资本多得多,因而”手工劳动占支配地位“因此,在富强的国家,商业和工业上的突然变动所带来的灾难,比如在较贫穷的国家大”。把流动资本从使用它的部门中抽出来而转投入另一个部门,比固定资本容易。“为一种目的而制造的机器,往往不能转用于另一种生产的目的;但一个部门的工人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却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部门的工人的生活。或者说,同一个工人虽然改变了他的职业,但可能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和住房。然而,这是富裕国家必须容忍的不幸。为这种不幸而埋怨,就好比一个富翁为了他的船只在海上会遇到各种危险,可是他的穷邻居的茅屋完全没有这种危险而长吁短叹一样,是没有道理的。”(第 311 页)(第 226 页)

积累对利润和利息的影响

“如果没有某种引起工资提高的持久的原因,任何资本积累都不能使利润持久地降低……亚·斯密把”利润“的下降归因于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但是,当资本增加时,运用资本实现的工作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家都不会得不到使用……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在荷兰,利润所以降低,是因为这个国家“消费的谷物几乎全部必须从国外输入”,此外,由于“对工人的必需品征收重税”,所以提高了工资(第 338—340 页)(第 246、247 页注)。

(李嘉图在这里忽略了我们以前在考察他的价值规定时已经指出过的事实,即交换是价值规定的一个本质的条件。当然,资本家可以经常地同工人进行交换。但是,资本家只有当他交换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有它的界限,这界限就是他人购买国内甚至世界市场上某个市场所能生产的某种特定商品的资力和需求。正是市场——交换者

在手稿中笔误为“工资”。——编者注

见本卷第 117—119 页。——编者注

——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 [资本] 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

李嘉图针对亚·斯密的下述论点：

一部分资本 [生产] 的“过剩产品，必须输出国外，以换取国内有人需要的某种物品”，

进行反驳说，

谁强迫我们“生产出过剩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呢”？如果使用在它们的生产上的一部分资本无利可图，“资本就会转移到某种”

(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某种”一词)

“更为有利的使用领域”……市场的商品充斥只能是某种特殊商品，而绝不可能是——一切商品……“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引起利润”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而利润却低……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 [—61] 在这一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第 341—344 页)(第 248—249 页)。

(李嘉图用他的“制造一些他种商品”进行的答辩是极其贫乏的。他说：

“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

(而且对外贸易断绝了)，

“难道我们不能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们需要的某种其他物品吗？”(第 346 页)(第 251 页))

“虽然利率归根到底总是由利润率调节的，但也会由于其他的原因而

发生暂时的波动……当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供给增多或需求减少,或者由于货币价值提高而下跌时,工厂主不愿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他的为数很大的成品就会积压起来。他一向靠出售自己的商品来支付的日常付款,现在就得设法借款支付,而且常常必须支付高额的利息率。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由于] 银行滥用职权而造成的货币量的增加,虽然归根到底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但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影响利息。“公债券行市不是判断利息率的可靠标准。”在战争时期,公债的发行如此频繁,以致“有价证券的行市来不及在公平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对政治事件的预测也会发生这样的影响。“相反地,在和平时期,抵偿基金的作用和”一些人“不愿把自己的资金从他们一向习惯的、他们认为稳妥的而又能按期得到股息的投资领域抽出,使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从而就使它的利息下降到市场水平以下”。此外,“政府对各种有价证券支付不同的利息。本金 100 镑利息为 5% 的证券”常常“可按 95 镑出售,而每年只有 4 镑 11 先令 3 便士利息的 100 镑国库证券”,常常“可卖 100 镑 5 先令,因为银行家需要这些国库证券的一定部分作为稳妥而又可以随时变卖的投资”(第 349—351 页)[第 253—254 页]。

论总收入和纯收入

“亚·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而非大量纯收入中所得到的利益”,

(由此也就夸大了把大部分资本或全部资本使用在农业上的利益)。(现在李嘉图反对这种看法。)(由此,亚·斯密¹³¹也提出把产业部门按其有用性来排列:农业,制造业,最后是用于对外贸易的资本。)

“一国的全部产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工资,另一部分为利润,第三部分为地租。只有从后两部分中才能扣出赋税和积蓄。对于一个拥有 2 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 2000 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 2000 镑,不管他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特殊种类的人”。——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有时”。——编者注

的资本是雇用 100 个工人还是 1000 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 1 万镑还是卖 2 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 1000 万还是有 1200 万，都是无关紧要的。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必须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如果 500 万人能够生产 1000 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么 500 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假如生产同量的纯收入需要 700 万人，也就是说，要用 700 万人来生产足够 1200 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海陆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第 415—417 页）〔第 297—298 页〕“在各种行业在各国间的分配中，贫国的资本自然将用于能在国内维持大量劳动的行业，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容易获得增长着的人口所需的食物和必需品。相反地，在富国中，那里的食物昂贵，在自由贸易时，资本自然将流向在国内只需维持最少数量劳动的部门，例如，海运业，同遥远的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以及需要昂贵机器装备的部门，流向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所使用的”手工“劳动成比例的部门”（第 418 页）〔第 299 页〕。

[—62]“区别总收入和纯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赋税都必须从社会纯收入中支付。假定一个国家在一年中能够向市场提供的全部商品即全部谷物、原产品、工业品等等价值为 2000 万，为取得这个价值需要一定人数的劳动，而这些工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要花费 1000 万。这个社会的总收入是 2000 万，纯收入是 1000 万。根据这个假定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工人得到的劳动报酬只能是 1000 万；他们可能得到 1200 万，1400 万或 1500 万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 从纯收入中 [得到 200 万、400 万或 500 万]。余下的就会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但是全部纯收入不会超过 1000 万。假定这个社会纳税 200 万，它的纯收入就会减到 800 万。”（第 512—513 页）〔第 362 页〕

利 润 税

“对奢侈品所课的税，只会落在这些奢侈品的消费者身上。”对必需品所课的税，只要它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它就不仅落在作为消费者的雇主身上，而

且也会影响利润率(第 231 页)[第 173 页]。“对于利润的不公平的课税,将使承担这种税的商品涨价…… 如果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按利润的比例课税,那就会提高一切商品的价格。如果为我们提供造币材料的矿山也在国内,并且对矿主的利润也课税,那么,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会提高…… 如果货币不课税,因而保持了它的价值”,那么,等量资本获得的等量利润都缴纳等额的赋税。“如果税额为 100 镑,那么,帽子、呢绒和谷物的价值都各增 100 镑。如果制造帽子的工厂主从他的帽子上所得的利润不是 1000 镑,而是 1100 镑,并向政府纳税 100 镑,那么,他还有 1000 镑的余额可供他自己消费。但是,因为呢绒、谷物以及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由于同一原因而上涨,所以帽子工厂主用他 1000 镑所能买到的,并不比他过去用 910 镑所能买到的多,这样,他将通过减少个人支出以应国家的需要。他通过纳税,把本国的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交给政府支配而不是自己使用。如果不把这 1000 镑花掉,而是把它追加在他的资本上,那么,他就会发现,由于工资提高,原料和机器的费用增加,这 1000 镑的积蓄并不比以前 910 镑的积蓄多。”(第 232—233 页)[第 173—174 页]“但是在货币不纳税的情况下。虽然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不会按同一比例上涨;在纳税前和纳税后商品相互间的 [价值] 比例不会相同…… 我们曾经指出,两个工厂主使用的资本额可能完全相等,由此获得的利润额可能完全相等,但他们的商品的售价,将根据他们所用资本的消费和再生产的快慢而极不相同。”在这里,赋税不论是直接课加在收入上,还是“按照生产商品所用的资本课加在商品本身上,都会改变以前的比例”(第 234—235 页)[第 175—176 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有赋税的国家内,货币因数量不足或过剩而产生的价值变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切商品的价格…… “如果在此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按货币价值下降的比例上涨,那么利润就会不相等。”(第 236—237 页)[第 176—177 页]

机器和赋税。对利润的影响

“使国内工业得到改进的机器的发明,总是具有提高货币的相对价值从而鼓励货币输入的趋势。相反地,对制造业者或农产品种植者所课的一切赋税,对他们设置的障碍的任何增加,则有降低货币的相对价值从而鼓励货币输出的趋势。”(第 243—244 页)[第 181—182 页]

原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

任何被课税的商品都按税额而提高了价格(第 281 页)[第 207 页]。为了弥补战时支出而借款,例如 2000 万镑。这笔款项被消费掉。这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抽出的”。每年为偿付这笔债款的利息而课征的税款 100 万镑,[—63]只不过是一种转移,是“从支付这 100 万镑的人的手中转到了收受这 100 万镑的人手中,即从纳税人手中”转到了收税人手中而已。“实际的支出是这 2000 万镑,而不是为这笔款项而必须支出的利息。利息支付与否都不会使国家更富或更穷。”政府为了还债,也可以一次征收 2000 万镑。“但这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第 282—283 页)[第 208 页]。

(但这样就证明,那些贷款给政府的人,贷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货币,而是纳税人的货币,他们自己是或多或少地免于纳税的,因而,这全部交易只是一种假象。但有人会说,赋税落在商品价格上,因而任何人,不论他是消费者还是雇主,都会受到影响。二者当中必有一个是有产者。但是,第一,我们可以假定,雇主从不贷款,总是借款。这是一般的规律。在相反的情况下,一国的资本怎么能够再生产出来呢?如果占总数三分之一的那部分雇主,不把未用于生产的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把自己的资本用于非生产方面,一国的资本怎么能够再生产出来呢?可见,第一种情况——雇主——并不存在。现在剩下的只是消费者了。第二,如果贷款人是吝啬的,或者在国外消费他的债息,那么,他作为消费者只负担价格上涨的很小一部分,或者丝毫也没有负担。他只是迫使其他纳税人给政府 1000 镑,2000 镑等等的贷款,例如,去进行反革命的战争,虽然这些纳税人可能非常厌恶这种战争。可见,贷款人给政府的贷款中,

他一文钱也不用支付。他贷给政府的款只是无知的群众的钱。其次,这种主体的消费与由他自己决定让政府来支配的国内年产品总额是根本不成比例的。这个总额如何分配,赋税落在谁身上和赋税如何不以同一程度提高价格,这一切纯粹是偶然的,而且事情一旦涉及到群众[居民],就必然影响到群众所消费的商品,因而正好是贷款人按其职业很少消费的那些商品。那些不以贷款为职业,而是以贷款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在这里完全没有加以考察。最后,在战争等等结束以后,由于不必在这里加以考虑的一些原因,一切东西,无论是谷物还是工业品,其价格都将下跌。因此,对商品的课税——在一切都受着赋税压力的情况下,这本来就纯粹是有名无实的——就变为自己的对立面。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下跌。因此,贷款人不仅每年收回贷出的资本(永久国债对他的补偿大于带来普通利息和利润的资本),而且在质上和量上都同样地增加了他的资本。因此,国债债权人不仅贷出他人的货币,而且是在他人从来不可能有的对他最有利的条件下贷出的。其他人支付货币,他回收货币。他把赋税加在国民身上,他自己则全部或绝大部分免税,他把赋税变成了自己收入的源泉。因而,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观点来看,国民甚至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没有偿还国债的义务。而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一点连说也不应该说”。)

[—64] 诚然,李嘉图认为:

如果政府要求我立即一次支付 2000 镑,而不是每年支付 100 镑,那么,我也许就不得不向私人借入 2000 镑并每年支付给他 100 镑的利息,而不去动用自己的生产资本(第 283—284 页)[第 208 页]。

我把这些货币付给私人或者付给政府,有什么区别呢?李嘉图自己作了回答:

“国家贫穷，正是由于政府和私人的过多开支，也是由于借债。”（第 285—286 页）〔第 210 页〕

但是，我的亲爱的，什么东西能向您保证，政府将顺利地向每个人一下子就征收例如 1000 法郎呢？那么是谁向政府提供“过多开支”的资金呢？还不正是那些证券经纪人和货币投机者把不属于他们而属于社会上其他群众所有的货币借给政府的吗？他们事前就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丝毫不会吃亏，而且还会得到好处。

当然，公债也应该从另一种观点来加以考察。

“如果抵偿基金不是从国家收入超过国家支出的部分中取得的，它就不能减轻债务。”（第 288 页）〔第 211 页〕“公债券持有者的资本决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本，它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

（即纯粹的虚构）。

“如果他想把有价证券卖掉，并将卖得的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他就只有使购买他的有价证券的人的资本离开某种生产用途才能做到。”（第 289 页 [注]）〔第 212 页注〕

生产者支付的赋税

（第 457—459 页）〔第 325—326 页〕

[这一章] 除了反对萨伊和西斯蒙第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评论以外，没有什么内容。

房屋税

“除了黄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商品，它们的数量不能迅速减少。因此，如果这些商品价格的提高引起了需求的减少，那么，对这些商品所课的税就会落在它们的所有者身上。房屋税就属于这类赋税：虽然房屋税是向房客征收的，但却常常因为租金的减少而落在房主身上。土地产品”以及工业品都

是“年年消费，年年再生产的。其他许多商品也是这样。由于它们的数量因此可以很快地和需求取得平衡，所以它们的 [价格] 不可能长期地超过自然价格。但是房屋税可以被看作是由房客支付的追加的租金。因此，这种赋税的趋势是：减少对提供等量年租金的房屋的需求，而不减少其供应。因此，租金下降，一部分赋税将由房主支付”（第 226 页）〔第 169 页〕。

（ ）论 赋 税

由资本或收入负担的赋税

“赋税归根到底是从一国的资本或收入中支付的…… 如果该国年生产量能补偿其年消费量而有余，那么，它的资本就会增加；当它的年生产量甚至不能补偿年消费量时，它的资本就会减少。因此，资本可以由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赋税是否落在收入上，是否不损及国家资本，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赋税是否落在资本上，从而是否使预定用于生产消费的基金减少，这取决于生产的增长或人民消费的减少是否与政府的消费相适应。“一国的全部产品都是要被消费的”，但是由再生产它们的人消费，还是由 [不] 再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当我们说节约收入并把它加到资本上时，意思就是说，加到资本上的那一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而不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 一国的资本减少，它的生产也随着减少，因此，如果政府和人民的非生产支出继续不变，而年生产量又不断下降，那么，资源就会日益减少”等等。“英国政府”在大陆战争期间的“支出虽然浩大，但国民生产的增长足以补偿而有余…… 任何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 [— 65] 的趋势…… 如果赋税落在资本上，那么”，它就直接妨害生产活动。“如果赋税落在收入上，它就会使积累减少，或者迫使纳税人相应地减少他以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以补偿税款”……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种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种价值的人消费”。——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最近二十年间”。——编者注

对资本所课的赋税也可以落在收入上,如果我相应地减少自己的支出的话(第 162—165 页)[第 127—129 页]。“任何形式的课税,都只是对各种流弊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它不影响利润或其他收入来源,它就一定会影响支出;假使赋税的负担平均,并且不妨害再生产,那么,赋税不论落在什么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守财奴可以逃避支出上的赋税,但他不能逃避利润税,不论是直接的利润税还是间接的利润税……如果我有 1000 镑年收入,必须纳税 100 镑,那么,我究竟是直接从我的收入中支付 100 镑,给自己留下 900 镑,还是在购买农产品或工业品时多付 100 镑,对我都是无所谓。”(第 184—185)[第 141—142 页]“任何事情,只要它会提高需求非常普遍的商品的交换价值,都会妨碍耕种和生产。但这种弊病是和课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每种新的赋税都会成为生产的一种新负担,并使自然价格提高。一国中原先由纳税人支配的那部分劳动,现在落入国家手中,因而不能用于生产。”(第 206 页)[第 156 页]“对利润征课的局部¹³²的赋税决不会落在纳税的部门身上,因为企业主可以停止他 [在该部门中] 的活动,或者为这赋税取得补偿。”(第 210 页)[第 158 页]“赋税决不能摊派得那样平均,以致能按同一比例影响一切商品的价值并仍然保持它们原来的相对价值。”(第 276 页)[第 204 页]“对必需品的课税没有什么特别的弊害。利润确实是降低了,但降低额只等于工人缴纳的税额,而这一税额无论如何是必须由他的雇主或他的劳动产品的消费者负担的。”(第 384 页)[第 277 页]

商品价格由于课税而上涨和货币

“如果商品的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课税而不是由于它们生产上困难的增加,那么,要使同量的商品流通”就不需要“更多的货币”。如果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我用相同的价格只能消费较少的数量。多余的数量由政府来消费。政府购买这些商品所需的货币是由对特殊商品的课税而得到的。工厂主或租地农场主从公众手里得到这种税。隐蔽的实物税(第 242—243 页注)[第 181 页注]。

() 摘自序言 (本书开头部分)

“土地产品——联合运用劳动、机器和资本而从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社会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需资本的所有者、进行耕种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全部土地产品以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分配给其中每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地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以及劳动者的技能与机巧和农业上使用的工具。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序言开头）〔第3页〕〔—65〕¹³³

卡 · 马克思

反 思¹³⁴

[—48] 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 [dealers] 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流；前者靠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并且无论是图克，还是早在金条委员会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一点。¹³⁵但是所缺乏的，是这两种贸易、两种货币之间的联系。

(1) 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经济学家们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至少是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一切论断¹³⁶，正象西斯蒙第反驳麦克库洛赫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涉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和零售商以及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又取决于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而后一交换又受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所制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 当然，正象亚·斯密所说，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必然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的限制，因为向消费者出售的价

格是最终价格,这种价格反过来必须在利润之外再补偿先前交易中的生产费用。不过,在亚·斯密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学被蒲鲁东粗暴地简单化了¹³⁷,等等。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首先,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例如在英国,决不[仅]受英国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还受全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例如,[东]印度公司或东印度商人把蓝靛运到伦敦市场上,在这里拍卖蓝靛。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易。蓝靛的购买者把一部分蓝靛卖给法国,卖给德国等等,在这些地方它们被有关的商人和工厂主买去。他们最终是否能赚回蓝靛的价格,则取决于最终的产品向消费者销售的情况,这些消费者也许住在伊奥尼亚群岛上,或者住在阿富汗,或者住在阿得雷德。因此,说许多国家内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受一个国家内的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是[—49]世界性的,那它就受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本身规模越大,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的地位越重要,就越是如此。其次,因为工人阶级构成消费者的最大部分,所以可以说,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不是象蒲鲁东所认为的在一国中的减少,而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减少,——就会造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相适应,从而造成生产过剩。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把这种论断绝对化,如说什么种植园主的贸易取决于他的黑人的消费,也同样是错误的。第三,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造成实业家

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例如,如果工厂主从投机商那里得到非常大宗的订货,那么工人就大量就业,工人的工资就增加,工人的消费就增加;在修筑铁路的投机中,造成了非常大的最终消费,可是最后表明,它纯粹是“非生产的”。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大多在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面前最终碰壁。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自然,往往发生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已经得到满足之后,不过往往只是发生在供给超出了推测估计的场合(例如粮食投机时)。第四,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3) 至于出现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中的货币,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流通手段,那么,只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获得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本家(非工业资本家)、国债债权人等等的货币,甚至工人的货币(在储蓄银行中),简言之,也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日常开支,以及超过他们认为必须始终由自己支配、也就是作为个人储备来保存(贮藏)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余额,这种余额是存款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又成为商业货币的主要基础。[资本]转移,信贷业务,总之,这个贸易界内部的整个货币运动,是建立在大部分不从事贸易的居民的存款基础上的。当[.....]信用缺乏时,这些存款就从贸易中抽走。资本成为非生产

的,因为生产领导者阶级手中所掌握的支配资本的手段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当这些阶级需要货币来在他们本身之间进行交易,而银行不再借货币给商店老板和工厂主的时候,消费者自己手中的流通手段也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了,这样,缺乏货币的怨言就从贸易界进到消费界。

(4)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据上述原因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流通手段的量是最少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流通速度减慢了。其次,因为大量的交易需要现金,而以前却不需要。正因为如此,在货币量和只用较少量的流通手段就能完成的那种交易的价值之间,也就出现巨大的差距。可见,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而不是资本。资本会贬值,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在这里,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能转化成流通手段,而资本的价值正在于可交换性。但是,尽管如此,资本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票据不能贴现,甚至建立在诚实交易上的那些票据也是如此。而票据是商业货币,[它的]价值代表商业资本。银行券兑换黄金的能力降到了最低程度,银行券贬值只会加重商业危机。现实的困难是商品即现实资本不能换成黄金和银行券,由于这个原因,也就发生了1793年、1825年和1847年的现象,那时,凡是有现实资本的地方,都可以求助于发行国库券和银行券的办法。[.....]不能断言这些国库券和银行券就是资本。它们只是流通手段。危机没有停止,但货币危机停止了。因此,银行券兑现的幕后是有价证券的兑现,不仅在银行业中是如此,而且在贸易中也是如此。不过甚至那

手稿中笔误为“最大的”。——编者注
指生产过剩危机。——编者注

些按性质来说可以兑现的有价证券,如国家有价证券,短期票据,也都停止兑现。显然,问题完全不在于商品,而在于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的兑现。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当然,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银行券兑换成[—50]黄金归根到底是必需的,因为商品必须兑换成货币;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总的说来存在着私人交换制度。货币贬值和商品贬值事实上甚至成反比。但是,银行券所以能够在对黄金的关系上贬值,只是因为商品能够在对银行券的关系上贬值。总的说来,银行券贬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商品即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转化成金银,商品和黄金之间的每一中间环节或代表,终归只是代表,因而没有价值。可见,主要问题始终是商品即资本本身不能兑现。某些人说,缺乏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流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在这里,问题恰好在于资本即商品同货币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于,前者不是必然地把后者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为自己的价格带到贸易界来,资本不再是货币,不再能流通,不再是价值,而可笑的是,当资本表现为次要东西的时候,却把货币说成次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另一种看法就更荒谬了:承认资本的不能兑现,却忽视了银行券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想通过某种人为的措施和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仿佛资本的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而又使资本不

具有始终可以交换,而且是按照公正价格交换的属性。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但是,说什么对货币市场的这种压力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货币本身又造成了信用制度。换句话说,同一个原因产生了这两者。北明翰派¹³⁸当然是些蠢人,他们想靠发行大量货币,或使货币的标准贬值,来消除货币的不便之处。蒲鲁东、格雷等人也是些蠢人,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因为货币市场上发生了普遍危机,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面恢复表现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用说会突然重新成为[普遍危机的]原因,所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莫过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家们希望改革货币了。他们保留产品同产品的可交换性之间的分离,因为他们保留价值和私人交换。但是他们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号,好让这种符号表示同一。¹³⁹

(5) 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即老实的不学无术的民主派,只知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的货币。因此,那个爆发冲突的领域、风暴、货币危机和大宗货币交易,他们是不知道的。因此,问题对这些头脑简单者来说,也象一切事物对他们来说一样,是如此的简单和幼稚,就象他们自己一样。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在这种交换中谈不上阶级对立。一个商人同另一个商人相对立,一个有货币的人同另一个有货币的人相对立。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

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这个事实显然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本身是由如下的事实造成的：每个人必须劳动，[— 51] 象施蒂纳所说的，使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¹⁴⁰首先，在所有以前的、建立在种姓、部落、阶层、阶级等等的差别和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中，货币都是这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货币制度则是这种组织历次兴衰的[表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可见，我们无须证明，货币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倒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必须证明，不管以前的所有历史经验如何，货币制度甚至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也有某种意义，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这一环节，在否定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状态下也能继续存在。但是，在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面前提出这种任务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他们是靠单纯的措辞造句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正是他们特别伟大之处。在他们看来，货币制度，以及全部现存制度，是如此善良，如此笨拙，正象他们自己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他们所喜爱的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吧。除了这种贸易之外，他们在前后左右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自由的个人用什么东西来从店铺老板手里购买呢？用自己收入的等价物或者说价值符号。工人用工资、工厂主用利润、资本家用利息、土地所有者用地租——它们转化成金银和银行券——从店铺老板、鞋匠、肉店掌柜、面包房老板等等那里交换[商品]，而鞋匠、店铺老板等等用什么来交换转化成货币的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呢？用自己的资本。他们在这种行为中补偿、再生产和扩大资本。

可见，在这种看来如此简单的行为中，第一，表现出总和的阶级关系，表明事先存在着雇佣工人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

业和非工业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首先表明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并使资本和收入分开。由于〔收入〕转化为货币，简单性也就消失了。

而且，工人获得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同样，土地所有者获得用货币交纳的地租，工厂主获得货币形式的利润，而不是获得实物报酬、实物租和进行物物交换，——这种情况不过表明，货币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起来，其前提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因而，毕竟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这种收入并以相当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这里已经不是象古代社会那样，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地租、阿谀者，一切都完全象咖啡、糖、鲑鱼一样成为交换物。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

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象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 [—52]，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我们首先撇开收入的特有性质，这种特有性质不表现在金银上，就象尿味不表现在妓院税上一样，罗马皇帝阿德里安曾说这类税没有臭味！¹⁴¹这种性质重新表现在受支配的货币量上，整个说来，购买的范围取决于收入本身的性质。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当然，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掉。这是在实物工资制下做不到的。这样一来，他的个人自由就扩大了，也就是说，白酒的支配作用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象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凡是收入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性质，不是象现在这样单纯取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而是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质的地方，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从一开

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因此，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智力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模糊。封建主曾徒劳地试图——例如在对资产者的关系上，采取奢侈法的办法——在政治上防止和摧毁货币的这种起普遍拉平作用的力量。可见，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行为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则形成质的差别。于是，[区分为]大资产者、中等资产者、小资产者。[—52]

写于 1851 年 3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77 年

《共产党人》杂志第 1 期

弗·恩格斯

* 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¹⁴²

皮·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关于革命实践和工业实践的论文选》

1851年巴黎加尔涅兄弟公司版

(1) “致资产阶级”。“你们资产者过去向来是最勇敢、最干练的革命者……”早在蛮族入侵之前，你们就用自己的市政联盟当作白布尸衣在高卢把罗马帝国裹起来了（第1页）。从那时直到现在，你们一直在领导革命。没有你们或者违背你们的意志而想完成某件事情，一次也没有成功；你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成功了；你们将从事的一切也会成功。

这个论题是以历史宣言的形式陈述的。——

目前，老政治阴谋家又掌握了政权，把你们看成是革命者（第 页）。那有什么，你们就接受头衔，当革命者吧！

(2) 现在转入正题。下面是七篇论文，目的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发挥：

P. J. Proudhon.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51. — 编者注

(a) 以前的秩序, (b) 革命时刻的政党, (c) 解决办法, 即本来意义上的革命 (第 1—2 页)。

第 一 篇 《反动造成革命》

任何革命都不能阻止。德罗兹认为通过让步和巧妙的计谋可以防止第一次革命¹⁴³, 布朗基认为用欺骗的把戏可以把革命化为乌有, 这两种想法同样都是可笑的 (第 3—4 页)。

法国的君主制从克洛维到黎塞留是革命的; 1614 年最后的三级会议开会期间, 它变为反动的了, 惩罚就是 1793 年的 1 月 21 日¹⁴⁴。可以引导、抑制革命, 延缓它的进程, 而这种一步一步退让的办法是最明智的办法 (第 5 页)。但是制止革命是不可能的。其证明就是对 1822 年和 1839 年的密谋的镇压¹⁴⁵, 以及对 1830 年和 1848 年的革命的镇压。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政府的高傲”经常同革命的和平进程相对抗 (第 8 页)。反动总是引起革命。在 1789 年和后来的岁月里是这样, 在 1848 年也是这样。在 2 月, 参与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争论的无产阶级, 只要求工作。共和派答应实现这个要求, 于是它就站到共和派一边 (第 10—11 页)。“得到工作和挣到面包, 这就是 1848 年工人们的要求, 这就是他们为共和国所建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这就是革命的实质。”[宣布] 共和国是“多多少少……要篡权的少数人的行为”。“革命的劳动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共和国只是“革命的保证” (第 11 页)。

临时政府对待自己关于工作的诺言是认真的, 但是没有能够兑现, 因为它为此不得不“更改方针, 改变社会的整个经济”。然而它不是公开承认困难和求助于政论家, 而是沉默, 直接走上反动, 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个“革命所采用的新名称”的敌人 (第 13 页)。它推动巴黎和卢昂的饥饿的群众举行起义, 并力图把二月的伟大思想——工人的抗议淹没在血泊里。从此人们清楚了, 1848 年共和国和 1793 年共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848 年共和国的最新发明是社会主义。

所以, 现在斗争是在过去的一切革命派别为一方和社会主义为另一方之

间进行。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从1848年2月开始的反动的行动就在这一方面启发了我们——“革命正是由反动决定的”(第17页)。

对反动和迫害如何逐渐使国家的大部分革命化,对“永恒的秩序之友”资产阶级本身如何受到怀疑、因此受到排挤、从而被赶进革命的怀抱,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直叙述到新的选举法¹⁴⁶。

于是,“当人民被弄得丧失了理智的时候”,唯一有效的手段仍然是“力量”(第26页),——

而这种“力量”就1852年危机¹⁴⁷来说,则表现为这样的一系列措施,其最后一环将只能是完全恢复封建的旧秩序。

但是你们不可能这样做,你们也没有胆量这样做(第31页)。号召共和派现在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给“革命”提供“保证”,提供“经济复兴计划”(第33、34页)。

第二篇

《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1. 《社会趋势的规律。1789年革命只完成了它的一半事业》

“革命的动因与其说是当时社会所遭受的贫困,不如说是贫困的持久性,这会导致任何幸福的消除和消灭”(第36页)。因此,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的趋势。人民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他们不要求完满的社会制度,但是希望“存在幸福和美德的趋势”;“当他们面前出现贫困和堕落的趋势时”,他们就起来反抗(第37页)。

那么当前社会的趋势是什么呢？

1789年只是推翻，而根本没有建立任何东西。由此产生了“骚扰法国社会六十年的那种不堪忍受的生活方式”。

(这样说来，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中就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自由竞争只有消极的意义，因而真正的资产阶级制度还有待去发现。)

1789年8月4日消灭的封建组织没有被新的“民族经济和利益均衡”所代替。“由于公民的地位已经不决定于出身，由于只有劳动才是一切？！，而财产本身又取决于劳动……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问题在于……到处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秩序 [le régime égalitaire]，即工业秩序”（第39页）。

(似乎这一点并没有尽力去实现！)

但是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只是置身于政治。“经济知识缺乏、政府观念¹⁴⁸ [l' idée gouvernementale]、对无产阶级不信任”，——这一切促使革命者走上错误的道路（第40页）。“在一切人的头脑中，政治同工业相比又获得头等重要的意义；卢梭和孟德斯鸠排挤了魁奈和亚当·斯密”（!!!），所以新社会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第41页）。

2. 《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贫困化的趋势》

“我把某些活动原则，即：分工、竞争、集体力量、交换、信贷、财产，称为经济力量。它们对劳动和财富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区别、代议制、世袭君主制和管理集中化对国家的关系。

(对比得不错！)

如果这些力量保持均衡，并服从于它们自己所特有的和决不以人的专断为转移的规律，那么可以认为劳动是有组织的，普遍的福利是有保障的。而相反，

蒲鲁东著作中是：“政府偏见” (le préjugé gouvernemental)”。——编者注

如果这些力量失去引导和平衡，

(同什么平衡??)，

那么劳动就会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经济力量的有益效果中就会掺进同样份量的有害效果；亏空就会抵销盈利；社会作为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心、代理机构或主体，就会处于病痛不断加重的状态”（第 42—43 页）。

到现在为止，大家只知道社会存在的两种形式：“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另外在这两种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对立和根本的矛盾”。

“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它们同政府制度这种影响它们组织起来的唯一障碍的斗争，——这是损害法国社会的病痛的真正而深刻的原因”。

(这样一来，蒲鲁东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把法国官僚政府同既管理自己又管理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混为一谈)(第 43 页)。

例子：(1)“分工”。——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同时是工人愚昧和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在英国，由于分工和采用机器，工人人数在同一个企业里减少到以前的 $\frac{1}{2}$ 、 $\frac{1}{3}$ 、甚至 $\frac{1}{6}$ ，“而后是工资以同样的比例下降，平均[每日]从 3 法郎降到 5 0 和 3 0 生丁”！！（第 46 页）。

如果去掉这些引人注目的资料（第 46 页），那就非常平淡了。

(2) 竞争。——“它正是市场的规律、交换的调料、劳动的食盐”。

(真妙！)

“但是竞争丧失合法形式！，丧失高级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理性原则，它本身也受到曲解。”除了导致工资下降的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工人被排除于竞争之外。竞争变成了垄断，并造成了新的贵族”。

非常平淡。

“不久前，当警察局长

蒲鲁东著作中是：“l'ordre dans une société”（“社会秩序”）（第 43 页）。——编者注

(对卡尔利埃的恭维话)

迎合普遍的愿望,允许自由出售肉类¹⁴⁹的时候,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自由竞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民的福利,这种保障 在我们社会里还是一个怎样的幻想”(第 48 页)。

好一个庸人!卡尔利埃先生的资产阶级措施竟成了社会主义的措施!自由贸易因为在法国不存在,所以是社会主义的!

其次,信贷。法兰西银行的垄断。按照蒲鲁东的看法,这种垄断的罪过在于,“财产负担着逐渐增加的抵押债务 120 亿,而国家负担 60 亿”;利息和其他与这项债务有关的费用每年达到 12 亿,

(仍然只占 $6\frac{2}{3}\%$)

此外,每年有 7 亿到 8 亿用来支付票据,“花在预付基金和以公司股票、股息、无保证债券、诉讼费用的补偿等形式出现的延期支付上”;它的罪过在于,房租和地租由于这一切而提高得超过了极限,100 亿年产值中有 60 亿用于寄生性消费¹⁵⁰ (第 51—52 页)。

接下去的例子或引文是用来证明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而他们的收入则象马尔萨斯所推算的那样按算术级数不断减少,也就是:

65 生丁、60、55……15、10、5、0、—5、—10、—15 (第 52 页)。

在这之后据说就到来这样的时刻,那时工人不仅得不到他每天劳动所应得的一定数量的生丁,而且自己另外还要支付 5、10、15 生丁!这就是工资规律!这就是竞争!!

下面的例子证明,人民的生活状况从革命以来在不断恶化。

在蒲鲁东著作中前几行写道:“竞争应当成为……买卖诚实的保障”。——编者注

酒类、肉类等的消费量减少；“招兵时对身高的要求”降低和不适于服兵役的人数增加：1830—1839年——45 $\frac{1}{2}$ %，1839—1848年——50 $\frac{1}{2}$ %；普遍教育不适应现代社会状况；犯罪行为增加：

1827年——34908件刑事案件，被告47443人

1846年——80891件刑事案件，被告101433人

1847年——95914件刑事案件，被告124159人

违警法庭审理的：

1829年——108390件，被告159740人

1845年——152923件，被告197913人

1847年——184922件，被告239291人

3. 《政府的反常，暴政和营私舞弊的趋势》

1848年以前，工人甚至普遍得到政府方面的慈善性照顾，从1848年以后进了一步：人们开始明白，只有革命才能在这里作出某种激进的事情，然而情况也只是如此。

1814年国债的利息为6300万，而现在为27100万。1802年的预算是58900万，1848年是169200万；它的增长不能用政府的愚蠢和居心不良来解释。从1830年到1848年，支付给官吏的薪俸总额增加了6500万。原因同样

(法国共有官吏568365人，蒲鲁东根据这个数字计算出，每九人中有一人靠预算生活，也就是说，法国总共只有男子5115285人，而1848年投票的人竟超过650万！)(第62页)。

官吏数量的这种增加和军事预算的增长证明加强惩治权力的必要性在增长，从而证明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危险在增长。国家支持大地产和资本的这种趋势直接导致营私舞弊，而营私舞弊则是一切集中化的直接后果。

——结果是：

蒲鲁东著作中是：“des classes laborieuses”（“劳动者阶级”）（第63页）。——编者注

“十九世纪革命有充分的理由”。

此外，在这第二篇里还遇到如下的妙论：

(1)“现行的税收制度……打算让生产者支付一切，而资本家分文不出。实际上十分明显的是，即使后者作为某一款项的缴纳者列入税务官员的账簿或者他缴纳国库规定的消费税款，他那只是从他的资本里预先得来的、而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交换得到的收入，也是免税的，因为交税的只有生产者”（第 65 页）。

后面的这个“因为”一词包含着第一句话中应当加以证明的那个论点，因而这个论点自然地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坚定的逻辑。他又对这个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样，资本和当局之间存在着只让劳动者负担税款的协议，我已经说过，这种协议的秘密只是征收产品税而不规定资本税。资本所有者借助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同其他一切公民一样地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动产、自己的财产转让的交易、自己的旅行和自己的消费纳税。因此，他硬说，假如他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是 3000、6000、10000 或 20000 法郎，由于纳税，就不会超过 2500、4500、8000 或 15000 法郎。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预算的膨胀比他的房客更为不满。纯粹是欺骗！资本家分文不出：政府同他处于同等地位，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政府从生产者那里拿走一部分产品时，它也同生产者处于同等地位，甚至可以说，资本家也同生产者处于同等地位。）

“政府和资本家在作共同的事情”

（啊，施蒂纳！。

“若能作为 2000 法郎利息的收入者而列入纳税人账簿，其唯一的条件是用利息的四分之一去偿付税款，有哪个劳动者不认为这是福气呢？!!!（第 65—66 页）

(2)土地册是这样编制的，“似乎立法者的目的是恢复不动产的不可转让性，似乎这个立法者竭力不断地使8月4日夜里的获得解放的农民，¹⁵¹回想起他以往的奴隶地位，回想起占有土地的权利并不属于他，以及每个庄户人如果没有从君主那里得到赠与证书，他就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长期佃户和没有权利支配自己财产的农奴 [emphytéote et mainmortable]！”(第66页)。

啊，施蒂纳！似乎大地产和小地产有同样的理由不应当记入土地册，这样一来，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是农奴了。

(3) 自由贸易的构思和对保护关税的说明。

关税给国家提供16000万。假定关税被取消，外国竞争在法国市场上加剧。“假定那时政府向法国工业家提出如下的问题：要么支付给我16000万，要么还是把这笔钱留在自己手上，你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宁愿要哪一条？你们是不是认为工业家会选择第一条建议呢？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正是这一条。在我们通常为外国商品和输往国外的本国制品所花的费用上面，国家又加上16000万，把它作为外快放进自己——仅仅是自己——的腰包；这就是关税。”(第68—69页)

如果这类荒唐事还可以用无理性的法国税率来辩解，那么蒲鲁东先生完全用法国尺度去衡量保护关税，把保护关税硬说成是向工厂主课税，就未免太过份了。

(4)在第73和74页上，蒲鲁东援引了鲁瓦埃-科拉尔的发言(下院，1822年1月19—24日的辩论)。¹⁵²这位法学家在发言中对独立审判所¹⁵³(议院)和其他“民主设施”——这些“私人权利的强大集中点、君主国内部的真正共和国”的消失表示遗憾。据说，它们在一切方面可以给最高权力设置障碍，而现在政府的权力虽然是分散的，但其行动并不受任何限制。

这位守旧的法学家不能掩饰他对行政制度的仇恨，他的这套反动的怀旧言论被蒲鲁东先生错误地当成是社会革命的观点。

蒲鲁东著作中是：“1789年的立法者”(第66页)。——编者注

“鲁瓦埃·科拉尔先生关于 1814 年君主制所说的话，对 1848 年共和国来说，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公正的。”

鲁瓦埃·科拉尔的胡言乱语把蒲鲁东先生弄糊涂了：

“这样一来，宪章¹⁵⁴应当既组织政府又组织社会；无疑人们没有忘记社会，没有忽视它，但没有立即着手研究它……”。

鲁瓦埃·科拉尔是怎样理解社会的，可以从他的下面这句话中看出：

“只有把出版自由确立为公众权利的准则，宪章才能还社会的本来面目。”（第 75 页）

可见，社会——这是从对抗政府的能力的角度来看的臣民。

第 三 篇

《论联合的原则》

在我们着手解决问题之前，首先，“应当评价一下供民众需用的理论，一切革命必不可少的理论”（第 79 页）。而我们批判了这些理论的原则，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理论——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勃朗和其他人全都驳倒了。对一切体系来说，这个原则就是联合。

联合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均衡”，它甚至根本不是“力量”，它是“信条”（第 84 页）。联合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总是导致体系，而以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变成宗教（第 84 页）。

联合不是“经济力量”，贸易才是这样的力量，因为“不管运输的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服务如何，贸易本身是消费的直接刺激者，因而是生产的原因之一，是创造价值的起因！、形而上学的交换行动，和劳动一样是实物和财富的生产者，虽然它创造实物和利益的方式与劳动不同……因此，靠没有任何投机倒把！！的生意而发财的商人，完全有权享受已获得的财产；这种财产同劳动得来的财产一样合法”。

(这位资产者在这里忘记了,不掌握资本,我决不能从事商业,而只能为他人、为资本家劳动;这样吹捧商人实在太妙了。)接着说……

“交换——这是纯道德的活动……也是创造性的行动”(第85页)。

属于经济力量的还有集体力量,

——蒲鲁东感到自慰的是,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发现了集体力量,

——而竞争、分工、财产等等也是这样。

蒲鲁东称之为“经济力量”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一些对他有利的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 [Verkehr] 方式的形式:在他看来它们暂时或者只有好的方面,或者虽然有坏的方面但同时却有一个明显的好的方面。甚至交换和生产的最一般的形式——这些形式一经发现,就被后来的每一代人以适当改变了的形式到处加以运用,这些形式是属于象水力利用、地圆说、地球分为经纬度等等那样的社会成就——蒲鲁东也只是按照它们的资产阶级面貌去理解。例如,正象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交换在他那里立刻溶化在贸易中。如果说集体力量至少看起来是某种永恒的东西,那么它因而仅仅是一种把社会存在本身变为经济力量的尝试。没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交换。交换、分工、竞争、信贷是集体力量的表现。要发生任何关系,至少需要要有两个人,凡是两个人共同从事某种一个人不能胜任的事情的地方,就有集体力量。但是,可笑的是,人们一开始把社会成员借以进行交换和生产的一切形式作为力量向我们叙述,而后来在结尾时又企图把社会、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

的存在作为特殊的经济力量强加给我们。其实，蒲鲁东所津津乐道的集体力量的原始的、不发达的形式（在建造方尖碑、金字塔等时的大规模的劳动）几乎早已被机器、马匹、分工等等所排挤，并完全被另外的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贸易、竞争、分工等等是经济力量，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例如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纸币、地产析分、大地产、雇佣劳动、资本和利息也是经济力量。对这里列举的每一种力量，都不难作出象蒲鲁东对前者所作的那种称颂。而关键也就在这里。

可笑的是，蒲鲁东在第 88 页上把这些力量的关系称为“实际上非物质的”，并根据它们的所谓非物质性质，唱起了自己的赞歌，例如：经济学家们用自己的工业力量理论——他们对这种理论丝毫不怀疑——证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教条：“d e nihilo”〔从无中〕创造

(ex ??) (第 87 页)，或者在前面一页他 [强调]

“贸易的纯道德的”行动，在他看来，“贸易也是创造性行动”（第 86 页）。

下面接着是关于联合的冠冕堂皇的诡辩：

“联合在本质上是不能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束缚工人的自由。为博爱的空想负责的作者们……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地把只有集体力量、分工或交换才具有的优点和效力……归之于协作社契约 [contrat de société]。如果某个工业的或商业的协作社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或者使巨大经济力量中的一种发生作用，或者开发某种按其本质是不可分的、并要求统一的主顾和垄断的资源 [fonds]，那么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协作社可以获得良好的结果。但是它取得这个结果不是靠自己的原则，而是归功于自己的手段。这一点如此之正确，以致所有的人，

恩格斯认为蒲鲁东著作中的“de nihilo”可能是“ex [nihilo]”。——译者注

(不，是资本家)

每当没有联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时，就宁愿不参加联合”(第 88—89 页)。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人们才联合起来。

联合意味着团结、“共同负责、对第三者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平均工资是联合的最高法律”。因此，“可以说，联合只有对它的能力弱或懒惰的成员，只有对这样的成员，才有好处”。——“愚笨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的团结”(第 89、90 页)。每一个繁荣的联合“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某种与联合格格不入的、与联合的本质毫不相干的客观原因”。联合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益的(第 91 页)。

同时，在目前所有的工人联合中，平均工资被计件制所代替——在力量和资本统一的条件下，团结尽可能少些，独立尽可能多些。

也就是说，联合尽可能少些，而手段尽可能多些。

“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和任何占主导地位的利益的，而专靠家族联系和自我牺牲法则建立起来的联合，总之，这种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种超自然的没有积极价值的联系，是一种神话。”

至于巴黎工人的联合，蒲鲁东冷冰冰地给它们作了如下的分类：

“它们当中有许多维持下来了，甚至有希望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些联合是由本行业中最熟练的工人组成——这是才智的垄断，它们靠这种垄断才得以存在。其他一些联合用廉价来吸引和留住顾客——竞争使它们有了生机……最后，在所有这些联合里，工人们照例……必须耗费较多的劳动，而满足于较少的工资。在这里，除了政治经济学中最常见的现象，其他什么也没有，而这些现象……丝毫不需要联合就可以得到。”(第 96—97 页)

屠宰牲畜的联合根本就不是联合。“这是不同处境的公民为同肉商的垄断进行竞争而共同出资建立的 [联合会]。这是新原则——不说是

(为什么不呢?)

新经济力量——，即互惠原则 [réciprocité] 的一种运用，这种原则就是交换的参加者保证彼此无条件地按照成本出售自己的产品。”¹⁵⁵

(蒲鲁东先生本人自然是“互惠原则”的第一个发明者,见他的《信贷和流通的组织》1848年加尔涅兄弟公司版,以及他的《人民银行》。)(第97—98页)¹⁵⁶

接着是蒲鲁东先生的赞颂,对路易·勃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¹⁵⁷说的一些俏皮话,在这之后是下面这段话:

在3600万法国人当中有2400万是农民。“你们永远不可能把他们联合起来。农业劳动不需要按照一种笛音跳舞的协作社[chorégraphie sociale],农民的灵魂是讨厌这种协作社的。”

援引农民如何愤恨有共产主义嫌疑的六月起义者。——接着是,

在其余的1200万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工厂主、手工业者、职员……他们不需要联合”;剩下的600万人也许会参加联合,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抛弃这种多数人的压制。

评价现有的工人联合,不应当根据它们今天的结果,而应当根据它们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隐蔽趋向。不管工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事业的意义根本不在于他们团体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将来……劳动者的公司必将把时髦的小商品和玩具[bilboquets]抛到一边,转向那些就其本质来说是它们的自然领地的大工业部门”(第107页)。

在结尾,他要求路·勃朗

“这只革命之蝉”“把节制和沉默献给那不幸落在了他的瘦小双手之中的无产阶级的事业”(第108页)。

整个问题就在于:联合本身,抽象地说,当然和任何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地取决于条件。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地方,任何经济力量都无济于事。竞争和联合一样都以具备手段为前提。分工和

蒲鲁东著作中是:“路易·勃朗自认为是革命之蜂,其实只是革命之蝉”(第108页)。——编者注

联合一样都可能被用得不是地方。交换象联合一样可以进行得很糟。抽象地说，每一种经济力量都和联合一样是教条，——一切决定于现存的关系。而在研究这些关系方面，蒲鲁东恰恰什么也没有做；他把巴黎的小工业当成标准，而不把英国那样的大工业、机器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加剧的资本集中看成是联合的需要，同时也不了解，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应当有一些完全不同于巴黎玩具联合会 [Billboquet- A ssoziation] 和蒲鲁东伙伴社¹⁵⁸ 的力量的联合和集中的形式。

第 四 篇 《论权威原则》

首先是对蒲鲁东先生发明的“无政府状态”的赞颂。

1. 《对政府 [观念] 的传统否定。代替这种 观念的观念的产生》(第 116 页)

任何政府都起源于宗法的家庭。“民主是政府进化 [évolution gouver- mentale] 的极限”(第 119 页)；民主的最后界限是孔西得朗、里廷豪森等人的直接民权的民主。但是民权象在希腊和罗马那样会合乎逻辑地直接导致皇帝的暴政(第 121 页)。

“对政府的否定”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权威的原则当时已从自由信仰的宗教领域中被排挤出去。后来这种情况也被搬到世俗领域，特别要感谢曾经发明“社会契约”术语本身的瑞略[?]。实际上被运用于社会生活和贸易等方面而不仅仅运用于政治的契约观念、“契约王国”观念，会超出整个这种政府制度的范围。但是，“对社会契约一窍不通的”卢梭葬送了整个事业。

社会契约须经每个有关的人自由讨论和接受，否则它是无效的，

以及诸如此类的充满施蒂纳道德精神的阐述（第 125—127 页）。

而在卢梭的社会契约中：（1）根本没有谈到契约的对象是什么；（2）契约中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只有惩罚（第 128 页）。

详细地论证：卢梭如何把“最广泛的民主原则”当作出发点，又把这些原则当作不能实现的东西 [unpraktikabel] ——加以抛弃，他如何承认不可能保持平等和民主政府，“得出关于无产阶级 [存在] 的必然性，关于劳动者的日益发展的从属地位，关于专政和宗教裁判的结论”，然后只提出了“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暴政的法典”（第 131—133 页）。

然而，蒲鲁东用华丽词藻激昂慷慨地对卢梭进行的猛烈攻击，对于路易·勃朗及其同伙一类人来说，还并未丧失一定的严肃性。

圣西门第一个模糊地预感到政府制度的崩溃和工业制度的建立。他“从历史的考察和人类的教育中”推论出对国家的否定。

而蒲鲁东推论出这一点

“是根据经济职能的分析以及信贷和交换的理论”。十八世纪最终完成了宗教改革，并提出契约观念 实践领域中的信仰自由 代替政府观念（第 136—140 页）。

2. 《对权威观念的总批判》（第 141 页）

（1）“专制权威”。

废话。

“朴素形态的专制主义对理性和自由来说是可憎的”！

以及类似的意义深刻的东西（第 142—146 页）。

（2）“法律”。

无数的先例——因而，法律消失在恶的无限性中（第 147—150 页）。

(3) “立宪君主制”。

“低能的政府”。人数、多数起决定作用。

连篇累牍地重复历史学派¹⁵⁹反对多数、反对计算票数等等的一切陈词滥调（第 150—156 页）。

(4) “普选权”。

平庸而空泛地唠叨二月革命的道德根据。

两个国民议会和路易·波拿巴当选¹⁶⁰证明，通过普选权能够达到什么结果。

普选权被说得一无是处（第 156—162 页）。

(5) “直接立法”。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彻底民主的，罗伯斯比尔也好，路易·勃朗也好，对它都是不公正的——就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

对直接的民权进行了夸夸其谈的讨论。

据说，问题在于把“共同的意志”作为某种“集体存在物”揭示出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产生一系列应当由代表向人民提出的问题，而人民对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是或否。然而这是荒谬的，因为根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一方面只有真理、法和正义，而另一方面只有愚蠢和非法。

引证了许多主要从里廷豪森先生本人那里抄袭来的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谈到蒲鲁东所说的工业秩序。

里廷豪森问人民：“是否需要修筑从里昂到阿维尼翁的铁路”，人民回答说，“是”。“但是这个‘是’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对各个地方的权利的侵犯。”

“夏龙和阿维尼翁之间有一条水路，它使货物的运费比任何铁路要便宜 70% ！。运费在这里还可能降低——我的理解是——90% ！！。为什么不利用这条几乎不花任何费用的路线，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没有利用这条路线？）

而去修筑一条要花费 2 亿和毁掉 4 个省的贸易的铁路呢？但是在没有运输业经纪人的立法院中，人们完全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除了罗尼河和索恩河沿岸的居民之外，法国人民对这两条河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比自己的内阁阁员们知道得更多，所以他们的表态——这是不难预见的——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根据自己全权代表的愿望。82 个省判处其他 4 个省破产 !!!：这是直接立法的愿望。”（第 169 页）

这样一来，随着工业秩序 [Régime industrie] 的出现，只要罗尼河上有拖船航行，铁路就注定不会出世。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是大有希望的。

然后在第 173 页上，是反对赖德律-洛兰和 1793 年宪法¹⁶¹，反对那种人民只表决法律、一般规定，而代表则通过法令即起行政权作用的制度。指出，借助于法令可以在细节上再把人民以一般形式即作为一般原则通过的决定化为乌有（第 174—176 页）。

最极端的形式就是人民自己执行政府的一切职责。但那时他们将不能劳动，而他们没有奴隶。这样，政府观念导致荒谬。

把 1793 年宪法和罗伯斯比尔的活动当作实际的例子。从 1791 年起，罗伯斯比尔是中庸的拥护者，并仇恨直接的民权。他力图通过更多地集中政府权力来废除 1793 年的宪法，这同国民公会的多数派的愿望也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多数派却不信任他：多数派把他的思想拿过来之后，把他踢开，然后再实现这个思想。热月派只是实现了罗伯斯比尔本人想做的事情。

似乎罗伯斯比尔在革命的一切阶段都是个反动分子，并且总是宣扬和解。最后是对罗伯斯比尔的华而不实的评价。

第五篇

《社会清算》

概要：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互惠和似乎是互惠的法律表现的契约观念。因此，需

要完成三项任务：“(1)完全制止我们从以前的革命¹⁶²继承下来的瓦解倾向，并借助新原则着手清算现存的利益；(2)再借助新原则来组织经济力量和建立财产结构；(3)把政治的或政府的制度溶化、淹没和强迫消失在经济制度中”（第 196 页）。

如果假定 1852 年的选举具有革命的性质，那么当时就应当作到下面几点：

1. 《国家银行》

公民们可以相互达成协议，必要时可以合股建立任何一种能给参加者带来利益的机构，——因而也可以建立贴现银行，同时，做到这一点根本不用着“联合或者博爱……只要有关于出售和交换的互惠义务，一句话，只要有简单的契约就够了”（第 198 页）。

现有的银行¹⁶³有变成“公共机构”的倾向：(1)因为它享用不属于它的资本；(2)因为它拥有发行纸币的特权，而任何特权“都是公共的财产”；(3)因为掌握别人资本的利息和人为地提高流通手段的价格是非法的，——“因此银行由于它的收入的非法性注定要成为公共机构”（第 199 页）。于是，法令：“银行被宣布为不是国家财产，而是公益机构，并发布清算公司的命令”。它作为“有自己的充当资本家的主顾的公益机构”！，不向任何人支付利息，因为公共的利益尽可能要求最便宜的货币。由于银行利息成为公共的财产，这种利息就可以降低到只用来补偿管理费用的水平，即降低到零点二五厘或零点五厘（第 200—201 页）。这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不同于国家信贷。国家信贷不是别的，而是“对掠夺原则的民主的和社会的神圣化，是为了共和国、效仿共和国的榜样和在共和国的庇护下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第 201—202 页）。可见，这应当由国民议会来颁布。

2. 《国债》

国债等于 60 亿；利息为 27000 万和每年支付的偿金 7400 万，总计——一年为 34400 万，加上 5600 万抚恤金和官员退职金。

银行的革命化和利率的降低使对国债也能加收较低的利息。国债以分年

还款的形式支付¹⁶⁴，即从应支付的 5% 中拿出 $\frac{1}{4}$ % 支付利息，而 $4\frac{3}{4}$ % 用来偿付资本（第 204—205 页）。

3. 《抵押债务、普通债务》

每年支付利息 12 亿，

可见，资本有 240 亿。

法令：“一切债务，抵押债务、无抵押债务，以及公司股票规定一样的利率

（如上所述——零点五厘；

只能要求以分年还款的形式偿付。总额在 2000 法郎以下者，分年还款额应为 10%，总额在 2000 法郎以上者，分年还款额应为 5%。国家贴现银行的一个分行变为土地银行；它每年发放的贷款最高额为 5 亿”（第 213 页）。

4. 《建筑物》

如果将来利息等于零，那么房租也将降到零。

（可见，利润和地租原来以利息为转移）（第 218 页）。

法令：“凡作为房租缴纳的款项，一律算作对财产的赎金，该财产的价格定为房租的二十倍

（而修理呢？）。

每次缴纳的款项都使承租人对他所住的房屋以及全部用来租给市民居住的建筑物，享有一定比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权。用这种方式赎来的财产，将逐步地转交给公社管理机构管理！；通过赎买的事实本身

（公社管理机构根本不支付赎买金！），

公社管理机构便以全体承租人的名义

(不经过同意?)

取得了抵押权和优先权,并保证

(连带责任!!!!)

所有承租人能够永远以建筑物的成本价格获得住宅。公社¹⁶⁵可以就立即清算和赎买出租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同所有者友好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现在这一代人就能享受降低房租的好处,上述公社可以立即把已经签订了合同的房屋的租金降低,以便只要三十年就能偿清。——至于建筑物的修缮、管理和维护以及建造新的建筑物,公社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契约的原则和规章,同泥瓦工协会或建筑工人联合会签订协议。仅仅居住自己房屋的所有者,保留他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直到他认为不需要的时候为止”(第 221—222 页)。

5. 《地产》

土地银行使地产革命化。“土地银行的特点,除了信贷低廉和容易取得之外,在于以分年还款的形式偿付债务”(第 223 页)。例如,银行有基金 20 亿,每年发放 4 亿贷款,条件是分年还款 5%。这样一来,农民可以偿还抵押业主,在得到贷款之后,过二十年就可以解除任何债务。“五年之后 20 亿的资本就会用完,但是银行由于有分年还款的收入和从贷款中进行扣除 ?!! ,金库里可以存有大约 4 亿的款项,银行把这笔款又重新投入周转。因此,运动将继续进行,这样经过二十年,地产将偿付 4×20 亿即 80 亿抵押债务;而经过三十年,它将完全摆脱高利贷者。”(第 224 页)

算得不错呀!(1)“从贷款中进行扣除”,不可想象这不是欺骗而是别的。(2)第一年里银行不会有分年还款形式的收入,第一年以后它从 4 亿中得到 5%的分年还款,即 2000 万;第二年以后从 8 亿中得到 5%即 4000 万;第三年以后得到 6000 万;第四年以后得到 8000 万;第五年以后得到 1 亿;这样,将会偿还 3 亿,而无论如何不会达到 4 亿。但是,假定它在第六年必须发放 4 亿,

而它在第六年以后只能收回 12000 万，这样，它就无法继续支付 4 亿。即使银行建立时基金不是 20 亿，而是 40 亿，从而不算收回的钱可以在十年之内每年发放 4 亿，那么它在第十三年就得关闭，而在这一年它能够发放的至多为 36000 万，而不是 4 亿。如果是 44 亿，就是说在有保证发放十一年贷款的资本的情况下，它经过十七年就会搁浅，那时它能够支付的只有 32000 万。只有在 48 亿的情况下，它才终于有可能用基金在十二年内提供贷款，而在以后的年代里用收回的款项提供贷款，在第二十年结束时才能有 6 亿的剩余，并且这时才能够掌握应当支付的、每年定期重复的补偿金 4 亿。

证明：

到第十二年用资本进行支付—

	年预支款 (百万)	年补偿金	余 额	年总余额
1- 12 年	4800	-	-	= 1320
13 年	400	240 +	(1320- 400)920	= 1160
14 年	400	240 +	760	= 1020
15 年	400	240 +	620	= 900
16 年	400	240 +	500	= 800
17 年	400	240 +	400	= 720
18 年	400	240 +	320	= 660
19 年	400	240 +	260	= 620
20 年	400	240 +	220	= 600
21 年	400	240 +	200	= 600
22 年	400	240 +	200	= 600

—以此类推，始终不变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为国家土地银行奠定的基础。

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较快地解决。法令规定如下：

“为使用不动产而交纳的每一次地租，都使农户获得该不动产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且对他说来就是抵押。已经完全偿清的地产立即归公社管理，公社将取代原所有者的地位

(为什么新的所有者不立即行使自己的权利呢？)，

并且同农户分享正式的所有权和纯产品。公社可以就偿还地租和立即赎回地产的问题，同愿意这样做的所有者进行友好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移居！?和地界的划定将按照公社的请求得到保证，同时将采取措施尽可能用土地的质量来补偿！?土地面积方面的差别并且按照收益确定地租……(这是分年还款造成的结果！)

一旦地产全部赎回，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必须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以及农业所固有的变化无常的[后果]加以平衡！?。各公社有权动用其管区内的土地的那一部分地租，将用于这项补偿和公共保险。从此以后，那些亲自经营自己的土地因而仍然保有产权的旧的所有者，将变为象新的占有者一样，交纳同样的地租，享有同样的权利，

(什么样的权利？)

以致任何在地区和继承问题上产生的偶然情况都不会使任何人获得特权，土地耕作条件对所有的人！！！！会是一样的。

土地税将废除

(在新的土地税取代它之后！)。

乡村警务归市镇参议会”(第228页)。

荒谬已极！

下面接着解释说，

“价值增长[plus-value]¹⁶⁶的权利”、即农户对他在耕作中采取改良办法而获得的[成果]的权利，也象劳动权利一样难以实现，尽管两者都很流行。

不同寻常的法律家的劝善。

第 六 篇

《经济力量的组织》

一切通过契约进行。我同自己的邻居达成某项协议——我的意志就表现在契约里。同样，我可以同自己公社的一切居民签订契约，而我的公社可以同本国的任何其他公社、所有其他公社签订契约。“我深信，以这种方式在共和国的各地制定的和反映千百万不同意志的法律，将永远只是我的法律。”（第 236 页）

啊，施蒂纳！！总之，契约制度大致具有如下的形式：

1. 《信贷》

由于有银行和把利率变为零点五厘、零点二五厘、零点一二五厘，信贷已经被安排好了；它的组织以停止一切金银流通而告完成。

“至于个人信贷

（即无抵押的贷款），

它的采用同国家银行无关，这种信贷只应当在工人协会和工业或农业团体中实行”（第 237—238 页）。

2. 《财产》

一切社会主义者¹⁶⁷都认为财产或者是联合公社（农民在其中是联合的农业工人）的财产，或者是租给农民的国家财产。前一种形式是“共产主义的”、“空想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真要打算采用这种形式，“农民就会起来造反”（第 238—239 页）。后一种形式也是不可取的，它是“政府的”、封建的、“国库的”等等。为论证它而引证的理由等于零，因为纯产品

（即地租）

即质量不同的土壤的结果，不属于国家，而属于“处于恶劣条件下的耕者；正

因如此，我们在清算方案中对不同种类的作物提出比例地租，以便平均耕者的收入，也是为了保证产量”（第 240 页）。

这意味着，一切照旧，农户继续在头二十至三十年间向以前的所有者交纳地租，然后向公共保险金库交纳地租，由公共保险金库将地租在坏地占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是否因此好地和坏地就具有完全同样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好地和坏地同样丧失了任何价值，因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具有作为资本的价值，——这一切是不好理解的。同样不好理解的是，这同向国家支付地租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公社自由干预一切事务的情况下。而蒲鲁东把这个叫做——

“同地租分离的、挣脱了锁链的和医好了麻疯病的财产”，

认为它现在仅仅变成了流通手段（第 242 页）。

在国家没收地产的情况下，会有 800 亿价值——全国地产的价值——停止流通，它们应当作为属于一切人，即不属于任何个人的东西从价值清单上勾销。“毫无疑问，民族的集体财富绝不会因此而有所失和有所得；构成个人财产的 800 亿不动产是否列入总账目，这对社会来说不是都一样吗？但是这对租佃者来说——周转的土地在他手中变为流通的价值，又变为货币——是否无所谓呢？”（第 245 页）

在农民向国家租地的制度下，农民很快就会确立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这对他并非难事，“因为在法国，农民总是最强大的力量”（第 246 页）。

在只有蒲鲁东才知道的可恶的小块土地制度 [Lauseparzellensystem] 将保存下去的条件下，这完全是正确的和自然的。但到那时，同蒲鲁东的意愿相反，抵押和高利贷也会很快地重新活跃起来。

“由于分年还款的便利，不动产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分割、交换，并作一切可能的变动，而不触动不动产本身。剩下的是警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根

本没有必要去干这种事。”（第 246—247 页）

3. 《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

“农业劳动的特点是，它最不需要，或者更恰当地说，最强有力地拒绝协作社的形式：谁也没有看到过农民在什么时候组织过耕种自己土地的协作社，谁也永远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在耕者之间能够存在的唯一的联合和团结形式，对农业生产适用的 唯一的集中制……这只能是由于纯产品的平均化、由于互相保证，特别是由于消灭地租 !! 而产生的集中制。”（第 247 页）

对铁路、矿场、手工作坊来说，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或者是在资本家指挥下的雇佣劳动，或者是联合。“凡是按其性质要求联合使用大量不同专业的工人的一切工业部门、采矿业或企业，必定成为工人协作社或工人协会产生的场所。”（第 249 页）

相反，在手工业中，“如果抛弃联合在个别场合是适用的这种想法，我根本看不出有联合的基础”。主人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也是不同的；“在这两种人当中，一种人称为老板，另一种人称为工人——这两种人在本质上是完全平等的和完全自由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把许多“几乎都是干同一件工作”的工人联合在一个作坊里，“只是为了增加产品的数量，而不是利用他们的多方面的才能来促进产品本身的质量的改进”（第 251 页）。

真是一个只知道巴黎的时髦小商品和小手工业生产，只知道没有分工和机器的工业的庸人！

社会和工人协会之间的契约：

“工人协会必须向社会——工人协会是它的产儿并依赖于它——按照最接近于成本的价格经常提供它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必须使人民得到一切所希望的改进和改善。为此目的，工人协会放弃任何同盟，服从于竞争，把自己所有的账本和档案交给社会管理。社会在对工人协会的关系上

“capable”，蒲鲁东用的原文是：“susceptible”，意思相同。——编者注
“se soumet à la concurrence”，蒲鲁东著作中是：“服从于竞争规律”（“se soumet à la loi de la concurrence”）（第 256 页）。——编者注

保持解散协会的全权”，作为对自己的控制权的确认。

(谁将享有这些全权呢?)

至于协会成员本身：

“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对协会的财产享有共有的权利；他们有权连续担任协会内的任何职务，有权在协会内担任与他们的性别、才能、年龄和资历相适应的任何职位，根据这一点，他们的教育、培养和习艺必须这样安排：使他们在承担讨厌的和繁重的职务时能够学会各种劳动技能和知识，保证他们在成熟时期能有多方面的技能和满意的收入。职务由选举确定，章程条例由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批准。报酬根据职务的性质、能力的大小、责任的轻重来确定。联合会的每个成员根据其贡献分得协会的利润并承担协会的义务。每个人如果愿意都有权退出联合会，相应地进行结算和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协会也有权随时接受新的成员。”（第 255—257 页）

“在过渡时期运用这些原则可能激起资产阶级的主动性并使它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结果……必定会使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高兴。”（第 257 页）无产阶级缺乏能思考的头脑，而资产阶级却乐意同它联合。“明知商业和工业有极大的风险，却不要工人协会中的固定薪水和光荣职务，而宁愿去为私人企业操劳，这样的资产者是没有的。”（第 258 页）

（蒲鲁东先生，您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4. 《价值的构成，廉价贸易的组织》

“公平的价格”

是人们十分期望的东西，

包括：(1) 生产费用和 (2) 商人的报酬或“对卖主卖出货物时丧失的利益的补偿”（第 262 页）。为了保护商人，应当保证他能出售商品。如果临时政府保证第一批每人投资 10 万法郎的 1 万名工业家获得 5% 的收入，它就能立即使贸易繁荣起来。

（就是在最繁荣时期也没有这么多！）

工业投资会有 10 亿。“1 万个商业和工业企业没有互相的支持，是无法同时进行工作的，因为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为另一个企业所消费，劳动——这是销售。”

（这只旱老鼠只知道国内贸易，并且象最平庸的英国托利党人一样，认为通过国内贸易可以达到大工业的繁荣！）

因此，为了建立这种保证，国家不仅用不着花费 5000 万，甚至用不着花费 1000 万（第 266—267 页）。

任何人，就是蒲鲁东本人，也没有写过比这更蠢的废话。

于是，根据下面的原则订立契约：

“国家以它暂时所代表的利益的名义，各省、各公社则各自以它的居民的名义……必须向愿意提供最优惠条件的企业主保证，或者给他的资本和他的企业中所用的原料以利息

（在废除利息之后），

或者给他以固定的报酬，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他以足够数量的定货。而承包人方面则有义务提供他们答应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此外，为竞争保留充分的活动场所。所有这些人必须报告其价格的构成因素、供应办法、合同期限和履行合同的手段。投标在指定期限内加封交出，然后……在裁定之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启封公布。每项合同期满后再重新公开招标。”（第 268—269 页）

5. 《对外贸易，输出和输入的平衡》

由于关税的使命是保护本国的工业，所以降低利率、清算国债和私人债务、降低房租和地租、规定价值等等，会大大地降低一切产品的生产费用，从而也有可能降低关税（第 272 页）。

蒲鲁东著作中是：“根据合同的重要程度在裁定之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三个月”（第 269 页）。——编者注

只要利息降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蒲鲁东就赞成取消关税。

“如果明天……法兰西银行把它的贴现率降到零点五厘，包括利息和佣金，巴黎和各省的那些从前没有享受过这个银行的贷款的工厂主和商人立即会在谈判中力图获得成功，以求得到它的银行券，因为他们支付零点五厘就可以按票面额得到这些银行券，而不象从其他银行家那里支款那样要支付6、7、8或9厘！！！！……国外的工厂主和商人也会来谋求这种银行券。既然法国银行券只值零点五厘，而其他国家的银行券要贵9或11倍！！，人们宁愿要前者，任何人都愿意在自己的支付中使用这种货币！”（第274页）。为了得到更多的法国银行券，外国生产者就会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我们的输入就会增加。但是因为外国人不能用这些输出的银行券在法国购买无期公债，也不能以贷款的形式又把它们给我们，也不能用它们来取得我们的土地抵押权，所以这种输入不会给我们带来害处；“相反，不是我们需要限制我们的购买，倒是外国人在出卖时须保持警惕”（！！（第274—275页）。

在这些有奇效的法国银行券源源而来的影响下，外国人只好在自己家里重演蒲鲁东在法国所进行的那种经济革命。

最后，号召共和派律师、所有这些克雷米约们、马利们、赖德律-洛兰们、米歇尔们及其他人接受这种思想。据说，他们，这些法律观念的代表们，由于所负的使命，必须在这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第275—276页）。

第七篇

《政府溶化于经济机体中》

1. 《没有权威的社会》。

华丽辞藻。

2. 《政府职能的废除。迷信》。

历史的、宗教哲学的和富有诗意的幻想。结果是：在美国盛行的志愿制度在这一方面无异于废除国家（第 293—295 页）。

3. 《司法》。

任何人都无权审判别人，只要后者本人不使他成为自己的法官，只要被破坏的法律没有得到破坏者本人的自由赞同的话，

以及诸如此类的深刻的探索。

在契约的制度下，每个人自己都要表明自己同意法律，而且“按照民主原则，法官应当由被告人自己选举”

（美国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应当选择仲裁法官，仲裁法官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执行。这样，国家也从司法领域中被废除（第 301—302 页）。

4. 《行政，警察》。

凡是一切都处于相互契约关系中的地方，根本不需要警察：“公民和公社（从而，各省、以至整个民族）

不再需要国家插手管理他们的财产，建筑他们的桥梁等等，以及执行一切监督、保护和警务的职务”（第 311 页）。

换句话说，行政管理不会废除，它只是分散了。

5. 《国民教育，公共事务，农业，商业，财政》。

所有这些部都要取消。学校教师由家长选举。学校教师选举教育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员，直到最高“科学院委员会”（第 317 页）。高等理论教育将同职业教育相结合；只要这种教育同手艺训练相分离，它在性质上仍旧是贵族的，它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巩固统治阶级及其对被压迫者的统治权（第 318—319 页）。

总的说来，理论教育被解释得很狭窄，在分工的范围内这种

教育完全被看成象工人协会里的学徒制一样。

不过，如果“在共和国成立中央训练局，以及中央工场手工业和艺术局……我并不反对”。

只是应当废除各个部和法国的集中制（第 319 页）。

公共事务部应当取消，因为它会压制公社、省和工人协会的主动性。

可见，这里也是带社会镶边的英美制度（第 320—321 页）。

农业和商业部——纯粹的寄生物和营私舞弊。证据：它的预算（第 322—324 页）。

当再也没有任何财政需要管理的时候，财政部就会自行消失（第 324 页）。

6. 《外交，战争，舰队》。

外交将随着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爆发而消失。民族将分散，它们的各个部分将同自己的邻居交往，就象它们全属于一个民族一样。外交和战争将终结。如果俄国想要进行干涉，那么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如果英国不愿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野心，那么英国也会发生革命，这样一来，困难也就没有了。在已经革命的民族那里，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象几何学一样，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同样的。“不存在俄国的、英国的、奥地利的、鞑靼的或印度的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没有匈牙利的、德国的、美国的物理学或几何学。”（第 328 页）

《结 尾》

纯粹的华丽辞藻。这里有下面这样一段直接击中目标的话，它以最可笑的方式推翻了整个无政府状态的建筑物。

在经济秩序下，“由经验伴随的理性向人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然后对他说，这些规律是必然性本身的要求；没有任何人创造它们，没有任何人

强加于你…… 你答应尊重自己弟兄的荣誉、自由和财产吗？你答应任何时候都不用暴力、欺骗、高利贷和交易所的勾当去占有别人的生产成果或财产吗？你答应任何时候都不在法庭、商业或在自己的任何交易活动中撒谎和欺骗吗？无论接受或者拒绝这一点，你都是自由的。你要是拒绝就会成为野蛮人社会的成员；你舍弃了人类的共性，你就要受到怀疑，你将丧失任何保护。任何人遭到一点委屈就会打击你，而他受到的指责只不过是用不着这样残酷地对待畜牲。相反，如果你发誓信守契约，那么你会被接受加入自由人团体。你的所有的弟兄都会同你一起承担义务，向你保证忠诚、友谊、帮助、服务、相互交换。如果你或者他们破坏了契约——不论是由于粗心大意、一时冲动还是居心不良——，你们就要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失或无秩序和不安全而互相负责，而这种责任会招来惩罚，直到开除或者处死，视违反誓约的严重程度或是否累犯而定”（第 342—343 页）。

接着是新的联盟的宣誓公式——

“以自己的良心向自己的弟兄和整个人类”

宣誓。

最后是对现状的议论，

农民站在政治之外，工人也同样，但是两者都是革命的。资产者同他们一样，追求自己本身的利益，也同样不大关心统治的形式。他自己出于天真把这个叫做“保守派，而决不是革命的拥护者”。——“商人、工厂主、工场手工业主、农村的所有者……所有这些都渴望生活，美好的生活；他们真心实意要革命，但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旗帜下追求革命”。此外，他们感到害怕的是革命一开始必然要表达“无产阶级特有的观点”；“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所以类似的分裂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不会继续下去了”（第 347 页）。在信贷的利率为零点二五厘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会变成革命的，革命不再使它感到恐惧。

最后，非常激动地对卡芬雅克和赖德律- 罗兰说：

如果他们硬说，“共和国高于普选权”，那么这就是说——“革命高于共和国”。¹⁶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8 月和 10 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1948 年版第 10 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卡 · 马克思

克拉普卡将军¹⁶⁹

我们从来源可靠处得到的下述克拉普卡将军的纲领，是准备科苏特来伦敦后给他的。它证明科苏特在他的最知名的拥护者当中是多么威信扫地。纲领的内容如下：

政 治 纲 领

因为我要离开一切政治活动舞台一个时期，也可能很久，所以，我在这里向我的朋友作以下声明，我不愿对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作不真实的解释。

(1) 在人民对专政问题表示自己的意愿以前，无论在祖国还是在祖国以外的地方都不会有任何专政。

(2) 出于对多数同胞的意见的尊重，并根据我个人的信念，我承认我们的尊敬的同胞路德维希·科苏特是匈牙利流亡者联合的首领，但同时我声明，我认为抓住统治者的职位和头衔不放是与我们革命活动的基本原则完全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事业非常有害的。

(3) 关于我们在国外的活动：

(a) 为了领导事务，全体流亡者选出的几位代表应当同已经被称作首领的人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

(b) 在分配因人们拥护匈牙利事业而得来的钱款时，遵循的原则不应是个人的关系，而只应是考虑祖国的某某忠实的儿子为祖国做了什么，他是否有权得到资助。根据这个原则，中央委员会

把资助私人的钱款交给由相应的流亡者团体选出的委员会公正地和公开地加以支配。

关于我们在国内的活动。

一旦匈牙利能对自己的暴君开始进行殊死的斗争,那时将领导整个事业的人,就有责任在最短期内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立宪国民议会作为唯一的革命政权,而政府的产生只应是这个议会活动的结果。

(4)因为我们的任务不能包括干涉未来的国家代表的活动和现在就制定我们祖国的宪法,所以我们只能指出那些我们从中期待祖国未来的繁荣、复兴、强大、昌盛以及保证所有民族团结一致和牢不可破的同盟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愿意考虑我们人民的精神和过去,——对个人和民族都同样适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但是,因为上天不考虑我们的微不足道的想法,而往往正是在难以期望的地方对国家命运施加它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因为在我看来,匈牙利未来的宪法问题目前居于次要地位,而生死存亡的主要问题是推翻威胁着民族生存的奥地利的压迫,所以我声明,我将以我的利剑和我个人的影响为任何一个旨在推翻奥地利王朝的强国效劳,因为推翻奥地利王朝同恢复匈牙利的独立和国家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

格奥尔格·克拉普卡将军

1852年4月

从上面所引的纲领中可以得出对克拉普卡的性格的非常准确的概念。他牢牢地坐在两把椅子之间,他非常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坚毅的人,但是在这方面他的力量不够。天生的本能胜于意志。他想要科苏特,同时又不想要他。他一只手抚摩他,另一只手又给他一记耳光,但是为了耳光打得温和一些,他带上丝手套。克拉普卡忘记了,带不带手套,打耳光总是打耳光,象科苏特这样一个虚荣心重、容易激动和沽名钓誉的人,对细小的侮辱,就象奇耻大辱一样,是不会忘记的。克拉普卡这种摇摆不定、没有主见的人,不幸做什么事情总是半途而废。克拉普卡的这一纲领显示

出自己的政治幼稚病，而他那句结束语甚至带有笨拙的轻率的痕迹。克拉普卡忘记了，不合时宜的话常常会把全盘计划宣扬出去。但愿克拉普卡将军不会落到对克拉普卡外交家的笨拙感到后悔的地步。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5 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卡 · 马克思

* 关于凯里¹⁷⁰

在美国——那里今天的社会矛盾远不如欧洲严重，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很大损害——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凯里。¹⁷¹而它的保守的资产阶级（从较新的英国学派的观点来看）对手是威兰德教授。使凯里的拥护者大为不快的是，威兰德的《政治经济学原理》¹⁷²在新英格兰的多数学校里已经被当作课本了¹⁷³。

凯里的主要功劳在于，他确实制造出自己独特的、直接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产品。他的学说简直是一种万能的东西，是纯粹美国佬的学说。它力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似乎不是斗争和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和和谐的条件。（理论上很妙，而现代工厂城市在这方面提供的实践又怎样呢？）这些经济条件分为：

- （1）地租，即土地所有者的份额；
- （2）利润，即资本家的份额；
- （3）工资，即成品价值中的工人的份额；

如同我们看到的，凯里太高明了，他不仿效初出茅庐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¹⁷⁴或者他们的前辈（如果您允许的话）海因岑，把阶级的存在同现有的政治特权和垄断联系起来，因而认为法国大革命无条件地即席创造了社会和谐，一劳永逸地拿到社会和谐

的专利证。¹⁷⁵相反,凯里为经济事实寻找经济原因,而且他当然不会越出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模糊不清的、正处于运动中的美国阶级关系的框框。因此,他只是证明,他把社会发展中的某种暂时的因素当作社会生活的正常关系。凯里学派同英国经济学家的论战是最有代表性的。凯里学派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古典代表、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总之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敌人”的军火库。凯里学派象猛攻李嘉图那样狂热地攻击现代资产阶级欧洲的所有其他有威望的经济学者,谴责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传令官,说他们把社会分成几部分,为内战锻造武器,并无耻地证明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之间产生必然的、不断增长的对立。

法国人巴师夏是自由贸易的绝对拥护者;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天真纯朴地跟着他象祈祷一样地重复“对自由贸易的祝福”。凯里本人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而且曾经闹过非同寻常的笑话:例如,他因为资产阶级的法国倾向保护关税而把它同中国混为一谈。¹⁷⁶他象所有的自由贸易拥护者必然做的那样,认为国家对有关私人工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等等进行不适当的干涉是社会所有的不和谐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佬,彻头彻尾的美国佬。今天凯里先生闷闷不乐,他同法国人西斯蒙第一道,为了处于集中过程的英国大工业的破坏性影响而呻吟悲痛,在他看来,这种大工业会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原则”。¹⁷⁷更不用提凯里在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中根本看不到革命的、改造的因素,他毕竟是美国佬的气味太浓,不认为工业本身负有责任,这一点也许是他论断中唯一正确的结论。他认为英国人对其工业的影响负有个人责任,更不用说李嘉图又一

次对英国负有责任。凯里陷入这种矛盾之后，不可避免地必定逐渐越来越倒向小资产阶级的 [制度]，倒向曾经存在过的、但早就被排挤掉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宗法式同盟。

凯里及其拥护者的一切都决定于他们是美国佬，他们借口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信念：他们在维护“人数最多的、最受苦的阶级”，他们在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西斯蒙第过去这样做，是为了摧毁现代工业和怀念以前的工场手工业；而他们今天这样做，是为了鼓吹保护关税。这样，实际上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博爱的乌托邦式的竞争手法，这种竞争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利的特殊现象。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的一面在这里表现得最出色。¹⁷⁸

问题在于，我们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中看到，后者如何越来越被排挤到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地位上。而这些国家在失去了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以后，都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有息贷款借出去。热那亚和威尼斯曾经促使荷兰的地位提高，荷兰曾经供给英国以资本，而现在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完全这样做。只是现在这种变革在各方面都比以前的规模要大得多。英国的情况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在后者那里贸易垄断是首要的因素，破坏这一点并不难，而英国除了贸易垄断还有工业垄断，这种垄断就其性质来说是比较坚固的。然而，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的资本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程度，以致它不得不在两大洲修建铁路，向柏林的瓦斯照明、波尔多的葡萄园、俄国的工场和美国的轮船投资。所有这一切为人们提供了材料，来最有趣地观察英国的集中的资本 [Centralkapital] 所具有的吸引力如何不可避免

地得到那种重新把英国的集中的资本驱赶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离心力作为补充。如果革命爆发——就会发现英国人已经为欧洲大陆无偿地创造了一切交通手段和供生产用的机器；美国不期待革命；它用保守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结算，有时通过破产来清算自己的英国债务。这就是它迅速发迹的秘密之一，一种类似铁路惨祸和轮船失事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正是这种丝毫不所顾忌、正是这种最疯狂的生产虚假繁荣，使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产生的成千上万的人有可能出现，同时又无情地借助蒸汽机使大批大批的人过早死亡。一种东西只是另一种东西的补充。资本主义联合会靠完全无视人的生命来无止境地增加财富！——这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性胜利”的注释！¹⁷⁹

卡·马克思写于 1852—1853 年
载于 1853 年 9 月 17 日和 21 日
《改革报》第 49 号 and 第 50 号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戴维·乌尔卡尔特¹⁸⁰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近来不止一次提到在英国鼓吹召开反俄大会的乌尔卡尔特先生，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¹⁸¹我们只能把这种谬论解释为“自由斯拉夫民族”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一个态度鲜明的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虽然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但是他所起的实际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某种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没有成效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个着了某种正确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失掉了一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一点部分是对的，但自然只有一部分是对的。目前英国议会评价任何人不是依据他的功绩，而是按照他是不是担任某种职务，乌尔卡尔特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自治。他希望，西欧为了对抗俄国而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以，他不愿听到关于党派的任何议论，而且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

1848年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有助于推动俄国的前进，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划好的目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保守的旧体系的范围内奥地利是和俄国直接对抗的，所以他特别倾心于奥地利，而对可能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他一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维护个人主义和民族的独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Vulgarism）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一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仅仅当作外交问题。至于客观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院审判的东西，或者相反，是某种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家对乌尔卡尔特所作的评论：

“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颠颠的老先生。”

既然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目的，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知识进行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一个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会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重新出现，而且无论在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判扎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就体现在《论坛报》的这位伦敦的主要台柱A·P·C·身上。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20日左右
载于1853年12月19日《改革报》第112号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¹⁸²

1854年3月31日星期五于伦敦

所得税法案通过了。¹⁸³约·帕金顿爵士公开反对它,并且尽管十分乏味但却理由充分地指出,不久前公布蓝皮书即机密来往公文集¹⁸⁴完全以新的方式使人看清了财政大臣过去的财政政策。格莱斯顿先生于1853年4月18日提出和平预算,那时他应当是完全确信战争已临近。¹⁸⁵在他声明的前三天,联合内阁收到罗斯上校的一则消息,说

“缅施科夫公爵还没有让宰相知道他的使命和要求的性质,就硬想得到宰相的正式保证,要他不把缅施科夫的使命和要求告诉不列颠代表和法国代表。”¹⁸⁶

联合内阁¹⁸⁷也从秘密通信中知道了皇帝有意除掉“病夫”¹⁸⁸,以便不让他从自己的手中溜掉。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¹⁸⁹掌握了这一消息,还更进一步对议会说:

“如果你们把所得税的有效期延长七年,那么我请求前两年每英镑只收七便士,其后两年每英镑收六便士,而其余三年每英镑只收五便士,然后所得税应该完全取消。”

我们报纸的读者还记得¹⁹⁰，格莱斯顿先生认为，所得税是战争的强有力的工具，而在和平时期则应该除掉它。他这样说时他知道，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而且不到一年每英镑收七便士的税就必然增加一倍。现在所得税是每英镑收一先令二便士。如果有人要说，精明过人的财政大臣自己错误估计了情况，那么我将回答说，上星期一国家有价证券已经下跌，因为按交易所经纪人的可靠说法，秘密文件的公布显然证实了沙皇坚决要实现他的计划，甚至对他最肯定的保证也不能相信。“群贤内阁”的成员应该有洞察力，至少要有证券交易所的成员那样的洞察力。

就在联合内阁的精明博士邓斯·司各脱¹⁹¹提出自己的国家有价证券变更条款的财政计划时，他不顾已经得到的警告而在“灾难”到来之前就这样地保证了国库的空虚。下面各个年份的国库平衡表是这样：

1844—6254113 英镑	1849—9748539 英镑
1845—8452090 英镑	1850—9 [245676] 英镑
1846—9131282 英镑	1851—8 [381637] 英镑
1847—8457691 英镑	1852—8 [841822] 英镑
1848—8105561 英镑	

1853年初，格莱斯顿先生竟巧妙地将平衡表缩减到4485230英镑，而很快它就会完全化为乌有，因为这个很有办法的金融家不得不将每一股按一百英镑计算来补偿南海公司¹⁹²剩下的债务，而在交易所里每股按八十五英镑都很难卖出去。

1854年3月20日。——编者注

方括弧里的数字是根据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帕金顿的讲话稿刊印的。——编者注

联合内阁的这种财政政策，在“感谢”沙皇的秘密瓜分计划时，完全 [适应] 内阁的外交政策；在经常向议会报告的 [消息] 与内阁掌握的消息直接矛盾时，完全 [适应] 内阁的议会政策；在强迫奥美尔-帕沙在沙皇没有做好入侵准备以前不得采取行动时，完全 [适应] 内阁的军事政策；它完全 [适应] 这一军事政策时的情况如下：用轮船调运部队，用帆船调运马匹，把军官留在伦敦，认为所有其他地方中最适于占领的正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敖德萨、克里木、芬兰、多瑙河口或者任何其他对俄国有危险的据点而让士兵在君士坦丁堡登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打败哥萨克，而是为了在这一紧要关头让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教士认识西方的权利和公民的平等。

尽管爱尔兰议员强烈反对，看来下院还是通过了决议，要审查钱伯斯先生的提案，并指定调查女修道院的活动和管理制度的委员会。钱伯斯先生的提案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要把强行从父母和法定监护人身边夺走的女孩同外界隔绝开来。英国资产阶级一想到为修道院抢女孩的可能性就发抖。但是，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正义感，到了为满足贵族的情欲和棉织业巨头的古怪念头而抢走女孩的时候，却非常迟钝。上周有人诱骗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离开了父母，把她勾引到郎卡郡工厂，昼夜扣在那里，如同锁在监狱一样，强迫在那里睡觉、吃饭。当父亲知道他的女儿出了事时，甚至不许他见她，而且警察把他撵出了工厂。这就违犯了工厂法、人身自由法、父亲有权保护自己未成年子女法，从而使人身保护法所提供的权利一文不值。出现了粗暴的令人发指

的抢小孩的事。但是，当不幸的父亲到地方当局寻求正义时，它采取什么态度呢？回答是：“我们无能为力。”

托马斯·邓科布先生提交了一份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七千六百多名普雷斯顿市的居民签名的请愿书，诉说该市地方当局在执行维持安宁和秩序法时的所作所为。他声称，复活节假日之后他将立即提出关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普雷斯顿的鼓动者，有经验的罢工教唆者是一些妄想组成国内新阶层和培养出工人议会¹⁹³的人，他们终于被制止了。他们之中约有十人被地方当局以阴谋罪逮捕、审讯，被保释并在利物浦的巡回陪审法院受审。”

《晨邮报》这样报道了¹⁹⁴由于某些情况而使我没有较早报道的这个事件¹⁹⁵。控告首领的根据如下：企业主们派人去曼彻斯特，说服那里的工人来普雷斯顿。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普雷斯顿人在火车站迎接他们；来的人就象是贫穷和不幸的化身。大约五十四人同意去法默斯-阿姆斯¹⁹⁶，他们在那里整天吃得很好，晚上当他们同意返回时，有一万五千人把这些工人热烈送到火车站。其中七人被企业主留下，送回普雷斯顿，为的是控告考威尔先生及其同事搞阴谋。现在如果我们来谈 [真正的] 事件，那么谁是真正的阴谋者¹⁹⁷就毫无疑问了。

1847年普雷斯顿的棉织业巨头降低了工资，并郑重答应只要商业重新进入繁荣时期就恢复原工资。1853年生意兴隆，他们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四个工厂的工人罢工了，继续工作的工人捐款支援他们。于是，厂主们秘密商定关闭自己的工厂，而且为了实现这一阴谋，他们规定每人将交付五千英镑。工人们向郎卡郡

如果他（企业主）同工人妥协的话。——编者注

的其他城市呼吁，结果他们得到了支援。企业主们四处派遣特使，游说或怂恿其他城市的棉织业巨头向自己的工人宣布同盟歇业，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他们不以此为满足，还开始大规模募捐，以对抗工人的类似行动。当确信所有这些措施无济于事以后，他们派自己的代理人四出活动，怂恿工人及其家庭、女裁缝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习艺所的贫民来普雷斯顿。他们发现这种补充办法没有尽快出现所期望的效果，就试图挑拨百姓骚乱。他们的卑鄙行动激起了百姓的愤怒。他们禁止在马尔舍集会，但是人民在黑石山脊以及其他禁止集会的地方举行了集会。他们招来上百名新警察，让特别警察宣誓，装备了救火队，让军队整装待发，而且竟然宣读骚扰取缔令¹⁹⁸以挑起暴动。这就是厂主们的阴谋，但是他们丝毫未能得逞。有人不顾这些事实而控诉搞阴谋，但不是控诉厂主而是控诉工人。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对控诉企业主搞阴谋提供了机会。一个工厂的工人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也好，工人委员会也好，都以各自的方式要求解释。工人张贴通知，说他们在一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威胁要对这家工厂的厂主采取措施，要求罚金五千英镑，这笔钱是他支持同盟歇业应当支付的。厂主的声明直接与工人的通知相矛盾，这使企业主退却了。如果说根据法律这种付五千英镑的义务是阴谋，那么威胁强迫实现这种义务就更是阴谋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对工人首领的起诉书本身是普雷斯顿法院的官吏们串通的结果。根据《泰晤士报》本身的报道，法官搜集证据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用单马车把新增加的工人¹⁹⁹不是送往拉屠沙，因为他们害怕在那里被

人知道，而是送到审讯室，以便在那里议定工人的供词；然后在黑夜的掩护下扑向他们选中的牺牲品。

但是，工人既不受人唆使破坏社会秩序，也没有胆小得 [屈服于] 普雷斯顿暴发户的强制，他们的理智使郎卡郡的这些小拿破仑的计谋破产了。

星期三晚上，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公开集会，目的是让首都工人阶级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普雷斯顿厂主的行为的意见。一致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

“根据英国现任大法官罗尔夫·男爵在他任法官时对法律所作的如下解释：

如果说人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只在一定工资条件下工作，而在其他的一定条件下不工作，并且用和平手段取得了目的，而不追求其他意图，那么这种行为是在法律范围以内的。

根据以下的情况：

普雷斯顿工人被卷进了同自己厂主发生的三十个星期的冲突之中，他们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完全遵守秩序，以最和平的方式行动；

尽管有这样一些事实，尽管对他们采取暴力和进行恐吓并没有任何证据，甚至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控告他们，工人委员会的四名委员还要为阴谋罪受利物浦巡回陪审法院的审讯；

因此，会议认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和地方当局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认为他们犯有滥用权力、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同时破坏人身自由的罪行，而且认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人民的一致谴责。

考虑到联合王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应是维护正义和巩固法制，会议有责任给目前处于困难条件下的普雷斯顿工人以特别的、经常的支援，热烈号召所有关心改善劳动条件的人都联合他们并支持他们的美好意愿。”²⁰⁰

克兰沃斯，罗伯特·蒙西·罗尔夫。——编者注

《人民报》上是：“十一名”。——编者注

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这些报刊担心工人阶级现在开始明白，在单个资本家即他们的剥削者背后有 [资本主义社会的] 整个机器，为了消灭前者，工人阶级一定要清算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纽约半周
论坛报》第 929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

致《每日新闻》编辑²⁰¹

先生：为了弄清楚我们的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对手，现在已经到了应当正视它的时候了。关于俄国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众说纷纭。一些人估计过高，另一些人则估计不足，而真实情况看来仍然被帷幕掩盖着，能够揭开这个帷幕的不是那里出版的什么《揭露俄罗斯的秘密》²⁰²之类的书籍，而只能是现实的军事事件。

不过在我们西方的书刊中有不少只需要加以分析和综合就可利用的宝贵资料。俄国自己所提供的这类资料也极其丰富。因为俄国的军事著作常常象使用本国语那样使用法语和德语，甚至使用得更多。斯米特少校关于 1831 年波兰战争的重要著作和托尔斯泰上校关于入侵匈牙利的叙述就是例证。俄国军官用俄文写的军事著作显然比用外文写的著作逊色。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和布图尔林关于 1812 年战争的书，鲁基亚诺维奇关于 1828—1829 年战争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著作同我们通常在二流的法国历史著作中看到的对战争的描写，极为相似。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为迎合极端的民族虚荣心而歪曲事件真相，战场上的胜利被作者纸上的更大胜利弄得暗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置于不利的境地。这

里很少有真正的军人所固有的那种认识,即认为战胜勇敢的敌人比战胜胆小鬼更光荣;这种认识把例如威廉·纳皮尔先生的著作《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看成不止是一个“军官”的著作,而主要是一个“绅士”的著作。历史著作中所以存在这种文风,也许应该用必须保持俄国人的黠武热情来解释。但是,一旦作者选用了一种西方语,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欧洲成了法官,西方具有的新闻公开会很快把那些因为剥夺了反对者的答辩权而被盲目信以为真的种种说法吹得精光。颂扬神圣的俄国及其沙皇的倾向依然如故,而手段的选择则愈来愈受到限制。必须更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虽然企图进行歪曲,而这种歪曲通常很快就会不攻自破,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具体的情报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能使这样的书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外,如果这本书是一个地位比较独立的人写的,那么这本书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军事历史著作,斯米特的《波兰战争史》就是这种情况。

俄国军队的编制和组织是全欧洲军界所熟知的。这种组织极其简单——至少“作战军队”是这样,人们很容易了解它。真正的困难只是在于要弄清楚这个组织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个军队的哪些部分不仅存在于纸上,而且可以调去对付外部的敌人。从这个观点来看,用西方语写成的俄国军事著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民族的自豪感不允许它们的作者在敌人取得局部胜利和进行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夸大俄军参战的人数。为了维护俄军的声誉,他们不得不泄露机密和说明俄军的实额和空额之间的差额。在这方面,引用了官方花名册的斯米特的著作特别有用。相反,完全符合俄军在匈牙利的行动方式的托尔斯泰的《匈牙利战况》,看来,与其说是打算显示随时准备扑向革命西方的俄军的英勇精神,不

如说是要显示它的有威胁性的优势兵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把握可以至少判断那部分直接威胁欧洲其余部分的俄国军队，那么要弄清楚舰队的真实情况就要困难得多。后来我们综合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全部情报资料，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某些更加明确的情报，直到“查理”提供关于舰队的较精确的情报或寄来几个可供就地研究的典型事例。

要了解象俄国这样的国家的筑城工事系统，以及预设的防御和进攻的作战地区，当然是很困难的。海岸防御工事在某种程度上已在地图和平面图上作了标记，由于其本身的特点，把它们完全隐蔽起来是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虽然有许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详情很少为人所知，却并不完全象某些人所感觉的那样神秘。但是，关于波兰的筑城工事，那些堡垒群——它们的存在本身暴露了进行进攻性战争和征服性战争的企图，除了它们的建筑地点，人们知道的情况很少。某些欧洲的军事机关可能用黄金从俄国官员那里得到这些堡垒的平面图。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会为自己珍惜这份情报。如果波兰侨民能够弄到这些平面图——这对他们来说不应当是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把这些平面图公布出来就会使俄国受到比他们曾经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的危害。

俄国军队由四大部分组成：主要的作战部队，它的预备队，特种部队和地方性部队，哥萨克（包括一切非正规部队而不管其来历如何）。

俄国所处的特殊条件要求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组织完

全不同的军事组织。在东南方，从太平洋到里海，它的边境由沙漠和草原守卫着，只会受到杀人越货的游牧部族的攻击，在这些地方对付这种攻击，最好是用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军队；在高加索，它必须同顽强的山地部族打仗，同他们斗争的最好方法是把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明智地结合起来；它的西南和西部边境，要求有一支按照欧洲正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和西方军队同等武器装备的大部队直接参战，因为它可能不得不与西方军队作战。但是，因为国内资源只得到部分开发，不可能经常保持这样一支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因而一部分士兵不得不告假回家以待战时应召。俄军的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组成的。

俄国军队的这种编制的原则开端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期，它的编制经过以后几次瓜分波兰、征服黑海、同法国的几次大战而逐步得到完善。1830年波兰革命后，它达到了现在这样的状况。

主要的作战军队几乎毫无例外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边境上，它尤其是瓜分波兰、同法国作战和波兰革命的产物。它的双重任务是：保持对帝国西部比较文明的和非俄罗斯的部分的统治；对西欧摆出乌云压顶之势，准备随时在它的头上电闪雷鸣。过去这项任务完成了多少，或者不如说有多少没有完成，大家是太清楚了。在现代战争中，这项任务能够完成多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主要的军队或作战军队（作战部队）由十一个军组成：一个近卫军，一个掷弹兵军，六个步兵军，和三个预备骑兵军。

全部编制大体上是拿破仑所实施的体制的翻版。前八个军正好相当于法国在伟大战争期间的军。近卫军和掷弹兵看来是专门

为了建立总预备队，骑兵军则计划用于特殊的决定性行动，拿破仑为了采取这种行动，总是握有大量这种部队和炮兵作为预备队。这样，上述八个军虽然名为步兵，但由于它们本身机构的关系，全部配备了骑兵和数量众多的炮兵。每一个军有配备齐全的司令部、工兵、运输浮桥和弹药的工具、炮兵厂和其他用于独立作战的军队装备。近卫军和掷弹兵军比其他几个步兵军的编制小，每个团有三个营而不是四个营。另一方面，近卫军比骑兵和炮兵的编制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预料，在战斗部署表中，他们的大部分将并入骑兵和炮兵的总预备队。第一骑兵军和第二骑兵军只是由重骑兵和马匹牵引的炮兵（正规的轻骑兵配备给步兵军）组成；第三骑兵军或龙骑兵军有特殊的编制；因为这些龙骑兵象以前一样既用于步兵作战，又用于骑兵作战，所以他们组成各兵种的预备队，同时具有只有骑兵才有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时间将表明是否会达到这一点；所有其他军队几乎全部和到处把龙骑兵变为普通骑兵的经验，是一种不大有利的征兆。上述思想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无论龙骑兵军和近卫军营都配备骑工兵、地雷工兵和架浮桥的工兵，俄国制度的崇拜者用一切办法大肆赞扬的这项规定，现在也需要经验来检验。

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包括师、旅、团的十一个军的编制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也不单纯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相反，上一次土耳其战争²⁰³，波兰战争，入侵匈牙利，以及现在同土耳其的战争都表明：和平时期的部署完全考虑到了战争，以致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向边境运动，都不需要把一个师、一个旅或一个团从一个军调配给另一个军。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优势，是俄国人习惯地、几乎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结果。其他一些比较爱好和平的

国家到临战时发现，它们的军事机器的车轮和杠杆已经生锈，整个机器已经运转不灵。军、师、旅的编制不管多么完善，都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以便尽快把军队调往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重新任命司令、将军和参谋人员，把一些团从一个旅调到另一个旅，从一个军调到另一个军，以致在集中兵力实行进攻时出现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军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互不相识、也不认识自己的长官和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强烈感到虚荣心受到刺激。但是只好指望这个新的“刚造好的”机器会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这无疑是一个缺点，尽管这个缺点的影响在西方这样的军队里比在俄国军队里要小得多。只有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才能避免这种不利的处境（从 1848 年起奥地利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因此它的一个军也有相当稳固的编制），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较高水平，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也可以弥补这种不利处境，因为这种不利处境在这种和任何其他情况下都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的要求所造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3 日和 12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 洲 战 争²⁰⁴

在昨天早晨“北极号”带来的欧洲消息中，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报道是俄军以将近五万人的兵力，编成三个军，在哥尔查科夫公爵、利迭尔斯将军和乌沙可夫将军直接指挥下强渡多瑙河下游，并占领了土耳其多布鲁甲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包括在保加利亚省里的地区是一个不大的平原，它西面和北面有多瑙河（流经切纳沃达后向北流，在到达河口前形成一个大河湾）环绕，东面是黑海。这个地区大部分是沼泽地，并且经常闹水灾。这里构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如：巴巴达格、伊萨克查、曼成、土耳其恰，有消息说这些工事已被俄军占领。但是，本报消息非常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为这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臆造。在多布鲁甲平原和土耳其内地之间伸展着作为屏障的巴尔干山脉。在这次战争之后，俄军没有接近君士坦丁堡，没有对土耳其人取得任何优势。实际上很显然，这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机动，它只说明俄军打算放弃瓦拉几亚最西部的地区。俄军在瓦拉几亚只有七个步兵师，在伊兹马伊尔有一个后备师，而在它的后面，是由三个师组成的切奥达也夫军，目前这个军可能已开往雅西。八个师加上骑兵大概不超过十一万人。如果注意到英法联军可能在黑海西北岸登陆，而这将给俄军后方造成威胁，那么很显然，夺取多布鲁甲的目的是在尽

量少丧失领土的情况下来保障俄军翼侧的安全。在这里要保证使俄军免遭切断危险的态势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径直向塞勒特河地区退却，使多瑙河下游成为一道以福克夏尼、加拉兹和伊兹马伊尔为据点的防线；或者完成到多布鲁甲的突进，把战线移至居斯坦杰、希尔索瓦、沃耳特尼察和布加勒斯特一线。这样，图拉真垒墙、多瑙河、阿尔哲什河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成为第二道防线，塞勒特河成为第三道防线。毫无疑问，后面这个计划是最好的计划，因为他们在一侧丧失了领土，却在相反的一翼赢得了新的领土，退却看来是向前推进，而且还保持了俄军的军事声誉。占领多布鲁甲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万一敌军在阿克罗曼或敖德萨附近登陆，也给俄军留下一条通往德涅斯特河畔霍亭的畅通无阻的退路。然而，我们应该等待关于会导致俄军态势发生这些变化的种种机动的详情。

其次，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王国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支持希腊人的起义，国王和王后到边境去鼓励武装起义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希腊和得到联军支持的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经几乎不可避免，这即使不会大大加剧普遍冲突的危险，也会使本来已很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我们得知沙皇在普鲁士调解下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的消息。²⁰⁵尼古拉认为冲突的解决要取决于土耳其的同盟国对完全解放土耳其全体基督教臣民作出保证。在这些条件下，他将在联合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时着手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而两位政府要员拒绝实行甚至部分的解放，并迫使苏

奥托一世和阿马利亚。——编者注

利法特·帕沙和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编者注

丹让他们辞职。²⁰⁶但是，现在这种建议显然已经不能防止战争了；法军和英军已经加强了联军的舰队，查理·纳皮尔先生大概正在攻打并将夺取阿兰群岛，直到发出新的命令和他接到这个命令为止。不过，也许这一建议的意义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毫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得到完整的情报时，就会清楚了。

在整个这种头绪纷繁和捉摸不定的形势中，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伊斯兰强国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在走向灭亡。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不论是通过和平让步还是诉诸武力，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力量变成一种宗教教派，并彻底破坏奥斯曼帝国的旧基础。这样不仅会完全证实沙皇关于奥斯曼政府已病入膏肓的论断，而且还有人建议为了救病人而切断他的咽喉。在这次战争之后，苏丹可能在政治上形同虚设而仍留在自己祖先的宝座上，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却需要到别处去寻找。为什么俄国专制君主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自己的西方敌手秘密达成协议，原因十分清楚。他想在土耳其尽可能实现最彻底的革命，而且想使这种革命完全服从于他自己的利益。在现存政权被这样削弱之后，沙皇同这个国家的正教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就可以保证他握有这个国家的真正最高权力。于是他将吃到牡蛎肉，而西方政府将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这样的结局是可能的，虽然现在看来它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有相当多隐蔽的因素，现在它们急速地闯入了事件的进程，将给这次伟大战争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就包含着这样的问题，即如此长时间寂静不动的欧洲革命将有多大的作用，本半

球的大政治家们正在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不满意,它却会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3—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4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 4055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4 月
22 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 658 号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²⁰⁷

在多瑙河方面，除了俄军已完全撤出小瓦拉几亚和正准备对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实行强攻外，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对岸集中了大量炮兵，并且有消息说，正准备调大约三万人来这里参加这次进攻。这个消息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计划是十分可能的。而这个计划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土耳其大要塞中最薄弱的，在易于步兵突破的距离内，有一些我们确信自上次战争²⁰³以来没有设防的高地控制着它。但是，正是这个在 1810 年经四天强攻后失守的锡利斯特里亚，却在 1828—1829 年经受住了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两次封锁，并在正规的围攻开始后坚持了三十五天，在主墙被打开缺口之后坚持了九天。看来不如说，这个命运如此变化无常的要塞，它的坚固性和防御能力是无法估量的。²⁰⁸

但我们还是假设，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强攻下将会失守，不过这决不会为敌人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为了进攻苏姆拉和瓦尔那，敌人必须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留下不少于六千人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锡利斯特里亚可以成为另一个位置比较适宜的据点的桥头堡。敌人大概不会去进攻苏姆拉，因为即使占

领了这个极好的设防营垒,它也只是夺去了对方一个极好的阵地,并没有为自己获得同样的阵地。苏姆拉挡住了俄军越过巴尔干的通道,但是夺取苏姆拉并没有给俄军打开这条通道。

苏姆拉的意义在于它是通向瓦尔那的钥匙,而瓦尔那则是通向小巴尔干的钥匙。瓦尔那的防御工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但在守军满员的情况下,要围攻这个要塞,对付这些工事就足足需要一个两、三万人的军。不仅如此,除了这些用来顺利完成围攻任务的兵力之外,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去掩护执行围攻任务的部队,以免受到来自苏姆拉设防营垒的偷袭,因为土军可以在那里集中自己全部兵力。1828年,瓦尔那守军在要塞围墙被攻破两个缺口之后坚守了三个星期;而当时的情况是,俄军舰队控制着黑海,土耳其人却没有任何能够反击围攻者的军队。现在我们假定,锡利斯特里亚已被夺取,瓦尔那和苏姆拉正面的许多极难克服的河川防线已被强渡,而且瓦尔那已被封锁,俄军是否可能留下足够的兵力来制止苏姆拉发挥作用呢?而土耳其人却能够从苏姆拉出发,不仅对围攻瓦尔那的敌军,而且在多瑙河一线,以及对俄军的哪怕是一条交通线,采取行动,从而迫使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兵力调离主力部队,以致最终必然会使他们因兵力极度分散而力量削弱。

即使瓦尔那失守,如果奥美尔·帕沙执意继续在自己的据点苏姆拉坐阵,准备俄军一犯错误就加利用,帕斯凯维奇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帕斯凯维奇拥有的唯一的交通线同时遭到来自正在向它逼近的苏姆拉军队和黑海联军舰队的威胁,他是否敢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呢?我们按照他在亚洲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可以判断,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帕斯凯维奇是一个过分小心谨慎的军事长官,他身上没有任何拉德茨基那样的性格。如果他面临这样的问题,他

会认为这种机动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前任吉比奇 1829 年在阿德里安堡附近曾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这样,我们甚至不考虑英法联军在色雷斯登陆,也不期望联军舰队有比迄今更多的作为,也就是说,不指望它事实上的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说,俄军要想摇旗呐喊、军乐齐鸣地径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人仍然没有援军,俄军终究会到达那里。这一点,除了时髦的军事作家,从来没有人否认过,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什么“权利反对暴力”必胜、“正义的事业”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信念来作出判断。

应该补充一点,不列颠军队在波罗的海比在黑海更少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5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 4080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5 月

20 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 662 号

弗·恩格斯

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²⁰⁹

“欧罗巴号”带来的报纸和信件证实了早先报道的关于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现在收到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具有官方性质，对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不用怀疑。港口的设施被破坏，两个火药库被炸毁，十二艘俄国小船被击沉，十三艘运输船被捕获，而联军舰队的损失是八人被击毙，十八人受伤。人员伤亡不多，说明这决不是丰功伟绩。后来舰队驶往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认为，破坏塞瓦斯托波尔要求它作完全不同的努力。

从多瑙河的战场上收到了关于奥美尔-帕沙取得对利迭尔斯将军的决定性胜利的新消息。但是，除了经由维也纳这个制造谎言以利于交易所投机者的大厨房转来的电讯²¹⁰之外，我们没有关于这一点的其他消息。按照这个说法，土耳其人以七万人的兵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位于多瑙河上游距切纳沃达大约十英里的拉索瓦之间的一个地方，赶上了利迭尔斯。这时奥美尔-帕沙从正面压迫俄军，而被专门派去进行迂回的另一个军从侧翼去攻击他们，这样他们就在两面火力夹攻之下被击溃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奥美尔-帕沙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把那么巨大的兵力集中在锡利斯特里亚下游的某一点上，而利迭尔斯却毫无准备。²¹¹根据在这个战役之前所得到的最新情报资料判断，他的军

队的主力——包括保障整个漫长的正面战线的守备队在内,总数不会超过十二万人——集中在苏姆拉,距离所说的会战地点几百英里。当需要把七万人运到战场上的时候,要克服那样长的距离,使敌人措手不及,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可能的。大概下一班轮船到来时,即可见分晓。

希腊暴动又一次受挫,但是不应该认为暴动已被彻底镇压下去。没有疑问,至少在边境地区还有士兵和指挥人员要重新起来进行斗争,要对土耳其军队进行艰巨的游击战。这一斗争是否能达到较为象样的地步,将取决于各种情况。正如我们的读者在另一页上看到的²¹²,在土耳其本国,一个广泛的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密谋已经酝酿成熟;由于偶然的情况,它的一切线索都被土耳其政府所掌握了。²¹³但是,还会发生其他类似的密谋,而且偶然的情况阻止不了它。同时,联盟的大国用威胁的办法责难希腊朝廷,并派军队在土耳其登陆,好象打算完全占领这个国家。虽然根据法国大使的坚决要求,派了一支部队向北开往大概总是发生冲突的瓦尔那,但是这些军队的大部分仍然会留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不过,联军的主力很快就发动进攻战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这个问题在司令官们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波罗的海,查理·纳皮尔爵士仍然留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没有攻击俄国任何一个沿海要塞。看来使他担忧的是俄国人在浅水域和芬兰湾岛屿间用来攻击他的一支小炮艇队。纳皮尔已派人去英国寻求轻载吃水的蒸汽船,这种船能够追击炮艇,直至它们找到自己的隐蔽所。另一方面,根据一家柏林报纸²¹⁴驻圣彼得堡记者

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

腊格伦和圣阿尔诺。——编者注

的报道，俄国宫廷担心喀琅施塔得不能抵抗意料中的不列颠 Rough and Ready〔威武的士兵〕的攻击，军舰不能顺利地进行机动，甚至不能在港湾里进行示威性的射击，担心对方为防止敌人陆战队在这个地区登陆已有所准备。

但是，在法国军舰抵达波罗的海之前，很少有可能进行任何进攻战。之后，喀琅施塔得大概会荣幸地受到第一次炮击。它是否会被占领或被破坏，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在联军有了准备用来攻击它的破坏手段的情况下，喀琅施塔得的陷落是不足为奇的。

西方强国从剑桥公爵在皇帝婚礼上受到的殷勤接待中得到鼓舞，看到奥地利有希望转到他们一边来而感到自慰。然而，从普鲁士却没有收到类似的令人快慰的消息。德国总的说来还是站在原先的立场上，而同盟国对于吸引德国参加有利于自己的任何事业不抱希望。毫无疑问，奥地利将会占领塞尔维亚和已经爆发反对苏丹的真正起义的门的内哥罗²¹⁵，然而正如我们早已说过的²¹⁶，这种占领仅仅是走向瓜分土耳其的又一步骤，实际上更加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它的敌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5 月 2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4 号

十九世纪英国士兵的绰号，滑铁卢战役后成为普通名词。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拉符上校战功卓著，威灵顿公爵就利用这个英雄的姓“Rough”的含义称他为“Rough and Ready”，直译是：“鲁莽的，但时刻准备行动的”。——编者注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卡 · 马克思 中央洪达²¹⁷

1808年9月26日（阿兰惠斯）—

1810年1月29日

应该预料到，在法军撤出马德里以后，拿破仑很快又会重新统帅更加强大的军队。因此，共同的防御措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感到：各省洪达的多头政治，应该让位给一个中央政府，因为拜兰会战²¹⁸获胜之后它们之间的争吵愈演愈烈。但是，唯恐丧失自己手中权力的各省洪达接受了塞维尔洪达²¹⁹的建议：由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政府，同时各省洪达保持对有关区域的内部管辖权。这样，由各省洪达的三十四名代表组成的中央洪达于1808年9月26日在阿兰惠斯召开会议，执政至1810年1月29日。中央洪达在征服者追击下从马德里逃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逃到加迪斯。当中央洪达从阿兰惠斯的王宫一再命令打仗的时候，法军已经占领了索莫山隘口；当它从塞维尔用有力的号召来宽慰人民的时候，摩勒纳山隘口已经失守了，苏尔特的军队已经拥进安达鲁西亚。

在中央洪达执政期间，西班牙军队被彻底消灭了，可耻的失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这个标题作了注：“（1809年1月，弗洛里达布朗卡）”。——编者注

败一个胜过一个，毁灭性的奥康尼亚会战（1809年11月19日）是西班牙人最后一次大会战，从此他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了。

当“陛下”——洪达为自己取了这样的尊称——从塞维尔逃跑的时候，加迪斯成了唯一的避难所，如果阿尔布凯克公爵不把他的军队调往加迪斯，而是按照中央洪达的命令开往哥多瓦，那么他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切断，加迪斯就会让给法国人，西班牙的整个中央政权就会完蛋。如果有什么地方例外，遇到了英勇的抵抗，那也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正规军，而是来自被包围的城市，如萨拉哥沙和赫罗纳。

西班牙争取独立战争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事实对评价中央洪达已经足够了。把法国军队从西班牙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是建立中央洪达的主要目的，然而它辉煌地葬送了这个任务。在革命时期的条件下，军队的成就比平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权的性质。为了游击战的功绩而放弃正规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全国中心在地方抵抗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全国政府的垮台应该如何解释呢？

中央洪达的组成本身根本不符合它面临的任務。要实现专制政权，它过于庞大了，过于复杂了，要想具有国民公会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中央洪达从各省洪达得到自己的权力这一情况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虚荣心、恶念和任性的妄自尊大。在中央洪达的成员中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开明的专制君主查理三世的八十高龄的大臣佛罗里达布朗卡和善良的改良家霍韦利亚诺斯，后者由于在选择手段方面过于拘泥而从来没有把事情干到底——当然是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解救国家的危亡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6页。——编者注

固有的虚弱感和人民心目中对它的权力的怀疑，使洪达经常处于恐惧状态，并且对它必须委以军事指挥重任的将军们持怀疑态度。中央洪达的成员莫尔拉将军预先把马德里弃让给拿破仑，而投到了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里。库埃斯塔首先拘捕了中央洪达中累翁的代表并准备制订恢复原先总督²²⁰的权力和皇家 *audiencias* 的复辟计划；后来，随着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的失败，他看来赢得了政府的信任。洪达不信任罗曼纳将军和拜兰战役的胜利者卡斯塔尼奥斯将军，令人信服的证明是他们二人对它的公开敌意，前者通过他 1809 年 10 月 4 日于塞维尔发表的告民众书中表现出来，另一人则通过对待它的态度并成为摄政府的成员表现出来。阿尔布凯克公爵这个大概在当时所有西班牙将军中唯一能够进行大战的人，看来主要是具有军事独裁者的一切危险的特性——这是撤销他一切重要指挥职务的十分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大胆地相信威灵顿公爵，他于 1809 年 9 月 1 日写信给他哥哥韦尔斯利侯爵说：

“我一观察中央洪达的行动，就开始担心，它把自己的力量与其说是用在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的任务上，不如说是用在政治阴谋和卑鄙的政治目的上。”²²¹

预感到军事家们有使命在国内动乱中起卓越的作用，这一点看来已使西班牙的第一个人民政府产生了虔敬的恐惧心。由于自己的组成情况而丧失一切真正革命力量的中央洪达，必然会求助于小阴谋，以便抵消自己的将军们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无法同人民暴动的压力相对抗，它常常迫使将军们在那些只有经过最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最高上诉法院。——编者注

慎重的长期防御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采取仓促的行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5 日
和 22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俄译文第一次部分发表于 1959 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的
科学情报通报》第 2 期

弗·恩格斯 巴拉克拉瓦²²²

英国消息

在激烈的战斗以后，起先是第一个多面堡，随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多面堡被迅速占领。后备队有第九十三团，在巴拉克拉瓦附近有舰队，还有将近 100.....。土耳其人在第九十三团的翼侧、在小山后面和在第二道筑垒线旁边构筑了工事。

参加战役的有剑桥 [公爵] 指挥的第一师和卡瑟克特指挥的第四师，还有占据紧靠卡瑟克特部阵地的骑兵师。

接着往左是一个法国师和

俄国消息²²³

中路纵队：列武茨基——前卫（ $4\frac{2}{3}$ 个营，16 门火炮）。谢米亚金——主力（9 个营，10 门火炮），从乔尔贡到卡德科伊。左路纵队——格里贝（ $\frac{1}{2}$ 个营，10 门火炮，8 个骑兵连，1 个哥萨克骑兵连），在科马雷方向（在较晚的时候得到枪骑兵混成团的支援）占领了村庄并构成左翼侧。

第一翼侧的组成如下：

(1) 雷若夫的骠骑兵旅，占据中间往右的阵地（14 个骑兵连，9 个哥萨克骑兵连，20 门

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

两个非洲猎骑兵团。俄国骑兵的袭击被第九十三苏格兰团和重骑兵旅击退。漂亮的攻击（南面的公路）。

俄军从他们占领的部分领土撤退。企图把火炮运出多面堡（[他们]一门也没有留下）。命令轻骑兵在卡瑟克特的支持下前进。俄军又重新展开战斗队形，沿正面和在两翼配置炮兵连。卡迪根的疯狂进攻被击退。

非洲猎骑兵从左翼进行进攻，解救了在右翼遭到俄国枪骑兵攻击的英军。

重骑兵没有转入进攻，而在右翼进行佯攻，并在炮火支援下使俄军占领的一个多面堡失去了作用。炮击声终于寂静下来。英军撤到第二道筑垒线，放弃了第一道筑垒线，虽然在某个时候被破坏的多面堡又重新被卡瑟克特指挥的土军占领。

火炮)。(2)扎博克里特斯基本人的部队（ $\frac{1}{3}$ 个营，2个骑兵连，2个哥萨克骑兵连，14门火炮）。

阿速夫团冲击第一个多面堡，早上六时半，敌人放弃第二个和第三个多面堡，立刻被乌克兰团占领。第四个多面堡被敖德萨团占领，但已被彻底破坏和放弃。

在三个坚守住的多面堡之间的阵地。

俄军骑兵对英军营垒的袭击被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翼侧炮火和重骑兵旅的进攻所打退。

扎博克里特斯基部队被调往右面的高地。

英军轻骑兵旅的进攻由于遭到[俄军]枪骑兵的两翼攻击而被击退。猛烈的霰弹和枪弹的射击。

英军轻骑兵旅得到非洲猎骑兵的解救，非洲猎骑兵自己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的一页手稿和会战平面图

是在弗拉基米尔团的 2 个营的刺刀面前退却下来的。

晚上的形势

德涅泊团的 1 个营在科马雷。

阿速夫团的 4 个营，守卫第一个多面堡的德涅泊团的 1 个营。守卫第二个和第三个多面堡的乌克兰团的 2 个营。

第一线的 8 个营，在同一阵地上的骑兵、炮兵和扎博克里特斯基部队。

下午四时，炮击停止。

一 . 从乔尔贡到卡德科伊的纵队：列武茨基少将

乌克兰团的 4 个营，16 门火炮

敖德萨团的 4 个营

$\frac{2}{3}$ 个步兵营

8 $\frac{2}{3}$ 个营，16 门火炮

阿速夫团的 4 个营

德涅泊团的 1 个营，10 门火炮

13 $\frac{2}{3}$ 个营，26 门火炮

乌克兰猎骑兵团

4 门重炮，6 门轻炮。对付卡德科伊附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多面堡。在它后面：谢米亚金少将，阿速夫团。

德涅泊步兵团的第四营。

4门重炮，6门轻炮。此外，还有敖德萨猎骑兵团和第六轻炮连的6门轻炮。

二．纵队：从乔尔贡到科马雷

德涅泊团的3个营
 $\frac{1}{2}$ 个哥萨克步兵营
10门火炮，8个骑兵连
1个哥萨克骑兵连
 $\frac{1}{2}$ 个营，10门火炮，
8个骑兵连，1个哥萨克骑兵连。

格里贝少将把哥萨克开往拜达尔盆地。
德涅泊步兵团第一、第二和第三营

4门重炮和6门轻炮，
枪骑兵混成团的1个骑兵连
顿河哥萨克第五十三团的1个哥萨克骑兵连

稍后从拜达尔派出枪骑兵混成团，以及哥萨克步兵（黑海的）和第六步兵营的一部分。

三．右翼：骑兵，雷若夫中将

14个骑兵连，20门火炮。
9个哥萨克骑兵连

第六骠骑兵团，
第十一和第十二骠骑兵团，
第一乌拉尔哥萨克团

第五十三顿河哥萨克团的 3 个
哥萨克骑兵连
12 个轻骑炮连
第三哥萨克重炮兵连。

四．最右翼：扎博克里特斯基少将

非洲猎骑兵在这里进行攻击。	弗拉基米尔团的
$\frac{1}{3}$ 个营，14 门火炮，2 个骑兵	3 个营
连，2 个哥萨克骑兵连	2 个连，6 苏兹达尔团的 个步兵营
	4 个营
	10 门重炮（ ）
	4 门轻炮（ ）
	魏玛大公的 2 个骠骑兵连，
	第六十哥萨克团（波波夫）的
	2 个哥萨克骑兵连。

投入战斗的总兵力

$\frac{1}{2}$ 个营	70 门火炮	24 个骑兵连	13 个哥萨克骑兵
600 [每个营的 人数]	8—22 [每门火 炮的人数]	80 [每连的人 数]	连
14700 名步兵 900 名炮兵 2600 名骑兵	900	1920	800 名哥萨克

1000 名哥萨克

19200 人

24 $\frac{1}{2}$ 个营

400

9800 名步兵

英军：第一师—8 个营= 3000 人；

第四师—8 个营= 3000 人；

骑兵师—10 个团—20 个骑兵连= 1200 人；

土军：约 8 个营，8 个营= 4000 人；

法军：第一师中的 6 个营= 3000 人；

12 个骑兵连 = 800 人；

[总计] 13000 [步兵] 2000 [骑兵] 和英国舰队。²²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原文是德文

11 月 13 日和 16 日之间

这是第二次计算出来的参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俄国步兵的总数。这一次恩格斯按每营 400 名步兵计算，而不是象第一次那样按 600 名步兵计算。——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²²⁵

1854年

- 9月14日 旧堡登陆。
- 9月20日 阿尔马河会战。
- 9月25日 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南区推进。
- 9月26日 攻占巴拉克拉瓦。
- 9月28日 封锁南区（当时在南区除水兵外只有8个营）。
- 10月1日 进行侦察和决定在强攻前进行炮击。
- 10月9—10日 [挖] 第一道平行壕，距要塞400—600俄丈。
- 10月17日 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在陆地上俄军的火力占优势，以200门重炮对付进攻者的126门炮），舰队同时射击。法军炮兵被迫停止射击。强攻的时间错过了。
- 10月25日 巴拉克拉瓦会战。
- 10月26日 俄军以9个营的兵力向英军阵地出击。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编者注

- 11月4日 俄军比联军的兵力占优势。进攻。
- 11月5日 因克尔芒会战²²⁶。英军的围攻作业现在几乎完全中止。只有阻援线在继续加强，以防止被解围军队突破。
- 12月11日 奥斯滕-萨肯任城防司令。出击日益频繁并日益顺利。
- [1855年]
- 1月初 英军在距要塞400俄丈处挖了第二道平行墙。出击继续进行。
- 1月27日 尼耶尔到来。法军对马拉霍夫冈的坚决强攻延期。英军让出了自己的一半堑壕——总共长一英里！
- 2月22—23日 色楞格多面堡²²⁷建成。23日对该堡的攻击被击退。距主墙1100码。
- 2月28日—3月1日 沃伦多面堡建成——距主墙1450码。
- 3月11—12日 堪察加眼镜堡我228——770码。这样在距要塞470俄丈处敌人被迫进行了转土对壕作业。
- 在这些工事前还筑有散兵战壕。
- 3月22—23日 对这些战壕的攻击被击退，这些战壕已被堑壕连成一个整体；第三棱堡前也是这样——距主墙430码处有采石场。
- 4月 为争夺第四至第六棱堡前200步处的俄军战壕展开战斗，

4月19—20日	英军攻击采石场
4月20—21日	被击退。
5月	联军的（法军和撒丁军）和佩利西埃的兵力增加。用新的兵力组织进攻。
5月23日	第五棱堡前为争夺反接近壕展开了战斗，俄军获胜。
6月7日	攻击堪察加眼镜堡、采石场、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
6月18日	第一次强攻，被击退。 ²²⁹
8月16日	黑河 ²³⁰ 。
9月8日	强攻。

弗·恩格斯起草于1855年9月
8日以后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第2版第11卷

卡·马克思 外交上的失礼²³¹

伦敦 10 月 2 日。英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公使亚历山大·马利特爵士在霍姆堡为庆祝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而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由于激烈攻击普鲁士国王及其内阁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英国公使在这次讲话中直接了当地声称，英吉利民族本来有权等待普鲁士采取另一种政策，况且普鲁士的多数人民从来没有隐瞒过他们对西方强国的同情。亚历山大爵士认为，如果普鲁士的态度有利于西方强国，那么奥地利接着就会坚决行动，而俄国面对普鲁士同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普鲁士对战争直接负有责任。由于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而亚历山大爵士是英国派驻该联邦的公使，所以人们认为这种攻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具有值得最严肃看待的后果。如果公使受到本国政府的袒护，那么这将是英国未来政策性质的征候；否则肯定他会被召回国。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0 月 2 日
载于 1855 年 10 月 5 日《新奥得报》
第 465 号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伦敦 10 月 6 日。为调查“外交活动”而建立的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²³²刚公布一项极有趣味的报告。我们现在摘引其中最重要的几段，不过我们事先要指出，在下面摘引的文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波特先生是不列颠贸易部的副大臣，作为《国家的进步》一书的作者在英国著作界享有一定的地位。

第一号。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认为：(1) 波特先生在墨尔本勋爵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的这一时期在贸易部任职，由于亲自观察和根据他所知道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他确信并发表了下述看法，即帕麦斯顿勋爵为讨好俄国在有关贸易条约的问题上一贯牺牲英国的利益；(2) 波特先生根本不向帕麦斯顿勋爵的同事、即他的上司贸易大臣 隐瞒这个看法；相反，1840 年当派他去巴黎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时，他在没有谈妥他无须给外交部打任何报告之前不同意接受这项使命。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相信，他签订这种条约的各种尝试，都会遭到上述部门首脑的叛卖性的破坏；(3) 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于是波特带着使命前往巴黎；(4) 波特在罗·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格莱斯顿手下供职时，始终坚持自己以前的看法，而且还指责帕麦斯顿勋爵得到俄国人的钱。波特断言这笔交易的中间人是个名叫杰科布·哈特的犹太人，这人从前在圣詹姆斯街开赌场，后来被帕麦斯顿勋爵任命为不列颠驻莱比锡的领事。波特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政府

为免去哈特的职务进行过调查；(5) 没有波特先生的证明，这个事实也是不容争辩的，凡是愿意的人都能证实杰科布·哈特确实开过赌场，帕麦斯顿勋爵委派他为驻莱比锡的领事，在那里大家都回避他，把他看作是名声有问题的人。下面委员会援引了它所搜集的证人的证词。

乔·克罗希等人

1855年9月20日于新堡

我们从这些证词中引了以下几段：

第二号。波特先生只是后来在罗·皮尔爵士的政府供职时才知道赌场的勾当。波特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个犹太人，即不列颠驻莱比锡的领事，被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看成是非常不体面的英国代表，特别是在查明他过去在圣詹姆斯街开赌场之后。曾试图免去他的职务，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到罗·皮尔爵士的政府面前。但是，他的政府碰上曾经委派哈特任此职务的帕麦斯顿的非常坚决而强烈的反对，致使政府让了步。帕麦斯顿信赖这样一个卑鄙人物的这一秘密，后来成为调查的对象，结果发现，帕麦斯顿勋爵曾一度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估计这是1825年），利文公爵夫人建议他到这个犹太人的赌场，在那里一个外国人一连两夜输给帕麦斯顿两万英镑。波特先生把这件事公开告诉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布莱特先生。

布莱登贝格人D·罗斯

1855年4月7日

第三号。哈特的任命是在帕麦斯顿打算退出内阁的时候，即1841年。哈特在莱比锡公开拿出帕麦斯顿的信，在各种人物面前炫耀自己，因为帕麦斯顿表示遗憾，说目前没有机会给他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

戴·乌尔卡尔特

1855年4月28日于沃特林

第四号。我说的话也许完全没有用处，而且我也不可能把我同波特的全部私人谈话重述一遍。我只谈一个情况。曾经同一个欧洲国家（那不勒斯）签订了一项重要条约，如果条约被批准，那么我们国家就能够通过友好途径在贸易上取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些了解并且反对在内阁里进行俄国人的活动的官方人士表示担心，只要对讨论、程序手续和先决条件找到任何借口，条约

就会告吹。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条约的条文搞得十分完善，而且只是在那不勒斯已经同意和签署之后才提交给内阁。在英国，人们对条约完全保持沉默。没有一家政府刊物被准许欢迎这一事件。外交部根本不理睬它。搞这一条约的人怂恿一位议员提出质问：是否已经取得那不勒斯对条约的同意。帕麦斯顿回答说，这完全是误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条约，只是有条约的一些初步草案。我记得，由于这位大臣的这番回答，波特当我的面打开公文柜，从中抽出一份文件交给我，并喊道：“这就是条约”。可能这个文件至今还放在原地方。同那不勒斯进行条约谈判的是议会的格拉斯哥的现任议员麦格雷哥里。更为惊奇的是波特谈到有一个贸易条约被牺牲。该条约是他本人同法国进行谈判的，条约的实现也被帕麦斯顿破坏了。

罗·蒙蒂思

1855年5月4日

第五号。我记得，听说委任一个犹太人或者说是一个落魄的犹太人米契尔（或者是与此相似的姓）担任官职。他是《晨邮报》的所有者之一，而且是该报的编辑之一。帕麦斯顿为他在圣彼得堡建了一个领事馆。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战争爆发，而且这个职位每年给他带来四、五千英镑的收入。在1847年普选后，当时忠于得比的非常保守的报纸《晨邮报》立即发表一篇关于内阁的文章，文章谈到帕麦斯顿，说乌尔卡尔特可以对他提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控诉。此后不久，米契尔接到委任。诚然，这时报纸的领导已转到别人手里，然而从这时起，在该报继续忠于得比和谷物法的整个时期，它攻击整个内阁而不触动帕麦斯顿；相反，它经常吹捧和支持他。在最近的十二个月中，这家报纸公然从保守党人营垒逃脱出来，不仅成了帕麦斯顿的报纸，而且成了政府的报纸。

查理·阿特伍德²³³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0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10月11日《新奥得报》

第475号

卡·马克思 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集会²³⁴

伦敦 11 月 13 日。昨晚在圣马丁堂举行了一次人数非常多的集会。邀请通知说，这次集会是“反对不久前发生的泽稷岛驱逐事件、反对正在准备的外侨管理法²³⁵和反对现在的军事政策的联合示威”。但是，为了保证在前两项上的统一行动，把最后一项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主持集会的爱德华·迈奥尔议员讲述了导致驱逐事件的概况之后，继续说道：

“这次集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既反对过去的外侨管理法，也反对未来的。为了政治流亡者的利益，我们要求避难权（呼声：“好！”）；我们提出这种要求，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政治流亡者（再喊：“好！”）。他们的悲惨命运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给他们以同情和保护（“好！”）。我们不问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因为我们不想知道他们在本国属于哪一个党派。在这方面，我们对公爵和平民不加任何区别（“好！”）。我们主张所有在这里上岸的人都有避难权。我们一向是公正的。我们一视同仁，向路易-拿破仑亲王伸出过援助的手，也保护过取名为约翰·斯密特的被人遗忘的国君（呼声：“好！”），笑声）。我们的法律还保护过奥尔良派、联合派²³⁶、保皇派和共和派，这不是由于他们逃出的那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政策，而是由于英国的法律。（“好！”）我们的民族十分好客，乐意热忱接待所有的人。在另外一些人中，我们尊敬地接待过象科苏特这样的人（暴风雨般的掌声）。《泰晤士报》不久前称他为

‘伟大的马扎尔人’，而且我们还使马志尼受到了他所请求的保护（热烈鼓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询问这些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和我们一致。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是政治原因的流亡者，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给以同情的充分理由。（“好！”）这就是我们为泽稷岛的流亡者力求做到的。（“听啊！”，“听啊！”）这就是我们为所有在这里上岸的人力求做到的，我们丝毫不想按照哪个人的要求放弃我们民族的好客精神。（长时间的高呼：“好！”）所以，应该让到这里来的所有人都享受不列颠的一切自由，而不是只受到监禁。（“听啊！”“听啊！”）对因政治原因而逃离祖国的人不需要任何登记；不需要任何警察的监视。（“听啊！”“听啊！”）我们不想把这些人的自由和我们自己本身的自由等等交到大臣或者王国的手里。”

在迈奥尔结束他那少不了对路易-拿破仑和奥地利进行尖锐攻击的、受到雷鸣般欢呼的、相当长的演说之后，华盛顿·威尔克斯先生宣读了下面这封科布顿的信：

“阁下 我很难过，因为我不能参加你们反对对维克多·雨果先生及其流亡难友们的暴行的示威。虽然，离城的路途遥远以及其他的事务不允许我出席集会，但是我衷心支持集会的组织者。那些象你们打算进行抗议的措施，一定会擦亮至少一部分曾经由于同情国外的自由主义而支持过战争（“啊！，啊！”）的公众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他们轻信了一些人的欺骗（“啊！，啊！”），那些人曾向他们煽动，说什么在我们当前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所参加的战争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嘘声，“好！”）请相信，从欧洲和平遭到破坏的那个时刻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有直接对立的倾向；如果他们把战争再强加给我们若干年，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抛向西德默思统治的苦难岁月的黑暗政治勾当。²³⁷（“不行，不行！” 嘘声，“好！”）

理·科布顿”

集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大会愤怒地抗议不久前从泽稷岛驱逐流亡者一事，并认为来到不列颠王国领土的外国人应立即取得英国人的天然权利和法律权利，在他们受刑事追究前有受公审和受陪审员审讯的权利。大会有责任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反对

那种会引起不安的企图，即企图通过议会的法令来取消或限制避难权，大会并号召全国都这样做。”

这次示威引起许多类似的活动。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在整个流亡者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舆论坚决转而反对政府，但同时我甚至认为，这出戏是政府的一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路易-拿破仑的第一批要求让步，其实正是为了向他表明，要英国任何一个政府作进一步让步是不可能的。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用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用他们威胁大陆。我确信，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流亡者可以比任何时候更用不着担心。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1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11 月 16 日《新奥得报》
第 537 号

卡 · 马克思
致《自由新闻》编辑²³⁸

阁下，我荣幸地附上一篇文章，您可能认为有必要让它同您的读者们见面。

您的忠实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4月26日

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4月26日
载于1856年5月3日《自由新闻》
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卡 · 马克思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²³⁹

卡·马克思撰写

原文是英文

部分发表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

(1856年6—8月)

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

8月—1857年4月)

卡·马克思

第一件 龙多先生致霍雷修·沃尔波尔²⁴⁰

“1736年8月17日于彼得堡

……我衷心希望……土耳其人能接受劝告而屈尊先行做出表示，因为这里的宫廷看来已打定主意，土耳其人不先走一步，它就不理睬任何声音，以此来羞辱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切场合极其轻蔑地谈论俄国人，这是女沙皇和她的现任大臣们所不能忍受的。奥斯特尔曼伯爵不但不感激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和卡尔库恩先生（前者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者是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转达土耳其人的善意，而且也不愿听从解劝而轻信土耳其政府抱有诚意，看来，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未奉英王和荷兰联省议会²⁴¹之命，也未受土耳其宰相之托居然就给他们（俄国内阁）写信，而且他们的信也未曾同皇帝 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协商过…… 我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王的那两封信给比朗伯爵和奥斯特尔曼伯爵看过，同时告诉这两位先生，由于这两封信中对这里的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我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比朗伯爵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被土耳其人这样对待了。我要求两位伯爵阁下不要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他们已经看过这两封信，因为这样做无补于事，只会使事态恶化……”

这封信讲的是1735年安娜女皇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驻圣彼得堡的这位英国外交官报告他在游说俄国同土耳其人媾和方面所作的努力。省略的词句是无关的。

指查理六世。——译者注

第二件 乔治·麦卡特尼爵士致 桑德威奇伯爵²⁴²

“1765年3月1日（12日）于圣彼得堡

绝密

……昨天帕宁先生 和副总理大臣 同丹麦大使奥斯滕先生签订了这里的宫廷与哥本哈根宫廷之间的同盟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把对土耳其的战争规定为履行盟约理由；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丹麦就必须给俄国每年五十万卢布的补助金，分季支付。此外，丹麦还根据一项最秘密的条款，答应与法国断绝一切联系，只要求一段宽限，以便设法索回法国宫廷欠它的债款余额。无论如何，它即将采用俄国对瑞典的全部观点，并且在瑞典王国内尽管不是公开地，但将完完全全地与俄国一致行动。不是我受骗了，就是格罗斯先生对阁下说俄国打算停止插手，而把瑞典这个包袱整个丢给英国时误解了给他的指令。不管这里的宫廷多么希望我们为每一项金钱义务支付大部份，然而我确信，到什么时候它也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它的计划、它的热烈希望，是与英国和丹麦协力合作来彻底消灭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不花费相当大的费用，这一点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俄国现在似乎并没有不通情理到期望由我们支付全部费用的地步。我已得到暗示，我们方面只要每年支付一千五百镑，就足以维持我们的利益，并绝对阻止法国人控制斯德哥尔摩。

英国当时在和俄国谈判一个通商条约。

帕宁是否领取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津贴，他这样做是背着叶卡特琳娜还是按照她的命令，这在历史学家当中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使外国宫廷与俄国使节合作，曾许可俄国使节在表面上与外国宫廷合作。至于帕宁，那么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我们相信还从来没有发表过的可靠文件决定的。这个文件证明，帕宁在一度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人之后，被迫冒着牺牲他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的危险继续保持这种身分。

指亚·米·哥利岑。——译者注

俄国驻伦敦公使。

瑞典人对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非常敏感，并且感到很受屈辱，他们对每一个干涉他们事务的强国都极其忌恨，对他们的邻居俄国人更是如此。这就是这里的宫廷给我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它希望我们和他们分别采取行动，同时在我们彼此的公使之间仍然保持推心置腹的信任；为什么它希望我们首先关心的事项不是成立一个叫作什么俄国派或英国派的派别，而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朋友赢得自由之友和独立之友的美名，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往往会被一个虚名所迷惑。目前我们享有优势，这个国家的人们已普遍相信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已招致很大的灾难，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还会非常严重地破坏他们的真正利益。帕宁先生决不希望瑞典宪法有丝毫改动。他希望王权能够保存而不扩大，人民的特权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²⁴³。然而他对王后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谲不无畏惧，不过奥斯特尔曼伯爵作为公使的高度警惕性现在已完全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担心。

由于与丹麦新缔结了联盟，由于这里的宫廷毫无疑问在瑞典取得了成就，帕宁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的。为了使这个计划臻于完善，唯一需要的就是与大不列颠缔结一个条约联盟。我确信，这是这里的宫廷最热切的希望。女皇对此已不止一次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她的野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抗衡家族盟约，并且尽可能挫败她特别憎恨的维也纳宫廷和凡尔赛宫廷的一切意图。然而，我不能向阁下隐瞒，我们要指望缔结任何这样的联盟，就必须以一项秘密条款同意在发生对土耳其的战争时支付一笔补助金，因为除了遇到那种性质的紧急情况外，他们不会向我们要钱。我自以为我已经说服这里的宫廷，期望在和平时期得到补助金是不合乎情理的，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对两个国家都更牢靠和更体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把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履行盟约理由写进条约正文或者列入秘密条款，将是我们同这里的宫廷举行任何谈判的必要条件。帕宁先生之所以对这点很固执，是由于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条约²⁴⁴正在讨论的时候，别斯图热夫伯爵

查理十二死后由参议院制订的寡头政治的宪法。

这样，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就告诉我们，通常所谓查塔姆勋爵的“北方联盟的大概念”，实际上就是帕宁的“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查塔姆不过是被骗去倡导这个俄国人的计划罢了。

指 1761 年 8 月在巴黎缔结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之间的盟约。

(他是普鲁士国王的死敌)建议加进关于土耳其的条款,他确信普鲁士国王决不会接受这一条款,满以为谈判会由于国王的拒绝而告破裂。但是这个老政客看来完全失算了,因为国王陛下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只是要求俄国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缔结联盟时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条件。情况确系如此,为了进一步肯定这一点,几天前,普鲁士公使佐尔姆斯伯爵拜访了我,对我说,他已接到训令,如果这里的宫廷有意和我们的宫廷缔结联盟而不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话,他要表示最强烈的反对。我得到了种种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在这一条款上不那么执拗的话,俄国在商务条约的出口税条款上就会不那么固执,格罗斯先生曾告诉过阁下,这里的宫廷是决不会放弃出口税条款的。同时,有一个受到帕宁先生极度信任的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着手缔结联盟条约,商务条约就会尽快地跟上;那时商务条约就会完全摆脱那个一向吹毛求疵和争吵不休的商务委员会,仅仅由大臣和我来解决,而且他确信,只要关于土耳其的条款被列入联盟条约,商务条约的缔结就会使我们满意。我还被告知,若是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可以雇用一万五千名俄国人去服役。我祈求阁下千万不要对格罗斯先生提到同丹麦缔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我担心,这位先生对英国不抱善意。”

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遁辞。关于弗里德里希如何被迫投入俄国联盟的怀抱,科克先生(法国的外交学教授,达来朗的老师)说得很明白。他说:“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伦敦政府抛弃之后,不能不投靠俄国。”(见他著的《欧洲革命史》)

霍雷修·沃尔波尔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的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无论如何,从上文可以看出,俄国在同英国交往中就是这样干的。桑德威奇伯爵,即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敢于写的上面这封信的受信人,十年以后,即1775年,在诺思政府中出任海军首席大臣,曾以激烈反对查塔姆勋爵关于公平解决美洲困难的动议而闻名。“他不能相信这(查塔姆的动议)是一个英国贵族的产物,在他看来这勿宁说是某个美洲人的作品。”1777年,我们发现桑德威奇又在咆哮:“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国库的最后一文钱,而决不让大不列颠被它的犯上作乱的臣民蔑视、欺侮和宰治。”当桑德威奇伯爵带头促使英国陷入同它的北美殖民地、同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战争时,我们看到他在议会经常受到福克斯、伯克、皮特等人的指控,说他使海军处于不能保卫国家的状态,说他明知道敌人已经集结大量军队,却有意派小量英国军队去对抗,说海军各部门事务的管理极其不当,等等(参看1778年3月11日,3月31日和1779年2月下院的辩论;福克斯对桑德威奇勋爵的不信任动议;1779年4月9日关于因桑德威奇勋爵玩忽职守而要求解除其职务的上国王书;1782

第三件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致 格兰瑟姆勋爵²⁴⁵

“1782年8月16日（27日）于彼得堡

（私人信件）

……我一到达这里，就发现这个宫廷的情况跟以前向我描述的很不一样。它对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偏爱，它完全是倾向法国的。普鲁士国王（当时深得女皇信任）正在施加影响反对我们。帕宁伯爵有力地支持了他。波旁王朝的两个公使拉西和科尔贝龙诡计多端，善耍阴谋；波将金公爵受了他们的蛊惑；而包围女皇的那一大群人——舒瓦洛夫们、斯特罗加诺夫们和切尔尼舍夫们²⁴⁶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伙巴黎的理发店学徒。形势有利于他们致力的事业。法国人装模作样地帮助俄国解决同土耳其政府的纠纷，紧接着这两个宫廷又一起成为帖欣和约²⁴⁷的调停人，这些对它们之间的和好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对于1778年2月1779年7月我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谈判毫无成果，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意图是防止而不是促进联盟。我们为争取联盟作出了各种让步，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制造新的困难，总是设置新的障碍。同时，我对他的明显信任也产生了很严重的恶果。他利用这种信任，在向女皇报告时转达的不是我使用过的语言和我实际表达过的感情，而是他满心希望我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和感情。他又同样悉心地向我隐瞒女皇的意见和感情。他在地面前把英国说成顽固、傲慢和冷淡，而在我面前则把

年2月7日福克斯弹劾1781年海军行政严重失职案）。皮特借此机会把“我们在海上所遭到的一切灾难和耻辱”都记在桑德威奇勋爵的帐上。在下院³⁸⁸票中，支持政府方面反对这一动议的票数只多22票。1782年2月22日，一个反对桑德威奇勋爵的类似动议在下院453票中仅以19票的多数被否决。然而，桑德威奇勋爵的施政确实使三十多名卓著功劳的军官离开了海军，或者声明不能在目前的制度下服役。事实上，在他的整个任职期间，海军中普遍存在的不和令人非常担心。此外，桑德威奇勋爵曾被公开指控侵吞公款，而且根据间接证据来看，他 also 的确犯了这样的罪行。（参看1778年3月31日，1779年4月9日及以后几次上院的辩论。）当1779年4月9日解除他职务的动议被否决时，三十九名上院议员提出了抗议。Z

女皇说成心情不快、讨厌我们并对我们在意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是那样确信他用这种两面谎报情况的办法已堵塞了一切成功的渠道,当我向他谈到那个西班牙声明²⁴⁸的时候,他甚至敢于俨然以大臣身分对我说:大不列颠是由于它自己的行动骄横傲慢才大难临头的;现在灾难已达到顶点;我们必须作出一切让步以求得和平;而且我们既不能指望得到朋友的援助,也不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宽容。我竭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感情用事……我当即找了波将金公爵,由于他的帮忙,女皇屈尊在彼得宫单独接见了。在这次会晤中,我非常幸运地不仅消除了她对我们的一切不良印象,而且通过如实阐述我们的处境以及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使她断然决定援助我们。这个决定她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我宣布的。当这件事透露出来的时候——而帕宁伯爵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他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散布谎言和最无耻地施加影响来破坏我的公开谈判,而且使用最卑鄙最恶毒的人所能想得出来的一切手段来贬损和伤害我个人。从他对我的那些无耻的指控来看,如果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就会担心受到他最无耻的袭击。这种残酷无情的迫害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比他的内阁任期延续得更久。尽管我从女皇本人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帕宁伯爵还是找到办法先是动摇,然后改变她的决定。他的确受到普鲁士国王陛下很热心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国王陛下极力要破坏我们的利益,正如他现在似乎热衷于要恢复它一样。然而,这头一次失望并没有使我灰心丧气,我加倍努力,在我出使期间又有两次使得女皇几乎(!)出面声明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我的期望都是建立在她亲口作的保证上的。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敌人策划武装中立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建议把米诺尔卡岛²⁴⁹送给她的时候。虽然在第一次,我从我以前遭到反对的同一来源遭到同样的反对,然而我必须说,我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我们对1780年2月那个著名的中立声明²⁵⁰的极其笨拙的答复方式。因为我非常清楚打击来自何方,我已作好避开它的准备。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英国觉得自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装作相信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是1780年武装中立的发起人,而只是拥护者。圣彼得堡宫廷总是使它自己的种种计划具有外国宫廷向它提出并迫使它接受的形式,这是它的重大策略之一。俄国外交喜欢这种张冠李戴。就这样,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宫廷被弄成了这次武装中立的负责发起人,从这个自命不凡的西班牙人写给查理三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一想到自己不仅策划了这次武装中立,而且诱使俄国支持了它,是感到多么自豪。

己强大得可以用开俄国，它就应该立即拒绝这些新出笼的教义；但是，如果它的处境还要求援助，它就应该服从当前的需要，在只是涉及俄国的限度内承认这些教义，用一个适时的善意行动为自己保证赢得一个强大的朋友。’

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提出来的是一个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答复；我们似乎对这些教义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同等地害怕。我得到的指示是，对它们秘密地进行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则表示默许。而且当时我们政府的一个机要人员在西莫林先生的谈话中使用了一些不谨慎的、与那位公使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听到的温和而诚挚的语言直接矛盾的说法，使女皇万分震怒，加剧了她对我们该届政府所抱的反感和不良印象。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些情况

就是这个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此人又名马姆兹伯里伯爵，读者也许更熟悉这个名字），被英国历史学家们吹捧为 1782—1783 年和平谈判中阻止英国放弃海上搜索权的人。

从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段落可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把诺思勋爵（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所说的该届政府就是指他的政府）看成是毫不妥协的人。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事实，任何这类误解都会消除：第一次瓜分波兰²⁵¹是在诺思勋爵执政时发生的，而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1773 年，当叶卡特琳娜对土耳其的战争还在进行，她同瑞典的冲突正日益恶化的时候，法国准备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波罗的海去。法国外交大臣戴居雍把这个计划通知了英国当时驻巴黎的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戴居雍详细论述了俄国的扩张野心以及应该促使法英两国联合对抗这种野心的共同利益。英国大使对这一亲密谈话的回答是：“如果法国派舰只去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将立即跟踪而至；两支舰队的存在，其效果不会超过中立；而且，无论英国宫廷如何愿意保持英法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由偶然冲突引起事端，是未可预卜的。”结果，戴居雍撤销了布勒斯特的分舰队，但是下了新的命令在土伦装备一支舰队。“英国内阁得到这种重新备战的消息之后，立即表示了强有力的反对；斯托蒙特勋爵受命发表声明说，用于波罗的海的每一个论点都同样适用于地中海。此外，还给法国外交大臣送了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把它呈交国王和枢密院。这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那支舰队撤销了，水兵解散了，扩大战争的危险避免了。”

我们上面引用的这几行文字的这位自鸣得意的作者说道：“诺思勋爵就这样成效卓著地帮助了他的同盟者（叶卡特琳娜二世），并且促成了俄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库楚克-凯纳吉）和约²⁵²。”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诺思勋爵好心帮助的报答，首先是撤销了她向他许诺的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的援助，其次是策划并领导了对英国的武装中立。诺思勋爵没有敢象詹姆斯·哈

…… 我提出了把米诺尔卡岛送给女皇的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在签订和约时会被迫作出牺牲，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向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向我们的敌人作出这种牺牲。

这个想法在国内被全盘接受了，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次从斯托

里斯爵士劝告他的那样来回报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即把大不列颠的海上权利放弃给俄国，并且只是放弃给俄国。这就刺激了女沙皇的神经系统；突然引起了她的歇斯底里幻想，说她对诺思勋爵“有不良印象”，有“反感”，感到“根深蒂固的厌恶”，“完全不信任”，等等。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为了给谢尔本政府提出一个例子以示警告，详细描绘了女沙皇感情的心理图以及诺思政府由于伤害这些感情而蒙受的耻辱。他的处方非常简单：任何别的强国若要向我们索取必定会被我们当作敌人看待的东西，对作为我们朋友的俄国，则应拱手相送。

可见，英国政府确实不满足于已使俄国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还千方百计要使它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看来，让渡米诺尔卡岛的建议在 1779 年底或 1780 年初，即在斯托蒙特勋爵进入诺思内阁之后不久就已经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提出了，——这个斯托蒙特勋爵就是那个曾阻挠法国抗拒俄国的人，甚至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也不能否认此人写了“完美地切合圣彼得堡宫廷的精神的指示”这一功绩。当诺思勋爵的内阁按照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建议提出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俄国人的时候，英国的下院议员和人民还在为担心汉诺威人（？）会从他们手中夺去“地中海的锁钥之一”而焦虑。1775 年 10 月 26 日，国王在议会的开幕词中曾告诉议会说，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被问到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封锁一直维持到那个“计划”实现的时候，他得到格莱安爵士的亲口回答是：“他们没有承担那种责任”，即执行他们的命令的责任！这里援引的公文，是除了日期较晚的一件公文以外唯一被宣读的文件。另一件公文据说是在 4 月 5 日发出的，其中“命令海军上将运用最广泛的权宜处置权力封锁俄国在黑海的港口”，这件公文既未被宣读，邓达斯海军上将的任何答复也未被提到。海军部派遣了汉诺威部队到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米诺尔卡岛）去，接替在那里驻防的英国部队中准备抽调到美洲去服役的团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强烈谴责“把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这样重要的要塞委托给外国人”。在极其激烈的辩论中，把直布罗陀和米诺尔卡岛这两个所谓“地中海的锁钥”委托给外国人的措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诺思勋爵承认自己是这一措施的参谋，感到不得不提出一个“免责任的议案”。不过，这些外国人，这些汉诺威人，是英国国王自己的臣民。在 1780 年实际上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了俄国之后，诺思勋爵当然感到有理由在 1781 年 11 月 22 日在下院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内阁大臣被法国收买的嘲讽”了。

蒙特勋爵那里接到的英明指示更加完美地切合这里的宫廷的精神了。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至今还不明白其究竟。在我得到全权处理此事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女皇对任何其他措施象对此事这样热心,而当我得到授权的时候,我发现她却从原来的意图退缩,我也是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吃惊。我当时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她对我们的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根本缺乏信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曾就此事征询过(奥地利)皇帝的意见,而后者不仅说服她拒绝这一建议,而且把这一秘密泄露给了法国,从而使它公之于世。我无法另外解释女皇感情上的这种迅速变化,特别是因为波将金公爵(不管他在别的事务上表现如何)肯定是真心诚意支持此事的,从我当时看到的和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他曾和我一样极其关心此事的成功。阁下,你会看到,促使女皇成为友好调解人的想法是和建议把米诺尔卡岛让给她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目前的调解中遭到种种困难,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证明不是我使我的宫廷处于如此难堪的地位。我当时希望和追求的是使女皇成为唯一的、别无副手的调解人。如果阁下细察她与我之间在1780年12月的来往情况,阁下就很容易理解我当时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设想女皇会成为一位友好的、甚至是偏袒我们的调解人。诚然,我知道她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但是我也同样知道她的虚荣心会因这一荣誉而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完全了解,她一旦插手进来,就会坚持下去,并且必然要卷入我们的争论,特别是当看来(当时看来也会这样)我们已用米诺尔卡岛酬谢她的话。另一个(奥地利的)帝国宫廷之被拉进调解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一个计划。这不仅给女皇提供

我们顺便指出,诺思勋爵——英国能够引以自豪的最卑鄙最胡闹的大臣之一——纯熟地掌握了使议院笑声不绝的艺术。桑德兰勋爵也是这样。现在帕麦斯顿勋爵也是这样。

诺思勋爵的政府1782年3月27日被罗金厄姆的政府接替之后,著名的福克斯就通过俄国大使的调解向荷兰提出了和平建议。那么,被这位统计女沙皇的感情、情绪和印象的卑贱记帐员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如此宣扬的俄国调解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当初步的和平条款已经同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时候,同荷兰却达不成任何这样的初步协议。从它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停止敌对行动而已。原来俄国调解如此有效,在1783年9月2日,即在同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缔结正式条约的前一天,荷兰同意了进行初步和谈,可是这不是俄国调解的结果,而是由于法国的影响。

了一个不恪守诺言的借口，而且使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和凌辱。她就是在这种印象下把这整个事情交给了我们为她提供的那位伙伴，并且命令她驻维也纳的公使绝对地赞同那里的宫廷所提出的一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以及我们现在所遭逢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此引起的。无论谁任何时候也不能使我相信，维也纳宫廷只要由考尼茨公爵发号施令，会对英国抱任何好意，或者对法国造成任何危害。我在这里努力加强它的影响，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是因为我发现普鲁士总是施加影响反对我；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给后者以沉重打击，我就会摆脱掉我最大的障碍。我错了，真是倒楣，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看来唯独在打算轮流损害我们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关于米诺尔卡岛的建议是我为了诱使女皇出面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已用尽了我的力量，使出了全副手段；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虽然是有礼貌的，但已使她感到不快。从那时起直到上届政府下台，我一直被迫处于劣势……现在我阻止女皇对我们做坏事比以前促使她为我们做好事要更困难。正是为了防止坏事，当女皇陛下初次提出由她单独在我们和荷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时，我才强烈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她对我们的拒绝所表示的极端不满，证实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这个建议第二次提出的时候，我毅然极力主张必须予以同意（虽然我知道这和我上司的感情有抵触），因为我坚信，如果我们再次拒绝，女皇在一怒之下会同荷兰人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明智的行动使得女皇原来对我们的不高兴转到了荷兰人身上，就象她以前偏袒他们的事业一样，她现在偏袒我们的事业。英国的新内阁成立以来，我的道路已变得更平坦了。你的前任

指约瑟夫二世。——译者注

维也纳和巴黎的宫廷阻挠英国内阁把米诺尔卡岛让给俄国的计划，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反对查塔姆勋爵的在俄国庇护下成立北方联盟的伟大计划，对英国没有造成丝毫损害。

前任是福克斯。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把英国各届政府按照它们受到他的全能女皇垂青的程度依次分了等级。尽管有斯托蒙特勋爵、桑德威奇伯爵、诺思勋爵和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本人，尽管有瓜分波兰、威胁戴居雍、促成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意欲让渡米诺尔卡岛，诺思勋爵的政府还是被贬黜到这架天梯的最底层。罗金厄姆的政府被置于比它高得多的地位，这届政府的灵魂是后来以勾结叶卡特琳娜而臭名昭著的福克斯。但是我们看到这天梯的最顶端是谢尔本的政府，它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威廉·皮特。至于谢尔本勋爵本人，

开创的、阁下继续遵循的这条伟大的新路,已在大陆上引起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变化。诚然,我相信,除了同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事件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促使女皇陛下积极参预;但是现在她对我们显示了强烈的友谊;她赞同我们的措施;她信任我们的这届政府;她无法克制她对我们民族所肯定怀有的偏爱。我们的敌人是知道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使他们深为恐惧。这是从我到彼得堡那天起到今天止对这个宫廷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略而准确的报告。从这当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支配女皇的是她的感情,而不是理智和论证;她的偏见很深,很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要取得她的好感,却没有可靠的途径,即使取得了,也会随时发生波动,易为微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在她没有完全参与一项计划以前,任何保证都不足依恃,但是她一旦完全参与了,就决不后退,就会坚持到底;她有很强的才能、崇高的思想、不平凡的智慧,然而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她的大臣们对国家的福利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对她的意志的消极顺从,或者是对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

四 (原稿) 关于沙皇保罗在位初期俄国情况的 报告, 作者是圣彼得堡海外商馆的牧师、 威廉·皮特的近亲耳·克·皮特牧师

摘 录

“已故的俄国女皇对过去几年中震撼了整个欧洲政治体制的那些重大问

伯克在下院高呼道:“如果他在道德上还没有成为卡提利纳或者博贾的话,那决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智力不足。”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忘记得出主要的结论,即他这个英国大使是俄国的代理人。

在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的信函若是前面带有“私人信件”这种象征性的标记,那就表示收阅该信函的大臣不应该把它转呈给国王。马洪勋爵在他的《英国史》中谈到这种情况。

收到这封信的那位先生在这份原稿前面写了这样几个字:“在我死后烧毁”。

题所抱的真实感情,是很难有什么可怀疑的。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些新原则的致命趋向,但是,如果她能看见所有欧洲强国都在一场愈激烈就愈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也许并不是不高兴²⁵³。完全可能,新取得的波兰各省的局势也是对叶卡特琳娜的政治行动有相当影响的一个因素²⁵⁴。看来,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正规政府的联盟各强国²⁵⁵,已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由于害怕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发生暴乱而产生的致命影响。害怕波兰会发生暴乱的心情分散了联盟各强国的注意力,并加速了它们的撤退,同样也使得这位已故俄国女皇不肯进入这个大战场,除非到了形势发展使得法军的进展变得比俄罗斯帝国因积极进军而可能招致的恶果更加危险的时候……人们知道女皇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临死前的那天早晨在打发走她的秘书时说的:“告诉公爵(祖博夫),十二点来看我,提醒我在同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上签字²⁵⁶。”

在对沙皇保罗的行动和荒诞行为²⁵⁷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皮特牧师先生继续写道:

“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才能对最近的退出同盟以及大不列颠政府所受到的无数凌辱的性质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把它(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几乎可以支撑住整个世界;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和重要性都受到根本的损害。英国有理由与俄国一起为它的王权运用得如此前后矛盾而感到遗憾,但是造成这两个帝国分离的只是俄国的君主。”

这位牧师先生以这样的话结束他这篇报告:

“就人们的预见目前所能洞察的程度来说,结束目前这种苦恼状况的办法,看来更可能的是某一个激怒的个人的绝望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使俄国皇位恢复其尊严和重要地位的更系统的措施。”

二

第一章中刊载的文件涉及女皇安娜在位时期到沙皇保罗在位初期,就是说包括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那个世纪的末尾,正如皮特牧师先生所说,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我们在细读这些文件时,有一种东西甚至比这些文件的内容更使我们吃惊,那就是它们的形式。所有这些信件都是“机密的”、“私人的”、“秘密的”、“绝密的”;然而尽管具有秘密、私人和机密的性质,英国政治家们在彼此间谈到俄国及其君主时用的却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这种语调即使出现在俄国政治家的公文中也会令人吃惊的。俄国外交官们借助秘密通信来掩盖对外国的阴谋,英国外交官们则采用这个方法来自由表达他们对一个外国宫廷的忠诚。俄国外交官们的秘密书函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气味。这一方面是圣西门公爵所说的那种伪善气,另一方面则是法国秘密警察报告所特有的那种卖弄自己的优越和狡诈。甚至波茨措-迪-博尔哥出色书函也带有这种下流文学的通病。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秘密书函要好得多。它不是装作高人一等,而是冒充天真糊涂。譬如,龙多先生告诉霍雷修·沃尔波尔,说他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国国王的两封信泄露给俄国大臣,但是他“同时告诉那两位先生,由于信中对俄国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

这样渴望看到的话,他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然后他又耍那两位伯爵阁下不要告诉土耳其政府说他们已经看过它们(那两封信),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乍一看,这种作法的无耻完全被这个人的天真糊涂淹没了。再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来说吧。他愉快地提到,俄国似乎足够“通情达理”,不致于为了俄国“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而期望由英国“支付全部费用”,他又“自以为”他“已经说服俄国宫廷”不要“不合乎情理”到在和平时期向英国索取与土耳其(当时是英国的盟国)作战时的补助金;他又警告桑德威奇伯爵对俄国驻伦敦大使“不要提到”俄国总理大臣在圣彼得堡对他本人提到的秘密,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再看,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极秘密地低声告诉格兰瑟姆勋爵说,叶卡特琳娜二世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又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

另一方面,再看看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如何厚颜无耻地告诉他的大臣,由于瑞典人对他们依附俄国的状况极其忌恨并且感到屈辱,圣彼得堡宫廷要求英国在斯德哥尔摩打着英国的自由独立的旗帜进行活动!此外,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英国把米诺尔卡岛 249 和海上搜索权、以及在世界事务中进行调解的垄断权让给俄国——不是为了取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或者哪怕是由俄国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而只是为了使女皇“显示强烈的友谊”和把她的“不高兴”转到法国身上。

看看这种假装天真糊涂的作法在更晚近时期的表现,在外交史上有什么能比得上帕麦斯顿勋爵在 1839 年向苏尔特元帅提出的建议呢?这个建议竟要求苏尔特元帅为了向苏丹提供英法舰队的支持来反对俄国,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轰击。

俄国的秘密书函都是循着这样一条很平淡的思路：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相反，英国书函从来不敢暗示说俄国与英国有共同利益，而只是设法说服英国，俄国的利益就是它的利益。英国的外交官们亲自告诉我们，这是他们与俄国君主们面面对时所维护的唯一观点。

如果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这些英国书函是写给私人朋友的，它们只是使写这些书函的大使们臭名远扬。既然它们是秘密地写给英国政府的，他们就把英国政府本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似乎已被人们，甚至被辉格党²⁵⁸的作家们本能地觉察到了，因为没有人敢于公布这些书函。

自然而然要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传统惯例的英国外交的亲俄性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时期，因此，它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打算通过重新刊印几本在彼得一世时期写的英国小册子来着手这个任务。这几本小册子不是没有引起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予以注意。然而，它们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通过英国的书函已经表明，在安娜女皇时期，英国已经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从我们即将重新刊印的几本小册子中还将看到，甚至在安娜时期以前，即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就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

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作家们的抨击。

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本小册子，叫作《北方危机》²⁵⁹。它在1716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是关于拟议中的丹麦、英国和俄国对斯科纳（肖楠）²⁶⁰的入侵。

1715年，在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之间缔结了一个北方联盟，其目的不是为了瓜分瑞典本土，而是为了瓜分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²⁶¹。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是瓜分波兰²⁶²的逻辑前提。西班牙瓜分条约²⁶³之所以引起后世的强烈兴趣，是因为它们是王位继承战争²⁶⁴的先声，而瓜分波兰吸引了更多的人们的注意，则是因为它的最后一幕是在当代的舞台上演出的。然而，不能否认，开创国际政治近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帝国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受俄国辖制的、由萨克森选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那个荒淫无耻的家伙所代表的波兰本身，被推到了这一阴谋的前台，从而自我签署了死刑判决书，甚至连波利菲米斯给奥德赛保留的那个留到最后吃的特权²⁶⁵也没有享受到。查理十二在本德雷自愿流亡时²⁶⁶发出的那篇声讨奥古斯特国王和沙皇的檄文曾预言了波兰的命运。这篇檄文署的日期是1711年1月28日。

参加这一瓜分条约，把英国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从“光荣革命”²⁶⁷的时候起，英国就越来越被引向这一轨道了。乔治一世作为英国国王通过1700年的条约曾与瑞典结成防御同盟。不仅作为英国国王，而且作为汉诺威选侯，他曾是特拉温达尔条约²⁶⁸（那个

条约为瑞典保证了这次瓜分条约所要剥夺的东西)的保证人之一,甚至是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不仅如此,他所以享有德意志帝国选侯的尊荣,部分地也归功于特拉温达尔条约。可是,他却以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向瑞典宣了战,并且以英国国王的身分进行了这一战争。

1715年,同盟国夺去了瑞典的德意志省份,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把俄国人引到了德国土地上。1716年,他们一致同意入侵瑞典本土,企图对瑞典最南端现在称作马尔默和克里斯蒂安施塔特地区的肖楠进行武装袭击。因此,俄国的彼得从德国带去了一支俄国军队,这支军队分散在西兰岛上,打算在以保护通商航海为名派到波罗的海去的英国和荷兰军舰的护送下从这里运往肖楠。早在1715年,当查理十二被围困在施特腊尔宗德²⁶⁹的时候,有八艘由英国借给汉诺威,又由汉诺威借给丹麦的英国军舰公开增援了丹麦海军,甚至挂起了丹麦国旗。1716年,英国海军由沙皇陛下亲自指挥。

为入侵肖楠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困难。虽然条约规定只派出三万俄国人,彼得却慷慨地在西兰岛登陆了四万人。但是到了要派他们去肖楠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表示在这四万人中他只能拿出一万五千人。这一声明不仅使同盟国的军事计划陷于瘫痪,而且看来对丹麦及其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为以俄国舰队为后盾的俄国军队大部分驻在哥本哈根。弗雷德里克的一位将军建议用丹麦骑兵对俄国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把他们消灭,同时由英国军舰去击毁俄国舰队。弗雷德里克四世不喜欢任何需要某种巨大魄力、某种坚强性格和某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背信行为,他拒绝了这个大胆的建议,而

只限于采取守势。他当时写了一封恳求信给沙皇，说明他已放弃了关于肖楠的幻想，并且请求沙皇也如此照办，动身回国。对这个请求，沙皇只能迁就。当彼得终于班师离开丹麦的时候，丹麦宫廷认为应该就破坏这次袭击肖楠计划的事件和交涉情况给欧洲各国宫廷一个公开的说明。这个文件就是《北方危机》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在注明 1717 年 1 月 23 日从伦敦发出的尤伦堡伯爵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中有几段话，在这几段话中，写信人，即当时瑞典驻圣詹姆斯宫²⁷⁰的大使，似乎承认自己是《北方危机》的作者，不过他并没有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然而，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真正出自这位伯爵手笔的作品，譬如他写给格尔茨的信件，就会打消认为他写过这样一本出色的小册子的任何想法了。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 1716 年 10 月 10 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 年伦敦版。

1. 序——……这（这个小册子）不是为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写的，但是真正对国际法感兴趣的人大有一读之必要；交易所街²⁷¹搞股票投机的轻浮伙计们在读了这篇前言之后再要往下看，将只是浪费时间，但是英国的每一个商人（特别是那些去波罗的海经商的商人）会从这里得到教益。荷兰人（正如报童和邮差已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的）竭尽全力要在几项与沙皇的贸易协定中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长时期来收效甚微。就他们非常节俭这一点来说，他们能给我们的商人提供很好的榜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设法取得一个更好的、更利于前进的出发点方面有一次能够超过他们，那么，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就让我们这一次给他们作榜样，就让他们这一次向我们学习吧。至于目前我们在波罗的海贸易方面怎么能取得这样一个出发点，这篇小小的论文将指出一条极其简单的途径。我不喜欢任何渺小的咖啡馆政客进来插嘴，我甚至宁愿让他对我感到厌烦。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根本不愿和他打交道。相反，那些熟悉国家学说的人会在这里看到很值得运用他们全部思辨能力的材料，这

些材料以前总是被他们忽略了,被他们(过于轻率地)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东西。任何一个狂热的党派人物都不会认为这篇东西完全合他的意;但是每一个诚实的辉格党人和每一个诚实的托利党人都能读它,不仅谁都不会感到厌烦,而且都会感到满意……总之,这篇东西既不是为疯狂的、唬人的、属于长老会²⁷²的辉格党人,也不是为狂妄的、暴躁的、不满的、属于詹姆斯党²⁷³的托利党人而写的。”

2. 冯·施托肯先生提出的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

“毫无疑问,大多数宫廷会感到吃惊:尽管为袭击肖楠进行了大量准备,这一袭击并没有付诸实行;尽管沙皇陛下驻在德国的全部军队冒着极大困难和危险,部分用他自己的船只,部分用丹麦国王陛下及其他盟国的船只运到了西兰岛,这一袭击却被推迟到另外的时候。因此,丹麦国王陛下为了避免指控和责难,认为应当命令把下述关于这一事件真象的说明通知所有不存偏见的人们。在瑞典人被完全驱逐出他们的德国领地之后,按照全部政治规律和战争逻辑,唯一的办法是在瑞典本土腹地对这位仍然执拗不屈的瑞典国王进行有力攻击,从而借上帝之助迫使他接受一项对盟国有利的持久和约。丹麦国王和沙皇陛下双方都有这样的看法,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良好的意图,同意举行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终于(尽管由于挪威遭到入侵,丹麦国王陛下很有必要留在本国首都,尽管俄国的大使多尔哥鲁基先生提出完全不同的保证)在汉堡附近的哈姆—霍恩,在丹麦国王陛下在此等候沙皇六个星期之后举行了。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陛下经过几次讨论,于6月3日决定对肖楠的袭击一定要在这一年进行,并且对促其实现的一切措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之后,丹麦国王陛下匆忙回国,下令日夜奋战,务使他的舰队尽早作好出海作战的准备。运输船只也从各处的领地调来,既耗费了难以形容的巨额开支,对他臣民的贸易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就这样,国王陛下(沙皇本人在抵达哥本哈根时也承认)尽了最大努力来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和促进这次袭击,因为一切都有赖于这次袭击的成功。然而,在此期间,在哈姆—霍恩的会谈就这次袭击达成协议以前,丹麦国王陛下曾不得不从他的舰队中派去一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相当大的分舰队去援救他那遭到入侵和沉重压迫的挪威王国,这支分舰队在敌人离开那个王国以前不能召回,否则会给那个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危险;所以,出于这种必要,这位海军中将不得不

停留在那里,直到7月12日丹麦国王陛下向他发出紧急命令,要他在风势和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返回;但是由于刮了一段时间逆风,他被阻住了……瑞典人一直控制着海面,沙皇陛下本人认为,在这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分舰队回来以前,派丹麦舰队的剩余部分和当时停在哥本哈根的军舰一起去罗斯托克为俄国部队护航,不是可取的做法。这支分舰队终于在八月份回来后,联合舰队便启航了。往西兰岛运输上述部队的工作,尽管有大量困难和危险,也开始进行了。但是这花费了过多时间,在九月以前未能完成袭击的部署。现在,袭击的一切准备和载运军队的工作均告完成,丹麦国王陛下曾确信在几天之内,至迟在9月21日以前应该开始袭击。俄国的将军和使节们先是向丹麦同僚提出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在9月17日一次约定的会议上宣布,沙皇陛下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认为在肖楠不可能得到粮草,因此在这一年进行袭击是不可取的,应该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可想而知,丹麦国王陛下对此是如何的惊讶,特别是由于沙皇如果对这个如此庄严协商过的计划改变了主意,他满可以早点宣布,这样就可以为丹麦国王陛下省下好几吨耗费在这些必要准备工作上的黄金。尽管如此,丹麦国王陛下仍在9月20日向沙皇写信详细解释说,虽然季节已经错过许久,但是有这样优势的兵力,进行袭击一定能成功地在肖楠取得立足点,他确信肖楠这年年成很好,毫无疑问能在那里取得供应;此外,那里和他本国有直接的交通联系,粮草也很容易从国内运去。丹麦国王陛下还列举了几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袭击应该在这一年进行,而在第二年春天进行的想法应该完全抛弃。不只是丹麦国王陛下向沙皇提出这种中肯的劝告;英国国王陛下驻这里的公使以及诺里斯海军上将也很坚决地支持他;他们按照自己国王陛下的紧急命令,想方设法说服沙皇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促使他仍然进行这一袭击。但是沙皇陛下在他的答复中宣布,他要坚持他业已做出的关于推迟这一袭击的决定;然而如果丹麦国王陛下决心仍然要冒险进行的话,根据在施特腊耳宗德附近签订的条约,他将只给他提供规定的十五个营和一千匹马;到第二年春天他才会应允其余的一切,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再作更多的说明。这样,丹麦国王陛下凭他自己的军队和上述的十五个营单独去干这样大的事情,自不免冒极大的风险,他在9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希望沙皇陛下能给他增派十三个营,这样的话,他还打算在这一年进行袭击;但是即使这一点也未能从沙皇陛下那里得到同意,沙皇陛下在同月24日通过他的大使断然拒绝了这

个要求。于是，丹麦国王陛下在他 26 日的信中向沙皇声明，既然情况如此，他不再需要沙皇陛下的任何军队，他们应该尽快地从他的领地上全部撤走；这样，每月要花费他四万帝国塔勒²⁷⁴的运输船只就可以解雇，他的臣民至今负担的沉重不堪的军税就可以免除。对此沙皇不能不表示同意；因此，全部俄国军队都已经登船，肯定一有顺风就离开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沙皇作出一个对北方联盟²⁶¹如此有害而对共同敌人极其有利的决定，只有留待上帝和时间去澄清了。²⁷⁵

如果我们要对大人物进行真实的考察，在我们知识界的心目中对他们有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性格，其次是他们的目的。不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如何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是如何曲折隐讳、捉摸不定，我们用这个考察方法，就能洞察他们心灵的奥秘，就能从最令人困惑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并且最后找到最巧妙的办法来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主要隐私，破解他们的核心秘密……沙皇……按性格来说，是一个极富于进取心，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人物。至于他的目的，只要世上有任何狡猾伎俩能使他在未来可以扩大帝国和积累财富，他的任意主宰自己臣民的财产和人格的统治方式，就会促使他不断提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获取这二者的计划。无论不知足的财富欲和无止境的权势欲会提出什么样的目的，促使他去满足那得寸进尺、囊括一切的欲望，他毫无疑问必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三个：

1. 他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些目的？
2. 在离他多远处，并且在什么地方能最好地达到这些目的？
3. 在什么时候，运用一切适当方法并且运用成功，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沙皇的领地大得惊人；人民对他全都俯首听命，全都是他的不折不扣的奴隶，而全国的财富都由他任意支配。但是，国土虽大，物产却并不丰富。每个臣民都有一支枪，一听召唤就来当兵；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口令。虽然沙皇能支配他们的全部财富，但是他们没有重要的商业，很少有现钱；因此，他尽其所能进行了聚敛以后，他的国库还是空空如也。他要满足那两种天生欲望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他既没有钱维持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这个君主表明他具备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君所必备的雄才大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他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聪明，或者更适宜于执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

他本人最合适到世界其他地区去旅行，学习治国才能来推进他统治的领域。他当时对那些深谙军事科学的人很少装出好战的样子；他的军事行动大部分是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虽然和他一样有许多战士，但是也和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场上既无经验，又无纪律。在这一点上，他的基督教邻居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种阻挡异教徒的屏障或堡垒。但是当他来窥伺基督教世界较为文雅的地方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不愿以过早地在战场上碰运气、冒风险，来学习比赛；不，他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在当时对他有利和必需的，是象参孙那样斗智，而不是斗力。²⁷⁶他知道，他当时只有很少几个适于通商的地方，而且都是位于白海沿岸，太遥远，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封着，完全不适合于舰队使用。但是他知道他的邻国在波罗的海有许多更合适的地方，只要他强大起来，伸手便能拿到它们。他对它们垂涎三尺，但是在外表上却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别的方面，为他将在适当时机夺得它们而暗自高兴。为了免遭猜忌，他努力不要他的邻国帮助他训练部队。因为那好象是想同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比武，先求他教自己如何劈刺似的。他跑到了大不列颠，他知道这个强大的王国对他力量的增长当时还不会产生猜忌，对他国土之辽阔还毫不在意，漫不经心，我担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他出席我们的一切军事演习，考察我们的一切法律，研究我们军事、民政和宗教方面的情况；然而这是他当时需要最少的东西；这是他这次使命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随着他和我国人民日益熟悉，他开始去参观我们的船坞，装作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而只是为了娱悦耳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想看看我们的造船方式。人们可以说，他把宫廷设到了我们的造船厂里，他是那样勤勉，御驾经常亲临现场。还应指出，这位伟大的沙皇往往事必躬亲，因而能够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巧工匠一样使用斧头，这为他增添了酷爱艺术和工艺的不朽盛誉。此外，这位君主还有一个很好的数学头脑，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很内行的皇家造船师。为了让他开心，造一两艘船给他送去，然后再送两三艘，然后又再送两三艘，只要这是由能够随意控制海洋的海上强国 许可卖给他的，这样做似乎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会是无关大局、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博得了我们许多优秀工人的好感，以他平易近人、和蔼可

指英国和荷兰。——译者注

亲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为了利用这一点谋取好处，给许多人提供了巨额的奖金和特权，让他们到他的国家去定居，他们都高兴地应许了。稍后，他又派一些代表他个人的使臣和官员去谈判要更多的工人、行政官员以及精选的好水手，只要他们到那里去，都能升官。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上的任何熟练水手，若是有一丝毫虚荣心，有任何想当官的欲望，只要他投身沙皇的海军，马上就会成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君主甚至找到办法强制我们商船上的熟练水手为他服务，而且他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同时给船长提供同样数目未经训练的俄国人来补缺，而船长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后不得不把这些人训练得能够顶用。然而还不止于此，在上次战争中，他曾让成百上千他的臣民（既有贵族，也有一般水手）呆在我国、法国的和荷兰的舰队里；他一直让他的许多臣民呆在我国和荷兰的船坞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但是，他看到，当他没有一个可供建造他自己的舰队、自行出口本国物产和进口别国物产的海港的时候，他为改善他自己和他的臣民的地位而作的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他还发现，瑞典国王拥有最方便的海港，我指的是纳尔瓦和列维里²⁷⁷，他知道这位国王永远不能够也不愿意友好地放弃这些海港；因此，他终于决心用武力把它们从他手中夺过来。瑞典国王陛下年纪幼小，似乎是成就此番事业的最适当的时机，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独自一人去冒险。他拉着别的君主和他一起去分赃。而丹麦和波兰的国王很软弱，足以成为沙皇推行他的宏大野心计划服务的工具。诚然，他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全部军队在纳尔瓦被为数不多的瑞典人完全击败了。但是他非常走运，瑞典国王陛下并没有利用这么辉煌的胜利来收拾他，而是立即把矛头转向了使他很生气的波兰国王，瑞典国王之所以对波兰国王特别生气，是因为他曾把那位国王当作他的心腹朋友之一，正要与他结成最紧密的同盟时，他却出其不意地侵入了瑞典的利沃尼亚²⁷⁸，并且围困了里加。瑞典国王的这一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正中沙皇下怀。他预见到，波兰的战事拖得越久，他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去弥补最初的损失和夺取纳尔瓦，他于是设法使它尽可能久地拖下去。为此，他从来不给波兰国王派去足以胜过瑞典国王的援军；另一方面，瑞典国王虽然连战连捷，但是只要他的敌人从自己的世袭国土²⁷⁹不断得到增援，他就永远不能使之屈服。要不是瑞典国王陛下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直接进军萨克森本土，从而迫使波兰国王缔结和

约²⁸⁰的话，沙皇本来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他的计划考虑得更加成熟的。这一和约是沙皇从来最感失望的事情之一，因为从这以后他就是孤军作战了。不过，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已事先夺得了纳尔瓦，并且为他心爱的城市彼得堡以及那里的海港、船坞和庞大的军火库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现在已达到如何完善的地步，让那些带着惊异的眼光看见过它们的人们去述说吧。

他（彼得）竭尽全力来达成某种谅解。他提出于对方很有利的条件；他只要保留彼得堡，佯言这是蕞尔小邑，但他非常心爱；甚至对此他也愿意以另外的方式予以补偿。但是瑞典国王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决不愿把它留在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手中，从而给他提供一个进入波罗的海的口岸。这是自从纳尔瓦失败以来这位沙皇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的唯一的一次自卫。要是瑞典国王取捷径向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进军，而不是（到底是听谁劝说，至今还是一个谜）转往乌克兰，那么沙皇军队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在乌克兰，瑞典国王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波尔塔瓦被彻底打败。这对惯于打胜仗的瑞典人肯定是致命的时刻，而俄国人如何感到如释重负，可以从沙皇每年隆重地庆祝这一节日推测出来，沙皇的野心从此变得更加膨胀了。他现在要求得到利沃尼亚的全部、爱斯兰²⁸¹、以及芬兰绝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他虽然暂且屈尊与瑞典的剩余部分缔结和约，但是他知道只要他高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也拿过来。他在实现这些计划时需要担心的唯一障碍是他的几个北方邻国；但是由于海上强国、甚至毗邻的德国诸侯当时都在专心致志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²⁶⁴，对北方战争²⁶¹似乎完全置若罔闻，所以需要戒备的只剩下了丹麦和波兰。这两个王国中的前一个，自从不朽的威廉国王迫使它与霍尔施坦，从而与瑞典缔结和约²⁶⁸以来，一直太平无事。在这期间，它由于自由贸易和海上强国给它的大量补贴而变得很富。它如果根据自己的利益与瑞典站到一起，就能够阻止沙皇的进展，及时地防止这些进展对它造成的危险。另一个王国，我指的是波兰，现在在斯塔尼斯拉夫国王的统治下很平静，这位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依仗瑞典国王才得到他的王位的，他出于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出于对本国利益的真正关心，不能不对邻居野心过大的计划表示反对。但是沙皇狡猾透顶，不会找不到对付这一切的办法：他向丹麦国王描述，瑞典国王现在被弄得如何狼狈，趁这位君主长期不在国内的时候，完全剪掉他的羽翼，牺牲他来壮大自己，机会多么难得。对奥古斯特国王，他则激起他长期埋在心头的失去波兰王位的怨恨，告诉他现

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恢复这个王位。就这样，这两个君主都被他立即争取过来了。丹麦人连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都没有就向瑞典宣了战，并且袭击了肖楠，但被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特国王重新回到了波兰，此后那里的一切一直是混乱不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人的阴谋活动。诚然，沙皇只是拉来推进他的野心计划的这两个新盟友，起初对他自身的防御变得比他想象的更加必要，因为在土耳其人对他宣战之后，他们阻止了瑞典军队同土耳其人一起向他进攻，但是由于沙皇的明智和土耳其宰相的贪婪和愚蠢，这场风暴很快就结束了²⁸²。于是他就象原先打算的那样来利用他的这两个朋友，用利欲引诱他们加入了他的同盟，这只是为了把战争的全部负担和风险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与瑞典人一起被彻底削弱，以便他准备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吞噬掉。他让他们去进行一次又一次困难的战斗，他们的军队由于进行战斗和长期围困而大大削弱，而他自己的军队则不是被用于较容易的、对他较有利的征伐，就是靠一些中立君主大量出钱维持在距战斗相当近的、能不放一枪而赶去分享战利品的地方。他在海上的行为也很狡猾，他的舰队总是避开危险，只要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一有发生战斗的迹象，它就躲得老远。他希望这两个国家互相摧毁对方的舰队之后，他的舰队能在波罗的海称霸。在这整个期间，他都竭力使他的士兵们以外国人为榜样并且在外国人的指挥下改进战术……他的舰队很快就会超过瑞典舰队和丹麦舰队加在一起的总和。他不必担心它们会阻碍他最终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事业。如果他这项事业成功了，就该我们当心自己了；沙皇肯定无疑将成为我们的敌手，他现在越被忽视，对我们将越危险。我们那时可能（不过也许为时太晚了）回想起我们自己的使节们和商人们就他的计划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他要独揽全部北方贸易，他正在把几条河流连接起来，使里海或黑海到他的彼得堡之间可以通航，以便把同土耳其和波斯的贸易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那时将对自己的盲目性感到吃惊：我们已听说他在彼得堡和列维里构筑了大量工事而竟没有猜到他的计划。关于这后一个地方，11月23日的《每日新闻》曾这样报道：

海牙11月17日讯。到过列维里的荷兰军舰的舰长们说，沙皇已经把那个港口和那里的防御工事建造得堪称为波罗的海甚至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

现在且放下他在海上的事情、他的贸易和制造业以及他在政治和军事两

方面的其他事情,来看看他在这最近一次战役中,特别是在我们已谈得很多的他和盟国一起打算对肖楠进行的那次袭击中的行动,我们会发现甚至在这里他也是以其惯常的狡猾行事的。毫无疑问,是丹麦国王首先建议进行那次袭击的。他认为,只有迅速结束他这么匆忙和不义地发动的这场战争,才能拯救他的国家,使他不致遭到毁灭,不致遭到瑞典国王或是对挪威或是对西兰岛和哥本哈根的大胆入侵。同那个国王单独谈判的事他不能做,因为他预见到那个国王不会给这么卑鄙的一个敌人割让一寸土地;而对于全面的和会,即使瑞典国王同意按照他的几个敌人提出的条件召开,他也担心会拖延时日而对他的处境所不许可。所以,他就邀请他的所有盟友对瑞典本土进行袭击,来给瑞典国王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他们会投入优势兵力把瑞典国王打败,然后他们就能迫使他按照他们满意的条件立即媾和。我不知道他的其他盟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普鲁士宫廷也好,汉诺威宫廷也好,都没有公开同意,我们的英国舰队在约翰·诺里斯爵士指挥下对它如何支持,我不好说,人们可以从丹麦国王自己的声明中作出判断。但是沙皇欣然同意了 this 计划。这样一来,他又得到一个借口可以靠别国人民出钱把战争再延长一个战役,可以把他的军队重新开进德意志帝国,先驻扎在梅克伦堡²⁸³,然后驻扎在西兰岛。同时他还觊觎维斯马²⁸⁴和瑞典一个叫作哥特兰的岛屿。要是能用奇袭的办法把头一个地方从盟友手中拿过来,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海港,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把军队运到德国去,而无须向普鲁士国王请求过境许可。要是能通过突然袭击把瑞典人从第二个地方赶走,他就会成为波罗的海最好的港口的主人。然而这两个计划都落空了;因为维斯马防守很坚固,不可能用奇袭取得;而要攻取哥特兰,他又发现他的盟友们不会助他一臂之力。在这之后,他就对袭击肖楠的计划有了另一种看法。他发现,它无论成功与否,都同样违反他的利益。如果他成功了,从而使瑞典国王被迫缔结全面和约,他知道他的利益在这当中几乎不会受到照顾,因为他已充分注意到,他的盟友们只要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就准备牺牲他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成功,那么由于他完全预见到英国舰队会阻止瑞典国王做出任何危害丹麦的事情,他有理由担心,除了会损失他那么精心培植和训练起来的军队的精华之外,整个打击还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会被迫交出他过去从瑞典得到的一切。这些考虑使他最终决定不参加任何袭击;但是不到最后时刻他尽可能不宣布这一点:首先是为了他可以更长时间地靠丹麦出钱维

持他的军队；其次是为了使丹麦国王来不及向他的其他盟友要求派出必需的军队，撇开他去进行这次袭击；最后是为了他可以使丹麦人因花费大量金钱去进行必要的准备而更加削弱，使丹麦人现在就更加依附于他，以后更容易成为他的鹵获物。

于是，他非常用心地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一直到预定要进行这次袭击的时候，才突然拒绝参加，并提出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声称到那时他一定践约。但是，正如我们一些报纸指出的，要注意他的话附有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即除非他能从瑞典得到一个有利的和约。这一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得到的关于他和瑞典国王单独谈判和约的公开报道，是表明他诡计多端的新例证。他的弓有两根弦，总有一根合用。毫无疑问，沙皇知道在他和瑞典国王之间必定很难达成谅解。因为正象他决不会同意放弃那些他为之发动这场战争，并且对实现他的宏伟计划是绝对必需的海港一样，瑞典国王只要能阻止交出这些海港，也会认为把它们交出将直接违反他的利益。不仅如此，而且沙皇对瑞典国王陛下的豪迈和英勇气概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他对后者会着眼于利害关系而不着眼于荣誉感就宣告降伏这一点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认为，瑞典国王陛下对他一定不会象对某些盟友那样恼怒——这一点他判断对了，因为他虽然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但他常常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在战争中总是有胜有负；而那些盟友却利用瑞典国王陛下遭逢不幸的时机，卑鄙地扑向他并缔结了瓜分他的省份的条约。沙皇为了更迎合他的伟大敌人的禀性，不是象他的盟友们那样抓住一切机会百般责难他，甚至是用极不相当的方式责难他（如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和虚张声势的声明），而总是用极其谦恭的态度谈到这位他所称呼的查理兄弟，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将军，甚至公开扬言，对他的一句话比对自己盟友们的最庄重的保证、誓言、甚至条约，还要更加信任。这种谦恭有礼的表示也许能对瑞典国王的高尚心灵产生较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宁愿向一个豁达大度的敌人牺牲真正的利益，而不愿在一些不大重要的事情上给那些曾恶劣地、甚至非人道地对待过他的对手以满足。但是，即使这点做不到，沙皇还是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以这些单独谈判使得他的盟友们心神不安，正如我们在报上看到的，使得他们更迫切要求他保持同他们的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将使他们作出极其巨大的让步和承诺。同时，他让丹麦人和瑞典人继续死死地纠缠在战争中，使他们尽可能快地相互削弱，而他则转身到德意志帝国²⁸⁵去巡视那里信奉新教

的君主们。他在许多漂亮的借口下,不仅把他从丹麦撤返的军队在他们的一些领地上开来开去,而且把他在整个期间以帮助波兰国王镇压心怀不满的臣民(他们骚乱的最大煽动者一向是他)为借口留驻在波兰的军队也慢慢地开往德国。他看到德国皇帝正在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²⁸⁶,因此根据以往一向正确的经验知道皇帝陛下要在保护帝国成员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威是如何无能为力。他的军队便不管人家如何坚持要求,都不肯撤离梅克伦堡。他对一切撤离要求的回答,充满了这样一类论据,仿佛他要给德意志帝国定出新的法律似的。

现在我们假定,瑞典国王认为与沙皇媾和而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不大豁达的敌人身上较为体面,那么,当德国皇帝已经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波兰人即使彼此间终于和睦相处(如果在经历如此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还能有所作为的话),按照条约也必须出力反对基督教共同敌人的时候,帝国的君主们,甚至那些轻率地引进四万名俄国人来保卫帝国安宁不受一万至一万二千名瑞典人侵犯的君主们,能对沙皇作出什么样的抵抗呢?

有些人会说我是小题大作。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这样的反对者回头看看,好好想想,我为什么要向他表明沙皇如何从原先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经过难以想象的、简直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而成长为现在这样一种庞然大物,连为他辩护的荷兰人也承认,他已不仅对他的邻国的安宁,而且对整个欧洲的安宁都构成威胁了。

然而他们又会说,他既无借口抛开丹麦人而与瑞典人单独媾和,也无借口对别的君主们开战,这些君主中有些还和他有同盟关系。谁要是认为这种反对意见驳不倒,那他一定是没有细心考虑过沙皇的性格和目的。荷兰人还进一步承认,沙皇向瑞典开战并无任何体面的借口。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开过战的人,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媾和,也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再次开战。(奥地利)皇帝陛下作为一个睿智的君主,当他不得不和奥斯曼人开战的时候,就象策略所要求的那样全力进行了战争²⁸⁶。同时,沙皇也是一个聪明睿智而强有力的君主,他就不能仿效这个榜样来反对他周围那些信奉新教的君主吗?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我怕说出口的是,完全有可能,在这基督教的时代,新教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掉,在基督教徒中,希腊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将再次成为唯一能进入永恒王国的人。单是这种可能性就给海上强国和所有其他信奉新教的君主提出足够有力的警告,必须为瑞典调停,缔结一

项和约，并且重新加强它的武力，否则任何措施都不能使他们保持足够的警戒；而且这件事必须做得尽可能早和及时，必须赶在瑞典国王或是由于绝望或是由于报复而投入沙皇的怀抱之前。因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所有君主都应该遵循，沙皇目前为了基督教的安宁似乎有点遵循得太过分了）：聪明人不应该墨守礼法，只是顺应时机。不，他应该迎合时机。至于沙皇，我敢冒昧地高度赞许他，他简直不能容忍在这方面被人超过。他的行动看来完全配合时机。再没有什么比利用时间和机会更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兴旺；因为成事的机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如果你把这些机会放过，那么你的全部计划就要落空。

总之，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必须尽可能快地做到为这个瑞典人谋得和约，条款要有利于满足他的荣誉感和保障新教利益，给予他的决不能少于他原先在德意志帝国内所拥有的全部领地。象在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在政治中也应该宁肯要久经考验的确定性，而不要即使是建立在最可能的假定上的不确定性。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内所拥有的省份，是为了使它更直接更好地保卫它当初曾与帝国的自由一起拯救过的新教利益而给予他的，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瑞典王国将近八十年来曾用这些手段在一切场合保卫了上述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至于现在的瑞典国王陛下，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安女王陛下也是在辉格党执政时写给他（查理十二）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一位真正的君主、英雄和基督徒，他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人们中传播对上帝的敬畏，而从不顾及他个人的特殊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

另一方面，那些现在打算通过瓜分瑞典在帝国内省的省份，把瑞典人排除在外而在那里充当新教利益保护者的君主们，能否保护得住这种利益，不是很不确定吗？丹麦已经很弱，从一切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还要变得更弱，在很多年内从它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萨克森在一个教皇派君主的统治下，前景非常暗淡，所以，在所有信奉新教的君主当中只剩下汉诺威和勃兰登堡这两个有名望的王室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别人。因此，我们只要对照梅克伦堡公国²⁸³现在发生的事情来设想一下新教利益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很快发现我们的估计可能是多么错误。这个不幸的公国已经遭到了俄国军队的严重摧残，而且现在还是如此；勃兰登堡和汉诺威的选侯作为下萨克森地区的领袖，作为邻国和信奉新教的君主，有责任拯救这个帝国内的兄弟之

邦和信奉新教的国家，使之摆脱外国如此残酷的压迫。可是请问他们做了什么呢？勃兰登堡选侯担心俄国人会一方面入侵他的选侯国，另一方面从利沃尼亚和波兰入侵他的普鲁士王国；汉诺威选侯则对他的世袭国土有同样明智的顾虑。在这个虽然非常紧急的时刻，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除了表示抗议以外，不需要使用任何别的手段。但是请问有什么效果呢？俄国人仍然呆在梅克伦堡，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要离开，那将是这个国家被摧残得使他们在那里再也无法生存的时候。

看来应该让瑞典国王收回他丢失给沙皇的一切，而且这看来是两个海上强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会乐于这样做：荷兰，是因为它确信，沙皇正在变得过分强大，不应该容忍他在波罗的海立足，而且瑞典不应该被抛弃；大不列颠，是因为如果沙皇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将由于摧毁和征服瑞典而成为离我们更近和更可怕的邻居。此外，我们必须这样做，还由于有威廉国王和当今瑞典国王在1700年缔结的条约；威廉国王曾根据这项条约向当时还比较强大的瑞典国王援助过他所希望的一切，援助过巨额的金钱，好几百匹布和相当大量的火药。

但是，有些政治家（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对沙皇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能力感到疑惧），虽然甚至象狐狸一样狡猾，然而却不愿理解或者装作不能理解，沙皇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损害我们这个岛国。对于他们，只要他们有一天愿意理解，我们很乐意成百次地重复这样一个回答：往事可能重演；他们没有理解他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强大的，我应该承认，这是以很难令人置信的方式达到的。那些不轻易置信的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位伟大君主的性格、目的和计划，就会发现它们很不简单，他的计划很有谋略和远见，他的目的要在长时期内通过一种魔法式的策略来实现。他们看到这些之后，难道还不承认我们应该担心他的一切吗？正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推行的计划不致终归失败，他才没有给它规定一个确定的实现日期，而是让它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实现，就象那些奇怪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今天做出模子，可以留待一百年以后按照它做出器皿。

我们当中还有另一种短视的政治家，他们懂得更多的是狡猾的宫廷阴谋和策略手腕，而不是诚实的政治和对自已国家利益的关怀。这些先生们完全盲从别人；无论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要问：宫廷是否喜欢？他们的党有什么意见？反对党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就根据这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只要他们的狡猾的领导人给任何事物贴上‘辉格党’或‘詹姆斯党’的标签，就足以使这些人不问情由地对它盲目地表示拥护或反对。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凡是有利于瑞典及其国王的意见或文字，都立即被说成是出自詹姆斯党的手笔，不去阅读或考虑就进行辱骂并予以拒绝。不仅如此，而且我听说有些先生们甚至公开地气势汹汹地断言，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这的确是我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只要我们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亲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天知道我们最终会被引入什么歧途。按照我们的条约和真实利益维护瑞典，与我们的党派争论毫无关系。我们不应该寻找和抓住任何借口来损害瑞典，而应该公开支持它。我们的信奉新教的后代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朋友和更勇敢的战士吗？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来简短地概括一下我所说的东西。既然沙皇不仅对恳求他作出相反决定的丹麦国王，而且也对我们的诺里斯海军上将回答说，他将坚持他的推迟袭击肖楠的决定，既然有些报纸说，他如果能与瑞典媾和，将完全取消这次袭击，那么所有君主，特别是我们，就应该警惕他有我现在论述的这类计划，并且一起商量如何防止这些计划和及时剪去他那过分丰满的羽翼。这一点，首先要海上强国乐意开始对他进行某种控制和威慑，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办到。但愿有某个曾帮助他向前迈进的强国能把他稍稍向后拉一拉，那也许就能对这个大冒险家说一个西班牙农民在一个被祀奉的偶像前说过的话，这个西班牙农民来到这个偶像前，很清楚地记得它最初是怎么制成的，对它根本没有它所期待的敬意，对它说道：‘你不要这么神气，你还是一棵李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你了’。此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约让瑞典国王收回他所失去的东西，那就会立即刹住他的（沙皇的）威风。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希望人们不要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些至今一直与瑞典国王为敌的人，基本上是与他们自己为敌。如果这位瑞典人有一天重新得到自己的领地，并把沙皇的傲气压了下去，那么他仍然可以象古希腊的一位英雄那样谈到自己的邻居，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每次为自己的同胞立了功，总要遭到他们的流放，但是当它们想要争取成功时，又不得不召他回来帮忙。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曾这样说：‘这些人总是把我当作棕榈树一样使用。他们经常不断地攀折我的枝条，然而一有暴风雨，又都跑到我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避雨处。’但是如果这位瑞典人没有收回他的领地，那么我只有引用忒伦底乌斯的《安德里亚》中的一段话：

难道你能相信，能领略，
有人会生来这样愚劣，
竟以作恶为乐？

4 跋——这篇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耐人寻味，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当今的世界；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作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¹²⁸⁷’这句话，我应该和别人一样当之无愧。”

三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沃尔波尔、唐森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了。因此，我们首先把彼得一世时期就已出版的一些久已遗忘的英国小册子作为必须详加考察的历史证据。不过，在这些初步的证据中，我们将只限于三本从三种不同角度阐述英国对瑞典态度的小册子。第一本，《北方危机》²⁵⁹（见第二章），揭露俄国的一般制度和瑞典俄罗斯化使英国遭受的危险；第二本题为《防御条约》²⁸⁸，根据1700年条约来判断英国的行动；第三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²⁸⁹，证明那些使俄国扩张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强国的新颖计划同英国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题为《防御条约》的小册子没有标明出版日期。然而书中有一节提到，为加强丹麦舰队，“前年”有八艘英国军舰留在哥本哈根。另一节提到，结集联合舰队远征肖楠²⁶⁰一事发生在“去年夏季”。鉴于前一事件是在1715年，后一事件是在1716年夏末发生

的，所以这本小册子显然是在 1717 年初写成和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以提出疑问的方式逐条进行评述的英国瑞典防御条约，是威廉三世和查理十二在 1700 年缔结的，到 1719 年才满期。然而，在几乎整个这段时期，我们发现英国不断地支持俄国并通过密谋或以公开力量对瑞典作战，尽管这项条约从未废除，也从未宣战。比这一事实或许还要更奇怪的，是对它采取的沉默阴谋。现代历史学家们以这种沉默阴谋完全抹杀了这一事实，然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拚命指责当时英国政府不预先宣战就在西西里海面上消灭了西班牙舰队。但是那时英国至少并没有同西班牙订立防御条约。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对待相似情况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原来对西班牙的海盗行径是 1717 年退出内阁的辉格党²⁵⁸大臣用来刁难留在内阁的同僚的一个武器。当后者在 1718 年进而迫使议会向西班牙宣战时，罗伯特·沃尔波尔先生在下院从他的座席上站起来，在一篇极为尖刻的演说中谴责内阁最近的行动“违反国际法，并且破坏庄严的条约”。他说，“按照所提议的方式批准这些行动，其目的只不过是包庇大臣们，他们已经识别自己做了错事，他们自己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现在又想把它变成议会的战争。”而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计划的纵容默许，则从来没有成为辉格党统治者内部争吵的表面借口（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颇为一致的），因此也从未有幸得到象对西班牙事件那样的大量历史评论。

现代历史学家一般是多么易于直接从官方骗子那里受到启示，在他们对英国在俄国和瑞典的商业利益的见解中表现得最清楚。彼得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俄国这个巨大市场向大不列颠开放的贸易规模被吹得天花乱坠。那些丝毫经不起批评的说法被许可抄来抄去，以至终于成了历史家产，每一个后起的历史学家

甚至无待取得继承权就可予以继承。只要列举几个无可争辩的统计数字就足以推翻这些陈词滥调。

1697—1700 年的英国商业

	镑
向俄国出口	58884
从俄国入口	<u>112252</u>
合计	171136
向瑞典出口	57555
从瑞典入口	<u>212094</u>
合计	269649

同一时期英国总共

	镑
出口	3525906
入口	<u>3482586</u>
合计	7008492

1716 年，瑞典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的全部省份落入彼得一世之手后，

	镑
向俄国出口	113154
从俄国入口	<u>197270</u>
合计	310424
向瑞典出口	24101
从瑞典入口	<u>136959</u>
合计	161060

同一时期，英国出口和入口的总数合计达 10000000 镑左右。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同 1697—1700 年相比，对俄国贸易的增

加同对瑞典贸易的削减相抵，一方所增加的正是另一方所减少的。

1730 年

	镑
向俄国出口	46275
从俄国入口	<u>258802</u>
合计	305077

可见，随着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站稳脚跟，十五年后，英国同俄国的贸易减少了 5347 镑。1730 年英国贸易总额达 16329001 镑，同俄国的贸易额尚不及总值的五三分之一。再过三十年，在 1760 年，大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的账目如下：

	镑
从俄国入口（1760 年）	536504
向俄国出口	<u>39761</u>
合计	576265

而当时英国的贸易总额为 26361760 镑。把这些数字同 1706 年的数字相比，我们发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同俄国的贸易总数只增加了 265841 镑这样一个区区之数。由于同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在查理十二生前为了要打破他对俄国的抵制，在查理十二死后又由于声称必须箝制俄国在海上的扩张，曾经常派遣海军远征波罗的海，如果把它出口和入口数字同它这种军事上的开销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贸易关系无疑使它遭受了损失。

再看一下 1697、1700、1716、1730 和 1760 这几年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到英国对俄国的出口贸易除开 1716 年以外都是不断下降的，1716 年俄国把波罗的海东岸和波的尼亚湾瑞典的全部贸易

夺去了，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英国对俄国的出口从 1697—1700 年俄国还被排除在波罗的海之外时的 58884 镑，降到 1730 年的 46275 镑，又降到 1760 年的 39761 镑，减少的数目达到 19123 镑，大约相当于 1700 年原额的三分之一。可见，自从瑞典的省份被俄国吞并以后，英国市场对俄国原料产品的需求是扩大了，而俄国市场对英国制造商来说却缩减了需求，在贸易平衡论被奉为最高原则的时代，这很难说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贸易。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曾有一些情况促使英俄贸易一度增长，要探讨起来则将离开我们这里考察的时期过远。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间，整个英俄贸易只不过构成英国全部贸易的一个很小部分，可以说，还不到四十五分之一。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称霸初期英俄贸易的突然增长对英国贸易的总平衡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因为它仅仅是从瑞典账上转到俄国账上而已。彼得一世后期以及他的直接继承者叶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皇时期，英俄贸易都明显下降；俄国在波罗的海各省最终站住脚以后的整个时期，英国制品向俄国的出口都不断减少，以至最后比起初还只限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进行贸易时要低三分之一。不论是和彼得一世同时代的英国人，或是下一代的英国人，都没有从俄国向波罗的海的推进中捞到丝毫好处。一般说来，大不列颠当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从占用的资金来看是微不足道，但从其性质来看却很重要。它给英国提供航海器材所需的原料。从这个观点看，波罗的海掌握在瑞典手中比在俄国手中更为可靠。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这里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提供了证明，而且英国大臣们自己也是完全了解的。例如，斯坦霍普在 1716 年 10 月 16 日给唐森写道：

“如果听任沙皇再这样干三年，他肯定将变成那些海面的绝对霸主。”

可见，无论是英国的海运业也好，还是一般贸易也好，都与背信弃义地支持俄国反对瑞典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却的确有一个英国商人小团体跟俄国商人利益一致，那就是俄罗斯贸易公司²⁹⁰。就是这些先生们发出了反对瑞典的叫嚣。例如，请看：

“英国商人对于到瑞典国王的领土去经商的一些申诉，由此可见，单是依靠瑞典供应造船材料对英国会是多么危险，而这类材料是可以从俄国皇帝的领土上得到充分供应的。”

“与俄国经商的商人们的实情”（向议会呈递的请愿书），等等。

正是他们在 1714、1715 和 1716 年间在议会开幕前每周定期聚会两次，以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英国商人对瑞典的不满意见。大臣们依靠的正是这个小团体，他们甚至急于组织这种抗议的表示（这可以从尤伦堡伯爵 1716 年 11 月 4 日和 12 月 4 日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件中看出），因为他们需要哪怕是一点点借口来驱使尤伦堡所称呼的“贪财议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些与俄国经商的英国商人的影响在 1765 年又重新显示出来，而我们这个时代目睹一个与俄国经商的商人掌管着商务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个财政大臣为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商的亲戚帮忙。

在“光荣革命”²⁶⁷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产阶级，即：英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

1657 年，丹麦和勃兰登堡的宫廷打算让俄国人参加进攻瑞典时，曾指令它们的使节，要设法使沙皇决不能在波罗的海得到立足点，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这样讨厌的邻居”（见普芬多夫的《勃兰登堡史》）。

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所以也极其易于做到使之虚有其表。于是，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就为贸易和海运业而大声鼓噪，全国糊里糊涂地予以附和。

那个时候，杜撰各种商业的借口，不管是多么毫无用处的借口，来解释他们对外政策的措施，这副重担至少还是要由内阁来承担。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大臣们已把这副担子扔给外国，让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去做那种为他们的行动发现隐秘的商业动因的讨厌工作。譬如说，帕麦斯顿勋爵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对大不列颠的物质利益极其有害的步骤。在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或者在德国的腹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国家哲学家，绞尽脑汁去发掘“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²⁹¹的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²⁹²的奥秘，认为帕麦斯顿就是它的无耻而顽固的执行人。我们顺便举几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些外国人由于必须用他们所想象的英国贸易政策来解释帕麦斯顿的行动，曾被迫采取何等绝望的步骤。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在他的很有价值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一书中，对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克洪先生 1848 年以前和 1848—1849 年期间那种俄国方式的做法感到吃惊，便怀疑英国从压制各公国的贸易中获得某种秘密的物质利益。老米洛什的御医、已故库尼贝特博士在他有关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的极其有趣的报道中，对于帕麦斯顿勋爵如何通过霍季斯上校以伪装支持米洛什反对俄国而把米洛什出卖给俄国一事做了奇特的叙述。由

于完全相信霍季斯的正直为人和帕麦斯顿的爱国热忱，库尼贝特博士比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走得更远。他竟怀疑英国所谋求的是完全压制土耳其的贸易。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在他最近一部关于波兰的著作中，则几乎暗示说，正是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卡尔斯²⁹³，从而牺牲了它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威望。最后一个例子，可以举现在巴黎报纸上那些穷根究底探索是什么出于贸易猜忌心理的隐秘原因诱使帕麦斯顿反对开凿苏伊土地峡运河的文字。

言归本题。唐森之流、斯坦霍普之流等为敌视瑞典的行动所选中的商业上的借口如下。在1713年年底，彼得一世下令将准备出口的全部大麻及其他俄国产品运往彼得堡而不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当时，瑞典摄政者（查理十二外出期间）和查理十二本人（从本德雷²⁶⁶回来后）宣布对俄国占领的所有波罗的海港口实行封锁。结果，破坏封锁的英国船只遭到没收。英国内阁当时宣称，根据1700年防御条约第十七条，英国商人有权到这些港口进行贸易，因为该条规定，除战争禁运品外，英国可以继续同敌人港口进行贸易。这个借口的荒诞无稽在我们即将重印的那本小册子中要予以彻底揭露，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已不止一次对贸易国家不利，而那些国家还不象英国那样对维护瑞典帝国的完整负有条约的义务。1561年，当俄国人拿下纳尔瓦并且想方设在那里大力兴办贸易时，汉撒²⁹⁴各城市，主要是卢卑克，曾试图得到这种贸易关系。当时的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反对它们这种企图。卢卑克市认为这种反对是前所未有的新闻，因为它从远古时代起就同俄国有贸易关系。它还援引各国商船只要不携带战争禁运品均可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国王则回答说，

他并不反对汉萨各城市有同俄国贸易的自由，而只是反对它们同并非俄国港口的纳尔瓦贸易。在 1579 年，俄国人破坏同瑞典的停战后，丹麦人又同样根据条约要求与纳尔瓦通航，但是约翰国王对此事的反对却同其兄埃里克一样坚决。

英国无论在公开敌视瑞典国王的行动方面还是在为这些行动制造借口方面，似乎都只是步荷兰的后尘。荷兰曾在 1714 年发表两项反对瑞典的声明，宣称没收它的船只是海盗行径。

一方面，荷兰联省议会²⁴¹的情况同英国完全一样。威廉国王签订防御条约既是代表英国，也是代表荷兰。而且，荷兰同瑞典在 1703 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与缔约国中任何一方所封锁的港口通航。当时荷兰有种流行的说法：“商人想要把他们的货物运到那里去就能运到那里去，毫无阻碍”，如果考虑到在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的战争²⁹⁵期间，荷兰共和国曾宣布封锁整个法国，禁止中立国同那个王国进行任何贸易，并且拦截往来法国的一切中立国船只而不管其货载的性质如何，那么，这种说法就更加显得厚颜无耻了。

另一方面，荷兰的形势又不同于英国。荷兰当时已经失去它在贸易方面和海上的威严地位，进入衰落时期。正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在新开拓的通商航道使它们失去昔日商业上的霸权地位以后的情况一样，它不得不把超出本国商船需要的资金出借给其他国家。从此，哪里为它的资金支付最高利息，哪里就是它的祖国。因而，俄国与其说成了巨大的商业市场，不如说成了巨大的投放资金和人力的市场。直到今天，荷兰还一直贷款给俄国。在彼得时代，它曾向俄国供应船只、官吏、武器和金钱，正如当时一个作家所评述的，彼得的舰队应当称作荷兰舰队，而不应称作俄国舰

队。它曾以派遣第一艘欧洲商船到圣彼得堡而感到自豪，并且以它同日本交往时的那种奴颜媚态来报答从彼得那里获得的或者希望从它那里获得的商业特权。而且，这里还有和英国完全不同的使政治家们亲俄的坚实基础。彼得一世 1697 年旅居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时曾把政治家们诱入自己的圈套，后来则通过大使进行指挥，在他 1716—1717 年再次旅居阿姆斯特丹时又再次对他们施加了个人影响。然而，如果考虑到十八世纪头数十年间英国对荷兰的绝对影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不经英国预先同意和没有英国的唆使，荷兰联省议会那些反对瑞典的声明是决不会发表的。英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利用英荷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荷兰名义为英国决心办的事情作出先例。另一方面，荷兰政治家被沙皇利用来影响英国政治家的情况，也是同样确切无疑的事实。例如，“行贿大师”的兄弟、唐森大臣的内兄弟兼 1715—1716 年间英国驻海牙大使霍雷修·沃尔波尔，显然就是被他的荷兰朋友引诱去为俄国利益效劳的。又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泰耳斯，在查理十二同彼得一世之间殊死斗争的最关键时期，曾同时为英荷两国驻土耳其政府的大使馆办事。这个泰耳斯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还公然声称，为俄国阴谋充当领取报酬的忠实代理人对他本国是一种功绩。

四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 1700 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²⁸⁸

‘切勿破坏和约

切勿只顾王国’²⁹⁶

第一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之间建立‘永远诚挚和持久的友谊、同盟和良好的关系,因此双方绝对不得相互地或单方面地损害另一方的不论位于何处的王国、省份、殖民地或臣民,也不得容许或赞同他人加以损害,等等。’

第二条 ‘此外,同盟双方及其后嗣和继承人必须尽其所能地照顾和促进另一方的利益和荣誉,探察并通知(一旦获悉时)对方它所面临的各种危险、阴谋和敌对计划,尽可能地为之加以抵制,并且同时通过劝告和援助加以制止。因此,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任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和敌对者,以损害其盟国,’等等。

疑问之一 我们的舰队正在同瑞典的敌人联合行动,沙皇统率着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上将参加军事会议,不仅了解他们的全部计划,而且还曾同我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一起(正如丹麦国王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亲自承认的那样)推动北方联盟²⁶¹各国参与一项会使我们盟国瑞典遭到彻底毁灭的计划,即去年夏季策划的对肖楠²⁶⁰的袭击,既然如此,上面两条中标有着重号的词句怎么同我们目前的行为一致呢?

疑问之二 同样,我们应如何解释前一条中规定一个盟国不得由自己或任何别人进行使另一方丧失国土和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的那一段文字呢?特别是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在 1715 年,当季节已经很迟,我国商船已经安全返回,再不能象通常那样用护送和保护我国贸易作借口的时候仍然在波罗的海留下八艘军舰呢?又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命令这八艘军舰同丹麦

人一起作战,从而使丹麦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瑞典舰队,使后者不能去援救施特腊耳宗德²⁶⁹,从而主要由于我们的缘故,使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甚至使瑞典国王陛下本人冒着极大危险在这个城市陷落前横渡大海呢?

第三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根据一项专门防御条约互相承担义务,保证‘紧密联合,互相保护彼此的王国、领土、省份、政府、臣民、属地以及在北海、苏格兰海、西海、不列颠海(通称英吉利海峡)、波罗的海和松德海峡的航海和贸易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保护根据条约和协议、根据公认惯例、国际法和传统权利属于同盟各方的种种特权,反对任何从海上或陆上来的欧洲侵略者或入侵者和骚扰者,等等’。

疑问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王或人民在迫切需要或有毁灭性威胁的情况下,都无可争辩地拥有使用他们自己认为最必要的各种自卫手段的权利和特权。再者,近数百年来,瑞典人在同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俄国人交战时,阻碍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上的一切贸易已成为他们一向的特权和做法。既然本条也规定了一个盟国应当保护根据公认惯例和国际法属于另一个盟国的种种特权,那么,现在,当瑞典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这种特权时,我们为什么不仅加以阻挠,而且以之作为公开反对瑞典国王的借口呢?

第四、五、六、七条 规定了英国和瑞典两国在一方的领土遭到入侵或其航运在第三条所列举的海域中遇到‘骚扰或阻碍’时应互相派遣的援军数目。对瑞典的德意志省份的入侵被明确地列为履行盟约理由。

第八条 规定未受攻击的盟国应首先起和平调解者的作用;但是,调解失败后,‘应毫不迟缓地派遣上述部队;在受害一方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同盟者不应停止行动’。

第九条 要求条约规定的‘援助’的那个盟国,‘必须对上述援助作出选择:是全部还是部分,是士兵、船只、弹药还是金钱’。

第十条 船只和部队由‘受援者统率’。

第十一条 ‘但是如果上述兵力不足以应付危险局势,或许由于侵略者得到他的某些同盟者的军队的支援,则盟国的一方在受害的另一方提出要求后,必须在他能够稳妥和方便地募集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部队从海上和陆上加以援助……’

第十二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及其臣民可以合法地将其军舰驶入另一方

港口并在那里过冬。’关于这一点的专门谈判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但‘在此期间,1661年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中有关航海和贸易的条文仍然有如该条文逐字逐句移入本条约一样,完全有效。’

第十三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的臣民……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不管是作为海员还是作为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应为他们(盟国中任何一方的敌人)效力,因此,应严刑峻法以警效尤。’

第十四条 ‘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王……在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或在自己的王国或省份中……受到任何其他邻近国王的骚扰……他本身需要援助而不能提供他按照本条约规定所必须提供的援助时,这位受到这种骚扰的同盟者可以不必提供所承诺的援助……’

疑问之一 是否我们当真认为瑞典国王没有受到他所有敌人最不正义的攻击;是否我们因此不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提供这些条文所规定的援助;是否他并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至今没有给他这样的援助呢?

疑问之二 这些条文以最明确的措词阐述了大不列颠和瑞典各应以什么方式互相援助,这两个盟国中的任何一方能根据这些条文给需要其援助的另一方强加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援助方式吗?如果这另一个盟国认为接受这种方式的援助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仍然坚持要履行条约,他能以此为借口,不仅拒绝给予规定的援助,而且以敌对方式对待这个盟国,并与他的敌人站到一起去反对他吗?如果这种作法毫无道理,因为甚至常识也告诉我们这是毫无道理的,那么,在种种理由之中,我们为我们现在对待瑞典国王的態度而摆出的这样一个理由,即他要求准确地执行他同我们的盟约,而不愿接受几年前我们向他建议的使他的德意志省份中立化的条约,又怎么能够站得住呢?且不说这个条约偏袒瑞典的敌人,只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只着眼于在我们同法国进行战争时防止国内发生种种动乱,仅仅由于要同瑞典国王签订这个条约的正是那些在发动这场反对他的战争时已分别撕毁了条约的敌人,而要给这个条约作保证的又是那些都为被撕毁的条约作过保证,但未起到保证作用的国家,瑞典国王就没有任何理由信赖这个条约了。

疑问之三 第八条说我们在支援我们受害的同盟者时,在他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不应停止行动,可是我们却反而致力于帮助那个国君的敌人(尽管他们全都是非正义的侵略者)不仅一个接一个地夺走他的省份,并且成为这些省份的牢固占有者,同时还不断谴责瑞典国王对此没有逆来顺受,我

们的行为怎么能和第七条说的一致呢？

疑问之四 第十一条确认了 1661 年大不列颠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明确禁止联盟的一方本人或其臣民向另一方的敌人出借或出售军舰或防护舰；本条约第十三条也明确禁止盟国一方的臣民用任何方法去帮助另一方的敌人，使这一盟国受到扰乱或损失。因此，如果瑞典在我国上次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把他们自己的舰队借给法国，使法国能够更好地实现反对我们的任何计划，或者如果瑞典不顾我国提出的抗议，允许其臣民向法国提供配有五十、六十和七十支枪的船只，难道我们不会谴责瑞典恶劣透顶地违反本条约吗？现在，我们设身处地地来回想一下，我国舰队近来甚至在最危急的时期有多少次，完全是为瑞典的敌人实现各种计划效劳，而且俄国沙皇的舰队中现在就有一打以上英国造的船只。这种事，若是别人做了，我们肯定要加以谴责，难道我们对此就不觉得很难原谅自己吗？

第十七条 义务不应扩大到要求与盟国（需要援助的盟国）的敌国断绝一切友好关系和相互贸易。假定联盟的一方派出援军而不直接参战，则其臣民同交战的那个盟国的敌人进行贸易，直接地和安全地同这些敌人买卖各种没有明确作为违禁品禁止的货物，当视为合法。此项违禁物品以后将由专门的通商条约做出规定。

疑问之一 这一条是在第二十一条当中我们能够要求瑞典人方面履行的唯一的一条，问题在于是否我们自己对瑞典已经履行了应由我们履行的所有其他各条呢？是否在要求瑞典国王执行这一条时，我们已经答应我们也将对其他各条尽到我们的义务呢？否则，难道瑞典人不可说，我们自己对整个条约在最重要的各点上不是没有执行就是完全背道而驰，却对单独一项条文遭到破坏进行抱怨，是不公正的吗？

疑问之二 是否盟国一方根据这一条文享有的同另一方的敌人进行贸易的自由应当无论在时间上或地点上都毫无限制呢？总之，是否这一自由应该扩大到甚至破坏本条约的目的本身即促进双方王国的安全和保障的程度呢？

疑问之三 假如法国人在上几次战争中占领了爱尔兰或苏格兰，并且努力通过在新建海港或旧有海港的贸易来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的地位，而瑞典人根据这一条，坚持要在上述从我们手中夺去的海港同法国进行贸易，并在那里向他们提供某些战争必需品，甚至提供武装的船只，从而使法国人更

易于在英格兰这里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我们会认为瑞典人是我们忠实的同盟者和朋友呢?

疑问之四 假如我们设法阻挠对我们如此有害的贸易,为此拦截所有开往上述海港的瑞典船只,而瑞典人则以此为借口将他们的舰队同法国舰队联合起来,使我国丧失一些领地,甚至怂恿对我国的入侵,并让他们的舰队随时准备予以协助,是否我们不会大声疾呼地激烈指责瑞典人呢?

疑问之五 按照公正的观察,我们现在坚持要与沙皇从瑞典夺去的那些海港进行的自由贸易,以及我们目前对瑞典国王阻挠这种贸易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上面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呢?

疑问之六 是否我们从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直到1710年间,在我国同法国和荷兰的历次战争中,从来不曾毫无任何迫切必要地拦截和没收过并非开往任何被禁运港口的瑞典船只呢?是否我们拦截和没收的瑞典船只的数量和价值不曾大大超过瑞典人现在从我国夺取的全部船只呢?是否瑞典人曾以此为借口同我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并派遣成队的船只去支援他们呢?

疑问之七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多年来的贸易状况,是否我们不会发现上述地区的贸易对于我们不是那么十分必要,至少不能同保护一个信奉新教的盟国相提并论,更不能给我们提供正当理由去同那个国家进行战争呢?这场战争虽未公开宣布,但给那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比它所有敌人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疑问之八 如果在两年以前这一贸易对于我们变得比过去更为必要一些,是否就难于证明,这只是由于沙皇迫使我们丢开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旧贸易航道而改往彼得堡,我们又顺从了的缘故呢?我们由此而遭受的一切麻烦,不是应当归咎于沙皇,而不应当归咎于瑞典国王了吗?

疑问之九 是否沙皇并没有在1715年一开始就重新许可我们照旧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呢?由于沙皇这样改变决定,对彼得堡的贸易对我们又变得象过去那样不必要了,是否我国大臣们在那年我国军舰被派去保护我们对彼得堡的贸易之前并没有早就了解这种情况呢?

疑问之十 是否瑞典国王未曾声明过:若是我们停止他认为对他的王国具有毁灭性的对彼得堡等地的贸易,那么,他对我国无论是在波罗的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贸易都决不干扰,但是,若是我们不愿向他表示这种起码的友谊,那么发生无辜受过的情况就不要责怪他呢?

疑问之十一 同瑞典国王禁运的港口的贸易除了对我们没有必要外,它的数额也几乎不到我们在波罗的海的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为了它,是否我们没有使我国贸易在这整个期间遭受种种危险呢?是否我们没有使得自己必须开支大量费用去装备保护它的舰队呢?是否我们没有由于同瑞典的敌人站到一起而使得瑞典国王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呢?而瑞典国王是否曾走到这样的地步,不论在哪里,不管是在他国内还是在在国外,一发现我国的船只和财物就不加区别地予以扣押或没收呢?

疑问之十二 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我国同各北方港口的贸易,难道我们不当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到因瑞典濒临灭亡和沙皇独占波罗的海及我们需要从那里购买的各种造船材料而使这一贸易遇到的危险吗?促使我们第一次派遣二十艘军舰去波罗的海并命令他们无论在哪里遇到瑞典人就加以攻击的那笔损失,总数只有六万数千镑(顺便说,其中三分之二也许是可疑的),而我们在上述贸易中从沙皇方面受到的困难和损失不是比这个数目还要更大些吗?然而,不正是这个沙皇,这个野心勃勃、十分危险的君主在去年夏天统率了其绝大部分由我国军舰组成的整个所谓联合舰队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英国舰队——我们国家的堡垒——被交给一个外国君主统率。我国的这些军舰后来不是护送了他的(沙皇的)运输舰和舰上载运的军队从而兰岛返回,保护他们不受瑞典舰队的攻击吗?不然,瑞典舰队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破坏的。

疑问之十三 现在假设情况相反,我们根据我国商人对沙皇虐待他们而发出的无数强烈的控诉,派遣我国舰队去向那个君主表示了我们的愤慨,制止了他的甚至对我们也是有害的庞大计划,按照本条约支援了瑞典,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和平,难道这不是更加符合我国的利益,更加必要,更加高尚和公正,而且更加符合我们条约的精神吗?这样一来,我们这几次北方远征所花费的数十万镑不是会使用得更加得当吗?

疑问之十四 如果维护和确保我国贸易免遭瑞典人的侵犯是我们北方事务中全部措施的唯一宗旨,那么,前年我们在那里已经没有贸易需要保护时,为什么我们要在波罗的海和哥本哈根留下八艘军舰呢?为什么尽管海军上将诺里斯同荷兰人一起足有二十六艘军舰之多,我国贸易若是由他们护航,瑞典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然而诺里斯却在去年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在松德海峡呆了两个多月,没有为我国和荷兰商人前往一些港口护航,从而

使他们在波罗的海停留太久，以致如事实所表明的，他们的返航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国军舰都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呢？世人不会很容易想到，当时对我们这一切活动有更大影响的，不是对我国贸易的假装的关怀，而是要强迫瑞典国王接受一个把不来梅和费尔登公爵领地划归汉诺威的不光荣和不利的和约，或者别的这类与大不列颠的真正的悠久的利益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企图吗？

第十八条 ‘鉴于为了维护波罗的海航海和贸易的自由，宜于保持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牢固真诚的友好关系，而瑞典和丹麦的前任国王确实曾经不仅通过 1660 年 5 月 27 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公开和约条款和互换的协定批准书相互保证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上述协定中包括的全部条款，而且在 1665 年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前不久，共同向……大不列颠国王查理二世宣布，他们将忠于……上述和约的所有条款……查理二世在上述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在 1665 年 3 月 1 日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后不久，即在 1665 年 10 月 9 日，承担了为这些协定作保证的义务……鉴于此后不久即于 1679 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了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的一个和约文件²⁹⁷，其中对于在罗斯基勒²⁹⁸、哥本哈根²⁹⁹和威斯特伐利亚³⁰⁰签订的几个条约做了明确的记载、重申和确认；鉴于上述这一切……大不列颠国王用本条约保证……如果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的任何一方要破坏上述的任何协定或者其中包括的一项或几项条款，因而如果两国国王中任何一方要损害另一方的个人、省份、领土、岛屿、货物、领域和权利（这些权利按照前面多次提到的 1660 年 5 月 27 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协定以及……1679 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的和约中所包括的那些协定，属于这个和约文字涉及的有关各方），不管他是本人出面还是通过他人，不管是密谋策划还是公开骚扰，不管是进行任何损害还是用武力进行任何暴力行动，那么……大不列颠国王……首先将通过自己的干预来尽一个朋友和高贵同盟者的义务，以维护前面经常提及的一切协定和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从而维护两国国王之间的和平；其后，如果违反一切协定及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而制造这种损害或任何骚扰和伤害的国王拒绝接受劝告……那么大不列颠国王……将……按照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现在这些协定对这种情况所决定和赞同的办法，对受害者给予支持’。

疑问 这一条不是明确告诉我们如何消除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可能遭

受的扰乱吗？——在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产生误会时，即责成双方履行他们之间从1660年至1670年签订的一切和约，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违反上述条约的敌对行动时，则支持另一方反对侵略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如此恰当的办法去反对使我们深受其害的弊端呢？丹麦国王虽然从签订特拉温达尔和约²⁶⁸到他从萨克森出发去同俄国人作战表面上一直是瑞典国王的忠实朋友，然而在这之后却立即卑鄙地利用致命的波尔塔瓦战役极不正义地向他发动了进攻，对这一点，无论任何人，不管他是多么偏颇，难道能够否认吗？那么，丹麦国王不就是上述一切条约的破坏者和使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遭受干扰的真正祸首吗？我们究竟为什么不按照这一条去支援瑞典反对他呢，为什么反而公开宣布反对受害的瑞典国王，在他对敌人稍占优势时就向他发出一份份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就象我们去年夏天在他进入挪威时所做的那样），甚至命令我国舰队同丹麦人一起公开与他作对呢？

第十九条 ‘上面提到的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今后应该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和联合，以保卫和维护新教、福音教和经过改革的宗教’。

疑问之一 我们是怎样按照这一条去联合瑞典保卫、保护和维护新教的呢？我们不是任凭这个一向作为上述宗教的堡垒的国家被极其无情地弄得支离破碎吗？……我们不是自己对它的毁灭助了一臂之力吗？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国商人损失了值六万余镑的船只。因为正是这笔损失，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1715年耗费二十万镑派遣我国舰队前往波罗的海的借口。至于我国商人后来所遭遇的，即使我们把它归咎于我们那些反对瑞典国王的威胁性备忘录和公开敌对行为，难道我们不当承认那个君主的怨恨也是十分克制的吗？

疑问之二 我们曾经要其他君主，尤其是我们的新教朋友们相信，那怕只是为了确保新教一个方面的利益，即这里新教的王位继承，我们也愿付出数百万的生命和财产。如果他们发现，王位继承问题刚解决，我们为了六万余镑（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区区之数是我们同瑞典争吵的第一个借口）就去破坏整个新教利益的基础，帮助把一向忠诚保护新教徒的瑞典牺牲给它的邻居，其中有些是公开宣称的教皇派，有些更坏，有些至少只是半心半意的新教徒，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呢？

第二十条 ‘因此，为了表示盟国双方的互相信任和对这一协定的信守不渝……上面提到的两国国王互相保证并宣布……他们将不以友谊、利益、

先前的条约、协定和诺言,或任何别的借口而稍许违反本条约任一条款的真正本意,他们将最彻底和最愉快地或由他们本人或由大臣和臣民们执行他们在本条约中所承诺的一切……毫不犹豫,毫无例外,决不推诿……’

疑问之一 既然这一条表明,在签订这个条约时,我们没有承担同它相反的义务,而且以后在本条约有效期内(从签订日起十八年),我们如承担任何这类义务都极不正当,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最近反对瑞典国王的行动进行辩解呢?这些行动不是很自然地显得是我们自己或某个目前能影响我国决定的宫廷同该君主的敌人缔结条约的结果吗?

疑问之二 这一条的文字……凭道义、信义和正义起誓,究竟怎么能同我们现在利用来不仅不按照本条约援助瑞典,甚至还要设法尽情地破坏它的那些卑微借口一致起来呢?

第二十一条 ‘本防御条约有效期为十八年,期满前,结盟的两国国王可以……重新谈判。’

对上述条约的批准书。‘朕认真审阅和考虑之后,以本批准书对本条约的一切条款表示赞同和认可。朕以个人名义,以后嗣和继承人的名义赞同本条约;朕保证并庄严宣誓,朕将诚恳地严肃地执行和遵守条约中所列各点。为确保有效,朕已命令对公元1700年,本朝(威廉三世)第十一年2月25日在肯辛顿宫递交的本文件加盖庄严的英国国玺。’

疑问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自认为支持最近的光荣革命²⁶⁷并真诚热爱和感激不朽的威廉国王的人,怎么能够……丝毫容忍(我得再次使用第二十条的文字)以利益或任何别的借口——特别是两年来一直被利用来动用我国舰队、人员和金钱去毁灭瑞典的那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借口——去违反上述条约呢?要知道,对这个瑞典的防御和维护,我国伟大睿智的君主曾作过如此庄严的保证,并且始终把这看作是确保欧洲新教利益的最大需要。”

这个条约于1700年1月6日和16日在海牙签订,威廉三世于1700年2月5日批准。

五

我们将以分析那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²⁸⁹的小册子来结束《外交内幕》的这篇导言，在这样做以前，对俄国政治的概括历史先谈几句，看来是恰当的。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代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这种怀疑就象阴影一样追逐着俄国，随着俄国的成长而增长；它把刺耳的讥讽音调同遭受苦难的各国人民的呼声混杂在一起，并且嘲笑俄国的赫赫威严不过是用来进行炫耀和欺骗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其他的帝国在其幼年时期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怀疑，然而俄国变成了一个巨人以后，仍然没有消除这些怀疑。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

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在十八世纪初，俄国被认为是彼得大帝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施略策尔曾认为找出俄国有它的过去，是一个发现；而在现代，象法耳梅赖耶尔这样的作者却不自觉地重复俄国历史学家们的陈词滥调，硬说这个使十九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九世纪时已把欧洲笼罩在阴影之中。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政策开始于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³⁰¹，中间虽有一些间断，但是一直沿袭至今。

俄国的一些古代地图展示在我们眼前，表明俄国的欧洲版图比它现在所能夸耀的甚至更大：它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不断的扩张活动被焦虑不安地指了出来；我们看到，奥列格率领八万八千人进攻拜占廷，把他的盾牌钉在那个首都的城门上以示胜利，并把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强加于没落帝国³⁰²；伊戈尔迫使它纳贡；斯维亚托斯拉夫吹嘘说，“希腊人供给我黄金、贵重织物、大米、水果和葡萄酒；匈牙利人提供牛羊和马匹；从俄罗斯则取得蜂蜜、蜂蜡、皮毛和人丁”；弗拉基米尔征服克里木和利沃尼亚²⁷⁸，就象拿破仑对德意志皇帝所干的那样，向希腊皇帝强索一个公主³⁰³，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然而，尽管这些往事的回忆提示了似是而非的类比，早期柳里克王公们的政策跟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折不扣是席卷欧洲的日耳曼蛮族的政策，现代各民族的历史只是在这场洪水退去之后方才开始。俄罗斯的哥特时期³⁰⁴只不过是诺曼人³⁰⁵征服的一章而已。正如查理曼的帝国³⁰⁶是现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导一样，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也是波兰、立陶宛、波

罗的海国家、土耳其和俄国本身奠基的先导。这一迅速扩张的活动,并不是深思熟虑策划的结果,而是诺曼人征服的原始组织——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自然产物,因为渴望荣誉和掠夺的新的瓦利亚基冒险家源源不断地涌来,使得必须不断进行新的征服。渴望休息的首领们被亲兵队所迫而不得不继续前进,在俄罗斯,正象在法兰西的诺曼底一样,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时首领们把他们那些无法驾驭和贪婪成性的战友们派去进行新的掠夺性的征伐,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摆脱他们。早期柳里克王公们在作战和征服的组织上同诺曼人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做法毫无区别。如果说,使斯拉夫各部落屈服的,不仅是武力,而且也有彼此间的协议,那么这个特点应归因于这些部落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处于北方和东方的侵略之间,接受前者是为了抵御后者。把北方其他野蛮人吸引到西方罗马去的那种神奇的魅力,也把瓦利亚基人³⁰⁷吸引到东方罗马去。俄罗斯的首都,柳里克定于诺夫哥罗德³⁰⁸,奥列格迁至基辅,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又企图建在保加利亚,这种迁都的本身无疑地证明了,入侵者还只是在探索道路,把俄罗斯只是当作继续南下去寻求一个帝国的落脚地点。如果说,现代俄国凯觐君士坦丁堡为的是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那么柳里克王公们则相反,他们是由于齐米斯基斯统治下的拜占廷的抵抗,最后才被迫在俄罗斯建立他们的统治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胜利者和战败者在俄罗斯比在北方蛮族征服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融合得更快;首领们很快就同斯拉夫人混同起来了,这从他们的通婚和姓名便可以看出。但是,应当记得,既充当他们的卫队又充当他们的枢密机构的亲兵队,仍然是清一色的瓦利亚基人;标志哥特俄罗斯³⁰⁴全盛时期的弗拉基米尔,

和标志哥特俄罗斯开始衰落的雅罗斯拉夫，都是靠瓦利亚基人的武力登上俄国王位的。如果要承认这个时代有任何斯拉夫影响的话，那就是诺夫哥罗德的影响了，它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它的传统、政策和倾向同现代俄国是如此截然对立，以致其中一个只能存在于另一个的废墟之上。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瓦利亚基人的优势已经打破了，但同时，第一时期的征伐势头也随之消失，哥特俄罗斯的衰落也开始了。这一衰落的历史，比征服和形成的历史更加能证明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纯属哥特性质。

这个由柳里克王公们堆砌起来的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帝国，也象其他发展类似的帝国一样，分裂为许多封土，在征服者的后裔之间一再进行分割，被封建战争弄得分崩离析，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大公的至高权威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中消失了。苏兹达尔公国的安德烈企图通过把首都从基辅迁移到弗拉基米尔来把帝国的一些大块肢体重新连结起来，结果只是把肢解从南部扩展到了中央地带。安德烈的第三代继承人甚至把最高权威的最后一点影子——大公的头衔和当时对他仅存形式的臣服礼也放弃了。南部和西部的封土先后转归立陶宛、波兰、匈牙利、利沃尼亚和瑞典。古都基辅本身从一个大公国的中心降为一个普通城市之后，便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这样，诺曼人的俄罗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

鞑靼人³⁰⁹的枷锁从 1237 年持续到 1462 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

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方起来反抗的人民。此外，他们制造荒土正是本着那曾使得苏格兰高地和罗马近郊平原人口灭绝的同一条经济原则，即把人变为羊，把肥沃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

当莫斯科公国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时，鞑靼人的枷锁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为了保持俄罗斯王公间的不和并使他们奴颜婢膝地臣服，蒙古人恢复了大公国的尊荣³¹⁰。俄罗斯王公们之间竞相角逐这一尊荣，正如一位现代作者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卑鄙的角逐——奴才之间的角逐，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诽谤，在自己残暴的统治者面前，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攻讦，他们为一个卑贱的宝座而争吵，因此他们除非采用掠夺和弑亲的手段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双手捧满黄金和沾满血污，他们不是卑躬屈节就不敢爬上这个宝座，不是双膝跪地战战兢兢地俯伏在随时都会把那些奴隶的王冠连同戴着这种王冠的脑袋踩在脚下的鞑靼人的弯刀下，就不敢保住这个宝座”。正是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1328年，伊万·卡利塔之兄尤里在乌兹别克汗脚下拾起了以告密和暗杀手段从特维尔那一支夺过来的大公国的王冠。伊万一世·卡利塔和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象征着借助鞑靼人的枷锁而兴起的莫斯科公国和由于鞑靼人的统治消失而获得独立权力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从它最初登上历史舞台起的全部政策，就体现在这两个人物的一生当中。

伊万·卡利塔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奉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³¹¹朝见，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他以不断向汗揭发有人搞阴谋使汗焦虑不安。只要特维尔一支流露出一点民族独立的愿望，他就赶忙去向金帐汗告发。他一遇到反抗，就去引这个鞑靼人来镇压。但是，仅仅扮演一个角色还不够：要行得通，还需要黄金。不断地贿赂汗及其亲贵，是他那套欺骗和篡权活动的唯一牢靠的基础，但是奴才怎么能弄到贿赂主子的金钱呢？他说服汗任命他为全部俄罗斯封土的征税人。一被授予这一职务，他就巧立名目，搜括钱财。他用鞑靼人的名子所引起的恐惧去聚敛钱财，然后用这些钱财去腐蚀鞑靼人自己。他以贿赂诱使都主教将其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接着，又借口后者已成为宗教首都而把它变成帝国的首都，使教权同他的王权合而为一。他又以贿赂引诱同他竞争的王公手下的大贵族们³¹²背叛自己的首领，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的周围。他利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希腊教会和大贵族们的共同影响，把拥有封土的王公们联合起来去讨伐他们当中最危险的特维尔王公；而当他的大胆篡权行动迫使他的新盟友起来反抗他自己，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不是拔出剑来，却是赶忙跑去找汗。他还是以贿赂和欺骗的办法引诱汗用极残暴的酷刑杀害他的同族对手。这个鞑靼人的一贯政策是使俄罗斯王公们互相遏制，助长他们的纠纷，使他们彼此势均力敌，而不让任何一个得以壮大。伊万·卡利塔则把汗变成了用以翦灭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篡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使鞑靼征

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他采用他曾用以提高莫斯科大公国地位的那同样的手段，那种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保证了他儿子的继位。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他为自己规划的这条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紊地勇敢地执行它。他就这样成了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他的人民恰如其份地称他为卡利塔，即钱袋，因为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正是他在位期间目击了立陶宛国家的崛起，当鞑靼人从东边把俄罗斯封土挤成一团时，立陶宛国家则从西边肢解它们。伊万不敢抵挡一种耻辱时，似乎就急于夸大另一种耻辱。他是不会由于受到荣誉的引诱、良心的责备或者由于不甘屈辱就离开自己的目标的。他那一套可以用寥寥数字来表述：一个篡权的奴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²⁹²。他把他自己的弱点——他的奴才地位——变成了他的力量的源泉。

伊万一世·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就是他的继承者的政策，他们只需要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罢了。他们辛劳地、逐步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个政策。因此，我们可以从伊万一世·卡利塔立刻就谈到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

伊万三世在位(1462—1505)初期，仍然臣属于鞑靼人；他的权威仍然受到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竞争；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统治着俄罗斯北部；波兰—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公国；最后，利沃尼亚骑士团³¹³尚未解除武装。但是到了他在位的末期，我们就看到伊万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廷末代皇帝的公主³¹⁴；脚下是喀山汗³¹⁵，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共和国都已屈服，——立陶宛萎缩了，它的君主成了伊万手中的一个工具，——利沃尼亚骑士团也被击败了。

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³¹⁶。那么,伊万是怎样完成这种丰功伟绩的呢?他是个英雄吗?俄国历史学家们自己却都揭示出他是一个公认的懦夫。

让我们按照开始和完成的顺序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他进行过的一些主要斗争——与鞑靼人斗争、与诺夫哥罗德斗争、与拥有封土的王公们斗争,以及最后与立陶宛—波兰的斗争。

伊万把莫斯科公国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并不是通过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他不是打碎这个枷锁,而是偷偷地摆脱了它。因此,推翻鞑靼统治看来更象是自然的产物而不象是人为的事业,在这个鞑靼魔怪终于咽气时,伊万来到他临终的床边,与其说象一个带来死亡的勇士,还不如说象一位前来诊断并推究死因的医生。任何一国人民,一旦摆脱外国统治,声望总是提高的;可是伊万手下的莫斯科公国却显得声望下降了。只要把西班牙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³¹⁷和莫斯科公国反抗鞑靼人的斗争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在伊万即位的时期,金帐汗国早就削弱了,这是由于它内部有激烈的纷争;外部则有诺该鞑靼人³¹⁸同他们的分离、帖木儿·塔梅尔兰的侵袭、哥萨克人的兴起以及克里木鞑靼人³¹⁹的敌对。与此相反,莫斯科公国则由于坚定地奉行伊万·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虽为鞑靼的束缚所摧残但同时却又由于这种束缚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些汗象着魔似的,一直充当莫斯科公国扩张和集权的工具。他们经过盘算后曾加强了希腊教

会的权势，但是在莫斯科大公们的手里，希腊教会却成了对付他们的致命武器。

这个莫斯科公国人要起来反抗金帐汗国，无需什么发明创造，只需仿照鞑靼人自己就行了。可是伊万并没有起来反抗。他卑贱地自认为是金帐汗国的一个奴才。他靠收买一个鞑靼女人，诱使汗下令从莫斯科公国撤回蒙古使臣。他用这类不知不觉鬼鬼祟祟的办法蒙骗汗接连作出一些完全是毁灭自己权势的让步。因而他并不是征服，而是窃取权势。他不是把敌人驱逐出堡垒，而是用计把敌人调离开。他在汗的使臣面前照旧卑躬屈节，自称臣属，但又编造遁词逃避纳贡，使用的是一个潜逃的奴隶不敢对抗自己的主子而只得偷偷逃出他的掌心时的那全套策略。蒙古人终于如梦初醒，战斗就打响了。看到一点点武装冲突场面就发抖的伊万，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并竭力以撤销敌人想要报复的目标来消弭敌人的盛怒。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克里木鞑靼人的干预，他才得到解救。为了抗击金帐汗国的第二次入侵，他大张旗鼓地集结了数量如此悬殊的兵力，以致一传说他们的人数就避免了这次攻击。在第三次入侵中，他丢下二十万大军临阵脱逃，当了可耻的逃兵。他在无可奈何被拉回来后，又企图对当奴才的条件讨价还价，他终于把自己这种奴隶的恐惧传布到他的军队里，使它陷入全面溃退。正当莫斯科公国惶惶不安地等待无可避免的灭亡时，忽然听说金帐汗国因都城受克里木汗袭击而被迫撤兵，并在归途中被哥萨克人和诺该鞑靼人所歼灭。于是转败为胜。伊万推翻了金帐汗国，但不是他自己打的，而是以佯攻的办法诱使它发动进攻，使它残存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并遭受它自己的那些已被伊万设法结为盟友的同族部落的致命打击。他利用一个鞑靼人制服了另一个鞑靼人。正如他亲自

招来的莫大危险未诱使他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英雄气概一样,他的奇迹般的胜利一时一刻也没有冲昏过他的头脑。他小心翼翼地不敢贸然把喀山汗国并入莫斯科公国,而是把它交给他的克里木盟友芒吉-吉雷家族的君主们,仿佛是受莫斯科公国委托代管的樣子。他用取自那个战败的鞑靼人的战利品束缚住这个战胜的鞑靼人。但是,如果说在目击他的耻辱的人面前,他是非常谨慎而不肯摆出征服者的架势的话,那么,这个骗子却完全明白,鞑靼帝国的倾覆在远处会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会带给他多么光荣的光环,并且会多么便于他堂堂皇皇地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因此,他就对外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征服者姿态,而且的确在高傲专横和盛气凌人的假面具后面,成功地隐蔽了这个对于亲吻大汗最低贱使臣的马镫仍然记忆犹新的蒙古奴才的死皮赖脸。他以较为压低的声调模仿他以前的主子曾使得他丧魂落魄的那种语言。现代俄国外交中某些常见的词句,诸如宽宏大量、有损君主尊严之类,就都是从伊万三世的外事诏令中借用来的。

在喀山汗国降服之后,他便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征伐。如果说,在他看来,摆脱鞑靼人的枷锁是使莫斯科公国强大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取消俄罗斯的自由则是第二个条件。由于维亚特卡共和国曾宣布在莫斯科公国和金帐汗国之间保持中立,普斯科夫共和国连同其十二个城市又表示了不满的迹象,伊万就奉承后者并且佯装忘记了前者,从而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大诺夫哥罗德。他很清楚,大诺夫哥罗德一垮台,俄罗斯其他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以分享这一肥美赃物为诱饵,使拥有封土的王公们都追随他。同时他又诱骗大贵族们,挑起他们对诺夫哥罗德民主制的盲目仇恨。这样,他拼凑起三支大军

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并以悬殊兵力压倒了它。可是随后,为了不遵守他对王公们的诺言,为了不丧失他那条“你卖力气我得利”的不变原则,同时由于担心诺夫哥罗德不经过预先的处理,还消化不了,他认为适宜的作法是突然表现得节制,满足于一项赔款和对他的宗主权的承认;然而在这个共和国的降书上,他却塞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他成了它的最高裁判者和立法者。接着,他又在诺夫哥罗德煽动象在佛罗伦萨一样激烈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和³²⁰。他利用平民的一些抱怨为借口再度进驻该城,并把他深知对他心怀敌意的那些贵族戴上镣铐押送到莫斯科,这就破坏了这个共和国古来的法律,即“任何公民均不得在本国领域之外加以审讯或判刑”。从这个时刻起,他就成了最高的主宰者。编年史家说:“自从柳里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基辅和弗拉基米尔的大公们从没有见过诺夫哥罗德人把他们当作法官那样来服从。只有伊万才能使诺夫哥罗德屈辱到这种地步。”伊万花了七年功夫,运用他的司法权威来败坏这个共和国。然后,当他发觉它的力量已经消耗净尽时,他认为显露真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摘下他节制的假面具,他却需要由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破坏和平。正象他原来假装平心静气一样,现在他又假装怒不可遏。他收买了这个共和国的一个使节在一次公开接见时称他为君主,接着就立即要求享有一个专制君主的全部权利——共和国自行消灭³²¹。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诺夫哥罗德以起义、屠杀贵族和投降立陶宛来回答他的篡夺。这时,这位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人就以义愤填膺的声调和姿态抱怨说,“是诺夫哥罗德人请求他作他们的君主的;而当他顺从他们的愿望,终于接受了这一称号时,他们又拒绝承认他,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当着全俄罗斯的面公然斥

责他撒谎；他们胆敢杀害那些仍然忠贞不渝的同胞，胆敢背叛上天和俄罗斯人的神圣土地把异教和外国统治引进国内。”正象他在第一次进攻诺夫哥罗德后曾公开联合平民反对贵族一样，现在他与贵族密谋反对平民。他以莫斯科公国及其封邑的联合力量进攻这个共和国。当它拒绝无条件投降时，他就求助于鞑靼人以恐怖制胜的老办法。整整一个月之内，他把诺夫哥罗德越困越紧，在它周围大肆烧杀劫掠，同时悬刃以待，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被派系弄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经历了疯狂的绝望、沉沦的沮丧和听天由命的各个阶段。诺夫哥罗德被奴役了。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也都一样。

看看伊万是怎样抓住这一胜利的时机铸造武器来反对那些被用来取得这场胜利的工具，是很有意思的。他把诺夫哥罗德教会领地同王权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收买大贵族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王公；并且获得了赏赐大贵族的随从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大贵族。至今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公国也象现代俄国一样，始终是怎样煞费苦心地来搞掉各个共和国。首当其冲的是诺夫哥罗德及其拓殖地区，随后是哥萨克人的共和国³²²，最后轮到波兰。要了解俄国对波兰的并吞，就必须研究自1478年至1528年诺夫哥罗德如何被搞掉的情况。

看来，伊万夺下蒙古人禁锢莫斯科公国的锁链，仅仅是为了用它来束缚俄罗斯各共和国。看来，他奴役这些共和国，只是为了使俄罗斯王公们共和化。在二十三年当中，他承认他们的独立，容忍他们的吵闹，甚至屈从于他们的凌辱。可是由于金帐汗国瓦解和一些共和国覆灭，他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王公们又由于这个莫斯科公国人对他们的大贵族们施加的影响而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以致于伊万这方面只消显示一下力量就足以决定这

场斗争了。然而在一开始，他仍旧没有背离他的谨慎小心的办法。他挑出俄罗斯封邑中力量最强的特维尔王公作为他行动的第一个目标。他先是迫使特维尔王公采取攻势并同立陶宛结盟，然后斥责他是卖国贼，然后恐吓他作出一系列破坏自己防御手段的让步，然后又用这些让步给他造成的被自己臣民误解的情况作文章，然后再让这一套办法自行得出它的结果。事情就以特维尔王公放弃斗争并逃入立陶宛而告结束。特维尔一与莫斯科公国合并，伊万就以吓人的精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计划。其他的王公几乎毫无抵抗就被贬黜为单纯的地方长官。这时还剩下伊万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被说服放弃了封土；另一个受假惺惺表示的兄弟情意之骗，被诱入宫廷和解除戒备，遭到了杀害。

我们现在就谈到伊万的最后一次大斗争——同立陶宛的斗争。这场斗争从他即位时开始，直到他死前几年才结束。在三十年期间，他把这场斗争局限于外交战，制造并扩大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内部纠纷，拉拢对立陶宛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它的仇人起来反对它而使它瘫痪；他们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匈牙利的马特维·科尔文，特别是他通过联姻笼络住的摩尔达维亚大公斯特凡，最后还有芒吉-吉雷，这个人不论是反对立陶宛还是反对金帐汗国都是同样有力的工具。然而在卡齐米尔国王去世和软弱的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立陶宛和波兰的王位暂时分离了；这两个国家在争斗中两败俱伤；波兰贵族由于只顾去削弱王权，压低克梅通³²³和市民的地位，就抛弃了立陶宛，使它在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和芒吉-吉雷的同时入侵面前只好退却；于是，立陶宛的弱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时候伊万明白显示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这方面进行一次成功的快速行动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但他仍然局限

于进行一次戏剧性的作战演习——集结压倒优势的兵力。事情完全如他所料,佯装的作战欲望就足以使立陶宛投降了。他强订条约,迫使承认他在卡齐米尔国王在位期间偷偷蚕食的地方,同时还逼亚历山大和他结盟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他用这个结盟禁止亚历山大防范自己岳父所发动的进攻,他用他的女儿在不容异端的天主教国王和受迫害的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之间,燃起了宗教战争之火。在这场大混乱之中他才终于斗胆拔出剑来,夺取了受立陶宛统治的俄罗斯封土,远达基辅和斯摩棱斯克。

一般来说,希腊正教是他最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之一。但是要对付拜占廷的遗产提出要求,要以拜占廷皇帝后裔的外衣来掩盖他那蒙古奴才的烙印,要把莫斯科公国的暴发户王位和圣弗拉基米尔的光辉帝国联系起来,要使他成为希腊正教新的世俗首脑,伊万在全世界应该把谁挑出来呢?罗马教皇。在教皇的教廷里住着拜占廷的末代公主³¹⁴。伊万以宣誓叛教的办法从教皇那里拐走了她,——而他又命令他自己的都主教豁免了他的这次宣誓。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来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伊万·卡利塔这个蒙古人的奴才,是靠运用他的最大敌人即那个鞑靼人的威力来反对他的次要敌人俄罗斯的王公们,从而获得他的权威的。但除非采取欺诈手段,他就不能运用那个鞑靼人的威力。他在主子面前不得不隐蔽自己实际积聚的力量,而又必须向和他一样的奴才们炫耀自己并没有掌握的那种威力。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他就得把最卑贱的奴才的全部阴谋诡计整理成一套体系,并且以奴才的那种耐心的辛勤去实现这套体

系。公开的力量本身只有作为一种阴谋才能加入到一套阴谋、腐蚀和暗中篡权的体系中来。他不先施毒，就无法进行打击。目的单一性在他那里变成了行动的两面性。狡诈地使用敌对的力量来扩大自己，通过对那种力量的使用本身来削弱它，最后通过它本身产生的效果来推翻它——伊万·卡利塔的这一政策是由统治种族和被奴役种族二者的特性所激发出来的。他的政策也就成了伊万三世的政策。

这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不管被使用的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但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广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靠仅仅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为现代俄国的。

总结一下。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

六

斯拉夫族的一个特点会使任何观察家惊讶，几乎到处他们都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白海海岸。斯拉夫人不管在哪里到达海边，如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一部分地方，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服从外族的统治。俄罗斯人民分享了斯拉夫族的这一共同的命运。他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德涅泊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彼得堡现在所在之处是过去一千年来芬兰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纷争的场所。从默麦尔³²⁴附近的波兰根到托尔尼欧³²⁵的其余全部海岸，从阿克罗曼³²⁶到列杜特-卡列³²⁷的全部黑海海岸是后来才被征服的。而且，好象为了证明斯拉夫人的抗海特性，在这全部海岸线中，波罗的海海岸没有哪一部分实际属于俄罗斯人，黑海东岸的切尔克西亚³²⁸和明格列里亚³²⁹也是如此，只有白海海岸适合耕种的部分，黑海北岸某一部分和阿速夫海岸一部分实际上居住着俄罗斯人，然而尽管他们处新的环境中，他们仍不从事航海生涯，而是固执地坚守他们祖辈流浪汉的传统。

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辩驳之词被铭刻在他的传记的扉页上。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³³⁰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他对瑞典作战²⁶¹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府作战²⁸²是为了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³³¹是为了征服里海。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

曾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或者能够在彼得大帝原有的帝国所处的那样一种内陆地位中生存；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甘心看着自己的海岸和河流入海口被人夺走；俄罗斯既不能让顿河、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入海口以及刻赤海峡³³²留在靠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鞑靼人手中，也不能让涅瓦河口这个俄罗斯北部物产的天然出海口留在瑞典人手里；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实：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

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科迁往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³³³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服(这项工作直到一八一九年征服芬兰之后才完成)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从一开始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而现在，在俄属波兰构筑的工事只不过是执行这同一思想的进一步措施而已。莫德林、华沙、伊万城³³⁴不仅是旨在钳制一个反叛国家的要塞，它们对西方构成威胁，正与百年前彼得堡直接对北方构成威胁一样。它们是要使俄国变成泛斯拉夫国，正如波罗的海诸省过去要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俄国一样。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

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一把波罗的海诸省攫取到手，就立即掌握了实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手段。这些省份不仅给他提供了外交官和将领，即借以推行他那一套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才，同时还向他供应了大批官僚、教师和军训教官，以便训练俄罗斯人，给他们涂上那样一层文明的色泽，使他们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

无论阿速夫海、黑海或里海都不能为彼得打开这条直接通往欧洲的通道。此外，还在他在世的时候，塔干罗格、阿速夫³³⁵、黑海，连同那里新建的俄国舰队、港口和码头，都重新被放弃或是丢给了土耳其人。征服波斯之役³³¹，也证明是一次不成熟的行动。在构成彼得大帝全部军事生涯的四次战争中，他的第一次战争，即

对土耳其的战争³³⁰（这次战争的成果在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²⁸²中丧失了），一方面，固然是对鞑靼人的传统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它只不过是瑞典战争的序幕。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对瑞典战争的插曲，而对波斯的战争则是对瑞典战争的尾声。就是这样，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对瑞典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大帝的全部军事生涯。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彼得大帝的战争”。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

现在，假定我们对于他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各种行动的详情一无所知。单是莫斯科公国之变成俄国是由于它从一个半亚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而实现的这一事实，难道不足以促使我们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吗？即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一个也扼守着波罗的海门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在那里保持着最高主宰者姿态的海上强国——必定曾经插手过这一巨大的变化，必定曾经是彼得大帝各项计划的主要支柱或者主要障碍，必定曾经在瑞典和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和殊死的斗争中左右过局势，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竭尽全力去挽救瑞典人，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曾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扶持过俄国人。然而，在通常所谓的历史中，英国几乎没有在这场大戏的前台抛头露面，它被描写为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演员。真实的历史将表明，金帐汗国³¹¹诸汗之有助于实现伊万三世及其先人的计划，并不超过英国统治者之有助于实现彼得一世及其后人的计划。

我们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是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英国人写的，它们全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者们那种共同的幻觉。它们断然把英国叫作俄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现在我们将简要地加以剖析，并

用以结束这篇外交内幕导言的小册子，就持同样的立场。它的书名是《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等等。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²⁸⁹。

我们重印的前面两本小册子，用一位崇拜俄国的现代人的话说，是在“彼得统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方列强的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上游弋，而这些舰队以在他号令之下航行为荣”的时候或者比这稍晚一些的时候写成的。可是，到《真理才是真理》出版的1719年，事态似乎完全变了。这时候，查理十二已经去世，英国政府装出与瑞立场在一边并对俄国作战的样子。还有一些与这本匿名小册子有关联的情况也值得特别注意。这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份报告的撮要，而这份报告是作者在1715年8月从俄国回国后，奉乔治一世之命编写并提交给当时的国务大臣唐森子爵的。

“现在，——作者写道——我不期而有幸能够在这里承认我曾经是第一人如此幸运地预见到，或者说，如此直言不讳地警告过我国宫廷：我国当时绝对需要与沙皇决裂，并把他重新逐出波罗的海。”“我的报告曾揭示沙皇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德意志帝国²⁸⁵所抱的目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一个内陆大国，但是，沙皇曾经建议它兼并利沃尼亚²⁷⁸，使它成为选侯国，以便沙皇至少也能够被接纳为一个选侯。我的报告也曾提请人们注意沙皇当时盘算采用专制君主的称号。由于他是希腊教会的首脑，他也会被其他君主们承认为希腊帝国的首脑。我不想说我们会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已经让一位大使用皇帝陛下的称号称呼他，而瑞典还从来没有屈就到这一步。”

这位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供职于英国驻俄国大使馆。据他说，他后来“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沙皇获悉：

“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了本书所述的报告。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诉诸国王，并请唐森子爵作证，唐森子爵曾亲耳听到国王陛下说过我是无辜的。”“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不断地乞求偿付一笔拖欠已久的债款，这笔债款的绝大部分是为执行已故的女王陛下委予的一项使命而

借下的。”

至于斯坦霍普内阁突然采取的反俄国的态度，这位作者对之颇表怀疑。

“我并不打算通过本文来打消公众给予内阁所应得的赞扬，但是内阁应该就下述问题对我们作出满意的说明，即内阁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在每一件事情上折磨瑞典人，尽管他们在过去完全和现在一样是我们的盟友，内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竭尽全力来加强沙皇，尽管沙皇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约束而仅仅存在着友好关系。……在我写到这里时刻，我获悉，不到三年之前曾经让俄国人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就以皇家海军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的那位绅士，现在又一次得到目前执政的人们的授权，要与沙皇在这些海域上第二度会晤了；这是出于什么理由，或是为了达到什么良好目的呢？”

这里暗指的那位绅士是海军上将诺里斯，他攻打彼得一世的海战的海战役看来的确象是纳皮尔海军上将和邓达斯海军上将最近指挥的几次海战所遵循的原型。

把波罗的海诸省归还给瑞典，这既是大不列颠的政治利益所要求的，也是大不列颠的商业利益所要求的。这就是这位作者论证的要旨：

“贸易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船队仰赖于造船材料，正如生命仰赖于食物一样。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充其量不过是赚钱的贸易，而我们与北方进行的贸易则是绝对必不可缺的，并且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大不列颠的神圣通道，因为它是大不列颠最主要的对外通道，无论对于支撑我国全部贸易还是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安全来说都是如此。正象羊毛制品和矿产品是大不列颠的大宗商品一样，造船材料是俄国的大宗商品，也是沙皇最近从瑞典国王那里夺取的所有那些波罗的海省份的大宗商品。由于那些省份已归沙皇所有，帕尔努³³⁶完全荒芜了。在列维里，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英国商人，以前在纳尔瓦的全部贸易现在已经转到彼得堡……过去，瑞典人永

过也不能够垄断我国臣民的贸易,因为那些海港在瑞典人手中只不过是商品转口的通道,而生产和制造这些商品的地区则位于那些港口的背后,在沙皇的领土上。可是,如果把这些波罗的海港口丢给沙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通道,而会变成沙皇自己统治下的内陆地区的专门货物堆栈了。沙皇在白海已经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让他在波罗的海再有任何一个海港,那就等于把控制欧洲所有造船材料总库的两把钥匙都交给他掌握,因为大家都知道,丹麦人、瑞典人、波兰人、普鲁士人在他们一些领土上只不过生产那些商品中的某些单项而已。如果沙皇把‘我们不可或缺的材料供应’就这样垄断起来,那么我们的船队会怎样呢?此外,说实在的,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全部贸易的保障又在哪儿呢?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商业利益要求把沙皇赶出波罗的海,那么,“我们国家的利益就应该象马刺一样,驱使我们加紧这一努力。所谓我们国家的利益,照我的理解,既不是指一个内阁的党派措施,也不是指一个宫廷的任何对外政策的动机,而正好是指那种今天是而且永远应该是同维护国王的安全、舒适、尊严和收益以及大不列颠的公共福利直接有关的事情。”至于说到波罗的海,“自从我们取得制海权的最初时刻起”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就是:第一,防止任何新的海上强国在那里崛起;第二,保持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均势。

“显示我们当时的真正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的一个例证,是1617年的斯托尔波沃和约³³⁷。詹姆斯一世是这个和约的调停人,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它当时占有的全部波罗的海省份,而成为欧洲这一边的一个完全内陆强国。”

瑞典和丹麦同样是根据防止波罗的海兴起一个新的海上强国的政策行事。

“谁不知道,皇帝想在波美拉尼亚³³⁸取得一个海港的企图,曾和任何别

指斐迪南二世。——译者注

的动机一样促使伟大的古斯塔夫甚至举兵深入奥地利皇室领域的腹地。在查理·古斯塔夫的时候,波兰除了在当时是北方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在波罗的海拥有一长条海岸和若干港口。但是,波兰国王的遭遇又如何呢?丹麦人当时虽然和波兰结盟,然而即使是波兰人为了援助他们反对瑞典而要在波罗的海拥有一支舰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波兰船只,都加以摧毁。”

至于在已确立海上地位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保持均势的问题,英国政策的传统同样是清楚的。“当瑞典的势力有粉碎丹麦之势而令我们感到有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荣誉就是靠恢复当时失去平衡的均势而保持下来的。

英吉利共和国³³⁹向波罗的海派出了一支分舰队,导致了1658年的罗斯基勒条约²⁹⁸。这一条约后来又在哥本哈根得到进一步确认(1660年)²⁹⁹。丹麦人在国王威廉三世时期点燃的星星之火,同样迅速地被乔治·罗克通过订立哥本哈根条约扑灭了。

传统的英国政策就是这样。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要找出那种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构成波罗的海的更公正的均势……是谁采取了这种与王牌城市泰尔³⁴⁰作对的主意呢(这个城市的商人都是王公,它出海经商的人在全球备受尊重)?但是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所以,除了不打算对事实公开表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对我发怒。后代将有点难于相信,这居然是现在掌权的某些人干出来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出力,不要沙皇担任任何风险,给沙皇打开了圣彼得堡的大门……”

万全的政策将是回到斯托尔波沃条约,不让俄国人继续“在波罗的海落脚”。然而,可以说,“由于我们在比较易于做到的时候不抑制俄国势力的滋长,在目前情况下将难以恢复我们已经失掉的优势了”。可以认为,更合乎时宜的将是一条中间路线。

“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俄国人拥有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从而在欧洲

所有君主中有了一个能够通过向国外市场运销产品而使他最受惠的地区，——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同我国的利益是协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有理由期望沙皇陛下，就他那一方面而言，不再谋求任何能够扰害别人的东西，只满足于拥有商船而不要求任何军舰，以报答我们如此迁就他的利益和改善他的国家的处境。”

“所以，我们应该消除他想超出内陆大国的希望，”但是，“也应驳斥种种说我们对待沙皇比对待任何别的君主更坏的指责。为此，我不准备举热那亚共和国或者在波罗的海这里的另一个国度库尔兰公国³⁴¹作例子。但是，我要举出波兰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现在虽然都有加冕的国王，然而也都满足于享有开放贸易的自由，而不坚持要有一支舰队。我还要举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法尔奇乌条约²⁸²，根据这一条约，彼得不仅被迫归还了阿速夫，放弃了他在那些地方的全部军舰，而且只得满足于在黑海仅仅享有通商自由。即使只给他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供贸易之用，也大大超过了还在不久前他与瑞典的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道义上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

如果沙皇拒不同意这样一种“补救性的折衷方案”，我们“感到惋惜的就只是我们贻误了时机，未能运用上帝曾使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迫使沙皇接受一项有利于大不列颠的和约”。战争将不可避免。在那种情况下，

“就应该既鼓励我们的内阁执行它的目前措施，也激发每一个忠实的不列颠人的满腔怒火：俄国的一个沙皇，多亏我们的指教才掌握了他的航海技能，多亏我们的容忍才建立了他的赫赫功绩，居然转瞬之间就拒绝大不列颠提出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他在短短数年前还曾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欣然接受过。”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让瑞典收复俄国人从波罗的海之王那里抢走的那些省份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自从大不列颠“把俄国扶植成为那里的一个海上大国以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那个海上的均势了……如果我们履行了威廉国王和瑞典国王缔结的联盟的各项条款的话，那个英勇的国度早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得足以阻挡沙皇来到波罗的海的屏障了……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内阁的首要目的。”

卡 · 马克思

普鲁士（“军事国家”）

（见施泰因）³⁴²

$$\begin{array}{r} 1320 \quad 1417 \\ - 1142 - 1320 \\ \hline 178 \quad 97^{343} \end{array}$$

第一个时期。1142年（冯·巴伦施太德伯爵，阿尔布雷希特·熊）。

北马尔克。

1133年。洛塔尔皇帝（1125—1137年）把北马尔克交给奥托伯爵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冯·巴伦施太德伯爵。萨克森公国就是赐给奥托伯爵的。³⁴⁴

第二个时期。巴伦施太德家族的封疆伯爵。1142—1320年。

他们主要是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力图摆脱封地从属关系。他们在—百七十八年中没有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个时期。巴伐利亚和卢森堡。1320—1417年。³⁴⁵

西吉斯蒙德皇帝（波希米亚国王，出身卢森堡家族）1141年任命借给他钱的纽伦堡城官弗里德里

在后来的九十七年（1320—1417年）中，他们的历史的特点是，无论巴伐利亚家

希第六为总督，1415年在弗里德里希又借给他巨款之后，任命弗里德里希为勃兰登堡马尔克的君主。此后，紧接着隆重的任命又于1417年授以神圣罗马帝国财政总长和选侯的封号。

族还是卢森堡家族都同样拒绝当旧马尔克的占有者的福分。

霍亨索伦 1411年被任命为马尔克的大总督和统治者。（1411年）。（1415年）从西吉斯蒙德那里买到勃兰登堡封疆伯爵领地。条件是：（1415年）必须承认和保留卢森堡家族有权用四十万金盾购买勃兰登堡马尔克以及选侯的封号。

第四个时期。霍亨索伦家族。从1417年到现在

第一阶段。1417—1535年（从弗里德里希第一到宗教改革）。

1413—1417年。城官的军队对统治马尔克的骑士强盗（契特人、普特利特人等）的斗争。1414—1418年。博登湖畔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在这次会

购买封疆伯爵领地。为此目的利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³⁴⁶。

北马尔克。——编者注
纽伦堡城官弗里德里希第六。——编者注

议上弗里德里希第一使用新贷款从西吉斯蒙德那里买到新的特权等等。1415年4月30日，西吉斯蒙德赐予弗里德里希以勃兰登堡封疆伯爵、罗马帝国财政总长、选侯等世袭封号。1417年4月18日，西吉斯蒙德又在宗教会议上赐给弗里德里希封地，并放弃关于购买的附带条件。（1415年弗里德里希答应每次选举皇帝时投卢森堡家族的票）。1419年波希米亚国王温采尔去世。他的弟兄西吉斯蒙德皇帝提出对波希米亚王位的权利；1420年他要求王位。

以瑞日卡为首的胡斯派占领布拉格，把皇帝部队赶出波希米亚。在以后各次战役中，由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多次担任总司令的皇帝部队蒙受了这样的耻辱，1432年胡斯派越过马尔克境界，推进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并继续前进到贝尔瑙，在那里他们终于被击溃，被迫退却。1432年或大约这个时期举行巴塞尔宗教会议³⁴⁷。这时，领土遭到蹂躏，弗里德里希坚持向胡斯派让步（胡斯派从此与塔博尔派分开）。为了使他的国家不致遭受进一步的蹂躏，难免要同波希米亚签订特别和约。

1436年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终于签订了和约³⁴⁸。同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萨克森-劳恩堡的公爵们斗争。（勃兰登堡同汉堡和卢卑克缔结同盟

勃兰登堡选侯的第一次大战；反对宗教自由。（胡斯派和塔博尔派。）

勃兰登堡难免要签订“单独和约”。

手稿中马克思在“特别”（“besondern”）一词上面写了“单独”（“Separat”）一词。——编者注

。)从波美拉尼亚夺取乌凯马尔克等。1440年9月21日去世。

1440年铁人弗里德希第二。(非常软弱的人，伪君子，但经常穿着铠甲。)

建立天鹅骑士团。

弗里德里希第一已经利用城市，以粉碎贵族的抵抗。可是现在发了财的城市变得顽强了。弗里德里希第一赐给它们自治特权。后来市政局中的望族成员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公社之间展开斗争。

在弗里德里希第二统治的最初年代斯普累河畔科恩和柏林之间的纠纷，它们在这以前是由总市政局管辖；各公社要求与选侯断绝这种联系。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科恩和柏林的居民举行公开起义，反对他们的市政局。后者在选侯那里得到解救，把城市的钥匙交给了他，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弗里德里希把自己的市政局交给每个城市。

市长的选举取决于选侯。市民造反。暴力镇压起义。市民丧失许多特权。

他们被迫同意把在科恩多米尼加修道院附近修建城堡的地方让给选侯。不久开始动工的建筑工程经常被市民中断，大约在1448年才完工。1451年弗里德里希第二住进新城堡。“如果选侯不同许多北方大国，特别是同丹麦结成更亲密的同盟，来防止马尔克的许多城市加入汉撒同盟²⁹⁴的危险企图，那么要顽强的城市听命于选侯看来就

不那么容易。”

1455 年用十万盾从现在已经

精疲力竭的条顿骑士团那里赎回新马尔克³⁴⁹。

到弗里德里希第一去世时，国土为381平方英里，到弗里德里希第二退位时为572平方英里。

1470 年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第二的弟弟）（阿基里斯）时为 602 平方英里。

1486 年，约翰·西塞罗。通过购买措森领地而扩大面积 6 平方英里。

1499 年，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星象学家。迫害犹太人。比较强烈地反对宗教改革。1535 年去世。国土：641 平方英里。

约阿希姆的法兰克尼亚系表弟阿尔布雷希特亲王成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1525 年接受新教后，把 [他的领地] 变为世俗公国。³⁵⁰

第二阶段。1535—1640 年。

1535 年。约阿希姆第二 1571 年去世（其弟约翰——新马尔克的封疆伯爵）。起初不赞成天主教派，但也不参加施马尔卡尔登联盟³⁵¹。暗中准备国内宗教改革。“他甚至命令天主教牧师起草施行新教义的方案。”

1539 年 11 月 1 日在施潘道公开转到新教方面。

1541 年。施行新的教会规章。勃兰登堡马尔克的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学院世俗化。“签订著名的

第二次购买。购买新马尔克。

（纽沙特尔——14 平方英里）。整个普鲁士——5062 平方英里。

第三次购买。

继承的诡计。

阿基里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编者注
约翰第二。——编者注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³⁵²之后，教会改革给帝国诸侯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帝国国会确定每个诸侯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取得主教的权利。这种权利对勃兰登堡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开创了逐步建立主教领地和王国联系的可靠前景。”

1545年。针对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员要求拿起武器保卫受到皇帝威胁的宗教事业，他不仅拒绝这一要求，而且企图促使联盟的领袖们同皇帝和解。

此后不久就爆发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这时约阿希姆本人站在一切党派之外，但不直接放弃他对皇帝的援助。

1568年，从波兰议会那里得到普鲁士公国作为共有封地。约阿希姆第二还参加了Interim（决定是1548年在奥格斯堡通过的³⁵³。在这之后，皇帝说明了特里延特世界宗教会议结束之前应如何对待宗教）。³⁵⁴

约阿希姆第二陷于严重的“财政困难”。在他统治时期，那些借给他许多钱的犹太人返回。

1571年，约翰·乔治。迫害犹太人。驱赶犹太人。狂热的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的压迫者。他为自己家族的未来发展作准备

一方面通过向自己家族中的幼系分封大量教会领地的办法，而

另一方面通过 1594年其孙子约翰·西吉斯蒙德

与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儿（同时是幽里希-克列维领地的继承者）结婚的办法。

1598—1608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

1598年根据所谓的赫拉王朝条约第一次规定勃兰登堡选侯国领土的不可分割。

通过把勃兰登堡、哈斐尔贝格和莱布斯的
主教土地世俗化的办法来偿付债务。

疯子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
1618年去世。

1605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要了许多
阴谋为自己和自己家族取得对普鲁士公国的
监护，而且还利用公爵的封号和称号取
得对国家的统治。他通过他在波兰宫廷中
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不惜力量和金钱来保
证他在普鲁士的王位继承权。

1525年接受新教的阿尔布雷希特也是波兰国
王西吉斯蒙德的侄儿。条约规定骑士团国家变为
对波兰王国保持封地从属关系的世俗公国，1525
年4月8日。——这个阿尔布雷希特属于法兰克
尼亚-勃兰登堡一系。——

在这项条约中没有关于勃兰登堡选侯可以
提出对普鲁士的统治权的任何暗示。约阿

安娜。——编者注

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

希姆第二和波兰公主结婚；只是在他不得不首先使卖身投靠的波兰议会遭受重大牺牲之后，只是在长期困难的谈判之后，他恰好在赏赐封地给青年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时刻得到勃兰登堡选侯家族对普鲁士的继承权的保证。

(1571年)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公爵发了疯；因此，统治权转到他最近的男系亲属波兰尼亚-勃兰登堡一系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封疆伯爵手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孩子当中，两个儿子已经死去，只剩下两个女儿。执政的乔治-弗里德里希没有孩子。约翰-西吉斯蒙德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两个女儿中的长女安娜结婚，而他的生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同妹妹爱琳娜结婚。

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长女安娜订婚(1591年)后不久，约翰-西吉斯蒙德就企图达到把普鲁士作为封地交给他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遇到普鲁士贵族支持的波兰给他造成的极大困难。约翰-西吉斯蒙德不得不采用“各种诡计”；但是他只是从他父亲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被任命为疯子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监护人，

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编者注
亚德维加。——编者注

以及摄政王和国家执政者的时候起才有了希望。

他死后封号传给了儿子。

1608—1619年。约翰·西吉斯蒙德。他终于取得对代表波兰王国权利的这一派的优势，这样一来，1609年无论监护权还是公

国统治权都转到了他的手里。

1611年慎重其事地把普鲁士作为封地转交出去。³⁵⁵在疯子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逝世时（1618年），普鲁士公国终于同勃兰登堡

选侯国合并。

约翰·西吉斯蒙德对幽里希·克列维土地的诈骗。他通过自己的妻子安娜得到了对这块土地的权利。

约翰·西吉斯蒙德转而投向革新（加尔文派）教会的怀抱（1613年）。从这时起，幽里希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地成为战场。在战争进程中侵入这块土地的一方是站在纽堡的领主方面为天主教联盟利益作战的西班牙人，而另一方是为属于新教同盟³⁵⁶的

勃兰登堡利益而战的荷兰人。

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个地方成为敌对各方心目中的一块肥肉；甚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³⁰⁰也没有使斗争结束，而只是1666年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纽堡之间在克列维签订的条约才使斗

争结束。根据这项条约，敌对各方瓜分了土地。

1678年，这项条约由皇帝批准。

1619—1640年。乔治·威廉（他的

受托人——

亚当·冯·施瓦尔岑堡伯爵）。乔治·威廉经常公然声称，在普遍的争斗面前他打算保持中立。自1625年起，各马尔克遭到可怕的洗劫，一部分是同盟部队干的，一部分是皇帝部队干的；

在瑞典和波兰战争³⁵⁷期间，普鲁士也遭到这样的命运。

乔治·威廉是冷静的观察者。

1629年，皇帝的归还敕令。³⁵⁸（同年波兰把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让给瑞典。）

163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的沿岸登陆；乔治·威廉犹豫不决：“尽管皇帝的部队干出了难以形容的兽行，但是恐惧和胆怯使他不能公开同皇帝决裂”。还有施瓦尔岑堡。古斯塔夫·阿道夫同波美拉尼亚·施特廷公爵博古斯瓦夫、黑森-加塞尔邦的邦伯以及马格德堡城结盟。“在乔治·威廉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同时，被蒂利包围的马格德堡向古斯塔夫·阿道夫求援。后者答应急速去解救马格德堡，但是，为了保证胜利并掩护自己的后方，要求将施潘道和尤斯特林要塞（暂时）让出。”

乔治·威廉支吾搪塞；只是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威胁要动用武力之后才同意。

哈布斯堡·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威廉五世。——编者注

（马格德堡于 1631 年 5 月 20 日陷落）。

1632 年 11 月 6 日，吕特岑会战。古斯塔夫 - 阿道夫阵亡。

1635 年，勃兰登堡脱离瑞典，同奥地利签订单独和约，以换取皇帝 承担义务废除归还敕令，保证勃兰登堡帝侯将来得到波美拉尼亚领地，并且批准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黑森签订的关于相互继承的条约。从这时起，瑞典反对勃兰登堡。后者于 1636 年 9 月 24 日被瑞典巴纳将军击溃。

1637 年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古斯瓦夫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裔。瑞典人立即占领波美拉尼亚。皇帝部队和萨克森部队援助勃兰登堡。在波美拉尼亚的斗争，瑞典人获胜。这时瑞典人进攻选侯国本身。乔治 - 威廉 1640 年 11 月 20 日去世。瑞典人要求得到波美拉尼亚，对这块土地，巴伦施太德家族“和乔治 - 威廉的祖先早已经常垂涎三尺”。

第三阶段。1640—1786 年。（从所谓“大选侯 ” 到弗里德里希二世）。

1640—1688 年。弗里德里希 - 威廉（大选侯！！）（他的妻子是出身拿骚 - 奥伦治家族的路易莎 - 罕丽达公主）。当时国土已有 1444 平方英里，但是大部分国土在敌人手里。

弗里德里希 - 威廉决定暂时支持瑞典人。

1641 年 7 月 14 日，同瑞典人停战，结果是，除了某些城市，马尔克选侯国几乎全部让出。同年波兰把普鲁士公国作为封地交出，条件是：弗里德里希 - 威廉将每年付给波兰十三万盾并经常向

三十年战争中的单独和约。1635 年。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 - 威廉。——编者注

它提供援助。

根据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西波美拉尼亚和吕根、东波美拉尼亚的施特廷连同其他几座城市、弗里施湾和奥得河的三角洲归瑞典占有；而勃兰登堡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其余部分、以前的主教管区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卡明，而且在执政公爵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死后立即获得作为世袭公国的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

主教辖区卡明并不是波美拉尼亚的如此微不足道的部分；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辖区归勃兰登堡占有。

卡明的最后一位主教恩斯特·博古斯瓦夫为了一笔可观的钱款而放弃他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普鲁士的领土达 2046 平方英里，人口 150 万。

1654 年，普法尔茨伯爵查理·古斯塔夫即瑞典王位。他同波兰的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随机应变，当胜利在瑞典军队方面时，他同瑞典一起反对波兰；反之，他同波兰一起反对瑞典。

1657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从波兰那里取得对普鲁士的主权。³⁵⁹

1660 年——奥利瓦和约。³⁶⁰

1663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同东普鲁士各等级签订的条约有一条规定，不经国会允许禁止征税。

1673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无视这一

购买。

对普鲁士的主权。

条约，任意征税。

1672年，同法国的战争。1673年6月10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福森同法国签订条约。

1674年，路易十四对德意志帝国宣战。弗里德里希-威廉参战。年底瑞典人入侵马尔克。1675年6月18日——费尔贝林会战。

1678年——奥地利同法国签订和约，即尼姆韦根和约。³⁶¹瑞典人重新入侵普鲁士；他们被击败；路易十四入侵克列维，迫使普鲁士于1679年在勒河岸圣热尔门签订和约。只保证选侯占有波美拉尼亚的一小部分。³⁶²

1688—171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从1701年起，自称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

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除了批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勒河岸圣热尔门条约，普鲁士毫无所得。奥古斯特二世成为波兰国王以后，需要金钱。弗里德里希花三十万塔勒从他那里买到对城市和克韦德林堡修道院的守护官继承权，买到劳恩堡、泽文贝格和盖尔斯多夫三个区以及诺特豪森的帝国城市的审判权。

为获得国王的称号，弗里德里希三世收买皇帝（莱奥波德一世）的忏悔牧师耶稣教徒沃尔弗。而且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11月16日，根据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赐给了他这个称号。该条约规定他必须为奥地利提供军队反对法国等等。²⁶⁴

由于同奥伦治家族的亲属关系，普鲁士除别的收获外，还得到纽沙特尔和瓦兰王伯爵领地。“诺恩堡公国连同瓦兰王伯爵领地在中世纪时属于勃艮第王国，此外，它还是瑞士联邦的成员，后来

购买。

购买国王称号。

转归夏龙-奥伦治家族，后又根据瑞士人的倡议，再加上奥伦治王朝的封地权的保证，转归朗格维尔家族，最后由于这个家族没有男性后裔，又转归末代诸侯的姐妹、孀居的奈穆尔女公爵。当后者成为领土所有者时，威廉三世（奥伦治）反而把两块领土转交给自己的表兄弟弗里德里希一世。奈穆尔女公爵去世（1707年）后，弗里德里希一世提出自己的继承权，而因为还有其他诸侯家族同时提出他们有继承权，所以弗里德里希一世将这一问题提交诺恩堡三个等级的最高法院解决。后者承认了弗里德里希一世作为诺恩堡和瓦兰壬的统治者的权利。”

马策约夫斯基。³⁶³

1713—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根据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³⁶⁴，法国承认普鲁士对纽沙特尔和瓦兰壬的主权。³⁶⁵

1713年俄国人占领施特廷；他们将它转让给普鲁士人，不过后者必须付给俄国内阁和萨克森内阁四十万塔勒以补偿军费。弗里德里希-威廉把奥得与佩纳两河之间的西波美拉尼亚暂归国家管理，同时承认暂归国家管理的土地的中立。

购买。

弗里德里希-威廉以“和平”方式完成了这一步骤。

由于查理十二的 [行动]，他不得不于1714年向他宣战。

1720年1月21日斯德哥尔摩和约：普鲁士获得直到佩纳河的西波美拉尼亚、施特廷、乌泽多姆和沃林；普鲁士承担波美拉尼亚所负的总数达六十万塔勒的债务，此外付给瑞典二百万塔勒。这样一来，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归普鲁士占有。

购买。

1725年，普鲁士加入反对奥地利的汉诺威同

盟。³⁶⁶

1726年，普鲁士退出汉诺威同盟，1726年10月签订符斯特尔蒙森秘密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它应承认查理六世皇帝的国事诏书³⁶⁷等等。为此在普法尔茨-纽堡选侯家族的男系绝后的情况下，占有幽里希和贝尔格时皇帝将予以援助。

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逝世时，国土为2275平方英里，人口为250万。

1740—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

1763年胡贝尔茨堡和约。³⁶⁸弗里德里希得到西里西亚。

1764年9月7日，由俄国军队支持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当上波兰国王。

1775年8月5日，瓜分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签订关于瓜分的条约。）普鲁士得到西普鲁士（根据1466年托伦和约³⁶⁹，条顿骑士团把它让给波兰）。托伦、但泽以及所谓涅茨区的一部分除外。国土：3600平方英里，600万居民。

第四阶段。从1786年起等等。

1786—179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1788年，普鲁士军队进入荷兰支持世袭总督威廉五世（妹夫）对付爱国者。

1790年3月普鲁士和波兰的友好同盟条约。

1792年2月7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法柏林条约。

1795年4月5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单独（巴塞尔）和约。

1796年8月普鲁士和法国的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同意让出莱茵河左岸领地。

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³⁷⁰

1793年。

俄国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

瓜分的结果,普鲁士得到大波兰的大部分,但泽和托伦。

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

瓜分的结果,普鲁士又获得900平方英里。

1791年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无子女的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统治者把这两块地方让给普鲁士,换取终身租金。

国土:5250平方英里,850万居民。

1797—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中立。

1801年4月,普鲁士占领汉诺威选侯国。12月又把它放弃。

1802年5月普鲁士和法国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在酬谢德意志帝国诸侯时法国必须保证“应该归属普鲁士”的土地。占领它在1802年就已经让出的所有领土(作为对它的莱茵领地的报酬)。(关于交换和赔款的条约。)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之后,普鲁士人同波拿巴签订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人得到“汉诺威”作为报酬³⁷¹。

1806年10月14日,耶拿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维也纳会议结果——现在称作萨克森公国的省(460平方英里)和波兹南(536平方英里)、下莱茵大公国等等。为瑞典所属波美拉尼亚连同吕根岛,给瑞典³⁷²的补偿:是把劳恩堡让给丹麦和支付酬金。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6年11月

原文是德文

卡 · 马克思 威 尼 斯³⁷³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里雅斯特同它们有地中海贸易关系……）热那亚。十三世纪下半叶：热那亚人由于援助希腊人反对天主教国王而获得的特权非常可观（在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和彼腊——的特权）。³⁷⁴在这里对威尼斯人取得优势（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天主教国王给予威尼斯人优惠待遇，在达尔马威亚、摩里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叙利亚等地的贸易统治地位。

衰落的原因。从十五世纪初起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帝国，特别是 1453 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人一下子就失去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阿尔明尼亚、黑海等地的特权 and 海外商站。他们从苏丹那里取得在埃及的特权，等等。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印度商品的市场移到里斯本。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特别衰落。甚至美洲的发现对他们来说，也不如对其他国家那样有利，等等。自从君士坦丁堡不再是亚洲商品的贸易和运输的中心以后，威尼斯的事业就非常不稳固。

十八世纪末以后——法国的统治；对英国的战争；所有意大利沿海城市贸易的衰落。

1815 年和约仅仅恢复他们在法国革命前所拥有的贸易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贸易归的里雅斯特；奥地利政府给予它非常优

惠的待遇。从贸易的数量来说，的里雅斯特超过威尼斯两倍。黑海俄国港湾的繁荣，特别是敖德萨的繁荣对的里雅斯特特别有利，它独占了十八世纪末还是由威尼斯经营的粮食贸易。

——

的里雅斯特。(1838年)——1700户，52000居民；位于的里雅斯特湾；而且有陡峭的卡尔斯特山环绕；1000商人；700经纪人；有英国人的、法国人的、德国人的、希腊人的、阿尔明尼亚人的、犹太人的商号。

早在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³⁷⁰签订之前，拿破仑就结束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生命；米兰、曼都亚等地，维尔特林[盆地]，罗马尼亚等[归属]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直到艾契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土地同奥地利合并。

1801年2月9日吕内维尔和约：通经艾契河谷的大路成为奥地利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它[奥地利]得到威尼斯，以及属于前威尼斯共和国的直到艾契河谷的大部分[土地]，还有伊斯的利亚、威尼斯的达尔马威亚及其毗连的岛屿和卡塔罗[港]口。

1805年，9月26日。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把属于它的那部分威尼斯领土让给意大利。

1807年，10月10日。奥地利被迫将蒙泰法尔科内伯爵领地让给意大利³⁷⁵，于是，伊宗佐河谷就成了国界。

1809年10月14日维也纳和约：拿破仑以卡林西亚的弗拉赫区、克莱纳公国、的里雅斯特州、格尔茨伯爵领地、弗里乌利、自阜姆起沙瓦河右岸的克罗地亚、以及匈牙利沿海地区和奥地利的伊斯的利亚建成所谓伊利里亚的省份，将伊斯的利亚、达尔马威

亚和腊古扎合并于这些省份，把它们据为己有，交给一个特别总督管辖。

1844年以前的里雅斯特的贸易额

(按约定货币³⁷⁶计算):

1842—1843

进口 58400000	(汉堡, 1843年 总值 215500000)
出口 40500000	(哈佛尔, 1842年 总值 168700000)
<hr/>	
总计: 98900000	

奥地利航运业

(按佛罗伦计算, 约定铸币)

1840年1月1日	船只数	吨数
	1590	176696

奥地利的贸易

(单位: 百万)

海 外 贸 易	1838年		1841年		1842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通过阜姆	0.2	1.7	0.2	1.6	0.2	1.7
通过的里雅斯特	32.2	14.4	22.3	11.2	24.9	11.9
通过威尼斯	9.0	5.3	8.5	3.1	11.5	3.4
通过其他沿海城市	8.0	2.0	5.3	1.9	5.1	2.6
	49.4	23.4	36.3	17.8	41.7	19.6

1839年

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的贸易

威尼斯的进口和的里雅斯特的进口之比是 1 2 . 84

威尼斯的出口和的里雅斯特的出口之比是 1 3 . 8

的里雅斯特的贸易

(价值按佛罗伦计算, 约定铸币)

1832年		1836年		1840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57000000	44000000	77000000	54000000	49000000	37000000

的里雅斯特的船只周转

1835年		1836年		1837年		1838年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988	1069	1146	1117	1094	1132	1154	1118

1839年

到港的外国船只：

到的里雅斯特—— 1217	到威尼斯—— 271	到威尼斯的船只数和 到的里雅斯特的船只 数之比等于
奥地利的船只：		
到的里雅斯特—— 10375	到威尼斯—— 3147	

总计：	11592	3418
-----	-------	------

外国船只的吨数：	133343	20254
奥地利船只的吨数：	330404	196135
	463747	216389

按土耳其披亚斯特计算的价值
从 1835 年至 1839 年士每拿的进出口

进 口

英国居首位—— 126313146

(马尔他—— 2979040)

其次的星雅斯特—— 93500456

其次美国及其他—— 57329165

——

出 口

英国 —— 44618032

(马尔他 —— 3361185)

的里雅斯特—— 52477765

美国 —— 46608 320

——

埃及的进出口 (1837 年)

按法郎计算

	进口	出口
(1) 奥地利 (的里雅斯特)	13858000	14532000
(2) 土耳其	12661000	12150000
(3) 法国	10702000	11463000
(4) 英国和马尔他	15158000	5404000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
(第二篇文章)³⁷⁷

现代山地战的历史（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经进行了简短的评述）不容争辩地证明了：现代军队的机动能力给军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使其能在象瑞士那样的山国里克服或绕过阻碍他们前进的一切天然障碍。现在我们假定，在普鲁士国王和瑞士之间真的爆发了战争。瑞士人为了保卫本国的安全，除了依靠备受赞扬的“山地要塞”之外，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他防御手段。

在上述情况下，进攻瑞士的行动可能在从康斯坦茨沿莱茵河至巴塞尔一线开展，这时还必须把奥地利和法国看作是中立国，因为这两国中任何一国采取积极的干预，都会大大增强这一进攻的破坏力，以致对付这种进攻的任何战略计划都将是徒劳无益的。这样，我们假定只有北部边疆是便于入侵的。莱茵河是它的第一条防线，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障碍物。这条河，有七十英里的地段是可受到攻击的边界，而且不管河水有多深，流速有多快，这一带便于渡河的地点是相当多的。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从来没有为争夺这条河而认真地打过仗。的确，强大的进攻军队在长达七十英里的战线上，任何一条河都是可以渡过的。毫无疑问，在一切情况下，在突然把部队集中到真正准备渡河的各渡场之前，制

造某些虚假的紧张气氛和进行某种佯攻，必能获得成功。此外，架设在河上的几座石桥，瑞士人未必会把它们破坏到战时不能使用的程度。最后，位于莱茵河南岸的康斯坦茨，因为是德国的城市，对于普鲁士人来说则是从翼侧包围全线的合适的桥头堡。

但是，在莱茵河那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障碍，它在某种程度上使莱茵河更便于防守，正象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使多瑙河便于防守一样。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来自西南方的阿勒河和来自东南方的莱斯河与利马特河（后两者同阿勒河成直角）在布鲁格附近汇合，然后径直向北流往莱茵河，在上述汇合处下游大约十英里靠近科布伦茨的地方流入莱茵河（当然不应该把这一位于阿勒河和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同位于摩塞尔河和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要塞混为一谈）。这样，在布鲁格和莱茵河之间的阿勒河把莱茵河的谷地一分为二，进攻的军队如在科布伦茨的上游或下游渡过莱茵河，就会面对利马特河或阿勒河，也就是说，会再一次面对便于防守的河流。这样一来，由于阿勒河和利马特河（莱斯河对于利马特河一线来说，只是下一道强大的防线）的汇合而形成的向前突出的三角形地带是第二道重要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的翼侧左面（西面）有苏黎世湖、瓦伦施塔特湖、楚格湖和四州湖掩护³⁷⁸；而这些湖，在上述情况下，却没有一个是普鲁士军队敢渡过的。阿勒河和利马特河的阵地，由于进攻它们的任何军队的后方就是莱茵河，成了瑞士抵御来自北部的入侵的主要战略防线。假定瑞士人抗击了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获得胜利，并组织反攻，积极追击 [敌人]，那时，失败的军队在它们能够沿莱茵河上可能架设的几座桥梁退却之前，就会被驱散、击

瓦伦湖。——编者注

费尔瓦德施泰特湖。——编者注

溃、截断并消灭。

另一方面，如果阿勒河和利马特河下游一带被敌人顺利地通过了的话，那时，瑞士人该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应该再看看地形。大部队在高山地带的条件下不能生存，不能把自己主要的作战基地和军需仓库安置在那里。山区战局如果有大部队参加，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所以瑞士人绝不应考虑将大量兵力撤往高山地区，他们应该尽可能长久地扼守较平坦的地区，因为那里有拥有各种资源的城市和便于转运的道路。如果从罗尼河在维耳讷夫附近流入日内瓦湖的入口处到莱茵河在兰涅克附近流入康斯坦茨湖的入口处划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就把瑞士分成两部分，其中西北部（不算汝拉山脉）为下瑞士，东南部为上瑞士或高山地带的瑞士。由此可见，瑞士人的战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主力在坚守平原地区的每一寸国土的同时，将会沿苏黎世——伯尔尼——洛桑——日内瓦一线退却；而东南部的山区则留给那些可能被切断的部队，以及民军和进行游击活动的自由射手去保卫。阿勒河南侧同莱斯河及利马特河平行的所有支流都成了主力在退却线上的依托，而在伯尔尼附近阿勒河本身（其上游也是从东流向西北）也是如此。如果阿勒河上游被强行渡过，伯尔尼被占领，如果仅仅由山地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不能从东南部造成对普鲁士人后方的严重威胁而引起全线退却，从而重新占领下瑞士，那么瑞士人实际上就不存在任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了。不过，这样的方案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由此可见，瑞士人有几条有利的防线：第一条，阿勒河和利

马特河一线；其次，阿勒河和莱斯河一线；第三条，阿勒河和埃默河一线（且不说中间的一些阿勒河的较小支流）；第四条，阿勒河上游一线，[这个阵地]左翼的前面是一片从纽沙特尔湖延伸到该河的沼泽地。

进攻的战略和防御的战略一样都取决于地形。如果普鲁士人不得已让自己的主力在科布伦茨上游渡过莱茵河，并进攻利马特河畔的阵地，那么他们就得铤而走险；他们不仅仅必须去进攻1799年马森纳为抗击奥地利人和俄国人而十分成功地守卫过的阵地，而且，即使夺得这一阵地，他们也会发现，在五英里之后，沿莱斯河还有一道同样坚固的防线；然后，在两三英里或五英里之后，另一道山溪挡住他们的去路；直到最后，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停顿、战斗和损失之后，还会遇到瑞士人凭借埃默河构筑的阵地，而且这条河是一道几乎同利马特河一样严重的障碍。如果不考虑那些迫使普鲁士人在距法国边界相当大的距离上止步不前的政治原因（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全然没有涉及）的话，这条进攻路线当然是绝对错误的。通往瑞士的正确路线应是在巴塞尔和科布伦茨之间渡过莱茵河；或者，如果是部分部队不得不从科布伦茨上游渡过莱茵河的话，那就必须立即组织好在布鲁格和科布伦茨之间渡过阿勒河，以便把主力集中于这条河的左岸。直接沿阿勒河一线进攻，可以从翼侧包围利马特河和莱斯河，也可以从翼侧迂回阿勒河所有不大的南侧支流，直至埃默河。加之利马特河沿线阵地的宽度不大，这一线宜于进攻的正面，从苏黎世到布鲁格，不超过二十英里；可是，沿阿勒河一线从布鲁格到左洛图恩，可供进攻的正面却长达三十六英里，而且即使在左洛图恩上游对正面攻击也无任何防护。阵地的左翼，在左洛图恩和阿尔贝格之间，

是阵地的薄弱环节；如果阵地在这儿被突破，那么瑞士人不仅会丧失这条防线，而且同伯尔尼、洛桑和日内瓦的联系将被切断，因而他们下一步只能退向东南高山地区。

但是，这儿的防御有各种战术障碍物加以保障。人们溯阿勒河越向左洛图恩上行，汝拉山脉不高的山岭就越接近河流，它那独特的与阿勒河平行的纵向山谷妨碍军事行动的展开。这些山地障碍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然而，在这种条件下集中大部队往往需要被迫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十分复杂的机动，而这是任何一个将军所最不愿意做的，除非他对自己和他的部队非常相信。而这种品质在老普鲁士将军中已不那么常见了。可以肯定，在 1815 年之后，他们恐怕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他们大概不会冒险尝试类似的机动，而宁愿在两翼采取不彻底的应付办法，并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沿河一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 月 1 日和 10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对波斯战争³⁷⁹

—

波斯战争是帕麦斯顿勋爵大约在二十年前初次表演的军事外交悲剧³⁸⁰的重演。那时同现在一样，波斯对赫拉特的袭击是爆发战争的信号。那时同现在一样，子爵力图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以后，他又同意搞一个新玩意：他不仅妄想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而且要攻击喀布尔，或者不如说要攻击阿富汗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时打败波斯。我们看到，这次正是这个多斯特-穆罕默德充当了他的同盟者和战友，这是从前锡克教徒的领袖朗吉特·辛格扮演过的角色。自从朗吉特·辛格下台以后，就非常需要这样做，而从前曾由他管理的领土，已转到东方不列颠帝国的管辖之下。³⁸¹

因为帕麦斯顿喜欢照他自己的老办法办事，所以要懂得他如何重施故技，就有必要了解波斯冲突的最初的处理办法。

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也许不妨对阿富汗、波斯和英国目前的状况做一些绪论性的评述。

阿富汗的一些部落在各个时期曾遍布波斯和印度，后来波斯在纳迪尔-沙赫统治下不仅征服了阿富汗，而且胜利地扩张到德

里。³⁸² 纳迪尔·沙赫死后,在某个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的统治下,产生了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 曾为锡克教徒占领的所有土地。但是这个结合得很不牢固的王国同它的创建人一起完蛋了。在他死后,这个王国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分成各个自有其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为无休止的内讧所分裂,只有在共同面临和波斯发生冲突的威胁时才联合起来。

此外,在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这种政治对立的基础是随种种历史传统而来的民族差别,它的支撑是由于宗教对立而变得更加尖锐的边境纠纷和相互觊觎。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人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主要堡垒。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的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以俄国为敌。还在彼得大帝的时候,俄国就入侵过波斯。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强迫波斯接受古利斯坦条约³⁸³,夺去波斯十二个省份,即高加索山脉以南的现在属于俄国的全部领土。由于 1826—1827 年的战争和签订土库曼彻条约³⁸⁴,尼古拉又夺走了波斯许多地方,使它承担了巨大债务,并且剥夺(禁止)波斯船只在它自己的里海北岸航行的权利。这样一来,对过去领土被占的记忆,波斯现在不得不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阿富汗人这一方面,虽然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不断蓄谋破坏他们独立

接着手稿中划掉了“后来被侵占的”。——编者注

的宗教夙敌：第一是因为俄国惯于发动战争反对正统派国王；第二是因为不久前它发动了反对土尔克斯坦的战争。³⁸⁵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这两个民族既然把俄国看作自己的天然敌人，逻辑的力量就迫使他们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天然盟友。在英国和这些亚洲民族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冲突（敌对），然而既然英俄之间的斗争，是存在亚洲俄国和英属印度本身的结果，那么难道这种斗争不是必然的？因此，英国以低廉的代价在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那里受到欢迎，绝不是由于它的作为，而只是由于它在亚洲有领地这个事实。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盟友，因为英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敌人。

总之，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在波斯和阿富汗方面的政治状况更为有利和更容易控制了。两国形成一道把英属印度与俄国隔开来的天然屏障，而且无论这个或那个国家都不能成为危险，因为它们相互抑制的。如果波斯表现出不满，阿富汗就从前面威胁它；如果阿富汗变得不驯服，波斯则从后面威胁它。波斯从西面掩护印度；阿富汗不仅保护了位于同一方向的通向印度的咽喉要地开伯尔通道，而且在北面阻挡俄国人向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里是亚洲高原，对东方的统治总是取决于是否占有这些高原。1809年，阿富汗人请求英国援助，而波斯人在1801年就已经这样做了，1814年英国确实同后者缔结了防御同盟。³⁸⁶因此，英国为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演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调停人，并坚决反对俄国人入侵。一方面是虚假的友好，另一方面是认真的敌意，——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英国的独裁者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的威胁是怎样使这种难得的局势变得更好的。

二

我们知道，自从英国用武力使俄国的傀儡 登上了波斯王位，进攻赫拉特的准备工作就在公开进行了，帕麦斯顿不仅不反对这样做，而且不准自己的大使提出抗议。

1837年9月，波斯军队终于侵入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些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派，他们在赫拉特城下安营扎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但是，尽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封锁，波斯人的进攻还是被击退了。1838年8月15日，沙赫被迫撤围，并且以强行军的速度把军队撤出他所入侵的国家。

现在，恫吓时期自然开始了。

在这些敌对活动进行的整个时期里，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耳爵士不仅被相互矛盾的训令捆住了手脚，而且，一方面，帕麦斯顿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当这次出征一开始时，埃利斯先生就召回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印度政府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1838年3月8日，麦克尼耳前往赫拉特城下的军营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沙

赫这方面声称，“如果在赫拉特被占领之前退却，他担心会得罪俄国政府”，此时，只有直接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威胁”，才能把军队撤走。但是要形成这种来自帕麦斯顿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他乐于用六行字的急电答复麦克尼耳的坚决要求，电报的主要意思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我不再作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到 1838 年 5 月底，帕麦斯顿推测赫拉特已经被拿下（从开始围攻到这时已经过了大约九个月），他就利用麦克尼耳的亲随被侮辱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帕麦斯顿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知道而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第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第一次竭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在发出威胁性照会的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上开赴波斯湾占领了哈尔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而在赫拉特城下的军事失利之后，波斯派往英国的大使没有得到入境的许可。赫拉特真的坚持下来了，虽然英国没有支援它。

帕麦斯顿勋爵重复自己过去的作为是始终不渝的，他巧妙地用自己的第二次中国之战来补充自己的第二次波斯之战。电报刚通知炮轰广州，《泰晤士报》就立即冒险出来为帕麦斯顿的中国之战辩护，虽然仅仅在这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关于波斯战争的文章还大谈经过一定时期事件必然重演的历史规律，而且如上所述，把 1838 年的波斯战争和 1856 年的波斯战争作一种令人怀疑的比较。³⁸⁷不过它装模作样，似乎忘记了如果事件彼此相象，那么引导事件的也就是同一个人，而他所发明的历史规律例同现在恬不知耻地吹捧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有些相象。但是，甚

指 1856—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注

至《泰晤士报》也不能不承认，波斯远征的结果无论是胜利或者是失败，二者对英国同样都是有害的，而对俄国则都是有利的。失败会暴露英国的弱点，它在中亚的威望已经由于放弃卡尔斯而受到损害；胜利会削弱波斯，会更大地动摇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使它完全依赖于俄国。如果吓不住波斯宫廷，不能迫使它让步，那么英军就必须赶快入侵波斯南部，这就会引起俄军相应地入侵波斯的北部。而如果波斯宫廷被吓住了，那么波斯就不敢说话，当然也就不能在英属印度和俄国的南高加索领地之间起着重要的屏障作用。《泰晤士报》宣扬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就是如此。被迫做出这个结论的《泰晤士报》疏忽了一个简单事实，即1856年同1838年一样，帕麦斯顿在波斯人开始进攻赫拉特之后，并不试图阻止这种进攻，而是想为此惩罚波斯人，把英国置于这种危险的抉择面前。他在面临其第一次波斯战争时，促使沙赫进攻赫拉特，直接帮助了俄国。难道帕麦斯顿在发动他的第二次波斯战争时，不是悄悄地在重复那种狡猾的策略，在紧要关头从德黑兰召回英国大使，从而有意消除自己对波斯宫廷的影响，而且在波斯大臣和英国公使之间的荒谬的私人争吵的可鄙的借口下，让俄国对波斯宫廷进行不容置辩的控制吗？如果《泰晤士报》故意突然继续评论帕麦斯顿勋爵在中亚的最初功绩，那它就不能用看来是一个实在的问题来结束自己勉强拼成的文章，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由于一个二等外交代表的容易动怒或者由于印度政府对征服地的贪婪欲望是否在重新卷入这次亚洲冲突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它就不考虑帕麦斯顿勋爵了，而只要它对历史随意地回忆一下，就

会发现安菲先生和坎宁勋爵不过是扮演老角色的新演员，他们在1856年只不过是扮演帕麦斯顿勋爵在1838年为约翰·麦克尼耳爵士和奥克兰勋爵所写的角色。

反过来说，它不得不承认，他们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利用的工具，而大约在二十年前，这些工具是用别的名字出现的。

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了了解目前帕麦斯顿戏剧的重演，必须知道他最初的表演。所以我们想就此结束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开始的对他在中亚的第一次冲突的概述。

三 实际资料

1838年6月16日朗吉特·辛格、舒扎·沙赫和印度总督在拉合尔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朗吉特·辛格承担帮助舒扎沙赫夺取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喀布尔王位的义务，但是英国士兵不必参加预谋的入侵。三个半月以后，1838年10月1日，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西姆拉宣战，并声称将用两万名英国士兵来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过了四个半月，1839年2月19日，这些军队和锡克教徒一起终于出动，侵入阿富汗的领土。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采取这些矛盾的步骤的日期。1838年6月16日缔结拉合尔条约时，还存在想象的危险：波斯军队在俄国的影响下围攻赫拉特。1838年10月1日战争宣布以后，由于波斯军队失败而撤围，并退出阿富汗领土，这个危险已经消除。1838年6月16日当还存在战争的借口时，不需利用英国军队对付多斯特·稀

罕默德。1838年10月1日当这个借口消失时，就宣布用两万名英国士兵对付喀布尔。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1838年10月1日，臆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伙同波斯和俄国的阴谋已经完全无用了，因为波斯军队已不能靠近坎大哈和喀布尔，而俄国显然只能够用波斯军队的力量来支援阿富汗。

俄国还能够保持对波斯宫廷的影响，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影响已经不那么强大了。圣彼得堡和伦敦内阁对中亚所持的对立的政治观点，与其说成了直接利益的客体，不如说成了抽象利益的客体。1838年10月1日明摆着的情况就是这样。1838年11月8日，印度总督接到约翰·麦克尼耳爵士的通知，说在赫拉特城下的失败已完全消除了俄国在波斯宫廷中的影响，到了10月底，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收到了涅谢尔罗迭伯爵的“非常满意的”“说明”，使他完全相信俄国并无“敌对的意图”。

“如果俄国象人们断定的那样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个国家，而攻击阿富汗呢？他（帕麦斯顿勋爵）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派兵到圣彼得堡去了，但是没有舰队。我们要求俄国政府作出说明。我们把我们所收到的情报的性质通知了俄国。我们说明了俄国间谍唆使邻国人民反对我们的情况，曾经对俄国政府提出问题：这样做是否得到它的许可？如果它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政府就有时间请求国会的协助；但是，俄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间谍。说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许可，并且要把他们召回；实际上俄国对我国并未抱有敌对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怎么能够派舰队到波罗的海去呢？此后，俄国的行为怎样呢？它的行为是友好的。在他执政期间，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于1843年3月1日在下院根据罗巴克先生关于指定一个调查阿富汗战争的特别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辩论时所作的声明。

他认为俄国人的说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项说明注明的日期是 1838 年 10 月 20 日。所以，在 1839 年 2 月 19 日³⁸⁸，甚至因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的关系而要对他发动战争的一点理由也完全消失了，[这是发生]在印度政府确信俄国对德黑兰的影响下降以后三个月的事情，而且是在帕麦斯顿勋爵自己由于俄国方面没有任何应该在中亚加以反对的敌对意图而表示满意之后又过了四个月的事情。但是，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公认的理由越是软弱无力，印度政府的敌对步骤就越是加强，而军事行动的虚构理由不复存在之后，这些军事行动就真的开始了。

四

帕麦斯顿在国会的声明

还有一个情况能进一步说明帕麦斯顿和俄国之间的争吵。从他 1839 年初向国会提出的题为《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的蓝皮书中，我们知道那份他后来作为非常满意的答复而提交给下院的俄国照会是在他本人要求给予说明之前就有了。涅谢尔罗迭的外交照会注明的日期是 1838 年 10 月 20 日，而帕麦斯顿的外交照会是 1838 年 10 月 26 日。因此，俄国的答复是在英国质问的前六天。的确，为了使俄国的照会具有答复的假象，就在蓝皮书中把它放在英国照会的后面了，不论是这个照会还是那个照会，都没有互相援引，两者都用同样强烈的词句写成。在一个照会中，俄国要求英国对它在中亚造成威胁的立场作出答复；在另一个照会中，英国指责俄国在波斯经常搞阴谋诡计。俄国无论如何也不答

复英国人，英国怎么也不答复俄国的照会。但是，相反地，两国政府都相互把对方的谴责当作非常满意的说明加以接受。是不是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迭之间的决斗仅仅是装模作样，他们的照会是协调一致的，其目的都是给入侵喀布尔提供某种借口？当借口抵抗俄国影响的阿富汗战争在激烈进行，（已着手进行）的时候，帕麦斯顿公开与俄国结成了反法同盟。³⁸⁹

卡·马克思起草于 1857 年 1 月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布·鲍威尔关于
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³⁹⁰

(a) 俄国和英国。1854

这些小册子也在追求预言，即希望通过批判地研究欧洲国家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历史，来揭开命运的帷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说明了一定的心计。因为批判³⁹¹的灵通消息和预见才能应当受到现代史的检验，所以看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批判的结论同现代史的事实加以比较，把前者同后者加以对比，这样就可以确信，或者是批判的主张理由充足，或者是批判妄自尊大。例如，我们在上述小册子里读到：

《La pratique constitutionnelle a gagné infiniment de terrain ; et la résistance passive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issues de la révolution de l'année 1848, a pris de plus grandes proportions. Toute l'Europe s'est partagé, en ce moment, les différents rôles du drame constitutionnel : l'Occident s'est chargé du rôle de l'opposition honnête ; la Russie représente le gouvernement, armée de la force et usant de son autorité》。（“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

³⁹⁰ “制宪实践大大扩大了，而且 1848 年革命产生的国民议会采取了最大规模的消极抵抗。这时整个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

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的角色。”))

我们不想谈论用加上“而且”来混淆“制宪实践”和 1848 年的种种“违宪”议会的“消极抵抗”等等的错误说法。在所有这些议会中,这一点只有对“Assemblée législative” [立法议会]来说才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把原话写出来。西欧,或者说立法议会仅限于消极抵抗,而俄国,即以“实力武装起来的政府”却通过政变“来实施自己权力”,就象波拿巴、弗兰茨-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做的那样。这就是批判对四月事态的认识——对不久前的过去的理解,也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预言。以后数周的情况把这种认识和这种预言全都推翻了,它们表明,批判轻率地、匆匆忙忙地把一时的丑恶现象变为僵死的表述。不仅西方强国放弃“消极抵抗”,并转向侵略行动,而且,在它们开始这样行动以前,俄国已经用它向多瑙河的进军证明它不是以实力“武装起来”的,而且它的武器软弱无力 [ungewaltig],证明它不是“在实施自己的权力”,而是匆忙实施退却。³⁹²各个钦赐和制造政变的政府同 1848 年的种种议会等等之间没有一点他所说的那种相似的东西。那么,批判的预言不正确吗?那么,他对情况的理解是错觉吗?完全不是。在使批判的抨击性小册子“(a)”的结论化为乌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之后,布鲁诺·鲍威尔恬不知耻地用以下的外交箴言开始了小册子“(b)”(《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 年版):

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则扮成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 19 页)。——编者注

接着手稿中删去了:“为什么这对它来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不考查”。——编者注

接着手稿中删去了:“变为普遍的范畴”。——编者注

“我们早！在4月就提出的这种前面引用的论点，³⁹³在锡利斯特里亚城墙下发生的事件的转变中完全实现了：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政府和反对派一样，它自己也表现为制宪的政府——或者是完全不诉诸暴力，或者只是采取暴力而并不期待有什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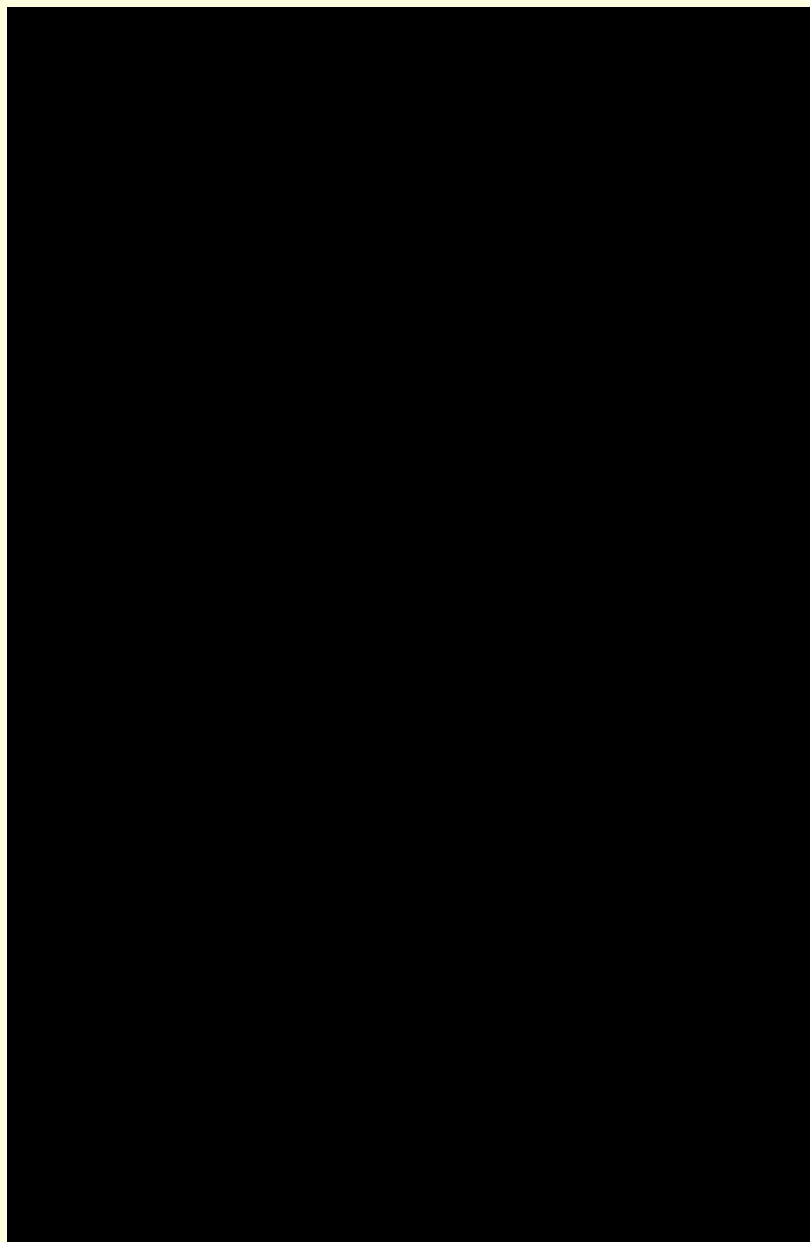
从这句话的论点的特殊“转变”中可以看出，“事件的转变”给批判带来的是模糊的满意。“早在4月就提出的”。在俄国人3月撤出锡利斯特里亚之后，批判是否放弃他在4月所提出的论点呢？根本没有。总之，“早”本应当是“已经”的意思。我们在4月即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提出的论点，在3月得到了证实。但是，倒不如说它没有得到证实。这样，由于不是“已经”而是“早”等等，这句话在文法上就讲不通了。“我早在4月坚持的意见，在3月实现了。”但是，批判不说他“早在4月就提出的论点”已经在3月“得到了证实”。决不会的。新的“事件转变”倒给他的论点赋予了新的“转变”，而这一论点“早”在4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怀疑。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批判的论点，虽然它“完全实现了”。好极了。这对事件同批判的关系作了新的说明。如果事件在实践中没有证明批判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们至少促使这种论点进一步“实现”，使批判本人至今没有怀疑过的他的隐蔽的优点显露出来。不仅批判在理论上与事件有关，而且事件也在实践上与批判有关。那么四月论点由于三月事件而“得到完全实现”又是怎么回事呢？

“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

确实而且完全！难道“完全”这个词会给“确实”这个词赋予新的含义？它削弱并庸俗化了“确实”这个词。仅此而已。但

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确实而且完全”——和以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论点把 1848 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 1848 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 1848 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强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方强国。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直接对立的论点出现，就表明批判的最初论点就是它本身的“对立”，而事件只显示出它的辩证性质。借助这种辩证法，即以对立论点的出现来证明预言的应验，批判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乌尔卡

接着马克思划出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



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确实而且完全”——和以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论点把 1848 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 1848 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 1848 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强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方强国。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直接对立的论点出现，就表明批判的最初论点就是它本身的“对立”，而事件只显示出它的辩证性质。借助这种辩证法，即以对立论点的出现来证明预言的应验，批判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乌尔卡

接着马克思划出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

里的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建议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不能相比,这里的资产阶级尽管自己本身对辉格党的无谓的诡计感兴趣,但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人民群众对辉格党的改革不是从昨天而是从宣布改革法案³⁹⁷时起就感到失望了。接着竟在奈克尔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类比!为了满足批判的要求,帕麦斯顿失去了“勇气和毅力”,他“深刻体验到自己的使命”,认为自己是“自己国家的最后拯救者”。甚至罗伯斯比尔和罗素之间的类比也不可能更荒谬了。从此以后,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变为安东尼达女王(玛丽-安东尼达),也完全用不着惊奇了。

我们完全不否认英国正处于大冲突的边缘。我们只是不同意在提出的“历史实例”中对这种冲突的实质出现比如说相去太远的理解。最卑鄙的政客手腕无可比拟地胜过这种空洞的深思远虑。

对于那些认为在自己内阁中有“influence étrangère”〔外国影响〕³⁹⁸的英国人,布鲁诺·鲍威尔为了证实他们的错误,指出了发现俄国是欧洲和平的保护人和保证人的福克斯。同时他引了福克斯 1803 年 5 月 24 日讲话中的一处。他本应该再进一步举出 1790 年福克斯就面临的第二次瓜分波兰一事交给阿代尔的“秘密”使命。³⁹⁹而福克斯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秘密的”和违法的联系证明什么呢?⁴⁰⁰证明帕麦斯顿同尼古拉并没有秘密的、违法的联系。然而,福克斯无须做出关于俄国的发现。这种发现在威廉三世时已经由卡马森侯爵做出了,而在乔治一世时已由当时执政的辉格党做出了。外交文件证明,从那时起俄国对辉格党内阁的影

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里,当丧失了历史的类比……”。——编者注

响已成为传统的影响。帕麦斯顿正是因此就应该结束辉格党的传统吗？相反，为什么他不使它完全“实现”，不完完全全投靠俄国呢？认为福克斯发现英法同盟的说法，就象对帕麦斯顿的这种“保护”一样不可信。斯坦霍普在乌得勒支和约³⁶⁴之后已经立即做出了这种发现。⁴⁰¹

为了证明俄国的富有成果的影响，有人说它所采取的立场使得“英法对立削弱”，或者说使得“英法同盟”建立。英法同盟于1717年就已经存在，数年之后，乔治一世正是企图把它变成欧洲抗俄同盟。1834年的四国同盟⁴⁰²是当时被认为也是针对俄国的英法第二次同盟。这样，从这方面来看俄国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前所未闻的同盟。但是，如果说仅仅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同盟就应认为是俄国的巨大成就，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路易-菲利浦法国的同盟，即1840年同盟³⁸⁹呢？这一同盟根据布鲁诺·鲍威尔的设计证明，路易-菲利浦的法国比尼古拉的俄国还要危险。

根据批判以后的发现，英国用它的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将大陆交到俄国的手里——这一发现至少没有新的功劳——之后，感到需要

《de se charger elle-même de la tâche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C'est Canning qui a rempli ce vide. Il leva en Angleterre l'étendard de la révolution, pour en faire levéritable

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第5页)。——编者注

adversaire de la Russie》。

人们引用坎宁从咪吉尔那里借用来的辞句 (quos ego : de di- eu Eole) 作为证明, 似乎“伊顿名将⁴⁰³的空话就是证明。关于“原则的政策”的话被信以为真, 被当成真的了。⁴⁰⁴而这些话比以前关于“利益的政策”的空话更虚假。然而, 关于皮特的战争⁴⁰⁵如同关于“原则的战争”一样到处流传, 很大一部分英国人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之所以如此, 一部分人是由于法国革命前不久和在它开始的时候, 寡头政权处于国内动乱的威胁之下。但是, 坎宁的空话起初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法国的。干涉葡萄牙是对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回答, 而这种“原则的政策”在其现实的体现中——承认过去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⁴⁰⁶的独立性——是异常准确地同英国的贸易利益联系着的。因为帕麦斯顿用坎宁的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完全由别的原因所引起的政策, 所以布鲁诺·鲍威尔确信坎宁关于“革命干涉”的空话成了英国的实际政策, 并给英国造成了许多不幸。同时我们获悉, 改革法案把英国宪法的性质改变到这种程度, 以致

《Que les Anglais mêmes ne reconnaissent plus en quoi se distingue leur constitution de celles du continent》(p. 9) 。

从乔治一世时期起, 英国宪法被修改的地方只是: (1) 改动了 rotten boroughs [衰败城镇]⁴⁰⁷的分配, 使它对大贵族派别之一

“自己承担法国的革命事业。正是坎宁填补了真空。他在英国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使英国成为俄国的真正对手”(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7页)。——编者注

“看我来教训你: 亚奥普士神”。尼普顿用这种厉声的吆喝来制服亚奥普士的狂暴之风(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135行)。——编者注

“英国人自己再也看不出他们的宪法与大陆的宪法有什么不同”。——编者注

的辉格党有利；(2) 1831 年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议会影响，就象金融资产阶级通过 1689 年光荣革命所做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也发现了，

《l'abrogation des lois des c^éales, comme la proclamation du principe de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renferment l'aveu que sa sup^ériorit^é (英国工业) est perdue》。

相反，这些事实证明：(1) 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土地贵族的利益；(2) 英国工业除自己本身的资本垄断外，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垄断，只是现在它才能够有把握地指望自己真正的优势。现在，英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

《assez d'^égrad^é》《pour supporter l'id^ée offensante d'une alliance avec sa rivale》(p. 10)。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要不贬低自己，当然不能签订与以前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相矛盾的同盟。英国总是停留于“那种”合乎道德的身份。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英国在这里经受的莫大损伤：

《Les peuples ne sauraient oublier leur pass^é qu'en renon^çant à l'avenir》。

似乎经常“消灭”过去并不是“创造”未来。

“谷物法的废除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宣布，说明承认它（英国工业）的优势丧失了”（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 9 页）。——编者注

“堕落到去迁就那种同自己对手结盟的可耻思想”。——编者注

马克思这里用的德语动词“degradieren”，有法语“dégrader”（“堕落”、“贬低”）的意思。——编者注

“看来，人民只有放弃未来，才能忘掉自己的过去”（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 11 页）。——编者注

因此，皮特英国的未来同英国的未来混为一谈了。一旦“人民”战胜过去的统治阶级，并因而同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治过去决裂，它就消灭自己的未来。

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英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仇视法国，反之亦然。英国的这种“民族独特性”——法国和英国之间较早时期的封建战争当然具有完全另外的意义——只是由“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创造，因此，它是“根深蒂固的”。多么深刻的思想啊！

俄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时而同法国结成反英同盟，时而同英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英国和法国不放弃“未来”就不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其实，布鲁诺·鲍威尔想要证明，除俄国外，欧洲各国的民族特点正在消失，法国和英国正体现为“西方”而反对俄国。因而它们在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特性。但是，难道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没有体现为欧洲而反对过法国？难道它们不是以此而重新创建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市民社会当然使批判不感兴趣。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经受了各种政治变化。当一片外壳掉下来时，批判就明确地认为，这个社会的灭亡即将来临。例如，那充满空洞政治废话的关于“自私的动机”和“盟友的别有用心”的一章，如果说不是证明这两个社会仍然在同属于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传统作斗争，以及它们尚未拥有符合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的那种政治形式，那么它现在又在证明什么呢？不管他多么可怜，谁能对他担保，说这种同盟并不是达到这种更高的形式的手段呢？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

接着马克思划去了：“它自应不再作为人民存在”。——编者注

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13页)。——编者注

需要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际关系，这是同义反复。

有人对他说，俄国

《a form éle plan de consolider son influence sur la Turquie, sans l'aide d'un alié》.

它不是为最近这次战争轮流寻求过同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吗？而且它不是始终保持同普鲁士的同盟吗？不管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观点和意图如何，谁会对他们担保说，俄国不是经常都相信同英国政府的秘密同盟，并认为这就保证了俄国的粗鲁行为呢？

尊敬的布鲁诺·鲍威尔相信俄国，认为它所提出的借口，即

《cause des populations gréco-slaves de la Turquie》（p. 11）—

是它的真实动机。即使在以色列我也没有找到过这种信仰！

小册子的大部分是描述英国政府（还有法国政府）的诡计和它们向俄国的让步。其实，俄国没有实现它在土耳其的计谋，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过失。这又证明什么呢？是证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特别是前者，被迫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行动吗？不是，[这仅仅证明了]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证明了政府和社会，即使它们实际上是分离的，在理论上却应是等同的。

俄国的要求！俄国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要以俄国领事的管理来代替在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⁴⁰⁸那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自治。批判当然是轻信地将俄国的声明看成是它的真实动机，以便

“制定了计划，在没有任何盟国的协助下巩固自己对土耳其的影响”（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2页）。——编者注

“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民族的事业”。——编者注

《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编者注

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28页。——编者注

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⁴⁰⁹里激动地断定俄国政府现在放弃了他的欺诈手段。布鲁诺·鲍威尔责备报纸对不久前的土耳其事件无知。但是他没有发现俄国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希腊）一再企图破坏公社的自治，证明自己无知。俄国力图保存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土耳其主权下的希腊牧师的神权统治，是束缚和扼杀希腊—斯拉夫公社的任何独立的市民发展的统治。批判的博学非常成功地特别表现在

《Gages que la Russie possède dans sa participation à l'oeuvre de l'organisation en Serbie》以及在它的《règlement organique》中，

俄国通过基谢廖夫把这种组织规程交给了多瑙河两公国⁴¹⁰。这太过分了。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南方斯拉夫人应该成为俄国人：首先，“en vertu de la nature des choses”〔由于事物的本性〕，援引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其次，不仅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且由于“de l'histoire”〔历史〕，而塞尔维亚的历史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最后，由于“position géographique”〔地理位置〕，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由于这种地理位置把自己同俄国隔开。多么广博的知识领域呵！他们从“事物的本性”的高度降到“历史”，又从这种抽象的概念降到“地理位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3页）。——编者注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3页）。——编者注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3页）。——编者注

同上，第34页。——编者注

同上，第33页。——编者注

置”的细节。

他证明奥地利应该仅限于中间人的角色。“早”在4月曾是正确的这一论断，在6月就成为“错误的”了，尽管批判的理由是绝对的而且是来自事物的本性。他证明，奥地利不“可能站到同盟国一边”。我们要重新检验这一论断。他在自己臆想出来的关于奥地利和英国的过去关系的历史推论中，纯粹按俄国的方式来歪曲历史。在援引阿德里安堡条约时，他避而不提真实的情况。如果不是英国以自己的骗局在土耳其政府那里撕毁这项条约，俄军就会被消灭，甚至它能保留的微不足道的少量部队也永远不能从阿德里安堡返回。鲍威尔也没有正确地转述利文的急电内容。正如他所说，不是“和约”，而是埃内兹的封锁⁴¹¹构成了阿伯丁和威灵顿不果断的直接原因。俄国人由于担心会引起威灵顿方面的反对，也放弃了封锁。顺便提一下，利文说：

《《that the Duke of Wellington and Lord Aberdeen have put everything in motion to extort from us Confidences as to the conditions of our future peace with the Turks》》。

这个利文丝毫没有用鲍威尔从他的急电中所引用的大话来对此进行反驳⁴¹²，而继续说：

《It appeared to us useful to repeat the assurances which on this point all the declarations of the Emperor contained, and even to add some developments to them, We shall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se generalities, for every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6页。——编者注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9页。——编者注

“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动用了一切力量来从我们这里探听有关我们将来同土耳其人签订和约的条件的机密”。——编者注

circumstantial communication on a subject so delicate would draw down real dangers, and if once we discuss with our allies the articles of a Treaty with the Porte, we shall only content them, when they would have believed that they had imposed upon us irreparable sacrifices) .

只是后来才有那句大话，而这句话由于这些粗笨的花招会失去自己的英雄性质，但这一点并不在批判的计划里。然后提到了帕姆的一切骗局，以证明他感觉到“英国的弱点”，证明这种弱点实际上是存在的。不仅如此，骗局还暴露出俄国在对待英国方面所拥有的“实力”的秘密。同时鲍威尔在例如“雌狐号”事件中造假。据他讲，俄国只要

《lui rappeler que ce forfait inoui avait été commis dans la mer Noire, près de la côte de la Circassie》就足够了。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帕姆和涅谢尔罗迭在这种场合采用了何等复杂的手腕。⁴¹³

在关于奥地利的一篇里，我们还读到，1848—1849年

《toute l'Allemagne ébluite se laissa passer les illusions du principe national, aurait taxé de crime politique chaque tentative d'intervenir dans cette lutte des nationalités》.

“在我们看来，重复皇帝一切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保证，而且即使对这些保证做一些补充，都是有益的。我们将仅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表示，因为关于这种微妙问题的任何详细的报道都会招致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同我们的盟国讨论同土耳其政府缔结条约的条文，那么只有当他们认为已迫使我们遭受无法补偿的牺牲时，我们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编者注
帕麦斯顿。——编者注

“提醒他 [帕麦斯顿]，这一前所未闻的罪行是在黑海，靠近切尔克斯亚海岸发生的”（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42页）。——编者注

“整个德国因对民族原则错误理解而处于消极的状态，认为干预这种民族斗争的任何企图都是政治罪行”（第43页）。——编者注

“似乎”法国国民议会没有反对意大利,也没有反对波兰!⁴¹⁴关于这本小册子,除了只有批判认为奥美尔-帕沙的多瑙河进军是报纸的谣传,再要谈点什么都完全是多余的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28 年

《马克思主义年鉴》第 6 卷

卡 · 马克思

* 关于东方问题

(草稿)⁴¹⁵

因此,我们重新回到这场战争开始时我们所作的那个结论。⁴¹⁶如果欧洲要维持现在的制度,那么构成所谓东方问题的所有问题,就必须按俄国的精神来解决,如果把这些问题同整个欧洲的革命事业等同起来,那么它们就必将获得全新的观点。有可能人为地支持目前这种以土耳其帝国虚假的独立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现状。这样,事态只能暂时摆脱困境,造成解决的假象。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原文是英文

卡 · 马克思
* 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
(十五至十八世纪)⁴¹⁷

() 由于 1315 年建立了瑞士联邦，瑞士于十五世纪末成为它的邻邦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盟国。

无论是中世纪的封侯，还是十五世纪的外国，在签订和约时都必须承担保证。政策首先引起了西方和南方宫廷的注意，使盟国的数量增加，并导致常驻使馆的建立。

1477—1515 年，尼德兰和意大利是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纷争的根源。1477 年，大胆查理死后，争夺勃艮第继承权的 [斗争]，路易十一占据了他的一部分领地。⁴¹⁸ 马克西米利安（奥地利的）同大胆查理的继承人玛丽结婚。法国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要求。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菲利浦 同西班牙君主国的继承人胡安娜结婚。

1494 年——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公共福利同盟（教皇、马克西米利安、西班牙、米兰公爵）反对他。⁴¹⁹（从 1416 年起——萨瓦公爵）。1498 年路易十二同天主教徒斐迪南暗中勾结。把自己对那不勒斯的权利让给他（1506 年）⁴²⁰，为此而得到（帝国）在米兰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编者注

菲利浦一世·美男子。——编者注

亚历山大六世·波尔札日。——编者注

洛多维科·摩尔人。——编者注

的支持。1506年，路易十二争取到同教皇、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国家 [建立] 反对马克西米利安的神圣同盟。⁴²¹但是，1509年法国人在贾尔达达取得胜利后，领导神圣同盟的教皇反对法国（路易十二）（英国的亨利七世也参加了；亨利八世退出了同盟⁴²²）。路易十二由于自己的领地受到瑞士的威胁，于1513年在布卢瓦同天主教徒斐迪南 [缔结] 和约。

至于意大利，整个这一时期的讽刺在于：法国（路易十二）在米兰巩固下来，天主教徒斐迪南（阿腊贡的）在那不勒斯巩固下来，然而神圣同盟的成果是法国被赶出意大利；斐迪南（天主教徒）保住那不勒斯和阿普利亚的港口；教皇征服罗马尼亚的城市。1512年（在瑞士帮助下）米兰回到马西米利安诺·斯福察手中，美第奇家族返回佛罗伦萨（1512年8月31日）。这一时期（1494—1515年）只有瑞士人有精锐的步兵。这样一来，法国人（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多次胜利和多次入侵意大利是毫无结果……

（ ）1515—1559年。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征服米兰（1516年他同瑞士人签订永久和约）。1519年查理一世成为德国皇帝查理五世。

四次意大利战争：

1521—1526年。弗兰契斯科·斯福察又在米兰被困；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附近被俘（1525年）（反弗朗索瓦一世同盟）；

1526—1529年。第二次反弗朗索瓦一世的神圣同盟。⁴²³他承认公爵弗兰契斯科第二为米兰公爵，并承认热那亚的自由。弗朗索瓦一世仍保有勃艮第。放弃对佛兰德和阿尔士瓦的封地权。

1536—1558年。米兰公爵弗兰契斯科去世，没有继承人。弗朗索瓦一世要求把米兰作为封地授给他的次子亨利。同查理五世的战争。十年休战，在此期间弗朗索瓦一世仍然是萨瓦的主人：日内瓦获得独立。

1541—1546年。查理把米兰作为封地授给自己的儿子菲力浦。法国仍处于意大利的疆界之外。它失去布伦对英国有利。

德国宗教战争。在第二次德国宗教战争中，亨利二世（法国）于1552年占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根据同西班牙在卡特-康布雷济（1559年4月3日）签订的和约，法国应将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一百九十五处领地一部分还给西班牙，一部分还给萨瓦。⁴²⁴

尼德兰的分离。1572年革命在北方各省爆发。这些省于1579年在乌得勒支成立独立联邦。1581年开始七十年斗争。⁴²⁵1584年成立联合省共和国。十六世纪末共和国的自由已经有了保障。在1609年4月3日的休战条约中，西班牙实际上已经将联合省看成独立国家。

1592年。国会成立⁴²⁶。欧洲还没有象荷兰共和国这样的贸易强国，这样的海上强国。1556—1618年，葡萄牙人的东印度领地落到荷兰人手里；后者想要独揽世界贸易。

（ ）1608—1648年，德国是欧洲政治的中心。1621年起荷西战争重新开始。结束法西战争的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只是1659年11月7日的比利牛斯和约。⁴²⁷

从1624年起是黎塞留内阁。在意大利，法国和萨瓦反对西班牙和热那亚。⁴²⁸

1634年，瑞典和它的盟国把自己在亚尔萨斯的征服地让给法国。

闵斯德和约⁴²⁹。1645年——首先是在西班牙和联合省共和国之间。

瑞典获得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不来梅、凡尔登等地。法国得到对麦茨、土尔和连同郊区的凡尔登、布赖扎赫的全部主权，以及奥地利在亚尔萨斯具有的种种权利。

1520—1559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⁴³⁰

威斯特伐利西和约（1648年）（闵斯德和约和鄂斯纳布鲁克和约）。

“至于法国……，皇帝把上亚尔萨斯和下亚尔萨斯、布赖扎赫（城）、三个主教辖区——麦茨、土尔、凡尔登，以及在菲利浦堡的驻军权让给法国。瑞典 [获得] 波美拉尼亚等地，并被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有权参加帝国国会。

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汉诺威、黑森……主要靠教会财产来补偿。

奥地利在意大利确立了自己对米兰和托斯卡纳的统治。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荷兰的独立也得到承认，荷兰的独立实际上在它和西班牙签订单独和约⁴³¹之后就已经存在。

宗教的纠纷和分歧……一切都在帕骚和奥格斯堡的和约（1552年和1556年）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波希米亚……完全被遗忘了；甚至没有预先把大赦规定下来。⁴³²德国的联邦制度（反联合的）被巩固下来。其实，这是一项支解德国的条约。

威悉河主教辖区。——编者注

麦士河主教辖区。——编者注

斐迪南三世。——编者注

1648—1660年。法西战争。比利牛斯和约。

1660—1697年。路易十四战争。里斯维克和约⁴³³。

1697—1715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乌得勒支和约⁴³⁴。

除去英国由于乌得勒支和约而取得的好处（哈德逊湾、纽芬兰、新苏格兰、罗耶尔港，关于“黑奴条约”的协议等等）以外，萨瓦由于西西里的简单加入变成了王国，同时奥地利获得那不勒斯、米兰、托斯卡纳作为领地，这就固定了意大利被奴役的地位。西班牙的尼德兰转让给奥地利。⁴³⁵

1715—1740年。

维也纳和约，1735年10月“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应成为波兰的国王；洛林和巴尔两公国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在他死后则应归还法国；洛林公爵 应得到托斯卡纳。唐·卡洛斯（西班牙的）将仍然是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纳的奥地利沿岸地区的占有人。撒丁应获得诺瓦拉、托尔托纳和米兰的一些其他土地。帕尔马和皮阿琴察应给皇帝”。

根据奥地利和法国（弗略里）之间的这项条约

“（西班牙、海上强国和俄国不久也参加了这项条约），法国保证下述国事诏书³⁶⁷，这张诏书保护奥地利帝国未来的继承者……将来不受任何侵犯”。

1740—176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⁴³⁶

除了1741年俄国和英国没有参加，全都协商一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根据贝尔岛（路易十五的宠臣）的计划

撒丁应获得米兰；西班牙应获得托斯卡纳公国；巴伐利亚选侯 应获得帝国王位；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应成为独立国；打算将玛丽-泰莉莎降到德国小君主的水平。

七年战争中，英国和普鲁士联合反对俄国所支持的法国和奥地利。这第二次战争导致普鲁士同俄国结盟，结果是瓜分波兰；叶卡特琳娜二世因此而

弗朗索瓦第三。——编者注

查理三世。——编者注

玛丽-泰莉莎。——编者注

查理七世·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

有机会占领克里木，受辱的法国则为自己的失利对英国进行报复，支持马萨诸塞的骚乱的移民。

（根据法国亨利四世的计划⁴³⁷

法国、西班牙、英国、丹麦、瑞典、伦巴第应成为世袭君主国；意大利、瑞士、尼德兰应成为共和国。应该剥夺奥地利王朝的两支旁系在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领地，他们应转到西班牙和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岛屿上。至于意大利，教皇应被宣布为世俗的统治者，把罗马、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下。如同少数的其他小国一样，佛罗伦萨、摩地那应同威尼斯共和国统一起来；萨瓦公爵应成为伦巴第的国王。波希米亚是选定王国，包括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住有卢日昌人的地区。匈牙利是选定君主国，必须通过把奥地利大主教辖区、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并入匈牙利的办法来使它更加强大。也应以同样的办法来巩固波兰。瑞士应以亚尔萨斯、提罗耳和其他领土来加以扩大。）⁴³⁸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中以后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弗·恩格斯 阿本斯堡⁴³⁹

阿本斯堡——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一千二百人。有人以为此地就是罗马阿巴西努姆城的旧址。城郊有温泉和华丽的古城堡废墟。1809年4月20日，波拿巴曾在阿本斯堡城下与奥军会战，并将奥军击溃；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火炮十二门，兵士一万三千人。这次胜利是兰德斯胡特和埃克缪尔会战胜利的前奏，并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
和14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弗·恩格斯

阿克⁴⁴⁰

阿克，圣让达克，阿卡，托列迈达，或阿科——卡梅尔山脚下的一个叙利亚港口，位于北纬 32 度 54 分，东经 35 度 4 分；居民——约一万五千人。这个港湾虽然很小，但却是这一带海岸的良港。阿克由于多次激烈的围攻和保卫战而获得声誉。1104 年曾被热那亚人占领，但 1187 年又被萨拉丁收复。1191 年，狮心理查强攻阿克城是十字军征讨时期最英勇的行动之一。1292 年以前，它处在圣约翰骑士⁴⁴¹的统治之下，他们大力固守，但是土耳其人迫使他们撤出了这个要塞。正是在这里，土耳其人在高尚的悉尼·斯密斯和为数不多的不列颠水兵的支持下把拿破仑和法军牵制在港湾达六十天之久，直至他最后放弃围攻并撤离为止。当穆罕默德·阿里发动反对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暴动时，易卜拉欣·帕沙于 1832 年在六个月的包围之后，强攻占领了阿克，并夺取了叙利亚。但是 1839 年叙利亚又归还给土耳其，这个城市再次遭受战祸，因为易卜拉欣拒绝撤离，直到 1840 年 11 月 4 日英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炮击阿克城为止。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弗 · 恩 格 斯

阿 克 齐

阿克齐 (Ακτιου), 现今的拉普恩塔——安布拉希亚湾入口处阿卡尔纳尼亚的一个海角和村庄。公元前 31 年 9 月 2 日, 凯撒·屋大维 (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 和马可·安东尼曾在安布拉希亚湾附近进行过海战, 屋大维获得全胜。这次会战解决了世界霸权的问题。在这以前, 屋大维称霸西方, 安东尼称霸东方。⁴⁴²两军的兵营驻扎在安布拉希亚湾两岸, 正相对峙。屋大维拥有八万名步兵, 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二百六十艘战舰。安东尼拥有十万名步兵, 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二百二十艘战舰。安东尼的舰队装备有弹射器, 但特点是不灵活。屋大维的舰只不大, 但航行速度较快。克娄巴特拉支援安东尼六十艘战舰。在克娄巴特拉的怂恿下, 安东尼不顾其最有经验的舰长的忠告, 提出要同屋大维进行海战。挑战被接受了。经过几个小时无结果的战斗之后, 屋大维的一个将军阿格利巴进行了迅速的迂回机动, 克娄巴特拉及其大船逃之夭夭。好色的安东尼支持不住, 带领少数舰只跟着逃走。被自己的指挥官丢弃的舰队投降了, 安东尼的陆军在等他七天之后也投降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情妇逃到埃及。战胜者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 把

在阿克齐的阿波罗神殿装饰一新，并且在海湾的北岸建造了尼科波尔（胜利城）。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弗·恩格斯

阿 兰 群 岛

阿兰群岛——由一群大约二百个岩石重叠的岛屿组成，其中八十个人有人居住，位于波的尼亚湾入口处，北纬 59 度和 60 度 32 分之间和东经 19 度和 21 度之间。群岛属俄国所有，1809 年由瑞典割让给俄国，成为芬兰的亚波总督管辖区的一部分。群岛的居民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出身于瑞典，都是出色的船民和渔民。在覆盖着薄土层的岩石上，生长着松树和桦树。这里种植黑麦、大麦、马铃薯、啤酒花和亚麻。居民们饲养大量的牛，并输出干酪、油脂和皮革。他们还生产家用的和制帆用的粗麻布。主要的岛屿叫阿兰岛，它的面积为二十八平方英里，居民一万人，它的西部有很好的港湾。所有的港湾或多或少都设有防御工事。其中占首位的要算博马尔松德群岛和博马尔松德海湾。该海湾于 1854 年英法对俄战争⁴⁴³期间被英法联军舰队占领和炸毁。1714 年，在西格尼尔德舍尔悬崖附近的海面上俄国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曾获得对瑞典的决定性胜利。⁴⁴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弗·恩格斯 阿耳登霍文

阿耳登霍文——莱茵普鲁士的一个小城，位于从幽里希到亚琛的路上。1793年3月1日奥地利军在科堡亲王的指挥下战胜杜木里埃的部分法军，这次会战即以该地命名。杜木里埃1792年占领比利时之后打算入侵荷兰，在麦士河和鲁尔河之间留下七万兵力围攻马斯特里赫特和文洛，为了掩护这次围攻，开始用其余兵力从安特卫普进攻荷兰。由于情况的需要，麦士河上的军队非常分散，掩护围攻的一些师驻扎在亚琛、阿耳登霍文和埃施魏勒尔的附近。科堡亲王集中四万兵力，成二路纵队向后面两个据点推进；他绕过埃施魏勒尔附近的阵地，以正面攻击夺取了阿耳登霍文的工事，打得法军向亚琛狼狈逃窜，并于次日占领了亚琛。马斯特里赫特解围了，奥军前卫在通格尔附近把法军击溃，甚至把他们追过了麦士河。逃散的法军各师只是在到达蒂勒蒙之后才集结起来，在那里等待杜木里埃。这样，联军到比利时的道路就打通了。过了几天，由于接着在涅尔文登附近取得胜利，对这个国家的征服即告完成。法军在阿耳登霍文会战中和被追击时受到的损失，除会战后立即开小差的一万人以外，伤亡和被俘的不可能

少于一万人；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落入奥军手中⁴⁴⁵。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弗·恩格斯

亚历山大里亚⁴⁴⁶

皮蒙特的设防城市,位于博尔米达河和托纳罗河的汇合处,距离波河数英里。1178年由米兰人建立,过去是抵御德国皇帝入侵的堡垒;而在当代,自1848年和1849年战局以来,又起了意大利抵御奥地利的国家要塞的作用。尽管在进入本世纪之前,亚历山大里亚城的防御工事已经过时,没有多大意义,但法国人在1657年对它的围攻却毫无成果,而萨瓦亲王欧根只是在粉碎了对方长期的抵抗之后才于1707年占领了它。就现在的状况看,这一要塞的主要威力在于拿破仑在皮蒙特并入法国之后所增筑的一些工事。这是拿破仑建造的唯一的一座要塞。在它的防御工事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却是第一次采用了蒙塔郎贝尔的穹炮台体系,用以保护壕沟。拿破仑特别加强了主堡即具有许多外部防御工事的六角棱堡,而在博尔米达河的对岸则构筑了桥头堡。不久前,皮蒙特政府决定为要塞再增建一些工事,假如瓦兰察附近波河的渡口得到应有的掩护的话,那么,这个要塞就能成为占有决定性地位的广大设防阵地的一个支撑点。城市里有高等法政学校,正教中学,十三座教堂,包括一座大教堂。这里出产毛料、丝绸、呢绒

和蜡烛。居民包括郊区在内有三万六千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弗 · 恩 格 斯
阿 尔 梅 达⁴⁴⁷

葡萄牙拜拉省的一个城市,位于科瓦河和杜瓦斯卡扎河之间。居民六千二百人。该城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1811年8月5日,威灵顿公爵曾在这里击败马森纳指挥的法军。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
和14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弗·恩格斯

阿穆塞特炮

阿穆塞特炮——一种过去在山地使用的发射一磅重圆形炮弹的轻型小炮，这种小炮曾受到萨克斯元帅的高度评价，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使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弗·恩格斯 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比利时的海滨城市，安特卫普省的行政中心，位于些耳德河北岸布鲁塞尔北面二十六英里和根特东北三十二英里处。居民（1855年）——七万九千人。城市呈弓状：城墙似弓背，河流象弓弦。防御工事极其完备，包括主堡在内，绵延约2.75英里。五角形的强大主堡是阿尔瓦公爵于1567年建造的。安特卫普是很古老的城市。它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时达到自己繁荣的顶峰，那时是欧洲的贸易中心，控制着广大地区的对外贸易，所有国家的船只都访问过它（在港口同时停泊的船只达二千五百艘），城市的居民据说有二十万人。1576年，该城曾遭到西班牙人的洗劫和焚烧。1585年，帕尔马亲王亚历山大在长时间围攻该城后占领了它。从这时起，安特卫普的贸易就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和联合省份的其他城市。1794年，该城转到法国人手中。在比利时各省暴动之后，1832年法国热拉尔元帅经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围攻⁴⁴⁸占领了它。这个城市现在虽然不象中世纪时那样重要，但现在它的贸易和工业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河流能航行最大的船只。拿破仑建造的贮水池已变成宽阔的商业船坞，能够容纳一千艘船。发

亚历山大·法尔宗译。——编者注

达的运河水道网使安特卫普能够进行广泛的国内贸易：1846年，到这里来的船只达一千九百七十艘，排水量为286474吨。该城同英国保持定期的非常频繁的航运联系，最近已成为运送大批侨民去美国的出发地。这里是欧洲最大的皮革市场之一。安特卫普的主要产品是黑丝绸和丝绒，还有棉织厂，麻布厂，生产花边、地毯、帽子、刀类制品的企业，以及制糖厂和造船厂。到目前为止，城市保存有许多壮观的古迹。大多数房屋很旧，但却是坚固的建筑。有许多漂亮的公共建筑物，其中主要的是一座大教堂，它是十五世纪初奠基并至少经过八十四年的时间才完工的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建筑。还有另外三座著名教堂，有1583年建成的交易所、市政管理机关、王宫（当时国王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自己的京都）和汉撒各城市的建筑。此外，城内还有一个绘画、雕塑和科学研究院，藏书一万五千卷的公共图书馆，绘画陈列馆（收藏有二百幅非常珍贵的画，其中有许多是古代佛来米大师们的杰作），以及植物园和各种各样的学校、医院和收容所。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
和14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1卷

弗·恩格斯 阿尔贝雷

阿尔贝雷，即现在的阿尔比尔或埃尔比勒是库尔迪斯坦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巴格达和穆苏尔之间的通道上，根据尼布尔记载，为北纬 36 度 11 分。房子是用土坯砌成的。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之间第三次大会战，即最后一次大会战是以阿尔贝雷命名。实际上，会战不是在阿尔贝雷，而是在其西北三十六英里一个名叫高加米拉的小村庄（现在叫卡尔梅莱斯）附近进行的。会战以后，亚历山大渡过利库斯河，进驻阿尔贝雷。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4 日
和 2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弗·恩格斯 卞尼格先和巴克莱⁴⁴⁹

关于卞尼格先,除了知道他在1807年的战局开始时曾经指挥过卡缅斯基所统率的第一军团(共两个军团,第二军团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外,其他我一无所知。1806年12月26日,他在普乌土斯克附近遭朗恩攻击,由于在兵力上占优势(因为拿破仑的主力在进攻另一个军团)而坚持下来了。后来,他自以为是胜利者,想转入决定性进攻。不久他成为总司令,1807年1月底开始进攻驻扎在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但很快就被击退,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摆脱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2月7日和8日在埃劳进行会战。7日拿破仑占领了埃劳(而领导防御战的巴克莱-德-托利却战果辉煌⁴⁵⁰),8日,卞尼格先为了避免拿破仑的猛烈追击不得不进行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卞尼格先所以免于彻底失败,只是由于他的军队坚韧不拔,莱斯托克指挥的普军到达,以及拿破仑的某些军迟迟开抵战场。春天,卞尼格先在海尔斯贝格设防固守,因为他的兵力已经减弱;当围攻但泽的一路法军⁴⁵¹还未来到时,他没有去攻击拿破仑,但是在但泽陷落和各路法军会合以后,他却转入进攻(!)并被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其兵力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一)堵住了,随后拿破仑迫使他退回其设防的营垒。拿破仑于[6月]10日仅以两个军和几个近卫营的兵力进攻这个营垒,没有成

功,但在次日就迫使卞尼格先放弃营垒,急忙后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还在提尔西特的二万八千人的一个军开到,就突然转入进攻,占领了弗里德兰德,并且驻扎在那里,背靠一条河,也就是说,只有弗里德兰德桥这唯一的退路(在隘路前会战永远是错误的)。他不在拿破仑能够集结自己的军队之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朗恩和莫尔蒂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卞尼格先使自己陷入了贼窝”——若米尼在谈到这个布局时说),直到拿破仑在近五点钟时把部队部署好并下令开始进攻。俄军被击退到河对岸,弗里德兰德被占领,桥被俄军自己破坏,当时俄军的整个右翼还没有过河,只是由于有浅滩才得救了,但丢了炮队。损失两万人。卞尼格先在这一天里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的行为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的混合。

1812年,他驻扎在俄军大本营附近,为了占据巴克莱的位置,他辱骂巴克莱,搞阴谋反对他,直到亚历山大解除了他的职务。1813年他接到命令,带领预备军团从俄国来到波希米亚,这个预备军团到达后被解散,而卞尼格先也销声匿迹了。

巴克莱-德-托利在埃劳指挥一个旅等情况(见上述)。1812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和陆军大臣,在亚历山大离开以后和库图佐夫总司令到达之前,巴克莱-德-托利巧妙地领导了俄军的撤退,他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反对俄军和整个大本营的会战要求,当他象在斯摩棱斯克那样处于不得不进行会战的地方时⁴⁵²,他占领了一个不使会战成为决战的阵地,而当决战已经不能避免——离莫斯科不远——的时候,巴克莱-德-托利在格查茨克附近选择了一个从正面几乎无法攻击的阵地,只有绕行很长一段路才能迂回这个阵地。军队已经占领了这个阵地,但是库图佐夫来到那里,他当然不同意这个阵地,因为不是他选择的,俄军只好

在博罗迪诺附近不利的阵地作战。在 1813 年和 1814 年，巴克莱 - 德 - 托利没有指挥过任何独立的军团，而是指挥施瓦尔岑堡所统率的联军中的全部俄军；因为这些俄军分属于各个军团并且常常改编，所以与其说他执行的是军事方面的职务，不如说是行政和外交方面的职务。⁴⁵³如前所述，他在中级将领中显示出自己是具有健全理智和坚毅精神的最好的将军，在俄军较老一辈的将军中，无论如何他也是最好的将军。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0 日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炮 击⁴⁵⁴

炮击广义是指战斗或围攻中的炮兵射击。作为专门的战术用语，炮击是指两军之间只有炮兵参加的战斗，其他兵种或者是按兵不动，或者是他们的行动至多不超出纯粹佯动的范围。1792年瓦尔米的炮击就是这种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在高地一线等待普军进攻的凯勒曼把炮兵配置在自己部队的前面；普军则在对面山丘上配置好队伍，并把炮兵推到前面，于是开始炮击。普军步兵几次列队准备冲锋，并且稍许向前推进了一点；但法军丝毫未动，于是，普军在尚未进入步枪射程之内就退却了。这样，一天过去了。而次日，普军则开始了全线退却。在大多数的总决战中都有这种炮击。这种炮击常常是一场戏剧的第一幕；在冲锋被击退和再次企图把敌人赶出阵地的间歇时间会进行这种炮击；这种炮击也是双方谁也不可能获胜的多数会战的终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炮击除了示威之外，不追求任何别的目的；这种炮击在远距离上耗费大量炮弹，其命中的弹数同失误的弹数相比，少得几乎难以令人置信，这在现代战争的炮兵使用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弗·恩格斯

CARTOUCH⁴⁵⁵

Cartouch (法文是 cartouche) 这一术语在旧的军事著作中有时作为“霰弹”及“大霰弹”的同义词使用。在个别场合，这个术语还用来表示步兵的子弹盒。

在建筑和雕塑中，是檐口的砌体或装饰横撑，以及一般上面刻有某种标志或题词的各种浮雕装饰物。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卡·马克思 毕洛夫⁴⁵⁶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男爵，1814年起是登内维茨伯爵，普鲁士王国的步兵将军，等等），1755年2月16日出生于旧马尔克毕洛夫家族世袭领地法尔肯贝格。十四岁时，他在柏林洛图姆伯爵的团队里当士官生。1772年起任准尉，1777年任少尉，1786年任中尉，1793年任大尉和普鲁士路德维希·斐迪南王子的教官，他以此头衔参加了1793年的远征，并很快晋升为少校。在围攻和夺取美因兹时（1793年），他是英勇作战的光辉典范。1805年晋升为中校，1806年他参加了莱斯托克将军指挥下的托伦保卫战，和自己的营在瓦尔特斯多夫战役中立了功。1808年他成为少将和波美拉尼亚旅的指挥官，年初当他还是上校的时候就暂时代理了指挥官的职务。1811年他被调到马里恩韦德西普鲁士旅，在法俄战争初期临时担任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的总督。1813年战局初期，他任中将，被委派去围攻施特廷。在陶恩青将军接替他之后，毕洛夫联合约克和维特根施坦将军一起，迎击在意大利总督指挥下渡到易北河右岸的法军分队。4月5日在这里的默克恩附近顺利地进行了第一次战斗，接着很快就占领了哈雷。但是在极短时间内，由于联军的退却又被迫放弃了哈雷。为了保卫受到乌

欧仁·博阿尔奈。——编者注

迪诺威胁的柏林,又返回渡过易北河。6月4日在鲁考的胜利使这次战役圆满结束。停战以后,在瑞典太子的最高领导下,他指挥普鲁士第三军团。他率领该军团参加8月23日大贝伦会战而第二次解救了柏林。9月6日在登内维茨会战中,他迫使奈元帅向维登堡退却,因而第三次保卫了柏林。在围攻维登堡之后,他同北方军团一起参加了莱比锡会战。当联军强渡莱茵河时,他侵入荷兰,以强攻占领了杜斯堡、聚特芬、安亨。12月2日,他把他的大本营安置在乌得勒支并且包围了侯尔康和海尔托亨博斯。1814年,他从布雷达出发,1月11日赢得了霍赫斯特拉滕会战的胜利,炮击安特卫普,进入布鲁塞尔,占领了拉费尔和苏瓦松,联合西里西亚军团,3月9日和10日在郎城附近的战斗中担任中路军指挥。他是黑鹰勋章的获得者,晋升为步兵上将。缔结和约后任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总督,当1815年战争重新爆发时,他受命统帅第四普鲁士军团。由于命令迟到了,他没有参加利尼会战(6月15日),但是由于强行军实现了同布吕歇尔的联合,促进了贝拉利昂斯会战⁴⁵⁷的胜利结局,为此暴君 委任他为他曾如此勇敢地率领过的、因而本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十五常备团的名誉团长。1816年1月11日,他回到自己的总督职位上,2月25日在科尼斯堡因患肝病逝世。国王 授予毕洛夫一级铁十字勋章,1814年在巴黎提升他和他的后裔为伯爵。他参加过国际大战⁴⁵⁸,后来部队推进到荷兰,把法军从那里驱逐出去。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3月

原文是德文

贝尔纳多特。——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⁴⁵⁹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内维茨伯爵，普鲁士将军，生于 1755 年 2 月 16 日，死于 1816 年 2 月 25 日。从欧洲拿破仑战争最初阶段起，毕洛夫就参加了反对法国皇帝的各次会战。1808 年，他被提升为准将。1813 年，由于在默克恩、鲁考、大贝伦和登内维茨会战中取得胜利，他获得了贵族身份。后来，毕洛夫在威斯特伐利亚、荷兰和比利时立了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正如威灵顿热情称赞的那样）滑铁卢会战的胜利结局。在这次会战中，他指挥了联军第四师。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底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弗·恩格斯 把军队运往印度⁴⁶⁰

1858年7月27日于伦敦

随着英印战争的爆发，围绕着两个有趣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一个是关于蒸汽船或帆船何者较为优越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利用陆路运输军队的问题。因为不列颠政府认为有利的是帆船而不是蒸汽船，赞成绕过好望角航运，不赞成陆路运输，下院根据德·莱西·伊文思先生的建议于1858年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一个由这位有经验的将军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的决议，责成这个委员会“对采取的措施”进行调查。由于在这期间更换了内阁，委员会彻底改组；斯坦利勋爵和约翰·帕金顿先生代替了帕麦斯顿的三个拥护者。因为委员会的报告总的说来有利于当前政府，德·莱西·伊文思将军公布并散发了抗议书。他在抗议书中宣称：委员会的结论同据说是它所根据的前提完全不相符，而且完全不符合事实和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考察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使所有公正的人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作战部队和它的必须保持联系的基地之间的短距离交通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这一点根本用不着证明。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必须克服的主要困难是要通过三千海里长的海路运送自己的军队、物资和增援部队。从大不列颠到印度河口和恒河口的距

离,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和孟买的距离,按照最新的资料,可以说约有一万四千海里,但是使用蒸汽船就有可能大大缩短这个距离。迄今为止,在任何情况下,在印度的部队都是用帆船走这条远程海路来进行换防的。当印度开始骚动的时候,前不列颠政府认为这就是宣布宁用帆船而不用蒸汽船运送军队的充足理由。直到1857年7月10日以前,所有用来运送军队的三十一艘船几乎都是帆船。就在那个时候,由于英国舆论和从印度传来的不利消息的影响,从7月10日到12月1日,在运送军队的五十九艘船只中有了二十九艘螺旋推进式蒸汽船。这样就有可能对蒸汽船和帆船的运载质量进行某种初步的对比。按照东印度公司海运部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运输船只的名称和从英国到印度四大主要港口的航行时间),蒸汽船和帆船的速度对比,其平均指数如下:

从英国到加尔各答	
	天数
1857年8月6日到10月21日期间一艘	
蒸汽船(损坏事故除外)平均航行天数.....	82
1857年6月10日到8月27日期间	
22艘帆船中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116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34
从英国到马德拉斯	
2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90
2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131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41
从英国到孟买	
5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76
9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118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42

从英国到卡拉奇

3 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91
10 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128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37
蒸汽船驶抵印度四大港口的总共十九次 航行的平均航行天数.....	83
43 艘帆船的平均航行天数.....	120
蒸汽船比帆船的平均航行天数缩短.....	37

在 1858 年 2 月 27 日的同一个官方报告中提供了下列资料：

运送的人数

	人数
用蒸汽船运到加尔各答.....	6798
用帆船运到加尔各答.....	9489
总共运到加尔各答.....	16287
用蒸汽船运到马德拉斯.....	2089
用帆船运到马德拉斯.....	985
总共运到马德拉斯.....	3074
用蒸汽船运到孟买.....	3906
用帆船运到孟买.....	3439
总共运到孟买.....	7345
用蒸汽船运到卡拉奇.....	1351
用帆船运到卡拉奇.....	2321
总共运到卡拉奇.....	3672

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二十七艘蒸汽船把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人运到指定地点——印度的四个港口，平均每艘船运五百四十八人；五十五艘帆船运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平均每艘船运二百八十九人。其次，从那些官方平均数据中可以看出，蒸汽船运送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人到达相应的指定地点比帆船送一

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平均要快三十七天。不列颠海军部和其他官方机关，除了援引人们对蒸汽船航行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先例和已确定的实际经验外，还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有利于传统运输方法的论据。但是对于帕麦斯顿来说，拖延的主要原因是费用，因为蒸汽船的运费在上述大多数情况下几乎超过帆船运费的两倍。不用说，这些相当高的蒸汽船的运费一定会随着最初不寻常的需求的减少而逐渐减少，而且在这样极端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考虑特别费用，显然，增长的运费会因起义的可能性的减少而大大得到补偿。

还有比蒸汽船是否优于帆船的问题更加重要的争论，这就是有些人主张绕好望角航行，另一些人则主张取道陆路；帕麦斯顿勋爵声称后者绝对不合适。帕麦斯顿的印度事务监督委员会和东印度公司经理之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看来在英国收到关于印度起义的最初一批消息时就开始了。实际上，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解决了。1801年，那时还没有可以用来支持军事措施的轮船公司的经理，也没有铁路，相当多的军队在戴维·拜尔恩先生的指挥下从印度出发，于5—6月间在库塞尔登陆；他们在九天的时间内穿过凯里沙漠抵达尼罗河；顺流而下，配置在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守备队；第二年，1802年6月，有几个团经苏伊士和红海回到印度。这支人数达五千人的部队有一个配有六门加农炮的骑炮兵连、步兵武器、弹药、野营装备、携运物品和一百二十六箱钱币。士兵的健康状况一般说来是很好的。通过苏伊士沙漠，从靠近大开罗的朝圣湖到苏伊士的行军轻而易举地在四天内完成

瓦迪·卡赖姆。——编者注

现在已不存在。——编者注

了，而且行军是在夜里进行，白天军队宿营。就在6月，船只到达印度，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风沿着红海吹，使船只能迅速前进。1854年夏季，在最近的对俄战争中，第十和第十一龙骑兵团（一千四百匹马，一千六百人）又一次从印度来到埃及，再从埃及转到克里木。大家知道，虽然调运这些部队是在炎热的月份和季风期间进行的，虽然他们不得不在埃及滞留一些时候，但是士兵的健康和他们的战斗力都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并且在克里木的整个服役期间始终保持了这种状态。最后，是这次印度战争的经验。在丧失了几乎四个月的时间之后，经埃及转运几千名士兵是有极大好处的，节约了时间，并完全保持了人们的健康。通过这条路线运送的第一团用三十七天的时间走完了从普利茅斯到孟买的路程。第一团从马尔他岛派出，它的前一半士兵用十六天到达孟买，另一半用了十八天。许多信得过的目睹者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证实陆路运输 [军队] 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1857年10月被任命为领导和监督运送部队工作的副总补给官佩克林顿上校，在按照陆军部的命令而专门给调查委员会准备的报告中说：

“陆路的优点极大，运输也非常简单。埃及运输当局能够经过地峡每周运送一千人而不影响通常的旅客来往，三百至四百人可以同时前往，用二十六小时走完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的距离。铁路运输在距苏伊士大约二十英里处终止。士兵们在将近六小时内骑驴走完了最后这一段路程。对这个成功的经验不能有任何怀疑。”

由陆路把军队从英国运到印度所需要的时间是三十三至四十六天。从马尔他岛到印度需要十六至十八天或二十天。把这些期限同用蒸汽船走完长距离海路所需的八十三天相比，同用帆船需要的一百二十天相比，差距是惊人的。况且，在路程较长的情况下，

大不列颠在一年的三、四个月里有一万五千至二万名士兵实际上丧失了战斗力,并且如果改变命令是无法赶上他们的。而在路程较短的情况下,如果欧洲发生意外事件,返航的命令只是在两周左右的短时间内,在从苏伊士到印度的航行途中,赶不上他们。

帕麦斯顿只是在印度战争开始了四个月之后才采取陆路运送,并只运送了为数不多的部队,无论在印度还是在欧洲他都忽视了人们的普遍期望。印度的总督认为,宗主国政府应经埃及派出部队。下面是从1857年8月7日总督致宗主国政府的信件中摘录的一段话:

“我们同比利牛斯东方轮船公司在把军队从苏伊士运往印度的问题上也有联系,而这些军队是可能经过这条路线运往印度的。”

在起义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的当天,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电伦敦,请示他是否应该要求土耳其政府准许英国军队经埃及进入印度。就在这个时候,苏丹于7月2日颁布并转交了相应的敕令,而帕麦斯顿回电说,不打算经这条路线运送军队。因为在法国也认为,加速运送增援部队在那个时刻应该是下列颠政策中的头等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波拿巴自己主动提议允许英军通过法国,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马赛上船开往埃及。不久前当管理埃及比利牛斯东方轮船公司的霍尔顿先生最后被授权对这个问题作出说明时,埃及的帕沙立即回答说:

“他乐意协助运送不仅目前所说的二百人,而且必要时还可运送二万人,

查理·约翰·坎宁。——编者注

大不列颠。——编者注

阿卜杜尔·麦吉德。——编者注

赛义德·帕沙。——编者注

不仅运送穿便服的普通人，如果需要的话，还可运送穿军装和携带武器的军人。”

这些就是被如此轻率地忽视的有利条件。适当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可以防止印度战争扩大到可怕的程度。促使帕麦斯顿勋爵宁愿用帆船而不用蒸汽船，宁愿取道长达一万四千多海里的交通线而不愿走还不到四千英里路程的原因，是现代历史的秘密。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7 月 16 日
和 20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8 月 13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01 号

卡·马克思

法国革命的新宣言⁴⁶¹

1858年9月24日于伦敦

昨晚在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六十六周年的公众集会上，费利克斯·皮阿先生宣读了一封十分值得注意的《致法国名士的信》。他在信中激烈地指责法国所有的著作家在当前制度下缺乏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打算将此信大体转述如下，为了更清楚地传达它的精神，有时要离开原文。

“在政变灾难后笼罩着整个法国的黑暗中，报界的先生们比其他人更丧魂落魄。你们对镇压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你们沉默地忍受着，好象惩罚是应得的，而且那样恭顺，好象这是永世不变的。能够这样吗？十年中毫无行动，毫无声音，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没有一句希望的话。强的和弱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教员和学生，全都无声无息，全都垂头丧气。荒漠中听不到一点声息。在法语词典里不再有表示自由的词。英国人问我们，在法国还说不说法语？我们却垂头无言以对。甚至奥地利报刊都在挖苦你们，连俄国报刊也在为你们痛心。这样的法国报刊竟成了哥萨克怜悯和蔑视的对象！波拿巴藐视太阳，把它熄灭了。谁应该把它重新点燃，或者把这个熄灭了的星球换掉？没有太阳，还有火山，如果说上天不再给予光明和温暖，那么还有潜在的太阳，地下的火焰，黑暗中的光亮，人民的烈火。我们已经看到到达座维苏威火山的火焰，因此不该悲观失望。”

皮阿先生从研究院的院士开始他对法国著作界的评论，他

对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从那些不朽的人——immortels开始。（研究院院士被称作“immortels”。）这就是他们，这四十个座位，更确切地说，这四十个灵柩；著作家的幽灵，喃喃念着碑文的幽灵，他们干枯的头脑只是在复活对过去的回忆和惋惜。他 基佐，老朽的伊克西昂，被教条的迷雾所迷惑，⁴⁶²追求自己的立宪幻想，在君主制车轮的恶性循环中辗转于戈德和弗罗斯多夫之间，他是裹着‘联合派’¹²³⁶稻草的象征。还有另一位魔术师，是他的同时代人 库辛，为了爱的王国而离开了索尔邦，象浮士德那样为失去的时间寻找补偿，肩负着六十多岁的重荷重返青春，效劳于弗伦特党的明珠⁴⁶³，因为他在二十岁时曾非常喜爱折衷主义！还有第三位人物 梯也尔，他不老也不年轻，在他身上有某种没有成熟的东西，又有某种已经腐朽的东西，是一个已经衰老的孩子，一架僵化了的永动机，从艺术飞到政治，又从政治飞到历史，老是怨恨革命，大加赞扬帝国，在残废人院和他的著作中两次为大人物 举行葬礼，⁴⁶⁴——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国家历史学家，历史的蛆虫，百人卫队⁴⁶⁵编制内的塔西佗，他有陛下的委任状和政府的委托书。最后，最末的一位，但不是他们中最次的一个人，是没有写过《伊利亚特》的荷马 拉马丁，没有闻过火药味的贝利萨留，只驱散一帮低能教师，只歌颂埃尔维拉的俘获，格拉齐埃拉的历史编纂学家，吉伦特派的诗人，复辟时期的吹鼓手，共和时期的演说家，帝国时期的忠实可怜虫。

“我们不再谈僵死者，现在来谈谈人。我们看看他们中最活跃的人物——尽管是假装的，——看看那些扯起正统派、奥尔良派和自由派的旗帜捍卫自己原则的人。这是另一座墓地！不过这里还可听到一点声息。什么声息？叹息，啜泣和暗语。干这些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但没有更大的胆量。他们叹息，哭泣，却看不见眼泪。这只是沉默的反抗，忧伤的无畏，惋惜的勇敢。宪法和宪章¹⁵⁴，以及他们自己赶走的亨利五世直到公爵夫人，毫无例外都在悲泣。贝朗热的遗体被抹上了香料，伏尔泰从死者中复活…… 贝朗热进过监狱，伏尔泰曾被流放。而他们的哭灵人常去教堂。勇敢的《辩论报》声称，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贝里公爵夫人和奥尔良公爵夫人。——编者注

即《辩论日报》。——编者注

为负义人去死意味着白白送死,它宁愿不惜任何代价活着……《世纪报》则说,既然要死,那只能为温和而死。他们这一代人的英明的代表们同现状妥协,满足于人行道上的卖身生涯。”“……他们中那些真正的布鲁土斯装出温和地反对维伊奥的姿态。⁴⁶⁶的确,十九世纪中叶,在为人民的主权和理性而进行的三次革命以后,九月革命以后经过六十六年,七月革命以后经过二十八年,二月革命以后经过十年,1858年,人们在法国讨论……什么呢?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讨论拉梅耐这个勇敢和高尚的典范、正义的热忱崇拜者。他在1848年六月战斗后的第二天宁愿折断自己的笔,也不愿让它听从军刀的指挥,他勇敢地呼喊‘穷人应该沉默’,⁴⁶⁷以表示对富有的胜利者的抗议,他既把自己失去自由的岁月,也把自己葬身于公墓⁴⁶⁸变为抗议的工具,你只是一个胆小鬼和笨蛋!英明就英明在写东西而什么都不说,勇敢就勇敢在说话是为了谎言和叛变,为了同限制的制度和好,为了适应菲亚伦医生规定的食谱,为了宣读社论的甜言蜜语,为了听取皮蒙特和比利时的法制辩论⁴⁶⁹。整个这个时期十二月政体一直支配着法国的生活、权利和未来。人民过去的代表,新闻记者,优秀的公民——革命遗留下来的所有的人——从贝尔岛的监狱转移到科西嘉岛的监狱,以便服刑期满后把他们发落到更远的地方,象对待德勒克吕兹那样,把他们送到凯恩的灼热的沙漠地区……即使这样的消息也必定是从英国报刊的深处秘密地传到法国去的。甚至在崇拜偶像的罗马和吉达⁴⁷⁰的宗教狂热者中间也是闻所未闻的耻辱!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离开了她的丈夫,来到她陌生的巴黎;在这里她遭到逮捕,被送到守卫房;现在请听,这些十二月帮的士兵们在干什么!我们援引正式的起诉书。守卫军士把她关进禁闭室,用种种淫秽的要求纠缠她而未能得逞。于是他命令他的两名猎兵进入禁闭室碰碰运气。女人反抗这两个兵。军士就在兵营这里硬把妇女按倒在长凳上,在她头下垫了一个背包。然后把蜡烛熄灭,以军士和班长为首的所有在场的人(九个男人)抓住了她的手脚进行强奸,她大声喊叫:‘上帝啊!放开我吧!放开我吧!’军士示范以后下令:‘从右向左,报数!轮着来!’……然后,他们为侮辱这个女人而寻欢作乐,喝了两夸脱白兰地。而这些秩序的卫士,这些挂满了奖章的救世主,民族的花朵,这些曾经完成了十二月政变、而现在成排地完成集体强奸的文森狙击兵,被关了六天禁闭,并罚款十六法郎以补偿造成的损失。强奸者是不可侵犯的,而报道这些事实的报纸受命宣布,实际上是‘情有可原’。皇帝万岁!的确《泰晤士报》说得

对：任何具有健全思想和感情的人一定宁愿把法国报刊全部取消也不愿它们参预这样的罪行。不能让点不亮的灯冒烟！为什么继续撒谎？为什么扰乱舆论？打着真理招牌的谎言已经够了，假装羞怯的卖淫已经够了，以坚贞不渝掩饰的怯懦已经够了，以谋生为借口的腐化已经够了。虚伪骗人的木乃伊，不要再假装活人了！到坟墓里去吧……你看，这些夸耀自己至少是某种观点的拥护者的报刊专家还是好的呢！……而其他的人呢？首先，这里有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中立派，他们躲进阴凉的山洞，在那里为艺术卖弄艺术，或者为哲学卖弄哲学；他们是对韵脚或诗行入迷的隐士，只重视装束的花花公子，爱钻研抽象概念的学究，他们以庸人的无用来为自己的淡漠辩护，同时让皇帝的英雄分给他们一点儿馅饼和十字勋章，而他们自己就象昆虫作茧那样，在他们的作品里自尽；这些虚荣的毛虫，这些利己主义的虫蛹，是冷酷无情的，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因爱慕自身而死去。其次，还有一个集团，其代表人物曾经参加过革命，而现在参加投机活动……和平帝国的辉煌成果⁴⁷¹……

他们曾为原则服务，而现在为资本服务；他们曾代表政党，而现在代表银行家；他们曾自称为保皇派或共和派，而现在是以西北银行和大东方银行的名义进行活动，是米勒斯办事处或米约大厦的臣民，是吃这些银行家王朝俸禄的正统派，是交易所崇拜者的利未人⁴⁷²，他们歌颂利息，鼓吹在商人神殿里领取报酬的权利；这些圣西门主义的余孽，指挥着金牛犊（又成为上帝了）祭坛旁和骗子手（已变成凯撒了）宝座旁的合唱队……呸！我们闻到著作界令人讨厌的沉渣的气味，官场的腐朽气味，穿着仆役制服的尸体和镶着金银饰边的骷髅的气味，《国家报》、《祖国报》、《通报》、《立宪主义者报》这些在马厩的粪便中跳圆圈舞的祖国的寄生虫的气味。”

皮阿先生在他的《致名士的信》的第二部分中，用法国报刊在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时期的积极忠诚来对照它们现在所抱的完全引退的态度。在钦定宪章的制度下，

“所有的人，从最有名的人物到毫无名气的人物，都在尽自己的职责。从贝朗热到方托、从马加隆到库里埃、塔亚、图亚、贝尔、康舒瓦、沙特兰——他们全都进了监狱，一部分人在圣珀拉惹，另一部分人在普瓦西。在‘最佳共

和国的'时期,情况也一样:拉梅耐被监禁,拉斯拜尔、卡雷尔、马拉斯特、杜波蒂、埃斯基罗斯、托雷——所有共和派也被监禁。阿尔芒·卡雷尔永远感到光荣的是,他在当时用武力反抗暴行,用他的剑保卫他的报纸,使佩里埃在下面这种不能忘记的挑战面前退却:‘在街头被暗杀的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但是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在合法反抗的时候,在他自己的住所被佩里埃先生的秘密警探镇压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将是十分可贵的。他的血将呼吁复仇。每一个怀有自尊心的作家应该用法律对抗非法,以武力对抗武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就是我的职责……’⁴⁷³但是如果十二月以后法国的所有‘名士’都离开了战场,那么工人阶级甚至农民就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独自承担罪恶的迫害,准备密谋,然后转入进攻——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是无名的,纯粹的真正平民……伊波德龙案件⁴⁷⁴以及从巴黎到里昂、从圣亚田到波尔多发生的武装起义的图谋同他们都有关系。在翁热是采石工人,在夏龙是箍桶匠,普通工人,他们没有上层阶级的领导人而自冒风险地采取行动”⁴⁷⁵。

关于夏尤的密谋,皮阿先生报道了一些至今还没有人知道的细节,我就以此结束这个摘要。密谋的首领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工人(箍桶匠)阿热奈。国家起诉人利埃夫尔先生出庭时是这样描述他的:

“‘这个人是爱劳动、守纪律、受过训练的无私的工人,正因为这样他就更加危险,也更值得警察注意和司法部门干预。他声称,不能容忍一个意大利人享有拯救法国的荣誉。’为了使法官相信这个人应该算作‘家庭、宗教和财产的敌人’,利埃夫尔先生读了阿热奈从阿尔及尔寄给他母亲的信,这封信被十二月政体的警察截获,信中写道:‘我们的非洲看守们深知我与家庭的关系,常常迫使我在人情和理智、感情和职责之间作出选择。每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这种痛苦就会出现,他们牢牢盯着我,看我被这种痛苦折磨。就这样拖了很长时期。最后,典狱长——一个高级军官——在耍尽伎俩和斗得疲惫不堪之后,一天晚上来到我的牢房,同我交谈了几句,最后说:“如果你不屈服,就让你粉身碎骨。”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让我粉身碎骨,但是我不屈服。”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说,有命令要把我送到凯恩去。他们给我十

二小时考虑。我为自己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时间。就是这样，我没有屈服，也没有被粉身碎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是这句老俗话。我祝贺你，因为让你看到了，我没有屈从于诱惑，没有接受你的请求，而只是按照我自己良心的召唤来行动。这个忠诚的谋士一再向我重复说，我只是凭良心和为职责而活着，因为，不这样将一无所有，而只剩下一具粗野的外壳；我日益清楚地感到，这内心的呼声是真理的呼声……这就是我能在家人面前为自己说明的情况。”

“帝国检察官——皮阿先生指出——这样的事当然不可能虚构。”

既不愿屈服也不愿被粉身碎骨的阿热奈为了不被关押在凯恩，从阿尔及尔的监狱逃了出来，游到一只海船上，回到了西班牙，从那里到了法国，又出现在法国夏尤。玛丽安娜的忠诚战士，共和国的坚强保卫者就是这样的。

卡·马克思起草于 1858 年 9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58 号

卡·马克思 约翰·布莱特先生⁴⁷⁶

约翰·布莱特先生不仅是英国曾经有过的最有才干的演说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下院激进派的领袖。他保持着传统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力量平衡。⁴⁷⁷他曾由于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中国战争而被曼彻斯特选民赶出了议会⁴⁷⁸，当他因这次政治失败和身患重病的双重打击而灰心丧气的时候，又被召了回来，被选为北明翰选区的代表。他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离开了下院，同样，他在长期痛苦和沉默之后重返下院又是另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次重返下院是帕麦斯顿勋爵政府被迫辞职的信号。⁴⁷⁹布莱特先生来到这个帕麦斯顿已经取得独裁者权威的下院时几乎没有他自己的追随者，他把这位老练的策略家推翻了，他不仅建立了新的内阁，而且实际上能迫使别人接受他需要借以完成自己任务的条件。这种重要的地位使布莱特在 10 月最后一周同他的选民们的初次会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演说家自恢复健康以来首次亲临群众大会，所以这一事件引起了相当的戏剧性兴趣。同时由于这个人即使自己不提出新的选举法改革法案，也无论如何会决定应该由哪个政党来提出这项法案，所以国内合法的政党不安地等待他宣布战争还是和平。

布莱特先生向他的选民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在为同他见

面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另一次是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我们另外报道了这两次演说中的主要论点和最动人的地方。⁴⁸⁰如果仅仅从演说技巧的角度来看，这两次演说不如他以前的演说。虽然这两次演说也有非常出色的辞令，但在这方面仍比不上关于对俄战争的著名演说和今年春天发表的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⁴⁸¹不过这是必然的。演说者的直接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有利于解决两项截然不同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一方面要作为一种立法措施被立即提交议会，另一方面必须成为一种号召，号召改革派所有的队伍联合起来，并在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团结的改革派。这项应该由布莱特先生解决的任务，不容许他特别卖弄演说技巧，而是要求叙述率直、构思合理和观点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赞扬他，只要说布莱特先生使自己的风格适应讲话的主题，因而再次表现为一个最出色的演说家，就足够了。他的纲领可以说是把被称作人民宪章的东西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⁴⁸²他完全接受这个纲领中的一项，即投票表决。⁴⁸³他把这个纲领的另一项——普选权归结为纳税人的投票权，尽管他声称他个人对普选权寄予很大希望。这样，现在为教区或城市的复选人规定的选举资格也足够使帝国范围内的人变成选民了。最后，布莱特把宪章的第三项，即各选区一律平等归结为比较公正地分配各选区的代表名额。这就是他的动议。他本想拟成法案，作为他的改革法案提交议会，以对抗似乎得比内阁打算要提出的土地占有者的措施，同时布莱特认为，就象通过 1830 年改革法案 397 的情形一样，法案一经提交下院讨论，就会取得一致意见。一旦改革法案提交审议，各城市一定会有支持改革的请愿书寄来。下院大概会对普遍的意愿让步，而如果政府不得不采取重新选举的办法（这完全可能），那就又有了一个宣传

的机会。最后，布莱特希望，改革派对于比他的法案提出更少要求的任何法案，采取否决的态度。

这些讲话在英国产生的印象，毫无疑问伦敦的报纸已很充分地反映出来。《泰晤士报》怀着难以掩饰的激愤情绪把上次最有意义的演说比作罗马诗人所描写的大山生出的神奇耗子。该报断言，演说内容陈旧不堪，没有一点新东西，甚至语汇也不新鲜。任何一个庸俗的高谈改革的演说家都可能用这样的措辞来发表这样的演说。《泰晤士报》觉得唯一新的东西——因为它本身陈腐——是布莱特先生的恶劣作风，他把早被遗忘的对上院的谩骂又翻了出来，——好象上院议员不屑于充当社会学的通俗宣讲人，去教育下等阶层如何精神饱满地承受他们注定的屈从地位！——好象1858年的北明翰同1830年有其革命政治同盟的北明翰一样！只有没有什么教养的人才会犯这样过时的时代错误。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主张投票表决的布莱特先生缺乏洞察力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所有上天指派的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皮尔派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都一致反对这种政治邪说。托利党的报刊本身悲叹布莱特先生这样“正直的”人糊涂。这些报刊断言，他让自己掉进了辉格党伪君子存心为他设置的陷阱。看来，这些报刊认为这次演说明显地破坏了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和解。但是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完全没有失望，因为它早就明白，从这个执拗的圆颅党人⁴⁸⁴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在帕麦斯顿报刊和得比追随者报刊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纪事晨报》，为布莱特先生本身的利害而深感惋惜，因为他似乎

贺雷西《诗论》中的一段：大山分娩，生出个耗子。——译者注

失去了任何自制，不象一个国务活动家，而象一个蛊惑家。另一方面，激进派的报刊，特别是激进派的庸俗小报众口一词地既赞扬布莱特先生的原则，也赞扬他叙述这些原则所采用的方式。⁴⁸⁵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2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1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79 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 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⁴⁸⁶

11月9日于巴黎

这个城市的居民一般说来十分讨厌国外自由的成就，以致他们几乎忘记注视本国奴役制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的表层毕竟处处出现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具体说来，我们是指贝里耶先生对律师的作用在衰退和法国的司法越来越奴颜婢膝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另一个证明，是各种色彩的自由派全都试图重新开展斗争，至少要在报刊上设置障碍，堵住每天通过十二月帮的报刊的闸门向全国倾泻的那股污水。例如在巴黎，德·奥松维尔、茹尔·西蒙、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奥迪隆·巴罗、杜韦尔吉埃·德奥兰、巴尔尼、奥罗以及其他一些先生们，正在这方面尽他们之所能。在默尔特省一批独立的作家着手出版定期刊物，题名《文选》，目的是同那个非常可怕的集权制作斗争，因为它把法国紧抱在自己致命的怀里，如同蛇缠着劳孔尼身体一样；在亚尔萨斯，这类刊物也在着手出版。然而，看来巴黎的《星期日信使报》周报在新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担负着领导角色。甚至只要浏览一下这个周刊，就马上可以想象出在它的

默尔特-摩泽尔省。——编者注

道路上有种种巨大的困难，此外，它的撰稿人在贿赂成风的环境里，似乎也不同程度地沾染上这种习气。但是要弄清问题，还要作相当大的努力，因此我打算对他们最近在关于波拿巴的抨击性著作方面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进行研究。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 发表所谓《关于俄国的报告书，
呈当今皇上》的文件的按语⁴⁸⁷

在普鲁士摄政问题得到解决和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后，他的继任者们在其他正式公文中立即发现了一份十分有趣的文件《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这个报告书的摘要还是落到了外人手里，他们认为这个时刻正适于发表这样的国家文件。

所有直接抄录原文的引文放在引号内。我们删掉了文件开头关于俄国历史的一般看法，从有关彼得大帝时期的那部分开始。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8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03 号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文件”时写了一段前言：“乌尔卡尔特分子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以这个标题发表了文件。这个文件对普鲁士和德国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在此全部刊登出来。我们自己在最近一号报上开始探索波拿巴扮演丑角而俄国扮演主角的那出戏的秘密线索。而现在我们让《自由新闻》来讲话。”——编者注

弗·恩格斯

意大利战争。1859年⁴⁸⁸

- 1月1日 波拿巴的新年讲话。⁴⁸⁹
- 2月26日 考莱的使命⁴⁹⁰旨在进行安抚和使两 [国] 从教皇国撤 [军]。
- 3月 奥地利武装和加强驻意大利的军队。
- 4月23日 奥地利致都灵的最后通牒 :立即解除武装 ,否则开始军事行动。卡富尔向法、普、俄同意英国建议召开的会议呼吁⁴⁹¹。
- 4月24日 边境步哨。
- 4月25日 法国军队在热那亚登陆。
- 4月26日 奥军开始军事行动后渡过提契诺河。
- 4月27日 因革命爆发 ,大公 从托斯卡纳逃亡。临时政府。5月11日由皮蒙特委员会所取代。⁴⁹²维也纳消息 :法国同俄国订立攻守同盟。
- 4月29日 奥地利在洛美利纳构筑工事。
- 5月1日 帕尔马女公爵被迫逃亡。返回若干日 ,但后来永远离开了 [公国]。

法国和奥地利。——编者注

莱奥波德二世。——编者注

-
- 5月10日 波拿巴 [赴] 意大利。
5月20日 蒙特贝洛会战⁴⁹³。
5月31日 帕勒斯特罗会战⁴⁹⁴。
6月4日 马振塔会战⁴⁹⁵。
6月7日 梅累尼亚诺会战。
6月24日 索尔费里诺⁴⁹⁶。
7月5日 罗素勋爵致函劝阻兼并萨瓦⁴⁹⁷。
7月7日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
7月11日 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⁴⁹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59年7月19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意大利的未来⁴⁹⁹

《通报》9月9日发表的那篇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已经闻名的文章，据推测，直接出自路易·拿破仑本人之手。这篇引起如此广泛议论的文章，可以说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赞扬维拉弗兰卡条约 498，特别是其中规定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那一部分。第二，承认条约和条约签订前的耗费巨大的战争都未能解决意大利的任何问题，并且试图把条约本身失败的过错转嫁给阻止条约规定的被赶走的各君主复位的那些人身上。第三，警告意大利人，既然他们不愿迁就法国皇帝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的制度，那么他们也就再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必须作好准备，在法国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下奥地利会重新恢复过去对意大利人（他们处在法国直接管辖之下）的统治者的地位，又成为始终觊觎着意大利民族的不容他人染指的残酷敌人，经常用大批军队威胁意大利，使这个国家经常处在惶惑不安之中。

为了对签订条约这一事实本身进行辩护，并证实同战争开始时宣布的纲领相反，意大利相当大一部分领土仍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文章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奥地利本身力量强大，它虽然失败，但仍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和强大的工事，第二，——而这是主要的一点，面临德国干预的危险，拿破仑皇帝会被迫把

战事转移到莱茵河两岸，从而有极大的危险丧失在意大利已经取得的优势。为了对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协定进行辩护，拿破仑硬说，只有作出这样的让步，他才能促使奥地利皇帝参加拟议中的意大利联邦，从而承认意大利民族，并自愿放弃他以前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和控制（这是这场战争的原因）。拿破仑提出他同意各大公复位的又一理由，是奥地利有给威尼斯以不同于奥地利帝国一般行政建制的自治的对等义务（第一次提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把威尼斯从征服者用军事力量控制的奥地利的一个省变为有自己地方行政机构的一个意大利公国，从而作为意大利联邦的一员，享有因归属意大利民族而应得的好处。这个协定看起来好象是背叛了受拿破仑本人唆使的人，而且协定的结果有损他在意大利人中的声誉。他为了对这个协定进行辩护，还提出了另外的理由，他说，各大公复位是在取得人民同意和对将来作了保证的情况下规定的，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各大公的复位都不能有外国军队介入。

文章继续明确地写道，如果意大利人民真诚接受并实现这个由两位皇帝一致同意的关于意大利的协定，会得到什么东西。奥地利会立即从意大利的威胁和恐吓变为友好的至少是无害的势力。意大利联邦就会通过自己最有影响的成员国撒丁实际上保证意大利民族的生存，找到意大利事务的代表。但是，《通报》的至尊的作者感到非常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希望，据他说由于过去和现在一直阻拦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那些人没有远见和自私自利，全都破灭了；而且他说，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战争和条约

都遭到彻底失败。既然条约的这一部分没有达到目的，拿破仑说，奥地利也就摆脱了它对威尼斯和意大利联邦的义务。奥地利在这两个问题上现在已不受约束，它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它的老政策：把在波河南岸的驻军作为理由，以便使自己的军队在对岸保持战争状态，而且实际上对意大利的其他所有地区采取曾经造成了过去这场战争并最后一定会引起新的纠葛和灾难的那种姿态。

关于维拉弗兰卡并没有人要动用军队来为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说法，同拿破仑关于不容许为此目的动用外国军队的声明，看来在意大利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意思；从这个观点来看，《通报》上的文章在那里已经被人们欣然接受。但是文章对这样的解释没有提供任何根据。文章最多不过表示了如下的意思：拿破仑不承担义务用武力来履行条约中的这一项，而且他也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在这个声明中丝毫没有暗示，如果奥地利认为需要越过波河（奥地利找到这方面的借口一点不难），拿破仑就认为有义务进行干预。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话只能理解为一种预告：他干预意大利事务的游戏结束了，他对意大利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不负任何责任。关于预定召开的讨论意大利问题的欧洲会议，他甚至推测说：没有补偿就不能从奥地利得到任何东西。不管怎样，唯一的选择是战争。在这方面法国已做了它想做的一切，意大利人期望有人还愿意为他们参战，那是徒劳的。

的确，文章看起来向意大利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者同意各大公复位，或者寄一切希望于法国的进一步干预和准备自己同奥地利打交道，只要他们确有这个本事。实际上，根据文章在谈到奥地利皇帝和他为了同法国相互谅解而甘愿承受因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给他们带来的牺牲时所用的友善的语调来看，似

乎无须怀疑还要同奥地利皇帝发生新的争吵。另一方面，这个宣言的主要目的看来是要让奥地利明白，既然事情取决于法国，法国就可以随意来对待意大利。为了建立一个看来已是一种空想的意大利联邦，法国皇帝耗费了一亿元并在战场投进了五万兵力，他打算不再关心意大利的事务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9 月 12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9 月 2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52 号

卡·马克思

* 论 分 工⁵⁰⁰

……形成 [社会] 的整体。因此，我的劳动表现为全部社会劳动的独立部分。各种不同的劳动构成社会劳动的不同部分，因此，总的来说，它们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通过交换，表现为整体，表现为互相补充的各部分，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系的各个环节。

这种在交换中表现为各种不同有用劳动的分工，有两个方面应该加以区别。

第一，与劳动种类相关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不是它们的同一性，是它们的多样性，而不是它们的划一性。社会分工是多种多样劳动的整体，这些劳动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差别，由于它们的差异性而互相补充。

鞋匠想把自己物化在鞋中的劳动去交换面包、茶、糖、煤、肉、衣服、帽子等等，也就是去交换面包师的劳动，茶农的劳动，糖厂工人的劳动，肉商的劳动，裁缝的劳动，制帽工的劳动等等。他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因为别人的劳动与他自己的劳动不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劳动所不能满足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别人的这种劳动体现在那些不能体现他自己的劳动的生活资料中。假如别人的劳动与他自己的劳动是同种的劳动，那他就不需要别人的劳动，也就不会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了。因

此，只要劳动是有用的劳动，它就能与其他各种劳动相交换，因为既然它们彼此不同并隶属于人的需要的不同领域，它们是彼此不同的。

第二，如果我生活上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都由我自己进行，也就是说，自己为自己生产一切生活资料，那么，我就不需要别人的劳动，也就不会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而别人同样会自己进行维持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劳动。如果我不仅做靴子，而且自己烤面包，酿啤酒，种小麦，编织衣服，我也就不会用自己的鞋匠劳动去交换面包师的劳动，啤酒酿造工的劳动，农夫的劳动，织工的劳动了。

我的劳动是片面的，但它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如果我不知道其他社会成员在进行着其他各种必需的劳动，因而补充着我的劳动，那我就不能只从事这种片面的劳动。因此，满足一种社会需要的劳动，是把这种劳动变成自己职业的一定的个人的特殊的劳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秋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⁵⁰¹

1860年6月12日于柏林

下面是最近在巴黎出版的阿布先生的最新小册子的摘要：

“德国将会知道，法国的友谊是有一定价值的。难道我们的士兵没有冲往黑海把奥斯曼帝国从灭亡中拯救出来？难道不是仅仅由于我们的影响莫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才没有流血就获得了解放？在我们的保护下意大利走上了独立统一的道路，我们的军队为意大利开辟了一条道路，它现在正沿着这条道路在皮蒙特带领下向前迈进；如果上天允许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如果在我们的门前组成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那么法国就不会抱怨了。”
“因为它认为，只要还存在被压迫民族和不为自己臣民所容忍的君主，欧洲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秩序。”

“这个高尚的民族”

（德国）

“还从未有过 1813 至 1815 年那样的强大，因为它从未有过那样的统一。当法国人以惊叹的口吻谈到法国如此惧怕的运动时，他的供述是值得注意的。被胜利所激动的德国，它的荣誉感和独立感创造了奇迹。全国只有一种激情，一种心意。全国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了，而我们无与伦比的军队的失败表明了统一的德国能够干出什么来。”

“让德国重新成为统一的国家。这是法国热切希望的，因为法国对德意志民族怀着无私的爱。如果我们被某些君主强加于我们的强烈的虚荣心所缠身，那么我们就不会鼓励德国统一。让德国成为统一的，并且组成一个非常

坚强的整体，使任何入侵都不能得逞。法国看到在它南部边境上建立起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丝毫不感到可怕，看到在它东部边境有三千二百万德国人也不感到恐惧。”

“德国人开始懂得，保存三十七个邦政府是多么不明智。”

它们下定决心要达到统一。

“普鲁士将是它们的核心，因为普鲁士体现了贸易和思想的自由，而奥地利代表保护关税、专制以及它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⁵⁰²所引起的一切灾祸。所以它们将团结在普鲁士周围。但是普鲁士必须在神权和民权之间作出选择。当某些君主抓住错误的正统主义不放的时候，真正正统主义的帝国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不勒斯国王硬说他的臣民是属于他的，他们则用武力对抗这种狂妄主张。法国皇帝和撒丁国王以现代哲学的精神声称，人民只属于他们自己，而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几乎一致地把他们选为自己的领袖。普鲁士亲王是赞成神权还是赞成民权呢？这样的声明对他尤其必要，因为普选权的成果国民议会于1849年给宫廷里的国王带来了合法的王位。而他做了什么呢？他赞成神权，反对民权，他只是在君主们请他接受王位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王位。”

于是普鲁士的傻瓜们鼓掌说：

“‘我们不要被民主制唾脏了的王位。’萨克森和巴登推翻了自己的君主。两支普鲁士军队为了神权向前推进，侵入萨克森和巴登，把萨克森的国王象巴登公爵一样重新扶上了王位；在一切都照此处理妥当和巴登的民主派军队逃往瑞士之后，普鲁士人残酷地枪杀了二十六名德国爱国者。”

“一位普鲁士民主主义者不久前写信给符腾堡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们合并呢？’他们回答说：‘要是我们成了普鲁士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诗

弗兰契斯科二世。——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威廉，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人乌朗特的领导下逃亡。”

“没有比这种论点更奇特、更真实的了。1848年以后，欧洲所有的君主，包括教皇在内，都宣布了大赦。而普鲁士还没有宣布大赦。如果摄政王想获得自己国家的嘉奖，就让他召回被放逐者，并成为1849年议会的遗嘱执行人，就象拿破仑成为法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请容许我们驳斥德国存在的某些错误观念。那里有人相信某些封建主义的报刊，认为法兰西帝国正处在被奴役的状态，皇帝的政权束缚了思想，取消了人民的代议制”，

并且把我们的自由扔给了豺狼般的魔鬼。

“普鲁士人认为，他们在自由派和议会的管理下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说实在的，法国皇帝建立法国的伟大和幸福”，

采用的手段是独裁政权，

“不过实质上这是民主主义的政权，因为它是由人民委托给他的。”

难道封建主义在普鲁士不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法国军队忠于皇帝，但它不属于他而属于民族。普鲁士军队呢，它属于国王还是属于民族？霍亨索伦首相前几天说过：‘属于国王。人民的代表同军队应该毫无关系。’”

“的确，出版自由在我们这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没有取消出版和被出版的权利，而只是延期而已。一个民族在一个创立伟大事业的君主面前。愿意沉默，就象一个哲学家或大作家的朋友们在他的书房里保持沉默一样。至于权利，那总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皇帝忘记！把权利归还给法国人，那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是有可能要求权利的。”柏林的著作家们大概是比较自由一些，尽管要缴纳税金、押金等等，“但是谁向他们保证特权的持续有效呢？”授权人也可以把它们收回去，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借给皇帝，而他们是向摄政王借自由。

“德国人认为，我们让自己失去了我们的议会制。这是真的。从1848年起，我们的议会就变了样。议会不再是代表四五十万人的集团；整个民族把自己的代表派往立法团。这个象皇帝本人一样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已经不再

享有荒谬的特权！去破坏国事的进程、用空谈代替行动、用联合代替统一、用个人的虚荣代替国家的利益、用纵容演说者卑鄙的虚荣心代替伟大人民的重大进步；然而议会却享有无比珍贵的权利，可以对帝国的一切捐税和法律进行投票表决。”“我们是否有什么理由羡慕普鲁士的宪法？难道普鲁士采用了内阁责任制的原则？根本没有。难道议院拥有拒绝投票表决捐税的公认权利？没有。普鲁士的议院是什么东西呢？其中之一相当于我们的立法团或！下院，与其说它是借助民主的办法成立起来的，不如说它是精心炮制出来的。”假设有一个缴纳三十万法郎直接税的区，纳税人分成三类：支付十万法郎的十五至二十名大财主构成第一等选民，支付另外十万法郎的两、三百人构成第二等选民，支付余下十万法郎的两、三千人构成第三等选民。每一等各选六名复选人，而这十八名复选人再选出代表。因而中间等级的代表权完全被排除了，因此，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坐在保守派一边的冯·芬克先生，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现在倒是普鲁士议会里最先进的民主派了。有这种议院的自由主义的德国是否能取得许多成就呢？即使下院表现出进步的倾向，难道上院不会捆住它的手脚，把它压倒？这个议会是由按世袭权利占有席位的贵族和国王在贵族、大学和大城市向他推荐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一方面是世袭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君主的挑选。上院只从这方面得到补充，所以它反对一切自由主义措施。”最近“上院以相当的多数否决了非宗教婚姻的原则，前不久，由于大臣提议贵族必须象所有其他市民阶级一样纳税，上院差点起来造他的反。”

“这个宪法还很不完善。如果德国决心投入普鲁士的怀抱，那就要彻底修改这个宪法。”

“本来非常希望普鲁士比较公正地对待按普选权建立起来的各邦政府。我们并不因为德国报刊的侮辱性抨击而指责柏林宫廷。我们也不期待摄政王会封住他的臣民的嘴，即使在他们侮辱我们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说，如果《世纪报》和《民论报》侮辱的君主不是法国的敌人，那么《通报》，或者至少半官方的报纸应当急忙进行严厉的驳斥以示陪罪。”

“本来也很希望，普鲁士的政治活动家在普鲁士议会里不要公开地大肆攻击法国。当冯·芬克先生在普鲁士下院声称必须夺取我们的亚尔萨斯和洛

林时，这种不明智的发言并没有激起法国民族拿起武器，而是使我们有理由满意地说，法国不可能有这样轻率的行为。”“自从拿破仑第三登上帝位，特别是兼并尼斯和萨瓦以后，德国的政论家们，而且据说连德国的君主们都相当大声地叫嚷，对法国政策表示毫无根据的怀疑。他们硬是把兼并莱茵地区和强占德国领土的计划强加于我们。人们如此大吵大嚷地一个劲地谈论这种没有根据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十分公正，那就会使我们产生坏的想法。显然，如果您在街上走到一个最温和的不会得罪人的人跟前对他说：‘阁下，您想打我耳光。您可以发誓说您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用不着发誓硬让我相信不是这样，因为我不相信您和您的誓言，因为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但我比您壮。我不怕您。我会把您象苍蝇一样捏死。我让您打我一记耳光试试看，’——难道温和的最不得罪人的人不会认为这种情况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做人们要求他做的事吗？难道他不会给挑衅者一记耳光？”

“但是任何挑衅都不会使法国离开给自己规定的界线。我们非常公正，不想占领属于其他民族的领土。愿上帝保佑，让德意志联邦也受这些思想的感召！这样它就不会侵占波兹南公国，也不会进攻北方的什列斯维希，也不会宣称的里雅斯特是德国的城市。至于我们，我们敢于肯定洛林和阿尔萨斯是法国的，因为不管德国人如何，它们本身证实了这点。我们保护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保卫我们的领土来说，欧洲所有的天然界线和河流还抵不上端着刺刀的朱阿夫团或猎步兵团一半的价值。”

“除这些友好的劝告外，我们是否可以再补充一点希望？这个希望将表明，我们是多么深切地关注着德国的统一和未来的普鲁士。”

“普鲁士的名字、普鲁士的宪法、普鲁士至尊的摄政王个人在德国赢得的同情很多，而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所有国家的正直的人那里引起的反感可能更多。1860年5月12日普鲁士警察局的鬼蜮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看到了一个最奇特的混合体，一个愚笨和不道德的混合体，热心殷勤和粗心大意的混合体，挑拨性的教唆和笨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混合体。”

“尼斯”一词是马克思加进去的。——编者注

“这就是波兹南大公国的极可尊敬的代表涅果累夫斯基先生向普鲁士议会报告的那些事实。三个普鲁士官员——波兹南省总督冯·普特卡默先生、警察局长冯·贝伦施普龙先生和翻译书记官波斯特先生——曾经寻找方法来表现自己的热忱和博得政府的感谢。冯·普特卡默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比省长大一些，比大臣小一些；冯·贝伦施普龙先生是个知名人士；波斯特是微不足道的人。”

“第一位出主意，第二位口授，第三位写。这三位可尊敬的人开动了他们当官的脑筋，想出一个伟大的主意即在波兹南发动起义，然后好通过镇压这场起义使自己获得荣誉和光荣。他们并不厌弃连维克都会望之却步的奸细兼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假装是对普鲁士统治不满的波兰人。他们在他们的办公处设立假民主委员会，同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再要求说：‘给我们派专员来，给我们送传单和武器来。’他们则往伦敦寄去预算中开支的钱和从不幸的纳税人那里掠夺来的塔勒。税款找到了不坏的用场。警察局的秘书施托尔岑贝格先生成了这个企业的财务官。信件接着寄给最高法院参事的妻子鲁赫夫人。”

“伦敦委员会没有立即上当。它拿不定主意，没有相信。看来，它已推测出有人背叛。但是，演三重唱的官员毕恭毕敬地央求寄些信和通告给他们，大肆赞扬马志尼将军，十分激动地评论弗利克斯·皮阿的作品，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以致使伦敦的某些革命家，甚至包括马志尼本人在内，开始同他们通信。这个奸诈的把戏持续了三年，要不是突然被涅果累夫斯基先生的霹雳所制止，还会持续到今天。”

“善于辞令的波兹南演说家把贝伦施普龙先生按照普特卡默先生的意思口授而由波斯特写的二十四封信的原件都摆在桌子上。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858年8月19日，最后一封是1860年4月。没有人，甚至内务大臣冯·施韦林先生也不敢出来否认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我们握有翻译员忠实译成的译文。信件证明，普鲁士警察局促使伦敦委员会把煽动性的传单寄往波兹南大公国，支付在伦敦印刷这些传单的费用，并且促使在有嫌疑的人中间散发这些传单，以便后来把他们抓起来，警察当局会牺牲普鲁士国王的几个臣民来显示它的尽心竭力；信件证明，普特卡默、贝伦施普龙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劝说和许愿的办法使得伦敦委员会给他们派来一个名叫吕伊特的专员，他们”

(也就是警察局)

“给他提供护照,使他能够自由往来,以便他把尽可能多的人牵连进去,然后把他逮捕起来,判处两年徒刑”。在完成这次光荣的业绩以后,冯·贝伦施普龙先生,这个被他破坏的制度的拯救者提出自己为议员候选人,但是落选了,“不过他继续同马志尼和伦敦委员会通信,发誓赌咒地要他们相信,波兰的贵族出卖了柳依特(1859年7月5日的信),许多波兰贵族为警察局效劳(1859年7月19日的信)”。

“这几个官员竭力在他们的信中向伦敦委员会中伤波兰贵族和僧侣,包括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内。他们主张为人民剥夺、并瓜分地主的财产。1859年3月27日,他们得知法国人的皇帝打算做出宽大的姿态,支持意大利独立。为了确定这一点,他们写信给伦敦委员会,恳求马志尼在法国军队开到之前发动全国起义,在拿破仑能够干预意大利事务之前,请他竖起红旗。5月21日,他们感谢伦敦委员会给他们寄来‘奥尔西尼的炮弹配方’。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也会猜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配方。我们知道,这些先生是在警察局供职的,因此,他们不能成为密谋家;他们的意图必然是最单纯的。无疑,他们是想警告皇帝注意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信里附上一句话:‘法国的民主派还会把损害拿破仑的新计划推迟很久吗?’在维拉弗兰卡⁴⁹⁸以后有理由认为,每个德国人应当对威尼斯仍留给奥地利一事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给马志尼写信说:‘革命会在意大利、匈牙利、德国、普鲁士、也可能在法国甚至波兰爆发。拿破仑的背叛擦亮了全世界的眼睛,所有被压迫民族都很想摆脱他。’这些普鲁士警探们还写道:‘法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不会有第二个奥尔西尼吗?难道共和派不想采取任何推翻暴君的行动了吗?’(1859年8月20日)”。

“我们不想把这种轻率行为的责任加在最上层的人士身上。警察局比罪犯更难堪,因为它不够审慎,使它的最机密的文件躲不过正直人的眼睛。不过普鲁士政府本应该使它的警察局离开这条危险道路;决不应该促使人们去犯罪,甚至去作探听他们内情的工具。”

“谁都知道,如果奥尔西尼罪恶的谋杀得逞,那他也就是杀了意大利未来的解放者,而且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危害大于他带来的好处。还可以说,如果普鲁士警察局没有任何恶意,而只是出于愚蠢的殷勤才找到第二个奥尔西尼,

那它就使普鲁士失去了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大力效劳，只要它稍稍迁就的话。”⁵⁰³

卡·马克思起草于 1860 年 6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6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86 号

卡·马克思

* [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
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
(两卷本, 1857年伦敦版) 一书
[第1卷] 摘录⁵⁰⁴

(1) 1520—1559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

(1523年。卡耳马尔君合国⁵⁰⁵的分离; 古斯塔夫·瓦萨被选为瑞典国王。)

1520年。查理(五世)在埃克斯-拉沙佩尔加冕称帝(勃艮第、西班牙、西西里、那不勒斯、纳瓦腊以及奥地利的统治者(1519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后))。

米兰是路易十二根据他的出身于维斯康蒂家族的祖母的权利所要求的地方, 1515年被弗朗索瓦一世从斯福察手里夺走, 而现在查理对米兰提出要求, 认为是帝国的采地。弗朗索瓦还重新提出法国对那不勒斯和勃艮第的要求。因此, 爆发了十四年战争——战争的起因无疑是米兰。

亨利八世同奥地利结成同盟。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比科卡战役失败后)放弃米兰公国。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同奥地利结成同盟。

弗朗索瓦一世没有一个同盟者；

沙尔·波旁（元帅）转到查理方面。

在博尼韦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二次战役（在意大利）。法军被击溃。查理·波旁进占普罗瓦斯，英军准备入侵皮卡尔第。

弗朗索瓦将掠夺者赶出法国领土，占领米兰公国（马利尼亚诺会战以后）。

1525年。弗朗索瓦在帕维亚战败，作为俘虏被押到马德里。反查理同盟——意大利各小国、新教皇（克雷门斯七世）、亨利八世、萨瓦的路易莎（法国摄政女王，弗朗索瓦的母亲）。1526年弗朗索瓦为了获得自由，同意马德里和约。

弗朗索瓦、教皇、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亨利八世订立同盟⁵⁰⁶。

波旁率领帝国军队把斯福察赶出米兰，把罗马抢劫一空。弗朗索瓦和亨利八世向查理宣战。

法军占领罗马，包围那不勒斯。法军军营中发生疫病，返回法国。

德国的路德派公爵和苏里曼部队遏止查理。奥斯曼军队几乎占领整个匈牙利，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曾企图把匈牙利据为己有。苏里曼兵临维也纳城下。

1528年。康布雷条约（夫人条约）⁵⁰⁷。弗朗索瓦又放弃他对米兰、那不勒斯和弗兰德的要求。至于勃艮第这个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达成临时协议：重新把弗朗索瓦同查理的姐姐葡萄牙的爱琳娜的婚事作为特殊的条件。

查理反对路德派教徒。

从此以后，各君主在内外政策方面事行两种方针，教皇甚至寻求同异教徒结成同盟。

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⁵⁰⁸。谴责新措施的决议。新教徒建立施马尔卡尔登联盟³⁵¹，寻求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弗朗索瓦表示愿意接受建议；甚至同奥地利的斐迪南的对手，匈牙利的亚诺什·扎波略订立同盟，并派林孔去君士

坦丁堡，以便取得苏丹的支持。弗朗索瓦让他的儿子同教皇的保女卡特琳·美第奇结婚，亨利八世却断绝了英国同罗马皇位的关系。⁵⁰⁹

1532年。纽伦堡临时和约

(查理和新教徒之间的)。

查理远征巴巴罗萨。

1535年。媾和六年以后

弗朗索瓦又发动战争(第三次战争)，

重新出现在意大利；取得胜利，迫使米兰和萨瓦接受条件。查理从阿尔及利亚胜利归来，把法军赶出意大利，侵入普罗瓦斯，最后他被赶走。

1538年。在尼斯订立为期十年的和约。但是根据查理的命令两名法国公使在意大利(林孔在波尔塔，弗雷戈索在威尼斯)被逮捕，并由于他的背信弃义而遭到杀害。弗朗索瓦再次发动战争。投入五个军团，但是毫无结果。

1544年在克雷斯皮签订和约：弗朗索瓦放弃对那不勒斯和阿尔土瓦的要求，答应不干涉纳瓦腊的事务。

(亨利八世又倒向查理方面。)

1547年。弗朗索瓦一世逝世；他的儿子亨利二世。

查理反对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1547年由于萨克森的莫里茨的指挥，帝国军队在缪耳贝克取得胜利，同盟解体。

查理宣布临时协议³⁵³。

莫里茨得到亨利二世的协助，突然进攻在提罗耳的皇帝。

(1552年查理不得不同新教徒签订帕骚和约)

在法军为占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而入侵洛林公国的同一年。查理被赶

亨利二世。——编者注

海尔埃丁·巴巴罗萨。——编者注

出麦茨，1556年退出政治舞台，把他的领地分给他的弟弟奥地利的斐迪南和他的儿子菲利浦二世。

亨利二世和菲利浦二世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继续进行战争。

1559年。卡托-康布雷济条约。每一方都必须退还1551年以来所掠夺的一切；法国除萨瓦424还交出了一百八十多个堡垒。亨利二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同菲利浦二世结婚。亨利二世逝世。

实际上，这个时期（查理五世时期）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不过是在德国的路德派教徒、苏里曼、匈牙利（扎波略）和教皇（克雷门斯）的支持之下，并且利用了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角逐。

（ ）1559—1618年尼德兰和菲利浦二世

1559年。法国的弗朗索瓦二世。

（法国的宗教战争。）1566年。尼德兰骚乱开始。

1572年奥伦治的威廉被宣布为荷兰、西兰、乌得勒支的统治者。1579年乌得勒支君合国。

英国的伊丽莎白。

1562年（伊丽莎白同法国的新教徒签订条约以后）同查理九世（法国的）签订条约。斐迪南（皇帝）和菲利浦二世都参加了条约。

1572年。巴托罗缪大屠杀。

1585年以前。尼德兰自治。1585年伊丽莎白同尼德兰签订同盟条约。

1589年华洛瓦王朝的末代君主亨利三世被害。

纳瓦腊的亨利（亨利四世）。

1593年伊丽莎白和亨利四世在海牙订立同盟；尼德兰参加同盟。

1598年亨利四世和菲利浦二世在韦尔万签订和约（彼此归还1559年以

来侵占的土地)。这个和约宣告西班牙优势地位已经下降。(同年颁布南特敕令。)菲利浦二世逝世。菲利浦三世。(1588年舰队覆灭。)伊丽莎白逝世。詹姆斯一世。

1609年亨利和西班牙签订对联合省停止军事行动(形式上停战十二年,实际上承认尼德兰独立)的协定。(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旁系仍保持对意大利的统治,1581年获得葡萄牙。)

亨利四世改造欧洲的计划(削弱奥地利)。⁴³⁷

根据这项计划:

意大利:教皇——世俗统治者(罗马、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归他统治);威尼斯(共和国,同佛罗伦萨、摩地那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小国合并);萨瓦公爵(应成为伦巴第的国王)。

波希米亚(选定王国;应当把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鲁日伊策人居住的地区并入波希米亚)。匈牙利(应当把奥地利大主教辖区,即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并入匈牙利)。波兰也应当扩大版图。瑞士(应当加上提罗耳、亚尔萨斯和其他领土)。尼德兰(应当成为共和国)。

奥地利王室的[领地]应当仅限于西班牙和地中海沿岸的几个岛屿。

1610年亨利四世逝世。

(在这一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长系衰落。)

() 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

1617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皇帝)签订条约。确认瑞典对卡列里亚、凯克斯戈里姆和因格里亚的统治。俄国同芬兰湾和波罗的海隔绝。阿道夫(反对波兰)确认他在利沃尼亚和波属普鲁士的统治。十六世纪末——亚盖隆王朝结束。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现在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匈牙利在试图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时,土耳其援助它同时又从中干扰。

斐迪南一世、马克西米利安和鲁道夫二世(延续整个十六世纪)在位时,奥地利从未参加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以进贡求得同苏丹的和解,

并因匈牙利问题而争执。

1606年。通过维也纳条约在匈牙利建立和平（鲁道夫二世）。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得到承认。⁵¹⁰波斯国王阿巴斯遏止土耳其；土耳其在欧洲的推进停止下来。

斐迪南二世（施梯里亚大公）即位。

1618年。在波希米亚开始骚乱。捷克人拥护弗里德维希第五（普法尔茨选侯）为王；贝特伦（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是他的同盟者。

1619年8月28日斐迪南二世被选为德国皇帝，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西班牙、教皇和玛丽·美第奇缔结同盟（在娶菲力浦三世的女儿安娜为妻的路易十三还未成年时）。（1620年昂古莱姆公爵代表法国同斐迪南二世在乌尔姆缔结条约。）菲力浦三世逝世。菲力浦四世。德国新教徒[找到]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作为同盟者；华伦斯坦的军队。战争开始。⁵¹¹威尔士亲王同法国的罕丽达结婚。

1624年。黎塞留执政。

1625年。黎塞留占领瓦尔特林纳，发动同西班牙的战争。查理一世（在英国）。

1626年。贝特伦被迫同斐迪南二世签订和约。⁵¹²丹麦（从1625年起参加战争）被迫同斐迪南二世单独媾和（1629年）。

1629年。斐迪南二世的归还敕令。³⁵⁸拉罗谢耳被让给黎塞留。

1629年。黎塞留充当瑞典和波兰签订和约的中间人。⁵¹³古斯塔夫·阿道夫（得到法国资助的许诺以后）派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

1631年。法国和瑞典签订条约。

（1629年。曼都亚公爵贡萨加死后，讷韦尔公爵卡尔和瓜斯塔拉 [公

加博尔·贝特伦。——编者注

保罗五世。——编者注

罕丽达-玛丽亚。——编者注

文钦佐第二·贡萨加。——编者注

爵]斐迪南是公国的王位追求者。法国支持前者,奥地利支持后者。法军用武力打通了到苏扎的道路,确立了讷韦尔公爵)⁵¹⁴。

1632年。吕特岑会战。古斯塔夫·阿道夫被击毙。

1634年。瑞典军队在诺德林根战败。

法国直接参加在德国的战争。

法军的同盟者瑞典军把亚尔萨斯的堡垒交给法军后,法国占领了亚尔萨斯。黎塞留同尼德兰建立新的同盟。萨克森选侯 转到皇帝方面;巴黎和约⁵¹⁵。

战火又同时在西班牙、意大利、尼德兰、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燃起。黎塞留入侵西班牙。(1635年)。沙蒂永和布雷泽元帅进入尼德兰;克雷基在意大利同萨瓦公爵 联合;盖布里昂和蒂雷纳在莱茵河流域和瑞典军协同作战;其他部队侵入西班牙。

主要对手:奥地利和西班牙为一方,法国、瑞典、尼德兰为另一方。

1637年。斐迪南二世逝世。斐迪南三世当皇帝。

1640年。特兰西瓦尼亚公爵乔治·拉科齐打算同法国和瑞典联合起来在匈牙利发起新的战争;后者(法国)还同发动起义的卡塔卢尼亚人结成同盟。葡萄牙爆发革命;西班牙人被驱逐。皇帝保证同土耳其人休战,占领匈牙利一半领土。法军在意大利、西班牙、佛兰德和莱茵河流域取得胜利。

1642年12月4日黎塞留逝世。1643年路易十三逝世。马扎里尼

(西班牙安娜摄政)。⁵¹⁶

1645年。闵斯德全权代表会议(主要讨论瑞典和新教国家的问题)和鄂斯纳布鲁克全权代表会议(主要讨论法国问题)⁴²⁹(谈判参加者一百五十五人)。

约翰·乔治第一。——编者注

维克多·阿梅代一世。——编者注

(萨瓦——法国的同盟者。)

法国大使的通告信：“法国的利益同德国的自由是一致的。”

法军和瑞典军取得胜利。

“荷兰人担心的已经不是他们的传统敌人西班牙人，而是现在成为他们怀疑对象的老同盟者法国人。”(布让⁵¹⁷)“他们(荷兰人)逐渐确信，安全之策在于使西班牙人成为抵抗法国人的屏障。”(同上)

西班牙和荷兰大使之间达成初步协议。

1648年。瑞典军获胜。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和约被批准。⁴³¹

1648年10月。和约。(西班牙没有参加和约。)

法国获得：上亚尔萨斯、下亚尔萨斯、布赖扎赫，在菲力浦堡驻扎警备队的权利和三个主教管区即麦茨、土尔和凡尔登。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施特廷、哈尔茨等地；维斯马港；主教管区凡尔登和不来梅以及参加帝国议会的权利。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汉诺威、黑森等主要从教会财产中得到补偿。(从前属于萨瓦的皮内罗洛让给法国。)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米兰和托斯卡纳建立了统治地位。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

(后者实际上从1315年起)。

至于宗教问题，全都根据帕骚和约和奥格斯堡和约(1552年和1556年)得到解决。除了自己的直辖省份，皇帝在帝国领土上赐与大赦。

(波希米亚被遗忘。)⁴³²

奥地利王室幼系衰落。

() 1648—1660年。法西战争。

比利牛斯和约

克伦威尔。

1654年。马扎里尼和西班牙在佛兰德的战争。

1654年。英国同荷兰签订和约。⁵¹⁸

1655年。英国同法国订立同盟，英国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1657年。克伦威尔派六千名士兵支援法军，拿下敦克尔克。

1657年。斐迪南三世逝世。1658年。莱奥波德当皇帝。克伦威尔逝世。

1657年。丹麦、波兰、俄国、奥地利结成反瑞典同盟。（查理-古斯塔夫——瑞典国王。）他唯一的同盟者是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

1659年。马扎里尼和唐·路易斯·德阿罗在野鸡岛（比达索阿河上）会晤。路易十四和菲力浦四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完全放弃公主地位）结婚。比利牛斯条约⁴²⁷。法国获得：尼德兰的阿拉斯伯爵领地；弗兰德的某些领土；黑纳高和卢森堡公国；比利牛斯山脉的鲁西永和孔弗朗。洛林公爵必须允许法军通过 [他的领土]。

1661年3月。马扎里尼逝世。

1654年。克里斯蒂娜女王让位给查理十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姐姐的儿子）。

他同勃兰登堡选侯 结成同盟，入侵波兰。当时丹麦和俄国、荷兰结成同盟反对他。

1660年。查理十世迫使丹麦人签订和约，取得斯科纳、哈兰、吕根岛上的某些领土，⁵¹⁹废除海峡税⁸⁵，1660年。查理十世逝世；他的儿子查理十一继位。恢复同丹麦的条约；同波兰签订奥利瓦和约³⁶⁰，波兰割让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埃捷尔。1661年。按照战前状态同俄国签订和约。

“这样，瑞典在法国称霸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同时在北方建立了优势地位。”

（ ）1660—1697年。路易十四的战争。

里斯维克和约

英国的复辟。

卡塔琳娜。——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敦克尔克被查理二世出卖给路易十四。

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

德·勒伊特和特龙普迫使英国签订布雷达和约(1667年)。(路易十四在这次战争中同荷兰协同作战。)路易十四帮助葡萄牙反对西班牙。

1665年。西班牙的菲利浦四世(路易十四的岳父)逝世。查理二世(菲利浦四世的儿子,大概还不到四岁)。(菲利浦四世的次女——莱奥波德皇帝的妻子)。

路易十四根据“领地所有权”⁵²⁰对西班牙的尼德兰提出领土要求。

1667年路易十四(蒂雷纳)占领西属尼德兰大部分领土。

1668年(冬)平定法兰斯孔太。

1668年1月22日。英国、荷兰、瑞典结成三国同盟。法国必须或者放弃它在西属尼德兰占领的土地,或者放弃法兰斯孔太。

1668年5月路易十四在埃克斯-拉沙佩尔同西班牙签订和约(他保留在尼德兰占领的土地,放弃法兰斯孔太)。

1670年。匈牙利的贵族密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莱奥波德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莱奥波德平定匈牙利后攻打荷兰人。

1671年。路易十四同英国的查理二世签订秘密条约。

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

1673年。查理不得不放弃同法国的同盟。西班牙、皇帝、勃兰登堡、荷兰、丹麦结成反法同盟。法国的同盟者只有瑞典。战场从荷兰转移到西属尼德兰和德国边境。

1675年。在尼姆韦根开始举行谈判,

玛格丽特·泰莉莎。——编者注

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在尼姆韦根：

1678年8月10日。路易十四同荷兰单独签订条约。1678年9月西班牙缔结和约。放弃法兰斯孔太以代替退还西属尼德兰的一些领土。最后莱奥波德签署和约³⁶¹；路易提出让丹麦、不伦瑞克、勃兰登堡把在战争中从瑞典夺来的土地归还瑞典。路易十四在西西里海岸战胜荷兰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但是尼姆韦根和约没有确认路易对亚尔萨斯的几个城市的权利。

1681年。麦茨的归并议会。⁵²¹

皇帝很想 [同法国] 作战，但是——对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战争；1684年他同路易十四在拉蒂斯邦缔结和约。

1686年。荷兰、奥地利、萨瓦、勃兰登堡缔结同盟。

1688年。路易十四出兵莱茵地区。英国威廉三世登极。反法大同盟（英国、荷兰、莱奥波德皇帝、西班牙、勃兰登堡、萨瓦的维克多-阿梅代）。

1689年。荷兰、英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荷兰、英国和皇帝于1689年5月单独签订条约。）（皇帝或其继承人在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情况下将得到支持。他的儿子匈牙利国王约瑟夫应当被选为德国皇帝。）（法国应当受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比利牛斯条约的条件所限制。）

1696年8月。路易十四和萨瓦的维克多-阿梅代在都灵签单独和约。皮内罗洛让给萨瓦。

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⁴³³。

法国最初同荷兰、英国签订和约，后来又同西班牙签订和约。

彼此归还占领地。1697年7月同皇帝媾和。路易十四让出克尔、夫赖堡、布赖扎赫、菲力浦堡，以换取斯特拉斯堡。

其余的——除亚尔萨斯外，归还在战争中侵占的全部土地。

() 1697—1715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乌得勒支和约

1698 年 10 月 11 日。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在海牙签订瓜分（西班牙）条约。（双西西里、托斯卡纳、吉普斯科阿让给太子。米兰让给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查理大公。西班牙和他的其他领地让给巴伐利亚选侯及其继承人。）

1698 年 2 月。巴伐利亚选侯逝世。

1700 年 3 月 11 日威廉和路易 [商定] 第二个瓜分计划。

（除了第一次条约划归的领土外，太子应当占有洛林，洛林公爵 [获得] 米兰作为补偿。西班牙王国的所有其他领地都给查理大公。）

1699 年土耳其政府、奥地利、威尼斯和波兰签订卡罗伐兹和约。

1700 年沙皇彼得、波兰和丹麦结成反瑞典的同盟，查理十二在纳尔瓦附近击败俄军。

1700 年 10 月。查理二世在遗嘱中指定太子的次子昂茹公爵 为他的继承人。1700 年 11 月。查理二世逝世。萨瓦公爵、曼都亚公爵、葡萄牙、最后国王威廉都承认菲力浦五世。

1701 年 2 月。路易十四出兵西属尼德兰，迫使荷兰人从那里撤出驻军；路易十四发表特别国书，承认菲力浦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

1701 年 9 月。第二次大同盟。⁵²²詹姆斯二世逝世。路易十四承认王位追求者。威廉逝世。奥地利和法国在意大利的局部战争。⁵²³

1702 年。女王安恢复同盟。5 月英国、荷兰和皇帝 向法国宣战。（葡萄

路易。——编者注

指约瑟夫·斐迪南。——编者注

昂茹的菲力浦，即菲力浦五世。——编者注

斐迪南多·卡洛。——编者注

詹姆斯·斯图亚特。——编者注

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牙、汉诺威、普鲁士联合起来)。(德意志一些小邦 [也联合起来]) (巴伐利亚、不伦瑞克、科伦、萨瓦公爵站在路易十四方面。)

1704年。直布罗陀被英军占领。1706年拉米伊 战役获胜(马尔波罗)。匈牙利内战⁵²⁴。奥地利占领那不勒斯。

1707年。查理十二在萨克森。

(从1703年起匈牙利同奥地利处于战争状态。)

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查理十二 [逃到] 土耳其。

1710年。土耳其政府向俄国宣战。

1711年。土耳其和俄国签订普鲁特和约。

英国和法国达成初步媾和协议。

1711年4月。皇帝约瑟夫逝世。他的儿子查理大公⁵²⁵成为他全部领地的继承人。

根据初步协议(英国和法国之间),

敦克尔克应当拆毁,直布罗陀、马翁港、纽芬兰、哈德逊湾划归英国。

1712年1月12日。在乌得勒支召开全体会议。(菲力浦放弃他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贝里公爵和奥尔良公爵放弃他们对西班牙的领土要求。)

1713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签订乌得勒支和约。除上述规定之外,法国把它在圣克里斯托弗岛上的领土、新苏格兰、罗亚尔港让给英国。路易以西班牙的名义把上格耳德恩让给普鲁士,承认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王位和他对纽沙特尔的主权。萨瓦得到西西里,并且在菲力浦五世无后裔的情况下有权继承王位。法国同萨瓦以阿尔卑斯山峰为界。荷兰取得贸易条约,并换得某些领土。1713年4月11日,法国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

1711年。匈牙利由于在萨特马尔签订条约而平静下来。如果能保住作为德意志帝国采地的里夫兰,沙皇彼得答应支援他三万军队。短期的战役;法国在莱茵河压倒奥地利。

1714年9月7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巴登和约。法国承认皇帝对那不勒

拉米伊-奥菲。——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皇帝查理六世。——编者注

斯、米兰、托斯卡纳和西属尼德兰的权利；归还布赖扎赫和夫赖堡。应归还科伦选侯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领地。

1715年乔治一世同普鲁士结成反瑞典的新同盟。

菲利浦五世仍未得到奥地利的承认。1715年荷兰和奥地利才签订条约，奥地利把西属尼德兰的一些领土让给荷兰，

并加上在其他一些地方驻军的权利。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逝世。

() 1715—1721年

乔治一世和奥尔良公爵结成反西班牙（阿尔维罗尼）同盟。

1699年。卡尔洛维茨和约。彼得得到阿速夫；除巴纳特外，整个匈牙利让给奥地利；摩里亚归还威尼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给波兰。

1719年。阿兰会议（4月24日召开）。⁵²⁶

根据英国（汉诺威）、普鲁士、波兰（萨克森）、丹麦订立的条约，沙皇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区；普鲁士获得施特廷和毗连的地方；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波兰国王获得库尔兰；汉诺威获得不来梅和凡尔登；丹麦获得吕根岛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后来在阿兰群岛商定：

沙皇帮助查理十二向普鲁士索回施特廷和普鲁士军队占领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领土；沙皇支援瑞典两万军队在德国作战，并帮助查理得到挪威作为让给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补偿；沙皇帮助查理从乔治一世手里夺取不来梅和凡尔登等地，

（并帮助复辟斯图亚特王朝）。

查理十二逝世。瑞典新政府同英国、丹麦、普鲁士缔结和约。

（1719年11月1日斯德哥尔摩条约。）

1721年8月30日尼斯塔特条约(在芬兰)。(瑞典让出里夫兰、爱斯兰、因格里亚、卡列里亚的一部分、维堡区、埃捷尔岛、达果岛、默恩岛以及上述各地区沿岸的其他岛屿。除一部分地方应在划定边界时确定外,沙皇放弃芬兰。)²⁶¹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约,什列斯维希划归丹麦。彼得把自己的女儿安娜嫁给霍尔施坦公爵,夺取他的“权利”。最初彼得同丹麦结成同盟反对这个公爵。)

“在分割瑞典的基础上改组北欧。”

() 1715—1740年。欧洲大混乱

西班牙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争。英国支持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对西班牙的战争。

阿尔维罗尼被驱逐。

1720年1月。西班牙参加四国同盟。⁵²⁷西西里转让给皇帝,萨瓦获得撒丁作为补偿。答应在最后一个美第奇死后将帕尔马、皮阿琴察、托斯卡纳让给菲利浦五世同他第二个妻子帕尔马的伊丽莎白所生之子唐·卡洛斯。

1724年。康布雷会议(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

1725年。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秘密条约。汉诺威对抗条约。³⁶⁶

1728年。(6月14日召开)苏瓦松会议。

1729年。西班牙、英国、法国签订塞维尔和约。

1731年。奥地利、英国、荷兰签订维也纳条约。

奥古斯特国王逝世。

1733年9月。宣布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为波兰国王。俄国(从1730

卡尔第一。——编者注

查理六世。——编者注

科齐莫三世。——编者注

年起由安娜统治)和奥地利(查理六世)支持已去世的国王的儿子。这个国王曾答应皇帝保证执行国事诏书³⁶⁷,答应女沙皇不要求归还波兰过去的采地库尔兰。

波兰王位战争。法国进攻奥地利。

伯里克元帅在莱茵地区作战。法国另一支军队在维拉尔指挥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联合撒丁的卡尔·艾曼努埃尔把奥军赶出米兰。此后不久,唐·卡洛斯

(西班牙的)(伊丽莎白的儿子)

入侵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那里称王,他(在因奥地利暴政而感到绝望的人民的帮助下)驱散了整个帝国军队;因此,不久,除曼都亚要塞外,奥军在意大利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千五百名法国士兵被派到但泽。

1735年(10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应为波兰国王。有国王称号的斯塔尼斯拉夫获得洛林公国和巴尔公国,在他死后这两个公国应归还法国。唐·卡洛斯保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纳的奥属沿岸地区。)洛林公爵获得托斯卡纳作为领地,补偿他继承的领土。撒丁应得到诺瓦拉、托尔托纳和米兰的其他一些地方。帕尔马、皮阿琴察应让给皇帝。同盟国军队占领的所有其他领土都应归还。法国、西班牙这两个海上强国和俄国保证国事诏书。(皇帝女儿玛丽·泰莉莎嫁给洛林的弗兰茨。)

1736年俄奥对土耳其政府的战争。俄军入侵克里木。米尼希拿下皮列柯普,把半岛南部变为废墟。

1737年。米尼希占领奥查科夫。拉西将军(俄国)再次入侵克里木。涅米罗夫会议。俄国要求:(1)废除以前的一切条约;(2)割让克里木、库班和其他鞑靼地区;(3)多瑙河各地区在它的保护下独立;(4)必须承认沙皇的皇帝称号;(5)黑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的航行自由。

奥古斯特三世。——编者注

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弗兰茨一世)。——编者注

奥地利要求多瑙河一带的大片领土，包括贝尔格莱德、维丁以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一些地区。

1739年。贝尔格莱德和约：除阿速夫外，所有领土都归还土耳其政府。其次，贝尔格莱德、沃尔肖伐以及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的有争议的地区仍归土耳其政府领有。（匈牙利从未有过恢复自己独立的好时机。

前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同有反奥情绪的匈牙利领袖们在土耳其。）

西班牙同英国在印度的战争。英国向西班牙宣战。

1740年。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逝世；皇帝查理六世逝世；俄国的安娜逝世。

1713—1740年。法国和英国的无效同盟。瑞典的动乱。瑞典分为“礼帽”派（亲法派）和“便帽”派（亲俄派），（不久便帽派占了优势）。

（ ）1740—1763年。奥地利王位 继承战争。七年战争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入侵西里西亚。

1741年。以分割奥地利为基础的尼姆芬堡条约（法国、巴伐利亚选侯、西班牙、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和波兰的）和普鲁士之间的）。

由于匈牙利人的热忱、弗略里红衣主教的叛卖性的政策和敷衍措施，哈布斯堡王朝得到挽救。1741年（春）。弗里德里希二世进入莫拉维亚；后来被拉到另一方面的撒丁准备入侵米兰。

1742年。英国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的支持者。

6月11日。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签订布勒斯劳和约（弗里德里希获得下

西里西亚)。

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在德国和意大利继续进行。

查理七世(巴伐利亚的)在法兰克福加冕称帝(1742年)。

为了阻挠俄国支援玛丽-泰莉莎,法国人挑起俄国和瑞典的战争;这场战争很快就以俄国的胜利而告终。1743年。亚波和约;瑞典应割让在芬兰的许多领土;根据沙皇 的要求指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 为瑞典王位继承人。

1745年。英国、萨克森、奥地利在华沙签订反弗里德里希的条约。

(1743年。奥地利、英国和撒丁在伏尔姆斯签订条约。)弗里德里希重新同法国结成同盟。

(1744年春。法国和英国彼此宣战。)

1745年(12月)。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签订德勒斯顿和约:恢复布勒斯劳条约,因此,弗里德里希答应支持玛丽-泰莉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从而保住了西里西亚。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皇帝(巴伐利亚的)逝世,而他的儿子 同玛丽-泰莉莎签订和约。(这是第二个奥普单独和约。)

该和约使玛丽-泰莉莎能够向意大利派遣大批增援部队,意大利的米兰、帕尔马、皮阿琴察落入法国西班牙军队手里;形势发生了变化。

英国在印度和地中海胜利地进行战争。西班牙的菲利浦五世逝世。西班牙军队退出意大利。

当贝尔岛公爵在意大利被击溃的时候,萨克森元帅 和洛旺达耳在尼德兰获胜。1747年萨克森元帅在荷兰共和国领土上推进,占领贝亨-沃普-索姆要塞。英国海军上将安森、沃伦和霍克在海上取得胜利。伊丽莎白受英国资助的许诺的诱惑,将四万俄军投入军事行动。

1748年(10月)。玛丽-泰莉莎不能不同意的亚琛和约。法国和英国彼此归还占领的土地。为换取开普-布雷顿,法国交出在尼德兰的领土,并把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编者注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编者注

马克西米安第三·约瑟夫。——编者注

萨克森的莫里茨。——编者注

马德拉斯归还英国；关于在加拿大边界的争执推迟到以后解决。帕尔马、皮阿琴察、瓜斯塔拉被交给唐·菲力浦和他的男系继承人。撒丁保持现状。黑奴条约对英国延长四年，英国王位继承 [制度] 得到保障，斯图亚特王朝被赶出法国。国事诏书得到保证，下西里西亚被确认归弗里德里希二世。新战争的种子是法国和英国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

1751—1753年。考尼茨在巴黎秘密谈判。这就使得先任命德·贝尔尼神父为大臣，后任命德·舒瓦泽尔公爵为大臣。

1754年。法国和英国在美洲又发生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根据乌得勒支和约364让给英国的新苏格兰或阿卡迪亚的边界，法国沿着俄亥俄河构筑炮台，法军占领中立岛屿，即安的列斯群岛、托贝戈、圣维森特岛和圣卢西亚岛。

1756年1月。英国和普鲁士在韦斯明斯特签订条约。针对这一条约法国和奥地利在凡尔赛订立防御同盟（1756年5月）。（同时奥地利、萨克森、（伊丽莎白）俄国举行谈判。）1756年6月。法军占领马翁港。弗里德里希在皮尔纳附近击败萨克森军（迫使一万八千军队投降）

（1756年秋）。

1757年（冬）。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和德国的某些“集团”集中四十万兵力对付弗里德里希。1757年春弗里德里希在布拉格城下击溃奥军；由于在科林被道恩击溃，不得不退到萨克森。黎塞留击败汉诺威-黑森军。⁵²⁸（克洛斯特-采文协定，根据该协定坎伯兰公爵必须解散汉诺威-黑森部队。）弗里德里希劝黎塞留不要采取行动，而他自己进攻苏比兹和由希尔德堡豪森公爵指挥的德军。11月5日。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附近获胜，而黎塞留仍在他的哈尔伯施塔特的驻地没有行动。后来进兵西里西亚。在利斯附近获胜。⁵²⁹

1758年。皮特执政。（查塔姆勋爵）掌权。

1758年12月。法奥在凡尔赛签订的第二个条约。路易十五必须资助瑞典军队，供养在德国的十万（法国）军队以及萨克森军队；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应归还女皇；必须从普鲁士手中夺取莱茵地区，让给奥地利；但是战争

期间 [这些地区] 的收入必须给法国，法国为奥地利的利益作战而忘记了它在海上的战争⁵³⁰。

1759年。普鲁士军在霍赫基尔兴附近被打败。

1759—1760年。英军在东印度、美洲（沃尔夫占领魁北克，从而夺取了加拿大）和西印度的胜利。

舒瓦泽尔——为了奥地利的利益。

1761年。法国波旁王朝和西班牙波旁王朝签订家族公约。

查塔姆想在西班牙 [行动] 之前先发制人。布特勋爵接任。
西班牙入侵葡萄牙。

1762年1月。俄罗斯的伊丽莎白逝世。彼得三世皇帝。布特勋爵通过俄国公使哥利岑公爵向沙皇提出迫使普鲁士无条件签订和约的建议未被接受。

（彼得三世把这情况通报弗里德里希）。

布特同奥地利关于瓜分普鲁士的密谈毫无成效。

1763年2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获得新苏格兰、加拿大、开普-布雷顿，而法国获得参加在纽芬兰海岸捕鱼的权利。密西西比河被宣布为路易西安纳和下列颠殖民地之间的疆界。在西印度法国把格林那达和中立岛屿：圣维森特岛、多米尼加、托贝戈让给英国。在非洲英国人归还戈雷，保留塞内加尔；梅诺尔卡归还英国。法国索回它在东印度的一些小块领地，但不得在孟加拉驻军。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承认它在洪都拉斯湾沿岸砍伐洋苏木的权利，但把古巴和哈瓦那归还西班牙。葡萄牙保持战前状态。

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之间的胡贝尔茨堡和约³⁶⁸（不外是布勒斯劳和德勒斯顿和约所认可的内容）。（在选举罗马尼亚国王时弗里德里希必须支持玛丽-泰莉莎的儿子约瑟夫大公。）七年战争后，欧洲的领土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提高到过去瑞典所拥有的那种等级（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³⁰⁰时期以来），那他是相当谨慎地利用了俄国人好大喜功欲望

的增长；但是他太弱，阻止不了俄国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曾有过任何重大的政治计划。他朝思暮想的唯一念头是西里西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法国的衰落。在第一次战争中，法国同弗里德里希结成的政治同盟（弗里德里希曾两次抛弃这种同盟）未能从已经衰落的奥地利手中夺得德意志帝国的权杖。在第二次战争中，在跟同一个奥地利、萨克森、瑞典和俄国结盟的法国，甚至未能从弗里德里希手里夺得西里西亚。

（ ）1763—1714年。瓜分波兰。

凯纳吉和约

波兰国王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逝世。

1762年6月。叶卡特琳娜篡夺俄国皇位。叶卡特琳娜和弗里德里希支持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们订立防御同盟，同盟的秘密条款不许对波兰的反常的宪法进行任何修改⁵³¹。

1764年。俄国军队开进波兰。9月波尼亚托夫斯基被拥上王位。俄国驻华沙的公使是波兰议会的实际主席。叶卡特琳娜保护非国教徒（正教徒和新教徒），他们作为奥利瓦和约³⁶⁰的保证人也受到英国和瑞典的支持。

1767年议会。俄国大使列普宁公爵攫取了一个独裁者的角色。波兰巴尔联盟（在波多利亚）。同俄军的战争；巴尔联盟的残余被赶到土耳其政府的领地。土耳其政府受法国唆使参加了俄波战争。

1768年底或1769年初苏丹把俄国大使投入七塔城堡。

1770年。俄土战争。

尼·瓦·列普宁。——编者注

穆斯塔法三世。——编者注

阿·米·奥勃列斯科夫。——编者注

(热那亚把科西嘉卖给法国。)

1772年瓜分波兰。这次瓜分的结果,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六十万人口;它成了波兰的贸易要道维斯瓦河的主宰者),叶卡特琳娜获得立陶宛和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领土(一百八十万人口);奥地利获得洛多梅里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周围的其他地方(三百万人口)。

1774年7月。(凯纳吉和约。)(克里木独立。)阿速夫、金布恩、刻赤、叶尼卡列划归俄国,等等。俄国有权在君士坦丁堡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作口头申述。

奥地利得到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布柯维纳(奥地利是土耳其的同盟者)。

() 1774—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

巴黎和约

1763年。旨在制止走私的严厉措施(不列颠);印花税⁵³²。

1773年。波士顿示威(货船上的茶叶被扔进海里)。

1776年12月。(富兰克林抵达法国。)

1778年2月6日。法国和起义的殖民地签订条约。

1778年4月。德斯坦伯爵指挥的法国舰队载着大批陆军驶往美洲。

约瑟夫(奥地利的)试图把下巴伐利亚并于奥地利(在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侯逝世以后)。

马铃薯战争⁵³³。

他还试图用武力开辟些耳德河上的自由航行。

1779年西班牙参加法国对英国的战争。

1780年俄国宣布武装中立。⁵³⁴

在马克思的笔记里这句话在“1772年瓜分波兰”的后面,这次发表时,根据笔记的内容把它移到前面来了。——编者注

伊·萨博《英国和美洲殖民地战争》(《……国家政策》第1卷第296页)。——编者注

1783年9月3日。法国、西班牙、美国 and 英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1784年5月。英国和荷兰签订和约。

() 1783—1730年。克里木最后归并于俄罗斯帝国

奥地利和俄国结成同盟，准备分得一份战利品。

1780年。普土同盟……赖辛巴赫会议（普鲁士和奥地利完全和解）⁵³⁵
……瑞典和俄国的韦雷莱和约⁵³⁶（以现状为基础）……匈牙利人和比利时人的不满……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西斯托夫和约⁵³⁷……雅西和约（俄国和土耳其之间）。⁵³⁸

从查理五世以来奥地利既没有能力夺取，也没有能力要回一个省份。

[第2卷]⁵³⁹

(Ia) 1790—1796年

1791年8月25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皮尔尼茨宣言。

1792年（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1792年（7月25日，科布伦茨）。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卡佩被处决。

1793年3月25日。皮特同俄国订立协定；接着是同撒丁、西班牙、意大利波旁王朝的各君主、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德意志的某些小邦签订同盟条约和提供费用的协定

(反对法国的)。

第一次联盟。（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军队深入法国，想同叶卡特琳娜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3年7月。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分得但泽和托伦。

(1791年5月3日宣布波兰新宪法。)(继承王位。)(1792年俄国在波兰的战役。)(1793年1月23日普鲁士和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协定。普鲁士军进入波兰。俄国几乎得到半个立陶宛(波多尔斯克省、波洛茨克省和明斯克省,以及诺沃格鲁多克省、布列斯特省和沃伦的一半)(三百万居民。))

叶卡特琳娜恶语攻击法国,但是她的军队留在国内。

1794年4月。(普鲁士和英国达成关于提供费用的协议。)

1794年3月24日。考斯丘什科(独裁者)。华沙和维尔诺的起义。奥地利也派出军队。1794年11月9日苏沃洛夫进入华沙。

1795年1月3日。奥地利和俄国单独发表彼得堡声明(关于瓜分)。1795年10月24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彼得堡协定。克拉科夫归属奥地利。俄国得到波兰和立陶宛的余下部分直到尼门河、布列斯特和诺沃格鲁多克的领土、萨莫吉蒂亚的大部分、整个库兰和塞米加利亚;在小波兰获得布格河右岸的霍尔姆州领土的一部分和沃伦的其余部分(一百二十万居民)。

除克拉科夫[省]的主要部分外,奥地利[得到]散多梅希省和卢布林省、霍尔姆州的一部分、布列斯特省、波德拉谢省和马索维亚省(布格河左岸)(约一百万人口)。

普鲁士得到马索维亚和布格河右岸的波德拉谢的一部分、立陶宛的特罗基省和萨莫吉蒂亚的一部分、小波兰的一个不大的区、克拉科夫省的一部分(居民一百万左右)。

第三次瓜分波兰。

迄今为止,俄国从同法国的战争中捞到最大的好处。叶卡特琳娜为了追求自己的单方面的利益,成功地使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产生了关于革命原则危险的概念,同时她没有为“共同的事业”派出一个哥萨克,拿出一个卢

布。她派几艘船支援英国简直是在开玩笑。

1795年4月5日。法国同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8月签订最后的秘密条约。普鲁士割让它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地，得到的补偿是一些德意志主教管区世俗化。然后是同西班牙签订条约。(法国只保留圣多明各的属于西班牙的那一部分。)⁵⁴⁰托斯卡纳同法国签订和约更早。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国家中立。只有撒丁和奥地利还同英国联合。比利时归并法国。荷兰的一些部分割让给法国。⁵⁴¹

(IIa) 1796—1801年 (吕内维尔和约)

1796年4月。(接连三次会战——波拿巴——决定撒丁的命运。)(法国获得萨瓦、尼斯和占领几个要塞的权利。)波拿巴在伦巴第。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殖民地落到大不列颠手里。

1796年11月17日。叶卡特琳娜逝世。

1797年4月18日。奥地利在莱奥本签订初步和约。

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摩地那、费拉拉、罗马尼亚、曼都亚)。利古利亚共和国(热那亚等地)。

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奥地利放弃尼德兰，同意法国获得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得到威尼斯和威尼斯领地中的达尔马威亚部分。阿尔巴尼亚和威尼斯群岛或伊奥尼亚群岛归法国)³⁷⁰。

(1798年5月19日。波拿巴从土伦到埃及。)(1798年6月波拿巴占领马尔他) 1798年3月15日拉施塔特会议⁵⁴²。

1798年12月英国和俄国签订条约。(两国同土耳其和西西里都建立单独同盟)。

瑞士共和国——在法国的保护下。

法军占领教皇领地。

第二次同盟。

1799年4月。解散拉施塔特会议。

奥地利参加第二次同盟。葡萄牙、巴伐利亚、美因兹选侯、维尔腾堡公爵 陆续参加同盟。

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那不勒斯战败。帕尔泰诺佩共和国⁵⁴³。

在虚假的借口下皮蒙特成为法国的领土(实际上,卡尔-艾曼努埃尔四世去撒丁)。

(1799年10月9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1799年6月14日。马连峨。英军夺取马尔他。保罗皇帝:同丹麦、瑞典和普鲁士一起武装中立。

1801年3月23日。保罗逝世。亚历山大一世。

1801年2月9日。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瓜分威尼斯领地。比利时割让给法国。)(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利古利亚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都得到承认。)

(IIIa) 1801—1805年

1802年1月。波拿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1802年3月27日。亚眠和约(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英国保留特里尼达和锡兰。)(英军必须撤离马尔他,马尔他独立。)(法国答应离开那不勒斯、教皇领地;英国答应离开地中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所有港口和岛屿。伊奥尼亚群岛共和国和土耳其的完整得到保证。)

1803年5月18日。英国向法国宣战。

1804年5月18日。波拿巴称帝。1804年12月2日教皇 为他加冕。

(IV a) 1805—1807年第三次同盟。提尔西特和约

彼得堡——新的反法同盟的中心。

弗里德里希·卡尔·约瑟夫, 埃尔塔尔公爵。——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一世。——编者注

庇护七世。——编者注

1805年4月11日。英国和俄国订立同盟条约。(瑞典已经通过1804年十二月条约同英国联合。根据该条约,施特腊耳宗得是英军的基地。)

奥地利同英国、俄国交换8月9日的彼得堡声明。

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投降。12月2日奥斯特利茨。

1805年12月26日。普勒斯堡单独和约(奥地利和波拿巴)。(拿破仑被承认为意大利国王。奥地利丧失威尼斯地区,提罗耳让给巴伐利亚,自己的其他一些地方让给巴登和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成为王国,而巴登成为大公国。)

1806年1月23日。皮特逝世。福克斯同法国谈判。俄国破坏这些和谈。(1806年9月13日。福克斯逝世。)

1806年7月12日。(巴黎。莱茵同盟,十六个德意志君主。)

1806年8月6日。奥地利放弃取得德意志皇帝称号 [的权利]。(帝国终结。)

1806年10月14日。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的会战。

1807年6月14日。弗里德兰德会战。

1807年7月7日。提尔西特和约(华沙和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归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的),并升为王国;东普鲁士划归沙皇。秘密条款: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归俄国,摩里亚和干地亚 归法国,大陆体系。波旁王朝在西班牙被推翻)。

(Va) 1807—1814年(巴黎和约)

1808年10月。爱尔福特会议。俄国的收获:在瑞典(芬兰)和在土耳其(多瑙河两公国)。

(同时俄国人同普鲁士、奥地利进行反法秘密谈判。)

1809年3月。奥地利宣言号召提罗耳人拿起武器。约翰大公侵入意大利。

利，斐迪南进攻华沙，卡尔侵入巴伐利亚。

1809年5月12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7月5日、6日瓦格拉姆。10月10日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割让克伦地亚、提罗耳的一部分、的里雅斯特地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从阜姆起的属于匈牙利的亚得利亚海岸。萨克森国王 获得西加里西亚。俄国作为法国的同盟者获得奥属波兰的余下部分，作为它在作战过程中显然迟迟不愿行动的报酬。)(奥地利暗中得到沙皇中立的保证。)

1809年9月。俄国同瑞典签订和约。(俄国得到芬兰和阿兰群岛。)

1810年12月。俄国发布反对大陆体系原则的命令。

1811年底北方国家的宫廷和圣詹姆斯宫廷的全部密谋准备实施。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卢博米尔斯基公爵成为彼得堡和伦敦之间联系的渠道。贝尔纳多特已被看作一张可靠的牌。英国已经支援普鲁士和俄国武器和装备。波茨措-迪-博尔哥准备在意大利总起义。

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

在英国的调停下；

俄国获得贝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

1813年2月。普鲁士和俄国的卡利希条约。

1814年4月12日。拿破仑退位。

1814年5月30日。巴黎和约。(法国回到1792年的边界，在法国北部扩大了一些领土。)

(VIa) 1814年5月—1815年11月

1814年11月1日。维也纳会议开幕。

1815年1月9日。奥地利、法国和英国之间订立秘密条约。

1815年3月1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1815年9月26日。神圣同盟。)

1815年6月底。维也纳会议结束。(“波兰王国”划归俄国；华沙公国

的一部分（波兹南）划归普鲁士，加里西亚划归奥地利。普鲁士获得萨克森的一半、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左岸的几个地区。比利时和卢森堡划归荷兰。奥地利除它以前的领地外还得到整个威尼斯、曼都亚等地（以交换比利时）。（摩地那、托斯卡纳和帕尔马划归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成员。）那不勒斯归还斐迪南；热那亚归还皮蒙特。丹麦必须把挪威交给瑞典。奥地利成为法兰克福议会⁵⁴⁴的主席。瓦勒、纽沙特尔、日内瓦并入瑞士。英国：两印度的一些殖民地、好望角、马尔他、伊奥尼亚群岛，黑尔郭兰——从法国、荷兰、威尼斯、圣约翰的骑士和丹麦那里夺得的地方。）

1815年9月26日。神圣同盟。

1815年11月20日。第二个巴黎条约。法国必须让出莱茵河边界上的、同尼德兰接壤地区的和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些要塞。

(VIIa) 1815—1825年

1817年10月。德国大学生瓦特堡纪念大会。德国大学生联合会。⁵⁴⁵西西里废除宪法（1812年）。西班牙议会宪法也废除。⁵⁴⁶

1818年9月。亚琛会议。（从法国撤军。葡萄牙发生战争。西班牙和它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梅特涅为了压制革命的情绪提出定期会晤的建议。11月15日签订关于定期会晤的议定书。卡斯尔雷签署协议书。法国也被吸收加入神圣同盟。）

卡斯尔雷根据本国政府的要求离去。

（梅特涅、哈登堡、涅谢尔罗迭组成三巨头同盟。）

1819年。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影响下召开卡尔斯巴德会议；后来移到维也纳。德国宪法被修改。美因兹警察委员会⁵⁴⁷。烧炭党人（1809年围绕弗朗契斯科的皇位问题形成的）。⁵⁴⁸教皇对烧炭党和共济会大加镇压。

1820年1月。西班牙的斐迪南不得不恢复议会宪法，那不勒斯国王斐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弗朗契斯科一世。——编者注

庇护七世。——编者注

斐迪南七世。——编者注

迪南也恢复宪法（7月6日）。（吉列尔莫·佩佩将军，烧炭党人领袖。）

1820年8月。皇帝弗兰茨一世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颁布反烧炭党的告示。

1820年10月。特劳波会议。梅特涅建议武装干涉那不勒斯。（卡斯尔雷不同意）（但是他“将不给奥地利的事情设置障碍”）；会议迁到莱巴赫（1821年）

1821年2月。奥军在弗里芒男爵的指挥下进入那不勒斯。撒丁、瓦拉几亚、希腊爆发起义。奥地利武装干涉撒丁。

1822年9月。维罗那会议。坎宁的抗议。法国干涉西班牙。

1823年1月28日路易十八的御前演说。

宣布对西班牙的干涉。

亚历山大一世明确声明决心在英国进攻法国时援助法国。

（梅特涅开始设法摆脱困境。）

葡萄牙的反革命。（1822年布拉冈萨王朝颁布西班牙式的宪法。⁵⁴⁶（国王若昂六世）（在他儿子唐·米格尔和阿马兰特伯爵的帮助下实行反革命政变。）坎宁阻止干涉西班牙；承认美洲殖民地的独立。）

1823年12月2日。美国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国会咨文。

1825年。坎宁承认墨西哥。

1824年9月。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

1825年10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克吕登纳夫人的“白天使”⁵⁴⁹）逝世。尼古拉。

(VIIIa) 1825—1834年

马茂德二世（改革家）。（近卫军叛乱，乌列玛⁵⁵⁰不满，某些帕沙叛变。）（“赫特里”⁵⁵¹）。（最初建立在莫斯科。）（卡波第斯特里亚，亚历山大的伊奥尼亚大臣⁵⁵²，——希腊运动中的主要工具。）（亚尼纳的阿里-帕沙于1821年发出希腊人总起义的信号。）（亚历山大·依普西朗蒂首先在瓦拉几亚起义。同时在伯罗奔尼撒、阿希佩拉哥群岛等地爆发起义。近卫军部队被歼。）

1825年2月。易卜拉欣·帕沙(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在摩里亚登陆。
亚历山大临死前土耳其和俄国的冲突。

1826年4月4日。英俄关于希腊的议定书(在彼得堡)。

1826年10月阿克尔曼协定(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于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的协议。)

1826年3月。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逝世。(他的长子唐·佩德鲁把葡萄牙移交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梅特涅同苏丹一起为他的利益搞阴谋。

1827年7月6日。法国、英国、俄国在伦敦签订协定(关于希腊)(在作战国之间进行调停)。

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林的歼灭战。(与此同时坎宁逝世。)

1828年春。俄军渡过普鲁特河,占领公国。法国外交部长拉费隆奈的密友波茨措·迪·博尔哥得到来自维也纳的所有秘密消息。

1829年9月14日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国得到多瑙河河口。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希腊总统。

1830年7月。路易-菲利浦登基。9月。比利时革命。

1831年。波兰人起义。意大利发生起义。比利时问题的解决。
希腊问题的解决。

1831年10月。波兰的灭亡。

1831年1月20日。比利时宣布独立。

1833年2月。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7月10日)⁵⁵³。

1832年5月7日。巴伐利亚的奥托成为希腊国王。

(俄国在希腊战争掩护下强行撕毁阿克尔曼协定,然后又撕毁阿德里安堡条约,在欧洲列强中它是唯一获胜的一方。)

1832年。根据梅特涅倡议制定的德国的反动措施。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编者注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IX a) 1834—1846 年

1828 年。(唐·米格尔叛乱。) 1832 年。唐·佩德鲁在特塞拉岛登陆。

1833 年。西班牙的斐迪南逝世。1833 年 7 月 1 日。(查理·纳皮尔爵士在圣维森特角歼灭米格尔舰队。)

1834 年 4 月。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⁴⁰²。

1840 年 7 月 15 日条约。³⁸⁹

1846 年 11 月 6 日。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

(XIa) 1846—1850 年

教皇庇护九世。瑞士宗得崩德战争。⁶⁵

1848 年二月革命。

1846 年 11 月。教皇发布关于召开“国务会议”的命令。⁵⁵⁴

普勒斯堡议会。1847 年。

1848 年 8 月 9 日。查理-阿尔伯特(撒丁)不得不用金钱换取在萨拉斯科的停战(延长到 1849 年 3 月中)。

1848 年 11 月 25 日庇护出亡。

1848 年 5 月。法兰克福议会。

1849 年 3 月 23 日。诺瓦拉会战。

1849 年 4 月 14 日。匈牙利宣布独立。

1849 年 2 月 9 日。在罗马宣布共和国。

1849 年 6 月 30 日。罗马沦陷。1849 年 8 月 13 日。匈牙利投降。

1849 年 8 月 22 日。威尼斯投降。

1848 年 7 月。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

热那亚公爵 成为西西里国王。

1849 年。⁵⁵⁵2 月俄军在特兰西瓦尼亚。

3 月 15 日俄军被赶出特兰西瓦尼亚。

3月23日撒丁军在诺瓦拉被击败。
4月14日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在匈牙利）。
2月9日罗马共和国。

1849年4月。巴尔塔利曼尼协定。

4月22日法军在契维塔未克基亚登陆。
6月俄军进入匈牙利。
6月30日罗马投降法军。
8月13日匈牙利军队主力投降俄军。
8月22日威尼斯投降。

(XIIa) 1850—1853年

1850年1月。希腊被英军封锁。
5月24日。三国国王条约（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
10月。华沙谈判。
12月。奥俄的德勒斯顿谈判。
1815年12月2日。政变。

1851年。俄国人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

1852年12月2日。G6法兰西帝国宣布成立。
12月6日。英国议会宣布承认法兰西帝国。
1852年5月。丹麦王位继承条约。

(XIIIa) 1853—1856年

马克思起草于1860年6月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恩斯特·奥古斯特。
——编者注
笔记到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⁵⁵⁶

在达姆施塔特出版的被认为是德国第一流的军事报纸《军事总汇报》9月8日刊登了一位通讯员写的关于在牛顿检阅的报道和关于猎兵运动的一般消息。下面发表的是这篇文章的译文（特地为《志愿兵杂志》译出的）。无疑，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引起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特别是参加过这次检阅的人的兴趣。正象预料中的那样，这篇报道绝不是用不列颠报刊往往认为是它对运动的贡献的那种过于称赞的语调写的；但是这篇文章的性质足以保证它是内行人写的，而文章赞许的语调证明，作者根本不想作无意义的吹毛求疵。至于文章中所提的建议，我们让我们的读者能够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⁵⁵⁷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9 月 8 日
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9 月 14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2 期

卡·马克思 论大赦问题⁵⁵⁸

原《新莱茵报》编辑、现在曼彻斯特任教师的威廉·沃尔弗，于1862年1月4日向布勒斯劳当局递交呈文。他根据不久前颁发的大赦令⁵⁵⁹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九个月后他接到了答复，全文如下：

“根据今年1月4日和6月4日的呈文，兹通知您，由于您逃亡，从而逃避了1845年和1848年对您继续进行的审讯，我们认为不能满足您的恢复您普鲁士臣民权利的要求！其实，如果您认为1月12日陛下的敕令能够使您免去惩罚，那是对上述敕令的误解。根据敕令，您！应当回到！本国继续接受审讯，然后等候结果。

王国政府内务厅，签名：施蒂希

1862年9月5日于布勒斯劳

致曼彻斯特哲学副博士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弗先生。”

我们顺便注意到一件怪事：虽然沃尔弗丧失了“本国”的公民权，但是他仍然作为“副博士”永远在本国继续生存。现在言归正题。

既然布勒斯劳当局为炮制上述文件花费了三个月时间，那么能否至少“期望”这个否定性答复的理由有事实的根据呢？不过看来，布勒斯劳当局“认为”行政机关同法学一样享有“法律虚

构”的特权。

沃尔弗是 1846 年(而不是 1845 年),在对他就出版问题开始的诉讼经过了全部侦查阶段以后,在他本人经过了一切审讯以后,在判决前不久逃亡的。可见,沃尔弗逃亡是逃避了判决,而不是逃避了“对他继续进行的审讯”。

此外,1848 年人民用暴力争得了大赦,因此沃尔弗最初回到了布勒斯劳。1848 年 4 月又把他传到布勒斯劳的刑事法庭,要他发表书面声明——当然,他也这样做了——,说他自己接受赦免。

因此,看来布勒斯劳当局“认为”,1848 年的大赦以及由于这次大赦而获得的权利被 1861 年的大赦废除了。在这种情况下,类似这样的“具有回溯效力”的立法恐怕会在法学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

布勒斯劳当局关于沃尔弗“1848 年逃亡,从而逃避了对他继续进行的审讯”的说法在不小程度上是胡说。沃尔弗成为流亡者不是在 1848 年,而是在 1849 年,而且是在对他进行某种审讯之前。这种审讯同他参加残阙议会的工作有关。1849 年夏天沃尔弗到了瑞士。在这之前并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审讯,因此,他没有任何审讯可以“逃避”。关于传讯他到法院的命令是在 1849 年秋天发出的,那时他早已在国外。看来,在逃亡之前进行的审讯和在逃亡之后发出的传讯的命令,在布勒斯劳当局的眼里是一回事。如果可以为此随意粗暴地破坏最简单和最平常地解释法律的规则,政府机关为什么还要给司法人员付报酬?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9 月中
发表于 1862 年 9 月 28 日《巴门
日报》第 226 号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⁵⁶⁰

美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这是预料中的事。《军事总汇报》⁵⁶¹再次评论的“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之间的战斗⁵⁶²证实了这种预见。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些新的资料。

—

“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的战斗虽然最终以炮塔舰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并没有回答哪一种装甲舰更优越的问题，是炮塔舰还是舷炮舰？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场战斗⁵⁶³，这场战斗从各方面看来都把这个问题永远弄清楚了，我们十分乐意详细谈谈这场战斗，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未必对它有什么了解，而在德国则根本一无所知。

在萨凡那港，同盟派在苏格兰结构的“芬加耳号”商船上加了一层四英寸厚的云杉板、柞木板和铁板。铁壳由两层六英寸宽二英寸厚的扁钢构成，里层用坚硬的螺栓横向固定起来，外层则竖向加以固定。按照“梅里马克号”的样式，装甲钢板象屋顶一

样斜装在船体上，但上面是平的，使舰呈截角锥体状。沿舰舷两侧装有四门六英寸口径炮，而在舰尾和舰首则有两门固定在旋转炮架上的七英寸口径炮。

清晨，“阿特兰塔号”（现在这样称呼这艘军舰）沿萨凡那河顺流而下，很快就碰上两艘迎面迅速驶来进行截击的炮塔型军舰“乌依豪京号”和“纳汉特号”。（我们是根据7月11日纽约《哈珀周报》的报道来描述这次战斗的。）“阿特兰塔号”首先开火，对“乌依豪京号”进行三次齐射，后者没有开炮，而是继续靠近，然后按照英国的打法，用它的十五英寸口径的达尔格伦炮发射四百四十磅球形炮弹进行回击。第一次射击打穿了“阿特兰塔号”的两舷，而且在炮弹碎片和冲击力的作用下有四十人丧失战斗力，其中有一个中尉，他后来谈起他曾有十分钟之久站不起来。第二次射击打穿了一个炮口的铁盖，死伤十七人。第三发炮弹把上甲板上装甲驾驶室的上部打成碎片，打死两名领水员，打倒两名舵手。第四发炮弹打中联接舰舷和甲板的肋条，但没有打坏，看来是跳

达尔格伦炮是一种炮身稍短的火炮，其长度约为口径的十二至十四倍。炮的外型是由达尔格伦（现在是海军上将，查理斯顿的司令官）按下述方式设计出来的：每隔一定距离沿炮膛轴线垂直于炮膛钻一些枪弹弹径大小的孔，孔里装进枪药，按通常的方法装弹和发射。单个弹丸的初速用通常的方法测定，并根据它标出膛壁相应部位上的火药气体压力的刻度。为炮膛轴线上相应的横座标标出了纵座标，联接纵座标的这种曲线就确定了炮的外形。根据这种原理设计出来的火炮，炮尾和炮耳部分很粗，而炮口切面的直径却要小得多，这种炮象装苏打水的瓶子。炮身没有膛线，空心炮耳上面铸有冷却时冷水可以流通的空腔。这种从里面进行冷却的办法使火炮具有很大的坚固性（即使是铸铁炮也是这样），以致可以铸成十五甚至二十英寸口径的火炮，能够经受住五百次大药量的射击而无任何危险。最初这种炮只用于发射空心弹，但是后来，因为铸造得更加坚固了，它们可以发射铸造的球形炮弹了。这些威力更大的火炮叫做哥伦比亚炮。（恩格斯原注）

弹。正当“阿特兰塔号”挂出白旗投降的那一瞬间，甚至同时驶近的“纳汉特号”还没有能够进行一次射击，第五发炮弹就打穿了烟囱。一刻钟之内全部结束。

本文作者昨天在利物浦港看到在拉芒什海峡作战的英国舰队，舰队里有“勇士号”、“黑亲王号”、“罗雅尔·奥克号”、“狄芬斯号”、“列齐斯坦斯号”，这些都是舷炮装甲舰（配备有八英寸口径的六十八磅滑膛炮和七英寸口径的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炮），镶有十八至二十四英寸厚的木板和四英寸半至五英寸厚的铁甲。毫无疑问，这是目前正在服役的最好的和最有威力的装甲舰队，只要它的吃水量允许，它就能平安地通过欧洲的任何装备了现代武器的岸防炮台，并能开进由这些炮台护卫着的港湾。但是，即使这些军舰中最好的，碰上装备了四百四十磅火炮的美国炮塔舰又有什么用呢？根据英国人自己的试验来看，要打穿军舰的舰舷，用口径小得多的火炮就够了，而一发四百四十磅的炮弹打进舰体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只要有一发打在相当于水线高度的舰体上，就足以把军舰击沉，因为这样大的弹孔是无法堵住的。看看这些漂亮的军舰，其中每一艘的造价，如果把试验费用包括在内，将近一百万英镑，这不能不使人认为它们已经是注定要失败，已经完全过时了。

因此，只要承受得住，装甲舰就尽可能装备较重型的花炮，看来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火炮不能作为舷炮使用；即使在最大的军舰上也只能装备为数不多的这种火炮，而且应该把它们安装在军舰的中部。而这一点只有在炮塔舰上才有可能做到，因此，今后每一支舰队的决定性力量是炮塔舰。

诚然，迄今所制造的炮塔舰的航海性能是极为有限的。问题在于美国制造炮塔舰只是用于某种目的：在沿海浅水域进行战斗。

如果生产较大型的、吃水量较大的炮塔舰，那么它们无疑在海上至少会具有与舷炮装甲舰同样良好的性能，而舷炮装甲舰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尚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即使仅仅根据上述经验，也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 装有重型炮（十至十五英寸口径）的炮塔舰，不论在防御战还是在近岸的进攻战中，毫无疑问都是最有威力的。

(2) 装有二英寸半至五英寸铁甲和八英寸口径舷炮的装甲舰，如果有煤炭基地，特别是，如果不卷入同炮塔舰的战斗，那么在对海岸的远距离作战中，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3) 对于在开阔海面上的机动战术本身来说，只有木质舰仍是适用的。只有这种军舰才能够携带那么多的粮食、煤和弹药，就好像几个月中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作战基地一样。只有这种军舰在会战之后能够独立地重新恢复战斗状态。例如在印度和中国，甚至英国人的任何类型的装甲舰都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对于德国来说，从这里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1) 要学会铸造美国口径的火炮和制造炮塔舰。在易北河或威悉河上有两艘这样的军舰就可以保障整个北海海岸的安全。在波罗的海，四艘这样的军舰就可以把波罗的海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必要时可以迫使哥本哈根投降。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人会谈论现在的丹麦舰队了。⁵⁶⁴即使将来造舰水平提高了，出现了制造有效的航海炮塔舰的可能，那时，老的炮塔舰仍然还是所有的海港防御手段中较好的一种，何况它们的价格又不贵。

(2) 每一艘排水量六千至七千吨的英国型和法国型的舷炮装甲舰，其价格相当于六艘炮塔舰。可是，两艘炮塔舰就足以战胜一艘这样的装甲舰。为它们付出这样的费用是不合算的。但是，用

二英寸半至三英寸最好的铁甲（例如施梯里亚铁）作护板的、航速很快的中型螺旋推进式蒸汽舰，配备少量的但是较重型的花炮，就可以很有效地对抗现有的舰队。这种军舰要回避重型的大装甲巡航舰，但是完全能够对付木质战列舰。

（3）远程作战的木质船——帆力舰和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是其他军舰无法取代的。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基地，它的意义一年比一年大。只要我们在那里没有取得煤炭基地，在这个区域就只能使用帆力舰，何况帆力舰目前还相当充足。很久以前就迫切需要在西印度、北美和南美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在列万特拥有基地。到处都应该保护德国的贸易，赢得对德国声誉的尊重。在这些地区保持四分之一蒸汽舰和四分之三帆力舰的比例就行了。相反，在本国，我们既不需要大量的木质船，也不需要大吨位的木质船；风行一时的、装备有六十磅火炮的巡航舰，现在根本就不适用，因为当代的战列舰已经过时，而未来的战舰尚未发明出来。

二

按照过去的做法，在围攻设防的壁垒时，破城炮设在斜堤顶上，距离被射击的垒墙大约有五十步。当蒙塔郎贝尔提出了构筑带有掩蔽的石砌体的弯窖工事⁵⁶⁵，特别是当这种无掩蔽的石砌体已经在德国很多地方采用时，的确有很多关于它们的这样那样的议论，说什么象这样的石砌体甚至从远处也可以打穿。但是从实际经验中，我们只知道 1823 年威灵顿的做法，而且缺口是在未筑

大概是指德国根据 1861 年 9 月 2 日同清政府在天津签订并于 1863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交换批准的通商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译者注

护墙而由垒障掩护的部位被五百至六百步距离远的间接齐射打开的。克里木战争证明，只有石质岸防炮台才是军舰无法攻破的，而博马尔松德情况之所以出现，只是由于修建工事的承包人非常恶劣地欺骗了俄国政府。意大利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因为事情没有发展到围攻要塞的地步。直到最近，人们还习惯于认为，凭借以往的炮兵兵器，无掩蔽的穹窿式石砌体，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反击围攻炮队的火力优势，而这种优势将会证明建造它所化的费用是值得的。幽里希的经验表明，甚至小口径的、使用着发炮弹的线膛炮，在相距一千二百步的地方即使进行间接瞄准射击也能在石砌体上打开缺口。可是如今在美国却发生了一些给人们以完全不同认识的事件。

在攻击皮尤拉斯加堡垒（位于萨凡那前面）时，吉尔莫尔将军（毫无疑问，他在现今还活着的美国炮兵专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只有重型哥伦比亚炮，口径不到十五英寸的、发射大威力装药炮弹的滑膛炮。⁵⁶⁶他把自己的炮队配置在相距一千二百步的地方，并且在不多几天内就把穹窿工事及其很厚的石砌体变成一堆垃圾。不过，这个经验使他相信，如果距离更远，他的炮大概就不能破坏石砌体。很可惜，我们没有关于火药量的资料，因为所有美国的报道都是非常表面的。不过可以想象，在这类炮上还根本谈不上用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的装药量。

因此，为了攻击查理斯顿，吉尔莫尔申请调拨并领得了一些大口径的线膛炮。这是些所谓帕罗特炮，是一种后装火炮，按口径的大小，刻有四至七条膛线。膛线较浅，膛线的缠度比阿姆斯

恩格斯接着划去了一句话：“而现在情况怎样呢？”——编者注

特朗炮的要小些。炮是由铸铁制成的，在炮尾上焊接一个锻铁圈，同炮耳相接，它们都具有普通火炮的形状。以单位重量计算，它们的价格大约是英国阿姆斯特朗重炮价格的四分之一。炮弹呈椭圆圆柱形，弹体由软金属制成，以便能够嵌入膛线。

吉尔莫尔用这些炮轰击了瓦格纳堡垒（见不久前刊登在《军事总汇报》上的查理斯顿计划⁵⁶⁷）。但是这种用轻沙土建筑起来的工事依然屹立不动。一些抗弹的、顶层得到掩蔽的房舍有驻军守卫，几次攻击都被击退。不得不转入正规围攻，重炮就在这里大显身手。于是，吉尔莫尔新编了三个重炮连，派去攻打位于港湾入口处中央的萨姆特堡垒。这些重炮连（其中之一配置在沼泽地上）离萨姆特堡垒有三千三百至四千二百码（四千至五千步）远。

萨姆特堡垒是在一个人工岛上用特制的非常坚固的砖建造的。墙的厚度为六至七英尺，墙根部分厚达十二英尺，穹窿的拱顶和护墙厚八至九英尺。堡垒有两层穹窿和一个架设有利用胸墙射击的火炮的顶层。堡垒的形状象钝角眼镜堡；吉尔莫尔炮兵连的炮火主要可以达到背墙和堡垒的一侧。堡垒中有一百四十门炮。射击从8月16日至23日持续了八天；舰队有时也参加射击，然而没有多大的成效。但是，二百磅的线膛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堡垒的背墙和侧墙首先倒塌，接着另一面的墙也倒塌了。在炮击将结束时，用吉尔莫尔的话来说，堡垒已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废墟。总共发射了七千五百五十一发炮弹，其中五千六百二十六发炮弹命中（在那样远的距离！）：三千四百九十五发打中外墙，二千一百三十发打中内墙。只进行了几次试射，很多炮弹一下子就打穿了两堵墙。

吉尔莫尔有一门三百磅的线膛炮，在第七次射击时炸裂了。看

来前六发炮弹在打穿了两堵墙的同时曾引起某些地方二十英尺高的墙倒塌。

显然，堡垒的回击软弱无力。即使有适当射程的火炮，它的炮队也不会半德里远的距离上对可见目标进行射击。因为堡垒一直处于很多同盟军炮队的火力范围之内，当时并不打算立即占领它。⁵⁶⁸但是，如今在瓦格纳堡垒和坎宁角堡垒陷落之后，占领堡垒的企图大概将实现了。

吉尔莫尔用这些炮队向查理斯顿城发射了十五发燃烧弹——在距离一德里以上的地方——，只是由于他的着发炮弹没有爆炸才停止了轰击。这是因为经过长途运输后火帽座的尖端已失去了作用。

关于这次炮击，我们在德国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们的无掩蔽的石砌体能否坚守得住呢？如果把那些负责保护中心地区免遭炮击的堡垒向前推进到离主墙八百至一千二百步的距离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科伦堡垒的内堡、科布伦茨堡垒的侧防门和埃伦布莱施坦堡垒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的敌人——他们都是海上强国——将很快拥有足够数量的最大口径的线膛炮，而用来运输这些炮的铁路到处都有。相反，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德国]所采用的武器中最大的线膛炮是口径在四英寸半以内的二十四磅火炮。它们同那些将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相比，那真是一堆小玩意儿。即使我们的穹窿也有这样的火炮，但它们在距离五千步远的地方是打不到围攻的炮队的。不管筑垒的河岸线怎样不完善，我们在莱茵河上的要塞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抵御法军第一次进攻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在出现了上述做法之后，现在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里不容有长时间的苦思冥想，这里需要的是行动，而且是立即行动。任何拖延对我们都可能导致一场失败的战争。望执政官注意，勿使国家遭受任何损害。

弗·恩格斯写于 1863 年 9 月底

原文是德文

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于《弗里德里希·埃贝尔特捐款创办的研究院文集》第 85 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970 年）《1970 年 5 月 25—29 日乌培河谷国际科学会议的报告、讨论和文件》1971 年汉诺威版第 69—71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讣告⁵⁶⁹

威廉·沃尔弗

今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近五十五岁。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1848年和1849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德国国民议会议员,从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任私人教师。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路易·博尔夏特、
医学博士爱德华·龚佩尔特

1864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
1864年5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
第144号附刊

卡·马克思

* 威廉·沃尔弗简历⁵⁷⁰

1809年6月21日生于施魏德尼茨区塔尔瑙。

1813年。俄国人。

1834—1838年在季尔别尔堡四年半。⁵⁷¹暗堡沃尔弗请求探望一下他将要死去的父亲，哪怕是在宪兵的随同下，但竟也遭到拒绝。

1843—1846年2月在布勒斯劳。

1846年。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有被审讯的危险而出亡。论述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的文章。

1846—1848年。布鲁塞尔。“通讯社”⁵⁷²。在布鲁塞尔被囚于狱中（2月6日和28日之间被捕）。

1848年4—6月在布勒斯劳。

1848年9月。科伦。鲁普斯应 [到法院] 受审。⁵⁷³逮捕令撤销。

1848年10月22日。黑克尔下逮捕令。1849年3月8日撤销。

1848年6月—1849年5月10日在科伦。从此处前往法兰克福。

1849年5月26日。在德国议会（法兰克福）里的一个场面。⁵⁷⁴

1849年。鲁普斯到瑞士以后，因他参加斯图加特残阙议会的工作而将他送交法庭审判的命令接踵而来。

1849年7月5日去巴塞尔，从那里去伯尔尼时被拘留。在苏黎世当教员一年零九个月。1851年3月31日。从苏黎世驱逐出境的书面命令。（1850年9月10日。苏黎世。鲁普斯抗议根据联邦会议关于流亡者必须分别迁居他地的决定而要他迁居琉森州的命令。）

1851年6月4日—1853年。到达伦敦。在伦敦约两年。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大赦令。⁵⁵⁹1862年1月4日。给普鲁士政府的呈文。五个月没有答复。1862年6月4日的新呈文。1862年8月1日施魏德尼茨地方官要求沃尔弗报告他在普鲁士的最近居留地。

1862年9月5日。普鲁士政府答复：大赦的结果是继续侦查。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5月底—6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1959年《近代和现代史》
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⁵⁷⁵

一

凡居住英国者均可成为协会会员。但任何会员如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参加其工作，则不得被选进中央委员会。⁵⁷⁶

二

本协会会员未预先缴纳其一年会费者，不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三

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至少应在选举前一周进行，选举时候选人不得在场；只有领取了会员卡的人才能被提名为候选人。

四

缴纳会费的时间自 1 月 1 日开始，12 月 31 日结束。

五

委托书记写信给尚未领取会员卡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通知他们，如果截至4月25日不领取会员卡，就认为他们是自愿退出中央委员会，从而把他们从委员名单中除名。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决议是必要的，因为有人抱怨早先一个同样内容的决议没有正式通知过缺席的委员们。

六

大陆上的通讯员当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1864年11月8日、29日和1865年
1月24日、31日及4月11日、25日
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
参加国际的手续的决议⁵⁷⁷

小委员会⁵⁷⁸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

1. 发给加入协会的每个团体一张证件。这种证件是一般性的，上面写明所开列的团体已经加入国际协会。

2. 英国的个人会费，应全部送交中央委员会，但是，协会的任何支部遇有合理开支时，中央委员会如认为开支得当，可以拨给一笔钱款，以偿付这项开支。

3. 向大陆的兄弟们供应会员卡，每张一先令，所得之款应送交中央委员会。

1865年2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⁵⁷⁹

2月21日(星期二)。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勒吕贝,他即将动身。

2月22日,星期三。(晚)吕贝动身。

巴黎,2月23日。在弗里布尔等人处会见勒福尔。(见弗里布尔的信。席利信中勒福尔的答复第2页。)

2月24日⁵⁸⁰晚。会见弗里布尔等人。

2月25日晨。勒福尔偕同勒吕贝访问席利。席利把勒福尔留在附近,便到弗里布尔处去了。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各种朋友,其中还有勒福尔的一个朋友。大家都坚决反对他钻进来。于是席利就去找勒福尔,向他说:他认为他所提的那种要求是不能接受的(第2页)。勒福尔本人也受骗了(同上)。对勒福尔做了一些安排(第2、3页)。

2月25日(!)晚。会议。勒吕贝缺席;到勒福尔那里去参加晚会了(第3、4页)。

关于2月25日会议的记述(第4、5、6页)。

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4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和英文

卡·马克思
* 写给海·荣克的有关
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⁵⁸¹

小委员会。3月4日会议。他 已经准备要提出一项决议案，根据这项决议案，巴黎理事会应由以下人员组成：弗里布尔、万萨德、利穆津、勒福尔指定的三名代表、类似仲裁人的席利。

小委员会。3月6日会议。他再次提出这项决议案。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未经分班表决他就让委派席利的事通过了，用议会的话说，也就是认可了这项委派。

刚一委派，甚至决议还未到手，他就急速给巴黎去信。他料想，正如他所说的（3月14日），巴黎理事会将会反对席利。因为根据第五项决议（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席利只被委派为驻该理事会的代表，对他的委派只有他们才可以提出异议。

吕贝对他们的期望落空后便同自己的一伙兄弟们密谋，把委派席利说成是他们辞职的原因。⁵⁸²他把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处境：

他以勒福尔的名义反对巴黎理事会，又以代表法国支部等的巴黎理事会的名义反对席利。

福克斯先生说（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勒吕贝之所以在3月4日和6日的会议上忘记席利的国籍，而在3月14日又记得清清楚楚，完全是因为他认为对勒福尔先生不尊重，他要报复。勒吕贝接受了这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他的卑鄙诽谤是：

第一，第五项决议的引言是为了争取票数而以欺骗手法加进去的。这个引言依据的事实是由勒吕贝转来并于3月7日当着托伦等宣读的席利先生的公开信，其次是席利先生给小委员会的报告，最后是巴黎2月24日会议通过的决议。加进这个引言只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连一点独裁的样子也没有。

第二，3月7日花了好多时间去进行个人争吵，以便匆忙地通过最后三项决议，使大家措手不及。

第三，席利先生不是工人。这在原则上已为第二项决议所否定。席利应当只是秘密地同巴黎理事会一起活动，勒福尔则应代表协会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活动。两者情况不同。

关于勒福尔。

他要求我们委派他为在法国的报刊的总辩护人。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他会和托伦等人协调一致地进行活动。他这样得到了委任后，就转而以合法的身分来反对我们。根据托伦的信，在派勒吕贝去巴黎之前，我们就针对勒福尔先生的名字和社会地位撤销了这项任命。（我们把它归结为：允许他写文章不署自己的名字，而署工人的名字——这件事，没有我们的同意，他是可能做的。）由他当时写给勒吕贝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来看，情

况就是这样，但他表示同意。巴黎 2 月 24 日会议只犯了反对已经不存在的一项决议的错误。因此勒福尔先生或者他在伦敦的朋友，假装忘记他已放弃了委派给他的职务。他甚至威胁我们说，他要劝告所有的民主派提防我们，他忘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能劝告人们提防他。

他和他的代理人勒吕贝说，他不是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需要的只是政治保障。好吧。我们就委派万萨德，他这个人比勒福尔和勒吕贝加在一起还大的保障。万萨德先生被委派后，在勒福尔和勒吕贝看来，他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对于由托伦等人提出、后来由我们批准的关于万萨德的建议，他们唯一能提出的异议之点是没有及时通知勒福尔。于是这种礼仪上的无足挂齿的小事就成了他们持反对立场等等的最后借口。

协会的国际性质受到威胁，以及中央委员会委派使者的权力。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形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1) 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马克思宣布，撤销对席利先生的委派，而他之所以同意委派，只是因为这是一致通过的。

(2) 委托勒吕贝通知法国理事会和勒福尔（在 3 月 7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指示如下：“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因为未能达成协议，在 3 月 14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个人指示变成了决议。这是唯一被通过的决议。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勒吕贝应逐字逐句地把决议全文通知双方。)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16
— 18 日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⁵⁸³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德国工人政党》(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

我们借此机会愉快地向读者推荐本书。本书富有远见地、公正地、熟练地阐述了当代德国所十分关心的问题。普鲁士军队原先的组织，它的改组的任务，普鲁士宪制冲突⁵⁸⁴的产生，进步党对反对派的领导，与此同时发生的进步党⁵⁸⁵和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所有这一切都在该书中得到了扼要的、同时又是崭新的、极其充分的阐述。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中
载于 1865 年 3 月 17 日《伦敦通讯》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
的报告札记⁵⁸⁶

(1)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一般地说，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而商品的价值却保持不变。

(2) 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工资的普遍提高才可能实现。如果工资得到普遍提高，那么它也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丧失。在现今的生产基础上，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而是降低工资。即使工资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得到普遍提高，也不能消灭，而只能减轻对雇佣工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奴役。

(3) 工联只要阻止——哪怕是暂时阻止——工资水平普遍下降的趋势，只要力求缩短和调整劳动时间，即工作日长度，它们的工作就有成绩。只要它们是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一种手段，它们的工作就有成绩。它们有时遭到失败，那是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力量使用不当。它们经常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把现存的劳资关系看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设法予以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6 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在 1866 年召开
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同意将下述决议案提交代表会议
批准：

如果没有发生必须使大会延期举行的意外情况，中央委员会
将在 1866 年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1865 年 9 月 19 日总委员会会议
通过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讨论代表大会
议程的程序的决议⁵⁸⁷

在开始讨论代表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宣言和章程所规定的协会的总目标和指导原则。

卡·马克思在 1866 年 1 月 23 日总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 年莫斯科版

卡 · 马克思

* 关于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
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⁵⁸⁸

委托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步骤，促使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1866年7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
通过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
1961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常务委员会关于
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

1 常务委员会建议，采取法国人提出的议程，只做一处修改：将最后一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合并。⁵⁸⁹

2 责成书记提出关于会员人数的报告和关于收支情况的综合报告。

3 常务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⁵⁹⁰：

(1) 行业名称。

(2) 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 从业工人的人数。

(4) 雇用的条件和工资：(a) 学徒工资；(b) 工资是计日或者计件；支付是否经过中间人等等。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

(5) 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夜工，日工。

(6) 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 劳动场所的情况和劳动条件：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等，清洁条件等等。

(8) 工种。

(9) 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 道德状况。教育。

(11) 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的，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4.] 加入协会的团体按每个会员半便士缴纳年度会费，会员卡或会员证的费用另付。书记有权同经费不足的团体协商减收会费条件。

[5.] 中央委员会建议会员建立互助会，并组织各互助会间的国际交流。

[6.] 各地方委员会应经常了解本地区的行情，并向工人提供情报。

卡·马克思在 1866 年 7 月 31 日总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84—1866》

1961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

马克思提议奥哲尔为 [总委员会主席的] 候选人。马克思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此项职务，因为他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⁵⁹¹

——

马克思建议目前只暂时确定这个委员会 578 的人选。委员会应由负责人员和已经委任的书记组成。

二

1 中央委员会委员凡无充分理由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四次以上者应从中央委员会除名。

2 . 此项决议应立即通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三

一致决定今年不委任常务主席；财务书记迄今所履行的一切

职责移交给总书记，取消财务书记一职。⁵⁹²

1866年9月25日，11月6日和1867年
9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会议记录。1866—1868》1963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洛桑代表大会事日程的决议

—

代表大会事日程第一项如下：

关于使国际工人协会能在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他们的共同行动中心的作用的实际办法。

二

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任何支部无权提出自己的议程，只有总委员会有权拟定代表大会议程；委任总书记将总委员会的议程送交《法兰西信使报》，并将这一决议通知巴黎委员会。⁵⁹³

· 卡·马克思在 1867 年 7 月 9 日和 23 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3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 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⁵⁹⁴

由国际工人协会倡议和支持而在德国成立的工会，给莱茵省制铁业领导人提供了反对普鲁士政府企图降低生铁进口税的论据。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商会认为，降低生铁进口税肯定会使普鲁士矿业资本家完全破产。英国资本家主张，为了经得住国外的竞争，不得不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德国矿业资本家要求维持保护关税措施以免遭英国人的竞争所带来的破产；然而普鲁士工人的工资比英国工人的工资少一半还多，而劳动时间却更长。

商会在4月14日给政府的报告中说：

“德国制铁业一旦破产，那将无法挽救。大资本将完蛋，成千上万工人将无以糊口。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工人问题越来越大，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危险。”

这一自白证明，协会的工作不是徒劳的。资本家要求官方调查普鲁士制铁业的现状。工人们坚决主张，调查也要包括对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状况的研究。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5月5—12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8年5月16日《蜂房报》第344号

卡·马克思

* 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
代表大会（1866）和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1868）决议之前的一段话

鉴于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些决议可能被看作是国际工人协会原则性纲领的一部分，而关于那次大会的报道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总委员会认为，把那些决议同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一起重新发表是适宜的。

第一次即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最重要的有下列问题。⁵⁹⁵

载于 1868 年 11 月 21 日《蜂房报》第 371 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纲领和章程的评语⁵⁹⁶

[公开同盟的
纲领和章程]

[卡·马克思
的评语]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结果脱离了这个同盟，从而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个完全溶化于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些朋友们

阶级平等！

溶化于和成立于对立之中！

这样一来，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派来说，国际不是相互了解的手段。

共同倡议建立这个新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中央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公布出来。

何等谦虚！他们作为中央权力机构组织起来了，真是好样的！

国际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纲领

(1) 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好象可以下命令废除信仰！

(2) 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而且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雌雄异株的人！
完全是一个俄国公社！
旧的圣西门的灵丹妙药！

(3) 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即在抚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学习阶段上得到同等的条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空话！

(4) 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

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5) 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6) 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7) 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 程

(1)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2) 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中央局。

(3) 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民族局。

(4) 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各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5) 一切地方组织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

如果是自己缩小自己的职能，那么不是必将消失，而是自己消失。

竞争与竞争不一样，我亲爱的俄国人！

国际协会不容许有“国际支部。”
新的总委员会！

国际的章程不承认这些“中间人的权力”。

(6) 凡是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十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7)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侵吞我们钱财的新的
苛捐杂税！

他们想在我们的庇护
下损害我们的声誉。

创建的日内瓦 组织的成员

约·菲力浦·贝克尔。——米·巴枯宁。——泰·雷米。——安东·林德格尔。——路易·尼德格尔。——瓦列里扬·姆罗奇科夫斯基。——扬·扎哥尔斯基。——菲·策勒。——安·阿尔丹。——沙·佩龙。——茹·盖伊。——J·弗里斯。——F·罗沙。——尼古拉·茹柯夫斯基。——米·艾尔皮金。——扎姆佩里尼。——恩·贝克尔。——路易·魏斯。——佩雷。——马劳达——爱德华·克罗塞。——A·布朗沙尔。——A·马蒂斯。——雷蒙。——阿列克谢也娃女士。——巴枯宁娜女士。——叙泽特·克罗泽女士。罗莎丽亚·桑吉内德女士。——德吉烈·盖伊女士。——珍妮·吉奈女士。——安东·杜诺。

蠢人中的蠢人！
还有巴枯宁娜女士！

—— J·莫莱。—— 盖里。—— 雅克·库尔图瓦。—— 让·波托。—— 安德烈·贝尔。—— 弗·博费蒂。—— Ch·居约。—— Ch·波斯特莱布。—— Ch·戴特拉。—— J·克罗泽。—— J·桑吉内德。—— 沙·雅克拉尔。—— L·库兰。—— 弗·盖伊。—— 布莱兹·罗塞蒂。—— 约·马里伊。—— C·布雷希特尔。—— L·莫纳雄。—— 弗·梅米约。—— 大多纳。—— L·J·谢纳瓦尔。—— J·贝多。—— L·H·福尔纳雄。—— 皮尼埃。—— 沙·格朗热。—— 雅克·拉普拉斯。—— S·佩拉顿。—— 威·劳。—— 瓦尔特·哥特洛布。—— 阿道夫·海伯林。—— 佩里埃。—— 阿道夫·卡塔兰。—— 马尔克·埃里迪埃。—— 路易·阿尔芒。—— A·佩莱格林·德鲁瓦。—— 路易·德·科佩。—— 路易·杜普拉。—— 吉尔莫。—— 约瑟夫·巴凯。—— 弗·皮斯特尔。—— Ch·吕谢。—— 玛格丽特·普莱西德。—— 保尔·加尔巴尼。—— 埃蒂耶纳·博雷。—— J·J·斯科皮尼。—— 弗·克罗谢。—— 让·若斯特。—— 莱奥波德·武赫尔。—— G·菲耶塔。—— 路易·菲利凯。—— 阿米·冈迪永。—— 维·阿列克谢也夫。—— 弗朗索瓦·舍伐利埃。——

由于创作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盟员决定创办名为《革命报》的报纸作为新组织的机关报，临时中央局一俟募集到三百股份（每股十法郎，从1869年1月1日起每个季度缴纳四分之一），就着手出版刊物。因此临时中央局吁请同盟各民族局在本地区着手募集股份。因为取得股份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厚颜无耻地在瑞士宣布，说我将《革命报》上发表文章！

被看作是一种不提供报纸获得权的自愿的礼物,因此各民族局应同时编制订户名单。

报纸每周出版一次。

订 费

一年.....六法郎

六个月.....三法郎五十生丁

受临时中央局委托：

书记 扬·扎哥尔斯基

蒙布里昂街8号

注意：请各民族局在1月1日以前将抵偿股票的款项和订报费交到中央局。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2月15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

1964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⁵⁹⁷

国际工人协会致《蜂房报》编辑

阁下：

在本月 5 日本协会会议上，宣读了几封德国来信，告知有两千名鲁高（萨克森）矿工加入协会，另有两个各拥有近七千人的矿工团体采取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措施。

柏林成立了民主工人俱乐部；它的成员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并且反对普鲁士政府，反对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按照英国工联的模式并根据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建议的某些改进意见，建立了工会，会员已达十一万人。

比利时书记 报告说，比利时已有六十个协会分部，每个星期都有上千名新会员加入。

瑞士书记 传达了关于巴塞尔一些织带工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消息。这个问题决定等下星期二委员会掌握了全部事实时再谈。

贝尔纳。——编者注

荣克。——编者注

法国书记 报告说,法国的卢昂、诺尔省和其他一些省份的棉纺织厂主商定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以便按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货物,在本国市场上击败英国的企业主。

公民阿普耳加思提出的、公民马克思支持的下列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委员会认为,法国卢昂、诺尔省和其他省份的企业主为了在本国市场上击败英国厂主的明显目的而降低自己工人工资的勾当,理应受到世界各国工人和企业主的谴责。我们承认自由竞争的权利,如果自由竞争是以合法手段进行的话,但我们完全反对用缩减本来就极低的工人工资的办法来扩大贸易。

决定建议各团体派代表出席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会议将于 1 月 19 日星期二晚上八时举行,讨论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来粉碎法国厂主不可容忍的勾当和给予有关工人以必要援助的问题。

临时执行书记 海尔曼·荣克

1869 年 1 月 6 日

载于 1869 年 1 月 16 日《蜂房报》第 379 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 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⁵⁹⁸

公民们！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协会会员之间如发生分歧，总委员会应该充当仲裁人。根据以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请求总委员会裁决阿尔伯·里沙尔和旧里昂支部的成员舍特尔、科尔米埃、安·勃朗、沙诺、万德里之间的纠纷。

总委员会研究了该支部寄来的材料，认为所提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并肯定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特别任命的两个委员会——一个是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任命的，另一个是1869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任命的——的决定；总委员会仍然认为，阿尔伯·里沙尔任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是符合章程和条例的。

此外，鉴于旧支部的成员呼吁激进的市民对这个只有协会会员应知道的问题作出裁决，是违背协会的章程、精神和利益，并且是有利于敌人的，因此，总委员会强烈谴责旧支部成员的这种行为。

总委员会利用这次误会使它所处的地位，要求协会全体会员在公开发表任何文章或公开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必须向它报告。因为这种做法会挑起个人之间的仇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正当我们会员的全部行动、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应当集中起来争取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迅速

胜利的时候，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1870年3月8日由总委员会批准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

1964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⁵⁹⁹

1870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大约两周前机械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终于邀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讨论关于同德国五金工人和巴黎机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现在，在通过有关你们的决定以前，他们提出下列问题请予回答：

1. 工作日有多长？
2. 每周几个工作日？星期日上不上工？
3. 工资多少？
4. 有没有加班费？多少？
5. 会员多少？
6. 你们每周交多少会资？
7. 互助保险会等等同工会团体有无联系？
8. 协会包括哪些劳动部门的工人？

致兄弟般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70 年 4 月 18 日
载于 1870 年《哨兵报》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每日电讯》的前通讯员罗伯特·里德⁶⁰⁰

1871年7月1日

《晨报》通讯员鲍尔斯在佩捷尔斯饭店同《泰晤士报》通讯员达拉斯和一名俄国使馆随员一起被捕后被立即释放了。但是后来他又回到咖啡馆去找他的夫人(英国女人),碰见她正同另一位先生卖弄风情,于是他向这位先生扑了过去,因此被捕,受到监禁。

这三个人在《真理报》发表了一封信,造谣说:(1)咖啡馆里有佩挂着镶金边红色肩带的公社社员和出示过本人证件的各种淫荡女人,(2)鲍尔斯被捕没有任何理由。(这不过是些警官,佩有红色肩带,但没有镶金边。)

《电讯》经常发表被彻底修改过的里德写的报道。报纸拒绝发表一封十分重要的来信。

《电讯》的凡尔赛通讯员在5月17日或18日的报纸上说什么库尔贝在路弗尔宫用锤子砸了艺术品。20日里德把这个电讯给库尔贝看了。库尔贝给《电讯》编辑寄去了下面这封信:

“阁下:

我不仅没有毁坏路弗尔宫的任何艺术品,而且相反,根据我的倡议,把那些被各位部长分散在首都各个大厦中的各种艺术品收集到一起,送回了[路弗尔]博物馆原处。对卢森堡也是这样办的。我是把从梯也尔先生家里搬出来的所有艺术品保存起来并进行分等的那个人,而我却被控告拆毁旺多姆

圆柱。但是有案可查的事实是：关于拆毁的法令是4月14日通过的，我在六天以后即20日被选进委员会。我激烈坚持保存浅浮雕，并建议在残废收容所的庭院内建立浅浮雕陈列馆。我知道我的行动的动机的纯洁性，我也意识到从帝国这种制度所继承下来的一切困难。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古·库尔贝

1871年5月20日于市政厅”

但是通过里德寄给《电讯》的这封信，没有被刊登出来。

见4月10—12日报纸。

托伦。《泰晤士报》通讯员想知道总委员会对此事的意见。而《泰晤士报》拒绝登载我们的决议。⁶⁰¹

曾有人建议里德给《电讯》发通讯，而且他可以发誓，这些通讯见报时被修改得不利于公社了。

《每日新闻》通讯员阿道夫·斯密斯关于公社的讲演将于1871年7月3日在切林- 罗斯剧院举行。

他参加了和平街的示威游行。国民自卫军的枪枝搭成角锥形排列在旺多姆广场。一个他称作（李特？）的英国人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扑向这些枪架，想夺取其中的一枝枪。

茹尔德留在燃烧着的财政部大厦抢救书籍和金钱，直到最后一分钟。可是他却被控告是纵火犯！一个住在对面的英国人（他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看到，两枚炮弹打穿房顶爆炸了，马上冒起了烟，然后就出现火焰，渐渐吞没了整个大厦。

弗·恩格斯 1871年7月1日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和
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一书。1972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和英文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1869—1871 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⁶⁰²

1869

(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

1869年9月28日。荣克说收到克吕泽烈将军从纽约的来信。信是写给代表大会的，但是到得太晚。

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报告的印刷问题。

宣读了纽约裱糊工人的信。他们要求总委员会施加影响，制止工人的输入，因为输入工人会使目前正在罢工的工人遭到失败。对此采取的措施（后来收到了得到总委员会的信的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地工联理事会的来信）。

1869年10月5日。宣读瓦尔兰从巴黎写来的信。他报告说，代表们已经开过会，他们决定要尽力促进各自的团体加入协会。

奥哲尔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曾提名累瑟姆和拉姆博德为候选人。推迟。

黑尔斯（鲁克拉夫特附议）：“总委员会应着手建立以代表大会决议为其纲领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该支部应称为‘全国劳工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

韦斯顿报告说，10月13日将在贝尔酒店召开会议，建立一

个宣传土地问题和工人提出的其他措施的组织。

1869年10月12日。通过关于建立国际英国支部的提案。

1869年10月19日。

1869年10月26日。莫特斯赫德当选。

决定“起草一个要求释放（爱尔兰的）政治犯和说明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决议”。

11月2日。黑尔斯：“上星期三（10月24日）土地和劳动同盟成立，总委员会许多委员进入了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目前没有必要做其他（有关英国支部）的事情。”

11月9日。

11月16日。《平等报》登载的反对总委员会的文章（马克思揭开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决议。

11月23日。（讨论爱尔兰问题。）

11月30日。（通过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决议。）

12月7日。

12月14日。荣克宣读《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的文章（施韦泽、李卜克内西等）。[月度报告]

1870年

[1月1日。关于《平等报》等的秘密通告信。爱尔兰问题等。报告等。]

这篇手稿中的方括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1月4日。罗伯特·休谟被指定为（美国长岛的）通讯员。（寄给德国委员会（不伦瑞克）三千张会员卡。）

《进步报》（洛克尔）和《平等报》（日内瓦）抱怨苏黎世的运动（《哨兵报》）政治性太强。

1月11日。日内瓦委员会来信说，支部不赞成《平等报》的行动。
[编辑委员会提出辞职，他们的辞职被接受。]

1月18日。

1月25日。杜邦提议，“在法国的任何团体，只要任命有与总委员会联系的通讯书记，即被认为在事实上加入了国际”。（通过。）

2月1日。瑞士中央委员会任命了《平等报》新编辑部成员。

赛拉叶收到布鲁塞尔来信。比利时总委员会赞同总委员会对《平等报》的攻击所作的答复。

2月8日。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申请入会。

2月15日。杜邦报告了里昂新旧支部之间的分歧。（提交小委员会578。）

2月22日。在那不勒斯，在国际开会的地方搜查文件，而警官并未出示搜查证。主席、书记和一个律师因抗议搜查非法遭到逮捕。

《觉醒报》刊登西班牙一家报纸的报道说，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将对国际采取严厉措施。

3月8日。小委员会关于里昂问题的报告。（里沙尔等。）

3月15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的来信 [杜邦曾要求他们把他们的章程和条例寄来]。

同意接纳他们，但不是作为“宗派”，并且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分歧。

3月22日。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人支部。他们希望马克思当他们的代表。

3月29日。

4月4、5、6日。拉绍德封代表大会。

4月5日。

4月12日。荣克收到拉绍德封的来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由于多数人投票赞成接纳日内瓦的同盟，日内瓦和拉绍德封的代表退出大会，自己继续开会。委托荣克向双方写信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况。

4月19日。（荣克说）瑞士的两方说法不一。新委员会代表大约六百会员，老委员会代表大约两千会员。

4月26日。（吉约姆给荣克的信。）

5月3日。关于臆造的反对巴登格的阴谋的决议（全民投票）。
[巴黎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被捕。]

5月10日。反对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决议。（5月10日。）荣克提议，以后正式文件都应有全体总委员会委员署名，不管他们是否出席会议。

5月17日。决议：“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

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编者注

集会地点；

法国目前存在的制度使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三条责成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集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5月17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今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

德巴普在给赛拉叶的信中询问总委员会对瑞士问题的看法。

荣克。佩雷（日内瓦）来信，他希望由总委员会来解决瑞士的问题。

5月24日。（围绕关于《蜂房报》的决议的争论。）

5月31日。巴黎人反对把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移至美因兹。关于克吕泽烈的问题。——荣克介绍奥斯本·华德。荣克介绍正在罢工的巴黎铸铁工人的代表杜瓦尔。总委员会指派代表团（荣克和黑尔斯）帮助他 and 工人团体取得联系。议决发给纽约的休谟证书。

6月7日。

6月14日。日内瓦新的同盟歇业（建筑业）。

6月21日。关于日内瓦问题的告各工会等书。

6月28日。卢昂的地区代表大会被禁止。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 蜂房报 的决议草案》。——编者注

卡·马克思《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编者注

日内瓦来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做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关于同盟,见韦斯顿的声明。)(通过提议:日内瓦委员会保持其原有的职权;新的委员会可以挑选一个地区性的名称。)

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布鲁塞尔(此事拟在应届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关于总委员会迁移问题的提议通知各支部)。提议被通过。黑尔斯表示准备提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7月5日。巴黎人希望驳斥检查官奥卢瓦捏造的罪名,但他们没有给总委员会寄来任何材料。杜邦抱怨没有得到答复。

7月12日。法国人支部。勒梅特尔。——实证主义者支部寄来会费。——机械工人联合会决定援助铸铁工人的钱。——建议(马克思提出的):“给各支部写信,请他们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是否合适。如果他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等等。”——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

7月19日。日内瓦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决议表示感谢。荣克写信给拉绍德封方面,指责他们放弃政治。——巴黎支部的反战宣言。——委托马克思起草反战宣言。

7月26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谈德国军事贷款(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柏林)。——(在他们的书面声明(他们为什么弃权)中公开宣布自己是国际会员。)

——宣读了7月23日的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卡·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编者注

以下是恩格斯做的摘录。——编者注

8月2日。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的来信，说总委员会应留在伦敦；但通知说，比利时参加大会的代表要质问为什么总委员会干涉瑞士的事情。马克思说，在巴门、慕尼黑、布勒斯劳等地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抗议书。荣克谈瑞士的事情。《团结报》上的文章。吉约姆方面还没有正式答复。巴黎人要求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提交小委员会。马克思提议询问各支部，是否同意代表大会延期举行。提议被通过。

8月9日。荣克收到那不勒斯的来信，说卡普卢索背叛了他们。

8月16日。再印（第三次）关于战争的宣言一千册。瑞士和德国（中央委员会）来信，要求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并授权总委员会确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8月23日。将在日内瓦印刷关于战争的宣言德文本一万五千份和法文本一万五千份。比利时委员会来信收回对瑞士争端的意见（见8月2日记录），并同意代表大会延期。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也赞成代表大会延期和总委员会留在伦敦。

通过了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决议。

8月30日。纽约成立法国人支部。奥斯本·华德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8月6日。马克思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通信，他们表示将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起草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决议。

9月9日。宣言被通过。

9月13日。赛拉叶去巴黎。

9月20日。不伦瑞克人被捕。被驱逐出美因兹。柏林、慕尼黑、奥

格斯堡、纽伦堡等地抗议兼并。派一个五人代表团与阿伦德尔大厅的委员会共同筹备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反对兼并的示威。

9月27日。报告(联合委员会)已同意派代表团去见格莱斯顿,要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10月4日。

10月11日。柏林和慕尼黑集会反对普鲁士的战争政策。关于巴枯宁9月28日在里昂的行为的信。财务委员会的报告。

10月18日。北明翰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对比利时的国际报纸不登载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表示反对。任命财务书记。

10月25日。比利时的《国际报》终于刊登了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第一部分。——海奈曼组织的集会。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抗议。决定讨论内部事务时,除总委员会委员外不准任何人参加。

11月1日。帕特森(新泽西州)和纽约来信说,那里的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发表了反对战争的联合宣言。奥布里(卢昂)来信说,波拿巴派仍然控制着政权,并且在行动。

11月8日。委托书记参加干预委员会的会议。

11月15日。由于战争迫近,纽约举行群众大会。

11月22日。布勒斯特来信说,10月2—10日,当地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全部被捕,10月27日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受审。两人被判处二年徒刑,一人被判处一年徒刑(仅仅因为参加了讨论保卫国家的大会)。——从公布的波拿巴的文件来看,在

- 全民投票前夕对国际的迫害是蓄意组织的。
- 11月29日。曼彻斯特工联理事会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杜邦被任命为郎卡郡的代表。
- 12月6日。马克思建议书记把委员们前三个月的出席情况开列一个统计表。建议被通过。
- 12月13日。书记宣读了一份列有委员们的姓名和他们9月以来缺席次数的统计表。此表列入会议记录，今后委员们谁出席谁缺席都要记下来。
- 12月20日。报告准备在纽约成立中央委员会。（见出席情况登记表）（在12月份最后一次会议以后）（1870年9月至12月和1871年1月至3月底）。

1871年

- 1月3日。
- 1月17日。北明翰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质问《邮袋报》对国际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人赞成兼并。）马克思发言反对奥哲尔在圣詹姆斯大厅的夸夸其谈（关于法夫尔之流）（反对我们的第二篇宣言）。
- 1月24日。纽约成立美国中央委员会。
- 1月31日。瑞士（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来信说，他们从西班牙

接着是马克思用铅笔写了这几句话：“1869—1870年期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 [日内瓦“同盟”支部] 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该支部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从另一页起继续是马克思做的摘录。——编者注

牙收到了要求建立密切联系的信件，但是在接受这一要求之前，他们想知道西班牙支部同总委员会有没有联系；如果没有，他们也不同西班牙建立联系。恩格斯被委派为西班牙书记。

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普法）战争（和英国政府的态度）的决议案。

2月7日。关于普法战争的讨论。英国政府的态度。

2月14日。（讨论继续进行。）

2月21日。土地改革协会在土地国有化这一问题上向工人党靠拢（穆勒）。哈里斯认为这是搞垮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一个步骤。

2月28日。关于土地改革协会的讨论。（决定讨论它的纲领。）

公民赛拉叶的报告（围城期间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3月7日。（关于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讨论。）（马克思谈1856年的巴黎宣言。）

3月14日。罗班。（在伦敦召开有所有支部代表参加的会议。）（被否决。）（关于1856年宣言的辩论。）（爱尔兰问题。）

3月21日。马克思说：战争爆发时，已给大陆各支部去信，通知不可能在美因兹或巴黎举行代表大会；所有回信的支部都请总委员会选择应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罗班说，巴黎没有收到这封信。决定给英国报纸寄去一个声明，驳斥强加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伪造的（关于开除德国人的）决议。

（3月18日决议。）

伦敦东区支部。

3月28日。赛拉叶被派往巴黎。拨给他妻子五镑。

见本卷第667—668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加诸于我们德国朋友的罪名仅仅是国际会员（所有其它的罪名都被取消了）。威灵顿游乐场举行的中央共和派大会（目的是建立共和派俱乐部）。威德建议加上“社会的和民主的”几个字。（二十六票赞成增加，五十票反对。）关于在伦敦东头建立支部的决议。

4月4日。旧金山支部。拜特纳-格林区支部。

4月11日。（安特卫普等地雪茄烟工人被解雇。）（总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月18日。总委员会第一次审查托伦的问题。

4月25日。开除托伦。得到批准。

5月2日。阿普耳加思和奥哲尔。（埃卡留斯提议，这次对他们暂不使用宣言必须有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的规定。莫特斯赫德反对。委托荣克同阿普耳加思谈谈此事，委托埃卡留斯同奥哲尔谈谈此事。）

5月9日。埃卡留斯辞去总书记职务。（阿普耳加思让总委员会决定是否在宣言上署上他的名字。奥哲尔希望在宣言付印之前能够过目。）

新西兰来信。

5月16日。黑尔斯当选为总书记。

5月23日。英国人将召开大会促使英国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法国流亡者的行动。大会已开过，以后就这一问题又召开过一系列会议。

5月30日。马克思宣读关于“内战”的宣言。（通过。）

6月6日。公社。英国报刊。马志尼。(国际民主协会企图起重要作用。)(公民卡迪奥出现。)

6月13日。(6月12日。对法夫尔通告的答复寄往《泰晤士报》。)发表关于内战的宣言。(公民博德里出现。)

6月20日。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出丑的会议。)(关于侯里欧克的丑闻。)

关于伪造的巴黎(国际)的宣言的声明。

6月27日。成立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每星期六开会。关于奥哲尔、鲁克拉夫特、侯里欧克等人的声明。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的关于宣言的信。

[《法兰西内战》]第一版售完。

7月4日。麦克唐奈当选。

卡菲埃罗来信。让罗伯特·里德带着宣言到各地作关于公社的讲演。沃尔弗少校(蒂巴尔迪等)、马克思与《派尔-麦尔新闻》。

7月11日。阿西案件—比果(代理人勒姆利出席)。关于华施贝恩的宣言。拉特森(普鲁斯)索取国际发表的一切文件。

7月18日。里沙尔问题(没有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埃利奥特(被否决)。

埃尔曼被选为比利时书记。

流亡者救济金问题。

7月25日。新奥尔良支部。(《公社报》是他们的机关报。)罗马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编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编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 旁观者 和 观察家 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编者注

教皇和马志尼反对国际。罗班提出瑞士问题。提交代表会议讨论。

决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9月17日）。

8月1日。马林的大主教，国际天主教工人协会。华盛顿支部。

罗沙建议成立调查公社历史的委员会（利用流亡者的力量和向流亡者调查）（科恩）。

8月8日。因新堡同盟歇业新堡和伦敦的机械工人派出的代表团。

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到比利时等国。通知国际各支部不要让工人到太恩河畔的新堡去。

阿普耳加思的信。今后来宾不许出席会议。

8月15日。利物浦和莱斯特郡的拉夫伯勒的支部。代表会议只限于研究组织问题和政策问题。

8月22日。（把公社社员迁移到加拿大的方案。）

8月29日。流亡者协会派出的代表团。争论。

9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黑尔斯、荣克辞去流亡者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关于代表会议的建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起草于
1871年9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
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庇护九世。——编者注

见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编者注

见弗·恩格斯关于召开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卡·马克思

*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 1871 年 9 月 9 日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1871 年 9 月 9 日晚八时

龙格主持会议。

马克思提议，朗德克是否仍然属于国际的问题与总委员会毫不相干，让他去找伦敦的法国国际会员解决。国际会员在巴黎受审时朗德克丧失气节，保证今后不再同国际有任何联系。但是这样的问题不能由总委员会来决定。

莫特斯赫德附议。

一致通过。

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会议不是由各支部的代表而是由各国的代表组成，代表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来同总委员会商讨问题的，因此代表会议同代表大会有很大区别，职权也很不相同。此点一定不要忘记。第一个问题将是：（1）钱的问题，会费没有按规定缴纳。代表会议无权改变章程，但能够执行章程，因此第一个提案就是，支部在被接纳入会之前要交会费。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2) (国际遭到禁止的各国，应提出自己的计划，允许它们使用其他名称，但不许成立秘密团体。)

埃卡留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3) 指定几名委员起草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两年工作报告。

照例通过。

荣克提议，埃卡留斯附议，指定马克思起草报告。

马克思：(4) 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改称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等等、等等。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5) 会后起草致各国政府的答复。

恩格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6) 设有经常性组织的国家要定期提出有关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征收会费情况的报告。

这一条由马克思自己撤销了。

马克思：(7) 凡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8) 总委员会应颁布新版《章程》以及标准的法文和德文译本，并列印出；而所有其他各国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

经总委员会批准。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莫特斯赫德：要求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一工作，可做如下决议：工会等组织，凡拒绝提供所要求之材料者，在罢工时总委员会将不给予援助。

麦克唐奈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小委员会星期一晚八时在马克思住处开会。

通过。

弗·恩格斯记录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

1965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 1871 年 9 月 11 日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1871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一 下午一时

于梅特兰公园路

赛拉叶主持会议。

恩格斯被指定为书记。

在恩格斯提议和黑尔斯附议下，决定同意特鲁拉夫的二十五镑十一先令六便士的账单，传单和第五次印刷的一千册的售价问题留待考虑。

一致通过。

恩格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先付给特鲁拉夫先生十镑，其余部分等他把售出的册数报来后再付。

一致通过。

马克思提议，龙格附议：为避免任何误解，要求总委员会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宣布，代表会议只不过是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而

举行的各国代表的会议，其任务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和决定一些组织措施。

黑尔斯提议，龙格附议：总委员会应建议成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旋又撤销，准备明天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建议成立女工支部。

弗·恩格斯记录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
代表会议》1936年莫斯科版

弗·恩格斯

* 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⁶⁰³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 年 10 月 17 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十分鼓舞人心，因为协会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是惊人的。三个月前马志尼断言，意大利只有一个城市有国际的许多拥护者。而现在，它在全国各处都完全巩固了。它在报刊方面的代表有：罗马不是两家就是一家日报，米兰一家日报，都灵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腊万纳、洛迪、帕维亚、吉尔真提和卡特尼亚的周报，其他一些在较小城市出版的报纸就不用说了。这些报纸是政府无休止地进行迫害的对象。这些报纸中有一家都灵的《意大利无产者报》，一连六号被没收，对每一号被没收的报纸，至少提出一次诉讼。然而这些报纸仍然无畏地进行斗争，反对教士、资本家和因国际不是宗教性国际而对它进行攻击的马志尼。政府解散了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国际的两个支部，但这只是引起了在全国立即建立起许多新的支部。在吉尔真提，一个新支部刚刚登出了自己的章程，章程前面还登了总委员会发表的章程的译文。在腊万纳，六个共和派的和工人的团体组织成一个有共同的委员会的国际支部。

加里波第表示拥护国际的信件到处在翻印和讨论；这些信件

显然促使许多动摇者对国际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马志尼在意大利工人中的威信彻底破产了。

协会在西班牙的发展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迅速。西班牙的工会几乎都是由国际建立的，构成了国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在涉及整个协会的问题上都直接同马德里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联系。同时，全国同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会受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该中央委员会在涉及这一部门的一切问题上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联系。

这种组织由 1871 年 9 月 10 日至 18 日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下来，现在在整个西班牙建立起来了。在西班牙大概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自己的地方“工会委员会”，而且许多小城市也有这样的组织。到处建立了新的支部，还有数百人以个人身分参加进来。共和党不久前还攻击国际是“耶稣会”派，现在已尖锐地感觉到了它的力量。

巴黎公社一成立，就把共和派分成两个阵营。资产阶级部分站到了凡尔赛分子一边，而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和具有共和色彩的工人则支持公社。这后一部分人自然是倾向于国际，并且很快会加入它的行列，从而使它因加入了许多宝贵的新成员而得到巩固。同这部分人有联系的共和派报纸，开始宣传土地国有化和其他社会主义原则。这些报纸包括：里昂的《协会报》，马德里的《共有者报》，马拉加的《正义报》以及埃尔费罗尔的《劳动报》等等。在 10 月 15 日马德里举行的规模盛大的共和派群众大会上，关于同国际联合行动的建议得到了热情的支持。

卡·马克思

* 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

在公社被镇压时有四百六十名（外国人）被捕。他们在囚犯船上呆了五个月。由于缺乏犯罪构成，案件就了结了。

在纽黑文登陆，船上没有饮食。释放时衣不蔽体，身无分文。他们被告知，可以找各自的领事解决困难。

从纽黑文到伦敦的路程一部分是步行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71 年 11 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和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1972 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弗·恩格斯

* 关于意大利的状况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 年 11 月 7 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⁶⁰⁴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接到了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其中包括都灵、米兰、腊万纳和吉尔真提的来信。这些信件完全证实协会在意大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工人阶级，至少是在城市中，正在迅速地抛弃马志尼。马志尼对国际的攻击在群众中没有起任何影响。⁶⁰⁵但是马志尼的攻击却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促使加里波第不仅明确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的协会，而且就在这个问题上同马志尼公开决裂。加里波第在给撒丁王国法学家佩特罗尼先生（他后来当选为如今正在罗马开会的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席）的一封长信中表示出对马志尼派的愤慨，因为他们竟敢把他说成是一个对他周围的人，他的喽罗和谄媚者向来言听计从的老糊涂虫。他问，这些喽罗是谁？是否就是他参谋部里那些在 1848 年同他一起从南美洲来的人、那些 1849 年他在罗马遇到的人、1859 年和 1860 年他参谋部里的那些人、那些不久前同他一起与普鲁士人作战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么他肯定这是这样一些人：在意大利人们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们的名字。让马志尼派去当这样的喽罗和谄媚者试试看。

“我再再说一遍，您又搬出什么我的喽罗和谄媚者来，说他们总是牵着尼斯的那个白发孺子的鼻子跑，您这样做连别出心裁也算不上。您，佩特罗尼，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受苦十八年，而那时候恰恰是您那一派的人（马志尼派）被保皇派指控为我的喽罗和追随者。您把朝廷所发表的全部垃圾，特别是1860年以后的东西读一读，就会发现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要不是加里波第不幸处于马志尼的领导之下并被马志尼派所包围，那他还可能会有点用处。这都是假的。您可以问一问那些同我更接近或更亲近的人。他们还见到过有哪个人在下决心做一件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事的时候比我更顽强？请问马志尼本人，当他想把我拉过去干干他那种行不通的事情时，他是否觉得我那样容易被说服？请问马志尼，我们之间分歧的由来，难道不是因为1848年我对他说，他在我军在明乔河同敌人打仗时以某种借口把米兰青年阻滞在市内是错误的吗？要知道马志尼是这样一种人：谁要是怀疑他的绝对正确，他是绝不宽恕的。”

加里波第接着说，1860年马志尼竭尽全力来阻挠和破坏将军的最终导致了意大利统一的西西里岛远征；后来，当马志尼知道了加里波第取得成功时，就坚持要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宣布成立共和国，而在当时条件下这样做是荒谬的、极端愚蠢的；最后他责备这位“人人都知道是呆在意大利的伟大流亡者”无耻地诬蔑巴黎的烈士，那些唯一在这个暴政、谎言、怯懦和堕落的时代高举着，甚至在临死时还高举着权利和正义的神圣旗帜的人们。

他接着写道：

“您诅咒巴黎，因为巴黎毁掉了旺多姆圆柱和梯也尔的住宅。可是您没有看见整座村庄由于掩护了一个志愿兵或自由射手而被烧毁，而且不仅在法国如此，在伦巴第和威尼斯也是如此。至于在巴黎把宫殿倒上煤油放火烧的事，让他们去问教士们吧，教士们非常熟悉自己所宣讲的地狱之火，应该能够很好地判断煤油之火和奥地利人为烧光伦巴第和威尼斯的村庄而放的火

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伦巴第和威尼斯是处于这样一些人的奴役之下，他们枪杀了乌果·巴希、小西塞罗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因为这些意大利人犯有为罗马要求自由、为意大利要求自由的渎神罪。

一旦光明驱散笼罩着巴黎的黑暗，我希望您，我的朋友，要多多宽容人民因处境绝望而干出来的行为，这样的人民肯定是受了不好的领导——而易受教条主义者的高调所迷惑的民族一般都是如此——，但他们实质上是为自己的权利而英勇斗争的。不管那些诽谤巴黎的人怎么说，他们永远无法证明，是一些坏蛋和外国人——1849年他们在罗马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同一支有最精锐的普鲁士军队做后盾的大军对抗三个月之久。

而对国际呢？为什么要在几乎对这个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攻击它？难道这个协会不是由于全世界的社会状况不正常而产生的吗？一个多数人为了勉强生存而做奴隶，少数人不是凭自己的汗水而是凭谎言凭暴力占有多数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难道不应当引起受苦群众的不满和报复吗？

我希望国际不要发生象巴黎人民那样的情况，就是说不要上那些教条炮制者们的当，相信了那些人的教条就会被弄得头脑膨胀起来，最后成为笑柄；希望国际对那些带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改进的道路上前进的人，要先认真考查其品格，然后才给予信任。”

他又回过头来谈了一下马志尼：

“马志尼和我两个人都老了，但是没有人能提出要我们和解。一贯正确的人是死也不会让步的。同马志尼和解？要和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服从他，而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

最后，这位老战士用自己的过去来说明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为自由而战斗：起初在南美洲，后来为罗马教皇效劳（是啊，甚至为罗马教皇效劳，当时罗马教皇扮演着自由派的角色），后来在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手下，最后

在法国在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手下。他在结尾中写道：

“我和意大利的青年愿在需要的时候同你们，马志尼派并肩为意大利服务。”

加里波第在许多信中都明白地表示出他对国际的同情，但总是避免公开谈论马志尼，而最近这封信就不这样了，因而在意大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促使新的拥护者站到我们的旗帜之下。

还有通知说，关于罗马工人代表大会⁶⁰⁶的全面报告将送交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1 日《东邮报》
第 163 号

原文是英文

弗·恩格斯

* 罗马工人代表大会。——
倍倍尔在国会中的演说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 年 11 月 14 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从意大利又得到许多消息。从这些消息可以看出，所谓罗马工人代表大会⁶⁰⁶不过是马志尼的一个诡计，指望把关于国际在意大利有一日千里的发展的舆论引入迷途。今年夏天，组织得很好的马志尼派的地方首领们在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第一次而且是非常出乎意料地碰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正在失去他们迄今所给予工人阶级的绝对影响。意大利工人的健全的本能帮助他们懂得，公社时期遭到欧洲所有统治阶级大肆诅咒的巴黎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捍卫者，马志尼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参加整个资产阶级对巴黎人民的共同诅咒，这样他自己就破坏了他原先对意大利工人的无可争辩的影响的基础。于是意大利城市的工人就开始懂得，他们的阶级利益超出了马志尼派共和国的范围；这些利益对于文明世界的全体工人来说，是一样的，现在有了一个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巨大组织——国际。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对马志尼在一个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受僧侣统治的国家

里进行完全不合适的宗教宣传已经感到厌恶；他们也厌恶他的无休止的提示：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履行义务，而马志尼却从来不提他们的权利。马志尼认为，最好当这个反对派运动在萌芽状态中就把它除掉。近二十年来，他实际上领导了各种工人互助团体、秘密团体、林业兄弟会（Foresters）和意大利的祭司，领导了那些正式禁止谈政治，并甚至完全忽视一般职工会的最基本任务的组织。这些团体的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和委员照例都是马志尼分子，在他们的帮助下一些维护行将衰落的马志尼主义的行动才得以组织起来。1864年以前，这些团体每年举行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于1864年在那不勒斯举行，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团结互助的决议案，它规定一种设立中央委员会以管理共同事务等等的章程。但是从那以后，代表大会就再也没有开过。在利古里亚人团体的帮助下，马志尼得以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1月1日在罗马举行。罗马工人团体中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组织得怎样。那里的委员会是反马志尼分子的，由于利古里亚人的请帖上说的是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政治问题，委员会就拒绝派代表，理由是讨论这样的问题违反章程。实际上，只要不是由马志尼分子组成工人团体的委员会的地方，都没有派出代表；这是马志尼派的报纸自己说的；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派出的代表不是由各团体的成员而是由它们的委员会选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在意大利的大多数成员对于觊觎意大利基本工人群众的代表权利的这一代表大会提出抗议。其中只有不多的一部分人出席了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以便有机会监视代表大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于11月1日开幕。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当选为名誉主席，而这不过是在加里波第给佩特罗尼写的表示同马志尼彻底断

绝关系的信发表之后一个星期的事！后来又重新讨论了那不勒斯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团结互助的决议案。为此一位代表建议写进一项关于代表大会明确宣布自己忠于朱泽培·马志尼的原则的声明，作为对决议案的修正。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后旧的马志尼派组织占了上风。三十四票赞成，十九票反对，六个代表弃权，十人缺席。由于在投票者中占十五票之差的多数，而在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中占一票之差的少数，意大利各秘密团体（Odd-fellows）的成员和祭司在一年之中就用马志尼所能说的或做的把自己束缚起来。不用说，国际支部的三名代表立即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代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秘密决定，无论是关于国际的问题还是任何宗教问题都不予讨论。程序规则只能作有利于马志尼的变动！

对代表大会上其他问题的表决只有马志尼分子感到兴趣，这是企图使马志尼的行将消灭的影响起死回生，但在目前意大利工人中所能看到的国际影响的增长面前，这种企图完全是枉费心机。罗马的意大利激进报刊，特别是《首都报》和《论坛报》尖锐地谴责代表大会无条件地信任马志尼。《论坛报》写道：

“这一表决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之间、最高主教的神学原理和对工人权利的忠贞的信念之间的联合作出了最终的判决。”

人们对加里波第似乎是要说：您否认马志尼的原则是不对的，马志尼的原则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原则；对失败的公社社员是要说，凡尔赛的保皇派地主枪杀他们是对的；对国际是要说，各国政府极力要消灭它是对的，意大利将成为阻挡冲击特权和垄断的激流的屏障。

在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的意大利工人如果详细地讨论并很好

他分析所有的建议，本来是不坏的，但不是这样，反对意见在提出问题本身以前就产生了。明哲之士说：被当作福音书来理解的老师的话，对于被迫采用这类手段来摆脱不能用其他办法对付的宣传的那个政党来说，只会给它带来危害。

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农业工人和小农的值得注意的文章，这些人要求把现在还没有耕种和正在变成沼泽地的大地产宣布为劳动者的财产，如果这些地产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开垦和耕作的话。

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中两次发言。⁶⁰⁷在第一次发言中他批评了军费开支的增长。

他说：“整个这支庞大的军队基本上是用来对付国内工人阶级的。然而，资产者先生们，你们自己通过迅速发展你们的工厂和作坊造成了工人人数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致于你们永远不可能以同样的规模来扩大军队。”

在第二篇关于自由派建议德意志各邦务必有代议机构的发言里，倍倍尔说，德意志各邦，无论是大邦或小邦，它们的宪法，连记载这些宪法的那张纸也不值。普鲁士行政机关统治整个德国，为所欲为；他倍倍尔希望，所有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自由的最后避难所的小邦都被普鲁士吞并，使人民直接面对真正的敌人——普鲁士政府。当倍倍尔说他并不把德意志帝国宪法排除在这种一般谴责之外时，众议院根据主席的建议打断了他的发言。

这就是德国议会中的大贵族、官僚、资本家和法学家所阐述的讨论自由。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位工人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是非常严厉的敌手，因此他们必须用暴力堵住他的嘴。

卡·马克思 声 明⁶⁰⁸

本人，卡尔·马克思，现住密多塞克斯郡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郑重而诚恳地声明以下各点：

1.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870年9月初还在不伦瑞克⁶⁰⁹，该党从来没有申请过作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2. 因此也从来没有接纳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 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许多党员根据本人申请被吸收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个人会员。

4. 本声明是根据不伦瑞克商业家威廉·白拉克的请求发表的，他本人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我发表这项郑重的声明，真诚地认为它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已故国王威廉四世陛下在位第五年和第六年议会会议所制定并通过的关于取消本届会议一项法令的法令条例，被取消的这项法令的名称是：更有效地废除各国家主管部门采用的各种宣誓而代之以发表声明和更彻底地废除自愿的和非司法的宣誓和宣誓声明，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废除不必要的宣誓。

1871年11月17日即在伦敦西蒂区市长官邸签字和登记。

卡尔·马克思

出席者：市长西尔斯·约翰·吉本斯

发表于《对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
审判》1871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英文

弗·恩格斯

* 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⁶¹⁰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 年 12 月 5 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们收到一份来自丹麦的报告，主要谈的是农业工人的状况和在他们中的宣传鼓动。丹麦只有两个正式的政党，一个是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学理主义者”的党，另一个是自称为“农民之友”的党，他们代表着包括土地贵族和大农民私有者在内的土地占有者。他们还自称代表农业工人，可是不用说却从来没有为他们办过一件事。因为丹麦贵族比较软弱，所以大租佃者构成了“农民之友”党的大多数。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迄今一直处在他们的领导下，尽管这些人中间也有少数代表选入议会，但他们的行动受大租佃者的影响，他们被大租佃者纯粹当作工具来使用。

国际的目的是要使小农和农业工人不再依附于靠他们的劳动而发财致富的人，国际正在努力把他們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所谓的“农民之友”、而和城镇工人紧密团结的独立的政党。这个新的农业工人的党将以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决议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

我们的哥本哈根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说：“土地是人民的共同财产，人民应当共同耕种土地，享受共同的产品，并将剩余部分地租交给国家，

用于共同的目的，这已越来越成为公认的真理。”

但是，丹麦的土地主要是每人占有五十英亩到一百英亩好地的、人数众多的农民私有者的财产，不可能立即没收这么一大批人的土地。因此提出了一个对租佃者和农业工人都很有好处的计划，这就是建立由租佃者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农业合作社，共同耕种目前由他们各自耕种的土地。这样，中小型农场就将为拥有五百英亩甚至更多的土地的农场所代替，从而就能够采用农业机具，利用蒸汽力和在小规模经营农业时无法利用的其他现代化的改良措施，所需的资产可以用每个合作社的土地作为抵押向国家借贷。这些建议必然都是最起码的；但是它们看来却很适合农村居民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始终坚持宣传土地国有化是运动的最终目的，将大大有助于打破大土地所有者在教区牧师、乡村教师和政府官吏帮助下使农业工人至今所处的那种政治依附状态。

载于 1871 年 12 月 9 日《东邮报》
第 167 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 美国的分裂⁶¹¹

1872年5月

1871年10月15日，伍德赫尔（银行家的老婆、自由同居论者、大骗子手）和克拉夫林（她的妹妹，一类货色）的报纸发表了第十二支部的宣言（第十二支部是伍德赫尔建立的，里面几乎全是资产阶级骗子和改革运动中的潦倒背时的美国痞棍；第九支部是克拉夫林小姐建立的）。

第十二支部的宣言（致合众国讲英语的公民）（日期是1871年8月30日，由第十二支部书记威·威斯特署名）。

下面是这篇宣言的摘录：

“国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就要求，第一，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政治平等就是人人亲自参与拟订、通过和实行一切都受其管辖的法律。”“社会自由就是在一切纯属个人性质的问题上，例如宗教信仰、男女关系、服装式样等等，绝对不受无理的干涉。”

“这一主张第二还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自然，这个纲领也包含消灭……甚至语言差别。”

标题是恩格斯亲笔在另一页上写的。引文中的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第十二支部”邀请大家根据这个纲领在合众国组织“英语支部”。

整个这一组织是用来猎取职位和为了选举目的，这从下面的引文可以看出：

“尽可能在每一个预选区建立一个支部以便于开展政治活动。”

“最终应在每个城市成立一个相当于市议会的城市委员会，在每个州成立一个相当于州立法机关的州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一个相当于合众国国会的全国委员会。”

“国际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起将完全取代前者的另一种政治体制。”

这个宣言，以及在宣言基础上建立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骗人支部——自由同居论者的、招魂术者的、招魂震教徒等等的支部——是导致分裂的原因，老委员会的第一支部（德国人的）要求开除第十二支部和不接受那种不是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组成的支部。

起初，五个分裂主义者于1871年11月19日成立了一个由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组成的单独的委员会。

在1871年11月18日《伍德赫尔报》上第十二支部（书记是威斯特）对第一支部提出抗议，其中谈到：

“简单的真理在于：使一切人——不分种族、性别，不论处于任何条件下——享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乃是国际所要求的更激进的改革的必要前提。

在对现存的劳资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应该先在全世界给妇女以平等的公民权。”“第十二支部还要驳斥贯串在这里所说的抗议书（第一支部的抗议书）中的一个错误思想，即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

更早些时候，第十二支部就在 1871 年 10 月 21 日《伍德赫尔报》上宣称

“每个支部都有不容干涉的权利对历次代表大会的那些记录，以及那个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条例！做出、保持和表明自己的理解，每个支部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1871 年 11 月 25 日《伍德赫尔报》。第十二支部抗议《第一支部的呼吁书》（就是你交给意大利报纸和其他报纸去发表的那个呼吁书）。

“说单单是各国工人的‘相互谅解和协调一致’本身就构成协会的基础，这是不对的……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争取，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工人阶级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解放。”

1871 年 12 月 3 日，新的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成立（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

12 月 4 日，老委员会（华德旅馆 10 号）在致合众国的国际各支部的通告中揭露了骗子手，其中谈到：

“在本应成为防止一切骗人的改革活动的屏障的委员会（老中央委员会）里，终于形成了由几乎已被遗忘的改革家和人民造福者构成的多数……结果，宣传自由同居福音的人和想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造福全世界的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这些人有：农业合作社专家、招魂术士、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一个个力图各显其能。尤其是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为了推进运动而必须在这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起来，同时使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对立所产生的革命因素活跃起来……”

第一、四、五、七、八、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支部以及其他支部的代表们鉴于一切制止这种胡作非为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此决定，在老中央委员会（1871 年 12 月 3 日）无限期停止活动之后，

建立一个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新委员会,而不让一切只会把问题搞乱的人参加。”(1871年12月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威斯特当选为新委员会的代表。

应当指出,新委员会很快就充满了大部分来自第九支部(克拉夫林)和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建立的新支部的代表,这些新支部成分低劣,而且大部分人数很少,连填充必要的职位都不够。

同时《伍德赫尔报》(威斯特等人)却恬不知耻地撒谎说肯定会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

两个委员会都向总委员会申诉。好些支部,如法国人第十支部(纽约)和所有爱尔兰人支部都从两个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听候总委员会的裁决。12月2日《伍德赫尔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明该报撒谎,文章的标题是:《第十二支部得到支持。——总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指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恰恰相反,是肯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反对第十二支部要作为美国人取而代之的无理要求的。)

1872年3月5日和12日总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决议关系着国际在合众国的命运。(同时应当指出《伍德赫尔报》迄今故意搞的那一套对我的崇拜。)

决议一寄到纽约,反委员会的人们就实行他们那套老策略。一开始他们就曾在纽约名声最坏的资产阶级报纸上谈论最初的分裂问题。现在他们又在所有敌视工人的报刊的一片欢呼声中,对总委员会干起同样的勾当来(把事情说成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

1872年5月4日《伍德赫尔报》上对总委员会决议的评论是很说明问题的。

早在 1871 年 12 月 16 日,《伍德赫尔报》就写道:

“在成员方面,要求支部的三分之二或多少成员必须是雇佣奴隶,似乎做自由人就是犯罪。除此之外,没有提出新的要求。”

(这是在反委员会成立时)

1872 年 5 月 4 日《伍德赫尔报》写道:

“.....在总委员会的这个指令中,它的作者们居然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一个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奴隶组成的美国支部。各支部的成员是不是也必须成为政治上的奴隶呢?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假改革派、资产阶级骗子手和政治投机分子渗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危险,大半来自仅仅依靠雇佣奴隶制下的工钱过活而别无其他谋生手段的那一类公民。”

同时,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暴露出来了:原来国际应当为选举服务.....选举伍德赫尔夫人!

顺便提一下,早在 1872 年 3 月 2 日《伍德赫尔报》上由威·威斯特署名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

“去年 8 月发表第十二支部对合众国讲英语的公民的‘宣言’,是国际历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导致了总委员会承认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和承认我们当前活动的本质上的政治性。”

1872 年 3 月 2 日《伍德赫尔报》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大会》标题下写道:

“全国各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的代表目前正讨论关于今年 5 月在纪念周期间在这里举行联合大会的建议..... 的确,如果 5 月的这个大会开得好的话,那么谁能说已经消逝的民主党的残余 [那些.....原则比共和党派或民主党派更宝贵的人.....不会参加大会] 2 不会活跃起来并参加计划中的大会呢..... 合众国各地区的一切激进组织应当在参加大会的邀请一发表,就马

手稿中有删节。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按报纸恢复的。——编者注

上采取措施派代表出席。”

（顺便提一下，《伍德赫尔报》——我找不到是哪天的了——安慰那些招魂术士支部，劝他们不要理会总委员会。）

1872年4月6日《伍德赫尔报》写道：

“日益增多的材料证明：各种改革主张的代表订于5月9日和10日举行的大会……将是一次人民自发的奋起行动。”

全国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要求：

“这次大会……研究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

在下面这一标题之下也有同样的内容：

《1872年5月合众国即将成立保障人权的人民党》。

首先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维多利亚·克·伍德赫尔，然后是西奥多·H·班克斯、罗·威·休谟（两人都是反委员会的成员，班克斯还是它的创建人之一）。在这个呼吁书中说：大会将研究“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特别邀请

“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改革家、和平主义者、禁酒运动家、国际会员和妇女选举权运动家——包括一切从事争取选举权活动的各种团体——以及其他一切相信在我们的立法中贯彻永恒正义和人类平等的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

在1872年4月13日《伍德赫尔周刊》上，有关总统选举的诡计暴露得越加明显了。这次变了一下样子，向下列人士发出呼吁：

“国际会员和其他的工人问题改革家——和平、禁酒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支持者，以及一切相信立法、司法和商业中贯彻真正道德和宗教的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

以《人民党……》为题的新呼吁书。首先签名的仍然是：维多利亚·克·伍德赫尔，随后是反委员会里的头目们——西·H·班克斯、罗·威·休谟、乔·R·艾伦、威廉·威斯特、G·W·马多克斯（后来在阿波罗大厅会议上当主席）、约·T·埃利奥特（反委员会的英国书记）、T·米约（法国人第二支部代表）。

《伍德赫尔……周刊》（不是报，而是周刊），1872年4月20日。继续玩弄同样的手法。

名单增加了，仍然是以维·克·伍德赫尔为首（在名单中还有些“达官贵人”）。

《伍德赫尔……周刊》，1872年4月27日。继续同样的宣传。（开始刊登代表名单）。

《伍德赫尔……周刊》，1872年5月4日。继续搞那一套。（继续刊登那个扩大了名单）。

《伍德赫尔……周刊》，1872年5月25日。最后（5月9、10、11日阿波罗大厅的丑剧）提名伍德赫尔为合众国总统，提名弗·道格拉斯为副总统（反委员会的马多克斯是第一天的大会主席）。纽约和合众国的笑料。

此外还有反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T·埃利奥特——副主席。乔·R·艾伦——书记（兼决议和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在后一个委员会里的是：西·H·班克斯（1871年11月19日反委员会的五个创建人之一）。还有臭名远扬的玛丽·哈勒克夫人参加了一个委员会。在合众国纽约全国中央委员会里有乔·R·艾伦、西·H·班克斯（与第十二支部成员、维多利亚的第二个丈夫布拉

德上校一起)、艾·B·戴维斯。

反委员会的崩溃。

第二支部(法国人支部)撤销洛格朗(在此以前是反委员会的法国书记)的代表权。指责这些家伙

“利用组织来达到政治目的,把组织弄成女权派自由同居论者这一支的某种附属物……公民米约 他提出第二支部退出反委员会的决议案,决议案被通过 在提出决议案时说:只有三个支部——第九(克拉夫林)、第十二(伍德赫尔)和第三十五——在七拼八凑的阿波罗大厅会议上有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别有政治目的的;在上述会议上伪装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进行活动的代表团是冒充的、自封的”。

(但是联合会反委员会并不否认这个代表团。)(《世界报》,1872年5月13日。)

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撤回了自己的代表爱·格罗塞(冯·施韦泽先生的前任私人秘书,并声明,如果反委员会不接受总委员会的全部决议,就退出这个委员会。

《社会主义者报》(纽约),1872年5月18日。

纽约第二支部在5月12日星期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

第二支部有根据确信首饰匠协会拒绝加入国际,而这个协会却有一名代表继续在联合会委员会里代表它;

第二支部有根据认为另外一些代表所代表的是虚假的或只有六至八名成员的支部;

第二支部声明,必须进行调查……”

“鉴于第十二支部,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已被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力暂时开除,第二支部抗议第十二支部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留在联合会委员会里。

最后,鉴于国际是一个旨在使工人自己解放自己的工人协会,第二支部

抗议接纳大多由非工人组成的支部。”

第二支部的另一项决议。

“第二支部

在原则上完全承认妇女的选举权，但鉴于女公民伍德赫尔在阿波罗大厅的会议上向公众暗示国际支持这次会上所提出的候选人，

兹声明：

现在国际不能也不应该被任何美国政党牵着走，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代表工人的愿望，没有一个把工人的经济解放作为纲领和目的。

第二支部认为，

当前我们唯一的目的应当是组织和团结美国的工人阶级。”

同一号《社会主义者报》在《国际会员们，要小心啊》的标题下载有这样的话：

“国际在美国没有遭到也不可能遭到迫害；政客们绝不想消灭它，而是一心想利用它作为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杠杆和支点。如果国际让人家把自己引上这条道路，那它就不再是工人协会，而成为政客们的活动场所。

警报早就发出过；可是现在阿波罗大厅会议以国际的名义提名伍德赫尔夫人为总统候选人一事应当使目光不很敏锐的人也擦亮眼睛了。美国的国际会员们，要小心啊！”

《世界报》，1872年5月20日。

1872年5月19日反委员会会议。（阿波罗大厅的）马多克斯主持。八名代表（代表八个支部）（法国人和德国人）退出。

1872年5月20日《先驱报》登载了这次会议的消息，标题是：
《法国人受辱，愤然退场…… 恶言相加。合众国仅有会员一千五百名。
伦敦国际会员发生分裂。伍德赫尔集团获胜》

1872年5月28日总委员会决议，根据该决议——回答圣路

易斯的德国人支部和新奥尔良的法国人支部的问题——只承认老委员会（合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员会）。

卡·马克思写于 1872 年 5 月

原文是英文、德文和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
1965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1872年夏总委员会
批准的国际工人协会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⁶¹²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的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根本原因；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⁶¹³，它的解

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尽快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应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创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 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助、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的共同行动。⁶¹⁴

第二条 本会的名称：“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⁶¹⁵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自行按规定的日期到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改变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日期，并可经大多数联合会委员会同意将代表大会改为具有同等权力的秘密代表会议。但代表大会或代替它的代表会议，必须在上届代表大会所

这里和下面的楷体字是 1872 年夏总委员会批准改动的地方。——编者注

定日期之后的三个月内举行。

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每一民族各选出三名。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更换辞职的或因故无法履行职责的委员,有权在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少于章程规定之数额时用增选的办法加以补足。

总委员会在每个年度代表大会上做一次公开的工作报告。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提前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管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个全国性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同一思想指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所有其他团体加以研究,并且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时使协会内的一切团体都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总委员会应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主动向各个地方性团体和全国性团体提出建议。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另一方面,如果总委员会能够同几个大的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联系而不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那它的活动就会更富有成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尚处于分散状态的工人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这种全国性组织由在组成方面尽可能带有国际性的中央机关来代表。

不言而喻,本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除存

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和组织
条例的法文版的一页，
上面有卡·马克思的修改

在法律障碍的情况外，每一个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有权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八条⁶¹⁶ 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工人阶级通过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联合，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其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并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但是为了保证协会的无产阶级性质，每一个支部都必须由至少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⁶¹⁷

每一个支部对它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得到协会会员的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抵抗团体，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在每次代表大会上可加以修改的条例规定之。

组织条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 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决议修订

—

全协会代表大会

1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的每个成员均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每个协会会员均有被选为代表的资格。

2 凡成员不少于五十人的支部或成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的若干支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3 凡成员在五十人以上的支部或总人数在五十人以上的若干支部，每超过一百人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4 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5 代表由选出代表的那个或几个支部支給补贴费。

6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

7 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和讨论并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原则问题的公开会议。

8 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正式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小组或它们的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交并为总委员会所接受的问题。

所有支部，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交将举

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3月31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9 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议程及时通知所有的支部。

10 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成立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各小组或支部提出的报告，交给哪个委员会研究，就在该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该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报告，该委员会还决定哪些报告应作为正式报告的附录。

11 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12 对有关原则的问题，均实行唱名表决。

13 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

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只宣读这个总报告。

二

总委员会

1 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设有国际正规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

2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

3. 总委员会应每周公布其开会情况。

4. 凡在联合会之外的固体，如想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5. 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的团体或小组，但它们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一个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保留做出临时决定的权利。

6.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属于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有关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行使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要求该联合会各支部在三十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其余各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正规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

7. 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可以向代表大会进行申诉，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

8.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的、地方性的或国际团体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

决权。

9. 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委员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1. 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每个会员每月十生丁。

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各项开支。

2. 总委员会应印制价值十生丁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3. 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所属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4. 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的专页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那份章程上。

5. 各国或各地区的联合会委员会每个季度均应将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6. 这些会费券，须标明当年年份。

四 联合会委员会

1. 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2. 每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应每月向总委员会呈交一次报告。
3.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个季度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4. 每一个联合会都可以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支部或团体，但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资格；然而它可以建议总委员会将它们暂时开除。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1.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定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2. 此种带有地方特点的章程和条例，由联合会委员会审定其是否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不在联合会内的支部，其章程和条例由总委员会审定。
3. 所有地方分部、支部或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其名称和性质一律只是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在名称前冠以该地地名。
4. 因此，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

证论分部、互助主义分部、集体主义分部、共产主义分部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等类名称成立执行与所有国际组织的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5. 不言而喻，本节第二条 不适用于加入国际的工会。

6 请所有的支部和加入国际的工人团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7. 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不言而喻，本条绝不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支部的存在和建立。

8 凡载有攻击协会之言论的报刊，支部应立即寄送总委员会。

9 协会的机关报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各联合会委员会的地址和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

1 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条以及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

2 .每个地方支部内均应设一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国际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对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和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共同利益，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3 .每年 8 月 1 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

这是指本节原来的第二条，即现在的第三条。——译者注

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4. 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工会和国际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5. 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说：

由工人自己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一项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显然，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同时工人也将通过亲手进行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来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统计工作，按后面所附的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此项关于劳动的统计工作，由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共同合作进行；

报告和证明材料应寄给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一份总报告，把证明材料作为总报告的附录；

这个总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给年度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

(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修改)

1. 何种生产部门？
2. 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 从业人员的人数。

4. 工资：(a) 学徒工资；(b) 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

5. (a) 工厂中的劳动时间；(b) 小企业主雇工和家庭生产的劳动时间；(c) 日工和夜工；(d) 休息时间。

6. 工场规则。

7. 工场状况和劳动性质。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瓦斯的采用。清洁条件等等。

8. 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9. 道德状况；教育。

10. 生产情况：生产是随季节变化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是否发生大的繁荣和停滞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主要是为国内市场生产还是为国外市场生产。

11. 专管劳资关系的法律。

12. 居住条件和营养状况。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
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弗·恩格斯

* 小委员会关于米·亚
· 巴枯宁和同盟的决议

1 . 对巴枯宁的来信不予答复。⁶¹⁸

2 . 公民恩格斯将写信给瓦伦西亚的联合会委员会，要求它报告它与同盟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至少有三人属于上述团体。

3 小委员会将要求总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开除巴枯宁和同盟分子。

弗·恩格斯在 1872 年 7 月 5 日小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
1965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
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⁶¹⁹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伦敦牛津街拉脱本广场 33 号

致汝拉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施维茨格贝耳公民

我把您今年 7 月 15 日的来信交给了总委员会，它委托我答复您，总委员会在选定海牙作为下次代表大会集会地点时曾考虑了您信中所提的一切理由。这一选择是基于以下的想法。

代表大会不能在瑞士举行，因为纠纷正是从那里产生并且集中在那个地方；代表大会多少总是受到它开会的地点的影响；为了使代表大会的决议有较重的分量，使它的辩论进行得比较明智，它必须避开那样的地方特点，为此就应选择—一个远离纠纷的主要中心的地点。

您不会不知道，四次代表大会中有三次是在瑞士举行的，比利时代表在巴塞尔坚持主张下次代表大会在佛尔维耶或荷兰举行。

尽管在瑞士可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瑞士不能指望得到召开代表大会的垄断权。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选择也表示不满，不同意这一选择。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1872年7月28日

载于1872年8月1日《汝拉
联合会简报》第14号

原文是法文

弗·恩格斯 关于里米尼代表会议⁶²⁰

巴枯宁分子终于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里米尼召开了据说是国际的、而实际上是意大利巴枯宁分子的代表会议。二十一个有代表的支部中只有一个即那不勒斯支部是真正属于国际的。其余二十个支部为了不使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有意不做那些按组织条例能保证它们被接纳进国际的事情；它们没有向总委员会提出接纳入会的请求，也没有送来会费。这二十一个“国际”支部于8月6日在里米尼一致通过这样的决议：

“代表会议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庄严声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拒绝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团结，但大声宣布自己在经济问题上同所有工人团结一致，并建议所有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1872年9月2日不要派代表去海牙，而是去瑞士的纽沙特尔，以便当天在纽沙特尔召开反权威主义的全体代表大会。”

载于1872年8月21日
《人民国家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国际代表大会⁶²¹

—

8月25日于海牙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再过几天要开幕了。虽然许多方面曾要求政府不允许在海牙举行代表大会，但当局在自由派报刊的支持下没有对会议的组织者加以任何阻挠。在政府人士中占上风的意见是，不应缩小自由争论的权利，只有用自由争论的办法才能有效地反对虚假和无根据的思想，避免有害的危机。

我今天就把整篇文章献给代表大会，因为要了解将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贵报读者就必须事先充分明了国际的现状。由于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将几乎纯粹是讨论内部的事务，而且各个派别将会彼此对立，所以我应当先说明一下每个派别的立场及其斗争的目的。因此我首先阐述一下我对列入代表大会纲领问题的看法。

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通知，将要讨论国际今后的组织。因此总委员会有意要提出一项建议：把去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代表会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事日程的决议》。——编者注

议的决议写进章程中去，根据这一决议，各个国家中的协会会员应当组织成为政党。正是围绕这一点，代表会议决议的拥护者和根本不想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的所谓弃权论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知内情的人未必会了解这一点。

二十多年前，所有欧洲国家的流亡者发表了由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起草的《宣言》，宣言用最新的社会学说来看待社会关系，并且拟定了这样的政治斗争策略：在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还在同等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

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试图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策略。由于工人的不成熟以及其他社会阶级对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缺乏任何理解，联合会未能成为多少有点影响的力量；不但如此，它的创始人死后，它就堕落成为警探所领导的一个宗派，这些警探的夸张的废话被用来吓唬有产阶级。这个宗派在海牙不会有代表。

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也主要是通过了政治纲领。它正在走开头的几步，因此犯有某些幼稚病，但是在不断积聚力量。在代表大会上这一派将有来自柏林、德勒斯顿、汉堡、莱比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代表。

至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立场，并为了使封建教权派大伤脑筋，根本不愿听什么放弃政治之类的话。但由于前大臣吉斯克拉颁布的通令，奥地利工人不能进行国际的宣传，他们也不得建立支部；但是我听说，本协会居住在奥地利的一些会员已委托一位国外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声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认为放弃政治是滑稽可笑的。

国际工人协会英国会员在几个星期以前再次赞成在英国建立政党⁶²²以进行政治活动。

总之,由德国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一派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不仅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而且还有多数的瑞士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将在代表大会上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的上述决议写进国际的章程。将投票反对在章程中作这种改动的,只是有联邦主义情绪的比利时人,而在瑞士法语区、法国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代表中,则只是俄国人巴枯宁的那些拥护者。

现在我首先应当把国际发生分歧的起因告诉你们。至于比利时人和一部分法国人,他们向来都是蒲鲁东及其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原则的拥护者。他们热情而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而德国社会主义者则把他们敬为理论方面的诚实的敌人。

巴枯宁拥护者的情况则不同。巴枯宁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在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上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1868年他出席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向集会者鼓吹“人人平等”和“废除国家”。他的建议被拒绝后,他在俄国流亡者的支持下在瑞士法语区、法国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成立了几个工人联合组织,取名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协会的单个支部有权单独成立组织并在考虑到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现存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活动,但支部的章程决不能同协会的总纲领相违背。纲领简要地规定: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目的是“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应当去统治别的阶级。在布鲁塞尔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多数人赞成这样一个论点:只有社会交往手段和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工人阶级的状况才能得

到根本改善。

废除私有制、废除家庭、人人平等和消灭国家这几点没有包括在成立于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中。因此，总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执行机关，也应当建议同盟的领导修改自己的纲领。同盟在答复这个建议时声称，它的被总委员会宣布为荒谬的原则应当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样板。总委员会因此与同盟断绝了通讯联系，而同盟就对伦敦的执行机关发动了有组织的战争。这一战争迄今没有停止，因为巴枯宁先生的拥护者在制造大吹大擂的宣言和煽动人心的演说方面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人们经常把国际工人协会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为一谈并且把后者的观点归咎于前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只想引用一事实：茹尔·法夫尔在反对国际的通告中，以及议员萨卡兹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都引了同盟的唱高调的文件来证明国际的危险性。

在 1870 年头几个月，巴枯宁找到了费利克斯·皮阿这个好同志。这个人利用伦敦某个法国工人团体，打着国际的招牌发表各种各样有血腥气的宣言，其中包括要求杀死拿破仑皇帝。因此总委员会在报纸上公开声明，不能对皮阿的行动负责，他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上述法国工人团体后来在伦敦街头张贴宣传画，宣布国际是“反革命团体”。

到 1870 年底，同盟成功的可能性又大大减少了。日内瓦《平等报》的领导权从巴枯宁手里夺了过来，转到了总委员会拥护者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编者注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

手中。只是当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来到了瑞士和英国，弃权论者，或者说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中又开始有了活跃气氛。所有可疑分子都跑到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而最有觉悟的流亡者则参加到总委员会一边。

这里就国际对公社起义的态度再讲几句也许是适宜的。调查⁶²³本身已经表明，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决不是巴黎三月革命的首创者；公社的成员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多半是雅各宾分子和象皮阿一类的人。再说，公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几乎全是蒲鲁东分子联邦主义者；因此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在运动爆发后很快就表示这样的意见，说运动的结局将是不利的。当失败已成事实，失败者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时，总委员会和国内的报刊一致地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

我认为我对大陆上国际的状况已经给了足够的篇幅。关于国际在美国的情况，只想说一点：在那里，自由爱情的信徒和半上流社会的太太们钻进了支部，但已被赶了出去。于是被开除的人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支部，但总委员会不承认它。

考虑到上述一切，就应该有把握地预料到无政府主义者在代表大会上的失败。对巴枯宁个人来说，情况更加不妙，因为对他提出了使他声名狼藉的指责。有人把巴枯宁先生称做俄国的萨宾纳。涅恰也夫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巴枯宁曾经给俄国一些完全不相识的人寄信，信封上盖着“秘密革命委员会”的印章。其次，有一个情况是他料想不到的，这个情况同时表明了弃权论者的思想会导致什么结果。巴枯宁的两个参谋、国际同盟在法国南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见本卷第562—571页。——编者注

部的领导人和 1870 年里昂叛乱的发起人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已投到波拿巴阵营中去了。几个月以前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最后一句是：“皇帝万岁！”同时宣言中还有一句巧妙的话：

“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是我们的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

最后，我还应当指出，巴枯宁先生的拥护者甚至极力要在工人中间煽起民族纠纷。弃权论者的喉舌《汝拉联合会简报》最近一期（除了其他东西，它还登载了一篇呼吁书，最后两句是：“无政府万岁！集体主义万岁！”）抱怨代表大会在四个德意志国家的邻近地区召开。伦敦总委员会被非难有泛德意志倾向，它的一个姓瓦扬的法国委员，被指责受过德国的教育，因为他在维也纳和杜宾根学习过。

还必须补充一点：德国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在理论方面比法国人先进了约五十年⁶²⁴，德国的使命是确定实现社会改革时将遵循的法律，这些话在罗曼语区的国家里引起了不满。因此我想起被慕尼黑的约翰·胡贝尔教授称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家费希特的一句话：

“以体现着人类个性的一切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法律王国，将起源于德国”。

二

9月8日于海牙

在讨论我昨天已提到的国际在政治方面的立场问题时，各个集团的观点都亮出来了。现在在伦敦的巴黎公社参加者多数是布

朗基分子，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德国人一起行动，但绝不是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布朗基分子本身由于最近几年的痛苦经验确实有点清醒了，但遗憾的是，他们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傲气和热衷于那种他们企图通过轻率而且简直是荒唐的行为来求得满足的行动。⁶²⁵他们在说明投票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入章程的理由时所讲的话，促使到巴黎来的代表发表了下列声明：

“尽管我们非常崇敬布朗基，但我们不得不声明，目前巴黎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同意布朗基派的观点。我们想夺取政权，首先要争取工人阶层上升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那种精神发展水平。我们不想用密谋而想用为我们的解放事业所作的不懈的、公开的工作来赢得全世界的尊敬。”⁶²⁶

德国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赫普纳向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大声喊道：“你们街垒逻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放弃政治会把人弄进警察局。”

另一个德国代表⁶²⁷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有人把我们德国人叫做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的，我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必须使性格和智慧的权威在我们为之而奋斗的那个社会中也得到承认。但更重要和更必须的，是尊敬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中的这种权威。国际作为一个为了一定目标而成立的联合组织，如果它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一些集团，使它们不致损害整个协会的名誉和它的利益，那它就是有负自己的存在了。”（转向弃权论者）：“你们想反对集权的专制，但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走上了属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期的联邦主义。你们想推翻组织得很巩固的反动派机构，并为此在自己的队伍中强制推行无政府主义！”（热烈的掌声。）“对历史进程毫无认识的联邦

主义者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曾为反动派的事业效劳；他们刚刚在德国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他们在奥地利的失败是必然的。联邦主义在汝拉山区、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的一些省份中为奸细钻入我们的队伍打开了通路，并且促使一些集团走上同反动派结盟的道路……人们引证蒲鲁东，他于1863年曾经建议对帝国放弃政治。这种弃权主义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成立一个庸人和背叛者的政府。我决不是谴责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三月十八日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它是被挑动起来的。法国得以保存共和国应当归功于它。但它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它的联邦主义的性质。梯也尔在毁灭公社时可以用维持国家的统一作为借口，就象法国国务活动家在屠杀法国新教徒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们的、有责任全面弄清社会思想并使它开动起来的政治工作，如果你们想把自己孤立成宗派，那么世界历史会不理睬你们而转向自己面临的事务。”

完全不出所料，关于国际对政治的立场的决议案，在普遍支持的情况下不顾巴枯宁拥护者的投票如何而通过了。

在昨天的秘密会议的过程中，还决定委托总委员会成立国际工会，在瑞士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并按以往的数额征收年度会费。

财务委员会报告了财务账目，大家认为账目没有错；在全体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支出和收入的总额，并说明一些属于有产阶级的总委员会委员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费用。

见本卷第609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编者注

七时开始举行第三次公开会议，因为根据报刊代表的要求，放弃了前天通过的不举行公开会议的决议。

一大群人又奔向大厅里被隔开来作为接待宾客的那个地方，邻近的街道上挤满了人群，但这一次秩序井然。

荷兰代表万·登·阿贝勒、万·德尔·豪特、埃尔曼和布鲁塞尔代表布里斯美的发言谈到国际的原则，受到极大的称赞。走廊上一些刺耳的口哨声没有再出现，因为听众自己使这些破坏安定的人遵守秩序。在宣读了秘密会议的决议和收到的信件、电报之后，公开的会议又结束了。

最后一次秘密会议结束了国际同盟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开除同盟，首先是开除巴枯宁先生和吉约姆先生的决议。

夜里一点钟，代表大会宣布闭幕。今天还将在荷兰工人运动的中心阿姆斯特丹举行民众大会。

载于 1872 年 8 月 29 日和 9 月 10 日
《新自由报》第 2878 和 2890 号晚刊

原文是德文

卡·马克思

* 1870年6月—1872年4月
总委员会记录摘要⁶⁰²

总委员会会议

1870年6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

马克思提议布鲁塞尔为下届总委员会驻在地等。这项决议案送往各支部。

通过。

黑尔斯表示准备提议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7月5日。继续讨论。讨论暂停。

7月12日。马克思：“给各支部写信，请他们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是否合适。如果他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代表应把答复同委托书一起带来）（给代表们的指示）。只有三票赞成黑尔斯的修正案。

美因兹代表大会议程。

8月2日会议。

赛拉叶宣读比利时的一封来信，信中提议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除意大利和西班牙外，它距所有的国家都很近。比利

时人要求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他们反对把它迁到布鲁塞尔。

关于代表大会的讨论。

马克思反对布鲁塞尔人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建议。应该给所有的支部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延期。也许可以象 1865 年那样召开一次代表会议而不开代表大会。

荣克反对代表大会。瑞士在征集入伍（六万人）。

黑尔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要求各支部说明是否赞成大会延期，如果赞成，则授予总委员会以确定开会日期的权力。（通过。）

马克思：如果各支部同意，可以在这里召开代表会议，但他主张征求意见。

8月9日。西班牙人提议巴塞罗纳作为代表大会集会地点。

8月16日。荣克宣读了瑞士德语区委员会的来信，信中同意代表大会延期，并让总委员会确定时间和地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来信大意相同。两封信都反对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

8月23日。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委员会的来信，信中同意代表大会延期。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也写来相同内容的信，要求总委员会留在伦敦。

通过了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决议。

11月22日会议（波拿巴政府档案中的文件）。

“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耶曾写信通知法国所有城市，必须把国际的领导人逮捕起来，不然投票就不能顺利进行。”

11月29日会议。马克思报告说，我们的不伦瑞克朋友们带着镣铐从勒特岑被押解回来，以叛国罪名受审。为了吓唬资产阶级，受警察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告诉人们，这些人都是那个要颠覆一切、建立世界共和国的国际协会的同伙。

1871 [—1872]

3月14日。罗班提议召开代表会议。(被否决。)

7月25日。恩格斯提议召开代表会议，罗班附议。

本月马林的大主教建立了一个国际天主教工人协会，目的是和国际工人协会相对抗。

2月20日。关于吴亭的声明。

3月12日。关于美国的决议。

4月16日。柯克伦。福塞特。

草拟于1872年8月27日以后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1872年3月5日和12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职责的决议”

在着手讨论新的总委员会的候选人以前，总委员会委员无权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对委员会的另一委员进行指责。

卡·马克思在 1872 年 8 月 28 日小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
1965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关于 1872—1873 年总委员会
驻在地的迁移及其成员的建议⁶²⁸

我们建议，1872—1873 年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委员会由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下列成员组成：卡瓦纳、圣克莱尔、塞蒂、勒维耶尔、劳雷耳、Fr .G .贝尔特兰德、弗·波尔特、康·卡尔。他们将有权自行推选，但总委员会成员的总数无论如何不应超过十五人。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乔治·塞克斯顿、沙·龙格、奥·赛拉叶、麦克唐奈、欧仁·杜邦、弗·列斯纳、勒穆修、M .马耳特曼·巴里。

1872 年 9 月 6 日于海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9 月 6 日

原文是法文

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海·施留特尔
《国际在美国》1918 年芝加哥版

弗·恩格斯 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⁶²⁹

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有六十四名代表，其中：代表法国的十六人，德国——十人，比利时——七人，英国——五人，北美——五人，荷兰——四人，西班牙——四人，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三人，瑞士汝拉联合会——二人，爱尔兰——一人，葡萄牙——一人，波兰——一人，奥地利——一人，匈牙利——一人，澳大利亚——一人和丹麦——二人。有几个代表有两个或三个国家的代表资格证，因此上述数字不完全准确。按民族成分来说，二十个法国人，十六个德国人，八个比利时人，六个英国人，三个荷兰人，三个西班牙人，两个瑞士人，两个匈牙利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爱尔兰人，一个丹麦人，一个科西嘉人。以往历次代表大会没有一次有这样多的民族的代表参加。

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几乎占了三天。这是因为在一些支部是否属于国际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例如，纽约的（法国）第二支部就是这样。这个支部参加了美国联合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后来又反对它的决议，因而被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出联合会。因为在这之后总委员会没有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支部，而代表大会又没有重新审理它的开除问题，因此它的代表不能被接受，代表资格证不能被批准（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五条和第六条，第四节第

四条)。关于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全权证书就不同了。它是由一些被旧马德里联合会用各种各样虚构的借口在明显破坏本地章程的情况下开除的工人组成的。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指责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在西班牙的国际内部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背叛国际。之后他们就组成新马德里联合会，并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给予承认。后者的成员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大部分是属于同盟的，因此拒绝承认。在总委员会（他们向总委员会提出要求）承认了他们是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后，他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代表权遭到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反对。在这个具体场合，总委员会没有考虑组织条例的规定（第二节第五条），因为按规定它在接受新马德里联合会以前必须同西班牙委员会商量；它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一方面，拖延是危险的，另一方面，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公开站到同盟一边，造了国际的反。

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没有一人投票反对；这样，新马德里联合会就得到了承认。

对日内瓦的革命宣传支部的代表资格证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总委员会根据罗曼语区联合会日内瓦委员会的建议没有承认过这个支部。代表资格证，从而整个支部，在代表大会结束前都暂时没有得到承认，因为时间不够，这个情况没有审理，所以支部仍然没有得到承认。

总委员会象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那样有派出六名代表的权利，这一点经过不大的争议之后得到了承认。

没有缴纳上一个会计年度会费的四名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只

是缴了会费后才被允许参加会议。

最后，美国第十二支部，也就是那个在纽约闹了一场丑剧的支部（如早先《人民国家报》报道的）的代表作了长篇的维护第十二支部的发言后，遭到了一致的拒绝，因此第十二支部最终被留在国际之外。

这样一来，以审查代表资格证的形式，几乎研究并解决了国际一年来的所有实际问题。代表大会以三十八至四十五票的多数对十二至二十票的少数（多半干脆弃权）赞同总委员会的每一个步骤，一次次地对它投信任票。

来参加会的还有一个意大利代表，里米尼代表会议主席卡菲埃罗先生。8月4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二十一个支部（其中有二十个支部没有履行章程所规定的入会条件，也就是根本不属于国际）通过决议同总委员会断绝一切联系，并于9月2日在瑞士的纽沙特尔而不是海牙举行所有拥护这一决议的支部的代表大会。

他们看来改变主意了，卡菲埃罗先生也来到了海牙，但十分慎重，把自己的代表资格证放在口袋里，只是凭会员卡作为一个普通旁听者出席代表大会。

在第一次表决时（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立刻就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直到最后，除少数人外，这个多数派和少数派一直是团结一致的两个集团。法国、德国、美国、波兰、丹麦、爱尔兰、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和澳大利亚组成多数派。比利时、西班牙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荷兰、一个法国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少数派，他们在大多数问

题上全部或部分弃权。英国代表是各人投各人的票，各行其事。多数派的核心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的行动极其一致，就好像1870年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政府行动和国家行动都根本没有发生过。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在色当投降两周年纪念日加强了——俾斯麦的教训不比梯也尔少！

结束了全权委托书的工作后，就转入第一个紧迫的问题即总委员会的地位问题。要取消它是根本谈不上的，在星期三晚上举行的公开会议上的头几次辩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紧密团结的多数派显然有充分决心不使国际变成傀儡，在他们面前，关于自由联邦、支部自治等等漂亮空话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那些国际不得不同政府当局进行真正斗争的国家中的代表，即那些对国际采取最认真态度的人（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葡萄牙人、爱尔兰人），他们认为，总委员会应当具有一定权力，不应当象少数派所要求的那样把它降低到简单的“信箱”、“通讯统计局”的水平。因此对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四十票赞成，五票反对和四票弃权作如下补充：

“并且监督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

而这一节的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将改为：

“总委员会有权将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和整个联合会暂时开除。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将同该联合会委员会商量。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建议在三十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对此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每个民族各派代表一名），对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三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九票弃权）

这项决议对总委员会的地位作了足够明确的规定，而按照原先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的地位是会引起疑问的。总委员会是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而作为这样一个机构，它对各支部和各联合会都具有一定的权力。实际上这些权力并未因上述决议而扩大；它们只是由于有了任何时候不得使总委员会丧失自己责任感的保证而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规定。有了这项决议，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谈不上总委员会的专制了。

把这两条写进组织条例是符合最迫切的需要的。由于时间有限，对章程没有作详细的修改。但是在章程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纲领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巴枯宁分子的宗派在瑞士汝拉联合会、西班牙和意大利，把绝对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选举作为国际的提纲来加以宣传。这种错误的解释已经被 1871 年 9 月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消除了；但是巴枯宁分子在回答中把这一决议也驳斥为代表会议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代表大会重新澄清了这个问题，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入章程，决议是这样写的：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特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这一决议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包括弃权者在内）通过。但除此以外，不得不提前离开的四名法国人和六名德国人以书面形式对章程的新条文投了赞成票，所以实际的多数是三十八票。

由于这项决议，弃权论者今后就不能散布谬论，说什么放弃任何选举和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是国际的原则。如果这个从一开始就在国际内部引起一切纠纷的宗派，到现在还认为留在国际是同自己的原则相容的，那是它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人留它在那里。

下一个问题就是选举新的总委员会。前总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马克思、恩格斯、赛拉叶、杜邦、符卢勃列夫斯基、麦克唐奈等人——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并选举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八名成员参加总委员会（美国联合会必须给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再补充七人）。作为这一建议的基础的是这样的事实：最近一个时期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国际的前总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已经不能再这样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个月以前就告诉自己的朋友们：只有在退出总委员会的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他们的

科学工作。

其他人也是同样的理由。总委员会如果留在伦敦，它恰好会失掉那些迄今一直从事全部实际工作，既写通讯又从事政论活动的成员。而在伦敦存在着两伙力图在总委员会里抢占上风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成功的。

这两伙人中的一伙就是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诚然，布朗基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他们不理解运动的真正进程，而专讲革命的词句，他们不从事宣传活动，而是无谓地忙于搞想象的密谋，结果只招来无益的逮捕。把国际在法国的领导权交给这些人，就意味着毫无意义地把我们在那里的人投进监狱，并且使国际得到蓬勃发展的三十个省的组织重新遭到破坏。在代表大会上就有足够的情况证实，法国的国际会员什么都同意，就是不同意这些先生的领导地位。

伦敦第二伙危险的人就是那些英国工人领袖，马克思在代表大会上当面说当英国工人领袖是可耻的，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把自己出卖给了查理·迪尔克爵士、赛米尔·莫里或格莱斯顿本人。这些人（总委员会中团结一致的法德多数派至今没有让他们发展和进行活动）现在会开始起完全不同的作用，而国际在英国的活动就不仅会处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监督之下，甚至可能遭到政府的监督。

因此，迁移是必要的，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纽约就是唯一的两全其美的地点：既可保证协会档案的安全，又可保证总委员会本身成分的国际性。要争得这个决定，就得作出一些努力，这一次比

利时人脱离了少数派,投票赞成伦敦,特别是德国人坚持主张在伦敦。然而在不止一次的表决之后,通过了把总委员会搬往纽约的决议,并选出下列十二名总委员会委员,他们有权把自己的成员补充到十五人:卡瓦纳和圣克莱尔(爱尔兰人),劳雷耳(瑞典人),福尔纳奇埃利(意大利人),大卫·勒维耶尔、德雷尔(法国人),波尔特、贝尔特兰德、卡尔·施佩耶尔(德国人),华德(美国人)。

接着决定在瑞士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由总委员会选择一个城市。

在选举新的总委员会之后,拉法格以他所代表的两个联合会:葡萄牙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名义提出下列建议,建议被一致通过:

“专门委托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后的一个月之内它应当起草一份呼吁书,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散发给国际知道其地址的所有工人团体而不论其是否参加国际。

委员会在这份呼吁书中应号召所有工人团体成立相应职业的国际联合会。

将建议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能够加入相应职业的国际联合会的条件。

委托总委员会把同意这一建议的团体所提出的一切条件收集起来,并制定出共同的章程草案,草案提交入会各团体取得事先赞同。

近期将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批准国际联合会的最后的章程。”

这样一来,新的总委员会一开始就面临一项实际组织的重要任务;看来,这个任务一解决,就足以使似乎已经死亡的国际具

有空前未有的规模。

轮到关于同盟的问题了。应当为代表大会准备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之后，终于在星期六晚上九点钟完成了自己的报告。报告宣布同盟的章程和目的是同国际的章程和目的矛盾的，并要求把同盟的创建人巴枯宁、同盟的主要代理人汝拉联合会的两个领导人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其次是贝·马隆，还有另外两个人开除出去。委员会的多数人得到证据，证明同盟是一个秘密团体，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反政府的密谋活动，而是为了进行反国际的密谋活动。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还想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因此当时他们自己作出了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著名的巴塞尔决议。由于伦敦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势力大大得到巩固）而感到扫兴并对实现自己愿望再一次失望之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完全受同盟操纵的汝拉联合会发表了它的桑维耳耶通告，通告把他们自己的代表所提出的巴塞尔决议攻击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受了罪恶的精神即“权威主义”精神的怂恿，并提出国际的唯一目的是各独立派别充分自治、自由联合。这是自然的。要知道，一个为了夺取更大的合法团体的领导权而成立的秘密团体，如果不能公开取得最高权力，那么它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破坏合法团体的组织。在没有中央领导和全国性的中央机关，或者这些机关失掉了任何权力的地方，阴谋家们一致行动，很容易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得整个领导权。按照这一计划，汝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同盟分子非常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破坏活动必定很广泛，以致不仅要取消总委员会，而且要取消所有中央机关、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甚至除引言以外的共

同章程。意大利人已经把这一点列入自己组织的章程中；汝拉代表得到指示必须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这一点的建议，如果不接受就退出代表大会。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有人向委员会提交了真实的文件，证明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的所有这些阴谋的联系；文件清楚表明，秘密的联系就在同盟内部，同盟的口号是巴枯宁提出的，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都属于这个同盟。加入同盟的代表硬说，同盟在西班牙（同盟在那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已经解散了，由于这些一再重复的保证，这些代表没有受到任何制裁。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很激烈的。同盟分子方面尽一切努力来拖延，因为会址的契约到夜里十二点钟到期，代表大会必须结束。同盟分子的行为消除了对他们的阴谋是否存在及其最终目的的一切疑问。最后，多数人终于迫使出席的两名主要被告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起来发言；在他们的辩护性发言之后立即进行了表决。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施维茨格贝耳由于他个人的魅力以微弱多数的优势逃脱了这一命运；之后决定对其他人进行赦免。

开除这两个人是国际对同盟和巴枯宁先生的整个宗派的公开宣战。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其他任何派别一样，巴枯宁的宗派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条件（恪守一致以及遵循章程和代表大会各项决议）下被允许加入国际的。但这个生来就是虚荣心多于才能的资产者学理主义分子所领导的宗派，不是这样，而是企图把自己狭隘的宗派主义纲领强加给整个协会，破坏了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后来又把它们宣布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必遵守的权威主义谰言。总委员会几年来几乎是不可理解地忍受了这一小撮寻衅之徒的阴谋和诽谤，可是这种耐心只招来非难它的专制行为。现

在，代表大会终于发表了意见，而且十分明确。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的涉及同盟和巴枯宁先生全部阴谋诡计的文件的语言也将是同样明确的。那时人们将看到，打算滥用国际的人是出于何等低下的目的。

这个问题表决之后，立即宣读了由全体汝拉代表、比利时代表、荷兰代表和四名西班牙代表以及一名法国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签署的少数派声明，声明中说，在拒绝了他们的所有建议之后，他们虽然还希望同总委员会保持通讯和统计的联系以及缴纳会费，但不容忍总委员会对联合会内部生活的任何干涉。一旦总委员会进行这种干涉，所有签过名的联合会就声明同所涉及的联合会团结一致，除非这种干涉被证实是由于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遭到公开的破坏。

签署这一声明，因而也就承认自己只受 1866 年日内瓦章程的约束，而不受后来几次代表大会的修改和决议的约束。只是他们忘记了，日内瓦章程本身就承认历次代表大会全部决议的拘束力，因而他们的附带条件也就全部落空。不过，这一文件不起任何作用，代表大会也就以应有的冷淡态度接受了下来。签名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企图

(1) 责成自己的联合会在国际内部成立单独联盟⁶³⁰以及

(2) 责成它们只承认日内瓦章程的法律效力，而对后来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则宣布为无效。

这样，整个文件显然只是同盟中的空谈家强加给上当受骗的少数人的，它没有任何效力。即使有某个支部或联合会企图对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编者注

牢载入我们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表示异议，新的总委员会也一定能象前届委员会对待美国第十二支部那样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在处理单独联盟方面是很顺利的。

我们还看到，那一天（星期六）的下午审查了总委员会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认为是正确的并给予同意。

在宣读了海牙支部致代表大会书以后，代表大会在夜里十二点半在“国际工人协会万岁！”的高呼声中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载于 1872 年 9 月 28 日和 10 月 9 日
《人民国家报》第 78 号和第 81 号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 《国际先驱报》上关于
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⁶³¹

—

西班牙

北方铁路司机和司炉的罢工还在继续。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瓦伦西亚铁路罢工的司机和司炉停止了斗争，但是这个报道似乎是第三次了，只要国际的西班牙机关刊物不证实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相信它。

加入国际的巴塞罗那及其郊区的工厂工人提出的缩短工作日至十小时的要求，看来得到了满足，因为工厂开工了，而可尊敬的报刊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迄今为止工作日长达十二、三小时。应当指出，胜利之取得主要是由于巴塞罗那工厂区加尔西亚工人的努力，他们在去年 11 月就一致支持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马德里，带插图的出版物的排字工人没有采取罢工就迫使他们的业主同意工人提出的新条件。

德 国

德国印刷工人进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有一个工会，全德国这一行业七千工人中有四千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另一方面，印刷业主也联合成一个协会，协会的章程责成它的会员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时要根据委员会的有关决议立即解雇所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例如，不久前莱比锡印刷工人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而业主委员会看到业主在莱比锡的阵地正在丧失，就号召全德国的协会会员宣布解雇工会会员。莱比锡、柏林、布勒斯劳、法兰克福、慕尼黑和德国其他多数城市也都这样做了。结果，如果在近日内达不成协议，大多数印刷工人就将于下星期被解雇，整个德国的出版物和图书营业就将处于完全紊乱状态。正当私营企业主的印刷业全部瘫痪的时候，合作图书出版企业在莱比锡却繁荣起来，并且订货多得应接不暇。

德勒斯顿。——建立了合作木工生产。

瑞 士

日内瓦首饰匠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正在继续，多数企业主作了让步，作坊按每天九小时恢复了工作。只要不停止对罢工者的支持，工人的最终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内瓦，这是由于国际的调停而获得成功的第二次大罢工。

二

西班牙

瓦伦西亚至塔腊果纳和阿尔曼萨的铁路司机和司炉的罢工以工人获得完全胜利而结束，工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西班牙北方铁路的罢工受到挫折，看来是由于组织得不够好。

在巴塞罗纳，港口煤炭装卸工人由于进行了短期而成功的罢工争取到每天平均增加工资十便士；现在他们八小时工作日获得四先令七便士，而不是三先令九便士。

瑞 士

瑞士工人代表大会近期将在俄尔顿举行，确切日期尚未确定。瑞士制鞋工人代表大会正在筹备。

德 国

我们最近报道中提到的印刷工人的罢工看来正在发生十分有利于工人的变化。业主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号召全德国的协会会员解雇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虽然这个号召完全符合企业主协会的章程，但看来并非到处都得到赞同。例如在汉堡，印刷业主就认为它没有根据，宁愿脱离协会而不愿服从。这使企业主委员会不得不屈从了，于是它向早先不愿与之有任何关系的工人委员会建议恢复和平解决争端的谈判。

彩画匠、油漆匠、镀金匠等等的国际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设在德勒斯顿。这个仅仅在一年前成立的组织不仅迫使业主不再进行

那些有关遵守礼拜日的鸡毛蒜皮的挑剔,而且成立了合作事务所,联合会的许多会员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制鞋工人在制鞋工人国际联合会会员的领导下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在美因兹,制鞋工人的罢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恐怕还不会很快结束。大部分单身工人离开了城市。

柏林木桶匠在报刊上号召北德意志的同行成立工会;他们报道说,他们刚刚进行了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组织在当地条件下活动得十分顺利,他们想扩大它的范围。

在汉堡,三百五十名钢琴制造业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资。

在格尔利茨(西里西亚),争取提高工资的缝纫工人于3月17日罢工。业主提出增加10%的工资,被拒绝了。

柏林的细木工和红木工要求增加33%的工资,如果不能用和平办法取得成功,就打算罢工。

美 国

在国际旗帜下行动的德国工人报纸开始在纽约出版。它揭露了美国工厂主采取可耻手段把工人同胞的繁重劳动和饥饿生活变成硬币。辛格尔缝纫机公司可以作为第一个这样的例子。例如,公司经理把活计按作坊包给监工,监工则把活计分给各承包人,而承包人又分给低一级的承包人,直到最低一级的承包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同要完成这项实际工作的工人达成协议为止。这种“血汗制度”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最高的形式。在这里不仅资本家,而且整个食客等级都同从工人劳动中

榨取利润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工人常常得不到维持生存和劳动的食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德 国

带有插图的出版物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业主所提出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被工人拒绝了。同时，特别是在小城市，业主一个接一个地作出让步，因此工人的前景是十分有利的。

在汉诺威，装订工人的罢工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提出的十小时工作日和增加工资 25% 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全德国的装订工人将于复活节在纽伦堡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开姆尼斯，缝纫工人要求企业主增加工资 33%，停止一切星期日劳动。被拒绝后，工人于 3 月 30 日罢工。

美因兹制鞋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在普福尔茨海姆爆发了这个行业的工人的另一次罢工；在维尔茨堡和爱尔福特，这个行业的工人的罢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德国泥瓦工工会宣布制砖工人和泥瓦工人在芬堡罢工，斗争的目的是缩短工作日。编筐工人在汉堡罢工，口号同汉诺威附近的大棉纺织厂工人的口号完全一样。

奥 地 利

维也纳缝纫工人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他们的这

一要求被拒绝后，四十多个作坊（其中包括一些较大的作坊）的工人举行了罢工。

格拉茨的缝纫工人也这样干了。

比 利 时

在刚刚举行的欧洲缝纫工人布鲁塞尔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欧洲缝纫工人联合会的临时章程，号召所有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缝纫工人团体加入该会。每个这种团体如要宣布罢工并想得到欧洲工会的支持，则应事先取得其他团体的同意。工会代表大会将每年举行。

瑞 士

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现在完全停止了。九小时工作日顺利地确定下来了。

苏黎世的木工和细木工举行罢工，温特图尔的缝纫工人举行罢工，他们都提出通常的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

纽沙特尔的制鞋工人没有罢工就争取到提高工资。

美 洲

渥太华（加拿大）的女仆成立了工会。

四

德 国

柏林。——短工花匠举行罢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

资。钢琴制造业工人将于最近宣布罢工，争取提高工资 33.5% 和八小时工作日。

慕尼黑。——这里的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自己的工会，成立工会中央委员会。首饰匠争取到提高工资 25%，而缝纫工人没有罢工就争取到提高工资 15%。

奥格斯堡。——市内七家最大商行的一部分木工（共九十人）不作工，因为不同意业主提出的新的工资定额。

莱比锡。——印刷业主和排字工人之间的巨大冲突从这里波及全德国，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傲慢的业主不得不接受工人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即废止普遍解雇工会会员和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制定新的工资定额。这些条件被采纳后，工人委员会宣布罢工结束。

但泽。——造船木工的罢工由于当局进行有利于业主的直接干涉而遭到失败，当局威胁要从海军造船厂解雇一切有意支持罢工的工人并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

汉堡。——最近在汉堡、阿尔托纳以及邻近地区可能发生制鞋工人罢工，因为企业主看来不打算对工人的要求让步。

较小规模的罢工有：基尔（霍尔施坦）造船木工的罢工，伊策霍（霍尔施坦）铸工的罢工，代尔门霍斯特瓶塞制造业工人（约九百人）的罢工，不来梅港细木工和红木工的罢工，以及其他主要是由于工资不足而引起的罢工。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甚至国际性的工会（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同一行业的工人）很快遍及整个德国，工资日益接近英国的水平。

奥 地 利

维也纳。——缝纫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大机械企业中机械工人的罢工一开始就考虑欠周，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锉刀制造业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所有工厂主都同意工人增加工资20%的要求。

格拉茨。——红木工和细木工于4月21日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20%。一家大企业的制鞋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规定维也纳目前通行的十一小时工作日。

匈 牙 利

佩斯。——巴黎公社失败后被禁止的匈牙利工人联合会又在3月23日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成立了。联合会有两家报纸，一家用匈牙利文出版，另一家用德文出版。委员会由国际的老会员组成，其中司库名叫卡·法尔卡什，是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

瑞 士

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现在完全停止了，因为工人到处都争取到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在苏黎世，木工停止作工；到目前为止有六个企业主作出了让步。温特图尔的缝纫工人继续罢工。洛桑的缝纫业主为避免罢工已表示愿意接受工人的要求。

比 利 时

埃卡辛二百名采石场工人停止工作，但罢工看来很快结束了。细情不详。

五

瑞 士

温特图尔缝纫工人的罢工以胜利告终；除一个企业主外，所有企业主都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苏黎世的制鞋工人打算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开始罢工；他们号召他们的同行不要在这个城市受雇。

罗 马 尼 亚

布加勒斯特车站铁路工场工人打算宣布罢工，如果经理处不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

德 国

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于6月1日圣灵降临节在德勒斯顿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汉堡。——马具工因业主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而从4月19日起罢工。我们在上周提到的制鞋工人不可避免的罢工已经爆发了。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25%。早些时候我们提到的北德意志各城市中造船木工的罢工主要是因企业主阻挠成立德国造船木工工会而引起的，他们企图把联合会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工人英勇

地进行了战斗。顺便说一下，德意志帝国主管基尔和其他地方的海军造船厂的领导给了造船业主尽可能的支持。

慕尼黑。——制鞋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限制工作日为十二小时。二百五十名工人争取到了业主的让步，一百五十名单身工人离开了城市；因此，胜利几乎是有保障了。

柏林。——制鞋工人（三千人左右）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所有独身工人离开了城市。花匠助手的罢工看来由于组织得不好而遭到失败。但是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他们成立了工会，打算重新开始斗争。

普福尔茨海姆。——制鞋工人的罢工已结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 20%，争取到了 15%。

美因兹。——沃尔弗的制鞋工厂，在业主放弃了所宣布的缩减工资 15%并付给工人约二十英镑以赔偿因罢工而造成的损失之后，结束了罢工。

科伦的木工，特利尔的制革工人打算宣布罢工，以争取较高的工资。

奥 地 利

前来参加维也纳展览会的木器工人得知，该行业的维也纳联合会委员会正在维也纳的玛丽亚希尔弗区施图姆普弗大街弗洛里安小酒店开会。

六

美 国

纽约煤气公司工人于4月5日罢工,要求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八小时工作日是在前一些时候给工人规定的,但后来很快又延长到夜班十二小时,白班十五小时。纽约市的共和国警察立即站到公司一边,给它的各企业派出强大的警察分队,而救济流亡者的慈善委员会立即送去二百名刚刚在沃兹岛 登陆的意大利人,以顶替罢工者。这些被警察护送到企业来的意大利人被人以最粗暴的方式强迫完成他们完全不习惯和不适合的各种工作。他们很快就要求回到岛上去。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断然拒绝了,警察强制他们留下来工作。有两个人企图越墙逃跑,但掉进东河淹死了,另外几个有同样企图的人被警察从水里捞了起来。从此煤气工厂就从海上和陆地被一道警察的警戒线包围起来,防止工人从这个新型的监狱中逃走。所有这些都是要求意大利人去完成极不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时发生的。

这就是“模范共和国”在工人为争得自己的权利刚想侵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或舒适生活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

奥 地 利

维也纳。——锉刀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缝纫工人的罢工已经结束;工人虽然未能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但取得了很

大成功：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

格拉茨。——面包工人开展了缩短工作日的广泛宣传，他们的工作日迄今一昼夜达十八和二十小时。木工的罢工正在继续。

工人运动正以极其令人满意的方式在奥地利各地发展。

匈 牙 利

匈牙利制鞋工人代表大会 6 月 1 日在佩斯举行。奥地利制鞋工人也准备派遣代表。拟讨论的问题有：规定全国同一长短的标准工作日，成立匈牙利制鞋工人工会，组织合作工场等等。

瑞 士

刚刚胜利结束的首饰匠的罢工再一次表明，业主反抗工人的正义要求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罢工工人未必有四分之一；余下的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现在业主很难雇到所需要的工人。那是活该！

德 国

哈雷。——只持续了几天的矿工罢工胜利结束了：业主让步了。

汉堡。——制鞋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

阿尔登堡。——缝纫工人经过短期罢工工资提高 $16\frac{2}{3}\%$ 。

许多起罢工正在准备，其中有：柏林制刷工的罢工——争取增加工资 25%，斯图加特马具匠的罢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增加工资 25%，以及废除工人必须在业主家里食宿的规矩。

弗赖茨及其郊区的泥瓦工人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但由于这

一行业的工人组织成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在内的国际联合会，因此胜利完全在望。正是这个联合会支持汉堡的罢工。

德国建筑工人年度代表大会将于6月在开姆尼斯(萨克森)举行。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3—5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3年3月22日和29日、4月12日和26日、5月3日和24日《国际先驱报》第51、52、54、56、57、60号

弗·恩格斯

* 关于大陆情况的报道⁶³²

来自大陆的报告说，在某些地区开了头的分裂运动造成了通常的结果——无政府状态。个别人羡慕他们的同行因分裂而赚得的廉价声誉，决定自己也来使用这一手段，并且不费力气就找到了脱离分裂者的现成借口。过去一个时候曾企图改善处境，建议误入歧途的支部在汝拉联合会的怀抱中寻找避难所（这无疑会使巴枯宁和吉约姆感到满意，把他们抬高到真正专制者的地位，会使英国的这种不健康宣传的发起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在“法规”〔“institutions”〕没有遭到含糊而廉价的言词所进行的毁灭性联合攻击的国家里，这种企图对居民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⁶³³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容易预料的：分裂派人数迅速减少，变成孤立的集团，这些集团除了它们全体所固有的需要彼此吵架以及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和睦相处这一特性，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情况可能不会使某个莫里不愉快，但能对此情况完全认清的却只有梯也尔和俾斯麦。

弗·恩格斯写于 1873 年 5 月 22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73 年 5 月 24 日《国际先驱报》第 60 号

大概是约翰·黑尔斯。——编者注

附 录

附 录

附 录

* 发给恩格斯的
瑞士出境许可证⁶³⁴
№1279

姓——恩格斯，著作家。

名——弗里德里希。

籍贯——巴门（普鲁士）。

年龄——28岁。

身高——5英尺9 $\frac{3}{4}$ 英寸，即1公尺79公分。

头发——深褐色。

前额——宽大。

眉毛——深褐色。

眼睛——深棕色。

鼻子——不大。

嘴巴——普通。

胡须——深褐色。

下巴——圆型。

脸——长圆型。

脸色——绯红。

特征

取道皮蒙特和西班牙前往英国并在该地居住一年，1849

年 9 月 1 1 日 签 发。

(1 8 4 9 年 9 月 1 1 日 司 法 监 察 部 批 准)

申 请 人 签 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9年9月11日签发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1970年《历史问题》

杂志第11期

恩格斯的亲笔签字。——编者注

收 据⁶³⁵

兹收到经爱·蒂森先生从施特廷转来的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的七英镑期票。我们仅以贫困的德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⁹⁴

卡尔·马克思，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卡·普芬德

1849年10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0月26日《自由射手》
报第86号

原文是德文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现款收据

1849年11月13日

兹收到经蒂森先生从施特廷转来的十一英镑十四先令，仅以
贫困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签名：卡尔·马克思博士，亨利希·鲍威尔，卡尔
·普芬德

1849年11月13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1月23日《北德意志
自由报》第208号

原文是德
文

卡·马克思 1849年8月24日在法国领取的赴英国的护照

摘自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 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⁶³⁶

.....除了上述犯有主要罪行——危害 [政府]——的被告人之外,还应对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提出起诉,虽然他既不是后备军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⁶³⁷他是冯·米尔巴赫的副官,以副官的身分参加了整个运动,并亲口供认他了解米尔巴赫的目的。在暴乱时期,他从他的居住地科伦来到爱北斐特。在这里,他早已认识的报纸编辑恩格斯和许纳拜恩找到他,请他帮助军事委员会⁶³⁸接待人员和办理投宿证。同一天,冯·米尔巴赫任命他为自己的副官并给他一条黑红黄三色⁶³⁹带子作为标志。据他亲口供认,安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向他解释,整个运动的目的是使德意志宪法⁶⁴⁰得到承认,为此必须武装民众。他执行副官的职责直到冯·米尔巴赫离去为止;他在龙茨多弗附近被捕.....

.....报纸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参加构筑街垒。证人亨利希·迈宁豪斯也作证说,有个戴眼镜和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举动象一个领导人,下命令加固文德鲍的街垒,据一个武装志愿人员说,这个人就是编辑恩格斯。上面早已提到的证人西蒙和藻尔也说有个留着小胡子的穿方格子上衣的年轻人参加构筑冯·德

尔·海特的住宅前面的街垒……

……在爱北斐特暴乱期间，格莱弗拉特的皇家军需库不止一次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和抢劫。这类事情最初发生在5月10日和11日，但不是爱北斐特匪徒干的，而是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的居民干的⁶⁴¹，其目的是要武装当地居民，然后支援爱北斐特暴乱，并使暴乱扩大到其他地区。对格莱弗拉特的这两次袭击是侦讯另一案件（关于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同时发生的暴乱）中的起诉要点，而这里主要是指爱北斐特人5月15日对这座军需库的抢劫。根据一些参加过这次袭击的人的证词，这一天被告人卡尔·扬森命令他的一部分队伍，约三、四十人，如他所说，去袭击瓦尔德，以便夺取那里的武器。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总指挥扬森和副官沃尔迈纳，编辑恩格斯也和这两个人在一起。路上，恩格斯和扬森在炼铜厂弄到两匹拉车的马，他们骑着马走在队伍前面，来到商人荣克在哈默施泰因的庄园。恩格斯在那里换上了荣克的乘马，两个人——恩格斯和扬森——都需要乘用骑兵的马。同一案件的被告人威廉·劳施作证说，到了哈默施泰因之后，扬森命令开赴格莱弗拉特，去看看那里的军需库里是否还有可供他们使用的武器和服装。根据骑兵班长施塔克向后备军地方管理处提供的证词和下级军官施泰尼格尔的证词，起初在军需库外边出现了一支先遣队，大约有六至八名射手，后来就出现了以恩格斯和扬森为首的武装匪徒三、四十人。他们两人骑着马，佩带了马刀和手枪。队伍马上在军需库前面整顿好，在门外布置了岗哨。然后，恩格斯从皮套里拔出手枪，走到骑兵班长施塔克跟前问他还有没有武器，当那个人回答说武器已经被佐林根和瓦尔德来的队伍抢走时，便命令骑兵班长跟他进军需库。两个军人若要反抗三、四十名武装匪

徒，那是无益的，尤其因为自从佐林根人前几次袭击之后军需库的大门再也锁不上了。因此，这两个军人被迫向暴力让步，允许进入军需库。恩格斯在这里挑选了一些军械和服装，命令把它们搬到院子里，然后写了两张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收据，由总指挥卡尔·扬森签了字。根据从军需库劫走的物品清单看，有军粮袋、头盔、军裤、子弹袋、手枪、马刀、鼓、皮鞋和一支长枪。扬森命令，每个匪徒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挑选一套合身的服装和一件必需的武器。扬森本人并不否认，他同自己的一部分武装队伍（三十九至四十人）一起到格莱弗拉特去就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只是说，他这样干是根据 5 月 15 日早晨收到的冯·米尔巴赫的书面命令，即要他在格莱弗拉特到瓦尔德的途中征集军需品。他还说，同他一起率领队伍的恩格斯来到格莱弗拉特后，在军需库门外布置了岗哨，同骑兵班长一起走了进去。据他说，当恩格斯在军需库里忙碌的时候，他让副官沃尔迈纳照料队伍，自己去察看军需库周围的地形，回来后看到各种军需品已经摆在操场上……

……为此，对下述人员起诉……

……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约翰·沃尔迈纳和卡尔·扬森。

理由：

(1) 1849 年 5 月在爱北斐特领导武装匪徒并下过命令；抢劫属于国家的格莱弗拉特军需库，以及

(2) 1849 年 5 月同这批匪徒一起公开使用暴力，抢劫格莱弗拉特皇家军需库里的武器和装备……

载于 1850 年 4 月 19 日和 21 日
《西德意志报》第 93 和 95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手稿中是：“三十六人至三十七人”。——编者注

* 弗·恩格斯 1850 年 4 月 5 日
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
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
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⁶⁴²

弗·恩格斯对英国人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强调指出，当英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⁶⁴³（平等之友）就已经有了，他最后举杯对英国工人表示祝贺。

载于 1850 年 4 月 17 日《大胡蜂》
报第 89 号

原文是德文

1850年4月8日 流亡者委员会会议⁶⁴⁴

公民克莱纳声称，公民鲁·施拉姆向他保证自己同任何流亡者委员会⁹⁴没有关系，只是从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收到一些彩票，并受托把钱寄到日内瓦。另一个委员会在希尔曼那里开会，这个委员会只是名义上存在，克莱纳认为它根本没有经费。

宣读、通过和签名

W·克莱纳
拜尔勒

公民格纳姆：公民司徒卢威声称，他根本没有救济流亡者的经费，他从加累尔那里收到一百张彩票，可是还没有配销出去。如果他把这些彩票卖得了钱，就把这笔钱或者转交给某个可能成立的委员会，或者自行分配给流亡者，让他们写下收据。他对德国流亡者当中存在的分歧表示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分歧，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盾源源而来。因此，他建议流亡者在自己人中间组织一个委员会。

宣读、通过和签名

格纳姆
约瑟夫·莱昂尼
雅科布·克莱因

然后，公民司徒卢威拿出一个英镑，格纳姆建议将它转交委员会；对此公民司徒卢威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任何委员会，我把钱交给现在在场的人，让他们自己分。

格纳姆

约瑟夫·莱昂尼

鲁卡斯

弗·恩格斯 1850年4月8日记录

原文是德文

辟 谣

我们从华盛顿获悉：“《纽约快邮报》编辑狄德埃先生自称是《新莱茵报》的前撰稿人。”这是谎言，特此声明。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
1850年4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4期

* 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9 月 10 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
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⁶⁴⁵

一家德国报纸 的前编辑恩格斯先生在大会上讲话 ,主席(约翰·佩蒂)介绍他是为自由而战斗和流血的人们中的一个。他说 ,大约在三十个月以前 ,有相当多的先生来到了英国 :路易·菲力浦、梅特涅公爵、普鲁士亲王威廉等等 ,外国的爱国者认为 ,英国如此情愿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 ,是玷污了自己。恩格斯说 ,那就等着吧 ,总有一天 ,英国人民会给他们以应得的回答。而现在 ,它正是这样干了。(请注意听 ,请注意听 !)对海瑙的态度在大陆上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超过了英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

人们对待他 ,比撕下他肩上带穗的肩章或折断他的佩剑 ,从而把他从跟他身份相当的社会中可耻地赶出去 ,还要厉害。(请注意听 ,请注意听。)最近 ,大陆上将会发生新的革命 ,那些在类似情况下本来要逃到英国去的人民的敌人 ,现在害怕了 ,他们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也许到自己的朋友俄国的尼古拉那里去 ,而尼古拉可能会在西伯利亚赏给他们一个小王国。(大笑 !)

恩格斯代表他的国家感谢伦敦居民对海璠的态度，并希望这个恶魔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将受到这样的接待。（鼓掌）

载于 1850 年 9 月 15 日
《雷诺新闻周报》第 5 号

原文是英文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1850 年 6 月或 8 月记下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名字和住址：
“弗伦克尔，克勒肯威尔区米德尔顿街 35 号。
列曼，牛津街贝里克街 25 号。
沙佩尔，黄金广场大帕特尼街 30 号。
施拉姆，恩格斯，普芬德，鲍威尔，
维利希，马克思，埃卡留斯”

* 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12 月 30 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
上的讲话记录⁶⁴⁶

恩格斯先生(他同德意志协会 96 的卡尔·沙佩尔一起代表德国流亡者)也抱有同感,他代表自己的兄弟对发言者所表示的同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英国人民繁荣昌盛。接着他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讲话,谈到国外 [革命运动] 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动的的原因,指出人民的愚昧和他们的领袖的叛卖也促使了反动的猖獗。Q

载于 1851 年 1 月 4 日《北极星报》
第 689 号

原文是英文

*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⁶⁴⁷

- (1) 10月27日致布劳巴赫兄弟转交施奈德（原件），股东。
- (2) 致J.A.伯克转交施奈德（抄件），时间同上，迈克尔·绍克龙公司。
- (3) 致I.D.赫施塔德转交洪特海姆——致马克思，费舍兄弟。⁶⁴⁸
- (4) 致J.H.施泰因转交埃塞尔第一——致马克思，股东。
- (5) 致莱昂哈德·萨得转交施奈德第二——致马克思，斯密斯（威尔逊）·德赖尔公司。
- (6) 致杜塞尔多夫商行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5日寄自伦敦（马克思谈舍尔瓦尔的问题，理论上的阐述）。⁶⁴⁹
- (7) 致艾布纳尔——转交冯·洪特海姆——10月26日于伦敦（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三份⁶⁵⁰），贝克尔和丹尼尔斯致马克思的信⁶⁵¹，希尔施的笔迹的新样本——舍尔瓦尔在《人民报》上的声明——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的原件。⁶⁵²
- (8) 致格·荣克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7日于伦敦：1.可靠的笔迹样本和书面宣誓证词。2.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四份以及希尔施的笔迹的样本。3.贝克尔致马克思谈论维利希的信的摘录。4.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的三封信。5.施梯伯的信的抄件。⁶⁵³6.给

施奈德的指示以及关于第九号和第十号邮件的通知。

(9)致施奈德第二,挂号信——书面宣誓证词的副本。10月28日。

(10)W .寄往杜塞尔多夫转交施奈德第二——挂号信,第九号的回执,10月28日。

第三号,第四号或第五号。一件交施奈德第二使用。说明罗伊特、施梯伯和荻茨的问题。65410月29日。

(11) 从B .公司寄给冯·洪特海姆。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摘录。指出未收到施奈德的信。

(12) G .布兰克父子。

(13) 哈赛尔曼·舒尔茨公司。⁶⁵⁵

弗·恩格斯起草于1852年
10月31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 委 托 书⁶⁵⁶

我，即下面签名的人，现在委托我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在处理她的母亲、已故政府枢密官夫人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太太的遗产问题时，代表我的利益和以我的名义行事。

Ne varietur〔不得更改〕签名：卡尔·马克思博士⁶⁵⁷

1856年8月2日于伦敦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八月六日于特利尔

燕妮·马克思

约瑟夫·阿佩尔特

.....
黑默里希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6年8月2日

原文是德文

发表于1968年《社会历史文库》第8

卷第254页

这是外交和法律文件上的公式。——编者注
第二个签名字迹不清。——编者注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 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

摘自关于 1865 年 1 月 31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然后马克思博士宣读《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美国)的摘录。该报同意国际的宣言和章程,并对因篇幅有限不能全文刊登宣言一事表示遗憾,但是鉴于协会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所以部分地公布了宣言。

应当指出,巴黎、比利时等地有成百上千人要求得到会员卡;虽然在大陆某些地方禁止劳动人民公开联合起来捍卫作为国际宗旨的那些原则,但就是在这些地方,劳动人民也还是在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参加协会而又不触犯法律的形式。

载于 1865 年 2 月 4 日《蜂房报》
第 173 号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在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成立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⁶⁵⁸

我打算从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一些讲话中引用卡尔·马克思的一段讲话。他说，在有关自助和国家帮助的争论问题上两派人都是错误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活资料 and 一切劳动资料都属于资本家，因此自助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在俾斯麦内阁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帮助——工人不能把自己出卖给俾斯麦内阁。国家帮助只能来自无产阶级实现最高统治权的国家。鼓吹普鲁士君主国内部的劳动解放等于激起杯水风浪。劳动解放的条件是德国的解放，而德国解放的前提又是恢复波兰和推翻普鲁士君主制。针对进步党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的责难，马克思说，当他指出工人们应当联合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时，曾经期望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能够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行事，但结果并不是这样。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存在着允许一切自上而下的辱骂和诽谤的出版法；他补充说，工人报纸就象工人运动一样，只有得到警察的准许才能存在，对政府只能进行不痛不痒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动，尤其是资产阶级太怯懦，不敢实行自己的纲领。

载于 1865 年 2 月 19 日
《社会民主党人》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 入会团体的证件

国际工人协会，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伦敦希腊街18号中央委员会
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已充分说明协会的目的和意图。它们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协会的目的在于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协会将促进每个国家不同劳动部门工人间的团结和不同国家工人间的合作。

协会的组织，以伦敦为中心，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支部。它将协助把各国工人阶级联合成为兄弟般合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由入会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年度代表大会将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开的、强大的欧洲范围的代表机构。

泥瓦工协会执行委员会在伦敦黑袍僧区哈特菲尔德街25号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赞成这些原则，并申请加入兄弟联盟，兹接

这一段中的黑体字是填在表格上的。——编者注

纳为协会的支部。

总委员会主席： 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书记： 乔·威·威勒尔
法国通讯书记： 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 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 埃·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 莱·路易斯
名誉总书记： 威·兰·克里默

1865年2月21日

1865年2月以传单形式刊印

原文是英文

*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 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决议⁶⁵⁹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

1866年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报
第176号和1866年7月22日《左岸》
报第29号

*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 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的发言记录

摘自关于 1868 年 5 月 26 日和 6 月 16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1868 年 5 月 26 日

兹通告，本星期二将提出建议，撤销上届代表大会关于规定布鲁塞尔为集会地点的决定而代之以伦敦。⁶⁶⁰

委员会认为，在看来已受到法国奸细包围的地方，在其政府能够采取对付沙勒罗瓦饥饿的矿工那样的专横暴行的国家里召开代表大会，是同协会的荣誉和尊严不相容的。

1868 年 6 月 16 日

决议的草拟者 宣布，除了上述想法之外，迫使委员会放弃撤销桑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⁶⁶¹比利时支部已经采取措施。巴拉先生似乎已在下院声明他不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委员会和“自由工作者”（参加协会的佛尔维耶政治团体）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的抗议书上，协会的地方成员表示，“不管司法大臣发表了什么狂言，国际的代表大会还是要布鲁塞

尔举行”。这样，整个问题就成为比利时工人对比利时政府的警察措施的反抗，而对此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因此它撤回自己的决议案。

载于 1868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20 日
《蜂房报》第 346 号和第 349 号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 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⁶⁶²

摘自关于 1868 年 7 月 21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来信报告，南德意志各邦的工人团体联合会决定于 9 月的第一周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赖得律- 洛兰的朋友们在巴黎出版了一家新报纸《觉醒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这篇文章同意巴黎委员会委员的立场，并以欧洲工人阶级所表现的政治上的健全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同统治阶级的狡诈和怯懦相对抗。其中有如下一段精采的话：

“为了保持和平，我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各国工人当中占优势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致。过几天就要召开国际协会的代表大会。欧洲所有国家都将有代表出席，也许法国例外，说这次所有欧洲劳动代表的大会由于它的英明的决议而可能成为欧洲真正的主人的会议，这未必是夸张。是的，如果明天，这次代表大会依据法国革命的不朽原则，维护包括秩序、安全和自由在内的劳动的神圣利益，坚决拥护和平，它的意见将会受到全欧洲的热烈的欢迎。”

载于 1868 年 7 月 25 日《蜂房报》
第 353 号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 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⁶⁶³

摘自关于 1869 年 2 月 23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书记宣读了关于萨克森王国煤矿矿工状况的报告。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工资每周为三便士六先令到三便士十先令;童工每周为四到五先令。每个矿井都有工人必须参加的互助储金会,但是他们在分配基金方面没有发言权;基金是矿主的合法财产,一切借贷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矿井主管人的命令支付。医疗费、补助金和超龄金根据劳动年限按比例增长,而如果工人被解雇,那么不论什么原因,他就丧失了领取基金的一切权利。这样,工人交费要交三四十年,但是养老金却一文也得不到。由于在矿工当中进行鼓动,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初步的章程草案。它是在 J.G. 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把所有互助储金会联合成一个互助储金会;(2)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3)全体成年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等;(4)雇主向互助储金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有觉悟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倒不如说它是想在资本的许可下进行改良

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这个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认为一向对矿工储金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且还要缴纳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为了使那些还相信可以在雇主和工人混合缴纳款项的基础上改造储金会的工人睁开眼睛，最好的办法就是雇主愤怒地采取拒绝的态度。

载于 1869 年 2 月 27 日《蜂房报》
第 385 号

原文是英文

* 总委员会致纽约
罗·威·休谟的信⁶⁶⁴

1870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为了回答您上个月26日的来信，委员会委托我声明，国际协会不承认不同国家出生的工人的特殊民族利益。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的意识中消除任何民族隔阂和可能的纠纷的痕迹。因此委员会不能同意您报告中的那种代表构成。克吕泽烈将军曾经受到法国警察的侮辱，这一点显然促使工会把全权交给了他，因此他使自己成为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类似的人物。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应当保护王朝的私人利益和法国商人的财产。巴黎工人没有这种需要在大西洋彼岸加以保护以免遭美国工人的可能侵犯的利益。我们认为，居住在美国的法国工人的利益同美国其他所有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使因语言和可能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彼此疏远的工人便于相互交往，我们有精通这些事务的通讯员，我们委托他们处理问题。

同美国的通讯由总委员会的不同民族的书记分别担任。克吕泽烈将军和佩尔蒂埃先生是我们驻美国的法国通讯员。他们同我们的法国书记保持通讯联系。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福格特是

我们的德国通讯员。他们同这里的德国书记 有通讯联系，而总书记 则负责英国的通讯。除了工联的负责人，例如杰塞普先生之外，我们还指望您作为我们的通讯员，尽力调解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误解；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法国人或德国人有自己的某些相反的或不同于其他工人的特殊利益，我们总是向他们说明必须投入他们居住国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运动，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

至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倾向问题，我受委托请您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不要拒绝把您对引起秘密活动的原因的看法告诉我们。有人建议我们劝说您和友人杰塞普公开反对进行秘密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秘密活动还是需要的，不然这个运动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而且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那是太自信了；但是我们希望知道这些原因，以便通报不久前刚刚越过秘密组织阶段的旧大陆的工人们。

忠实于您的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起草于 1870 年 4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马克思。——编者注

埃卡留斯。——编者注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71年1月24日

公民恩格斯问道，委员当中是否有人出席了前一天晚上的群众大会⁶⁶⁵，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说，由于委员中有不同的看法，最好在会上讨论一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现阶段的态度问题。他提议将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公民马克思附议，一致通过。

1871年1月31日

公民恩格斯说：遵照上次会议主席的建议并尊重英国的习惯，我草拟了几条决议，主要是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并不是一定要让这些条一字不改地通过。下面就是我所草拟的决议：

1 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 象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 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⁶⁶⁶的约束。

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写进了第二篇宣言。9月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9月9日，我们的宣言就发表了。宣言中这样说：“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运动如果是仅限于完成这个任务，那或许就能成功，其他国家就会跟着这样做，这样就会使法国处于一个为普鲁士所不能忽视的地位。可是就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孔德派，即比斯利教授及其朋友们。比斯利教授曾多次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在布罗德黑德事件⁶⁶⁷中他勇敢地顶住了资产阶级的敌视，但孔德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党派。他们主张妥协，极力使雇佣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使它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属于一个认为世界应当由法国来统治的政治宗派。他们在上次那篇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也署了名的宣言里要求让法国恢复到战前的地位。法国在战前是一个军事强国。孔德派要求进行 [武装] 干涉，而这个要求刚一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立刻就发生了分裂。反对派说，迄今为止，战争阻滞了一切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而每一次战争都延长了贵族的寿命。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再说，连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都做不到的人，又怎么能够迫使这个政府为共和国进行战争呢？假定英国进行了战争。从苏格兰撤回全部军队，把其他所有地方的兵员也都撤光，仅

留一万人在爱尔兰，这样，能调动起来的兵力也就是三万人左右，而且他们也是在一定时候才能起作用。曾经有一个时候，法、德两国的军事力量大体相等，毛奇准备停止围城；英国军队如果在那个时候出动，就可能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德国人。可是那个时候早已过去了；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奥尔良附近的战局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奥雷耳·德·帕拉丹取得了一些胜利。一支英国军队在当时是会对法国士兵起到良好作用的，它会增强他们的斗志；后来，德国人大大增强了兵力，而且普鲁士人非常看不起英国的军队，英国军队如果前去定会遭到嘲笑；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也只能是使尚济的撤退⁶⁶⁸稍有秩序些。

英国的陆军只能同别国军队联合作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在克里木战争中也是这样做的。英国最善于通过向其盟军提供军需物资来进行战争。在克里木战争中，他们曾不得不借用法国的士兵来填充自己的战壕。派大军远离本国作战向来是办不到的。由于实行这样一种军事体制——没有征兵制，志愿兵补充过程缓慢，操练方法不佳，培养一个英国士兵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英国军队是建立在长期服役上的，不可能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保证必需的兵员补充。即使派一支军队到法国去，这支军队一遇损失也就无法维持下去。英国为支援法国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俄国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之际宣战。我们的两篇宣言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一篇宣言说：“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第二篇宣言说：“正如在 1865 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

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俄国刚一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俾斯麦就宣布反对卢森堡条约。这证明存在着默契。普鲁士向来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这正是英国介入的机会。法国人的处境当时还不象后来这样恶劣，如果英国宣了战，普鲁士和俄国会结为一方，欧洲其余国会成为另一方，法国就可以得救。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有准备，如果土耳其人不是象在战争中那样受到干涉，如果他们被准许按自己的方法保卫自己的话，他们是能够顶住的，而其余的国家就可以帮助法国人将普鲁士人赶出去。可是，当这个机会出现时，那些要帮助法国的先生们却一言不发了。

现在，茹尔·法夫尔已代表整个法国投降——他是无权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驱使下法国将不得不屈服并缔结和约。那时我们将看到俄国要干什么了。俄国和普鲁士象拿破仑一样需要战争，以便制止其国内的群众运动、维护其威信和保持其地位。

海军是英国的主要力量，但是，1856年的宣言确立了新的海上法。新的海上法规定废除私掠。对中立国船只的搜查权取消了。保证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物和敌方船上的中立国货物的安全。过去，俄国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是不接受的。在巴黎会议上，克拉伦登大笔一挥，签字放弃了英国在海上打击俄国的权力。他这样做是根据谁的指示或授权，人们从来不知道。当有人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时，迪斯累里支支吾吾，问题回避掉了。要想削弱俄国，就

必须断绝它的出口，它的出口贸易。如果俄国贵族不能把他们的谷物、亚麻，一句话，把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外国，俄国连一年也维持不住，而它进行贸易主要是使用外国船只。英国要对俄作战，就必须重新掌握这种权力。放弃这种权力的借口是确保私有财产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安全。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人在法国是怎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可以丧失，所以，它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不感兴趣。但是，工人阶级对重新掌握这种权力却有兴趣，并要把这种权力完整无损地一直保持到俄罗斯帝国瓦解之日。英帝国同所有其他建立在……之上的帝国一样，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不过目前这与我们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也许将以较和平的方式发生。别的国家没有一个象英国那样能反抗俄国，它必须把这种权力至少保持到波兰光复之时。如果对俄国宣了战，法国就可能得到了解救，波兰就可能得到了光复。现在，俄国是要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也许等不到一年就会打起来，欧洲将只得在缺少法国这样一支力量的情况下作战。

1871年2月7日

公民恩格斯：当我讲到爱尔兰时，我只是设想政府在爱尔兰至少得留一万人的兵力。我根本没有考虑爱尔兰人的情绪。

1871年2月14日

公民马克思说：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必定失败。法国在国际上是没有行动

能力的，在国内也是如此，而普鲁士的背后则有俄国。共和国一宣布成立的时候，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如果共和国在那时被承认，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当得不到承认时，他们就后退了。有产阶级与其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国的胜利，不如说是希望看到普鲁士的胜利。他们十分清楚共和国迟早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就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共和国，这些阴谋活动对普鲁士的效劳超过毛奇及其将军们。总之，在这场讨论中，没有一个人说承认共和国不是首要的一点。其次，大炮街会议⁶⁶⁹不是伦敦富人的集会，而是一向无足轻重的小资产阶级的集会。他们只可能要么支持大资本家反对人民，要么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光是他们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如果他们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千万不能让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是危险的领导人。他们仇恨共和国，不愿意承认它，可是他们害怕普鲁士，所以他们拥护战争。公民埃卡留斯谈到抗议肢解法国的问题，说不以战争相威胁就毫无用处；这与事情毫不相干。我们在宣言中抗议了，德国人也抗议了，然而这仅仅是道义上的抗议；英国政府要等到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并对那两个省份正式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能提出抗议，而且也不能相信这个政府当真会反对肢解法国。

还有，公民科恩对工人的宣传鼓动似乎抱有奇怪的见解。工人们到格莱斯顿那里去听取他的意见，必须把他的意见当作最后的决定加以接受。他还认为，要是赶上议会正在开会的话，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好在没有赶上议会开会。承认共和国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行动。如果是议会正在开会，格莱斯顿就会把责任推给议会的多数，谁要提出一条理由赞成承认共和国，就会有人提出一千条理由支持格莱斯顿加以反对。要改变政府，就可能需要举行

选举，而自由党人也不愿意老去收买自由选民。我完全相信，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并且不让满口教条的资产阶级发言人来干涉，他们是能够成功的。这场运动中所投入的力量还不及前些时候啤酒事件⁶⁷⁰中所用的力量的一半。在英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外部的压力。公民米尔纳好象是说，如果英国人坚持要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就会触犯德国人。恰恰相反：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做得还不够。数以百计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们所能指望给予道义上支持的只有英国工人，但是英国工人却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争，最初是一支君主国军队对另一支君主国军队；谈不到什么共和国，而且法国军队被认为是强者。当法国常备军全部消失以后，人人都认为法国人要屈服了，几天之内就没有君主制能帮助抗击普鲁士人了。正是因为没有了君主，正是因为有了共和国，所以才抗击了五个月之久，假如没有人搞叛卖活动和阴谋活动，他们还能维持得更久一些。

第三点可以看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洲已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的政府连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来进行防御都不敢干。共和国只是使工人阶级力量得到发展的一种政治形式。法国的上一次选举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宁要军事专制而不要共和制。在英国恐怕也是如此。共和制与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能携手同行了。

现在我来谈谈战争本身。色当投降之后，俾斯麦处境困难。国王对德意志议会和法国人民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卫而同拿破仑打仗。可是，在色当投降以后，普鲁士人就成为了过去法国人那样，不

是为防御而战了。我知道,俾斯麦同拿破仑一样竭力谋求战争,防御只是一个借口。可是在色当之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借口。德国资产阶级怀疑是否该停止了,但是俾斯麦发现没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政府作为议和对象,因此,他必须到巴黎才能议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会被法国人承认,什么样的政府又不会被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但是却符合他的目的。赚钱人总是崇拜胜利的,而且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法兰西共和国,所以他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贵族的支持他是早有把握的。俾斯麦所关心的是英国不要承认共和国,因为英国是唯一能够抗击他的强国,但他寄希望于格莱斯顿,寄希望于宫廷关系。做德国皇帝的岳母,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英国就跟着神圣同盟亦步亦趋。当工人代表团责问格莱斯顿当初对拿破仑为什么那样匆忙地给予承认时,他混淆日期,混淆政变后帕麦斯顿的承认和全民投票后得比的承认来迷惑他们。他对工人们说,他已经是能做的都做到了,他还为自己摆功,那就是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他本来是能够做得象美国那样多的。他的同僚,普鲁斯、娄和卡德威尔对共和国显示了敌意,他们声称英国对外只能使用道义力量。英国唯一能够使用武力的地方是爱尔兰。还有,德国报纸奉命大骂英国不该向法国出售物资。当伯恩施托尔夫向格兰维尔提出质问时,格兰维尔含糊其词,说要调查一下,而后来查明那是正当的、合法的。他本来就知道是正当合法的,只不过没有胆量这样说。接着,英国政府根据伯恩施托尔夫的要求没收了法国的电缆,此事后来被一位英国法官宣布为非法。麦茨投降以后,俄国认为该是亮出它的合伙关系的时候了,于是就通过否认巴黎条约而

把这种合伙关系亮了出来。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和罗马尼亚在多瑙河两公国的确立。这些都是对英国的侮辱。然而，格莱斯顿做了些什么？他派了一名全权特使去向俾斯麦讨教。俾斯麦建议在伦敦召开一个会议，连格莱斯顿都觉得没有法国参加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法国参加，条约的破坏者将占多数。可是，不承认共和国，法国就不能参加会议，因此，俾斯麦就得阻挠承认共和国。当奥伯朗·赫伯特在下院就此向格莱斯顿提出质询时，他又是支吾搪塞，歪曲事实，对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虔诚者多罪孽。从蓝皮书中可以看出，当英国政府要求准许法夫尔前来参加时，俾斯麦答复说法国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活动，只要这一答复不撤销，想用什么办法让法国能够参加会议都是徒劳的。不给予承认是孤立英国政府的一个手段。

1871年2月21日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东邮报》上关于他的发言的报道，以及这篇报道的那种胡拼乱凑的写法。要不是他的名字印错了的话，他会认为他有责任给编辑写信。报道里说“共和国一宣布成立，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共和国没有得到承认，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开始了”。这完全是胡言乱语。相反，他说的是，共和国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致反对派也不得不假装拥护；他特别提到了布卢瓦高等法院的法官把自己打扮

这里记录不确切。在1871年2月19日《东邮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里，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俾斯麦和罗马尼亚大协议定的关于两公国的条款”。——编者注

成共和主义者一事。报道接着说：“资产阶级不想使共和国获得成功，他们十分清楚，社会问题迟早一定要加以解决。”这跟他所说的完全不同，他说的是共和国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报道接下去还说：“主张战争的人没有一个证明了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这里应该是：“不是首要的条件”。

关于他对其他人的发言所做的评论，报道的作者连是谁的发言都不肯指明，所以也就很难辨别出是针对谁的发言。作为他对科恩发言的评论而报道的那些话等于是一种侮辱。报道接下去说，正是“没有了君主才鼓舞了人民”；他明明说的是“没有了君主制”，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嘛。鬼才懂得这样的报道。还有那句英国对外使用的“更多的〔more〕力量”，可能是由“道义的〔moral〕力量”错印而成的。

报道里还说，俾斯麦说法国人没有承认那个政府，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应被法国人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报道根本不提他本来说的是：在法国人人都承认并服从政府而俾斯麦却说法国人没有承认政府，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报道还说，法国被准许出席会议那将等于得到了承认。这是雇佣文人的说法，不是他（马克思）的说法；结论完全被歪曲了。正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它才没有参加国际活动的的能力。报道与会议记录也不一样。这样的报道有害无益。如果再有这样的东西发表，他将提议不准再刊登报道。

1871年3月7日

公民马克思接着又回到巴黎宣言的问题。他说，如果英国工人不表态，这个宣言也许就会成为条约的一个条款；英国人民决

不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被解除武装；应该不失时机，立即建立英国委员会。对海上强国说来，作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敌方的对外贸易。美国不同意这个宣言，而法国却遵守它，这正是法国舰队作为甚少的原因。现在荷兰在他人的唆使下要求把过去只是一纸宣言的东西变成条约的一部分。在海上能够被摧毁的只是货物，而在陆战中被摧毁的却是大量的固定资本，如桥梁、建筑物等等，这些东西需要多年才能恢复。私掠特许证则是另外一回事；私掠船是海上的自由射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已丧失了对外保卫国家的力量，在法国软弱无力的时候，英国成了西欧的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应该夺回这一权力。

1871年3月14日

公民马克思接着重新开始中断的讨论。他说，找到一支足以对抗大陆军事列强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强国现又重新扮演神圣同盟的角色，英国是唯一能够对抗它们的国家，而它只有夺回它的海上权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收这些国家在中立国船只上的货物，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毁灭它们的对外贸易，这样，德国资产阶级就不会象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好战了。这种作战方式比通常的作战方式较为人道。大陆上的军事列强实际是通过巴黎宣言对英国说：你不应按自己的方式，而应按我们的方式作战。许多人反对私掠船，其实私掠船并不比自由射手坏，而且它们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当巴特勒鼓吹对英国作战时，人们说：美国没有海军，无法作战；巴特勒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海军，我们只要有私掠船就行。当今的英国统治者对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力量满不在乎，但是，他们总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使英国人民拥有用来为大陆人民谋福利的

力量。斯图亚特·穆勒曾经是拥护巴黎宣言的,但是在看了给他寄去的一些文件后,就转而反对它了。整个黑海会议都是为了要使这个宣言得到批准。在此之前,这个宣言只是被帕麦斯顿和克拉伦登个人认可,而昨天签署的议定书看来把它包括进去了。

公民恩格斯说,他要答复公民韦斯顿的意见,既然韦斯顿没有来,也就不必谈了。至于巴黎宣言,公民马克思已经指出,这仅仅是私人协定。它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领导人和议会的承认,谁也没有说它具有约束力。1862年,康沃尔·路易斯宣布它没有约束力。1867年,现在的得比勋爵在回答斯图亚特·穆勒时宣布它仅仅在一定范围内有约束力,但是自卫远比所有契约重要。这个宣言从未被批准,它所凭借的仅仅是一位大臣的私人信件的权威,谁也不受它的约束。这一点,从每次战争交战国都另订专门的协定来约束自己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是,会议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今后所有条约和协定未经一致同意废除,都具有约束力。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证明,现在的堡垒不足以抵御炮击,只有在堡垒前面筑炮台才能保住堡垒,在波兰就准备修筑一些炮台。俄国以毫不衰减的热情继续扩充军备,它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已转入战时状态。正在组织通讯部队和卫生部队。在英国市场发行的一千二百万镑俄国公债已被超额认购,这也许是俄国能得到的最后一笔英国钱。战争可能不等夏季结束就会到来——局势看来很不平静。至于讨论中的一些发言,恩格斯说,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一支英国军队是否足以进行武装干涉。公民韦斯顿所说的那种强烈措词,他没有用过。接着,恩格斯再一次证明,英国只能出兵三万人,英国只有在阿尔马战役中达到三万三千人,而这个数目在克里木战争中再也没有达到过。这只等于普鲁士的一个军,因此,以为这样的兵力能够改变力量对

比,那是荒谬的。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勇敢,个人的勇敢在每个国家都可见到,但是,战士的素质却有不同,它们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爱尔兰人擅长当轻步兵,英格兰人擅长当,但是这里的军事当局却把英格兰人当作爱尔兰人使用,把爱尔兰人当作英格兰人使用。英国的军训制度太不完善,太过时了,以致阿尔德肖特的士兵直到这次战争时还未受过站岗放哨的训练。这里有人说,如果是十万英国兵,就不会让人把他们困在巴黎了。但是象我们的志愿兵那样的士兵怎能制止得了这种情况发生呢?法国人中这样的士兵是够多的,如果四十万英国志愿兵象法国人一样被围困在巴黎,并由同样的笨蛋和卖国贼指挥,他们也会做出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来。

最后,他说英国不能按同等条件和大陆国家作战,也不应该希望它能这样做。一个英国兵一年要花一百镑,而一个普鲁士兵只花三十镑,因此普鲁士用同样的钱能养三个兵,而英国却只能养一个;所以它完全不能跟那些陆上强国竞争,他希望英国永远不要试图这样做。

讨论开始时所提出的建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被撤销,第三条被一致通过。第三条说:

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的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的约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原稿此处缺字。报纸的报道增补了“重步兵”几个字。——编者注

* 卡·马克思 1871 年 4 月 25 日 的发言记录⁶⁷¹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纽约委员会书记 的来信，信中附有在委员会中有代表参加的支部的名单：

1. 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
2. 纽约国际协会法国人支部。
3. 纽约捷克工人协会。
4. 芝加哥第一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5. 芝加哥第二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6. 纽约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
7. 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爱尔兰人支部。
8. 纽约威廉堡社会民主协会（德国人的）。

信上说这些支部工作不错！爱尔兰人支部发展迅速，并打算和美国爱尔兰人同盟合并。出版德文周报的工作也有进展。工人联合会曾决定，只认可那些代表劳动，而不代表资本的代表。全国劳动联合会在纽约各协会中丧失了基础，其中有许多协会拒绝派代表参加下一次代表大会。

弗·阿·左尔格。——编者注

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从这里开始。——编者注

纽约州工人大会在沃耳巴尼举行了自己的年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并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决议结尾写的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告工人协会和工联书正在草拟中，同宾夕法尼亚矿工互助团体建立了通讯联系。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最近的选举中推翻了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在当地美国人当中成立了一个支部，它 [向纽约委员会] 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收到两英镑期票，这是二百零三名会员的捐款和代表大会报告的酬金。

公民马克思通知说，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 12 日的，另一封是 15 日的，⁶⁷²但只是星期六收到。一个属于公社的法国人到伦敦来办理交易所业务，拜访了他 [马克思]，以便得到他的帮助。开除托伦确有其事⁶⁷³，为此马克思提出如下的决议案：

“鉴于巴黎支部各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下述决议：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一边，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埃卡留斯支持这个决议案，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继续发言。他说，他向公社代表指出，既不给我们写信，也不给我们寄报纸，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将来会纠正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

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利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

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委托马克思起草这封信。⁶⁷⁴

收到的几封信是拉法格在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寄出的⁶⁷⁵，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平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贝尔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象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人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一位司法官

在《东邮报》发表的报道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写的：“而小店老板和手工业者对凡尔赛人不太买账”。——编者注

员去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一无所获。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普罗托在检查国防政府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一百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六千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东邮报》上是：“要确定死因，必须进行调查，但凡尔赛人断然拒绝”。——编者注

《东邮报》上是：“弗路朗斯不是死在公开的战斗中，而分明是被撞入其住宅的凶手杀害的。”——编者注

《东邮报》上是：“公社委员最初的措施之一是查阅他们的前任的文件和登记簿。在国防政府内务部的报告中发现有关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的记录。这种用来大规模屠杀巴黎工人的新工具就是目前在凡尔赛的那些爱国者装模作样要保卫巴黎打退普鲁士人的时候制作的”。——编者注

《东邮报》上接着写道：“一些电讯和通讯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似乎人民烧掉它们是为了不让公社使用”。——编者注

《东邮报》上对整个情节作了如下的报道：“另一个捏造是关于煤气公司‘被抢劫’的消息。市政府的账目表明，煤气公司曾经从巴黎居民那里收了一百多万煤气费。这笔款子被认为是公司欠市政府的债款，虽然公司在法兰西银行有足够的存款。在公司拒绝向公社支付这笔款项之后，公社派法院执行官前往煤气公司；当公司发现它的财产和保险柜被查封后，便开了全部款数的法兰西银行支票，这样才把保险柜和其他被查封的东西归还给它。这两个事实已证实”。——编者注

《东邮报》上是：“普通官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而高级官员的年薪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显然，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他们当中找不到一个绅士，因为很难想象有年薪二百四十英镑而能举行内阁招待会或在市长那里设宴的绅士！”——编者注

宣言 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部分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东邮报》第 135 号

原文是英文

* 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5 月 9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附议。⁶⁷⁶他说，他对纪念会的发起人几乎毫无了解，但是对罗伯特·欧文没有任何怀疑。欧文著作中的许多思想至今都还未过时。欧文是从他自己的认识出发的，他本人虽然原是一个工厂主，但他首先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以便结束工厂雇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可耻的制度。恩格斯认为国际应该派代表参加纪念会。

公民恩格斯反驳莫特斯赫德⁶⁷⁷说，洛克是自然神论者，而欧文却是唯物主义者。洛克的哲学把法国人引向了唯物主义。他怀疑欧文是否熟悉法国老一辈作家。他完全不同意莫特斯赫德的看法。欧文主义运动早在 1809 年就开始了，与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1812 年他出版了他的论婚姻的著作，1818 年他到亚琛的君主会议去说服他们宣布共产主义。说运动后来带上了宗教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社会改革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大多数欧文主义者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他们曾一度属于宪章派，但是不得不做职业鼓动家，也就变得不大可靠，不坚持他们的原则了。他说，如果举行纪念会而我们不能去参加，那将是很遗憾的。

公民恩格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章派，而是他所认识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曾是宪章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
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关于 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6 月 20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马克思对大陆工人公开支持公社表示满意。在日内瓦、布鲁塞尔、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都举行了集会，声讨梯也尔—法夫尔 [政府] 的暴行。马克思还请总委员会注意法国报纸发表的许多硬说是国际巴黎支部的所谓宣言。这些都是法国警察当局伪造的东西，目的是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上圈套；这表明，卑鄙的政府下流到何等地步。⁶⁷⁸

载于 1871 年 6 月 24 日《东邮报》
第 143 号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 谈话的记录⁶⁷⁹

[1871年] 7月3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副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象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语言⁶⁸⁰谈起来：这里没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便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您差不多能够象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象旁观者那样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国家。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么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么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恰好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象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就需要一

个管理国际的集权形式；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的解决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使其解决，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罢工时，由于从别的国家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已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那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⁶⁸¹但是协会对罢工并不感兴趣，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很容易的。让我们把事情的本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⁶⁸²、工会和互助会、合作小铺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

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马克思博士说：难道您看不见，旧社会没有力量用自己的武器——讨论和组织来对付国际，不得不求助于欺骗，给国际扣上搞阴谋的帽子吗？

我说：但是，法国警察当局断定，它能够证明国际参与了最近的事件，更不用说以前的企图了。

马克思博士说：那好吧，假如您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些企图，因为根据这些企图最能判断说国际搞阴谋的一切指责的严肃性。您记得前一次的“阴谋”吧。曾经宣布要举行全民投票。⁶⁸³那些将要投票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显然动摇了。他们已经看不到帝国政权的以前的好处，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存在着对社会的威胁而似乎要这个政权去拯救社会。需要一个新的稻草人。警察当局着手寻找它。警察当局仇恨一切工人组织，自然不反对破坏国际。产生了一个绝妙的念头：能不能选择国际作为稻草人，这样可以一箭双雕，既败坏协会的声誉又服务于帝国的事业？从这个绝妙的念头中产生出一个谋害皇帝（似乎我们曾经打算杀死可怜的老头）的可笑的“阴谋”。逮捕了国际的领导人。捏造罪证，准备把案件提交法庭，与此同时举行了自己的全民投票。但是，这出虚构的喜剧十分明显只是一出荒谬的、笨拙的滑稽剧。文明的欧洲看了这出戏，一秒钟也没有看错它的性质，只有投票的法国农民受了蒙蔽。你们英国报纸报道了这一卑鄙勾当的开头，但是

以下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没有收入的部分。——编者注

忘记指出它的结尾。法国法庭出于礼节承认阴谋的存在，但不得宣布没有证据能证明国际参与了阴谋。请您相信，第二个阴谋同第一个是类似的。法国的一位官员又忙得满头大汗。他奉命要找到对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国民运动的解释。千百个时代的象征应当可以提示正确的解释——工人觉悟的增长、当权者的奢侈和寄生性的发展，政权最终从一个阶级转到人民手中的历史性过程目前正在扩展——时间、地点和情况显然都同伟大的解放运动相适应。但是要看到这一点，这个官员就应当是一个哲学家，而他只是个警探。因此，他依照自己的生活规律，抓住警探的解释——“阴谋”。他以前贮存的伪造文件给他提供了证据，而这一次受惊的欧洲将会相信谎言。

我说：欧洲在每一家法国报纸上看到这一案件的报道时未必会采取另外的行动。

马克思博士说：每一家法国报纸！您看，这是其中的一家（拿起《形势报》）。请您自己根据事实来判断它的证据的价值。（他读报。）“国际的成员卡尔·马克思博士在企图潜入法国时在比利时被捕。伦敦警察当局早就监视着与他有联系的协会，现在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以查禁这个协会。”

两句话，两句谎话。您亲眼所见，可以相信这一点了吧。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并没有蹲在比利时的监狱里，而是呆在英国自己家里。此外，您一定知道，在英国，警察当局不会妨碍国际协会，正如协会不会妨碍它一样。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大陆上所有的报刊都刊登了这个消息，没有一处辟谣，即使我从伦敦直接向欧洲所有报纸辟谣，它们还是会继续转载这个消息。

我说：您是否经常打算驳斥这类虚假的消息？

马克思博士说：在被这种无效劳动弄到精疲力尽以前，我曾经打算过。为了证明这些消息编造得多么粗心大意，可以提出一件事：我见到一条消息，竟把费利克斯·皮阿说成是国际的成员。

我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马克思博士说：在协会里未必能有如此不受约束的人的位置。有一次，他居然如此自信，代表我们发表了一个轻率的声明，我们立刻予以否认，虽然应当给他们以应有的回答，但是报纸自然对这个批驳置之不理。

我说：那么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 1848 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应有的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
本卷第一次发表的部分到此结束。——编者注

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实证论者。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象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探索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说：您对宗教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代表协会讲话。我自己是无神论者。也许，在英国听到这样的自白是非常突然的，但是，一种可以告慰的想法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没有必要悄悄地这样做。

我说：那您毕竟还是在这个国家安置了自己的大本营啰？

马克思博士说：根据明显的原因：集会权在这里是已确定的东西。这种权利在德国虽然存在，但困难重重；而在法国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权利了。

我说：而美国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不让工人问题在美国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象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迅速地被提到第一位。

我说：看来，在英国，不论预期的解决办法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象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 1871 年 7 月 18 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 弗·恩格斯关于 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8 月 22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恩格斯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西班牙刚刚发生的内阁更迭表示很大的希望。可以预料，对国际的迫害行将结束，那时协会将在整个半岛迅速地发展起来。共和党队伍中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不了解它的社会原则，曾给予支持。但当他们一知道公社的意义超过了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他们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谴责起公社来了。这激怒了共和党的基本组成部分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当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再不愿充当普通的工具而转向了国际。

公民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博士的女婿、前总委员会委员公民保尔·拉法格在西班牙被捕，并由宪兵押送到马德里。但是，由于提不出任何罪名，政府已将他释放。

载于 1871 年 8 月 26 日《东邮报》
第 152 号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在 1871 年
9 月 17 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⁶⁸⁴

这次代表会议是由于非常情况而召集在一起的各国代表的会议，目的是同总委员会共同讨论由于这种非常情况而出现的紧迫问题。但是，这次代表会议不能任命总委员会的新成员，不能迁移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也不能修改协会的基本章程。它的权限是在现有的章程的范围内就策略、政治和组织问题通过决议，并拟定更有效地实施这个章程的措施。

载于 1871 年 10 月 2 日
《苏格兰人报》第 8789 号

原文是英文

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 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

1871年11月11日于伦敦

公民：

《谁来了》所刊登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引起各种不同的、决不是善意的解释，因此请允许我公开声明，这是背着总委员会刊登的。不仅如此，在总委员会能够发表这些决议之前，其中的部分决议已经被贵报披露了。⁶⁸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敌人正在密切注视着协会的言论，并急急忙忙地把这些言论加以歪曲，散布出去，以至我只好把这些决议发表出来而未能事先消除对决议中的下列地方作出模棱两可解释的一切可能性：“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转交给法国报纸的原文是：“代表会议声明，参加国际的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这种文字上的出入使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也有了借口在某些反动报纸上进行侮辱性的解释。但是，只有头脑有毛病的人才会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会把对协会会员作的决议中的“德国工人”一词理解为别的什么人，而不是那样一些公民：他们用反战的集会和示威来支持法国工人保卫和平的行动，他们在德国国会里拒绝投票赞成军事贷款，在兵痞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

欢呼中提高了抗议的呼声并向 1870 年 9 月 4 日的法兰西共和国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一种耻辱而加以拒绝，他们热烈欢迎巴黎公社的成立并维护它的原则，当公社在反动派的打击下遭到暂时失败而覆灭，公社社员及其捍卫者遭到刽子手的杀害或在苦役和放逐中受折磨的时候，他们在本国国会内谴责凡尔赛人的无耻暴行，并宣布他们同公社团结一致，为它的全部活动承担责任。

到战争结束时还被关在监狱和囚室的人，即代表会议声明他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那些人，现在正在法庭受审，罪名是搞政变。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对决议作任何其他解释，其原因只能是：要么对国际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和宣言一无所知，要么显然不怀好意。

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

法国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6 日《谁来了》
第 39 号

原文是法文

弗·恩格斯

* 更 正

西班牙书记公民恩格斯更正 12月23日《东邮报》一篇报道中的错误。⁶⁸⁶西班牙各支部根本没有象该报报道的那样举行代表会议。在他的发言中提到《解放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机关报)上发表的、西班牙其他刊物转载和支持的声明。从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西班牙各支部完全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坚决根据关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决议 进行活动。

载于 1871年 12月 30日《东邮报》
第 170号

原文是英文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 9月 17日至 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格莱斯顿政府
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摘自 1871 年 12 月 19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⁶⁸⁷

马克思博士谈到他从最接近内务部的人士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说，英国政府蓄意以民事罪挑起对某个法国流亡者的迫害；信中暗示，这些步骤是应法国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

这个情报同他 [马克思] 从大陆收到的其他消息是相符的，所以必须立即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

由于发生了法国政府拒绝延长贸易条约期限的问题，所以，如果格莱斯顿决心挑起对流亡者的迫害来换取签定新的贸易条约，那是不奇怪的。如果格莱斯顿有此意图，他肯定不能实现。英国人民决不会允许一个大臣用国家的自由作交易。帕麦斯顿勋爵的声望当时比格莱斯顿的声望要高得多，可是一当他试图于这类勾当，他也就垮台了。

载于 1872 年 1 月 10 日《平等报》
第 1 号

原文是法文

发给卡·马克思的 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1872年7月30日于纽约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支部，北美，沃德旅馆 10
号致卡尔·马克思（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荣幸地通知您，在 7 月 28 日会议上您被任命为上述支部的代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我们期望您同意我们的选举并将代表纽约第一支部出席该代表大会。

您的委托书将由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本地代表中的一位代表到达欧洲时转交给您。

按照 7 月 28 日那次会议的决定，对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是，您必须同从我们这里直接去的代表一起坚决支持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目的是严密的组织，首先是完全的集中，以及反对巴枯宁、吉约姆之流的阴谋，因为他们显然是要瓦解国际工人协会以便于他们个人自由搞阴谋和破坏我们的运动。

我们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一次没有让纽约第一支部在决议中写上它认为必须修改共同章程的看法，因此我们授权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以及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和解决的一切其他问题自行酌情处理。

纽约第一支部完全意识到，它把代表的职责交给您，还应当考虑支付与此有关的费用，但是我必须向您说明，我们的经费现在已经完全用尽，对我们来说哪怕支付最少的费用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这种情况，海牙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要求我们直接派出代表，因此我们希望您即使没有我们的资助也能找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机会。

致兄弟般的问候

通讯书记 卡·施佩耶尔

通讯书记的通讯处：纽约第5号大街南76号卡·施佩耶尔收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纽约第一支部

委 托 书

本件持有人卡尔·马克思于1872年7月28日在上述支部会议上当选为该支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纽约第一支部的有表决权的的全权代表。

通讯书记 卡·施佩耶尔

会议主席 弗·阿·左尔格

1872年7月2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 and 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发给弗·恩格斯的 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的布勒斯劳会员委托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代表他们出席今年 9 月 2 日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亨利希·厄梅、保尔·博克、海尔曼·克里米兴

1872 年 8 月 19 日于布勒斯劳

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正式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纽约(北美)第六支部出席 1872 年 9 月 2 日起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特此证明。

代理主席 Fr . G . 贝尔特兰德

书 记 约翰·斯托克

1872 年 8 月 8 日于纽约

为了证明本委托书属实，兹盖上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印章并加上本人签名。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

弗·波尔特

1872年8月9日于纽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72年9月
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
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 1872 年
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⁶⁸⁸

卡·马克思
关于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
1872 年 9 月 1 日

马克思对这一点补充说，除海牙支部的成员外，会议对一切人都应是秘密的。

马克思作了 [关于允许协会所有成员出席的] 补充，条件是：会员身份应得到确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秘密会议的不公开性质
1872 年 9 月 2 日

恩格斯要求通讯员不得报道秘密会议的消息（这是涉及那些同时给报纸写报道的代表）。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方式
1872年9月2日

马克思（在所有布朗基分子和所有德国人的支持下）说，这种投票方法是同协会章程相违背的；他说，每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它的代表都有投票权。⁶⁸⁹

（茹柯夫斯基的记录）

马克思反对这种投票方法：他说，我们在这里代表的是支部，而不是联合会，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不具有全协会的性质。

（茹柯夫斯基的第二本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新的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资格
1872年9月3日

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应当投票表决国际是否要服从结成秘密团体的那一伙人。在座的有这个团体的六名成员。他们（吉约姆和西班牙代表）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将在一般性讨论的过程中证实这一点。首先承认开除是非法的。莫拉戈早已

见本卷第 605 页。——编者注

说过，邀请 [被开除者] 是不需要的，相反，章程要求任命仲裁法庭。另外，莫拉戈继续说，这是不涉及代表大会的内部问题。由于支部向委员会申诉了，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内部问题。委员会承担了违背章程的责任，因为涉及到在西班牙保存国际的问题。以瓦解国际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在联合会委员会的八个席位中取得了五个。他们为整个西班牙提出了这种只是让秘密团体有行动自由的投票方法！对总委员会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有不属于这个集团的一名西班牙代表，并且它为国际的利益对这一行动承担了责任。

(勒穆修的记录)

恩格斯说，我们应当决定，国际工人协会今后是否应当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管理，还是由违背章程秘密组织起来的集团来领导它。在座的有六个属于这个秘密团体的人：四个西班牙人，施维茨格贝耳和吉约姆。⁶⁹⁰

恩格斯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封信并说道：“这就是证据”。恩格斯接着指出，没有任命章程所要求的仲裁法庭而任意开除是非法的。新的联合会同联合会委员会决裂并直接向总委员会申诉，只是行使了自己的权利。的确，总委员会离开了章程，但它是有意这样做的，为的是以这种办法来拯救在西班牙的国际工人协会。同盟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经费在西班牙进行活动，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自己的八名成员中有五名“同盟兄弟”。总委员会完全理解自己这一步骤的意义，但是它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西班牙代表的委托书
1872年9月3日

恩格斯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西班牙人没有象人们在代表大会一贯和应当作的那样把钱和委托书一起交出来，而是把钱留在自己的腰包里。西班牙人弄不清楚为什么别人要把他们牵连到关于同盟的问题里去，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同盟盟员。马塞劳和其余三个人硬说，他们以前属于同盟，而现在已经退出。恩格斯推测，他们还会加入同盟，而只是用其他名称罢了。如果他们借口在西班牙发展国际工人协会，那么他们应当记住，这种发展是在马德里被开除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前的成员所取得的。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1872年9月5日

马克思警告说，总委员会的报告不要涉及内部问题，因为：
(1) 如果这样做，公开宣读这个报告就会在国际被禁止存在的那些国家里使国际的声誉受到影响，(2) 联合会没有履行前几届代

表大会所规定的职责，没有给总委员会送来自己的报告，(3) 因此，即使不考虑公布报告将会招致的危险，草拟这种报告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建议先举行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

(勒穆修的记录)

马克思通知说，总委员会的报告要在报刊上发表；由于总委员会既不能公开地，又不能秘密地报告各个民族的组织情况，还由于一些联合会，例如汝拉联合会和比利时联合会，没有完成送交通讯的任务，所以报告是一般性的。报告人称赞美国联合会是全部完成了通讯和交费任务的唯一一个联合会，并表示希望采取措施来确定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的议事日程。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⁶⁹¹

1872 年 9 月 6 日

马克思说，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不是指旧的总委员会；所以，不是指我们，而是指原则本身。他说，宁肯投票赞成取消委员会，也不愿把它变成信箱；信箱可能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这对国际可能是很大的威胁。我们是负责任的，而新闻记者先生们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不能象索瓦所希望的那样预见到一切情况。例如，伦敦出现了被章程所掩护的警察支部。发生过招魂术者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事情等等。我不明白，汝拉人怎么会这样，不反

对资产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同他们串通一气。

不过，所要求的权力大概已经反映到章程里了。所提出的条款不是让总委员会拥有无限的权利，而是规定了监督权。

几年来，总委员会曾经碰到过警察和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混入奥地利和法国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法国有个警官企图成立支部；自然不得不暂时将它解散。韦济尼埃、朗德克支持汝拉人，就象第十二支部的资产者那样，——这本来是一回事。——再没有一个委员会比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更多地受到比利时工人的批评了，人们指责它的权威主义不亚于总委员会。法国人认为，他们对国际分子的民族主义太多了。

暂时解散联合会委员会的理由在纽约提出来了；可能其他国家里的秘密团体也想要掌握联合会委员会，应当暂时解散它们。——至于是否可以象韦济尼埃、朗德克和一个德国奸细那样自由建立联合会，这是不允许的。梯也尔先生成为反对国际的一切政府的走狗，总委员会必须有权力来消除瓦解的因素。

接着建议规定保留条件。旧的委员会只注意协会的利益并且只是把一个第十二支部暂时开除了出去。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足够的权力：一个美国委员会的成员当着荣克和勒穆修的面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指第十二支部。

此外，联合会委员会可以撤销对支部发出的改选号召——这有利于联合会；如果总委员会决定采取没有根据的步骤，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就会谴责它。

在国际遭到迫害的国家里，[支部]最好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利。你们所提出的警告是圈套，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进行秘密活动并且是最权威主义的团体。——总委员会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预算

——它只具有道义的力量，如果你们使它失掉权力，那么你们自己只会成为虚假的力量。

(勒穆修的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1872 年
9 月 2—7 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记录和文件》1970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和法文

*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 1872年9月8日在
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⁶⁹²

演讲人说，从前海牙曾经是欧洲外交的策源地。在这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签订和约，又在策划各种各样的战争了。目的在于使战争不能发生的工人代表大会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对国际说，海牙是荷兰的最反动的城市，它的粗野的居民会把“巴黎公社的匪徒”“撕成碎片”。但是，这恰恰是要选择这个“残忍的”城市来表明国际不怕任何反动暴行的另一个原因。另外，他相信这里可以找到同情的人，而凡是有工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人。

公民马克思转而分析了刚刚结束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果。他认为这些成果是重要的。面临柏林会议，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讲演人认为，柏林会议预示着对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⁶⁹³在国际成为一个团结的组织以前，它还不能使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不能使运动在各地同时发生，它的努力不会产生很大的成效。讲演人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它为什么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是孤立的。如果在巴黎发生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也爆发革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大一些。

讲演人认为在其他手段不起作用的地方使用暴力是正确的。

在北美，街垒不是必要的，因为那里的无产者只要愿意就可通过选举取得胜利。对于英国和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必须代替合法性，因为不然——用虚伪的宽厚、盲目的正义感——是不可能达到所需要的目标的。强大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应当准备和支持这种革命。由于这些原因，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也是极为必要的。

公民马克思说，代表大会昨天（星期六）决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伦敦迁往纽约。他同意这个决定。美国是一个工人的国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被逐出欧洲或者为穷困所迫的人投奔到那里。这对国际的努力来说是一个多么新的得天独厚的活动场所。讲演人希望这个措施将会产生好的结果。

至于他本人，他确实是要放弃总委员会委员的称号，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谣言——不放弃国际会员的称号。完全相反。他从行政事务的重担下解脱出来，将以新的精力把自己贡献给二十五年来他为之献身并要干到最后一息的任务：解放劳动。（热烈鼓掌）

载于 1872 年 9 月 10 日《商业总汇报》
第 12837 号

原文是荷兰文

纽约总委员会 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 1872 年 10 月 27 日的决定授权住在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英国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理经费和会费以转交本总委员会。特此证明。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1872 年 10 月 27 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于 1961 年《年鉴》
杂志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信⁶⁹⁴

尊敬的公民：

尽管我厌恶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从国际成立时起的前总委员会委员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开始活动时起的成员，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诚实的”约翰·黑尔斯的信。

约翰·黑尔斯吹嘘说，他的信是以自己的名义写的；恩格斯和马克思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他们反对的是他署名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的那些信“没有得到”不列颠委员会的“同意和批准”。而事实正是这样。

9月26日，他的一些支持者在他的怂恿下提出如下的决议案：“委托通讯书记”（约翰·黑尔斯）“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委员会各寄一份我们在英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先驱报》”。他执行这项决定，立刻主动把在《国际报》（布鲁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联盟》（巴塞罗纳）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信寄给脱离了关系的委员会；“诚实的”约翰·黑尔斯这样就自己代替了联合会委员会。

至于他要把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切职能都统一到他的名下的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 国际先驱报 编辑》。——编者注

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可以根据下述例子加以判断。在 11 月 7 日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约翰·黑尔斯建议“实行如下的职务再分配，也就是：任命一个总书记，负责通讯和财务开支，为报刊草拟正式报告，并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和书记兼记录员，后者的职责是保管委员会的记录簿”。但是这对约翰·黑尔斯来说也还是不够的。他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于是通过了他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提出的建议，内容是：“我们任命一名将替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协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总书记，并保证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这实际上是集权，所以，曼彻斯特联合会委员会立即宣布反对不列颠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不足为奇的。

约翰·黑尔斯在他给汝拉联合会的信中硬说，“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向当时的西班牙通讯书记、公民恩格斯询问过洛伦索的通讯处”，而“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绝把通讯处告诉它”。恩格斯在答复中要求黑尔斯用记录中的有关段落来证实联合会委员会的这一询问。黑尔斯没有这样做，而引了他的朋友罗奇的证明来搪塞。只要把罗奇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和投票情况同他向不列颠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正式报告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他的证明有什么价值。

至于里斯本委员会的通讯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没有告诉黑尔斯，因为人们知道，“他需要这类通讯处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阴谋。对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则用不着采取这种审慎的态度”。黑尔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恩格斯拒绝告诉通讯处似乎是因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葡萄牙的问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黑尔斯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信中的声明所作的答复，也表现出对真情的同样“诚实的”忠忱，即说什么，“他履行自己通讯员职责这一点在总委员会把这些职能转交给公民米尔纳时所做的特别决议中得到了评价”。他暗示，记录中的这一段似乎是指他暂时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时的情况。这一免职是由小委员会（它的成员中有黑尔斯的朋友荣克）提出并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的。总委员会的仲裁委员会曾受托来调查对黑尔斯提出的控告，但是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随后伦敦总委员会的解散打断了它的工作；它收集的材料还要由它来公布。但是，上述记录中的那一段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黑尔斯被总委员会暂时免职（荣克也偶然作了记录）的那次会议上，公民埃卡留斯建议任命一个专职的英国书记来恢复黑尔斯完全放弃了的同工联的通讯。决议被通过了，但措辞上作了如下的修改：委托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工联通讯——为此目的，任命了公民米尔纳。

约翰·黑尔斯竭力回避重复他的那些可笑的说法，什么秘密同盟的存在是前总委员会的“发明”，或者，说什么这个委员会“企图在我们协会内部组织庞大的秘密团体”。但是，在诚实的杜撰方面，约翰·黑尔斯的本领有多大，可以从他在去年12月21日给许多单位寄去的下列明信片中看出：

“公民们：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已经托出伦敦弗利特街红狮子大院7号住所，如果小集团为自己保留了住所，那么这样做是没有得到委员会成员的同意的，所以对它的任何措施都应当作相应的估价。下列人员打算把协会变成秘密政治组织，以便发展它的章程所规定的密谋，而不是使协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即真正的劳动组织。他们构成了在不久前发表的通告中所说的那个少数派。这就是公民列斯纳（德国人，由小组选出）、威·哈·赖利（代表小

组) 亚·魏勒尔(德国支部) 埃·希尔斯(西头区) J·密契尔(同上,但是代表欣克利) 赛·维克里(柏肯海德) 查·默里(诺尔曼比,但他只是在被公民维克里解散的那次会议上才参加的) 欧·杜邦(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 乔·米尔纳(带着 1849 年某个全国改革同盟的委托书出席的)。”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不满足于散布这种荒谬的杜撰,而且把这种杜撰写在明信片上。为什么不直接通知亨德森上校呢?

约翰·黑尔斯指责德国工人阶级的最老的和最受人尊敬的领袖之一公民恩格斯,说他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罗伯特·欧文也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黑尔斯忘记补充一点:恩格斯用自己手中的笔和武器(在 1849 年德国革命时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斗争了四十年;他早在 1845 年就在一部欧洲著名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捍卫了这一事业;在以后的年月里他积极参加了英国工人运动,为罗伯特·欧文的杂志《新道德世界》、菲格斯·奥康瑙尔的报纸《北极星报》、乔·朱·哈尼的《红色共和党人》和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撰稿。

至于说约翰·黑尔斯的“诚实”,那么他本人也许相信这种诚实,不过,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妨碍工联(他是工联的成员)派自己的代表到总委员会控告黑尔斯,说他充当监工,勾结主人来反对自己的工人弟兄。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指责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叛卖行为。这也并没有妨碍他本人向当时已经委派的侦查委员会申明,他为了找工作曾求助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招募人议员格林先生。这也并没有妨碍公民布恩在被派参加检查黑尔斯的财务账目的委员会时拒绝签署收支表。他说,当埃卡留斯任书记的时候,黑尔斯曾经证实说,给这个职务每周支付五先令足够了,而在他被任命后却马上要求十先令,后来争取提高

到十五先令。这个增加额只批准为期三个月，但是黑尔斯未经新的表决继续给自己增加。公民布恩关于让黑尔斯归还他超过应得部份的余额的建议没有通过，因为通过了恩格斯的修正案——考虑到在黑尔斯免职之前总委员会本身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财务委员荣克每周超过应得部分支付给黑尔斯的五先令予以报销。

约翰·黑尔斯在他的信中声称，他作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执行总委员会的指示。就算是这样，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只要黑尔斯获得总委员会的酬金，他的“诚实”就成为总委员会的顺从工具，一旦不再支付酬金，他就公开反叛。

我自己曾经因为参加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而蹲过普鲁士的要塞和被逐出祖国，所以我不能允许约翰·黑尔斯之流歪曲这个运动并使它服从于个人虚荣的渺小利益。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弗·列斯纳在卡·马克思的参与下

原文是英文

写于 1873 年 1 月 4 日左右

载于 1873 年 1 月 11 日《国际先驱报》

第 41 号

*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致《东邮报》编辑的信⁶⁹⁴

阁下：

请允许我根据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占用贵报的一些篇幅来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由约翰·黑尔斯等人署名的某些说法。

我们称为真正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利可以由下述事实来确认：许多在组织上已成立、实际上已存在的英国支部参加到我们这边，它们根据章程有二十三名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委员会，诺定昂集团的两个成员也参加到我们这边；大不列颠的唯一的国际协会刊物支持我们。此外，在英国的所有类似组织中，只有我们同代表整个协会的权威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还同世界各地支持协会的委员会和支部保持联系；其实，贵报的通讯员即使拥有必要的人数来捍卫他们所期望的地位，他们也未必比美国战争时期联邦派国会自称合众国会那样更有权利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实际上，贵报通讯员及其朋友们已经背弃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背弃了总委员会和国际的立场。如果他们为了一定程度相同的目的而组织一个气味相投的联合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自

《国际先驱报》。——编者注

命为唯一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委员会并诬蔑公认的国际成员是分裂派——这就是既荒诞又可笑的创造性的表现。

至于我们开会的地点,那么个人方面的情况——在贵报上自然不便加以说明——妨碍我们在我们通常开会(顺便说一下)的地方举行我们最近的几次会议。同样的情况或它们的影响还妨碍我们立即找到合适的开会地址,但是我们的会议今后将在索荷区丹麦街折衷大厅举行。顺便说一下,举行过所谓“代表大会”的西蒂路197号的房子多半没有作为公共场所进行登记,而由于根本没有宣布“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举行自己的会议,因此,作如下的推测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会议会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在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的地方举行,也就是说根本不会在任何地方举行。

至于所谓“代表大会”的权限问题,那么通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次会议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就举行了,而且不是在举行例行会议的那天晚上举行的;只有多数成员知道开会,而少数成员为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规定的这天晚上到了平时开会的地方,才知道开会。当然,他们大为吃惊,但是由于没有记录簿、文件等等,他们通过了向各支部发出呼吁的决议之后就各自走开了。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各支部几乎一致地支持他们,虽然被赶来参加这次极其“非常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十二名代表,他们的委托书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贵报通讯员在把下述的内容作为似乎是诺定昂代表大会⁶²²通过的章程条款之一时,过于指望我们有可能不熟悉协会的章程:“如果联合会的情况需要,联合会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书记所记的这次大会的正式记录是由总委员会保管的,记录中并没有这样一条;另

外，也没有经过某种歪曲而可以赋予这层意思的那么一条。

为了回答那种似乎有人带着无效的委托书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说法，可以指出，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对所提交的全权证书非常满意，以致毫无保留地或毫无意见就在记录上签了名，这有委员会记录可查。其实代表大会的决议通常是以四比一的多数通过的。上述代表是多么的玩忽职责，而他当时就得到，而且现在还得到西蒂路197号的委员会及其拥护者的信任！

不择手段的作风本身常常推动派别斗争的参加者为了自己的纲领的胜利而采取极其可疑的极端行为，这是真实的，可惜常常是被认可的，但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丝毫不适用。在诺定昂代表大会前后，有人无中生有地散布关于空白表格和假委托书的谣言，而且现在还在散布，不亚于海牙代表大会前后。例如，现在联合会委员会掌握着一个人的信，这个人为西蒂路委员会执行着格林先生为内阁所执行的那种任务。信中在否定诺定昂代表大会时所用的措辞，同现在同一机关对海牙代表大会所用的措辞极其相似。因为诺定昂代表大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先弄清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问题不是更好吗？这对贵报上周发表的信件的作者所代表的那伙人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合适的工作。

当他们正忙于个人的阴谋，在协会的历史上寻找一切可以指责的事情，并引人注目地摆给我们的好嘲弄人的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显然是给这些人提供材料）看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奉行我们的方针，不在障碍面前退却。我们对那些看来只在竭力要进行个

人报复，并以此来损害协会的人的微不足道的攻击不屑一顾。伟大的事业在前面等待着我們，我們愿意始终不渝地献身于这个事业，不允许自己为了无谓的争吵哪怕短时期地脱离这个事业，而这些争吵的问题对不知内情的广大读者来说不过是庸俗而枯燥的一堆空话。

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

通讯书记 赛·维克里

赛·维克里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
起草于 1873 年 2 月 17—2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73 年 2 月 22 日《东邮报》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 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 1873年6月1—2日⁶⁹⁵

1. 不列颠联合会的组织。
2. 实施协会的宗旨和原则的最好手段。
3. 国际工人协会同工会的关系。
4. 实施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的最好手段。
5. 普遍的 [国民的] 教育。
6. 土地问题。
7. 废除继承权。
8. 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9. 工人有权取得一定份额的国家贷款用于促进合作生产。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参与下
写于1873年5月3日以后

原文是英文

发表于1873年5月17日《国际先驱报》
第59号，并印成传单

国际和工会⁶⁹⁶

下面是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出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联成员书：

工人同志们：

去年9月份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例行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下列决议：专门委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为此，它应当在本届全协会代表大会后一个月之内草拟、翻译并用一切国家的语言发表告工人书，把它寄给一切能确定其通讯处的工人团体，而不管它们是否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应在这个告工人书中建议各个工人团体建立自己行业的国际工会并明确提出它们同意参加该工会的条件。这些条件一经提出，总委员会就加以收集，并拟定一个总的草案，这个草案将提供给一切希望参加国际工会的团体。国际工人协会最近这次代表大会（定于1873年9月举行）将把建立国际工会的条件最后确定下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这个决议拟定了国际工会的草案。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现将这个草案的概要提交给你们审查并请你们尽快把自己的意见通知我们。当然，这个草案只是一个初稿，不具有任何约束和强制的性质；相反，各工会本身有充分的机会来制订自己的章程。

草 案 概 要

1 每个国家的所有同行业工会共同选出该国的同行业的中央执行机关。

2 各个国家的各个行业的中央机关选出所有行业 and 所有国家的总委员会。

3 依靠各中央机关谘议和帮助的总委员会的任务是，每当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时，防止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输出劳动力或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输入劳动力。

4 必要时应把组织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去解决任何一个行业或国家所发生的冲突。

国际工人协会不是别的，而是为了本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团结起来的各国工人的联合，它怀着最真挚的兄弟情谊提出这个草案供工会的全体会员和工人审查，不论他们是国际协会的个人会员或集体会员，还是在它的队伍之外。没有必要向已经加入工会的人说明共同行动的意义。他们本身的经验会提醒他们，他们在反对雇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共同行动取得的，而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于分歧和孤立所造成。国际工会的草案只是进一步传播已经被承认的原则，实现构成无数现存地方性和全国性团体的活动基础的思想。

到目前为止，国际工会的职能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来执行的，但是不难了解，这些特殊的任务由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纯工人组织来完成会更容易和更有效。在 1866 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

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几项决议：1. 在全世界建立类似英国已有的那种工会。2. 组织对各国工人生活条件的统计调查，由工人自己来收集这些统计资料。3. 提出八小时劳动作为工作日的极限；由于现在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由美国工人提出来的，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把这个要求写在各国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面。

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都确认了这些决议。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工会和建立总的罢工基金的决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工人的如下决议：

“1.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2. 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最后有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完成了使命并把可以用来管理世界的工具交到工人手里。

我们不谈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中成功地起过中间人作用的许多次罢工的细节，只提一下两三个有代表性的事实。1866年10月总委员会向法国拍发一份电报，阻止了大批法国镀锌工人打算到伦敦去顶替罢工的英国工人。1867年3月司机和司炉罢工期间，当铁路公司宣布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正在开往铁路线时，总委员会设法使协会的所有大陆报纸发表罢工的消息，号召自己的通讯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让已经受雇的工人前去。总委员会不等司机和司炉发出呼吁，就主动作了这项工作；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到今天还不了解这些事实。但是，在国际的巴黎会员受审期间，检察官提出这些事实来控告国际协会。

美国铸工前几年罢工时，他们虽然是不列颠铸工协会的分会，但是也认为需要呼吁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防止把英国工人输入他们的国家。在不久前木工和细木工罢工时，他们的执行委员会曾向国际工人协会发出呼吁，之后总委员会建议所有的通讯书记把罢工的消息通告大陆上的工会，以防止工人到英国去。此外，总委员会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一名委员注视罢工的进展，以便及时地向大陆工人发出警告。就在不久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还应伦敦装订工人协会的请求阻止了一家伦敦公司企图运进外国工人并用低于当地工人同意的工资雇佣他们。一家刊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告的法国报纸的出版人被梯也尔先生的自由派共和国的法庭处罚款和监禁。

没有必要把大陆上那些若无政府干涉就能够实现所提要求的罢工全都列举出来。我们只是讲一下最近法国北部矿工罢工时发生的事情。这次罢工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人们才得知，英国工联曾经决定寄钱支持罢工工人。梯也尔先生（他是该公司的股东）知道此事以后就把军队派到罢工地点，下了一道把工人赶下矿井恢复工作，违抗者格杀勿论的绝对命令。这项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报纸拍手称快，又宣称梯也尔先生是救星。

工人阶级的敌人慑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力图逐步败坏它在工联心目中的声誉，把它说成是不关心工联行业利益的纯政治组织。上述几个事实是我们对这种诽谤性指控的回答。

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批准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如下决议：

.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

最初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至于这项决议，我们认为，协会的职责是提醒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和采取自己的政治行动路线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只有这样，它才能不再成为沽名钓誉的资产阶级阴谋家的工具，不管他们自称是分立派、脱离派、自治论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让那些要求英国——当然是徒劳的——查禁总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本身的政府去慈父般地照管所有这些人吧。这些渺小的人物不能阻挡工人阶级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宣布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时，只把它看作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这个目标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简而言之，就是消灭阶级。

随着工人阶级从游手好闲的阶级的经济奴役下彻底解放的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子日益临近，联合的头等意义越来越明显了。

只是各国工人之间缺乏兄弟般的联结一致，所以这种解放至今仍遭受阻碍。

各国的国务活动家都在全力保持这种状况，进一步使各国工人彼此疏远。为此动用了“民族”和“种族”两个词，为此而写了历史。为此有钱有势的人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就用虚假的民族主义口号来诱惑无知识的和被欺骗的人民，唆使他们互相攻击，把他们引入流血的战争。但是这种玩意儿几乎都失败了。统治者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人民的时代快要来临了。全世界的工人们——腐朽的现代社会的整个大厦就建筑在他们的愚昧无知和互相疏远上面——正在觉醒，认识到自己的集体力量，而这种力量的第一个表现将把这座破旧的大厦化为灰烬。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马耳特曼·巴里	乔治·米尔纳
乔治·贝内特	查理·默里
阿·孔博	威·哈里逊·赖利
阿尔弗勒德·戴伊斯	奥古斯特·赛拉叶
欧仁·杜邦	威·唐森
J·乔治	赛米尔·维克里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乔·威·威勒尔

5月8日于索荷区丹麦街折衷大厅

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写于
1873年4月底—5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3年5月24日《国际
先驱报》第60号副刊

注 释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弗·恩格斯的《法国来信》这一组文章（也象另一组文章《德国来信》一样，见本卷第28—38页）是为乔·朱·哈尼1849—1850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撰写的。杂志编辑哈尼和恩格斯极力使这组文章具有直接发自巴黎的通讯的性质，这在第六篇文章中看得特别清楚（见注31）。对这组文章的分析表明：它们根据的材料不仅有法国报刊上的，而且有英国报刊上的，此外还有其他来源的消息（从巴黎寄给恩格斯的私人信件；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斐迪南·沃尔弗被驱逐出巴黎后，1849年12月来到伦敦，谈了他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其中第四封信《选举。——红色分子的光荣胜利。——无产阶级的优势。——秩序党的沮丧。——对革命进行镇压和挑拨的新计划》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写《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三章的同时写成的（1850年3月），后者当时以《从1848年到1849年》为总标题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包含对法国政治情况的深刻分析。《法国来信》中所援引的事实和对事件的评价，除了上述《阶级斗争》第三章以外，在《国际述评（三）》以及稍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多次被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74—110、492—540页，第8卷第117—227页）。许多思想以及对法国事件分析的方法本身互相吻合，无疑地证明《法国来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观点。

每周出版的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在评介新的几期《民主评论》时，总要指出《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的特别重要意义。例如，在对12月这一期的评介中说（1850年1月5日《北极星报》），“《法国和德国的来信》是这本杂志上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些来信将有助于推进各国人民友爱的光辉事业。”

《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在本卷中仍按《民主评论》上发表的顺序刊载，虽然德国来信的第一封注明的日期是1849年12月18日，而法国来信的第一封是12月20。

《法国来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76年《苏共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杂志第8—9期上。——第3页。

- 2 这个消息恩格斯大概是从1849年12月19日《泰晤士报》发表的电讯中取来的；法案是在1849年12月18日提交国民议会的。——第3页。
- 3 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的决定是制宪议会在1849年5月19日通过的。——第4页。
- 4 入市税（Droit d'octroi）是城市对输入的日用品所征收的税。——第4页。
- 5 二月革命的直接原因是禁止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的宴会和示威游行。——第6页。
- 6 在临时政府时期（1848年2月24日—5月4日），担任财政部长职务的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人物：银行家米歇尔·古德肖（3月5日辞职），以及接替他的路易·安东·加尔涅-帕热斯。——第6页。
- 7 指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后成立的所谓秩序党。该党是相互竞争的两个君主主义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组织；领导该党的是梯也尔、法卢、蒙塔郎贝尔等人（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6—69页）。——第6页。
- 8 在1848年12月10日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投票拥护候选人路易·拿破仑的，有5343000人，占参加选举的总人数的四分之三。——第7页。
- 9 爱丽舍宫从1848年12月起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总统官邸。——第7页。
- 10 关于《法国来信》的这一篇和《德国来信》的第二篇（见本卷第30—

- 34 页),《北极星报》(1850 年 2 月 2 日)写道:“《法国和德国的来信》无疑是《民主评论》这一期中最重要的材料。揭露欧洲暴君们的图谋和列举事实证明法德两国革命精神在发展,这就赋予这些信件以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国来信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写得过于简短。”——第 7 页。
- 11 恩格斯在谈到最近 12—15 个月法国农民情绪的变化时,对比了 1850 年冬季法国的形势和 1848 年 10 月至 11 月他在法国旅行时得到的关于法国农民敌视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561—564 页)。——第 7 页。
- 12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大地主交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这里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恩格斯在描写法德两国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时,尽量使用英国工人熟悉的概念。——第 7 页。
- 13 1848 年 3 月 16 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对土地所有者的四种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门窗税和特许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的法令。这种新税的重担主要落在小农的肩上。——第 7、55 页。
- 14 1849 年 12 月 13 日,为了使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教师离职,早在通过新教育法(见注 16)之前,教育部长帕里埃就曾向立法议会提出一项临时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教师受警察局长控制。这项法令于 1850 年 1 月 11 日通过。——第 8 页。
- 15 这些消息,恩格斯大概取自 1850 年 1 月 21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报道说:埃蒂耶纳·爱德华·法旺,共和主义者,曾参加山岳党,在加尔省于正统派议员让·巴蒂斯特·德·博恩死后举行的选举中得票 21668 张,保守派的格雷尔得票 12745 张,正统派的卢尔杜艾得票 9249 张。——第 9 页。
- 16 指国民教育改革法(所谓法卢法),此法令草案由教育部长法卢于 1849 年 6 月 18 日提出。这个由立法议会于 1850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法令肯定了天主教会和宗教机构对国民教育的统治地位。——第 9 页。
- 17 1850 年 1 月 20 日《总汇通报》第 20 号上曾发表一则消息说,立法议

会将于 1850 年 1 月 21 日审议关于把六月起义参加者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去的法令。——第 9 页。

- 18 1850 年 3 月 2 日《北极星报》在评介《民主评论》3 月这一期时，关于这篇文章和《德国来信》的第三篇文章（见本卷第 35—38 页）这样写道：“我们应该补充一点，《法国和德国的来信》包含着对神圣同盟及其工具——波拿巴总统的图谋的重要揭露。可能，这些来信是《民主评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些来信——至少是每个想了解大陆上各国人民和暴君的真实情况的人应该读一读。这一期所刊登的《来信》证明，伟大的事件已为期不远”。——第 10 页。
- 19 “自由之树”是 1848 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自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成为法国的传统，当时并由国民公会做了明文规定。1850 年 1 月，借口排除街道交通障碍，在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的命令下，砍倒了“自由之树”。当局采取这些行动，实质上是企图挑起人民的骚动。恩格斯提到的那幅画刊登在 1850 年 2 月 9 日《伦敦新闻画报》第 412 期上。——第 10 页。
- 20 指 1848 年二月革命二周年。——第 10 页。
- 21 1849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5 日，最高法院在凡尔赛开庭审理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参加者的案件，这次游行是山岳党议员为抗议违宪行为——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罗马的革命——而组织的。在七十六名被告当中，有二十九人是缺席审判的；审讯结果，十一人宣判无罪，三十六人被判处驱逐出境。——第 10 页。
- 22 1850 年 2 月 16 日法国立法议会中的这场辩论，恩格斯引自 1850 年 2 月 17 日《总汇通报》第 48 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第 12 页。
- 23 这篇文章从“真的，这样的人选是意义重大的”开始至本段末，1850 年 4 月 6 日《北极星报》在对《民主评论》4 月这一期的评介中曾以《卡诺、维达尔和德弗洛特当选》为标题加以引用。——第 13 页。
- 24 “现在瑞士根本不在话下”这句话，是《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这

两组文章出于一人之手的证据之一。关于神圣同盟打算开始对革命进军，恩格斯 1850 年 2 月 18 日曾在《德国来信》第三篇文章中写到过。其中有这样的话：“无疑，如果法国不发生意外事件，下个月就要开始对瑞士，或许还对土耳其的‘神圣’战争”（见本卷第 36 页）。——第 14 页。

- 25 也和上述情况一样，恩格斯的这句话证实《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关于革命迅速临近的思想，恩格斯曾在第三封法国来信中谈到；关于即将发生战争，关于神圣同盟打算在欧洲发动战争来窒息革命的看法，则在《德国来信》的第三篇文章中谈到。此外，就在这第三篇德国二月来信中，他还谈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专制政府企图为此目的在国外借债的问题。他写道，“俄国和普鲁士弄钱是为了打仗。奥地利则为了弄钱而不得不打仗！”（见本卷第 36 页）。在 3 月份的《法国来信》中，恩格斯回到自己以前的想法，得出结论说，“每一个国家单靠国内已不能把军队继续维持下去——要么把军队解散，要么叫他们靠敌人供养”。——第 15 页。
- 26 巴黎卫戍部队根据临时政府 1848 年 3 月 4 日的法令参加了选举，按照这一法令，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法国男子均有选举权。——第 15 页。
- 27 这个消息恩格斯可能不是从报纸得来的，因为 3 月 20 日和 21 日《总汇通报》上开列的提交立法议会于这几天讨论的法案只有一部分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那些法案相吻合。这一假定也为恩格斯下一篇文章的第一段所证实。——第 15 页。
- 28 1850 年 5 月 4 日《北极星报》刊载的对这一期《民主评论》的评介中说道，“本月的这篇《法国来信》特别有趣”。——第 15 页。
- 29 1850 年 4 月 4、5、18—22 日立法议会开会讨论了把工人逐出巴黎的法案。——第 17 页。
- 30 恩格斯讽刺地把巴黎商人亚历山大·勒克莱尔称作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他由于以国民自卫军的身分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镇压 1848 年六月起义而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第 17 页。
- 31 这封信看来不完全是恩格斯写的。它曾片断地发表在《民主评论》6 月

这一期上的哈尼《反革命分子的策略和纲领》一文中，作者对此加有下述按语：“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巴黎通讯员被捕；他的信比平常迟到了好几天，只是在本刊付印时才收到。因此我们只能在这里援引几小段。”——第 18 页。

- 32 恩格斯指的是 1850 年 5 月 22 日关于废除普选权这一法案的初步讨论结果。462 票赞成废除普选权，227 票反对。详见《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15—117 页，第 8 卷第 168—171 页）。——第 18 页。
- 33 暗示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共和国报》1850 年 5 月 17 日号召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平静的告人民书（1850 年 5 月 18 日《共和国报》），以及维克多·雨果在 1850 年 5 月 21 日立法会议上讨论修改选举法草案时的讲话（1850 年 5 月 22 日《总汇通报》第 142 号附刊一、二，第 1762—1763 页）。——第 19 页。
- 34 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阿尔伯、巴尔贝斯、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在法国工人中威信下降的情况，是德朗克（1850 年 2 月 21 日和 5 月初）从巴黎写信告诉恩格斯的。——第 20 页。
- 35 立法议会讨论财政部长富尔德 1850 年 6 月 4 日提交议会的、关于增加总统的年俸的提案时，成立了一个由十五人（巴武、克雷通、沙波、福图尔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6 月 14 日否决了这个提案。——第 21 页。
- 36 指一个叫做丹尼尔·博尔姆的小册子：小博尔姆。《帷幕拉开。5 月 15 日案件的前被告小博尔姆先生献给农民、勤劳的工人和正直的公民的一盏反映 1848 年 2 月 24 日、5 月 15 日和 6 月 24 日的政治阴谋的明亮的魔灯》[巴黎]的内容提要，拉孔布夫人刊印〔1850〕，四开本，共 2 页（Borme fils . Le Rideau est levé . Grande lanterne magique des pâtisseries politiques des 24 février , 15 mai et 24 juin 1848 , dédiée aux paysans , aux ouvriers laborieux et aux honnêtes gens , par M . Borme fils , ex - accusé du 15 mai . [Paris] , impr . de M me de Lacombe

[1850] in 4°, 2 p.). 内容提要中谈到博尔姆在 1848 年 3—5 月参与组织保皇党人的发动, 还参与了布尔日的审判案。

布尔日审判案在 1849 年 3 月 7 日—4 月 3 日举行, 审讯的对象是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的巴黎工人(见注 81)。审讯结果, 巴尔贝斯被判处无期徒刑, 布朗基被判单独监禁十年, 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分别被判不同期限的徒刑和殖民地流放。——第 23 页。

- 37 指《泰晤士报》企图利用博尔姆在控告该报的案件(即 1848 年 2—6 月前巴黎警察局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西迪耶尔控告这家报纸发表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 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 义勇军》1850 年巴黎版的片断以诬蔑巴黎警察的案件)中充当证人。(A. Chénu. Des Conspir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ossidière; les corps francs. Paris, 1850)。1850 年 6 月 11 日, 《共和国报》发表了博尔姆的一封信, 其中抗议《泰晤士报》企图利用他作为这个案件的辩护证人。博尔姆的信在 1850 年 7 月 6 日伦敦《红色共和党人》第 3 期(第 1 卷)上也转载了。——第 23 页。
- 38 立法议会拨给路易·拿破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 而不给他的年俸增加三百万法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0 页)。——第 23 页。
- 39 指 1850 年 7 月 16 日立法议会通过的关于报纸交纳保证金和对定期和不定期刊物征收印花税的决定。——第 23 页。
- 40 指《国民议会的逐渐削弱》(《Affaiblissement graduel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一文, 发表在 1850 年 7 月 15 日的波拿巴派《权力报》上。根据 1822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法律第十五条, 该报因诋毁上下两院而被处以罚金。——第 27 页。
- 41 恩格斯在《民主评论》上以《德国来信》为标题(见注 1)总共发表了四篇文章; 头三篇因为相互提到, 在本卷中用《德国来信》作总标题编在一起; 第四封信写得比较晚, 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前三封信, 所以按照它在《民主评论》上标的日期单编(见本卷第 64—67 页)。——第 28 页。
- 42 这个名词是按照宪章派报刊上常见的说法(《profitmongers》), 《money

- mongers)》类推出来的,恩格斯在这里是第一次使用它;在《法国来信》中,他用这个词指“秩序党”的拥护者(见注7)。——第28页。
- 43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它在5月30日迁到斯图加特开会,1849年6月18日被维尔腾堡当局解散。——第28页。
- 44 临时协议(Interim)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49年9月签订的关于在德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成立了普鲁士奥地利联合委员会。——第28页。
- 45 杂志编辑部在此处加了一个按语:“收到这封信以后,摄政王辞职并把他的权力(?)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的消息就传到了英国。这样就结束了这场法兰克福丑剧。《民主评论》编辑部”。这个按语大概是恩格斯本人写的。——第29页。
- 46 这个摄政政府是1849年6月7日选出的,由五人组成(拉沃、福格特、西蒙、许列尔、贝歇尔);革命失败后,他们流亡瑞士。——第29页。
- 47 “三王联盟”是1849年5月26日在柏林缔结的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之间的协议,是普鲁士王朝力图夺取德国领导权的尝试。这个协议规定要按照普鲁士王朝的利益修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甚至选出了议会,它在1850年3月20日在爱尔福特举行了会议。这个联盟之所以被叫作有限的“联邦国家”,首先是因为中央权力的有限性。奥地利和其它许多德意志国家(巴伐利亚等等)一开始就没有加入联盟,因此“三王联盟”在当时的著述中有时被称为普鲁士的宗得崩德(见注65)。1850年11月普鲁士在俄国和奥地利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这个联盟。——第29页。
- 48 暗指1849年5月28日普鲁士政府号召各德意志国家政府加入“三王联盟”。这个号召和新的帝国宪法草案一起发表在1849年5月底至6月初的德国报刊上。——第29页。
- 49 “四位国王”的原文是用大写字母开头,甚至从这种用法中也可看出恩格斯对德国各种中央政权机构妄想实现国家统一的讽刺。——第29页。

- 50 指尼古拉一世，他娶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妹妹夏绿蒂公主（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第 30 页。
- 51 恩格斯指的是陪审法庭 1849 年 12 月在柏林和科尼斯堡宣布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领导人贝·瓦尔德克和约·雅科比无罪，这两个人曾由于拒绝按照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离开法兰克福议会而被控以叛国罪。——第 30 页。
- 52 奥伦治会会员是奥伦治会的成员，奥伦治会是 1795 年在爱尔兰成立的一个新教恐怖组织，它被当局、信奉新教的大地主和教士利用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它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镇压 1688—1689 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这个组织在居民主要是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奥尔斯脱影响特别大。——第 30 页。
- 53 从 1615 年起，德意志帝国的邮政事业，除普鲁士和其它几个邦以外，是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家族的世袭权利，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个权利在好些地方丧失了。1815 年首先在德国南部签订了图尔恩-塔克西斯和几个邦之间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邮务特权被交还给了图尔恩-塔克西斯家族，或是作为封地权，或是由这个家族每年缴税。在维尔腾堡，邮政的领导权在 1819 年重新回到图尔恩-塔克西斯的手中，图尔恩-塔克西斯每年上缴七万盾。1849 年底临时协议（见注 44）废除了已制定出来的把邮政转给维尔腾堡政府的条约。只是在 1851 年邮政才重新交给图尔恩-塔克西斯，赎金是一百五十万盾。——第 31 页。
- 54 指 1849 年 3 月 4 日的奥地利宪法以及奥地利帝国内一些德国小邦根据这个宪法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并未实行。——第 32 页。
- 55 恩格斯经历的这件事至今无人知道，但是恩格斯在这场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在 1846 年写的《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中有所发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6 页）。——第 32 页。
- 56 恩格斯指的是科布顿 1850 年 1 月 18 日在主教门大街伦敦酒馆一次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这次集会是为讨论俄国建造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

- 铁路要求借债五百五十万镑而举行的。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和科布顿的演说发表在 1850 年 1 月 19 日的《泰晤士报》上。——第 32 页。
- 57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的同时，发表了钦定宪法。根据这个宪法，普鲁士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借助年龄和财产的资格限制变成了一个特权的“贵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被允许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第 33 页。
- 58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9 年 4 月解散了第二议院，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这个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各阶层代表权不平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每个阶级不论其选民人数多寡，都推出同样数量的选举人。国王用这种办法，得以选出一个俯首听命的众议院多数，这个议院在 1849 年 8 月 7 日开会时，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第 33 页。
- 59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50 年 1 月 7 日的信件，其中包括他对 1849 年 8 月 7 日宪法（见注 58）的修改意见。这封信发表在 1850 年 1 月 11 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第 9 号上。——第 33 页。
- 60 明星院（英文是 Court of Star Chamber）是十五——十七世纪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设在韦斯明斯特的皇宫里的会议大厅，因天花板用繁星作为装饰而得名）。——第 33 页。
- 61 这个案件是 1850 年 1 月 17—19 日在科伦审理的。——第 34 页。
- 62 普鲁士的新宪法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通过；对该宪法的评论，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54、264—265 页）。以下是恩格斯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50 年 2 月 6 日就通过这个宪法一事对国会两个议院作的演讲的讽刺。——第 35、68 页。
- 63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7 年 4 月 11 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会时发表的御前演说。——第 35 页。

- 64 由于 1848 年 2 月 29 日的资产阶级革命,原来对普鲁士保持附属关系的瑞士纽沙特尔公国(关于这些关系的历史,见注 342)宣布成立共和国。关于 1848 年在纽沙特尔发生的事件,见恩格斯的《昔日的公国》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7—8 页)。——第 37 页。
- 65 宗得崩德——瑞士七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天主教州在 1843 年组织的单独联盟,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军队在进攻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的其它几个州时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 37、479 页。
- 66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启事》是因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1 期的出版脱期了。这期的材料于 1850 年 2 月初才寄往汉堡。《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1 期到 2 月 28 日已准备就绪,3 月 8 日在汉堡出版,第 2 期于 1850 年 3 月 25 日左右出版。——第 41 页。
- 67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 2 期发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二章《1849 年 6 月 13 日》;《启事》中所说的第三章——《六月十三日对大陆的影响》以《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为标题载于《评论》第 3 期;马克思把第四章的和第三章的一部分构思写进了杂志的其他材料里,包括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第 41 页。
- 68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章以《为共和国捐躯》为标题,发表在 1850 年 4 月 11 日左右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3 期上。——第 41 页。
- 69 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96。——第 41 页。
- 70 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关于普鲁士的财政状况一文本应由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来写,他 1850 年 2 月 10 日在答复马克思 2 月 7 日的信时答应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后来贝尔根罗特被驱逐出柏林,使这项计划未能实现,贝尔根罗特在 1850 年 3 月 9 日的信中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恩格斯。——第 41 页。

- 71 编辑部在《启事》末尾作了如下说明：“《新莱茵报》每月出版一期，每期篇幅不少于五印张。预订每季为二十五银格罗申，零售每本为十银格罗申。责任出版者为康·施拉姆。”——第41页。
- 72 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革命的两年。1848和1849》是为该著作第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38页，并见本卷注1和注67）写的简介。这篇简介载于1850年4—6月《民主评论》，里面讲述了《新莱茵报》出版的情况和该报编辑们的遭遇，对马克思这一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且还补充了新的事实以及恩格斯自己对法国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在这篇简介里，恩格斯大量摘引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尽量使这些摘引的段落为英国读者所易于理解。马克思原著和恩格斯的简介之间文字上主要的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注明了。——第42页。
- 73 在《新莱茵报》被封闭以后，马克思于1849年6月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到达巴黎，并立即同法国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秘密工人组织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除他之外，在巴黎还有三个《新莱茵报》的编辑——格·维尔特、斐·沃尔弗和恩·德朗克，这三个人都参与了六月十三日事件。——第42页。
- 74 指的是恩格斯自己。他作为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经历了四个战役。起义失败后维利希的部队是最后离开德国国土的，恩格斯随同这支部队于1849年7月12日进入瑞士境内。《新莱茵报》的排字工人以及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都参加了革命军作战，其中包括在战斗中牺牲的约瑟夫·莫尔。——第42页。
- 75 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的时候关于这件事加注解如下：“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帕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的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所有这三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三年徒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3页）——第44页。
- 76 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

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这次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第44页。

- 77 乔治·赫德逊(1800—1871)——英国大企业主，有“铁路大王”之称。

罗伯尔·马凯尔——法国著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塑造的和奥诺莱·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45页。

- 78 1846年2月，在波兰全境曾酝酿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但是由于小贵族们背叛和起义领袖们被普鲁士警察逮捕，只有克拉科夫一个地方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国民政府，并由国民政府发来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1846年3月初起义被镇压。11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对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破坏，但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加以反对。

宗得崩德——见注65。在1847年十一月事件时期，基佐实际上采取了企图干涉瑞士事务和支持宗得崩德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立场。

1848年1月12日，巴勒摩（在西西里岛）爆发了起义，此事成为全意大利革命开始的信号。——第46页。

- 79 1847年春，在安德尔省的比桑歇，饥饿的工人和住在四郊的农民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1847年4月16日，起义者有四人被处死刑，多人被判服苦役。——第46页。

- 80 恩格斯在写简介时所根据的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最后定本而是初稿，因为这一段所摘引的同《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最后定本不完全一致（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22页)。——第51页。
- 81 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要求实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的诺言。这次行动被镇压下去了,起义的领导者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被捕(见注36)。——第61页。
- 82 编辑部在本文末尾注有“待续”字样,但后来未付诸实现。——第63页。
- 83 指1848年的二月革命。——第64页。
- 84 恩格斯谈的是1848年8月9—30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案。此案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政府为镇压民主派而制造的。审判的借口是由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在1848年3月29日同里斯康土小村附近的比利时部队发生冲突。恩格斯曾就此事在《新莱茵报》上写了一篇专题文章《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47—450页)——第64页。
- 85 所谓海峡税是指1425年到1857年丹麦向经过松德海峡的外国船只所征收的税。——第65、456页。
- 88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和丹麦在1767年秘密签订的并由1773年的条约确认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未来的俄国皇帝)把他从彼得三世那里继承来的对哥托尔普公国的权利转让给丹麦,以换取德国北部的奥登堡和德曼霍斯特这两个伯爵领地。由于哥托尔普公国的合并,整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都为丹麦所占有。丹麦在北方战争(1700—1720)中也站在俄国一边,在1788—1790年的俄国—瑞典战争中,它也根据“武装中立”条约(见注534)成为俄国的同盟国。——第65页。
- 87 从1460年起,丹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之间实现了君合国。丹麦国王在他在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当选时应该宣誓,这两个公国应该“永远”留在一个统一体内。在这两个公国内,王位只能由男系继承,而在丹麦,从1665年起也允许女系继承王位。——第66页。

- 88 维登布鲁赫的照会载于 1848 年 6 月 18 日《总汇报》第 170 号的附刊上。关于这个照会也可参看马克思的《新年贺词》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187 页）。——第 66 页。
- 89 弗雷德里西亚会战发生在 1849 年 7 月 6 日。——第 66 页。
- 90 普鲁士和丹麦在 1850 年 7 月 2 日签订了和约。——第 66 页。
- 91 《国际述评（三）》的有关德国一节的草稿，是马克思大概在 1850 年 10 月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92—540 页）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 1850 年 11 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上。除《述评》中详细阐述的那些思想外，草稿中还有一些论点在发表的文章里没有反映出来。——第 68 页。
- 92 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国和黑森-加塞尔选侯国（黑森选侯国）1849 年同意参加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见注 47），1850 年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退出联邦，并转向奥地利。——第 68 页。
- 93 农民获得革命的果实是指 1848 年 8 月 31 日奥地利议会废除奥地利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关于这点，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9—40 页）。
- 对银行的保护政策是指一系列把奥地利国民银行置于国家保护下的政府措施：1848 年 5 月 22 日的内阁命令允许银行限制银行券兑换硬币并规定银行券的官定行市；1849 年初在银行协助下开始发行国家纸币；1849 年 12 月 6 日国家和银行之间达成调整相互要求的协议，等等。——第 68 页。
- 94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为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而于 1849 年 9 月 18 日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卡尔·马克思、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卡尔·布林德、安东·菲斯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96 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 12 月 3 日加入委员会。当马克思、鲍威尔、普芬德和恩格斯退出委员会时，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所有的账簿和收据，看到一切手续完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 9 月 18 日签署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 1850 年 9 月 27 日《德意志伦敦

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28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3—624页)。

草稿由恩格斯亲笔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并经马克思校正过。——第69、635、643页。

- 95 这篇草稿曾打算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普芬德和亨·鲍威尔的名义发表,它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2月底在伦敦见面时写的,其起因可能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1850年9月)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后,维利希-沙佩尔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集团的代表妄图控告他们盗用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钱款(关于这一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673—674页注159中的卡·普芬德1852年1月21日的声明)。但是这篇草稿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年后,即恩格斯1851年12月20日到1852年1月3日逗留伦敦期间写的,并成为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13页)。后一个声明的原文未找到,然而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有威·皮佩尔1852年1月转抄的以普芬德和鲍威尔的名义草拟的文件,它同本卷发表的草稿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第69页。
- 96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的领导作用转到同盟的各地方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69、651页。
- 97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于1850年12月和1851年3—4月所写的四本手稿,是专门论述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侨居伦敦,着手进行新的一系列经济学研究,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批判研究。马克思在1851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46页)。1844—1845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就已写了1835年

让·巴·萨伊所出版的李嘉图该著作法译本的提要。在五十年代初,马克思仔细研究了1821年即李嘉图逝世前两年英国出版的第三版(生前最后一版)。

发表的手稿包含在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本中,这些摘录来自各不同作者的著作、官方文件、期刊,主要是关于经济问题的。这些笔记本有许多被保存下来了,马克思还把其中的二十四本用罗马数字编了号。在第九本笔记本中有李嘉图著作的摘录,是专门论述李嘉图的货币原理的。在第十本中有李嘉图整个著作的详细提要。最后,在个别的摘录笔记本中,有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土地税观点的评注,以及李嘉图著作的名目索引草稿。

马克思所作的李嘉图著作的摘要,或者是用直接引文的形式(常常是自己翻译为德文,再加上英文的词和整个句子),或者是用叙述李嘉图的意思的形式。如果马克思所作的某一引文是缩写的或者是用自己的话改写的,那么,在本版中,该引文的译文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有引文都放在引号内,即使手稿中有些引文没有引号。

编者所加的标题用星花号标明,而正文中必要的补充则加在方括号内。马克思手稿笔记本的号码在方括号内用罗马数字表示,手稿的页码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在把正文译为俄文时,纠正了手稿中明显的笔误,同时,一切比较重要的纠正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中,也指出了手稿正文同李嘉图著作正文有重大偏离的地方。

马克思自己对他所作摘录和提要的评论,以及他所加的标题和小标题,都用大号铅字刊印,正文的其余部分则用小号铅字刊印。——第72页。

98 下面所引马克思的摘录是关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的。这些摘录在摘录本的最后几页上,在本子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着:“第九本。伦敦。1850年11月。1850年12月。”——第73页。

99 这个标题照用了李嘉图著作第1章第7节标题的开头部分。——第74页。

100 指的是用纸币代替黄金,以保护黄金在流通中免受磨损。——第84页。

- 101 这些笔记以及接在它们后面所发表的名目索引草稿，都在开本不大的笔记本中，恩格斯在该笔记本上标明 1851 年字样。可以认为，它们大约写于 1851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是李嘉图著作第 9—12 章中所形成的一些结论的概括。——第 87 页。
- 102 马克思在这里称为“名义地租”的，是指在李嘉图著作（见他的著作的第 10 章）中“土地所有者为使用他花在农场上的资本而取得的报酬”。李嘉图把它与他所说的实际地租，即“为使用土地，而且只是使用土地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金额”区别开来。——第 87 页。
- 103 马克思把这种税称为“特别赋税”(originelle)，因为它既不同于地租税，也不同于什一税。——第 87 页。
- 104 下面发表的索引草稿的每一行都逐一被划掉了，这证明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李嘉图著作时曾利用过它。——第 88 页。
- 105 索引草稿的一部分包含在封面上，这里用数字 [a] 标明。——第 88 页。
- 106 在这里和以后（在下面发表的李嘉图著作的概要中），马克思跟着李嘉图有时也不用“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 这一术语，而用意义相同的术语“实际价格”(real price)。另一方面，李嘉图始终一贯地把“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primary and natural price) 同“实际的或市场的价格”(actual or market price) 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第 89 页。
- 107 包含着大量马克思的评论的李嘉图著作概要，是马克思于 1851 年 4 月在笔记本第 本上抄录摘记过程中编成的。它包括李嘉图著作的所有主要篇章，但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在作有关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摘记时所利用过的篇章。——第 90 页。
- 108 这一句是李嘉图著作第 1 章第 4 节的标题。——第 91 页。
- 109 马克思在这里所借用的李嘉图的例子中，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在第一年年底，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就已在 10000 镑预付资本上获得 1000 镑利润。因此，商品的价值在第一年年底不是 5500 镑，而是 6000 镑（机器的磨损不计算在内）。在 1000 镑利润中，500 镑用于个人需要，500 镑加到预付资本上，资本现在就是 10500 镑。在这总额中，花在劳动上的仍然是

- 5000镑而花在机器上的是5500镑。——第92页。
- 110 在提高工资以前，第一个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商品得5000 + 500，即5500镑。在提高工资10%，即从2000提高到2200镑以后，他出售自己的商品得5200 + 520，即5720镑。——第93页。
- 111 指的是流动资本占优势时的场合。——第94页。
- 112 在第21页末尾，马克思亲笔写着：“（下接第29页）”。在第22—28页上有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hree volumes . Dublin, 1770.）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29页开头，马克思亲笔写着：“李嘉图，大卫。上接第21页”。——第96页。
- 113 在李嘉图著作中，这句话说的不是赋税，而是建筑物等等的费用。——第100页。
- 114 指的是这样一些农业上的改良，其结果是农业中所生产的产品量增加。——第103页。
- 115 这段引文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104页。
- 116 指的是1815年结束的欧洲列强同盟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107页。
- 117 这里指的是李嘉图所理解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实质上说的是商品价值。——第115页。
- 118 在李嘉图著作中这里是“购买1000镑的英国货物后”，但这并不改变句子的意思。李嘉图最初说商人向工厂主购买商品，而马克思立即说在国外出售这种商品。——第116页。
- 119 在第41—42页上有上面提到过的（见注112）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40页末尾，马克思亲笔写着：“下接第43页”。在第43页的开头注明：“李嘉图，大卫《政治经济学原理》。上接第40页”。——第119页。
- 120 李嘉图在这里引证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卷第

- 6章的开头(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74年中文版第2卷第116页)。——第121页。
- 121 这一引文的最后一句,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123页。
- 122 这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123页。
- 123 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128页。
- 124 在第49页的末尾,马克思亲笔注明:“(下接第53页)”。与此相应,第53页开头就注明:“大·李嘉图(上接第49页)”。第50—52页上,有十七世纪初安东尼奥·塞拉关于货币的论文的摘录,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著作的摘录的接续部分。——第133页。
- 125 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133页。
- 126 马克思在这里叙述的李嘉图的原理说:“萨伊先生举法国大革命前的盐税为例,他说,这种盐税使食盐生产减少一半。但是,如果食盐的消费减少,用来生产食盐的资本也会减少。因此,虽然生产者在食盐生产上获得的利润减少,但在其他商品的生产上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第273页)。——第134页。
- 127 在第53页末尾注明:“(下接第56页)”。在第54—55页上,有詹姆斯·斯图亚特上述著作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56页的开头注明:“大·李嘉图(上接第53页)”。——第135页。
- 128 李嘉图的根据是:不支付地租的那块土地的产品总价值是720镑,它决定所有其他土地的产品总价值(扣除地租)。——第135页。
- 129 是指威克菲尔德为1835—1839年出版的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文版所加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205—206页)。——第139页。
- 130 马克思在页边把他的这整个评注用线划出。——第141页。
- 131 李嘉图在第26章一开头就引证了亚·斯密的相应的论点来证明,与纯收入相比,斯密过分夸大了总收入的作用。——第145页。
- 132 李嘉图把只影响一些部门的利润而并不影响另一些部门的利润的赋

税，称为“局部的”赋税。——第152页。

- 133 手稿的下一页即第66页的开头标有“1851年5月”字样。其后是《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的摘录。——第153页。
- 134 马克思的《反思》写在第 笔记本的第48—52页，第 笔记本主要是就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问题从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做的摘录。这个笔记本是马克思大约在1851年3月写完的，因此，《反思》的理论水平反映了该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这个时期是进一步积累大量的实际材料——具体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材料——并从具体研究资产阶级经济过渡到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职能的纵深结构的进一步概括的时期。《反思》在较高水平上继续了四十年代开始的对小资产阶级的——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观念的批判，这些观念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缺陷来解释经济危机，企图人为地构想货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是在1857—1858年手稿和以这一时期他所制定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中完成的。——第154页。
- 135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2卷第292—293页；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36页；《调查金条价格高昂原因的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1810年6月8日下院决定刊印》1810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的摘录包含在第 笔记本的第29—31页中。
- 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分册第111、255—258页；第25卷第500—504页）中对斯密和图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评论。马克思在引用斯密的话时，转述了斯密著作的法文本译者热·加尔涅的说明：“dealers是指‘全体商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等等，一句话，是指一国工商业的全体当事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11页）。——第154页。
- 136 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和1861—1863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394—397页；第26卷第2册第602—611页）中

-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问题的辩论,特别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作了详细评论。——第154页。
- 137 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413—424页)中对蒲鲁东的简单化的观点作了批判,蒲鲁东把生产过剩的原因解释为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不能赎回自己的产品。——第155页。
- 138 马克思对北明翰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建立的北明翰派的代表“小先令派”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395—396页;中文版第13卷第71—73页;第23卷第260—261页;第25卷第610—611、634—635页。——第159页。
- 139 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159页。
- 140 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菜比锡版第35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61—466页)中对施蒂纳关于货币性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作了批判。——第160页。
- 141 如果马克思所举的事实是正确的,那么阿德里安皇帝是重复了韦斯帕西安皇帝就他征收厕所税一事所作的一句回答。——第162页。
- 142 弗·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 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一书的批判分析》是对蒲鲁东1851年出版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关于革命实践和工业实践的论文选)》一书的评介。这篇评介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他计划写的《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皮·约·蒲鲁东的 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一文而作的。马克思原打算把这篇文章发表在约·魏德迈的杂志《革命》上。对蒲鲁东这本书的讨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8月的通信中占了很大的篇幅。马克思在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书的内容,同时做了大段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16—322页),8月中,把书寄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处,请他对此书发表详细的评论。恩格斯的这篇评介分两次写成,一次是在8月(大约从16日到21日),一次是从10月中开始。10月底全部材料

寄给了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94页)

恩格斯的手稿共有六大张,每一张都是分两栏写的,左上角或右上角注有“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字样。本卷发表时将这些字样删除。手稿是用两种文字写的。蒲鲁东的话用小号字排印,法文原文摘录放在括弧内,恩格斯用德文转述的蒲鲁东的话不加括弧。恩格斯本人的话用大号字排印,而其中强调的地方用黑体排印。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中,一般黑体字是蒲鲁东加的,黑体加着重号是恩格斯强调的话。——第164页。

143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165页。

144 1793年1月21日,根据国民公会的判决,路易十六被处死。——第165页。

145 蒲鲁东指1822年对企图在翁热、罗舍尔、索缪尔等地发动反王朝起义的共和派团体的成员(包括烧炭党人)的一系列诉讼案。

关于1839年起义,见注76。——第165页。

146 新的选举法实际上在法国废除了普选权,它是立法会议在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见本卷第18—19页)。——第166页。

147 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总统任期届满。按照1848年法国宪法,新总统的选举应当每四年在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166页。

148 蒲鲁东在这里和下面使用“le préjugé gouvernemental”〔“政府偏见”〕、“l’idée gouvernementale”〔“政府观念”〕、“le système gouvernemental”〔“政府制度”〕、“l’évolution gouvernementale”〔“政府进化”〕等术语是用来表示政治管理制度的各个方面,他把这种制度同他所设想的经济制度、“经济力量的组织”对立起来。——第167页。

149 按照甚至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都没有能够消灭的传统,巴黎的肉类买卖掌握在肉商同业公会手里。他们维持牲畜的低价和肉类的高价。蒲鲁

- 东说的“自由出售肉类”是指政府从1848年起为了消灭肉商同业公会的垄断而采取的措施，即允许不属于这个同业公会的人每天在市场上出售肉类等等。——第169页。
- 150 在蒲鲁东的著作中对这一概念的内容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寄生性消费 [le parasitisme]——这就是金融界、不法财产、预算和与此相伴随的一切东西”（蒲鲁东，第52页）。——第169页。
- 151 指1789年8月4—11日制宪会议通过的决议。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决议中宣布废除等级特权和农民的一切形式的人身依附。——第172页。
- 152 指鲁瓦埃-科拉尔1822年1月22日在下院关于出版法草案的辩论中的发言。——第172页。
- 153 独立审判所是指法国革命前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第172页。
- 154 指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于1814年7月4日以路易十八的名义“恩赐”给法国人民的宪法。——第173、420页。
- 155 蒲鲁东进一步解释了他的思想，他说：“这个原则也是所谓屠宰牲畜的联合的本质，这种原则则联合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许多这种屠宰牲畜的 [联合会] 里，工作是由雇佣工人在代表投资者的经理的控制下进行的”（蒲鲁东，第98页）。——第176页。
- 156 恩格斯讽刺蒲鲁东的下面这样一个注解：“互惠同交换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越来越力图成为交换规律并与交换同时并存。在《信贷和流通的组织》（1848年巴黎加尔涅兄弟公司版）小册子里第一次对这一规律作了科学的分析，而《人民银行》第一次对这一规律的运用作了尝试”（蒲鲁东，第97—98页）。——第177页。
- 157 指路易·勃朗1849年12月15日在他的《新世界》杂志第6期上发表的《一个人和一个主义》一文中的话。——第177页。
- 158 伙伴社 (compagnies ouvrières, compagnonnages) —— 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手工业帮工的秘密联盟。最初其宗旨是一个行业中的帮工互助，从十六世纪起，它变为帮工为反对师傅的剥削而进行斗争的

- 组织。在正文里，“compagnies ouvrières”在后面都译为“工人协会”。——第178页。
- 159 指法的历史学派——十八世纪末在德国法学和历史学中产生的一个反对启蒙思想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动流派（雨果、萨维尼、艾希霍恩）。这一学派的特征，见马克思的文章《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106页和第454页）。——第180页。
- 160 指从1848年5月4日召开的制宪国民议会和1849年5月28日代替它的立宪国民议会。1848年12月10日经过全民投票，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第180页。
- 161 指1793年6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的雅各宾宪法。宪法宣布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立法倡议自由、出版自由、请愿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反抗压迫权。这个宪法在全民投票时得到法国人民多数的赞同，但没有实行。——第181页。
- 162 蒲鲁东用概念“以前的革命”（“l'ancienne révolution”）来代表纯政治革命。他用自己的社会革命公式来对抗这种革命（蒲鲁东，第196页）。——第182页。
- 163 指1800年在波拿巴的庇护下由股份公司建立的法兰西银行，其资本为3千万法郎（蒲鲁东著作中误为：9千万法郎）。银行从国家方面得到许多特权，但继续被认为是公司的财产。从1834年到1857年，银行的总经理是阿尔古伯爵，在他任职期间，银行取得了许多新的特权，其中包括发行面额较小的银行券的垄断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新的特权使银行变成了“全国规模的私人企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42页）。——第182页。
- 164 马克思1851年8月8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蒲鲁东的著作作了评述，写道：“国家用付给年金的办法代替利息，即公年偿还它所借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18页）。——第183页。
- 165 根据1790年1月15日制宪议会通过的法律，在法国实行新的行政建制。

国家分为八十三个省，省又分为州和公社。——第184页。

- 166 蒲鲁东在这里使用的术语“plus- value”同当时法国人们所理解的含义不同；参看恩格斯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除了西斯蒙第使用的重 mieux- value〔剩余价值〕一词而外，plus- value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远的时代起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63页）。——第186页。
- 167 蒲鲁东认为其中包括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勃朗、宪章派（蒲鲁东，第238页）。——第187页。
- 168 在同一页上，恩格斯接着用拉丁字母拼写了亚·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三节俄文诗。——第196页。
- 169 这篇手稿是卡·马克思给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匈牙利将军乔治（格奥尔格）·克拉普卡的《政治纲领》写的前言和跋。马克思对这个文件感到兴趣，是因为它说明了匈牙利流亡者的内部分歧和流亡者中有些人对科苏特的独裁作风的不满。此外，引起马克思注意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流亡者深受亲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影响。从马克思1852年5月10日给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打算把自己的评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24页），因为他对克拉普卡打算参加科苏特和马志尼的拥护者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准备的反奥地利统治的武装暴动感到不安。马克思认为，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在大陆上组织革命暴动的尝试，只能有利于胜利了的反动派，特别是有利于第二帝国的制度。马克思的这种想法未能实现，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马克思1852年9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两篇文章，表示反对这种危险的倾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12—415页、443—444页）。——第197页。
- 170 卡·马克思关于美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查理·凯里的观点的这篇短评，摘自1853年9月发表在纽约工人报纸《改革报》上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阿道夫·克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克路斯的文章批判了新旧大陆上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思想混乱,批判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并阐述了以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克路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1853年间写给他本人和魏德迈的信。1853年9月11日他给马克思写信说,虽然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但是文章是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与克路斯本人的文章不同之处首先是,与后者相反,马克思详细叙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它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总体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与此有关的以最大经济学家亨·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思想的特点。克路斯把马克思信中的有关片断全部收入他的文章,为了行文连贯只在文字上作了极有限的修改和补充(这些都在注释中注明)。这一点从下面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说明:这些片断的内容同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凯里观点的论述近似,而且有时简直是一模一样。马克思在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克路斯的这一著作作了肯定的评价,并直接指出:“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69—270、302、508页)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马克思和克路斯还继续通信谈这些问题。——第200页。

- 171 克路斯在这句话的前面写了这么一段话:“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 [Sozialen] 所直接反对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理论,被当作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最新发现,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协调’而献给轻信的公众(不过,从《新英格兰报》的长时间呼救以及传闻看来,提出对公众的设想为时尚早)。我们看到,凡是在过尚词藻的高度协调敢于干涉实际生活的地方,它都作为准备效劳的工具服务于最高当局。看来《新英格兰报》编辑部还没有因研究象政治经济学论文这种麻烦的物质属性的论文而玷污自己贞洁的思想方式。我们每天都看到,编辑部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只配抛进垃圾堆。上面

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在1849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上进行论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判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得这种仅仅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

克路斯1853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也证实这段话是他写的。克路斯对巴师夏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这里首先指1850年巴师夏同蒲鲁东的论战)的看法与马克思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页;第26卷第3册第581页;第27卷第393—394页)不同。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爱德华·施累格在波士顿用德语出版的民主派报纸;1852年创刊。给该报撰稿的有阿·卢格、阿·戈克、卡·海因岑以及其他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报纸有个时期还刊载过约·魏德迈的文章。——第200页。

- 172 后来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从威兰德的这部书中作了相当详细的摘录,记在他的1859—1862年笔记本里。——第200页。
- 173 克路斯接下去添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把学说的基本原则简略地归纳一下。这些原则巴师夏在他的《社会和谐》中叙述得生动而又明白易懂,但是凯里在宣传中却毫无叙述天才,缺乏确切地概括的才能。亨·查·凯里无法否定某些有益的学识、甚至独创的优异思想。”马克思对凯里和巴师夏的比较性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4、5、8—9、201—202页。——第200页。
- 174 这里利用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泰·佩舍和卡·格普的著作《新罗马。世界合众国》的名称。该书于1853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200页。
- 175 克路斯显然改动了这句话。他1853年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克路斯从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采用了这些思想,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凯里“拚命驳斥他们 [欧洲的经济学家——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萨伊等人。——编者注],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

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08—509页)。——第201页。

176 指凯里的书《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纽约版,第194—210、213—220、228、230页及其他各页。——第201页。

177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凯里的书《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同年在伦敦出版铅印版。凯里在这本书里(第203—204页)引用了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3—574页)。马克思由于凯里把书寄给了他,才读到了这本书,并且在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该书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主要论点在这篇草稿里都重复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69—270页)。

克路斯接下去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加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他知道了德国的黄口小儿认为大资本的威力象雪崩一样的骤然增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散精神和个体精神的雪团,他会非常吃惊”。——第201页。

178 克路斯接下去写了这么一段话:“因为甚至凯里学派也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求颓废的国家活动家和《新英格兰报》初出茅庐的国家经济学家对此哪怕有一般的理解,那当然是完全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整个身子淹没在资产阶级粪坑里,远远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已背熟的那个流派的历史意义。”——第202页。

179 克路斯接下去为批判凯里及其追随者写了这么一段话:“当然,所有这些事实,对于‘清醒地惧怕棍棒和智慧低下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某家保守的杂志中吸取了高见,似乎今天拉弗尔的女工挣的钱比三十年前多两倍。根据这一高见,那时的女工每周只有四天半能吃上饭,最多也只有用遮羞布遮挡自己裸露的身体。一个只是最近三十年才出现的城市,有二百个勉强过着枯燥而平静生活的居民,现在发展成了工业城,居民有三万六千人;今天这些居民

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女工(拉弗尔的居民八分之五是女人,只有八分之三是男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她们靠每周三美元的平均工资勉强度日,也就是说,她们的工资围绕这个平均价格上下波动,顺利的时候能够往储蓄银行存上一分尼,当生意完全停顿,或者工作日缩减一半时,再把这一分尼花掉;这些女工的大部分不是由于民主法令,而是由于环境所迫而注定过着独身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允许猎取职位的‘民主主义’候选人看的,即使他们能够看到也不准许看。

当然,在美国这里,我们不能否定有‘个人的机会平等,有的人(即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人)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黄金狂热相当长期地起着罗马民主委员的作用,而机会的平等已在新奥尔良显示出来。但是后生先生,平等的机会是资产阶级视野之外的东西,只有那位知道现代工人全部问题的改革家[卡·马克思。——编者注],才能不囿于任何偏见而以比较宽阔的眼光来掌握它。”——第203页。

- 180 马克思的供《改革报》发表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是克路斯用马克思寄给他的关于乌尔卡尔特的评论编写成的,这可以从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看出。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的观点主要是针对戴·乌尔卡尔特的书《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的第一段显然是克路斯写的,或者是由他改写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曾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注566。——第204页。
- 181 从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是指琼斯的文章。——第204页。
- 182 马克思的1850—1854年笔记中有关于本文寄往纽约的如下记载:“3月31日星期五。其他事项:所得税,培恩斯先生、华盛顿·威尔克斯,普雷斯顿”。文章发表时,编辑部删去了马克思评论英国激进政论家华·威尔克斯著作《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1854年伦敦版)(W. Wills《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的那一部分。关于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批判意见,在他1854年4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略有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

卷第338页)。

文章是根据质量很差的报纸照像复制品刊印的。方括号内的词不能就理解为这一种意思。——第206页。

- 183 所得税法案是指格莱斯顿因英国即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提出在六个月里把所得税率增加一倍的提案。1854年3月27日,英国向俄国宣战,所得税法案于30日三读后通过。——第206页。
- 184 指英国政府公布了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160—177页)中曾对这本书中的材料作过分析。——第206页。
- 185 关于格莱斯顿1853年4月18日提出的预算的详细说明,见马克思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7—70、72—76、78—85、87—95页)。——第206页。
- 186 帕金顿的讲话的片断马克思引自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第21703号。——第206页。
- 187 指1852—1855年乔治·阿伯丁的联合内阁。阿伯丁内阁(“群贤内阁”)内有辉格党、皮尔派和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代表。——第206页。
- 188 “病夫”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治·汉·西摩尔在1853年1月9日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用来指土耳其的(《来往公文集》第5部分第877页)。——第206页。
- 189 “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是马克思对格莱斯顿的称呼。皮由兹派是英国教会的一个教派,格莱斯顿属于该派;马克思在强调格莱斯顿的伪善时,常常称他为“献殷勤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

83页)。下面一段话是马克思根据帕金顿的讲话(发表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援引格莱斯顿的发言片断。——第206页。

- 190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他发表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页)。——第207页。
- 191 马克思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绰号——“精明博士”(“Doctor Subtilis”)来称呼格莱斯顿。——第207页。
- 192 南海公司于1720年破产,它的破产增加了英国的国债。根据1853年财政改革计划,格莱斯顿打算把这家公司的股票利息从3%降到 $2\frac{3}{4}$ %。对他的建议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1、59—60页。——第207页。
- 193 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提出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该组织应当既联合工联也联合无组织的工人,首先是要使全国各地区的罢工统一步调。这个组织应当由无组织的工人集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会议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来领导。工人议会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闭幕。它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的纲领,并成立五人执行委员会。
-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对政治斗争持否定态度的工联的多数领袖不支持建立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1854年夏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参加广大工人群众运动产生不利的影 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第209页。
- 194 马克思指1854年3月27日《晨邮报》第25033号的社论。——第209页。
- 195 指1853年8月在普雷斯顿城开始的、当时英国工人最大的罢工事件中的一起。关于罢工的进程及其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4—375、467—470、493—495、520—521页;第10卷第253—254、687—688页。——第209页。

- 196 法默斯-阿姆斯 (Farmer's Arms) 是普雷斯顿织工罢工时工人委员会的所在地。——第209页。
- 197 马克思接着引用了1854年3月25日《人民报》上发表的厄·琼斯的《普雷斯顿的棉花法》。——谁是真正的阴谋者?一文中的实际材料。——第209页。
- 198 骚扰取缔令 (Riot act) 授权地方当局以暴力驱散“秩序破坏者”的集会,对集会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当众宣读解散命令,过一小时后不服从即可开枪。——第210页。
- 199 指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招募到普雷斯顿的工人(1854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694号)。——第210页。
- 200 这个决议的原文马克思引自1854年4月1日《人民报》发表的文章《郎卡郡领导者的控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4月1日的《人民报》在3月31日晚上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这天晚上写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这份报纸。——第211页。
- 201 由于克里木战争爆发,恩格斯表示愿意作为军事观察家为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撰稿,并于3月30日将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3—679页)寄给编辑部,1854年4月3日以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又寄去《俄国军队》一文,这篇文章应当是有关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的一组文章的头一篇。这篇文章排版后,恩格斯大约在1854年4月12日收到校样,并附有该报编辑林肯的信件,林肯在信中询问了恩格斯同意为该报撰稿的条件。恩格斯对给《每日新闻》撰稿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望经常给《每日新闻》写稿可以使他摆脱商务活动并迁居伦敦。但是,从恩格斯1854年4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林肯得知恩格斯的政治观点以后,就取消了原先的协议。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上发表的文章《俄国的兵力》和《欧洲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页和第11卷第501—514页)里发挥了《俄国军队》一文中的某些论点。——第213页。
- 202 恩格斯指沙米尔领导的达格斯坦和彻岑山民运动的参加者、英国作者

亨宁森写的《揭露俄罗斯的秘密》一书，1844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在欧洲获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它的作者后来参加了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和美国国内战争。——第213页。

203 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第217、223页。

20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写的《欧洲战争》一文（关于这篇文章，马克思的笔记本中没有专门记载）本来是他的《议会的战争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88—199页）一文的一部分。马克思于1854年4月4日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论坛报》编辑部从中抽出三段，把它们作为该报编辑部所写的社论单独发表。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稿所作的改动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第一段——头两行以及“但是，本报消息非常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为这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臆造”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这一段的绝大部分，从“实际上很显然……”一句直到末尾都是恩格斯写的，它和恩格斯1854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原文几乎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34—335页）。这一段的其余部分是马克思写的。

第二段，把它和《议会的战争辩论》一文的第四和第五段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编辑部也是任意处理马克思的材料，虽然要确定作了多大改动是比较困难，但是它加进下面这句话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这一段中的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得到完整的情报时，就会清楚了”也是编辑部加的。

第三段，从内容来看，许多地方同马克思所写的《希腊人暴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以及后来写的《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粮食贸易的缩减》等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142、178—187、217—220页）有相同的地方。——第219页。

205 1854年3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请求尼古拉一世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以避免冲突。尼古拉一世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撤军，条件是西方强国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徒得到解放和把自己的舰队撤出黑海。

关于这次谈判的消息，马克思是从1854年4月4日《泰晤士报》发表的材料中得到的。——第220页。

- 206 指土耳其政府内部由于法国、英国和土耳其1854年3月12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伊斯兰教总教长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和最高法院主席利法特·帕沙反对在土耳其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上作任何妥协，因而被免职。——第221页。
- 207 弗·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一文写于1854年4月24日。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恩格斯1854年4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2页）和马克思笔记本中关于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的注：“4月25日，星期二，军事论文”。《土耳其战争》直到5月14日才迟迟寄到纽约。然而报纸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军事论文很感兴趣，利用寄来的材料，把它作为社论发表。同时编辑部对文章作了改动，使它看起来好象是根据一周以后即1854年5月3日才离开欧洲的“大西洋号”轮船带来的迟到消息写成的。为此，在恩格斯的文章前面加了一段对联军舰队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的评述，这个消息发表在同一号《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战争”栏内。这一段的末尾对海军上将邓达斯的勇敢精神的讽刺性评价，可能是《论坛报》编辑部从同一号报纸登载的马克思所写的《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28—235页）一文中抄来的。《土耳其战争》第一段全文转载如下：
- “昨天，‘大西洋号’轮船带来了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在黑海对俄军进行第一次真正攻击的消息。看来，英国的蒸汽巡航舰‘怒涛号’挂着军使旗驶向敖德萨，以便接运英、法领事离开敖德萨，当他们刚一上船，就遭到岸上的射击。英国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军使旗的权力的不负责任的侵犯，必须立即予以报复。俄国人这方面则坚持说，在领事们登上船后，军舰仍然停留在港内，使军官们有可能把防御工事画下来，因此，射击的唯一目的是制止这种非法的行为。不管那里的情况如何，英法的海军将军们决定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派了强大的力量去轰击城市。显然，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因为，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官

方的通报,但根据现有的消息,在压制海岸炮兵连的炮火,使停泊在港内的少数几艘商船起火并且使离海岸不远的沃龙佐夫公爵的庭院遭到破坏的时候,有些英国军舰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坏。坐落在小山顶上的城市本身,由于距离海岸较远而安然无恙。这样报复之后,军舰又重新撤走。看来,邓达斯海军上将接受了他的一个军官在伦敦发表的信件中向他提出的建议,作为行动的指南,不要过于热心地参与到困难和危险的事情中去。”——第223页。

- 208 关于锡利斯特里亚要塞的历史,恩格斯后来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5—296页)一文中讲得比较详细。——第223页。
- 209 确定本文作者的根据是:恩格斯1854年5月1日、6日和9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笔记本中关于5月5日寄往纽约一篇军事论文的注(“5月5日,星期五,军事论文”),以及本文和《泰晤士报》发表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恩格斯论述多瑙河前线军事行动的资料来源)的对照。在本文中(第一段的第一句、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和其他一些字句)可以明显地看出《论坛报》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原稿所作的改动。——第226页。
- 210 指1854年5月4日《泰晤士报》第21732号在《俄国人的失败》的标题下发表的维也纳电讯。——第226页。
- 211 恩格斯对奥美尔·帕沙在切纳沃达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的充分可靠性的怀疑已经完全得到证实。1854年5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通讯员从维也纳寄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这个事件是敌对军队间一次普通的武装冲突,关于俄军损失的数字是被夸大了。——第226页。
- 212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到恩格斯的原稿里的;指《论坛报》同一天发表的《希腊人暴动》一文。——第227页。
- 213 1854年1月,伊斯坦布尔宣布,警察当局成功地揭发了希腊人的密谋。按照西方报刊的说法,这一密谋的目的是要发动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起来进行暴动,首要人物是埃尔斯纳男爵。关于这一点,见

- 马克思的文章《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7—124页、第228—235页）。——第227页。
- 214 指《国民报》发表的和1854年5月4日《泰晤士报》第21732号转载的简讯。——第227页。
- 215 关于门的内哥罗的暴动，见马克思的文章《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28—235页）。——第228页。
- 216 恩格斯指马克思的文章《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和《土耳其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00—109、117—124、160—177页和第9卷第27—28页）。参看这些文章是符合恩格斯的想法的。恩格斯1854年5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这个想法：“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所写的第一批文章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51—352页）。——第228页。
- 217 由于1854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的历史，他的研究成果有五本摘录和1854年9—12月《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53—511、669—672页）。《中央洪达》的草稿大概是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的初稿。手稿是一篇有许多删改的草稿，这次发表时没有将删改处刊印出来。——第229页。
- 218 在拜兰会战中，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一万四千名法国士兵于1808年7月20日向西班牙的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将军投降。对拜兰会战在1808—1814年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1页。——第229页。

- 219 在建立中央洪达之前，塞维尔洪达名义上是最高洪达。——第229页。
- 220 总督是西班牙十六世纪制定的军队最高职称。总督掌握州、区或国家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权力。——第231页。
- 221 威灵顿的信，马克思引自威·纳皮尔的书《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38年伦敦版第2卷第473页。——第231页。
- 222 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巴拉克拉瓦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一文中部分地使用过关于1854年10月25日巴拉克拉瓦会战的草稿。为了更明显地对照起见，恩格斯把这些英国和俄国的消息分成两栏；在手稿的一页上，恩格斯画了一张这一会战的军队配置平面图。草稿的标题是恩格斯加的。——第233页。
- 223 关于俄军数量和组成的资料，有一部分是恩格斯从1854年10月22日《俄国的残废者》发表的资料《第十二步兵师师长利普兰迪中将10月14日给侍从副官长缅施科夫公爵的报告》中摘引的，也许是根据1854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的转载。——第233页。
- 224 关于参加1854年10月25日巴拉克拉瓦会战双方军队的人数和组成的资料，恩格斯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中讲得更加准确。——第240页。
- 225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一文的草稿内容是从1854年9月14日联军登陆到1855年9月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尔这段时间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记。这个草稿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注289。——第241页。
- 226 关于因克尔芒会战，恩格斯写过一篇专题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第242页。
- 227 关于色楞格多面堡在塞瓦斯托波尔尔保卫战中的作用，见恩格斯的文章《塞瓦斯托波尔尔会战》、《战争的进程》、《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0—174、191—195、214—217

- 页)。——第242页。
- 228 关于堪察加眼镜堡(马美朗多面堡)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作用,见恩格斯的文章《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7、320—321、324页及其他各页)。——第242页。
- 229 指联军1855年6月18日企图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区的棱堡,法军和英军的强攻被击退,联军遭到重大损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78—381、394—397页)。——第243页。
- 230 关于这次会战,恩格斯写过一篇专题文章《黑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5—581页)。——第243页。
- 231 下面发表的马克思的三篇文章《外交上的失礼》、《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和《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刊登在德国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上。马克思1855年曾为该报撰稿。在大陆几乎没有一家工人报刊的反动年代里,这样做使他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言,保持同德国的联系,向德国读者介绍国际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及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收入本版第11卷的马克思载于《新奥得报》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标有特殊的通讯员代号——“X”。1855年10月,因遇到财政上的和书报检查造成的困难,该报编辑摩·埃尔斯纳请求马克思暂时停止提供文章和通讯。保存下来的文件不能使人有十分把握肯定,马克思在中断关系后又曾恢复为《新奥得报》撰稿,虽然11月和12月又有许多发自伦敦的文章和通讯标有他的通讯员代号。这样的文章和通讯共有二十四篇。上述三篇文章中的头两篇无疑是马克思写的,因为它们是在马克思收到埃尔斯纳的信之前于1855年10月2日和6日从英国发出的。第三篇文章《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的最重要的论点,同马克思1855年11月8日给埃尔斯纳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30—631页)几乎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使我们作出这篇文章是属于马克思的结论。所有二十四篇文章都用德文载于斯塔尼斯拉夫·施旺1958年在波兹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给弗罗兹拉夫的新奥得报的通讯》一书。——第244页。

- 232 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是有组织的外交事务委员会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之一。这些外交事务委员会是乌尔卡尔特及其追随者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主要为了同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而在英国的一些城市里建立的。关于乌尔卡尔特,见本卷第204—205页。——第245页。
- 233 《新奥得报》没有刊登通讯的续篇。大概马克思接到埃尔斯纳1855年10月7日的信(见注231)以后,就没有再写下去了。——第247页。
- 234 1855年10月10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费利克斯·皮阿在《人》报(《L'Homme》)上就维多利亚女王同年8月访问法国一事发表了一封致女王的公开信。这封内容是反波拿巴的信,却具有皮阿一切行动所固有的那种挑衅和盲动的性质。它引起了英国报刊和流亡者报刊的很大争论,并且使人们非常担心会恢复外侨管理法案(见注235)。《人》报的编辑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流亡者接到泽稷总督让他们离开该岛的命令。《新奥得报》发表的有关泽稷岛冲突的文章和通讯中,除了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两篇文章和两篇通讯标有通讯员的代号“X”(见注231)。1855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有关马克思这篇文章所谈到的集会的报道。——第248页。
- 235 外侨管理法案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行动的危害而数度采用的法律。关于因泽稷事件而恢复这项法案的问题和从英国驱逐革命流亡者的代表的问题在1856年初才被否决。1856年2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声称,英国政府将不向议会提出新的外侨管理法案。——第248页。
- 236 联合派,联合主义(Fusion——联合)是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的派别。——第248、420页。
- 237 英国的反动的国家活动家西德默思(亨利·阿丁顿)子爵是1812年至1821年利物浦托利党内阁的外交大臣。这一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反人民的法律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这些法律是:1815年为大地主利益实行的谷物法;1817年的《禁口法》(Gagging Act)它限制社团集会的权利,关闭激进派的俱乐部,并且实际上实行了书刊检查,以及在曼彻斯特附近

举行集会的工人遭到血腥镇压（彼得卢大屠杀）后实行的各项法律。——第249页。

- 238 这封附信是马克思为把《卡尔斯的陷落》一组文章寄给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供压缩发表一事写给该报编辑的。这组文章曾在1856年4月宪章派《人民报》上发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73—712页）。《自由新闻》用《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Kars Papers Curiosities》）为题发表的异文稿，基本上是《人民报》发表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摘要。——第251页。

- 239 本篇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巨著的导言。1856年，马克思在翻阅英国博物馆保存的外交手稿时，发现了一些能够说明英国政府同俄国政府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就已经秘密勾结的文件。马克思曾经设想利用这些文件撰写一部篇幅为二十个印张的著作来揭露这种卑鄙行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是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标题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它最初在英国《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1856年6—8月）上部分发表过，后来全文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8月—1857年4月）。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四件秘密书信；第二、四、六章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即《北方危机》、《防御条约》和《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马克思认为这些历史资料是判断十八世纪欧洲外交关系的重要依据，因此详加批注，重新发表，“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2页）。

马克思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出过单行本。1899年，伦敦的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出版了由爱琳娜·马克思编辑但未最后审定的单行本，书名是《十八世纪外交秘史》，其中第五章较《自由新闻》发表的全文缺少一部分。1969年，英国出版了由莱斯特·哈钦森编辑的、按照《自由新闻》补全了的单行本。正文部分的脚注全部是马克思写的。——第253页。

- 240 俄国为了取得出海口，从十七世纪末就开始向黑海沿岸地区进行扩张。这封信中谈到的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是俄国这种扩张活动的继

续。这次战争是俄国女皇安娜联合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一起发动的,从1735年秋季开始,以173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城签订和约结束。按照这一条约,俄国从土耳其方面获得了阿速夫和德聂泊河沿岸一部分地区。

1736年,俄国以一支军队越过佩列科普,攻入克里木汗国,占领其首都巴赫契萨赖,以另一支军队占领阿速夫,使土耳其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土耳其曾被迫向英国与荷兰求援,要求它们出面调停。——第255页。

- 241 联省议会是荷兰联省共和国(1588—1795)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宣战和媾和问题,掌管国家的财政和武装力量。——第255、295页。
- 242 俄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它过去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对于俄国势力的增强极感不满。法国尤其害怕俄国在东方的势力会危及它在那里的地位,因此极力联合土耳其、波兰、瑞典和奥地利去反对俄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企图组织“北方国家”的联盟来对抗法奥同盟,以便实现它对波兰、瑞典和土耳其等国的侵略意图。1764、1765年,俄国先后与普鲁士和丹麦缔结了联盟条约。英国驻俄国公使麦卡特尼爵士从1764年起与俄国谈判通商条约,俄国为了诱使英国与它结盟,有意拖延这一谈判。到1766年,俄国同意缔结俄英通商条约,英国为了报答俄国,表示在波兰问题上完全支持俄国,同时在瑞典也和俄国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第256页。
- 243 查理十二死后的瑞典宪法,赋予受贵族寡头支配的等级议会以最高权力。国王仅在名义上对议会的立法有批准权。议会的决议,国王即使不同意,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国王的亲笔签字,加盖国玺也同样有效。“人民的特权”即指这种贵族寡头能与王权对抗的情况。俄国和英国为了更好地操纵瑞典政治,曾极力维护瑞典宪法中的这种规定,它们施展种种阴谋,在瑞典议会中培植亲俄亲英的党派来与企图扩大王权、修改宪法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和王后(路易莎·乌尔里卡)进行斗争。——第257页。
- 244 指彼得堡条约,即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64年4月11日在彼得堡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有效期为

八年,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战时相互援助,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对土耳其、波兰和瑞典采取一致行动。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士有义务在俄国同土耳其作战时每年向俄国提供四十万卢布的补助金,两国应维护波兰的现存制度,保护非国教徒的权利,必要时向波兰进驻一定数量的俄国和普鲁士军队,此外,普鲁士有义务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这一条约为1772年瓜分波兰打下了基础。——第257页。

- 245 英国从1775年起与它的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先后站在美国方面向英国宣战,后来俄国、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又组织武装中立联盟与它对抗。1781年英国军队向美法联军投降,开始了与美国及其盟国缔结和约的谈判。英国在和谈中曾千方百计谋求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支持,以摆脱困境。——第259页。
- 246 舒瓦洛夫、斯特罗加诺夫和切尔尼舍夫都是俄国的贵族世家,历代都有人在沙皇身边供职,如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时,伊·伊·舒瓦洛夫是女皇的侍从官和顾问,亚·谢·斯特罗加诺夫是女皇的枢密官,安·加·切尔尼舍夫先是女皇的近侍,后来任彼得堡的城防司令,等等。——第259页。
- 247 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向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24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7—1779)。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俄国和法国充当了调停人,以后它们又一起成为条约的保证人。——第259页。
- 248 指西班牙对英国的宣战声明。在1775年开始的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中,西班牙一直暗中援助后者。在1778年法国加入反英战争后,西班牙企图通过调停来取得米诺尔卡岛和直布罗陀,但遭到英国的拒绝,并且它的船只在公海上也不断受到英国的袭击,于是它便在1779年6月23日正式向英国宣战。因为英国的主力被束缚在美洲,西班牙夺得了米诺尔卡岛和佛罗里达,并把英国人逐出洪都拉斯和巴哈马群岛。按照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佛罗里达和米诺尔卡岛留在西班牙手中,英

- 国在洪都拉斯的权利受到限制,巴哈马群岛还给了英国。——第260页。
- 249 米诺尔卡岛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十八世纪曾多次易手。1763—1782年属于英国,英国政府在1779年曾提出把它送给俄国。1802年转归西班牙所有。——第260、268页。
- 250 指叶卡特琳娜二世1780年3月11日(俄历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它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当时英国正在与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这篇宣言是针对它的。在1780—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第260页。
- 251 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1772年进行的。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分得加里西亚,普鲁士分得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俄国分得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第261页。
- 252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后俄国强迫土耳其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并吞克里木造成了方便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土耳其苏丹应给予正教会一系列特权。——第261页。
- 253 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一切封建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所以整个封建的欧洲都反对法国革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是欧洲反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认为干涉法国的革命事件是全欧洲君主的责任。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前,她就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竭力帮助逃亡贵族。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她废除了同法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禁止法国船只驶入俄国港口。但是她并没有加入1792年组织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来公开同法国作

战。——第266页。

- 254 1792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害怕法国革命影响波兰,乘波兰内争之机,同普鲁士一起入侵波兰,击溃波兰军队的抵抗后,于1793年1月与普鲁士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俄国获得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获得托伦、格但斯克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1794年,波兰爆发了由考斯丘什科领导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俄、普、奥三国出兵干涉,把起义镇压下去后,于1795年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获得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and 沃伦的一部分,普鲁士获得波兰本土的大部分,奥地利获得包括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虽然波兰被瓜分之后,不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但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未中断。——第266页。
- 255 欧洲的反动君主国家为了扑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92年底到1793年春天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加入同盟的有英国、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小邦。法国和这一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延续到1797年。——第266页。
- 256 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叶卡特琳娜二世同英国缔结反对法国的俄英同盟条约。英国答应给俄国大量补助金,俄国则答应派六万大军去攻打法国。由于叶卡特琳娜二世突然死去,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266页。
- 257 保罗一世即位时,俄国由于履行1795年的俄英同盟条约,已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1798年,俄、英、奥地利、土耳其和那不勒斯王国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是,由于英、奥、俄三国同盟内部很快发生严重利害冲突,1800年保罗宣布退出同盟,并且同英国绝交,扣押在俄国境内的英国货物和船只,同瑞典、丹麦、普鲁士签订旨在反对英国的、恢复武装中立规则的条约,同法国进行关于媾和、结成反英同盟和共同远征印度的谈判,使俄国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第266页。
- 258 辉格党是英国1679—1682年在议会中形成的政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起初是国王的反对派(与忠于国王的托利党相对立)。到

十九世纪中叶,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称为自由党。——第269、288页。

- 259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The Northern Crisis; Or imparti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zar; Occasioned by mynheer von Stocken's Reasons for delaying the descent upon Schonen. A true copy of which is prefixed, verbally translated after the tenour of that in the German Secretary's office in Copenhagen, October 10, 1716》London, 1716)。——第270、287页。
- 260 斯科纳(肖楠)是瑞典南部历史上的一个省,根据1660年哥本哈根条约由丹麦割让给瑞典。——第270、287、297页。
- 261 瑞典在十七世纪末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除本土外,包括芬兰、爱斯兰、里夫兰、英格尔曼兰、卡列里亚、北波美拉尼亚、德意志北部的公国——不来梅、费尔登和维斯马。俄国早在1699年就同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五世和萨克森选侯(也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结成了反瑞典同盟,想趁新登基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年轻无经验之际用武力来肢解瑞典。沙皇彼得一世想占领波罗的海东岸省份,取得盼望已久的出海口;丹麦国王想收复过去割让给瑞典的失地,波兰国王则想夺得里夫兰和爱斯兰,并且巩固王位。1700年开始了对瑞典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的开端。起初,由于军事失利,丹麦和波兰先后被迫暂时退出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1709年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丹麦和波兰立即恢复了对瑞典的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随后,普鲁士和汉诺威也相继加入了联盟(北方联盟)。到1715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占领了瑞典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在这一年缔结了一个瓜分瑞典帝国的协定。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地被丹麦、普鲁士和汉诺威所瓜分,在波罗的海东岸的省份则被俄国占有。1719—1720年间瑞典先后同汉诺威、波兰、普鲁士和丹麦缔结和约,承认这些国家所夺去的土地。1721年瑞典和俄国之

- 间缔结了尼斯塔德和约,俄国得到了里夫兰、爱斯兰、卡列里亚、英格尔曼兰、维堡区的一部分以及芬兰湾和里加湾的全部岛屿。俄国从此得到了出海口,成为称霸波罗的海的强国。——第270、275、278、297、322、462页。
- 262 关于三次瓜分波兰,见注251和254。——第270页。
- 263 西班牙在十六、十七世纪时版图异常辽阔,但是它的国力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已变得很衰弱。国王查理二世(1665—1700年在位)无后裔,因此法、奥、英、荷等国君主在他生前就对如何瓜分西班牙进行了策划。1698年10月在海牙签订了第一次瓜分西班牙条约,规定在查理二世死后,西班牙的领地和殖民地在与查理二世有姻亲关系,因而有权继承王位的法王路易十四、奥皇列奥波特一世和巴伐利亚选侯约瑟夫·斐迪南亲王之间进行瓜分。由于巴伐利亚选侯亲王不久死去,1700年3月在伦敦和海牙签订了第二次瓜分西班牙条约,将原定分给巴伐利亚选侯亲王的那一份在法、奥之间进行瓜分。然而,第二次瓜分条约不久即由于路易十四接受查理二世的遗嘱,让他的次孙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而被撕毁。——第270页。
- 264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是西欧国家为了瓜分西班牙的领地和殖民地以及英、法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而引起的。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法王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遗嘱,让他的次孙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从而撕毁了法国与英、荷等国缔结的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英国、奥地利、荷兰、萨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兰进行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1713)(见注364)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西班牙王位保留给菲力浦·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划;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给奥地利。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是英国,它达到了削弱法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的目的,获得了直布罗陀、米诺尔卡岛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国殖民地,而且有把黑奴贩运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权利。——第270、278、343页。

- 265 据古希腊神话说,奥德赛和同伴们来到独眼巨人居住的西西里岛。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他把奥德赛和他的同伴们关进自己的岩洞,每天吃掉几个人,给奥德赛保留的特权是把他留到最后吃。奥德赛想尽办法,用一根削尖了的大木杆,在火上烧红了之后刺瞎了巨人的独眼,并把活着的同伴一个个地缚在巨人养的公羊肚子下面,跟着逃出洞口。——第270页。
- 266 本德雷是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贝萨拉比亚地区德涅斯特河的一个城市,在现今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瑞典国王查理十二1709年在波尔塔瓦被彼得一世打败后流亡至此,一直到1714年才离开此地回国。——第270、294页。
- 267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270、292、305页。
- 268 1700年,丹麦同俄国和波兰结盟(北方联盟)进行反对瑞典的战争(北方战争)。战争一开始,瑞典就派大军在哥本哈根登陆,同时英国站在瑞典方面,出动舰队威胁丹麦,迫使丹麦在特拉温达尔(位于霍尔施坦)与瑞典单独媾和。根据特拉温达尔和约,丹麦放弃霍尔施坦,并宣布退出北方联盟,从而使瑞典能集中力量对付俄国。——第270、278、304页。
- 269 施特腊耳宗德是德国北部的要塞港口,同波罗的海中的吕根岛相对。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前属汉撒同盟,1648—1814年属瑞典,1815年转归普鲁士。——第271、298页。
- 270 圣詹姆斯宫是伦敦的王宫,通常用来指英国朝廷。——第272页。
- 271 交易所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是从事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第272页。
- 272 长老会是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治集团之一,属清教徒中的温和派,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辉格党人都是顽固的长老会徒。——第273页。

- 273 詹姆斯党是指拥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为英国国王的那一部分人。詹姆斯二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1685年登位后企图恢复天主教会的统治，实现全面封建复辟。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被推翻，流亡法国，由他的信仰新教的女婿威廉三世继任王位。当时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有许多人（主要是托利党人）在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后继续忠于他，秘密从事复辟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第273页。
- 274 帝国塔勒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在欧洲大陆上使用的银币。——第275页。
- 275 原文缺少第三部分的编号，从内容上看，从下一段起应是第三部分。——第275页。
- 276 参孙是圣经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因留发不到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并以一块驴腮骨击杀一千敌人。他的行传载于《士师记》第13—16章。西方文学中一般用来比喻大力士。不过，他也善于斗智，如他曾出谜语给敌人猜，曾把火炬扎在几百只狐狸的尾巴上，放到敌人的田野里去烧毁他们的庄稼。——第276页。
- 277 纳尔瓦在今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位于纳尔瓦河下游临近芬兰湾处。列维里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旧名。这两个城市原来属于瑞典，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第277页。
- 278 利沃尼亚包括今苏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里加是它的主要城市。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是瑞典、波兰和俄国争夺的地方，1660年归瑞典占有，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第277、307、326页。
- 279 指萨克森，因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原为萨克森选侯。——第277页。
- 280 指1706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签订的阿尔特兰施太特和约，根据这项和约，奥古斯特二世承认放弃波兰王位并把王位让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第278页。
- 281 爱斯兰即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一样，是在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的。——第278页。
- 282 1709年6月，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后逃往土耳其。彼得一世要求土耳其引渡查理十二并以战争相威胁。土耳其政府在查理十二

- 的煽动下,于1710年11月向俄国宣战,要求俄国归还阿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彼得于1711年7月率领俄军进入摩尔达维亚,渡过普鲁特河后,在法尔奇乌附近陷入土军的包围。彼得派人到土耳其军营求和,于1711年7月12日缔结法尔奇乌条约,满足了土耳其方面提出的归还阿速夫等要求,从而彼得可以继续集中力量进行反对瑞典的北方战争。这是彼得一世的第二次对土耳其战争。——第279、322、325、330页。
- 283 梅克伦堡是德意志帝国北部的一个公国。在北方战争后期,彼得一世为了保持住从瑞典手中夺得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在德意志帝国北部展开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活动。1716年1月,彼得将侄女叶卡特琳娜·伊万诺夫娜嫁给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列奥波特,4月在格但斯克同梅克伦堡签订了同盟条约,以同盟为幌子将梅克伦堡完全置于俄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第280、283页。
- 284 维斯马是德国北部波罗的海的最好的港口之一,原属梅克伦堡公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划归瑞典。1716年4月,丹麦和汉诺威为了防止维斯马转归与俄国结盟的梅克伦堡,攻占了这个港口。——第280页。
- 285 德意志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十世纪初,德意志境内的封建公国之一萨克森兴起,萨克森王奥托一世实现了德意志境内的统一,于962年取得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建立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最大时虽然包括意大利北部等地,但以德意志地区为主,所以也叫做德意志帝国。从1273年到1806年拿破仑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称号时为止,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几乎延续不断地保持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然而,这个帝国缺乏内部的经济联系,境内诸侯林立,皇帝徒有虚名。1517年的宗教改革,1525年的农民战争,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加强了诸侯割据局面,使这个帝国更加分崩离析。及至十八世纪,在这个有名无实的帝国内部,逐渐形成奥地利、普鲁士两大强国。——第281、326页。
- 286 指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是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1716至1718年对土耳其进行的战争。土耳其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按照帕萨罗瓦茨条约割让了它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些领土。——第282页。

- 287 引自古罗马诗人贺雷西（公元前65—8）的诗集《颂歌》第3册。——第286页。
- 288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1700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The Defensive Treaty concluded in the year 1700, between his late Majesty, King William, of ever-glorious memory, and his present Swedish Majesty, King Charles Published at the earnest desire of several members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第287、297页。
- 289 《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以简单明了的理由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这些理由要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全部摘自N . N . 在1715年8月从出使莫斯科宫廷回国后奉国王陛下之命编写并向国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Truth is but truth, as it is timed, or Our ministry's present measures against the moscovites vindicated by plain and obvious reasons, tending to prove, that it is no less the interest of our British trade, than that of our state, that the Czar be not suffered to retain a fleet, if needs must that he should [have] a sea port in the Baltick, the whole extracted from a representation made by His Majesty's orders, and given 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y N . N . on his return hither from the Court of Moscow, in August 1715 . Humbly dedica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London, 1719）。——第287、306、326页。
- 290 俄罗斯贸易公司是英国商人组成的对外贸易特许公司之一，1554年在伦敦成立。——第292页。
- 291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称呼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298页。

- 292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鼓吹统治者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后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即指为达到商业上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第293、312页。
- 293 卡尔斯是一个古城,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是独立的亚美尼亚公国的首都。十六世纪中叶为土耳其占有。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英国威廉斯将军统率的土耳其驻防军1855年在这里抵御俄军达半年之久,但最后不得不把它放弃给俄军。——第294页。
- 294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卢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十四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第294、334页。
- 295 指1688—1697年法国同欧洲同盟之间的战争。欧洲同盟就是所谓的奥格斯堡同盟,其成员有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这场战争于1697年以签订里斯维克和约而告终,和约确认作了某些变更的战前疆界。法国应承认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使法王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王位。——第295页。
- 296 引自古罗马诗人西里乌斯(意大利的)(26—101)的著作。——第297页。
- 297 1675年,丹麦趁瑞典同荷兰作战失利的时候,与勃兰登堡和荷兰结成同盟,对瑞典宣战,企图夺回它按照罗斯基勒条约和哥本哈根条约丧失的领土(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这场战争延续数年,互有胜负。最后,于1679年在斯科纳的隆德城签订和约,按照这个和约,两国间的边界仍保持原状不变。——第303页。
- 298 瑞典在1657—1658年与丹麦进行战争,丹麦战败,1658年在哥本哈根附近的罗斯基勒缔结和约。根据罗斯基勒和约,丹麦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和博恩霍尔姆岛割让给瑞典,并且承诺不向瑞典的敌国开放松德海峡。——第303、329页。

- 299 罗斯基勒和约签订后不久,瑞典为了进一步削弱丹麦,又发动战争,但是荷兰、波兰、勃兰登堡等国都站在丹麦方面对瑞典作战。瑞典难以取得胜利,被迫于1660年5月在哥本哈根与丹麦缔结和约。根据哥本哈根和约,瑞典交还了以前取自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和特隆赫姆城(在挪威境内),但保留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此外废止了不让非波罗的海国家的船只进入波罗的海的规定。——第303、329页。
- 300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而缔结的,其中包括两个和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和约保证了战胜国瑞典和法国获得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过去在亚尔萨斯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条约规定德意志皇帝保证德国境内各邦永久存在,不干涉诸侯内政。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这更加削弱了德意志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第303、339、467页。
- 301 862年,柳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称王,879年死后,由其弟奥列格继位,于882年占领基辅,建立了所谓的“基辅罗斯”,从而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柳里克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598年。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即指奥列格及其继承人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等罗斯大公。——第307页。
- 302 没落帝国(Lower Empire)在这里指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或希腊帝国。东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从罗马帝国分出,作为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东正教——希腊正教教会的中心,具有强烈的希腊传统,对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极大。1204年被信奉天主教的西欧封建主征服,1261年得到重建,但是国力很弱,到145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第307页。
- 303 弗拉基米尔于988年包围了原属拜占廷的克里木的赫尔松城(即赫尔松涅斯),强索拜占廷公主安娜为妻。拿破仑第一在1810年2月要求奥地利

- 皇帝（在1806年以前也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把公主玛丽亚·路易莎嫁给他。——第307页。
- 304 哥特时期指中古时期。——第307、308页。
- 305 诺曼人是指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丹麦）的日耳曼人。以飘洋过海远征中欧、西欧和东欧各国著称。从九世纪下半叶起曾控制了经芬兰湾和里加湾到罗斯的道路。——第307页。
- 306 查理曼的帝国，即查理大帝建立的庞大帝国，其版图包括法兰西、德意志、荷兰、意大利大部分、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首都在亚琛和罗马。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查理曼死后，迅即分裂。——第307页。
- 307 瓦利亚基人是古斯拉夫人对诺曼人，主要是瑞典人的称呼。——第308页。
- 308 诺夫哥罗德在十至十二世纪初属于基辅罗斯，1136年成为独立的封建共和国。它的领域达到芬兰湾、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东到乌拉尔山为止的整个北部地区都是它的拓殖地区，它的封建领主们常常向那里的居民征索皮货以为贡赋，有时也进行劫掠。诺夫哥罗德实行“自治制度”，最高权力机关是市民议会，由它选举大公、主教和官吏，处理司法等。但市民会议完全被大贵族和富商所操纵。十五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成为莫斯科公国的劲敌，到1478年为莫斯科公国所灭。——第308页。
- 309 西方通常将十三世纪在蒙古人统率下征服了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所有游牧民族泛称为鞑靼人。——第309页。
- 310 金帐汗国保存了罗斯各公国的政权。各公国接受金帐汗的册封和诏令，向他称臣纳贡，承担军役。金帐汗从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中挑选一人，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金帐汗国的贡赋，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其四周并入自己的领地。俄罗斯王公们把这一称号视为特殊的荣宠，互相争逐。金帐汗则以此对罗斯实行分而治之。——第310页。
- 311 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另三个是：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初有咸海及里海

- 北钦察旧地，术赤子拔都远征（1236—1242）后，拓地益广，西到多瑙河下游，东到今额尔齐斯河，南尽高加索，北到今苏联保加利亚地区。1243年建都在今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另将咸海东北地方分给其兄斡鲁朵，称白帐汗；将咸海以北地方分给其弟昔班，称兰帐汗，都归他统辖。居民主要是钦察人、不里阿耳人、罗斯人、蒙古人。十四世纪起，由于封建内讧，人民反抗，国势转弱。十四世纪末逐渐分裂为许多独立汗国。1480年莫斯科公国独立，金帐汗国的统治遂告结束。——第311、325页。
- 312 大贵族是古罗斯的地主贵族，大封建主。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为各王公的近侍顾问。在十五至十七世纪时，大贵族已经成为正式称号；大贵族参加“大贵族杜马”，掌握国家行政的某些部门，在伊万四世行政改革以前，有些地方的大贵族任州长，享有征税、司法及管理军事之权。他们反对国家中央集权政策。十八世纪初叶，彼得一世废除了大贵族称号。——第311页。
- 313 利沃尼亚骑士团是条顿骑士团的一个分支。1236年德国佩剑骑士团（1202年建立）被立陶宛等国人民粉碎，其残部于1237年同条顿骑士团合并组成新的骑士团，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活动于利沃尼亚（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境内），故称利沃尼亚骑士团，听命于罗马教皇和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在它占领的地方建立了农奴制统治，长达三百年之久，统治中心是设防的城堡。最后于1561年瓦解。——第312页。
- 314 指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弟弟福马的女儿索菲亚·帕列奥洛加。她在1472年成为伊万三世的妻子。——第312、319页。
- 315 喀山汗国是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于金帐汗国分裂而在伏尔加河中游出现的一个鞑靼封建国家。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起，它与俄罗斯国家之间进行着频繁战争。1487年伊万三世推翻喀山汗阿里，把顺从他的穆罕默德·埃明宣布为汗，使喀山汗国成为俄国的附庸。1552年，喀山汗国为俄国所灭，伏尔加河中游全部并入俄国。——第312页。
- 316 土耳其在巴耶济德二世（1447—1513）任苏丹期间（1481—1512），同俄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497年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普列谢耶夫率领第一个俄国使团到达伊斯坦布尔。他奉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之

- 命,只见苏丹本人,拒绝出席宰相为他举行的宴会。巴耶济德二世仍表示愿意和莫斯科公国建立友好关系,交换使团。——第313页。
- 317 西班牙在八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比利牛斯半岛上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国家。西班牙人从十世纪末开始了反对阿拉伯侵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土地的斗争,到十三世纪末这个斗争基本上胜利结束,使西班牙成为摆脱外国统治的独立国家。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热忱,在斗争中诞生的歌颂反侵略英雄西得的史诗,中世纪曾在欧洲各国人民中广泛传诵。——第313页。
- 318 诺该鞑靼人指十四世纪末由于金帐汗国分裂而出现的一个鞑靼封建国家——诺该汗国的居民,他们游牧于从伏尔加河到额尔齐斯河,从里海、咸海到喀山、秋明之间的广阔地带。诺该汗国十六世纪下半叶分裂成几个小汗国,以后逐渐衰亡。——第313页。
- 319 克里木鞑靼人指克里木汗国的居民。1223年蒙古鞑靼人侵入克里木半岛,使这里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1443年克里木汗哈奇-吉雷乘金帐汗国衰败,建立了独立的克里木汗国。1475年,土耳其侵入克里木,克里木汗国变为土耳其的附庸。1768—1774年俄土战争后,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1783年并入俄国。——第313页。
- 320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从十二世纪初起成为独立的城市公社。在公社内部,平民和封建贵族之间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残酷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与教皇党和皇帝党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293年施行名为“正义法规”的新宪法,封建贵族被剥夺了权利。——第316页。
- 321 1899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版本中第五章到此为止。从下段起到本章末是按照1857年2月25日伦敦《自由新闻》的文本补全的。——第316页。
- 322 哥萨克人的共和国指十六至十八世纪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自治组织查波罗什营地(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它建在德涅泊河下游的霍尔迪察岛上,由武装移民组成,其中大部分是不堪封建压迫而逃亡至此的农奴。查波罗什营地是乌克兰民族的萌芽状态的国家组织,曾对乌克兰人民

- 的敌人(土耳其、克里木汗国、波兰地主以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封建地主)进行英勇斗争。自十六世纪末叶起,查波罗什营地的内部开始了阶级分化,领导地位被剥削阶级上层分子所篡夺。1654年,在它的首领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带领下,乌克兰合并于俄罗斯,但查波罗什营地仍保持自治权。1667年,查波罗什营地根据俄国和波兰之间的休战条约归俄波共同占有。1686年,根据最终和约完全归属俄国。查波罗什哥萨克人参加了1667—1671年由斯切潘·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和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在北方战争期间,查波罗什营地的首领马泽帕投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方面,俄军在1709年4月占领了查波罗什营地并摧毁了它的全部防御工事,彼得一世随即下诏撤销查波罗什营地的建制。——第317页。
- 323 克梅通是波兰从十四世纪末起对独立的有地农民的称呼。——第318页。
- 324 默麦尔是立陶宛沿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口,现名克莱彼达,1795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 325 托尔尼欧是芬兰的一个城市。位于波的尼亚湾的顶端,扼托尔尼欧河口。在芬兰1809年与俄国合并到1917年宣布独立期间属于俄国。——第321页。
- 326 阿克尔曼是位于乌克兰南部德涅斯特河入黑海口附近的一个城市。它从十四世纪起属于摩尔达维亚公国,1484年被土耳其人占领。1812年按照俄土布加勒斯特和约,它与贝萨拉比亚一起并入俄国。1918年重归罗马尼亚,1940年又并入苏联,从1944年起改名为别洛戈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第321页。
- 327 列杜特-卡列是高加索黑海岸的一个城堡,位置在今天的波季港以不远处,1829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 328 切尔克西亚是高加索西北部的过去的地域名称,指库班河以南一直到大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1828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 329 明格列里亚在高加索山以南,黑海东岸,原为一独立公国,1803年落到

- 俄国手中。—— 第321页。
- 330 彼得一世即位前,俄国已与土耳其断断续续进行战争。1689年彼得即位后,急于取得出海口,加紧准备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沿岸地区。1695年春,彼得亲自率领俄军进攻阿速夫海东北岸的阿速夫要塞,1696年7月攻克。但是,由于土耳其拥有强大海军,俄国不能单独打破土耳其对黑海的控制,而企图组成西欧各国反土耳其联盟的计划又未能实现,彼得于是决定停止对土耳其的战争,转而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700年7月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阿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割让给俄国。这是彼得一世的第一次对土耳其战争。—— 第322、325页。
- 331 在与瑞典缔结尼斯塔德和约,结束北方战争之后不久,彼得一世借口一些俄国商人在阿塞拜疆发生反对波斯统治者的起义中受到损失,于1722年派遣远征军去里海西岸,开始了与波斯战争。1723年9月在彼得堡缔结了与波斯的和约。根据和约,俄国获得了包括杰尔宾特和巴库在内的里海西岸,包括阿斯特拉巴德在内的里海南岸。但是在彼得死后不久,这些地方曾一度被波斯收复。—— 第322、324页。
- 332 刻赤海峡位于阿速夫海和黑海之间,是俄国舰队进入黑海的门户,1774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由土耳其割让给俄国。—— 第322页。
- 333 里巴瓦是拉脱维亚沿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口,现名赖耶帕亚,是拉脱维亚仅次于里加的第二大城市。1795年落到俄国手中。—— 第323页。
- 334 莫德林是波兰中部的城堡,位于华沙以北约三十公里处;伊万城的波兰名称是登布林,位于华沙东南约一百二十公里处。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莫德林、华沙和伊万城在俄国侵略欧洲中的战略地位。—— 第323页。
- 335 塔干罗格和阿速夫是阿速夫海北岸的两个城市。在1695—1700年俄土战争中被俄国占领,在1710—1711年俄土战争后重归土耳其。1774年,根据结束1768—1772年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重新落到俄国手中。—— 第324页。
- 336 帕尔努是爱沙尼亚西南部沿里加湾的港口,和列维里、纳尔瓦一样是原

- 来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里夫兰和爱斯兰的海岸城市，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7页。
- 337 斯托尔波沃条约是俄国和瑞典在1617年签订的结束它们之间1614—1617年战争的和约。依照和约，诺夫哥罗德归俄国，东卡列里亚和英格尔曼兰（位于芬兰湾的东部海岸）则归瑞典。这些地方直到1721年才划归俄国。——第328页。
- 338 波美拉尼亚位于波罗的海南岸。从1062年起是一个公国，从1181年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这个公国的奥得河以西部分划归瑞典，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普鲁士，北方战争（1700—1721）后，瑞典所属的部分又分别划归普鲁士和丹麦。——第328页。
- 339 英吉利共和国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共和国（1649—1660）。——第329页。
- 340 泰尔（又译推罗）是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奴隶制城邦，地处今黎巴嫩的苏尔。约建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其居民长期从事航海活动，于公元前九世纪末在北非建立迦太基城。公元前64年并入罗马版图，但仍为地中海的工商业中心。——第329页。
- 341 库尔兰公国是1562年在今天的拉脱维亚西部地区建立的公国。十三世纪上半叶，库尔兰地区受条顿骑士团（利沃尼亚骑士团）统治。十六世纪中叶，在莫斯科公国对波罗的海的威胁日益加强的情况下，骑士团宣告解散，骑士团的大总管葛·凯特勒于1562年承认波兰国王为宗主，成为库尔兰公国的第一任大公。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库尔兰公国土地被俄国兼并。——第330页。
- 342 1856年秋，普鲁士同瑞士由于纽沙特尔事件发生了冲突。以前属于勃艮第家族的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瓦伯爵领地（德文称作：诺恩堡和瓦连迪斯），于170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转归普鲁士所有（见本卷第343—344页）。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纽沙特尔公国作为第二十一州加入瑞士联邦，同时保持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年，纽沙特尔成为共和国（见注64），1856年9月，这里爆发了保皇派暴乱，暴乱参加者被瑞士政府逮捕。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政府针

锋相对地要求普鲁士放弃对这个州的一切权利。冲突在欧洲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引起很大反响。

马克思对这一冲突写了一篇尖锐的讽刺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该文发表在1856年12月13日伦敦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1857年1月9日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论坛报》上。马克思把发生的冲突看成是“革命和神权之间的永恒的争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04页)。

马克思写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文的基础,它是人A.F.施泰因《普鲁士勃兰登堡史。纪念和知识手册》一书(它的第一版于1811年问世)的提要。施泰因这本书公开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辩护,后来多次再版,被国家机关用来颂扬普鲁士黠武主义的“光荣和英勇传统”。马克思在其提要中除施泰因的书之外,还利用了一些别的资料。

马克思1856年11月写成的提要是分成两栏的手稿:左栏是提要本身,右栏是马克思的评语和他划的线。但是,马克思的本文不仅限于右栏的评语;提要中有许多马克思的表述和评语。此外,马克思对普鲁士历史的分期与施泰因不同。与施泰因的辩护的语调不同,马克思强调这样一个情况,即勃兰登堡选侯和后来的普鲁士君主的力量不是基于他们的英勇和军事力量,而是基于收买、购买或在继承问题上的诡计。标题本身含有的讽刺也就由此而来,所以马克思把“军事国家”一词加上了引号。

马克思至少两次用过这篇著作:一次是撰写《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文的时候,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次是1863—1864年撰写波兰历史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在编写1863—1864年波兰问题手稿中的《年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73年莫斯科版第14卷第690—699页)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广泛利用过《普鲁士(“军事国家”)》这篇文章。这次重印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手稿中划的线可能也是马克思在这几年划的。

摘录是用小号字排印的。文中的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施泰因的书有许多刊误和重大的事实错误,特别是在日期方面。其中许多错误马克思已改正了,有些错误是在手稿准备付排时无条件地加以修改了。——

第331页。

- 343 马克思在这里是计算巴伦施太德家族和卢森堡家族统治的时间；他在下面的评语中使用了这些数字。施泰因计算巴伦施太德家族的封疆伯爵的统治不是一百七十八年，而是一百六十三年，因为他是从1157年阿尔布雷希特·熊在勃兰登堡得以巩固的时候算起的。——第331页。
- 344 奥托·冯·巴伦施太德伯爵1112年成为萨克森公爵，但很快就失去了这一头衔，他的妻子是萨克森伯爵马格努斯的女儿，因此他们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熊希望得到萨克森。——第331页。
- 345 指巴伐利亚家族（1320—1373年）和卢森堡家族（1373—1417年）的封疆伯爵在勃兰登堡的统治。——第331页。
- 346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开会的目的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巩固天主教会的阵地。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领袖约翰·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义。会议形式上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选出了教会的新首脑、教皇马丁五世。会议的决议引起了捷克的胡斯运动的新高涨。——第332页。
- 347 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是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开会的目的是要通过批准会议对教皇权力的至高地位来巩固教会。文中指的是这次会议的活动的事件之一：1432年5月，会议代表同胡斯派开始谈判，1433年11月30日结束，签订了所谓的布拉格协定（承认捷克的俗人的圣餐礼有“两种形式”，教会有用胡斯教义精神传教的自由等等）。布拉格协定是胡斯运动温和派即圣杯派和封建天主教反动派之间妥协的协议。左翼代表即塔博尔派拒不接受布拉格协定，坚持接受胡斯运动的最初要求。——第333页。
- 348 指西吉斯蒙德皇帝1436年7月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郑重批准布拉格协定（见注347）。从此协议就叫做布拉格协定。——第333页。
- 349 新马尔克是条顿骑士团1402年用63200金币从西吉斯蒙德皇帝那里买去的。——第335页。
- 350 关于变条顿骑士即的土地为世俗公国和承认普鲁士对波兰的封地从属

关系的条约，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和条顿骑士团前大团长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1525年在克拉科夫签订的。——第335页。

- 351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因1531年2月27日在施马尔卡尔登城结成联盟而得名)是新教诸侯和帝国的许多城市为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对以查理五世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所结成的联盟。1546—1548年,皇帝和联盟之间进行了战争,战争以查理五世的胜利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解体而告终(见注353)。——第335、449页。
- 352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德意志新教诸侯和皇帝查理五世于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国会上签订的;和约结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并确立了诸侯在宗教问题上的独立,确认新教徒在德国取得的胜利成果,承认路德教(同天主教一起)是正式的宗教,批准教会土地的世俗化,促使了诸侯专制政体的加强。——第336页。
- 353 奥格斯堡临时协议、奥格斯堡宗教妥协(Interim)是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见注351)中新教徒失败后在奥格斯堡国会上通过的协定。这个带有妥协性的协定引起双方的不满,1555年被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彻底废除(见注352)。——第336、450页。
- 354 特里延特会议是1545—1563年在特里延特城和波伦亚城召开的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会议谴责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教会的决议,包括宣布教皇权力高于会议权力和加强主教权力。会议的决议成为反对改革运动的封建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纲领。——第336页。
- 355 1611年波兰议会不顾坚持波兰对东普鲁士的权利的一些代表的反对,通过了关于普鲁士公国和勃兰登堡统一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之下的决议。与此同时必须保留普鲁士对波兰的封地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于1657年结束(见注359)。——第339页。
- 356 新教同盟是1808年为反对德国的天主教诸侯和皇帝而创建的,是德国新教诸侯和帝国城市的同盟,起初普法尔茨—纽堡也是它的成员。它存在到1621年。

天主教同盟是德国天主教神职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的联合,是为反对新教同盟于1609年建立的。由蒂利指挥的联盟军站在皇帝斐迪南二世

- 一边，积极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到1635年联盟不再存在。——第339页。
- 357 大概是指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第340页。
- 358 归还敕令于1629年规定把世俗化的教会土地归还给德国的天主教诸侯，是哈布斯堡天主教阵营在三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它被正式废除。——第340、453页。
- 359 这项权利是霍亨索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根据1657年9月19日签订的韦利亚夫条约获得的。这项权利是：勃兰登堡放弃对西普鲁士的一切要求，从波兰取得对东普鲁士的独立主权。——第342页。
- 360 奥利瓦和约是以瑞典为一方向以波兰、莱奥波德一世皇帝和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为另一方于1660年5月3日签订的，是结束1655—1660年北方战争的条约之一。其中有一项条款是承认韦利亚夫条约的条件(见注359)。——第342、456、468页。
- 361 尼姆韦根和约是法国(也有瑞典)和莱奥波德一世皇帝之间于1679年2月5日签订的条约，它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300)。这项条约是尼姆韦根条约(1678—1679年)的一部分，后者结束了1672—1678年以法国为首的各国联盟和以尼德兰为首的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第343、458页。
- 362 圣热尔门和约是以法国和瑞典为一方向以勃兰登堡为另一方于1679年6月29日签订的。该和约是和尼姆韦根和约(见注361)衔接的。——第343页。
- 363 马克思的这个注(马策约夫斯基是十九世纪波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有许多关于斯拉夫人的著作)可能与这段摘录没有直接的关系。——第344页。
- 364 乌得勒支和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向，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面，于1713年签订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的一项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浦·波旁，

- 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第344、374、466页。
- 365 普鲁士参加了1713年4月11日的乌得勒支和约，除了对纽沙特尔和瓦兰王的权利外，还得到法国和西班牙对勃兰登堡选侯的国王头衔的承认。——第344页。
- 366 汉诺威同盟是法国、英国和普鲁士1725年9月3日建立的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政治联盟。后来荷兰（1726年）、丹麦和瑞典（1727年）也加入了同盟。——第345、462页。
- 367 国事诏书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邦的王位继承法，1713年由查理六世颁布。诏书规定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土地不可分割，奥地利帝国的皇位可以传给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第345、388、463页。
- 368 胡贝尔茨堡和约是以奥地利和萨克森为一方同以普鲁士为另一方于1763年2月15日签订的。和约所以有可能签订，是因为有彼得三世，他不仅停止了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而且答应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国对奥地利的一切影响以结束七年战争（1756—1763年）。根据胡贝尔茨堡和约的条件，普鲁士又获得了战争过程中失去的全部领土。——第345、467页。
- 369 根据1466年托伦和约，条顿骑士团被迫把西普鲁士让给波兰，而承认东普鲁士是波兰的封地。1568年，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向波兰共和国宣誓，同它一道占有作为封地的普鲁士公国（见注350、355、359）。——第345页。
- 370 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对加入欧洲国家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法国根据条约得到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促使把莱茵河左岸转让给法国，并放弃它在北意大利的占有（占有的领土曾并入在法国保护下建成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属于它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奥地利。——第345、

348、472页。

- 371 指1805年12月15日在雷恩布龙签订的条约。普鲁士为了法国利益放弃安斯巴赫、克列维和纽沙特尔；法国同意由普鲁士兼并汉诺威和英国国王的财产。——第346页。
- 372 看来原文有误：不是“瑞典”，而是“丹麦”。根据1814年1月14日丹麦和瑞典之间签订的基尔和约（结束1807—1814年英国和丹麦战争的两个条约之一），丹麦将挪威让给瑞典，而换得瑞典所属的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根据正文中提到的1816年7月27日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签订的条约，瑞典所属的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归属普鲁士以换取劳恩堡。——第346页。
- 373 这些札记是马克思记在摘录笔记本中的，注明的日期是1854年11月—1857年初，这是马克思为撰写《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90—103页）而记下的。——第347页。
- 374 指热那亚人根据1261年同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帕莱奥洛格签订的尼姆费条约而获得的特权。——第347页。
- 375 指法兰西帝国和奥地利于1807年10月10日在枫丹白露签订的关于确定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国王为拿破仑第一）之间的国界的条约。——第348页。
- 376 约定货币，约定铸币是1753年在奥地利实行的二十盾的或约定的币制，它确定国内货币流通的白银基础。按照这种币制，由一个纯银科伦马克（约二百三十四克）铸成二十盾。从这时起，银币或金币就取得约定铸币的名称。尽管到十九世纪初在“维也纳货币本位”名义下统一起来的纸币实际上已把硬币从流通中排挤出去，金属货币的铸造几乎已经停止，但是计算仍然按约定币制进行。随着纸币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约定铸币的行市同纸币数量的增长相比，仍在不断提高。——第349页。
- 377 弗·恩格斯的《山地战的今昔》一文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1857年1月初

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马克思于1月10日写信通知恩格斯收到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87页)。纽沙特尔冲突(见注342)和当时报纸对普鲁士军队入侵瑞士的计划的讨论,是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文章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恩格斯分析了山地战的一般的战略战术问题,其中有以拿破仑在瑞士的战争为实例的说明,发表在1857年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126页)。第二部分则分析了普鲁士军队越过莱茵河入侵瑞士的可能的方案,以及瑞士联邦如何组织防御的问题。这篇文章根据《论坛报》编辑部的决定(这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1857年3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没有发表。报纸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鉴于1857年1月16日瑞士政府释放了被捕的保皇派后,对普鲁士作出了让步,冲突已经解决了。“瑞士的夸口可悲地破产了”——马克思就是这样评价纽沙特尔冲突的结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93页)。——第352页。

- 378 看来,在马克思誊抄时出现了差错,这里所说的几个湖位于恩格斯所谈阵地的右翼(东面)。——第353页。
- 379 马克思写了《威尼斯》一文的草稿(见注373)以后,立即写了四篇札记,以《对波斯战争》为总标题,前两篇是关于英国和伊朗战争的文章草稿,第三篇和第四篇,马克思加上《实际资料》和《帕麦斯顿在国会上的声明》的副标题,谈的是同一个问题。根据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稿的记载,我们能够确定写这些草稿的日期是这一年的1月(在1月2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用这些材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和伊朗冲突的文章,报纸编辑部把它们合成为一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7—132页)。因此,所发表的这些草稿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最初的构思有更完整的概念。《对波斯的战争》的手稿具有极明显的草稿性质,其中增删的字句很多,在这次发表时,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加以说明。——第357页。
- 380 马克思指的是1837—1842年英国和伊朗的冲突。他也是指1838—1842年英国和阿富汗第一次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遭到了致命的

- 失败。—— 第357页。
- 381 指旁遮普。它在朗吉特·辛格的统治下曾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849年被英国兼并。—— 第357页。
- 382 大莫卧儿的首都德里曾经被纳迪尔·沙赫所侵占。—— 第358页。
- 383 结束1804—1813年俄国和伊朗战争的古利斯坦和约于1813年10月24日（俄历12日）签订。—— 第358页。
- 384 1828年2月22日（俄历10日）签订的土库曼彻条约结束了1826—1828年的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约使俄国享有在黑海驻有舰队的特权。—— 第358页。
- 385 指1839年为了确立俄国在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影响和保证通往布哈拉和浩罕的通商道路的安全而组织的由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指挥的从奥连堡到希瓦的军事远征。这次远征是对1838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答复，由于准备得很差而告失败。—— 第359页。
- 386 1809年6月17日—— 阿富汗的舒扎·沙赫和英国的埃耳芬斯顿签订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条约。
1801年1月4日—— 签订了旨在反对法国的英伊条约。
1814年11月25日—— 英国和波斯缔结了条约，这个条约使波斯有义务废除同所有敌视英国的国家的联盟。—— 第359页。
- 387 马克思指的是1856年12月29日《泰晤士报》为英国和伊朗战争所写的社论，和该报1857年1月2日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社论。—— 第361页。
- 388 1839年2月，驻扎在印度北部的英国军队奉命经过开伯尔山口向阿富汗推进。—— 第365页。
- 389 指的是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 第366、374、479页。
- 390 卡·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是

专门批判布·鲍威尔的对外政策观念,特别是批判他对沙皇俄国在欧洲各族人民命运中的作用的认识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就政治信念来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54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发表过许多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分析各种战争事件和早先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国一败涂地,俄国将成为全欧洲的仲裁者。早在185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打算批驳“批判的批判”的“高傲的愚蠢”,即批驳布·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25页)。这篇手稿可能是1857年1月写成的,是实现这一想法的尝试。马克思写这篇手稿时主要是批判鲍威尔的两本小册子:《俄国和英国》(1854年6月在沙洛顿堡出版法文版,译自德文)和《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10月在该地出版德文版)。

马克思1857年的摘录笔记本是以这篇手稿开始的,第一页上注有:“1.笔记A”;第二页上注有:“A·斯帕达。俄国大事记”,指A·斯帕达的书《1816年以前的俄国政治、文学、历史和已故名人等大事记》1816年圣彼得堡版(A·Spada.《Ephémérides russes politiques, littéraires, historiques et nérologiques... jusqu'en 1816》. St - Petersburg, 1816),注明日期:“1857年(1月)”。从第三页开始是手稿本身,手稿总共六页。手稿标题前有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手稿发表时,把划掉的最重要的地方用脚注注出。手稿最初用俄文发表在1928年《马克思主义年鉴》(《Летописи марксизма》)杂志第6卷上,标题是《布·鲍威尔关于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第367页。

- 391 “批判”就是布·鲍威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就这样称呼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268页)。——第367页。
- 392 指1854年5—9月间俄军在多瑙河的行动,首先是指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14、334—339、395—400及其他各页)。——第368页。
- 393 指这句话:“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角色。”最初用于小册子《俄国和英国》的这句话,鲍威尔在他的

另一本小册子《俄国当前的立场》的开头又提到了。“前面引用的”这几个字是马克思加到鲍威尔的原文里的。——第369页。

- 394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初稿）》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中，对蒲鲁东的“人民银行”和“劳动货币”理论作了详细批判。——第371页。
- 395 1774年安·杜尔哥当上财政总稽核之后，在法国实行谷物和面粉自由，贸易。这一措施如同杜尔哥后来的改革一样遇到宫廷人士、上层僧侣、贵族、官吏方面的坚决反抗。1776年路易十六签署了关于免去杜尔哥职务的命令。
- 下面谈的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厂主、自由贸易派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建立的；它力求贸易的完全自由。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后，它不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著作以及在《资本论》中曾不止一次地分析和批判过同盟的活动。——第372页。
- 396 指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第372页。
- 397 指选举法改革法案（1832年通过），这项法案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取消某些“衰败的城镇”选派代表的权利（见注407），并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开始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1852年2月，罗素在议会就选举改革法案作了初步的声明，但是该法案甚至没有提交讨论。恩格斯在《英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7—240页）对这个法案的内容作了分析。——第373、426页。
- 398 暗指威·乌尔卡尔特，他认为帕麦斯顿是沙皇政府的直接代理人。——第373页。
- 399 关于福克斯把他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家罗伯特·阿德尔派往彼得堡去破坏威·皮特的计划的说法，是1821年在G·托姆林《关于尊敬的威廉·皮特的生平传记》三卷集，1821年伦敦版（G·Tomline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rable William Pitt, 3 Volumes, London, 1821）一书中提出的。——第373页。

- 400 对俄国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感到不安的小皮特，曾企图阻止雅西条约的实现。俄国外交利用英国报界，并同反对派领袖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建立关系，得以防止同英国外交关系的破裂。福克斯在下院尖锐地批评了皮特的政策。叶卡特琳娜在外交上取得对皮特的胜利之后，命令故意引人注目地为她在伦敦购买福克斯的半身像。把它放在皇村官狄摩西尼与西塞罗的全身像之间。大概马克思所说的“违法的联系”就是指这些情况。——第373页。
- 401 1716年英国和法国在汉诺威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在路易十五无后死去时，英国充当维护奥尔良王室继承法国王位的保证人。条约是由英国方面国王乔治一世的外交国务秘书斯坦霍普和法国方面的红衣主教杜布瓦签订的。根据这项条约，英国、法国和荷兰于1717年缔结三国同盟，1718年奥地利加入同盟（四国同盟）。关于这些事件马克思在本文中还将谈到。——第374页。
- 402 指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有关比利牛斯半岛问题于1834年4月22日在伦敦签订的协定。——第374、479页。
- 403 伊顿名将（Captain from Eton）是伊顿学院的大学生由于参加按议会辩论形式举行的政治辩论会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坎宁1788年毕业于该校而获得这一称号。——第375页。
- 404 马克思这里指坎宁1826年12月12日就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在英国议会上的发言。坎宁声称英国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原则（或见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伊奥拉斯的角色，伊奥拉斯“……拿着帝王权杖，坐在高高的小堡垒中，缓和它们的情绪，平息它们的怒气……”（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56—57页）。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是这个国家内战（1823—1834年米格尔战争）中的事件之一。——第375页。
- 405 指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老皮特）的反法政策，他在策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次战争使英国差不多侵占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所有领地。——第375页。
- 406 由于1810—182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的结果，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于1826年宣布独立（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葡

- 牙殖民地巴西于1822年宣布独立。——第375页。
- 407 “衰败的城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时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衰败的城镇”的特权被1832年的改革（见注397）、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375页。
- 408 原稿中是《Stämme》，《Stamm》这个词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历史科学中具有比现在更广泛的意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具有共同的族系的人的总和。这个词在这里根据所用术语的实际内容译成“民族”。——第379页。
- 409 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第25—26页。——第379页。
- 410 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结果，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9月），该条约确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并保证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俄国是被争得的权利的保证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1831—1832年在多瑙河两公国实施了组织规程，以规定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价，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5—267页）。——第379页。
- 411 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的一次事件，即俄军围攻爱琴海的港口埃内兹。埃内兹于1829年8月26日被西韦尔斯将军的部队占领。——第380页。
- 412 指鲍威尔引自利文的急电中的下列引文：“和约就是应当在我们的营垒内签订；只有在它签订之后，欧洲才能知道它的条件；那时抗议的时间就错过了，并不得不耐心地忍受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40页）马克思引自利文1829年6月13日（1日）致涅谢尔罗迭的急电的引文，是取自《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期第24页。——第380页。
- 413 1836年11月25日，在苏茹克-卡列港（高加索的黑海沿岸）英国“雌狐号”商船被一艘俄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在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51—461页)中详细分析过这一事件。——第381页。
- 414 关于法国国民议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1页。
- 415 《关于东方问题》草稿是马克思在摘录笔记本的末尾写的;注明的日期是1857年1—3月;根据这一点,草稿注明写于1857年3月。——第383页。
- 416 马克思指恩格斯写的关于克里木战争准备和开始时期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19、24—30、35—40页)。——第383页。
- 417 马克思这篇笔记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下行列两本书:G·F·马尔滕斯《十五世纪末至亚眠和约时期欧洲国家贸易和缔结和约的外交史概论》1807年柏林版,以及1849年匈牙利革命参加者的匿名出版物,即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两卷集)1857年伦敦版(并见注504)。马尔滕斯一书的摘录是马克思还在1853年9—11月间为了撰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而摘录的,《国家政策》的摘录是1860年作的(见本卷第448—480页)。这篇《笔记》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结论和评语。文章是根据照相复制件发表的,文件的准确日期非常难辨。《笔记》是马克思为研究俄英对外关系问题和一般外交历史而作的,时间不早于1857年年中。——第384页。
- 418 大胆查理死后,勃艮第和皮卡尔第公国转归法国。通过这些国土以及普罗凡斯与马赛的合并,路易十一完成了除布列塔尼外的所有法国领土的统一。——第384页。
- 419 指意大利战争(1494—1559)初期形成的反法同盟。关于成立同盟的条约是1495年3月31日由米兰、威尼斯、西班牙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们同罗马教皇在威尼斯签订的。马克思跟着马尔滕斯称同盟为“公共福利同盟”,把它同1464年底在法国以此名称出现的封建贵族同盟相类比,封建贵族同盟实际是由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领导,反

- 对国王路易十一执行的把国家统一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 第384页。
- 420 路易十二放弃了他1504年根据1500年条约获得的那不勒斯王国的那一部分；这一事件结束了意大利战争的第二个时期。—— 第384页。
- 421 指康布雷同盟建立之前发生的事件。—— 第385页。
- 422 1506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侵入米兰地区，被威尼斯人击溃；接着是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路易十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一些意大利国家（佛罗伦萨、曼都亚、费拉拉、萨瓦等）在康布雷城结成同盟对抗威尼斯共和国以瓜分它的领地。1508年12月10日康布雷同盟正式成立。法国在安尼亚德洛（在马尔胜斯书中是贾尔达达）取得胜利后，它过去的同盟者全都转而反对它，1511年10月5日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威尼斯、西班牙、英国和瑞士各州组成神圣（至圣）同盟。由于神圣同盟的行动，法军于1512年被赶出意大利。—— 第385页。
- 423 手稿这里可能有误。帕维亚会战和弗朗索瓦一世获释后，弗朗索瓦一世参加了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所谓科尼亚克同盟（见本卷第449页）。—— 第385页。
- 424 1559年结束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济和约是由两项条约（法国和英国之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组成的。根据这项条约，法国放弃对在意大利的领地的一切要求。恢复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占领的萨瓦公国，并把皮蒙特的一部分归并到该公国。—— 第386、451页。
- 425 1581年起义省的国会宣布菲利浦二世被推翻，1581年7月26日宣布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宣告尼德兰独立。—— 第386页。
- 426 尼德兰国会最初于1463年成立。国会代表各个省的利益，有表决赋税的权利。在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全国国会于1576年召开，革命胜利后国会便成为共和国的最高常设立法机构。—— 第386页。

- 427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签订后,法国继续同西班牙作战,直到1659年。1659年11月7日在比利牛斯山脉比达索阿河的野鸡岛上签订和约后战争才告结束。比利牛斯和约促使西欧的霸权从西班牙转到法国。——第386、456页。
- 428 指曼都亚王位继承战争(1628—1631年),它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在北意大利争得优势的战争是在贡萨加家族的旁系代表者之间进行的,即一方为瓜斯塔拉公爵斐迪南(费尔兰泰第二),他受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根据1528年条约实际从属于西班牙的热那亚所支持,另一方为法国的傀儡讷韦尔公爵卡尔(卡尔第一·贡萨加)。1629年,萨瓦公爵也不得不归附法国。战争的结局巩固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第386页。
- 429 指1648年10月24日在闵斯德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它是由两项相联系的和约即鄂斯纳布鲁克和约(一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同盟者,另一方为瑞典及其同盟者)和闵斯德和约(一方是皇帝,另一方是法国和它的同盟者)组成的。和谈是从1645年开始进行的。——第387、454页。
- 430 马克思引用的是伊·萨博《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第1卷第1章的标题,见第1页。——第387页。
- 431 指西班牙同尼德兰的单独条约,它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组条约中的一项(见注300、429)。——第387、455页。
- 432 波希米亚是捷克的正式名称,1526—1918年它加入哈布斯堡帝国时就用的这个名称。
- 说到大赦,马克思是指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对波希米亚许下的诺言,波希米亚在三十年战争中是在反哈布斯堡同盟一方作战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成为战场的捷克领土,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300、429),仍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第387、455页。
- 433 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结束了1688—1697年法国同奥格斯堡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

- 的战争,确认了战前的疆界而略有改变。法国应承认1688—1689年的政变(所谓光荣革命),政变后立宪君主制在英国得到了巩固。根据条约的条件,海地岛(圣多明各)西部让给法国。——第388、458页。
- 434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国家政策》一书第1卷第4、5、6章的标题,见第84、100、132页。——第388页。
- 435 指1713—1715年由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向反法同盟的参加者(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萨瓦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为另一方之间签订的条约(其中包括在乌得勒支条约(见注364)和拉施塔特条约)。条约结束了长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第388页。
- 436 马克思引用的是《国家政策》第1卷第9章的标题,见第247页。——第388页。
- 437 马克思可能是指亨利四世的谋士马·萨利的《合理地经办》一书中提到的国际协议草案;该书于1638年出版,作者是萨利,虽然他把草案说成是亨利四世写的。草案是在三十年战争高潮时写成的,并具有反哈布斯堡色彩,它的实质是要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排挤出欧洲,组成名义上由罗马教皇领导而实际上由法国统治的基督教国家的混合体。计划完全不现实,不符合真正的亨利四世的对外政策。——第389、452页。
- 438 手稿接着是统计数字,与主要内容无关。——第389页。
- 439 弗·恩格斯写的短条目《阿本斯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注53。——第390页。
- 440 下面发表的《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中的九条小条目(《阿克》、《阿克齐》、《阿兰群岛》、《阿耳登霍文》、《阿历山大里亚》、《阿尔梅达》、《小炮》、《安特卫普》、《阿尔贝雷》)都是恩格斯写的。这些条目都列入恩格斯写的“A”字头军事问题条目的初步目录里。恩格斯于1857年5月28日把这个目录寄给马克思,以后又寄给纽约《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6—138页)。——第391页。
- 441 圣约翰骑士——十字军骑士于十二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创立的天主教军

- 事僧侣骑士团的成员。他们在1291年失败后,把自己的居住地迁移到塞浦路斯岛,以后又相继搬到罗兹岛、马耳他岛和罗马。——第391页。
- 442 按照公元前40年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之间签订的布伦迪齐协定,安东尼得到罗马帝国的所有东部各省,屋大维得到所有西部各省,列庇都斯则得到非洲。——第392页。
- 443 关于这次博马尔松德会战,恩格斯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两篇专题文章,还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过一个小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42—451页、第14卷第295页)。——第394页。
- 444 指1714年7月25—27日俄国和瑞典舰队之间的汉古特会战,俄军获胜。——第394页。
- 445 从1857年5月28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来看,恩格斯还打算在这个条目里写1797年的战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7页)。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第396页。
- 446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有两个条目用的是这个标题;其中第二篇即本卷所刊载的这一篇是恩格斯写的。——第397页。
- 447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有三个条目用这个标题:《阿尔梅达》——葡萄牙的一个城市,《阿尔梅达》——巴西的一个海港,以及《阿尔梅达,弗朗西什库》——葡萄牙第一任驻印度总督。恩格斯1857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件使我们确信,恩格斯是第一个条目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7页)。——第399页。
- 448 指1831—1833年比利时荷兰战争时期比利时军队和法国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围攻。战争是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发动的,因为他拒绝承认比利时在1830年革命中赢得的国家独立。——第401页。
- 449 这里发表的弗·恩格斯的草稿《卜尼格先和巴克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合写的《巴克莱-德-托利》和《卜尼格先》两篇文章的第一稿。恩格斯把这个草稿随同1857年9月10日的信件一并寄给马克思,标题是按照恩格斯的信加上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2—94页,第112—115页,第29卷第162页)。——第404

页。

- 450 这个事实马克思已写在巴克莱-德-托利的传记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2页)。——第404页。
- 451 法军围攻但泽(格但斯克)从1807年3月持续到5月底。——第404页。
- 452 拿破仑的军队和俄军在斯摩棱斯克的会战发生于1812年8月16—18日(俄历4—6日)。——第405页。
- 453 马克思在文章结尾时指出:巴克莱-德-托利在1813—1814年的战局中的作用,按其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而恩格斯在这篇草稿中只谈到巴克莱-德-托利在1814年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3—94页)。——第406页。
- 454 《炮击》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写的,由马克思于1858年1月8日连同《玻利瓦尔-伊-庞特》、《战局》、《CAPTAIN》等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25—245页)一起寄往纽约,马克思1858年笔记簿上的笔记证明了这一点。——第407页。
- 455 《Cartouch》的译文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注252中发表过。——第408页。
- 456 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毕洛夫的文章是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倡议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最初打算由马克思写普通传记部分,恩格斯写军事部分。但是这个打算未能完全实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2、274页)。马克思寄往纽约的用同一标题的另一篇文章(见注459)看来是被《百科全书》编辑部删改过的。马克思最初写的这些短文证明了原来的更广阔的构思。——第409页。
- 457 贝拉利昂斯是比利时布拉班特省的一个村庄,在滑铁卢以南四公里处,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期间是拿破仑第一的司令部所在地。在德国书籍中,滑铁卢会战有时称为贝拉利昂斯会战。——第410页。
- 458 指1813年10月16—19日欧洲强国第六次同盟的军队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的莱比锡会战。“国际大战”以联军获胜而告

终。——第410页。

- 459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发表的以《毕洛夫》为标题的短文有两篇：《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和《毕洛夫，亨利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8年2—3月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篇短文是马克思写的（见注456）。——第411页。
- 460 由于1857—1858年印度人民反对不列颠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这次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动力，揭露英国的殖民政策。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这一篇文章（《把军队运往印度》）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1858年7月16日和20日之间写成的，并于7月27日寄往纽约。恩格斯的文章在谈到英国组织军事镇压起义的问题时，尖锐地批判了保守主义的和墨守陈规的帕麦斯顿政府的陆军部。恩格斯的文章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删改，特别是最后一段更可以看出删改的痕迹。编辑部还改了标题，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印度战争组织不善》。本卷用的标题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取名为：《把军队运往印度》。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注明了“《纽约论坛报》通讯”。——第412页。
- 461 马克思的通讯《法国革命的新宣言》是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利克斯·皮阿的抨击性文章《致法国名士的信》的一篇评论。马克思一向十分反对皮阿的挑衅性言论。皮阿在五十年代，后来又在六十年代在英国不负责任地号召谋杀拿破仑第三，而且泛泛地号召“弑君”。这就给了英国警察以驱逐革命流亡者出境的借口，也给了法国警察以迫害法国国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的借口。但是，这篇抨击性文章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注意，是因为其中有“一两件有意思的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46页），即证明了工人阶级自觉性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这一点就连始终激烈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并在第一国际活动的年代成为国际势不两立的敌人的皮阿也不得不承认。此外，马克思从皮阿的抨击性文章中援引了一些段落，证明波拿巴帝国已经发生危机和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经穷尽。马克思的笔记本里有关于把通讯寄往纽约的记载。

- 因为没有皮阿的小册子的原文，所以马克思对皮阿的原著有多大改动无法确定。——第419页。
- 462 伊克西昂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拉皮弗人的君主；伊克西昂追求女神赫拉，但被宙斯所蒙骗，宙斯把扮成赫拉的云彩献给他。皮阿暗指基佐所鼓吹的代议君主制的理想，具体地说是指他的著作《近代史教程。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史》（《Cours d'histoire moderne.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en Europe》）。——第420页。
- 463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维·库辛的著作：《朗格维尔夫人》（《Madame de Longueville》），《萨布莱夫人》（《Madame de Sablé》），《舍弗勒瑟夫人和奥特福尔夫人》（《Madame de Chevreuse et madame de Haute-fort》）等等。这些著作的总书名为《关于十七世纪著名妇女和社会的研究》（《Etudes sur les femmes illustres et la société du XVII^e siècle》）。——第420页。
- 464 1840年梯也尔担任法国政府首脑时，拿破仑第一的遗骸迁移到巴黎，安葬在残疾人院；同时皮阿还指梯也尔二十卷本的著作《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第420页。
- 465 百人卫队（Cent-gardes）是享有特权的皇帝个人的专门卫队，是根据法国1854年3月24日法令建立的。——第420页。
- 466 暗指天主教人士和波拿巴派人士中对天主教报纸《世界报》（《Univers》）编辑路·维伊奥的行为不满，因为他在该报上同所有持不同见解的人进行了丢丑的论战，同时还求助于教皇。——第421页。
- 467 指拉梅耐的报纸《人民制宪报》（《Le Peuple constituant》）停刊，该报最后一号在1848年7月11日出版。“穷人应该沉默”（“silence au pauvre”）这句话是拉梅耐在报纸的最后一号上说的。——第421页。
- 468 拉梅耐的遗嘱说把他葬在穷人的墓地，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第421页。
- 469 指1858年2月18日在比利时和皮蒙特讨论并通过惩处教唆谋刺和

谋刺参加者的法律。这是1858年1月14日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未遂以后为迎合拿破仑的要求而通过的法律。——第421页。

470 1858年在吉达(红海的港口)发生穆斯林同基督教徒的流血冲突。——第421页。

471 暗指路易·波拿巴在全民投票和宣布第二帝国成立之前不久于1852年10月9日在波尔多发表演说中的话。他为了赢得居民的同情,蛊惑性地声称:“帝国就是和平”。——第422页。

472 利未人²是古代犹太人的宗教神职人员。什一税是为他们征收的。——第422页。

473 这是皮阿从阿尔芒·卡雷尔1832年1月24日在《国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摘引的一段话。卡雷尔在文章中反对路易·菲力浦时期实行的非法的预防性逮捕。——第423页。

474 伊波德龙案件是对一批共和派的审判案。这些人在1853年夏季曾两次(6月7日在去伊波德龙的路上,7月6日在喜剧歌剧院里)试图谋刺拿破仑第三。——第423页。

475 这是指1850年成立的共和派的秘密团体“玛丽安娜”多次试图组织反对波拿巴帝国制度的斗争。

1855年8月26日夜间翁热的油页岩矿场的工人得到不确实的消息说共和政体在巴黎胜利,于是他们向城进发,被军队驱散。

1858年,在奥尔西尼1月14日谋刺失败以后,共和派在法国许多城市里试图发动政变,其中3月6日索恩河岸的夏龙发生军队哗变(关于索恩河岸的夏龙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36—440页)。——第423页。

476 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约翰·布莱特先生》一文,是马克思写的(见注482)。文中可以看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动,特别是第一段有很大改动,而最后一段完全是编辑部写的(见注485),评价布莱特时所用的热情的形容词也是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本卷

编辑根据文章的开头加的。

1858年11月16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1406号曾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是《英国的激进主义》。——第425页。

- 477 1858年6月11日,马克思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一文中写道:“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确原则的单纯的派系了。它们在试图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的努力遭到失败以后,现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们只有把它们共同利益奉送给共同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约翰·布莱特这样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39页)。——第425页。
- 478 关于曼彻斯特学派在1857年3月下院选举中的失败,见马克思《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1—185页)。——第425页。
- 479 由于1858年1月29日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对英国给予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权一事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向下院提出一项关于密谋的法案。2月19日二读时,米尔纳·基卜生提出一项得到布莱特支持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紧急公函没有给以应有的回答。下院多数通过的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表决,迫使帕麦斯顿辞职。——第425页。
- 480 这句话是《论坛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布莱特的演说就刊登在这一号报上。——第426页。
- 481 马克思指约翰·布莱特于1854年3月31日和1858年3月26日发表的演说。——第426页。
- 482 对布莱特这个纲领的评价,可参看1858年11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关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最近我只提到布莱特在北明翰召开的大会,要点是:他的提纲把人民宪章的要求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8页)。——第426页。
- 483 马克思指作为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宪章的第四条:“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

- 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7页)。——第426页。
- 484 “圆颅党人”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保王派给议会派起的辱骂性的绰号。——第427页。
- 485 下面接着是该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一段话:“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无论从政治的公正和人民进步的角度,还是从这个问题的解决导致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都满怀希望地欢迎布莱特先生的发言,并希望他在勇敢的崇高的创举中取得成就。”——第428页。
- 486 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稿《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说明马克思密切注意波拿巴帝国内部反对情绪的增长,并且补充了1858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论述法国财政、经济和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虽然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只注明了某月和某日,但是依据文稿中的事实可以确定文稿是1858年写的。文稿中划掉的地方这次发表时没有刊印出来。——第429页。
- 487 这里所发表的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通讯——《俄国的对外政策。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1837年俄国内阁草拟》所写的按语。在注明“纽约论坛报通讯。1859年7月14日于柏林”的通讯中,马克思转载了1859年7月13日乌尔卡尔特报纸《自由新闻》发表的文件:《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1837年内阁草拟》。由于围绕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和同波拿巴斗争(可耻的维拉弗兰卡条约刚刚签订——见注498)的问题斗争日益尖锐化,文件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借评论这个文件的机会“简单地论述一下俄国在这个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把波拿巴收拾一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41页)。这个想法马克思在另一次发表这个文件(把《自由新闻》的英文稿译为德文,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按语中也谈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这个文件时对它的个别地方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40、442页)。从《自由新闻》以后几号(1859年7月27日和7月31日)才真正弄清楚,发表的文件不是根据原文,而是根据1855年6月刊登在德国的保守报纸《普鲁士周

刊》(《Preussisches Wochenblatt》)上的材料,这篇材料象是这个文件的概述,其中有大量的引文(1855年6月9、16、23日《普鲁士时评周刊》(《Preussisches Wochenblatt zur Besprechung politischer Tagesfragen》)第23、24、25期)。这次发表也没有指出文件的来源、名称、也不是全文。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俾斯麦对奥托侯爵的纪念和回忆》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11—112页)(《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von Otto Fürst von Bismark》. Stuttgart, 1898, Bd. 1, S. 111—112)中直接了当说,这次发表的文件是伪造的。本卷准备出版时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中央古文件国家档案馆进行了研究,结果使人完全确信这个文件是假的。

对1859年7月23、26日和8月6、13日《人民报》用德文发表的文件按语刊印在本卷的脚注中。——第431页。

- 488 记事年表《意大利战争。1859年》,大约是1859年7月19日恩格斯因马克思请他给《人民报》写一篇关于拿破仑第三向意大利“进军的军事总结”的文章而草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37页)。恩格斯在写《意大利战争。回顾》一文时部分利用了这份年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77—490页)。事件大概是恩格斯凭记忆记的,因为在日期上有点不确切,编者在刊印时没有修改。——第432页。
- 489 1859年1月1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他说“法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了。”——第432页。
- 490 1859年2月中,英国得比政府为调解法奥冲突提出正式调停的建议。为此目的,考莱勋爵经拿破仑第三同意于1859年2月底被派往维也纳。马克思对这次使命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04—405页。——第432页。
- 491 对欧洲列强主张召开会议和和平解决冲突的真正意图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马克思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以及他们合写的文章《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和马克思1859年4月2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20—324、334、346页；第29卷第404—407页)。——第432页。
- 492 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革命(1859—1860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1859年4月27日开始的。革命后建立的托斯卡纳临时政府于1859年5月1日由卡洛·邦康帕尼公爵(他是维克多·艾曼努尔委派的托斯卡纳的王国特派专员)为首的内阁所替代。恩格斯称这个政府为“皮蒙特委员会”。——第432页。
- 493 恩格斯专论蒙特贝洛会战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9—391页以及第383—384、398—399、401—402页)。——第433页。
- 494 关于帕勒斯特罗会战,见恩格斯的《军事行动的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3—417页)。——第433页。
- 495 对马振塔会战的评价,见恩格斯的《奥军的失败》、《马振塔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22—426、427—434页)。——第433页。
- 496 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写过两篇文章《索尔费里诺会战》,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历史的公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48—461页。——第433页。
- 497 根据拿破仑第三同卡富尔在普伦贝尔(1858年)签订的关于在对奥战争中支持撒丁王国的秘密协定的条件,萨瓦和尼斯应当归并法国。——第433页。
- 498 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倡议,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没有皮蒙特参加)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初步和约。关于仓促签订条约的原因,见马克思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及恩格斯1859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6—468、469—471、472—476页;第29卷第435页)。——第433、434、446页。
- 498 《意大利的未来》一文的作者,是把这篇文章同马克思关于1859年的意

大利事务的其他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相比较而确定下来的,同时还根据可以证实马克思于1859年9月继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关于意大利的文章的通信。这篇文章被《论坛报》编辑部作了某些改动。——第434页。

500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对伦敦的德国工人作了多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本文是其中一次演讲的提纲。提纲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章的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第465—471页)互相呼应。手稿的开头部分已丢失。——第438页。

501 卡·马克思在《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中摘录了法国波拿巴主义政论家埃·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 年的普鲁士》,这篇通讯是在他1860年6月13日写的《普鲁士新闻》之前一天写的。通讯和文章都是反对混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的,揭露了这本安排在1860年6月16日拿破仑第三同普鲁士摄政亲王威廉会晤的前夕出版的阿布的小册子的沙文主义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7—78页;第30卷第64—66页)。此外,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再一次辛辣地抨击普鲁士的专制,并谴责欧洲民主派中普鲁士警探的挑衅性活动。马克思认为揭露阿布具有重大意义;他在《福格特先生》著作中又提到阿布,指出阿布的思想同拿破仑第三的领取秘密津贴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86—587、753—754页),马克思还鼓励德国的民主派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撰写专题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埃德蒙·阿布 一八六 年的普鲁士 一书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Napoleon III .und Preu en .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 Preu en in 1860 von Edmond About》(Ld ., 1860)),并且帮助他书写,审阅校样。

马克思在写通讯时,大概利用了从波克罕那里得到的阿布小册子的校样,因为马克思这篇通讯的标题、文章《普鲁士新闻》和摘录那本小册子的1860年的笔记,都引用了小册子最初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马克思的这篇通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2卷第2册。通讯同阿布的小册子已经核对过，马克思的话用大号铅字刊出。——第440页。

- 502 指1855年奥地利同罗马签订的条约，条约恢复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一系列特权。——第441页。
- 503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阿布小册子的这句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3—754页）。——第447页。
- 504 马克思的这篇著作是伊·萨博1857年5—6月在伦敦匿名出版的两卷本英文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并见注417）的摘录。伊·萨博的书不是什么创作，而是十六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战争期间到1856年巴黎会议这一段时期欧洲国家关系的历史汇编。马克思因为要写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而于1860年6月上半月做了这本书的摘要。马克思为了揭露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革命实质而需要顺便回顾这一段历史，因为福格特是拿破仑收买的暗探。马克思只从萨博受戴·乌尔卡尔特一定思想（见本卷第204—205页）影响写成的这本书中摘录了一些事实，完全没有涉及作者的观点。不过马克思常常在摘录中加进一些作者没有写的历史事实，从而提供了更加广阔更加全面的历史事件。某些事实是用德文写的。这次发表时，马克思加进去的话用大号铅字印出，以示区别。
-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的《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一章及其他几章使用了部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第448页。
- 505 卡耳马尔君合国（1397—1523年）是丹麦、挪威（包括冰岛）和瑞典（包括芬兰）在丹麦国王统治下联合在一起的君合国；十五世纪瑞典实际上已退出了君合国；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试图对斯德哥尔摩进行血腥镇压来恢复他对瑞典的统治，致使瑞典最终脱离丹麦而恢复了瑞典的国家制度（1523年）。——第448页。
- 506 指1526年5月22日订立的同盟（科尼亚克同盟）。——第449页。
- 507 夫人条约（*Traité des dames*）是对康布雷条约的讽刺性称呼。该条约是

- 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瓦的路易莎和查理五世的姑母玛格丽特的积极促使下于1529年8月签订的。——第449页。
- 508 指1530年查理五世和奥格斯堡议会拒绝接受宣讲路德教原则和规定其仪式的所谓奥格斯堡宗教。——第449页。
- 509 1534年亨利八世同教皇决裂并被议会宣布为英国国教首领(《至高权力法令》)。——第450页。
- 510 1604—1606年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广泛展开由匈牙利封建主伊什特凡·博奇卡伊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运动。有反封建要求的农民参加了这个运动,使得运动的领导人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根据1606年伊·博奇卡伊和鲁道夫二世·哈布斯堡签订的维也纳和约,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实现新教徒的信仰自由,皇帝的许多顾问由匈牙利贵族的代表们所代替。——第453页。
- 511 捷克从1618年持续到1620年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开始。领导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的起义的加博尔·贝特伦(见注512)是捷克人的同盟者。1620年11月8日在白山的决定性会战中起义者遭到失败。——第453页。
- 512 1619—1626年加博尔·贝特伦在匈牙利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属于三十年战争的范围,以1626年12月20日签订波容(布拉迪斯拉发)和约而结束。和约确认以前的条约的条件:匈牙利以放弃独立的国家体制而换得许多地方,包括斯洛伐克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加博尔·贝特伦的运动虽然带有妥协的性质,但却使匈牙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免于完全受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第453页。
- 513 指波兰和瑞典在法国的调停下于1629年9月26日签订的为期六年的阿耳特马尔克停战协定。停战协定使瑞典能够对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第453页。
- 514 这里是指构成三十年战争第三阶段的曼都亚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事件(见注428)。——第454页。
- 515 1635年5月30日德国新教派的公爵们同皇帝签订了巴黎和约。——第

454页。

- 516 奥地利的安娜，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妻子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的女儿。她在儿子路易十四在位并由她摄政期间(1643—1661年)，试图实行亲西班牙的政策。在奥地利的安娜摄政时期，实际上统治法国的是马札里尼。——第454页。
- 517 指伊·萨博在他的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中引用的布让1751年在巴黎出版的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史》。引号中的话是布让著作的引文。——第455页。
- 518 指1654年4月14日韦斯明斯特和约，该和约结束了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两个强国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的战争，以荷兰的失败而告终。荷兰不得不容忍旨在反对荷兰中间贸易的1651年航运法。——第456页。
- 519 这里指1658年2月26日丹麦和瑞典签订的结束它们1657—1658年的战争的罗斯基勒和约的条款。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资料中，把这些事件错误地列在1660年。——第456页。
- 520 领地所有权——在尼德兰许多地方有一种规矩：父亲第二次结婚时，他的土地应转交给他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娶了菲利浦四世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女儿玛丽·泰莉莎为妻的路易十四以此为借口，为获得西属尼德兰同菲利浦四世第二次结婚所生的儿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开战(所谓的1667—1668年领地所有权战争)。——第457页。
- 521 归并议会(Chambres de réunion)是1679—1680年路易十四在布赖扎赫市议会、麦茨和伯桑松的议会中附设的机构，其目的是从法律上论证法国占有阿尔萨斯、西洛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领土的权利。——第458页。
- 522 大同盟——1701年9月7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夕，皇帝莱奥波德一世、英国和荷兰在海牙订立的反法同盟。后来又有普鲁士、丹麦、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参加。伊·萨博称这次同盟为第二次大同盟，第一次大同盟是指1688年的反法同盟(见本卷第458

- 页)。—— 第459页。
- 523 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开始（见注264）。这次战争是由于1701年为了不让法军占领米兰公国派遣萨瓦的欧根率领帝国军队出征意大利而开始的。1702年正式向路易十四宣战。—— 第459页。
- 524 指在费伦茨第二·拉科齐领导下的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运动（1703—1711年）。农民积极参加了运动，特别是在运动的最初时期。农民的行动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这次运动由于签订背叛的萨特马尔和约（1711年）（拉科齐拒绝承认和约）和起义军的投降而告结束。匈牙利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组成部分。—— 第460页。
- 525 这里写错了。查理·哈布斯堡大公（查理六世）不是约瑟夫一世的儿子，而是他的兄弟。—— 第460页。
- 526 阿兰会议（1718—1719年）是俄国和瑞典的代表在北方战争（1700—1721年）的进程中对签订和约的条件进行的初步谈判。由于种种原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第461页。
- 527 1718年四国同盟是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后来奥地利也参加了同盟，其目的是支持乌得勒支和约（见注364）的条款，反对西班牙的要求。原计划有荷兰参加同盟，所以称为四国同盟。西班牙在阿尔维罗尼主持其对外政策时不承认四国同盟的要求，从而导致战争。战争以西班牙的失败而告结束。—— 第462页。
- 528 伊·萨博写错了，是德斯特雷元帅指挥的法军赢得了会战的胜利；路·弗·黎塞留元帅指挥这支军队是在1758年。—— 第466页。
- 529 指1757年12月5日在西里西亚进行的莱滕（吕廷）会战。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会战中击败奥军，保证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领。—— 第466页。
- 530 暗指七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和法国争夺殖民地。—— 第467页。
- 531 暗指自由否决权的原则。自由否决权是任何一个议员对议会决议提出异议加以否决的权利。这项权利从1652年开始采用，它加剧了波兰的封

- 建混乱局面。——第468页。
- 532 关于在北美对商业文件、司法文件、定期出版物等等征收印花税的法案于1765年3月22日由英国议会通过。——第469页。
- 533 马铃薯战争是以普鲁士和萨克森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为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1778—1779年）的讽刺性称呼。——第469页。
- 534 1778年就使用松德的问题，曾提出国际法五项原则为1780年宣布的“武装中立”奠定了基础（见注250）。——第469页。
- 533 1790年6—7月在西里西亚的赖辛巴赫城（杰尔若）召开奥地利、普鲁士、波兰、英国和荷兰的代表会议。会议参加者对俄军在俄土战争（1787—1791年）中取得的胜利感到不安，责成奥地利同土耳其签订和约（见注537）。——第470页。
- 536 结束1788—1790年俄国和瑞典战争的韦雷莱和约是在1790年8月14日签订的。俄国承认瑞典新宪法，俄国根据尼斯塔特条约和亚波条约获得的领土的权利也得到承认（见本卷第461、465页）。——第470页。
- 537 结束1788—1790年奥地利和土耳其战争的西斯托夫和约是1791年8月4日在保持战前状况的条件下在西斯托夫（保加利亚）签订的。奥地利只得到旧沃尔肖伐，而无权在那里构筑军事工事。——第470页。
- 538 结束1787—1791年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的雅西和约是1791年12月29日（1792年1月9日）签订的。该和约确认克里木归并俄国，规定德涅斯特河为俄国和土耳其的疆界，巩固了俄国在黑海沿岸的地位，并促进了对南部草原的开拓。——第470页。
- 539 以下是《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的第二卷的摘录；马克思在摘录中对第二卷的各章标上字母“a”：Ia、IIa等等。——第470页。
- 540 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的单独的巴塞尔和约（1795年7月22日），海地岛属于西班牙的部分（东部）让给法国。该岛的西部（1697—1803年称作圣多明各）根据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的条款早已归属法国（见注433）。十九世纪整个海地岛有时叫圣多明各岛。——第472页。

- 541 指法国和巴达维亚共和国签订的条约。这个共和国是由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进入尼德兰王国和当地居民起义反对威廉五世的反动的总督制而在尼德兰王国领土上产生的(1795年1—3月)。1795年5月签订的条约规定,共和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1806年拿破仑第一把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第472页。
- 542 指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一些邦的代表从1797年12月9日在拉施塔特举行的关于解决“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的谈判。1798年3月帝国代表团同意莱茵河左岸划归法国(看来,这个日期是马克思标记的),而1799年4月23日由于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开始,会议工作中断。——第472页。
- 543 帕尔泰诺佩共和国是1799年1月22日那不勒斯共和派依靠法国督政府军队的支持在双西西里王国的领土上宣布成立的。共和国存在到1799年6月23日波旁王朝政权(斐迪南四世)在英军的帮助下复辟时为止。——第473页。
- 544 指联邦议会。它由在1815年6月8日维也纳会议上组成三十九个邦的德意志联邦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没有自己的军队、货币手段,而它的决议实际上对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没有约束力。——第476页。
- 545 瓦特堡纪念大会是1817年10月18日在耶拿大学学生的倡议下为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莱比锡会战数周年而组织的。纪念会成为大学生反对梅特涅制度的示威。
-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影响下成立的德国大学生组织,主张德国的统一。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传播很广。——第476页。
- 546 指西班牙议会在1808—1814年西班牙革命时期于1812年3月18日在加迪斯通过的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规定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改造专制制度的西班牙的一系列制度。1814年5月4日宪法被斐迪南七世废除。在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过程中里埃哥再一次宣布加迪斯宪法,1823年10月1日又被早些时候曾对宪法宣誓过的斐迪南七世废

- 除。从1836年8月12日至1837年6月18日，该宪法第三次生效。——第476、477页。
- 547 指美因兹中央调查委员会。它是1819年8月31日在德意志联邦（见注544）成员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其他邦的大臣会议上成立的，其目的是镇压德国内部反对派的自由主义情绪和革命情绪。——第476页。
- 548 指十九世纪烧炭党人运动的早期阶段。那时烧炭党人在那不勒斯王国领导反法运动（反对缪拉特），支持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弗兰契斯科一世恢复他们双西西里王国的王位。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资料中把弗兰契斯科误称为皇帝。——第476页。
- 549 巴尔巴拉·克吕登纳在维也纳会议前，作为一个神秘主义情绪的预言者和鼓吹者在宫廷人士中已相当有名，她称亚历山大一世为“北方白天使”，称拿破仑第一为“南方黑天使”。——第477页。
- 550 乌列玛是穆斯林国家神学界和法学界的最高等级。——第477页。
- 551 “赫特里”是指“费里克·赫特里”秘密组织，1814年在敖德萨建立，1818年它的中心迁往君士坦丁堡。这个不久就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进行了希腊民族解放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开始（1821年）以后被解散。——第477页。
- 552 暗指约·卡波第斯特里亚在1809年担任俄国外交工作以前，在根据1800年俄土条约在伊奥尼亚群岛建立的“七联合岛共和国”政府中担任一系列职务时的情况。——第477页。
- 553 1833年2月俄国分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然后4月俄军陆战队为保卫君士坦丁堡抗击进攻的埃及军队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小镇登陆。7月8日（俄历8月26日），俄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同盟条约。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文，如果发生战争，土耳其必须封闭海峡禁止一切外国舰只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而在1840—1841年被废除。——第478页。

- 554 指庇护九世在他任职初期宣布的温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纲领（建立教皇辖区行政改建问题委员会、部分的政治犯特赦等）。——第479页。
- 555 以下的摘录，马克思不是根据原书顺序而是按照第二卷末尾附的编年表（《现代欧洲国家政策》第2卷第389—391页）写的。——第479页。
- 556 《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这篇简讯是恩格斯作为他1860年9月8日首先发表在《军事总汇报》上的《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9—156页）一文的按语写的。恩格斯把这篇简讯连同刊登在《军事总汇报》的文章一起寄给了英国的许多报纸。《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曾作为一篇完整的文章发表在1860年9月14日《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期。——第481页。
- 557 在杂志上接下去就是恩格斯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第481页。
- 558 《论大赦问题》一文是马克思根据1862年9月10—12日威·沃尔弗从曼彻斯特来信向他提供的材料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普鲁士大赦政治流亡者的蛊惑性质（见注559），在德国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文章发表在《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后来《下莱茵人民报》（《Nieder-rheinische Volks-Zeitung》）和《马尔克区人民报》（《Märkische Volks-Zeitung》）转载。1862年10月16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时谈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他说：“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可怜的撒谎成性的普鲁士人一拿起笔来就要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88页）——第482页。
- 559 1861年1月12日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极而颁布大赦令，保证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归普鲁士国土不受阻拦”。——第482、495页。
- 560 恩格斯《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这两篇文章是专供《军事总汇报》发表用的。正当统一德国的途径问题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时候，由于有可能爆发德国对丹麦的战争（见注564），恩格斯于1863年9月底写了这两篇文章。这篇恩格斯在世时未曾发表过的手稿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标上了恩格斯姓名的第一个字母（F . E . ），在这次发表时省略了。——第484页。

- 561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1863年5月16日《军事总汇报》第20号中发表的《1863年4月7日对查理斯顿的进攻》一文；关于“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之间的战斗的消息在《北美今年战局的经过和意义》（见《军事总汇报》1862年10月11日第41号）中也报道过。——第484页。
- 562 恩格斯指的是1862年3月9日南军装甲舰“梅里马克号”与北军装甲舰“蒙尼陀号”之间的战斗，“蒙尼陀号”的炮装置在军舰中部一座旋转的装甲炮塔上。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蒙尼陀号”打跑了自己的敌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42页）。——第484页。
- 563 指的是1863年6月17日发生的会战。——第484页。
- 564 恩格斯是指由于1863年下半年丹麦和德意志联邦之间因德意志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问题而关系尖锐化，有可能同丹麦打仗。在1848年革命期间，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展开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运动，运动以革命力量的失败而告终。按照1852年5月8日关于丹麦君主国的完整性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尔施坦公国留在德意志联邦，并同时成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则成为丹麦王国的成员，但保留某些特权。直到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为止，丹麦的统治阶级始终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隶属于自己，这就促使这两个公国和德国本国内反丹麦情绪的加强。——第487页。
- 565 关于蒙塔郎贝尔的筑城体系，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筑城》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44—349页）。——第488页。
- 566 吉尔莫尔将军炮击皮尤拉斯加堡垒发生在1862年4月10—11日。看来，恩格斯如同他自己在下面所写的那样，掌握的情报不够确实，在夺取皮尤拉斯加堡垒的会战中，吉尔莫尔使用的不是滑膛炮，而是线膛炮。——第489页。
- 567 对座落在岛上的、掩护通往萨姆特堡垒的进路的瓦格纳堡垒进行第一次炮轰和射击的尝试，是在1863年7月10日，7月18日开始对堡垒进行正规的炮轰和围攻。在9月6日的夜里，同盟派的军队放弃了堡垒。查理斯

- 顿计划是作为1863年5月16日《军事总汇报》第20号的附刊发表的。——第490页。
- 568 在恩格斯所描写的炮轰以后，联邦军在达尔格伦的指挥下于1863年9月8日试图夺取萨姆特堡垒。登陆的失败使北军的指挥不得不放弃从海上占领查理斯顿的打算。——第491页。
- 569 这篇《讣告》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注583中发表过。——第493页。
- 570 《威廉·沃尔弗简历》是马克思在他的忠实的朋友和战友1864年5月9日在曼彻斯特逝世以后于1864年5月底至6月初写的。马克思打算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并为此目的收集了他的生平材料。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是到了1876年恩格斯才部分地实现了马克思的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简历》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注391中发表过。——第494页。
- 571 西里西亚的普鲁士监狱。威·沃尔弗曾因参加大学生协会和“反普鲁士国王陛下罪”被监禁在这里。沃尔弗因他写过一篇关于布勒斯劳贫民窟的文章《暗堡》而得到“暗堡”沃尔弗的绰号。这篇文章发表在1843年11月18日《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271号。——第494页。
- 572 指由德国民主派评论家、后来是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的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在布鲁塞尔创办的通讯社。通讯社给德国民主主义报纸提供来自法国、英国、比利时的消息。——第494页。
- 573 由于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于1848年9月26日停刊，许多编辑（恩格斯、沃尔弗、毕尔格尔斯等人）被控告从事密谋活动。沃尔弗在杜尔克海姆（普法尔茨）躲避逮捕，但不久秘密回到科伦，继续参加报纸编辑工作。——第494页。
- 574 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沃尔弗1848年作为西里西亚的代表当选议员），威·沃尔弗要求宣布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和他的大臣们是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9卷第101—102页)。——第494页。

- 575 马克思提出的有关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的决议,是对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7页)第4、5、6条中扼要阐述的一般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第496页。
- 576 写这个决议是按照1864年11月12日伦敦工人报纸《蜂房报》发表的原文刊印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记录本中关于这一点的记载较为简略。这个决议取消了当时盛行的名誉会员资格,统治阶级的代表曾利用这种资格钻进了工人组织的领导机构。——第496页。
- 577 这个决议同1864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9页)有直接的联系。根据临时章程第8条的规定,总委员会除领导整个组织外,还负有吸引英国工人团体加入国际的特殊任务。马克思对这一条的贯彻实行颇为重视。——第498页。
- 578 小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或简称委员会,是由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执行机构的名称,它通常在星期六开会,以筹备总委员会的例会。实际领导小委员会的是以德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该组织的马克思。——第498、511、531页。
- 579 这个札记是马克思为在1865年3月4日和5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黎支部的创始人、蒲鲁东派工人(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和以律师昂·勒福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准备的材料。常务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0页。
- 保存在马克思笔记本中的这个札记是根据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德国流亡的共产党人维·席利1865年2月25—28日从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写成的。——第499页。
- 580 这里马克思笔误:“2月23日”误为“2月24日”。因此,2月24日的事情,尤其是晚上的会议,也被误为2月25日的事情了。从惊叹号来看,这个日期也引起了札记作者的怀疑。——第499页。

- 581 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对巴黎支部的冲突做一简要分析,以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荣克于1865年3月12日将此事告诉马克思并请求给予帮助。3月13日马克思答复同意,并于3月18日把所写的便条给荣克。进一步商榷的结果,加上了最后的几段(从“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开始),其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部分是荣克写的。——第500页。
- 582 反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的全权代表的抗议书是由流亡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伦敦的一个共济会分会的会员起草的。在1865年3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抗议书。——第500页。
- 583 确定马克思是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一书的简介的作者,是根据马克思1865年3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04—107页)。
- 这篇简介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73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学情报通报》(《Науч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ектор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第25期。——第504页。
- 584 普鲁士宪制冲突发生在1860年2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提案。直到1866年,普鲁上政府不顾议会的反对实行了军事改革,并不经议会批准开支了这项经费。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内阁的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创始人俾斯麦彻底投降后,冲突才获得解决。——第504页。
- 585 进步党是1861年6月在普鲁士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第504页。
- 586 马克思笔记本里的这个草稿,是对他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总委员会宣读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所做决议的初稿;决议的最后定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9页。——第505页。
- 587 这个决议是马克思在1866年1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在同意约·韦斯

- 顿关于开始讨论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后提出来的。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第507页。
- 588 马克思认为,吸收已经兴起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国际,必将加快使意大利工人摆脱马志尼派影响的过程。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没有派代表参加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第508页。
- 589 发表在1866年6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和7月8日《左岸》(《Rive gauche》)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最后一项,即第十二项,提出了建立互助会,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问题。在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这项建议包括在这一点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14页)。——第509页。
- 590 这个调查大纲是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的大纲之一。这个大纲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后收入《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5页)。——第509页。
- 591 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上,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在批准章程时企图通过如下观点:不仅担任工人组织领导职务的人,而且工人组织的成员都必须是工人。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马修·劳伦斯提议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就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一种表示。但是马克思拒绝当候选人。——第511页。
- 592 这个决定是根据1867年9月28日《蜂房报》第311号发表的文本刊印的。关于不委任常务主席的建议由总委员会委员约·黑尔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在9月24日的会议上提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59页)。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在一项特别决议(这项决议在1871年已被写入章程)中,建议所有支部废除常务主席一职。——第512页。
- 593 马克思提出这项决议案,是由于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撇开总委员会,对即将召开的协会洛桑代表大会提出了它自己的充满蒲鲁东主义味道的议程,并在1867年7月20日把它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第513

页。

- 594 马克思根据约·巴·施韦泽的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6、79页)写的这篇短评,曾收在关于1868年5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1868年5月16日《蜂房报》第344号)里;这个材料在记录本中没有反映出来。——第514页。
- 595 在发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马克思选出同时发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涉及:国际在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中的作用,八小时工作日,儿童和妇女的劳动保护,组织合作生产和工会的任务(《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2、3、4、5、6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4—221页。——第515页。
- 596 米·巴枯宁于1868年秋建立的团体,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于1868年12月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15日讨论了同盟的纲领后,根据马克思关于接纳另一个国际团体加入协会是同章程相抵触的这一意见,委托他起草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
- 马克思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的评语写在这个文件的法文文本的页边上;荣克在页边上记下了熟悉该文件并在讨论文件时发言的杜邦和若昂纳尔两人的姓。——第516页。
- 597 1868年12月15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他帮助荣克起草一份关于委员会活动的简报,结果就有了这篇包括最近几次会议材料的报道。记录本中没有这篇报道中所提到的马克思和阿普耳加思关于国际对自由贸易的态度的决议案。——第522页。
- 598 这个文件是总委员会1870年3月8日会议批准的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1870年2月1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34页)和3月5日讨论了里昂支部冲突的问题。——第524页。
- 599 这封信是对汉诺威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1870年1月12日请求马克思协助同英国工联建立联系的答复。以荣克为首的总委员会代表团受委托进行谈判,荣克于4月12日报告了4月7日同伦敦机械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晤的情况;该委员会表示愿意同德国和法国的机械工人建立联

- 系,并提出英国工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专题调查表。马克思这封信中复述的调查项目同1870年4月13日荣克给马克思的信中保存的英文原文(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第162页)在文字上稍有不同。——第526页。
- 600 这个文件是恩格斯关于1871年7月1日他和马克思同英国民主派新闻记者罗伯特·里德谈话的笔录。里德6月30日曾建议马克思利用公社时期他在巴黎任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电讯》通讯员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为公社社员辩护。——第527页。
- 601 1871年4月12日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开除倒向凡尔赛分子一边的工人阶级叛徒昂·托伦的决定。1871年4月25日总委员会做出专门决议(见本卷第681页)批准了这一决定,该决议只有工人报刊发表了。——第528页。
- 602 保存在马克思遗稿中的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本的摘要,是由马克思、部分由恩格斯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记在两大张纸上的。摘要一直记到1871年9月5日。这里还有马克思在一年以后,即1872年8月底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前夕,记在一页纸上的关于1870年6月—1872年4月的记录摘要(见《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第580—581页)。这两份手稿上划有一些记号和线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国际的文件时利用过它们。——第529、599页。
- 603 在1871年10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中只记下了这个发言的题目(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232页)。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恩格斯把本人写的通讯交给总委员会秘书,以便在《东邮报》发表(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80页)。恩格斯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547页。
- 604 在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中恩格斯的发言是这样记载的:“公民恩格斯说,他有来自意大利各支部的许多消息,他想把它交给秘书以便每周在《东邮报》上报道。加里波第终于同马志尼断绝关系的信件,在意大利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得到该信,就把它放到报道中去”

-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1页)。恩格斯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550页。
- 605 指马志尼在1871年7月13日，9月7、14和21—22日在《人民罗马》(《Roma del Popolo》)报第20、28、29和30—31号上的文章。——第550页。
- 606 1871年11月1—6日在罗马举行了基本上处于马志尼影响下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主要是互助组织的第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第553、554页。
- 607 指倍倍尔1871年10月30日和11月8日在帝国国会中的发言。——第557页。
- 608 声明是用来在1871年11月23—25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审判中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执行委员会委员威·白拉克等人进行辩护的。因该党在普法战争中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而于1870年9月被捕的被告人被指控“危害社会秩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起诉的主要罪状是加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16页)。其实，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在爱森纳赫的成立大会上曾考虑到德意志各邦现行的有关工人联合会的法令，宣布赞同国际的纲领，但形式上不加入国际；至于个人加入外国(科学和其他的)团体，则法律并不禁止德国臣民这样做。——第558页。
- 609 按照爱森纳赫党的组织结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驻在地由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指定轮流设在国内的大城市；执行委员会从地方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个驻在地曾指定设在不伦瑞克市。马克思起草这个文件时，新的执行委员会已经从1871年8月起设在汉堡。——第558页。
- 610 恩格斯的这个报告没有收入会议记录，看来它是在1871年12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做的，并写成了书面形式交给报刊发表。这个报告是根据国际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和路易·皮奥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写的。——第560页。
- 611 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是1872年2月底—5月底从美国的国际各支部领导人

的报告和信件中以及美国报刊有关北美联合会分裂的消息中做的摘录。马克思在起草总委员会关于合众国联合会内部分裂的决议时,以及恩格斯在写《国际在美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59、106—113页)时都曾利用过这个摘录。——第562页。

- 612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1872年6—8月修订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草案,拟提交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批准。由于时间仓促和代表大会总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只限于解决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章程中写进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第七条(a),为了加强纪律和组织上的集中制,对条例中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用作修订的原稿是1871年共同章程的正式法文本,总委员会通过对原稿所作的修改是保·拉法格亲笔记下的,同马克思本人写的草稿完全一致。——第572页。
- 613 在1872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共同章程草案时,总委员会委员,英国社会主义者马耳特曼·巴里建议去掉“存在有现代社会的。这几个字,说它限制了协会活动的范围。恩格斯为此声明说:“如果象所建议的那样去掉这句话,就会把协会变成一个类似资产阶级创建的慈善性团体。现代社会——这是一个资本进行统治,而工人只被当作工具使用的社会。认为可以立即把古巴或巴西的奴隶,或者把中国和印度的居民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那是荒谬的。在他们获得解放以前,他们应先成为自由的工人。抛弃‘现代社会’这几个字就意味着取消这种实质性的提法”(《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89页)。——第572页。
- 614 在章程的以前的文本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是要成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6页)。这个修改根据的是马克思在1872年7月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说明。记录簿中写道:“关于章程第一条,公民马克思建议去掉‘成为……联络……中心’这些字,理由是协会的发展已经使情况有所改变,他建议改为‘组织……各国工人的共同行动’。他说,为了防止错误的解释,作这种修改是必要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91页)。——第573页。

- 615 马·巴里建议去掉这一条中的“工人”一词,认为这是多余的重复。马克思反对他的意见,说:“这纯粹是文字上的问题,不过他认为,最好不要改动,因为代表大会可能会把这样做当作是委员会企图抹掉代表大会的工人性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92页)。——第573页。
- 616 第八条是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的简要提法,由海牙代表大会批准,写进章程作为第七条(a)。在1872年6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一条时,恩格斯和马克思支持关于把这一条写进章程的建议:“公民恩格斯支持这一建议。我们在代表会议上采纳这一条的理由至今仍然有效,因此我们应当争取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它。
- 公民马克思说,还有另外的考虑。我们有两种反对者:拥护摒弃政治的人,他们攻击这个决议案比谁都厉害,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他们让资产阶级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自己。我们应当揭露这一情况而加以制止”(《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96页)。——第577页。
- 617 对第九条的补充是按马克思的建议做出的,马克思根据的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斗争中成功地应用了这一原则的北美支部的经验。——第577页。
- 618 指1872年6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0—11期发表的米·巴枯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总委员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5页)的答复。——第586页。
- 619 由海·荣克署名发表的《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在1872年7月2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讲述了它的内容。记录本上保存了这样的记载:“马克思说,在瑞士已经开过三次代表大会,比利时人早在1870年就提出荷兰;荷兰是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北部的中心点,没有必要重新审理委员会原来的决议。(通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239页)。——第587页。

- 620 发表在1872年8月21日《人民国家报》上的这篇简讯，同恩格斯同时期写的《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40页）在内容上是一致的。——第589页。
- 621 1872年8月25日写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巴枯宁分子诬蔑性攻击的答复。巴枯宁分子在1872年8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4期上竭力把国际内部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德国共产党人的“独裁者的”野心。与奥地利代表新闻记者奥伯温德从海牙寄给《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署名为“g”的那些文章不同，马克思的文章没有署名。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72年9月2—7日。报告和书信》1972年莫斯科版。——第590页。
- 622 1872年7月21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不列颠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声明必须建立一个以国际的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工人政党。——第592、723页。
- 623 指凡尔赛国民议会委员会对3月18日起义和建立巴黎公社原因的官方调查（《议员对三月十八日起义的调查》）。——第594页。
- 624 这个看法是恩格斯说的。他在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的《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末尾提出了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59页）。下面引自约·哥·费希特的著作《1807和1813年的政治文摘》的话不完全确切。——第595页。
- 62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的建议被通过之后代表大会的代表——布朗基主义者示威性地离开了海牙。——第596页。
- 626 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巴黎代表的这个声明没有保存下来。这个声明实质上同国际法国支部的其他著名文件是一致的，但在文字上有所不同。——第596页。
- 627 下面引的这段话同海牙代表大会正式记录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报纸对会议情况的报道中的德国代表的任何一次发言都不一样。显然，马克

- 思这样写是为了给联邦主义者的立场以更多方面的批判。——第596页。
- 628 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9月6日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并在同一次会议上以26票对23票、9票弃权通过的。这一建议的详细理由见本卷第609—611页。——第603页。
- 629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阿·赫普纳给《人民国家报》写了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道而被捕之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文章的结构和内容都很近似恩格斯1872年10月1日为《人民报》（《La Plebe》）写的《海牙代表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84—190页）。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1872年10月21日编辑委员会最终确定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正式法文本。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引文同《全集》发表的决议原文（同上第165—177页）在个别地方有细微差异的原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报告和书信》1972年莫斯科版。——第604页。
- 630 原稿此处和下面用的是“宗得崩德”一词，这个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用来指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关于这一名称的起源，见注65。——第614页。
- 631 恩格斯关于欧美工人运动的简讯同1873年1—2月登载在同一报纸上的他的《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45—349页）相衔接。《简讯》与《报道》（同关于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一起刊登在报上）不同，单独登载在《国外工人运动消息》或《大陆工人运动消息》一栏里。《简讯》的材料来源，除了恩格斯在同朋友们和战友们广泛通讯中得来的消息之外，就是各国的工人报刊，首先是莱比锡报纸《人民国家报》和马德里的《解放报》（《Emancipacion》）。——第616页。
- 632 这篇《报道》登在关于1873年5月8日举行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例行会议的报告之中。——第629页。

- 633 暗指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见注628）后，它的前任书记约翰·黑尔斯企图把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分裂出去的改良主义派变成所有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的某种中心。黑尔斯把持国际工人运动的野心在大陆上没有得到支持。——第629页。
- 634 这个文件是洛桑的瑞士当局为弗·恩格斯离境前往伦敦而发给他的，这时被驱逐出巴黎的马克思已经到达伦敦。恩格斯是由于在德国西南部起义失败而到瑞士的（见注74）。1849年8月23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坚持要他转赴伦敦，说：“……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注6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160页）恩格斯绕道意大利和西班牙前往英国，因为法国政府不准他过境。——第633页。
- 635 这里发表的《收据》证明了这是对社会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1849年9月20日发表的《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95—596页）的第一批响应者中的一个。——第635页。
- 636 这里发表的材料是《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的摘录。这次起义是德国人民群众维护帝国宪法（见注640）斗争中的一次。摘录谈到弗·恩格斯带领佐林根武装工人的队伍（见注641）赶到爱北斐特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委托恩格斯领导构筑防御设施并让他指挥炮兵。恩格斯的坚决行动和他依靠工人的意图吓坏了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根据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见注637）的要求，恩格斯不得离开该城。
- 这个摘录（除最后两段之外）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70年《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杂志第11期。——第639页。
- 637 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许纳拜恩（裁缝）、约翰·波特曼（铜匠）和尤利乌斯·特罗斯特（食利者）。——第639页。
- 638 指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军事委员会。——第639页。
- 639 黑、红、黄是象征德国统一的颜色。——第639页。

- 640 指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尽管这个宪法有它的局限性和向封建反动势力作了让步，但它毕竟是在德国统一和德国民主化的事业中前进了一步。然而，法兰克福议会没有实施这部宪法的实际权力，而一些德意志最大的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的政府拒不承认这部宪法。1849年5月，德国人民群众（在莱茵省、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开始发动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领导这些起义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胆小的和指望妥协的政策导致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失败。——第639页。
- 641 指1849年5月初在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的支持帝国宪法的起义。对格莱弗拉特附近的军需库的袭击使起义者（其中有许多佐林根工人）装备了必要的武器。市政当局被撤换，由安全委员会取而代之。起义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遭到失败。——第640页。
- 642 关于马克思也参加的、1850年4月5日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的集会的报道，除了《大胡蜂》报（《Die Hornisse》），《民主评论》1850年5月号也发表了。在这则关于恩格斯的演讲的报道中有如下一段话：“德国流亡者致了答辞，并以举杯向英国无产者祝贺而结束了非凡的演说。”“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后来他们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1848年宪章派失败之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完全瓦解了。——第642页。
- 643 平等派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647年在全国范围形成。——第642页。
- 644 这里发表的恩格斯亲笔记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20日起草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5—357页）中使用过。——第643页。
- 645 1850年9月，在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刽子手海瑞逗留英国期间，巴克莱和彼尔金斯公司啤酒厂的工人殴打了这位奥地利将军；奥地利

将军在警察的保护下跑掉并立即离开了英国。“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642）为了表示支持和同情工人的这一行动，于1850年9月10日举行集会。恩格斯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除《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 Weekly Newspaper》）发表了恩格斯演说的最完全的记录之外，1850年9月14日《北极星报》第673号、9月11日《泰晤士报》第20591号、9月2日《纪事晨报》第26139号也发表了关于他的演说的简讯。两家德文报纸——1850年9月13日《德意志伦敦报》（《Die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285号和9月18日《大胡蜂》报第218号也发表了这次集会的报道。——第646页。

- 646 1850年12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哈尼的邀请，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642）新年聚餐会。哈尼在会上概述了协会一年的活动总结 and 欧洲的政治形势。恩格斯当时同马克思都已经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他在聚餐会上代表这个协会发表演说可能事先同该协会的领导，其中包括同卡·沙佩尔有了协议。恩格斯的演说记录虽然非常不完全，但是证明，恩格斯在演说中阐述了他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不久会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应当提出新的任务。——第651页。
- 647 这里发表的文件是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2年》）时写的。普鲁士当局策划这起案件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组织和整个民主主义反对派。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其他文件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普鲁士当局及其代理人的挑衅、伪造文件和无耻行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文件安全转交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埃塞尔第一和冯·洪特海姆，曾经使用过目录中列举的商人和商号的名字。恩格斯保障了这些通讯处中的大部分，为此他曾利用自己的商业关系。——第652页。
- 648 (3) — (5) 是恩格斯写好的有商业通讯处的信封。10月28日他把这些信封寄往伦敦马克思处，以便把给洪特海姆、埃塞尔第一、施奈德第二的信装进这些信封里寄出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

- 175页)。——第652页。
- 649 指马克思经杜塞尔多夫寄给施奈德第二的一封信，信寄到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德国商人的名下。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它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652页。
- 650 指1852年10月26日马克思致施奈德第二的信。马克思认为这封信非常重要，托别人寄往科伦施奈德处，共四份，其中一份经维尔特从曼彻斯特寄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3—164页），另外两份恩格斯在本目录（1）和（8）中提到。这封信没有找到。——第652页。
- 651 指1851年1月27日海·贝克尔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9页）和丹尼尔斯就他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致马克思的几封信。——第652页。
- 652 指1848年12月26日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过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7—508页）。——第652页。
- 653 指马克思通过当时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格·荣克捐给施奈德第二的一些文件，文件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希尔施参与了伪造，并揭露了施梯伯证词的虚伪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496—506页；第28卷第169—170页）。——第652页。
- 654 指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茨茨的所谓档案一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7—471页）。——第653页。
- 655 在文件的末尾是恩格斯绘制的1852年7月—10月的月份牌。——第653页。
- 656 燕妮·马克思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1856年7月23日在特利尔逝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卡·马克思作为其女儿的丈夫应当亲自参加财产的分配。马克思由于不可能亲赴德国，写了这份在特利尔生效的委托书。——第654页。
- 657 下面的字迹看来是特利尔公证人的手笔；燕妮·马克思的签字是本人写

的。——第654页。

- 658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唯一一份记录，出自格·埃卡留斯的手笔，但不太令人满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和埃卡留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83页和第453—454页）中批评了这个纪录，指出记录含有同演说完全相反的意思。其中包括最后的一句话，即似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能采取共同的行动。——第656页。
- 659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决议是作为总委员会1866年6月19日、26日，7月3日和17日在马克思参加下所展开的讨论的总结通过的。这项决议的基础是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最初议案。这个议案在马克思发言之后作了修改（关于讨论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30页）。——第659页。
- 660 马克思提出的建议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1页。——第660页。
- 661 马克思1868年6月2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这次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94—95页）。——第660页。
- 662 在总委员会记录簿1868年7月21日的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的：“公民马克思。德国。工人总联合会打算用迂回的办法做普鲁士法律所禁止公开做的事情。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各邦里存在另一个工人联合会，它在瑞士有若干分会；它们也打算参加。赖德律-罗兰党出版的新报纸《觉醒报》对国际协会反映较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6—1868》第161页）。——第662页。
- 663 马克思在1869年2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详细地讲述了恩格斯用德文写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5—392页）。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本卷发表的报纸报道比记录更完全和更准确一些。——第663页。

- 664 这个文件是以美国报纸(可能是《民主主义者》(《The Democrat》))的剪报形式保存下来的,剪报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在1870年4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里有马克思关于休谟的信和信中所附要求总委员会在每个国家建立不同国籍工人的专门代表机构的报告书的如下发言记录:“公民马克思不同意报告书,因为在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不同国籍的代表,其他一切问题应交协会的通讯员处理。信中说,美国工联运动倾向于采取秘密团体的形式。驻纽约的德国通讯员的信证实了这一点,他要求委员会干预此事并尽力劝阻休谟和杰塞普不参加这个运动。”委员会通过了要求进一步说明事实真相的决议(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8—1870年》第163页)。——第665页。
- 665 指1871年1月2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以工人的名义要求英国政府使普鲁士停止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第667页。
- 666 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它是欧洲列强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后签订的1856年巴黎和约的一个附件。——第668页。
- 667 1867年7月4日比斯利在伦敦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伪善地就1866年秋设菲尔德罢工时期因招募顶替者而引起的冲突事件对工联首领布罗德黑德进行迫害。——第668页。
- 668 1871年1月10—12日勒芒战役失败之后,新组成的尚济将军军团败退,损失惨重。——第669页。
- 669 1871年1月5日在大炮街的一家旅馆大厅里召开的由律师约·梅里曼主持的会议,号召英国政府促进普鲁士和法国之间议和和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第672页。
- 670 指1855年6—7月由于议会决定限制酒店在星期日的营业时间而在伦敦举行的群众示威。——第673页。
- 671 马克思在1871年4月25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过去只是发表过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73—674页),由于不久前发现了记录簿中的一页,这里才得以发表了讲话的全文。记录

- 同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号刊载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之间的最重大的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680页。
- 672 指1871年4月23日在伦敦收到的奥·赛拉叶4月12日和15日的两封信。——第681页。
- 673 在前一次会议，即1871年4月18日的会议上，由于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托伦被开除出国际的电讯，总委员会通过决定：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就发表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的决议。保存下来的英文本总委员会的决议案是恩格斯的亲笔，上面有几处马克思作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1页）。——第681页。
- 674 马克思在1871年4月26日左右给列·弗兰克尔的信中完成了这个委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17—218页）。——第682页。
- 675 保尔·拉法格从1871年4月6日至12日在巴黎。——第682页。
- 676 恩格斯支持荣克关于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预定1871年5月16日在伦敦共济会大厅举行的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提议。——第685页。
- 677 莫特斯赫德反对参加纪念会，他说：“欧文并不象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有独创之见。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法国老一辈作家那里拿来的，他的宗教思想则来自洛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136页）莫特斯赫德还硬说恩格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 是宪章派”。——第685页。
- 678 在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的：“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寄信给《观察家》和《旁观者》，揭露据说是国际巴黎支部发表的那些宣言。所有这些宣言都是凡尔赛警察当局的捏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159页）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信没有发表在上述报纸上，我们所得到的只是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0页）。——第687页。
- 679 马克思同《世界报》驻伦敦记者R·兰多尔谈话的记录，以前是根据1871

- 年8月12日国际美国支部机关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刊载的节录译成俄文发表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81—688页)。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1972年《在国外》(《3a py^{6e}AKOM》)杂志第45期。——第688页。
- 680 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作家查理·高弗莱·李兰德(1824—1903年)的幽默作品《汉斯·布赖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第688页。
- 681 记者的记录不准确:1871年春在巴塞罗纳发生的是纺织工人的罢工,同时发生的雪茄烟工人的罢工是在安特卫普。——第691页。
- 682 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秋季在马克思的直接参加下成立的英国工人群众性组织。马克思认为它是英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化的道路之一。——第691页。
- 683 1870年春宣布的全民投票,按照法国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意思,应当巩固由于整个波拿巴制度的危机而摇摇欲坠的拿破仑第三的统治。在发表这个蛊惑性的告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书的同时,对无产阶级和左翼共和派的运动进行了镇压。——第692页。
- 684 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前根据法文记录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93页)。这里是根据埃卡留斯作的英文记录发表的。这两份记录可以互相补充。——第698页。
- 685 伦敦代表会议是在对国际成员采取警察恐怖和迫害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秘密的性质,它的工作是关门进行的。然而报刊透露了这次会议的消息:1871年10月2日(《苏格兰人报》)(《Scottsman》)发表了埃卡留斯阐述代表会议过程及其最重要的决议的文章,欧美许多报纸都予以转载,而伦敦报纸《谁来了》(1871年11月7日和8日第31—32号)还在代表会议决议正式公布之前就刊载了从一个排字工人那里秘密得到的决议稿。——第699页。
- 686 指恩格斯1871年12月19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簿中的这次发言记录是准确的(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年》第

33页)。——第701页。

- 687 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发言时通报了德国、美国、瑞士和英国的情况。他的发言中有关英国政府对公社流亡者的态度的摘录，曾用法文刊登在1872年1月10日《平等报》第1号上，用德文刊登在1872年1月20日《哨兵报》第3号上。这篇通报中的某些部分还在1872年1月21日（8日）莫斯科报纸《当代新闻》（《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звестия》）第7号的国外通讯中引用过。——第702页。
- 688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会议记录保存下来的是弗·泰·库诺手抄的、并经过核对的弗·阿·左尔格根据自己的德文记录稿整理的副本以及有些地方具有草稿性质的法国书记勒穆修的记录。由于9月3日才选举书记，所以代表大会的前两次会议在勒穆修的手稿中没有得到反映。马克思1872年9月2日的发言只在巴枯宁分子尼·茹柯夫斯基（他的代表资格未被代表大会确认）的两本记录里保存下来了。左尔格的记录中的马克思的四次发言和恩格斯的一次发言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4—731页。——第707页。
- 689 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代表由于带的是限权代表委托书，所以要求代表大会投票时不按每一个代表的票数计算，而按选出代表的组织的成员人数计算。这个要求遭到代表大会的否决。——第708页。
- 690 在左尔格的记录上接着是“吉约姆打断发言者说：这是不真实的”。——第709页。
- 691 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以前是按照左尔格的德文记录收入本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8—729页）。这里发表的是勒穆修的法文记录。——第711页。
- 692 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的简短记录曾发表在荷兰报纸《商业总汇报》（《Algemeen Handelsblad》）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自由报》（《Liberté》）和《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比较完全的经作者认可的通讯报道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8—180页。——第714页。

693 指1872年9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这次会晤讨论包括关于共同反对革命运动的问题。——第714页。

694 在英国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反击总委员会前书记约翰·黑尔斯的诽谤性攻击。约翰·黑尔斯转到改良主义立场，同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派无原则地勾结起来，竭力分裂不列颠联合会，并于1月26日在伦敦单方面召开一些脱离国际支部的人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对国际英国支部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展开的不调和的斗争，当时反映在许多文件中，首先是反映在《致国际先驱报编辑》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6—231页）。

本卷收入的两封致伦敦报纸编辑部的信，一封是弗·列斯纳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另一封是赛·维克里在恩格斯参加下写的。这两封信描述了这一论战的较详尽的观点和细节。——第717、722页。

695 出席1873年6月1—2日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有承认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二十三个支部的二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巩固组织和加强宣传的决议，强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主张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授予不列颠联合会一面国际工人协会的红旗，以证明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726页。

696 为了执行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工会国际联合会的决议，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选派出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筹备。在4月24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委员会之后，曾委托马·巴里和欧·杜邦起草相应的告英国工会书。恩格斯直接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在1873年5月1日和8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听取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文件。在告英国工会书中揭示了工会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过程中和在协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同时指出了工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工人运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任务。——第727页。

人名索引

A

- 阿巴斯一世 (Abbas I 1571—1629)——伊朗萨非王朝国王 (1587—1629)。——第453页。
- 阿贝勒, 昂利·万·登 (Abeele, Henri van den 生于1847年)——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商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98页。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和1841—1846) 和 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380页。
- 阿卜杜尔·麦吉德 (Abdul-Medjid 1823—1861)——土耳其苏丹 (1839—1861)。——第221、228、417页。
- 阿布, 埃德蒙 (About, Edmond 1828—1885)——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440页。
- 阿代尔, 罗伯特 (Adair, Robert 1763—1855)——英国外交家, 查·詹·福克斯的老搭档。——第373页。
-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Adolf Fredrik 1710—1771)——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的瑞典国王 (1751—1771)。——第465页。
- 阿德里安 (普卜利乌斯·埃利乌斯·阿德里安)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罗马皇帝 (117—138)。——第162页。
- 阿尔伯 (Albert 1815—1895) (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法国工人, 社会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47、49、61页。
- 阿尔布凯克 (Albuquerque 死于1811年)——公爵, 西班牙将军, 西班牙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1811年任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第230、231页。
- 阿尔布雷希特 (勃兰登堡的) (Albrecht von Brandenburg 1490—1568)——最后一个条顿骑士团团长, 第一代普鲁士公爵 (1525年起)。——第335、337页。
- 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 (Albrecht-Friedrich 1553—1618)——普鲁士公爵 (1568—1618)。——第337—339页。
- 阿尔布雷希特·熊·巴伦施太德伯爵 (Albrecht der Bär, Markgraf von Ballenstedt 1100左右—1170)——第一代勃兰登堡侯爵 (1150年起)。——第331页。
-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 (Albrecht Achilles 1414—1486)——安斯

- 巴赫公爵(1440年起),勃兰登堡选侯(1470—1486)。——第335页。
- 阿尔丹,安东(Ardin, Anton 死于1898年后)——瑞士工人,加入国际的马车制造工人和铁匠协会主席;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第519页。
- 阿尔加罗蒂,弗兰契斯科(Algarotti, Francesco 1712—1764)——伯爵,意大利哲学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近友。著有《供夫人们阅读的牛顿哲学》。——第323页。
- 阿尔芒,路易(Allement, Louis)——第520页。
- 阿尔诺德(Arnold)——第225页。
- 阿尔瓦,费南多·阿尔瓦雷斯(Alba, Fernando Alvarez 1507—1582)——公爵,西班牙统帅和国家活动家,1567—1573年为尼德兰总督,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极其残酷地镇压人民起义。——第401页。
- 阿尔维罗尼,朱利奥(Alberoni Giulio 1664—1752)——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意大利人;红衣主教和西班牙宫廷的首相(1717—1719),实际上是该国的统治者;1719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第461、462页。
-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阿格利巴)(Marcus Vipsanius Agrippa 公元前63左右—12)——杰出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公元前21年起是奥古斯都的共同执政者。——第392页。
- 阿迦汗·努里(Aga Khan Nuri)——亲王,波斯沙赫纳斯尔-埃德-丁时期的政府首脑(1852年起)。——第362页。
- 阿里-帕沙(亚尼纳的,或台佩莱纳的)(Ali Pasha 1741—1822)——巴尔干半岛西南部一个国家的创立者和执政者,定都在亚尼纳城(1788—1822);他在跟土耳其苏丹军队激战两年(1820—1822)之后投降,被背信弃义地杀害。——第477页。
- 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生于1786年)——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46年1854年3月伊斯兰教总教长(大穆夫提)。——第221页。
- 阿罗——见门德斯-德阿罗。
- 阿马兰特——见沙维什。
- 阿马利亚,奥登堡公主(Amalia, Prinzesin von Oldenburg 1818—1875)——希腊王后,奥托一世的妻子。——第220页。
-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Armstrong-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工厂主,线膛炮的创造者。——第486、489、490页。
-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 Robert 1833—1925)——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1862—1871),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8—1872),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523、539、541页。
- 阿普拉克辛,费多尔·马特维也维奇(Апраксин, Федор Матвеевич 1661—1728)——伯爵,俄国海军上将,彼得一世的功臣。——第394页。
- 阿热奈(Agénais)——法国工人,共和主义者。——第423、424页。
- 阿特伍德,查理(Uttwood, Charles)——

- 英国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第247页。
- 阿西，阿道夫·阿尔丰斯 (Assi, Adolphe - Alphonse 1840—1886) ——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加里波第派；职业是机械工人，克列索罢工 (1870) 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对国际巴黎支部进行第三次审讯时，受法院审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第540页。
- 埃尔曼 阿尔弗勒德 (Herman, Alfred) —— 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塑家，比利时国际支部组织者之一；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 (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上参加无政府主义少数派。——第540、598页。
- 埃尔塔尔，弗里德里希·卡尔·约瑟夫 (Erthal, Friedrich Karl Joseph 1719—1802) —— 公爵，美因兹选侯和主教。——第473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 (1867年—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 (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曾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第513、536、537、539、543、545、600、648、665、666、672、681、719、720页。
- 埃里迪埃，马尔克 (Héridier, Mark) —— 第520页。
- 埃里克十四 (Eric XIV 1533—1577) —— 瑞典国王 (1560—1568)。——第294、295页。
- 埃利奥特，约翰 (Elliott, John) —— 美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国际会员，资产阶级改良的积极宣传者。——第540、568页。
- 埃利斯，亨利 (Ellis, Henry 1777—1855) —— 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德黑兰公使 (1814—1815)，后任大使 (1835—1836)。——第360页。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 (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 —— 普鲁士官员，律师，教权派，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辩护人。——第652页。
- 埃斯基罗斯，昂利·弗朗索瓦 (Esquiros, Henri-François 1812—1876) —— 法国作家；1840年由于《人民福音》(《L'Évangile du peuple》) 一书被判处监禁；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423页。
- 爱琳娜 (Eleonore) —— 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儿，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的妻子 (1603年起)。——第338页。
- 爱琳娜 (奥地利的) (Eleonore d'Autriche 1498—1558) —— 查理五世的姐姐，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妻子 (1519—1521)，后来 (1530年起) 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妻子。——第449页。
- 爱琳娜 (葡萄牙的) —— 见爱琳娜 (奥地利的)。
- 艾尔皮金，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

- (Элл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5—1908) —— 六十年代初喀山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65年侨居日内瓦, 在那里创办了俄国印刷所, 该印刷所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 国际会员, 巴枯宁同盟盟员, 后来成为沙皇暗探局密探。——第519页。
- 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 (Ahmed- Shah Durrani 1724—1773) —— 阿富汗的沙赫 (1747—1773), 阿富汗国家和杜兰尼王朝的创立者。——第358页。
- 艾伦, 乔治 (Allen, George) —— 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568页。
- 安妮 (Anne 1665—1714) —— 英国女王 (1702—1714)。——第459页。
- 安德烈·博哥柳勃斯基 (Андрей Боголюбский 约1111—1174) —— 苏兹达尔公国大公尤里·多尔哥鲁基的儿子。1157年父死后继承王位。——第309页。
- 安东尼 (马可·安东尼) (Antonius, Marcus 公元前83—30) ——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家, 尤利乌斯·凯撒的拥护者。——第392页。
- 安菲 (Amphy) —— 第362页。
- 安娜 (Anna 1576—1625) —— 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儿, 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 (1594年起)。——第337—339页。
- 安娜——见奥地利的安娜。
- 安娜·彼得罗夫娜 (Анна Петровна 1708—1728) —— 彼得一世的女儿; 1725年起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一世的妻子, 彼得三世的母亲。——第462页。
- 安娜·伊万诺夫娜 (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 —— 俄国女皇 (1730—1740)。——第255、267、269、291、463、464页。
- 安森, 乔治 (Anson, George 1697—1762) —— 男爵, 英国海军上将, 海军首席大臣 (1751—1756、1757—1762),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8) 的参加者; 英国舰队的改革者。——第465页。
- 昂古莱姆公爵, 沙尔·德·华洛瓦 (Angoulême, Charles de Valois, duc d' 1573—1650) —— 查理九世的非婚生子, 在路易十三的军队中供职。——第453页。
- 奥勃列斯科夫, 阿历克塞·米哈伊洛维奇 (Обресков,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18—1787) —— 俄国外交家; 驻君士坦丁堡的代办 (1751) 和驻办公使 (1752—1768); 1768年因俄土战争爆发在土耳其被捕并拘留到1771年; 曾参加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和约的签订。——第468页。
- 奥布里, 埃米尔 (Aubry, Emil 1829左右—1900) —— 法国石印工人, 国际的著名活动家, 蒲鲁东派, 国际卢昂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第536页。
- 奥地利的安娜 (Anne d' Autriche 1601—1666) —— 法国王后, 路易十三的妻子, 路易十四时期摄政女王 (1643—1661); 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三世的女儿。——第453、454页。
- 奥尔良公爵——见菲力浦·奥尔良。
-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 (Orléans, Héléne, duchesse d' 1814—1858) (父姓梅克伦堡-施维林 Mecklenburg- Schwerin) ——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的孀妇, 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22、420页。

- 奥尔西尼, 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446页。
- 奥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皇帝 (公元前27—公元前14)。——第392页。
- 奥古斯特 (萨克森的)——见奥古斯特二世。厉王。
- 奥古斯特 (萨克森的) (August von Sachsen 1614—1680)——公爵, 马格德堡主教辖区的统治者 (1628年起)。——第342页。
- 奥古斯特二世·厉王 (August II, der Starke 1670—1733)——波兰国王 (1697—1706和1709—1733), 萨克森选侯, 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 (1694—1733)。——第270、278、343、461—463页。
- 奥古斯特三世 (萨克森的) (August 1696—1763)——前者的儿子; 波兰国王 (1734—1763) 和萨克森选侯 (1733年起), 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第388、463、464、468页。
- 奥古斯特三世 (萨克森的)——见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
- 奥康瑞尔, 菲格斯 (O'Co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720页。
- 奥克兰伯爵, 乔治·伊登 (Auckland, George Eden, Earl of 1784—1849)——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多次担任内阁大臣, 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第360、363、364页。
- 奥雷耳·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特·德 (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 d' 1804—1877)——法国将军, 教权主义者,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1855年任法军旅长, 普法战争时期任卢瓦尔军团司令, 1871年3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669页。
- 奥利维耶, 埃米尔 (Ollivier, E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57年起为立法团议员; 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政府首脑 (1870年1—8月)。——第600页。
- 奥列格 (Oleg 死于912年或922年)——基辅大公, 882年建立基辅罗斯。——第307、308页。
- 奥卢瓦 (Aulois)——法国检查官。——第534页。
- 奥罗, 让·巴泰勒米 (Hauréau, Jean Barthémy 1812—1896)——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429页。
- 奥美尔·帕沙 (米哈伊尔·拉塔斯) (Omer 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土耳其将军, 克罗地亚人, 二十年代在奥地利军队供职, 三十年代初加入土耳其国籍; 曾任驻瓦拉几亚土军指挥官 (1848—1849), 门的内哥罗土军指挥官 (1853), 多瑙河土军总司令 (1853—1854), 克里木土军总司令 (1855) 和高加索总司令 (1855—1856)。——第208、224、226、382页。
- 奥普尔, 阿尔丰斯·昂利·德 (Hautpoul, Alphonse-Henri de 1789—1865)——法国将军, 正统主义者, 后

- 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陆军部长（1849—1850）。——第8、12、17页。
- 奥斯本，托马斯，卡马森侯爵 (Osborne, Thomas, Marquis of Carmarthen 1631—17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首相（1674—1679和1690—1695）；1695年议会控告他有贪污罪行。——第373页。
- 奥斯特尔曼，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Остерман,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686—1747)——伯爵，俄国外交家，在叶卡特林娜一世时为副总理大臣，在安娜女皇时为内阁三大臣之一，实际掌握内政外交的大权。被伊丽莎白女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第255页。
- 奥斯特尔曼，伊万·安德烈也维奇 (Остерман,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奥斯特尔曼的儿子，俄国外交官，曾任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第257页。
- 奥斯滕 (Osten)——丹麦驻俄国公使。——第256页。
- 奥斯滕-萨肯，德米特里·叶罗费也维奇 (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在俄国南部任军长（1853—1854），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1854年底—1855年）。——第242页。
- 奥松维尔，德 (Aussonville, de)——法国政治活动家。——第429页。
- 奥托——见奥托·富翁。
- 奥托·富翁，巴伦施太德伯爵 (Otto der Reiche, Graf von Ballenstedt 死于1123年)——阿尔布雷希特·熊的父亲。——第331页。
- 奥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巴伐利亚王子，希腊国王（1832—1862）。——第220、478页。
- 奥哲尔，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第511、529、537、539、540、658页。

B

巴登公爵——见莱奥波德。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贝斯，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会议议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被赦后流亡国外，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20、22页。

巴尔尼，茹尔 (Barni Jules 1818—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872年起为议会议员。——第429页。

巴尔田涅夫，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Бартев, 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假名阿列克谢也夫，涅托夫 Алексеев, Нетов 生于1838年)——俄国军官，同情1863年波兰起义，不久即辞职；1867年迁居瑞

- 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起小组成员；1869年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的斗争。——第520页。
- 巴尔田涅娃，叶卡特琳娜·格雷哥里也夫娜（Баргене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1843—1914）——德国革命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起小组成员；1869年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参加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创建工作，积极反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参加第二国际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1889）；缩·伊·巴尔田涅娃的妻子。——第519页。
- 巴凯，约瑟夫（Baquet, Joseph）——第520页。
- 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1761—1818）——著名的俄国统帅和军事活动家，1814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中为俄国指挥官，曾任陆军大臣（1810—1812），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军指挥官之一，1813—1814年任俄军和俄普军队指挥官。——第404—406页。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519、536、586、592—595、597、598、612、613、629、703页。
- 巴枯宁娜，安东尼娜·克萨维尔也夫娜（Бакунина, Антонина Ксавьерьевна 1840左右—1887）（父姓克维亚特科夫斯卡娅 Квятковская）——米·亚·巴枯宁的妻子。——第519页。
- 巴拉，茹尔（Bara, Jules 1835—1900）——比利时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司法大臣（1865—1870，1878—1884）。——第660页。
-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Baraguay d' 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1854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第227页。
-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利浦·阿尔伯。
- 巴里，马耳特曼（Barry, 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4），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603、733页。
-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第429页。
- 巴罗什，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物；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第23页。
- 巴纳，约翰（Baner, Johan 1596—

- 1641) —— 瑞典将军, 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参加者。——第341页。
-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 ——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201页。
- 巴泰勒米-圣伊莱尔, 茹尔 (Barthélemy - Saint - Hilaire, Jules 1805—1895) ——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凡尔赛十五人委员会委员和梯也尔的办公厅主任 (1871—1873), 外交部长 (1880—1881)。——第429页。
- 巴特勒, 本杰明·富兰克林 (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 —— 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 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 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 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 (1862)。——第677页。
- 巴希, 乌果 (Bassi, Ugo 1801—1849)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派,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被奥军枪决。——第552页。
- 巴耶济德二世 (Bajazet II 或 Bayazid II 1447—1513) —— 1481—1512年为土耳其苏丹。曾与波兰、威尼斯、埃及和波斯进行长期战争, 增强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第313页。
-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1880)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 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的创始人 (1869) 和领导人之一,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 (1877—1879); 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 但不够彻底。——第558页。
- 拜尔恩, 戴维 (Bairn, David) —— 英国军官。——第415页。
- 拜尔勒 (Beyerle) ——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643页。
- 班克斯, 西奥多 (Banks, Theodor) —— 国际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 (1871), 职业是彩画匠, 采取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立场。——第567、568页。
-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 1754—1801) —— 俄国皇帝 (1796—1801)。——第265—267、473页。
- 保罗五世, 俗名卡米洛·博尔盖泽 (Paulus V (Camillo Borghese) 1552—1621) —— 罗马教皇 (1605—1621)。——第452、453页。
- 鲍尔斯 (Bowers) —— 英国新闻工作者。——第527页。
-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367—382页。
- 鲍威尔, 亨利希 (Bauer, Heinrich) ——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职业是鞋匠; 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 后失踪。——第70、635、636、649页。
- 贝多 (Beleau, J.) —— 第520页。
- 贝尔, 安德烈 (Bel, André 死于1898年以后) —— 瑞士工人, 细木工, 日内瓦细木工协会书记。——第519页。
- 贝尔岛公爵, 沙尔·路易·奥古斯特·富凯 (Belleisle, Belle-Isle, Charles-Louis - Auguste Fouquet, duc de

- 1684—1761)——法国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法国元帅(1741年起),1750年起(中有间断)任陆军大臣,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的参加者。——第388、465页。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科伦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652页。
- 贝尔纳,马利(Bernard, Marie)——比利时彩画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年9月—1869年),比利时通讯书记。——第522页。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rdotte, Jean - Baptiste - 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第410、475页。
- 贝尔尼,弗朗索瓦·约阿希姆·德皮埃尔·德(Bernis, François - Joachim de Pierre de 1715—1794)——法国国家活动家,外交家和作家,红衣主教(1758年起);外交大臣(1757—1758)。——第466页。
- 贝尔坦,路易·玛丽·阿尔芒(Bertin, Louis - Marie - 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记者,奥尔良党人,1841—1854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第24页。
- 贝尔特兰德出(Bertrand, Fr. G.)——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在纽约的国际第六支部通讯书记,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和《工人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603、611、705页。
- 贝克尔,恩斯特(Becker, Ernst 死于1898年以后)。——第519页。
-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2—1866),后为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伦市长。——第652页。
-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官官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六十年代是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6)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1866—1871);1868年10月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临时委员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同巴枯宁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19页。
- 贝朗热,皮埃尔·让(Béranger, Pierre - Jean 1780—1857)——法国最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

- 第420、422页。
- 贝里公爵,沙尔·斐迪南(Berry, Charles-Ferdinand, duc de 1686—1714)——路易十四的孙子,1710年娶奥尔良的菲利浦的女儿玛丽·路易莎为妻。——第460页。
-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斐迪南达·路易莎(Berry Marie-Caroline-Ferdinande - Louise, duchesse de 1798—1870)——正统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1832年企图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利浦。——第420页。
-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i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正统主义者。——第429页。
- 贝利萨留(Belisar (ins) 504左右—565)——拜占庭统帅,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功臣。——第420页。
- 贝伦施普龙(Baerensprung)——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波兹南普鲁士警察局长。——第445、446页。
- 贝内特,乔治(Bennett, George)——代表哈里法克斯支部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第733页。
- 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 1580—1629)——匈牙利王国反哈布斯堡运动的领导者,特兰西瓦尼亚公爵(1613—1629)匈牙利国王(1620—1621)。——第453页。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
- 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534、554、557页。
- 比果,莱昂(Bigot, Léon 1826—1872)——法国律师和政论家,左派共和党人;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作为公社社员的辩护人出席凡尔赛军事法庭。——第540页。
- 比朗,厄内斯特·约翰(Бирон, Эрнест Иоганн 1690—1772)——安娜女皇的宠臣,1737年被封为库尔兰公爵,1740年为幼皇伊万六世的摄政,不久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762年被彼得三世召回并恢复库尔兰公爵封号。——第255页。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主席,曾积极参加1867年选举改革运动;1870—1871年为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支持要求英国站在法国方面出来进行武装干涉的冒险要求;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第668页。
- 彼得一世(Петр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269、271、272、278、287—291、294—296、307、320—327、

- 330、358、431、459—462页。
- 彼得三世(Пётр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第467页。
- 俾斯麦,奥托(Bismar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607、629、656、669、670、673—676页。
- 庇护七世(俗名格雷哥里·路易吉·巴尔纳巴·基亚拉蒙蒂)(pius (Gregorio Luigi Barnaba Chiaramoti) 1742—1823)——罗马教皇(1800—1823)。——第473、476页。
- 庇护九世(俗名卓瓦尼·马里亚·马斯塔伊-弗雷蒂)(Pius (Giovanni Maria Mastai - 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441、479、540、541、552页。
-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内维茨伯爵(Bülow,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Dennewitz 1755—1816)——普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409—411页。
- 卞尼格先,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列昂节·列昂节也维奇)(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 (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6)——在俄国当将军,汉诺威人,谋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7年为总司令,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第404、405页。
- 别斯图热夫-留明(Бестужев-Рюмин 1693—1766)——伯爵,俄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曾任总理大臣,1741—1757年间参与俄国一切外交事务,1747年极力推动组成俄、奥、英、萨克森的反普、法同盟,1758年因触怒女皇伊丽莎白,被革去总理大臣职务并被流放,1763年被叶卡特林娜二世召回,恢复官职。——第257—258页。
- 波波夫,米哈伊尔·格拉西莫维奇(Попов, Михаил Герасимович 1818—1883)——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239页。
-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维奇(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俄国外交家,科西嘉人,1814—1821年任驻巴黎大使,1821—1835年为大使,后任驻伦敦大使(1835—1839)。——第267、475、478页。
- 波尔特,弗里德里希(Bolte, Friedrich)——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工人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72—1874),1874年因《工人报》执行错误路线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603、611、706页。
- 波将金,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1784年起为元帅,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时期任总司令;曾领导俄罗斯南方边区的垦殖;叶卡特林娜二世

- 的宠臣。——第259、260、263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Poniatowski, Stanislaw August 1732—1798)——波兰国王,称斯塔尼斯拉夫二世。奥古斯特(1764—1795)。——第345、468页。
- 波旁公爵,沙尔(Bourbon, Charles, duc de 1190—1527)——弗朗索瓦一世时期法国军队元帅(总司令),后来转到皇帝查理五世方面,1525年帕维亚会战中战胜法军。——第449页。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 1814—1815和1815—1830)和西班牙王朝(1700—1868; 1874—1931和1975年起)。——第3、21、467、470、474页。
- 波斯特(Post)——普鲁士警官。——第445页。
- 波斯特莱布(Postleb, Ch.)——第520页。
- 波特,乔治(Porter, George 1792—185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论者;贸易副大臣(1841年起)。——第245—247页。
- 波托,让(Potot, Jean)——第519页。
- 勃朗,安德烈(Blanc, André)——国际里昂支部成员。——第524页。
- 勃朗,加斯帕尔(Blanc, Gaspard)——法国巴枯宁主义者,职业是养路领工员,1870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595页。
- 勃朗,路易(Blanc, Louie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第47、49、58、61、173、177、179、180页。
- 伯蒂歇尔,卡尔·威廉(Bötticher, Karl Wilhelm 1791—1868)——普鲁士国家活动家,东普鲁士省总督(1842—1848)。——第31页。
-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布雷希特(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伯爵,普鲁士外交家,普鲁士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第674页。
- 伯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Berwick, James Fitzjames, duck of 1670—1734)——法国元帅;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非婚生子;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的参加者。——第463页。
- 伯克,艾德蒙(Burke, Edmund 1729—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写有一些经济问题的著作,在活动的初期倾向于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分子,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第258、265页。
- 博阿尔奈,欧仁(Beauharnais, Eugène 1781—1824)——亲王,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的妻子前夫所生之子,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5—1814年为意大利总督。——第409页。
- 博德里(Baudry)——法国人,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流亡伦敦。——第540页。
- 博恩,让·巴蒂斯特·奥古斯坦·德(Beaune, Jean-Baptiste-Augustin de 1796—1849)——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立法议会的加尔省代表。——

- 第9页。
- 博尔姆(Borme)——法国发明家,花炮制造师;政治信仰是保皇派,冒险家。——第22页。
- 博尔夏特,路易(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493页。
- 博费蒂,弗朗索瓦(Bofféy, François)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细木工。——第520页。
- 博古斯瓦夫十四(Boguslaw 1580—1637)——末代波美拉尼亚公爵。——第340、341页。
- 博古斯瓦夫·恩斯特(Boguslaw Ernst 1580—1637)——格罗伊公爵,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古斯瓦夫十四的女婿;1633年起接替他岳父卡明主教的职位。——第342页。
- 博贾,切扎雷(Borgia, Cezare 1476—1507)——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以道德败坏,阴狠毒辣闻名。——第265页。
- 博克,保尔(Bok, Paul)——第705页。
- 博雷,埃蒂耶纳(Borret, Etienne)——第520页。
- 博尼韦,吉约姆·古菲埃·德(Bonni- vet, Guillaume Gouffier de 1488—1525)——法国海军上将;1523—1525年意大利战争中的法军指挥者,帕维亚会战中战死。——第449页。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统率奥普军队,进攻革命的法国。——第470页。
- 布恩,马丁·詹姆斯(Boon, 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720、721页。
- 布克斯格夫登,费多尔·费多罗维奇(Буксгевден,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750—1811)——伯爵,俄国将军,1805和1806年曾参加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404页。
- 布拉德,詹姆斯(Blood James)——美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第568—569页。
- 布拉冈萨——葡萄牙王朝(1640—1853)和巴西王朝(1822—1889)。——第477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下院议员(1843年以后);托利党得比内阁成员(1852、1856、1859、1866—1868);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5、246、425—428页。
-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Blanqui, Jérome- Adolphe 1798—1851)——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165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

- 多次被判处徒刑;巴黎1870年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第13、20、22、595、596、610页。
- 布朗沙尔(Blandhard, D. A. 死于1869)——日内瓦印刷厂主,国际会员。——第519页。
- 布雷希特尔(Brechtel, C. 死于1898年以后)——1866年起为瑞士德语支部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成员(1870年1—3月)。——第520页。
- 布雷泽侯爵,于尔班·德·马伊埃(Br  e, Urbain de Maille, marquis de 1597—1650)——法国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元帅(1632年起)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参加者。——第454页。
- 布里斯美,德吉烈(Brism  , D  sir   1823—1888)——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部(1865)创建人之一,1869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委员,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追随巴枯宁派,后抛弃无政府主义,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598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43、635页。
- 布鲁内蒂,安吉洛(Brunetti, Angelo 1800—1849)(绰号小西塞罗 Ciceruacchio)——意大利革命家,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被奥军枪杀。——第552页。
- 布罗德黑德,威廉(Broadhead, William 1815—1879)——著名英国工联主义者,制刀工匠联合会书记(1848—1867)。——第668页。
-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Bl  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1793—1794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1813—1814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第410页。
- 布让,吉约姆·亚桑特(Bougeant, Guillaume Hyacinthe 1690—1743)——法国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耶稣会士;他的关于二十年战争(1618—1648)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著作最为著名。——第455页。
-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 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1713—179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761—1763)。——第467页。
- 布图尔林,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Бутурлин,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1790—1846)——俄国军事史学家,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参议员,1848年起为书报督察特别委员会成员。——第213页。
- C
- 策勒(Z  ller, Phil.)——第519页。
-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耶日伊(Czartor-
-

- yc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的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446页。
- 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 1799—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479页。
- 查理大帝(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王国卡罗林朝著名的统治者(768—814)。800年加冕称帝。——第307页。
- 查理大公——见查理六世。
- 查理一世(Charles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453页。
- 查理二世(Charles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303、457页。
- 查理二世(Carlos 1661—1700)——西班牙国王(1665—1700)。——第457、459页。
- 查理三世(Carlos 1716—1788)——西班牙国王(1759—1788);那不勒斯国王(称查理七世)和西西里国王(称查理四世)(1735—1759)。——第230、260、388、462页。
- 查理五世(Karl 1500—1558)——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尼德兰亲王(1516—1555);西西里国王(1516—1556)。——第336、385—387、448—451、470页。
- 查理六世(Karl 1685—171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1740),莱奥波德一世之子。——第345、459、460、462—464页。
- 查理七世·阿尔布雷希特(Charles-Albrecht 1697—1745)——巴伐利亚选侯(1726—1745);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2—1745)。——第388、464、465页。
- 查理八世(Charles 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第384、385页。
- 查理九世(Charles 1550—1574)——法国国王(1560—1574)。——第451页。
- 查理十世(Charles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第477页。
-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Karl Gustav 1622—1660)——瑞典国王(1654—1660)。——第329、342、456页。
- 查理十一(Karl 1655—1697)——瑞典国王(1660—1697)。——第456页。
- 查理十二(Karl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第257、270、271、281、283、288、290、294、296、297、326、344、459—461页。
- 查理曼——见查理大帝。
- 查塔姆——见皮特(老皮特)·威廉。
- 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军事家。他完成了蒙古诸部的统一,建立了蒙古汗国(1206);曾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活动。1211和1215年两次大举向金进攻,直到黄河北岸。1219年发动第一次西征,攻灭花剌子模,1223年在喀勒喀河打败罗斯联军,把蒙古汗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乌克兰草原地区。

——第309、320页。

D

- 达尔格伦,约翰·阿道夫(Dahlgren, John Adolf 1809—1870)——美国海军军官和军事发明家,1863年起为海军上将,写有许多海军军械方面的著作。——第485页。
- 达拉斯,亚尼雅士·斯威特兰(Dallas, Aeneas Switland 1828—1897)——《泰晤士报》巴黎通讯员。——第527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 - Périgord, Charles -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其特点是善于玩弄手腕,利用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制造不和,从中渔利。——第4页。
- 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勃艮第公爵(1467—1477);曾企图侵占瑞士。——第384页。
- 大流士一世·希斯塔斯普(Darius Hystaspes 公元前550—486)——古波斯王(公元前522—486)。——第403页。
- 大卫,爱德华(David, Edward)——法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人,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选入总委员会,但拒绝当选。——第611页。
- 戴居雍(D'Aiguillon 1720—1798)——法国外交官,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1771—1774)。——第261、264页。
-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Teste, Jean - Baptiste 1780—1852)——法国律师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46页。
- 戴特拉(D'Éraz, Ch.)——第520页。
- 戴维斯,艾拉(Davis, Ira)——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569页。
- 戴伊斯,阿尔弗勒德(Days, Alfred)——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3年6月起),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参加者。——第733页。
- 丹尼尔,罗兰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做了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初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52页。
- 道恩,莱奥波德(Daun, Leopold 1705—1766)——伯爵,奥地利元帅(1754年起),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第466页。
- 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Douglas, Frederick 1817—1895)——废奴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参加1855年约翰·布朗的袭击,参加美国内战;争取妇女权利的积极战士。——第568页。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247、426、427、674、678页。
- 德巴普,塞扎尔(De Paëpe, César

- 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5)。——第533页。
- 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De Flotte, Paul - Louis - François - René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立法会议员(1850—1851),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3、17页。
- 德拉马尔,泰奥多尔·卡齐米尔(Delamarre, Théodore Casimir 1797—1870)——法国银行家,政论家,1844年起为《祖国报》所有人,波拿巴主义者。——第24页。
-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日内瓦,1851年流亡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会员;七十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第493页。
-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Delescluze, Louis - Charles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诺尔省政府委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代表,属于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多数派,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牺牲在街垒上。——第421页。
- 德雷尔,西蒙(Dereure, Simon 1838—1900)——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曾参加《马赛曲报》编辑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美国,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82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611页。
- 德罗兹,弗朗索瓦·克萨维埃·约瑟夫(Droz, François - Xavier - Joseph 1773—1851)——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165页。
- 德斯坦伯爵,让·巴蒂斯特·沙尔·昂利·埃克托尔(Estaing, Jean - Baptiste - Charles - Henri - Hector, comte d' 1729—1794)——法国海军上将;1778年率领法国分舰队参加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第469页。
- 邓达斯(Dundas)——英国海军上将。——第262页。
- 邓达斯,理查·桑德斯(Dundas, Richard Saunders 1802—1861)——英国海军上将,1855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第327页。
- 邓科布,托马斯·斯林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第209页。

- 狄德埃,亨利希(Didier, Heinrich)——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五十年代初参加出版德国旅美民主派的许多报纸。——第645页。
- 狄茨,奥斯渥特(Diet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653页。
- 迪尔克,查理·温特沃思(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共和主义者,自由党激进派的首领之一,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80—1882),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882—1885)。——第610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四十年代曾参加“青年英国”社,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 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第670页。
- 蒂巴尔迪,帕奥洛(Tibaldi, Paolo 1825—1901)——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第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第540页。
- 蒂雷纳子爵,昂利·德拉图尔-多韦尔尼(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 Auvergne 1611—1675)——法国著名统帅,元帅(1643年起),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指挥在德国的法国军队;曾参加弗伦特党的战争、归属战争(1667—1668),回忆录的作者。——第454, 457页。
- 蒂利伯爵,约翰·采尔克莱斯(Tilly, Johann Tserclaes 1559—1632)——伯爵,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著名的统帅,狂热的天主教徒,1610年起为天主教联盟军队指挥,1630—1632年为皇帝和天主教联盟的联军指挥;1631年5月他统率的军队向马格德堡发起进攻,占领后洗劫了该城。——第340页。
- 蒂森,爱德华(Tichen, Thiessen, Tichsen, Edward)——第635, 636页。
- 丁特尔(Dinter, J. G.)——德国矿工,茨威考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第663页。
-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 Marie- Jean- 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2页。
- 杜邦-德勒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 Eure, Jacques- 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47页。
- 杜邦,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

- 桑代表大会(1867)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组织了国际支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1874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523、531、534、537、603、609、658、665、682、720、733页。
- 杜波蒂,米歇尔·奥古斯特(Dupoty, Michel - Auguste 1797—1864)——法国政论家,曾参加好几家民主共和派报纸的出版工作。——第423页。
-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Turgot Anne - Robert - Jacques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最大的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1774—1776);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第372页。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 - Armand - 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1848年是制宪会议议员,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和1849);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1876和1877—1879)。——第593页。
-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 Charles - 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1792—1793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第395页。
- 杜诺,安东(Dunaud, Anton)——瑞士刻版工;在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封代表大会(1870年4月)上反对巴枯宁派。——第519—520页。
- 杜普拉,路易(Dupras, Louis)——1869年春建筑工人罢工时期同政府谈判的日内瓦建筑工人代表。——第520页。
- 杜普拉,帕斯卡尔(Duprat, 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第11页。
- 杜瓦尔,埃米尔·维克多(Duval, Émile - Victor 1841—187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铸工;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委员,公社国民自卫军将军,1871年4月4日被俘后遭凡尔赛分子枪杀。——第533、682页。
- 杜韦尔吉埃-德奥兰,普罗斯佩(Duvergier de Hauranne, Prosper 1798—1881)——法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429页。
- 杜亚里埃(Dujarier)——第46页。
- 多尔哥鲁基(Долгорукий)——俄国驻丹麦大使。——第273页。
- 多纳(Donat)——第520页。
-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 1793—1863)——阿富汗的艾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第357、363—365页。

E

- 厄梅,亨利希(Oehme, Heinrich)——德国的国际会员。——第705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传记材料)。
-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

1771—1851)——汉诺威国王(1837—1851)。——第29、480页。

F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写有许多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第307页。

法尔卡什,卡罗伊(Farkas, Károly 1843—1907)——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职业是五金工人,国际匈牙利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1880)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890)的组织者之一。——第623页。

法尔奈泽,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帕尔马公爵(Farnese, Alexander (Alessandro), duc de Parma 1545—1592)——西班牙统帅和国家活动家,1578—1592年任尼德兰总督。——第401页。

法尔奈泽,伊丽莎白(Farnese, Elisabeth 1692—1766)——帕尔马公主,西班牙王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五世的妻子。——第462、463页。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副外交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六十年代为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537、540、553、593、670、675、687页。

法旺,埃蒂耶纳·爱德华·沙尔·欧仁(Fa-

vand, Étienne - Edouard - Charles - Eugène 1793—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1813—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共和主义者,参加山岳党,制宪议会(1848)和立法议会(1850—1851)议员;反对1851年12月2日政变。——第9页。

菲力浦(Philipp 1720—1765)——帕尔马公爵(1748—1765)。——第466页。

菲力浦(奥尔良的),沙尔特尔公爵(Philippe d'Orléans duc de Chartres 1674—1723)——路易十四的侄儿,路易十五年幼时的法国摄政王(1715—1723)。——第459、461页。

菲力浦一世·美男子(Philipp, der Schöne 1478—1506)——尼德兰国王(1482—1506),疯子胡安娜的丈夫,查理五世的父亲。——第384页。

菲力浦二世(Philipp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第386、451、452页。

菲力浦三世(Philipp 1578—1621)——西班牙国王(1598—1621)。——第452、453页。

菲力浦四世(Philipp 1605—1665)——西班牙国王(1621—1665)。——第453、456、457页。

菲力浦五世(Philipp 1683—1746)——西班牙国王(1700—1746),昂茹公爵。——第459—462、465页。

菲利凯,路易(Fullicquet, Louis)——瑞士工人;国际会员,日内瓦细木工和硬木工支部书记。——第520页。

菲耶塔(Fillietaz, G.)——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第520页。

斐迪南(奥地利的)——见斐迪南一世。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1503—1564)

-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556—1564),查理五世的弟弟。——第449、451、452页。
-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1751—1825)
——双西西里国王(1816—1825);
1759—1825年(中有间断)那不勒斯国王。称斐迪南四世西西里国王(1759—1825)称斐迪南三世。——第476页。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1578—1637)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19—1637)。——第340、341、453、454页。
- 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1608—1657)
——奥地利大公,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37—1657)。——第387、454、456页。
- 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1784—1833)
——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第476、479页。
- 斐迪南亲王——见斐迪南·冯·埃斯特。
- 斐迪南·冯·埃斯特大公(Ferdinand von Este, Erzhzog 1781—1830)
——奥地利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474页。
- 斐迪南,瓜斯塔拉公爵——见费尔兰泰第二。
- 斐迪南多·阿尔伯特·阿梅德奥(Ferdinando-Alberto-Amedeo 1822—1855)
——热那亚公爵,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的儿子,1848—1849年反对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年当选为西西里国王,但没有即位。——第479页。
- 斐迪南多·卡洛(Ferdinando Carlo 1652—1708)
——曼都亚公爵(1665—1707),贡萨加家族的末代。——第459页。
- 费尔兰泰第二(Ferrante 1563—1630)
——瓜斯塔拉公爵(贡萨加家族)。——第453页。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第595页。
- 芬克,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1811—1875)
——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五十至六十年代被选入普鲁士议会下院,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443、444页。
- 冯·施托肯(Von Stocken)
——第272、273页。
- 福尔纳奇埃利(Fornaccieri)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意大利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611页。
- 福尔纳雄(Fornachon, L. H. 死于1898年以后)
——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第520页。
- 福格特,奥古斯特(Vogt, August 约1830—1883)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鞋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国际会员;1867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665页。
- 福克纳,埃弗拉德(Fawkner, Everard 1684—1758)
——英国外交家,伦敦商人,1735年任驻土耳其大使。——第

- 255页。
- 福克斯,彼得(Fox, Peter 死于1869年)(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德列 Peter Fox André)——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实证论者;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1866年9—11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美国通讯书记(1866—1867);《共和国》周报的编辑之一(1866),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501页。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和1806)。——第258、263、264、374、474页。
-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追随者,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601页。
- 伏尔泰,弗朗索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420页。
-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安东尼(Wróblewski, Walerj Antonius 1836—1908)——波兰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61—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七十年代末,在瑞士同波兰流亡者接近;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第603、609页。
- 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死于1015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970年起为诺夫哥罗德王公,978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第307、308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至六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第42页。
- 弗兰茨一世(Franz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第477页。
- 弗兰茨一世(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Franz (Franz Stephan von Lothringen) 1708—1765)——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5—1765);洛林公爵,称弗朗索瓦第三(1729—1736);托斯卡纳大公(1737—1765)。——第388、463、465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32、228、368、435、436页。
- 弗兰契斯科第二(Francesco 1495—1535)——斯福察王朝的米兰公爵。——第385、386、448页。
- 弗兰契斯科一世(Francesco 1777—1830)——双西西里国王(1816—1825)。——第476页。
- 弗兰契斯科二世(Francesco 1836—

- 1894)——那不勒斯国王(1859—1860)。——第441页。
- 弗朗索瓦第三——见弗兰茨一世(弗兰茨·斯蒂凡·洛林)。
-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第385—387、448—450页。
- 弗朗索瓦二世(François 1544—1560)——法国国王(1559—1560)。——第451页。
- 弗雷德里克四世(Frederik 1671—1730)——丹麦和挪威国王(1699—1730)。——第271、272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66页。
- 弗雷戈索,切扎雷(Fregoso, Cesare 死于1541年)——法国外交官,出身于古老的热那亚家族;法国驻威尼斯公使;根据查理五世的命令被处死。——第450页。
- 弗里布尔(Fribourg, E. E.)——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499、500页。
- 弗里德里希第一——见弗里德里希第六。
- 弗里德里希第五(Friedrich 1596—1632)——普法尔茨选侯(1610—1623)。——第453页。
- 弗里德里希第六(Friedrich 1371—1440)——1398年起为纽伦堡军政长官;1417—1440年为勃兰登堡选侯,称弗里德里希第一;霍亨索伦王朝的创立者。——第331—334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1657—1713)——1688年起为勃兰登堡选侯,称弗里德里希第三,后为普鲁士国王(1701—1713)。——第343、344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1754—1816)——维尔腾堡公爵(1797年起)和国王(1805—1816)。——第473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256、258、264、345、464—468页。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萨克森的)——见奥古斯特二世·厉王。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August 1750—1827)——萨克森选侯(1763—1806),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国王(1806—1827)。——第475页。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August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第29、441、480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侯(1640—1688);1657年将普鲁士公国并入勃兰登堡,而在这之前他作为波兰贵族共和国的臣仆领有普鲁士。——第341—343、456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1688—1740)——普鲁士国王(1713—1740)。——第344、345、460、464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第345、470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

- helm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346、410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29、31—37、66、244、352、368、441—443、480页。
- 弗里芒,约翰·马利亚,安特罗多科公爵(Frimont, Johann Maria, prince d'Antrodoco 1759—1831)——奥地利将军,参加镇压1820—1821年那不勒斯革命的奥地利远征军司令。——第477页。
- 弗里斯(Friess, J 或 Fries)——国际会员和瑞士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第519页。
-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4月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682、683页。
- 弗兰克尔(Frankel)——在伦敦的德国工人,1847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1849—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649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47页。
- 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霍赛·蒙尼诺(Florida Blanca, José María, conde de 1728—1808)——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曾任大臣(1777—1792),实行过一系列进步的改革;反对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08年为中央洪达主席,曾企图阻止1808—1814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第230、260页。
- 弗略里,安德烈·埃居尔·德(Fleury, André-Hercule de 1653—1743)——法国红衣主教和国家活动家,路易十五的首相(1726年起)。——第388、464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73页。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屡次担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第6、56页。
-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第469页。

G

- 盖布里昂伯爵,让·巴蒂斯特·比德(Guëbriant, Jean-Baptiste Budes, comte de 1602—1643)——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参加者。——第454页。
- 盖里(Guerry)——第519页。
- 盖伊,德吉烈(Gay, Désiré)——第519页。

- 盖伊·弗朗索瓦(Gay, François)——第520页。
- 盖伊·茹尔(Cay, Jules 1807—1876年以后)——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派;1849年在巴黎出版《共产主义者》(《Le Communiste》);国际会员。——第519页。
- 冈迪永,阿米(Gandillon, Ami)——第520页。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里也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部军队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第219页。
-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和首相(1867—1882)。——第670页。
- 哥利岑,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лицы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18—1789)——公爵,俄国外交官,驻英国大使(1755—1762),副首相(1762—1775)。——第256、467页。
- 哥特洛布,瓦尔特(Gottlob, Walter)——第520页。
- 格尔茨,格奥尔格·亨利希(Görtz, Georg Heinrich 1668—1719)——男爵,瑞典国家活动家,1715年起任财政大臣和国务大臣,曾执行冒险主义政策。——第272、292页。
- 格拉安,詹姆斯(Graham, James)——第262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6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第206、207、245、536、610、672、674、675、702、720页。
- 格兰瑟姆男爵,托马斯·罗宾逊(Granatham, Thomas Robinson, Baron 1738—1786)——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辉格党人,曾任驻马德里大使(1771—1779),外交大臣(1782—1783)。——第259、268页。
-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和1886);1852—1854年任枢密院院长。——第674页。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1870),持极右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24页。
- 格朗热,沙尔(Grange, Charles)——瑞士抹灰工,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第520页。
- 格雷,约翰(Gray, 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

- 创始人之一。——第159页。
- 格雷尔(Grahl, E.)——法国正统主义者。——第9页。
- 格里贝(Гриббе)——俄国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第233、238页。
- 格林,乔治·格伦费尔(Glyn, George Grenfell 1824—1887)——英国银行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秘书长(1868—1873)。——第720、724页。
- 格罗斯(Гросс)——俄国驻英国公使。——第256、258页。
- 格罗塞,爱德华(Gro e, Eduard)——在美国的德国侨民,拉萨尔分子,国际第六支部的成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第569页。
- 格纳姆(Gnam)——德国民主派,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旅居美国。——第643、644页。
-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1893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93页。
- 古斯塔夫一世·瓦萨(Gustaf Vasa 1496—1560)——瑞典国王(1523—1560)。——第448页。
-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f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和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宣战;曾参加三十年战争,领导新教国家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成立的新教同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第329、340、341、452—454、456页。
- H
- 哈布斯堡王朝——1273年起至1806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西班牙王朝(1516—1700)、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第388、451、452、457、464、476、480页。
- 哈登堡,卡尔·奥古斯特(Hardenberg, Karl August 1750—1822)——公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4—1806和1807);为巩固普鲁士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1810—1813);维也纳会议后成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476页。
- 哈勒克,玛丽(Huleck, Maria)——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侨居美国。——第568页。
- 哈里斯,乔治(Harris,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后为宪章主义者布朗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总委员会财务书记(1870—1871)。——第538页。
- 哈里斯,詹姆斯,马姆兹伯里伯爵(Harris, James, Earl of Malmesbury 1746—1820)——英国外交和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777—1782)。——第259—265、268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五十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人十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第720页。

哈布斯堡王朝——1273年起至1806年(断

- 哈特,杰科布(Hart, Jacob)——英国驻莱比锡领事。——第245、246页。
- 海伯林,阿道夫(Haerberling, Adolph)——第一国际支部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发起委员会成员。——第520页。
- 海尔埃丁·巴巴罗萨(Cheireddin Barbarossa 1483年左右—1546)——阿尔及尔执政者(1519—1546)。——第450页。
- 海奈曼(Heinemann)——普鲁士在英国的警探,1869年起为在伦敦出版的《海尔曼》德文周报的主编。——第536页。
- 海瑞,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奥地利将军,曾残酷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由于残暴,得绰号“疯狂的鬣狗”。——第646、647页。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在美国成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第200页。
- 罕丽达·玛丽亚(Henriette - Marie 1609—1669)——英国王后,查理一世的妻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第453页。
- 豪特,伊萨克·索洛蒙,万·德尔(Hout, Isaac Solomon, van der 生于1843年)——荷兰工人,阿姆斯特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598页。
- 荷马(Homerus)——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420页。
- 赫伯特,奥伯朗·爱德华·威廉(Herbert, Oberon Edward William 1838—1906)——英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自由派,下院议员(1870—1874)。——第675页。
- 赫普纳,阿道夫(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596页。
- 赫施塔德(Herstadt, I. D.)——科伦银行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652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427页。
- 黑尔斯,约翰(Hales, John 生于1839年)——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织工,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从1872年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企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组织的领导权;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29、530、533、534、539、541、545、546、599、600、629、717—722页。
- 黑克尔(Hecker)——普鲁士法官,1848年任科伦检察官。——第494页。
- 亨德森,埃德蒙·纽曼斯·沃尔科特(Henderson, Edmund Newmans Wolcott 1821—1896)——英国军官,伦敦

- 警察局长(1869—1886)。——第720页。
- 亨利二世(Henri 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第386、450、451页。
- 亨利三世(Henri 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第451页。
- 亨利四世(Henri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389、451页。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昂利·沙尔。
- 亨利七世(Henry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第385页。
- 亨利八世(Henry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第385、448—450页。
- 洪特海姆,理查(Hontheim, Richard 死于1857年)——科伦律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652、653页。
- 侯里欧克,乔治·杰科布(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英国政论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作运动的活动家。——第540页。
- 胡安娜(疯子)(Juana la Loca 1479—1555)——1504年起为加斯梯里亚女王,1516年起为阿腊贡女王,菲力浦一世·美男子的妻子(1496年起);胡安娜时期实际上统治西班牙的是摄政,而从1516年起,她的儿子查理五世统治西班牙。——第384页。
- 胡贝尔,约翰(Huber, Johann 1830—1879)——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慕尼黑哲学教授(1855年起)。——第95页。
- 华德,奥斯本(Ward, Osborne)——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影响的国际布鲁克林支部的成员,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但拒绝当选。——第533、535、611页。
- 华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Wallenstein, Albrecht 1583—1634)——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1618—1630和1632—1634年任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第453页。
- 华洛瓦——法国王朝(1328—1589)。——第451页。
-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12页。
- 华施伯恩,艾利修·本杰明(Washburne, Elihu Benjamin 1816—1887)——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属于共和党,曾任驻巴黎公使(1869—1877),实行反对巴黎公社的破坏性的挑衅政策。——第540页。
- 霍尔顿(Holton)——英国资本家。——第417页。
- 霍尔托普,埃米尔(Holtrup, Emil)——在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6年),波兰通讯书记(1864—1865),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1866年参加马志尼创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第658页。
-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卡尔·安东(Hohenzollern-Sigmaringen, Karl Anton 1811—1885)——亲王,普鲁士将军,曾任首相(1858—1862)。——第442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332页。

霍季斯,乔治·劳埃德(Hodges, George Loyd)——英国上校,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驻塞尔维亚总领事(1837—1839),后任驻埃及总领事(1839—1841),1849年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专使;帕麦斯顿的走狗。——第293、294页。

霍克,爱德华(Hawke, Edward 1705—1781)——男爵,英国海军上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7—1763)的参加者;议会议员,首席海军大臣(1765—1771)。——第465页。

霍韦利亚诺斯-拉米雷斯,加斯帕尔(Jovellanos y Ramírez, Gaspar 1744—1811)——西班牙国家活动家、作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继承者,持重商主义观点;反对西班牙的封建教权制度;曾任司法大臣(1797—1798),1808—1810年为中央洪达左翼少数派的领导者。——第230页。

J

基谢廖夫,巴维尔·德米特里也维奇(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88—1872)——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将军,1829—1834年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俄国行政当局的首脑,1835年起一直为所有有关农民问题的秘密委员会的常委,国家产业大臣(1837—1856),驻巴黎大使(1856—1862);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第

379页。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5、21、420页。

吉本斯,西尔斯·约翰(Gibbons, Sills John)——1871年任伦敦市长。——第559页。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225页。

吉尔莫(Guillemeaux)——第一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会员,钳工和机械工支部书记。——第520页。

吉尔莫尔,昆西·亚当斯(Gillmore, Quincey Adams 1825—1888)——美国将军,军事工程师,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89—491页。

吉奈,珍妮(Guinet, Jenny)——第519页。

吉斯克拉,卡尔(Giskra, Karl 1820—1879)——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1867—1870)。——第591页。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爾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

- 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532、535、596、598、612、613、629、703、709页。
- 加贝尔(Gabel)——丹麦海军中将。——第273页。
- 加尔巴尼,保尔(Garbani,Paul)——第520页。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东(Garnier-Pagès,Louis-Au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成员(1864—1871);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47页。
- 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格雷哥里(García de la Cuesta, Gregorio 1741—1811)——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231页。
- 加累尔,阿伯特(Galeer,Albert 1816—1851)——瑞士教师和著作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7年反对瑞士宗得崩德的战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日内瓦大会议员,最初是法济的拥护者,后为反对派的领袖。——第643。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七十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第547、550、551、553、555、556页。
- 剑桥公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英军总司令(1856—1895)。——第228、233页。
- 杰塞普,威廉(Jessup William J)——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1866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1867年起为该同盟纽约州通讯书记,纽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加入国际。——第666页。
- 居丹,沙尔·加布里埃尔·塞扎尔(Gudin, Charles-Gabriel César 1798—1974)——伯爵,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副官,法国元帅(1846年起);1847年由于欺骗行为而被解职。——第46页。
- 居约(Guyot, Ch.)——第520页。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第173页。
-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Kapo d'Istrias, Johannes 1776—1831)——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1814—1815年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工作;曾任俄国交外副大臣(1815—1822);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为外国间谍刺杀。——第477、478页。
- 卡德威尔,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第674页。
- 卡迪奥(Cadio 或 Cadrot)——法国人,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第540页。
- 卡迪根伯爵,詹姆斯·托马斯·布鲁德内尔(Cardigan, James Thomas Brudenell, Earl of 1797—1868)——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旅长。——第234页。
- 卡尔——见卡尔(奥地利的)。
- 卡尔(Karl 1771—1847)——奥地利大公,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从1792至1809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曾任陆军大臣(1805—1809)。——第475页。
- 卡尔,康拉德(Carl, Conrad 死于1890年)——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美国,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北美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工人报》编辑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74年由于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603页。
- 卡尔,讷韦尔公爵——见卡尔第一。贡萨加。
- 卡尔第一(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I (Karl-Friedrich) 1700—1739)——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第462页。
- 卡尔第一,贡萨加(Carlo I Gonzaga 1580—1637)——讷韦尔和曼都亚公爵(1627—1637)。——第453、454页。
- 卡尔·艾曼努埃尔三世(Carlo E-manuele 1701—1773)——皮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730—1773),萨瓦公爵。——第463页。
- 卡尔·艾曼努埃尔四世(Carlo E-manuele 1751—1819)——皮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796—1802),萨瓦公爵。——第473页。
- 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 死于1806年)——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封疆伯爵。——第346页。
- 卡尔库恩(Calcoen)——荷兰驻土耳其大使。——第255页。
- 卡尔利埃,皮埃尔(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第169页。
- 卡菲埃罗,卡洛(Caffero, Carlo 1846—1892)——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1871年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1872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879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简述。——第540、605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6月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20、196页。
-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

- 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政府首脑（1852—1859和1860—1861），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1861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432页。
- 卡雷尔，阿尔芒(Carrel, Armand 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第423页。
- 卡马森——见奥斯本。
- 卡缅斯基，米哈伊尔·费多托维奇(Каме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Федотович 1738—1809)——伯爵，俄国元帅，1806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中任总司令。——第404页。
-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1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13页。
-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雷·雷蒙(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2—1872)——法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保皇派。——第24页。
- 卡普卢索，斯蒂凡诺(Caporusso, Stefano)——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一，并任该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0年由于盗用公款而被开除出支部。——第535页。
- 卡齐米尔四世(Casimir 1427—1492)——1447年起为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第318页。
- 卡瑟克特，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13—1814)和滑铁卢战役(1815)，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233、234页。
-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798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799—1801)，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第476、477页。
- 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弗朗西斯科-哈维尔(Compañón y Aragón, Francisco Xavier 1758—1852)——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在拜兰会战中任西班牙军队指挥官。——第231页。
- 卡塔兰，阿道夫(Catalan, Adolphe)——瑞士激进新闻工作者，《自由报》(《Liberté》)编辑，第一国际会员。——第520页。
- 卡塔琳娜(Katharina 1584—1638)——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的母亲。——第456页。
- 卡特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 1519—1589)——法国王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第450页。
-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左右—6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以道德败坏，荒淫无耻闻名。曾策划密谋反对罗马共和国。——第265页。
- 卡瓦纳，赛米尔(Kavanagh, Samuel)——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爱尔兰人；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

- 的委员。——第603、611。
- 卡文迪什,约翰(Cavendish, John)——第262页。
- 凯勒曼,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Kellermann, Francois-Christophe 1735—1820)——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后为正统主义者。——第407页。
-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第200—202页。
- 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特(Cumberland, William August, duke of 1721—1765)——英国将军,乔治二世的儿子;七年战争(1756—1763)初期英军指挥官。——第466页。
- 坎宁,查理,约翰(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1859年起为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邮政大臣(1853—1855),印度总督(1856—1862),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策划者。——第363、417页。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首相(1827)。——第375、477、478页。
- 坎特米尔,德米特里(Cantimir, Demetrius 1673—1723)——1710年起为摩尔达维亚公。1711年与沙皇彼得一世联合对土耳其作战,战败后流亡俄国,1723年死于哈尔科夫。著名学者,著有《奥斯曼帝国兴衰史》、《罗马尼、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古事编年》等书。——第322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普鲁士驻中央政权的使节(1848年7月—19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第34页。
- 考莱男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Baron 1804—1884)——英国外交家,驻巴黎大使(1852—1867)。——第432页。
- 考尼茨,温采尔·安东(Kaunitz, Wenzel Anton 1711—1794)——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所谓文明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曾任首相(1753—1792)。——第264、466页。
-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776—1783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471页。
- 考威尔,乔治(Cowell,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主义者,1853—1854年普雷斯顿大罢工领导人之一。——第209页。
- 柯克伦-贝利,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威沙特(Cochrane-Baillie, Alexander Dundas Ross Wishart 1816—189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601页。
- 科堡亲王,弗里德里希·萨克森-萨尔费尔德(Courburg, Friedrich Sachsen-

- Saalfeld, Prinz von 1737—1815)——奥地利元帅,七年战争和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参加者。——第395页。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许多和平代表大会,如1850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议会议员。——第5、32、249页。
- 科恩,詹姆斯(Cohn, James)——英国和丹麦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丹麦通讯书记(1870—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第541、672、676页。
- 科尔贝龙(Carberon)——第259页。
- 科尔米埃,阿里斯蒂德(Carmier, Aristide)——网布业工人,第一国际里昂支部成员。——第524页。
- 科克(Koch)——法国学者,《欧洲革命史》一书的作者,——第258页。
- 科利尼伯爵,加斯帕尔·德·沙蒂永(Coigny, Gaspard de Chatillon, comte de 1584—1646)——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参加者。——第454页。
- 科佩,路易·德(Coppet, Louis de)——第520页。
- 科齐莫三世·美第奇(Cosimo Mèdici 1642—1723)——佛罗伦萨执政(1670—1723)。——第462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Ludwíg)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197、198、248页。
- 克洪(Colquhoun)——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第293页。
- 克拉夫林,田纳西(Claflin, Tennessee 1845—1923)——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曾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组织来实现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曾和自己的姐姐维·伍德赫尔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562、565、569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残酷地镇压了1848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670、678页。
- 克拉普卡,乔治(Klapka, György(Georg)1820—1892)——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年流亡国外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年普奥战争时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197—199页。
- 克莱纳(Kleiner, W.)——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643页。
- 克莱因,雅科布(Klein, Jacob)——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643页。
-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蒙西·罗尔夫(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 Baron 1790—1868)——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1852—1858和1865—1866)。——第211页。
- 克雷基,沙尔·德·布朗什福尔,普瓦亲王,莱迪吉埃尔公爵(Créqui, Charles de Blanchefort, prince de Paix, duc de Lesdiguières 1578—1638)——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参加者,驻罗马大使(1633)和威尼斯大使(1636)。——第454页。
- 克雷门斯七世(俗名朱利奥·美第奇)(Clemens (Giulio Médici) 死于1534年)——罗马教皇(1523—1534)。——第449、451页。
- 克雷米约,阿道夫(Crémieux, 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自由党人;1848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成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47页。
- 克里米兴,海尔曼(Criemichen, Hermann)——在布勒斯劳的第一国际会员。——第705页。
- 克里默,威廉·兰德尔(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粗木工联合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普法战争时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后来是自由党会议员(1885—1895和1900—1908)。——第508—510、658页。
- 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1577—1648)——丹麦和挪威国王(1588—1648)。——第453页。
- 克里斯蒂娜·奥古斯塔(Christina-Augusta 1626—1689)——瑞典女王(1632—1654)。——第456页。
- 克娄巴特拉七世(Kleopatra 公元前69—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第392页。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301、455、456页。
- 克罗塞,爱德华(Crosset Edouard)——瑞士印刷工人,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成立大会(1869年1月)的参加者。——第519页。
- 克罗希(Crowshay, J.)——英国新闻工作者,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第246页。
- 克罗谢,弗朗索瓦(Crochet, François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木工。——第520页。
- 克罗泽(Croset, J.)——第520页。
- 克罗泽,叙泽特(Croset, Suzette)——第519页。
- 克洛维一世(Clovis 465—511)——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481—511)。——第165页。
- 克吕登纳,巴尔巴拉·尤莉娅(Krudener,

- Barbara Juliane 1764—1824)——男爵夫人,女作家,虔诚主义的宣扬者;十九世纪时误传建立神圣同盟的主张是她提出的。——第477页。
- 克吕泽烈,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克里木战争(1853—1856)的参加者,曾参加解放意大利(1860),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获将军衔;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1870)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1871年4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大赦后回到法国,1888年起是众议院议员,追随社会主义者;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529、533、665页。
- 孔博,阿梅代·本杰明(Combault, Amédée Benjamin 1838左右—1884以后)——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为首饰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1870年创建国际的一个巴黎支部,加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第733页。
- 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第178页。
- 库埃斯塔——见加西亚·德拉库埃斯塔·格雷哥里。
- 库尔贝,古斯塔夫(Courbet, Gustave 1819—1877)——杰出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巴黎公社社员。——第527、528页。
- 库尔图瓦,雅克(Courtois, Jacques)——瑞士家具工,第一国际会员。——第520页。
- 库兰(Coulin, L.)——第520页。
- 库里埃,保尔·路易(Courier, Paul- Louis 1772—1825)——法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第422页。
- 库尼贝特(Cunibert)——塞尔维亚公爵米洛什的私人医生。——第47、48页。
- 库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Кутуз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1745—1813)——公爵,著名的俄国统帅。——第405页。
-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主义者。——第420页。
-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的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167页。

L

- 拉布谢尔,亨利(Labouchère, Henry 1798—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39—1841和1847—1852),殖民大臣(1855—1858)。——第245页。
-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7年2月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31、224页。
- 拉多维茨,约瑟夫(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宫廷佞臣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

- 之一。——第31页。
- 拉法格, 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 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79); 《社会主义者报》的编辑,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者之一和代表, 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1891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611、682、697页。
- 拉费隆奈伯爵, 奥古斯特·皮埃尔·玛丽·费隆(La Ferronnays, Auguste- Pierre - Marie Ferron, comte de 1777—184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为反革命流亡者 复辟王朝初期回到法国 驻哥本哈根大使(1817)和驻彼得堡大使(1819—1827); 神圣同盟特劳波会议(1820)、莱巴赫会议(1821)和维罗那会议(1822)的参加者, 外交大臣(1828—1829)。——第478页。
- 拉科齐(乔治一世·拉科齐)(Rákóczi György I Rákóczi (1593—1648)——特兰西瓦尼亚公爵(1630—1648), 为争取匈牙利所有领土的统一而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 在三十年战争过程中同瑞典结盟。——第454页。
- 拉科齐(乔治二世·拉科齐)(Rákóczi György II Rákóczi) 1621—1660)——特兰西瓦尼亚公爵(1648—1660)。——第456页。
- 拉科齐, 约瑟夫(Rákóczi, Joseph 1700—1738)——特兰西瓦尼亚公爵的古匈牙利利家族最后代表之一; 1736年起居住在土耳其, 死于远征莫尔达维亚时期。——第464页。
- 拉马丁, 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年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第47、48、52、420页。
- 拉梅耐, 费利西泰(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父, 政论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421、423页。
- 拉姆博德(Lambord)——第一国际会员。——第529页。
- 拉普拉斯, 雅克(Laplace Jacques)——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会员。——第520页。
- 拉萨尔, 斐迪南(Le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591页。
- 拉斯拜尔, 弗朗索瓦(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著名的法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 政论家, 社会主义者, 靠近革命无产阶级; 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制宪会议议员; 1855年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第48、423页。
- 拉特森(Rutson, A. O.)——英国内务大臣普鲁斯的私人秘书。——第540页。
- 拉西(Lacy)——第259页。
- 拉西, 彼得·彼得罗维奇(Ляцци, Петръ)

- Петровиц 1678—1751)——伯爵,俄国元帅;爱尔兰人;北方战争(1700—1721)、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和俄土战争(1735—1739)的参加者。——第463页。
-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以威灵顿的参谋官身分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1815),曾任总司令办公室军务秘书(1827—1852),军械总长(1852—1854),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第277页。
- 莱昂尼,约瑟夫(Léoni, Josep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643、644页。
- 莱奥波德(Leopold 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第441页。
- 莱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1640—1705)——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58—1705)。——第340、343、456—459页。
- 莱奥波德二世(Leopold 1797—1870)——托斯卡纳大公(1824—1859)。——第432页。
- 莱斯托克,安东·威廉(L'Estocq, Anton Wilhelm 1738—1815)——普鲁士将军,1806—1807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404、409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 Rollin Alexandre- August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一直住到1870年初,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为抗议与德国签订和约而辞职。——第47、55、181、196、662页。
- 赖利,威廉·哈里逊(Riley, William Harrison 1835—1907)——英国新闻工作者,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国际先驱报》的编辑和发行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脱离工人运动。——第720、733页。
- 兰多尔(Lander, R.)——美国新闻工作者,1871年为《世界报》驻伦敦记者。——第688—696页。
- 朗德克,贝尔纳(Landeck, Bernard 生于1832年)——法国首饰匠,巴黎公社驻马赛的代表;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伦敦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第542、712页。
- 朗恩,让(Lannes, Jean 1769—1809)——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404、405页。
- 朗吉特·辛格(Randschit Singh 1780—1839)——旁遮普的执政者(1797—1839)。——第357、363页。
- 劳,威廉(Rau, Wilhelm)——第一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第520页。
- 劳雷耳(Laurel)——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瑞典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603、611页。
- 劳施,弗里德里希·威廉(Rausch, Friedrich Wilhelm 生于1820年左右)——巴门的印刷工;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的参加者。——第640页。

- 勒福尔,昂利(Lefort, Henry 1835—1917)——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联合》杂志编辑部;参加了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准备工,1865年3月断绝同国际的一切联系。——第499—502页。
-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Leclerc, Alexandre)——巴黎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工人的六月起义。——第17页。
- 勒吕贝,维克多(Le Lubez, Victor - P. 约生于1834年)——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激进派有联系;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6),法国通讯书记(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第499—503页。
- 勒梅特尔,弗雷德里克(Le Maître Frédéric)——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伦敦的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六十年代末返回法国。——第534页。
- 勒姆利(Lumley)——第540页。
- 勒穆修,本杰明(Le Moussu, Benjamin) (化名孔斯坦 Constan)——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第603、709、711、713页。
- 勒维耶尔(Leviê)——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法国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603、611页。
- 勒伊特,米希尔·德(Ruyter, Michiel de 1607—1676)——尼德兰海军统帅,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65—1667、1672—1674)时期任尼德兰国会舰队总司令;1673年起任尼德兰海军元帅。——第457页。
- 雷蒙,沙尔(Raymond, Charles)——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成立大会(1869年1月)的代表,日内瓦中央支部书记(1870)。——第519页。
- 雷米,泰奥多尔(Remy, Theodor)——瑞士教师,约翰·菲利浦·贝克尔所领导的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瑞士)书记,巴枯宁分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小组的成员。——第519页。
- 雷尼奥,埃利阿斯·若尔日·奥利瓦(Regnault, Elias-Georges-Olivé 1801—1868)——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从1848年起开始研究罗马尼亚人民情况,并在1855年出版了《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第293、294页。
- 雷若夫(Рыжков)——俄国军队将领,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233、238页。
- 累瑟姆,罗伯特·马斯登(Latham, Robert Masden)——英国工联主义者,工人代表同盟主席,第一国际会员。——第529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莱西(Richelien,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165、386、453、454页。
- 黎塞留公爵,路易·弗朗索瓦·阿尔芒·杜·

- 普莱西(Richelieu, Louis- François - Armand du Plessis, duc de 1696—1788)——法国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法国元帅(1748年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及七年战争的参加者。——第466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30、534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73—153、201页。
- 里德,罗伯特(Reid, Robert)——英国新闻工作者,1871年为英美报纸驻法国通讯员,同情巴黎公社。——第527、528、540页。
- 里沙尔,阿尔伯(Richard, Albert 1846—1925)——法国记者,国际里昂支部领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员,1870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阿列曼派。——第524、531、540、595页。
- 里廷豪森,莫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曾为《新莱茵报》撰稿,国际会员,1884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877—1878年和1881—1884年为国会议员。——第178、180页。
-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Richard Lion-Hearted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第391页。
- 利埃夫尔(Lièver)——法国法学家。——第423页。
-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俄国将军;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军长,1855年任南方军司令,1856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第219、226页。
- 利法特·帕沙(Rifaat Pasha 1798—1855)——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1853),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1853年5月—1854年3月)。——第220页。
- 利穆津,安东(Limousin, Antoine)——法国工人,合作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国际会员,1865年中以前为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第500页。
- 利文,达丽娅(多罗苔娅)·克里斯托弗罗夫娜(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ь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公爵夫人,克里斯托弗尔·安德烈也维奇·利文的妻子;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246页。

- 利文, 克里斯托弗·安德烈也维奇 (Ливен, Фридрих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公爵, 俄国外交家, 驻柏林公使 (1810—1812), 驻伦敦大使 (1812—1834)。——第380页。
- 列曼, 阿尔伯特 (Lehmann, Albert)——在伦敦的德国工人, 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649页。
- 列普宁,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Репнин,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 1734—1801)——公爵, 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 元帅 (1796年起); 七年战争 (1756—1763) 的参加者; 驻波兰大使 (1763—1769); 俄土战争 (1768—1774和1787—1791) 的参加者。——第468页。
- 列申斯基, 斯塔尼斯拉夫 (Leszczyński, Stanisław 1677—1766)——波兰国王 (1704—1709和1733—1736)。——第388、462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r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年11月—1872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伦敦代表大会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在国际里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03、717、719—721、733页。
- 列武茨基, 费多尔·格雷哥里也维奇 (Левутский, Федо Григорьевич)——俄国将领,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233、237页。
- 林德格尔, 安东 (Lindegger, Antoine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装卸工; 巴枯宁派, 国际日内瓦支部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委员会成员。——第519页。
- 林肯 (Lincoln, H. J.)——《每日新闻》的编辑。——第213页。
- 林孔, 安东尼奥 (Rincon, Antonio 死于1541年)——法国外交家, 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 根据查理五世的命令被处死于意大利。——第449、450页。
- 柳里克 (Rurik 死于879年)——根据俄国的历史传说, 他原是瓦利亚基人 (即北欧诺曼人) 的军事首领, 在诺夫哥罗德公国内讧时应内讧中一方之请前去助战, 于862年占领诺夫哥罗德, 自立为王公, 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柳里克王朝”。——第307—309、316页。
- 龙多 (Rondeau)——英国驻俄国公使。——第255、267页。
-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蒲鲁东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 加入在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 在支部中捍卫总委员会的路线,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和1871—1872); 比利时通讯书记 (1866),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 (1872)代表;巴黎保卫战的参加者(1870—1871),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542、545、546、603页。
- 娄,罗伯特,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Viscount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第674页。
- 卢博米爾斯基(Lubomirski)——公爵,1811年为亚历山大一世驻大不列颠摄政亲王(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宫廷的私人代表。——第475页。
- 卢尔杜艾(Lourdoux, H.)——法国正统主义者。——第9页。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第167、178、179页。
- 鲁道夫二世(Rudolf 1552—1612)——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第452、453页。
- 鲁基亚诺维奇,尼古拉·安德烈也维奇(Лукьянович,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06左右—1855以后)——俄国军官和军事史学家,1828—1829年俄土战争、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第213页。
- 鲁卡斯(Lukas)——1949年为德国莱茵省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侨居伦敦。——第644页。
-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529、540、667页。
- 鲁瓦埃-科拉尔,皮埃尔·保尔(Royer-Collard, Pierre-Paul 1763—1845)——法国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法学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172、173页。
- 路德维希,斐迪南(Ludwig Ferdinand 1772—1806)——普鲁士亲王。——第409页。
- 路易(Louis 1661—1711)——法国太子,路易十四的儿子。——第459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4—6、8、9、19、21、22、44、45、53、172、248、370、374、422、478、646页。
- 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利浦七世,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2页。
- 路易·卡佩——见路易十六。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九世(圣路易)(Louis (Saint Louis) 1214—1270)——法国国王(1226—1270)。——第34页。
- 路易十一(Louis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第384页。
- 路易十二(Louis 1462—1515)——法国国王(1498—1515)。——第384、385、448页。
- 路易十三(Louis 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第453、454页。
- 路易十四(Louis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343、388、456—461页。
- 路易十五(Louis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372、388、466页。
- 路易十六(Louis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470页。
- 路易十八(Louis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第4、8、477页。
- 路易莎(萨瓦的)(Louise de Savoyen 1476—1531)——法国的摄政女王,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第449页。
- 路易莎·罕丽达(Louise-Henriette 1627—1667)——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第一个妻子(从1646年起)。——第341页。
- 路易莎(波旁的),玛丽亚·泰莉莎(Louise de Bourbon, Marie-Thérèse 1819—1864)——帕尔马女公爵,帕尔马公国摄政女王(1854—1859)。——第432页。
- 路易斯·莱昂(Lewis, Leon)——美国新闻工作者,1865年在伦敦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第658页。
- 路易斯·乔治·康沃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2—1855年为《爱丁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1855—1858),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第678页。
- 罗昂,阿尔布雷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之一,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普鲁士首相(1873年1—11月)。——第443页。
-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第364页。
- 罗班,保尔(Robin, Paul 1837—1912)——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1869年起),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第538、541、601页。
-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第69、70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

- 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8、180、181、373、642页。
- 罗德戴尔,詹姆斯(Lauderdale, James 1759—1839)——伯爵,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第113页。
- 罗金厄姆,查理·沃森·温特沃思(Rochingham, Charles Watson - Wentworth 1730—1782)——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首相(1765—1766和1782),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妥协和从美国撤军。——第263、264页。
- 罗克,乔治(Rock, George)——第329页。
- 罗曼纳侯爵,佩德罗·卡罗·苏雷达(Romana, Pedro Caro y Sureda, Marqués de la 1761—1811)——西班牙将军,1807—1808年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西班牙军军长,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阿斯土里亚中央洪达委员。——第231页。
- 罗奇,约翰(Roach,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1872),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718、724页。
- 罗塞蒂,比亚卓(Rossety or Rossetti, Biagio)(布莱兹 Blaise)——意大利工人,国际意大利日内瓦支部主席,1870年起参加罗曼诺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第520页。
- 罗沙(Rochat, F.)——第519页。
- 罗沙,沙尔(Rochat, Charles 生于1844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1871—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541页。
- 罗斯(Ross, D.)——第246页。
- 罗斯,休·亨利(Rose, Hugh Henry 1801—1885)——英国将军,后升元帅,驻君士坦丁堡代办(1852—1853),克里木战争时期为驻克里木法军司令部代表;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者之一,曾任驻印军队司令(1860—1865),驻爱尔兰武装部队司令(1865—1870)。——第206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第372、373、433页。
- 罗伊特,麦克斯(Reuter Max)——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第653页。
- 洛多维科·摩尔人(Lodovico "il Moro" 1452—1508)——斯福察王朝的米兰公爵。——第384页。
- 洛格朗(Laugrand, P.)——在美国的法国侨民。——第569页。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685页。
- 洛伦索,安赛尔莫(Lorenzo, Anselm 1841—1915)——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会员

- (1869年起),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第718。
- 洛塔尔三世(萨克森的洛塔尔,苏普林堡的洛塔尔)(Lothar ,der Sachse, Graf von Supplinburg 1075左右—1137)——德国国王(1125年起),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33—1137)。——第331页。
- 洛图姆,弗里德里希·阿尔布雷希特·卡尔(Lottum, Friedrich Albrecht Karl 1720—1797)——伯爵,普鲁士将军。——第409页。
- 洛旺达耳伯爵,乌尔里克·弗雷德里克·沃尔德马尔(Lowendal, Ulric - Frédéric - Waldemar de 1700—1755)——法国将军,1747年起为元帅,原系丹麦人,1735—1743年在俄军,1743—1755年在法军中任职,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任法军司令。——第465页。
- 吕谢(Ruchet, Ch.)——第520页。
- ## M
- 马策约夫斯基,瓦茨拉夫·亚历山大(Maciejowski, Wacław Aleksander 1793—1883)——波兰历史学家,写有许多波兰史和斯拉夫国家法律史方面的著作。——第344页。
- 马蒂斯(Matis A.)——第519页。
- 马多克斯或马多克·马多斯(Madox, Maddock, Madoss, G. W.)——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568、570页。
- 马尔波罗公爵,约翰·邱吉尔(Mar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1650—1722)——英国统帅和政治活动家,1702—1711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第460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103、104、128、134、169页。
- 马洪子爵,菲利浦·亨利·斯坦霍普(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Viscount 1805—187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1834—1835年为外交副大臣。——第265页。
-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293、294、312、316页。
- 马加隆,让·德尼(Magalon, Jean Denis 1794—1840左右)——法国自由派著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第422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冯·韦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654页。
- 马克西米利安(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第一(Maximilian von Bayern, Maximilian 1573—1651)——巴伐利亚公爵(1597年起)和选侯(1623年起),德国天主教反动派的积极活动家。——第453页。
-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1459—1519)——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第318、384、

- 385、448页。
-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第29页。
-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1527—1576)——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64—1576)。——第452页。
- 马克西米利安第三·约瑟夫(Maximilian Joseph 1727—1777)——巴伐利亚选侯(1745—1777)。——第465、469页。
-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第9、47、423页。
- 马劳达(Marauda)——第519页。
- 马里伊,纳瑟夫(Marilly, Joseph)——第520页。
- 马利,亚历山大(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任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第47、58页。
- 马利特,亚历山大(Mallet, Alexander 1800—1886)——英国外交家,德意志联邦时期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公使(1849—1866)。——第244页。
- 马隆,贝努瓦(Malon, Benoit 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1880年被赦免后回到法国;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612页。
- 马茂德二世(Mahmud 1785—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第477、478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ia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403页。
- 马塞劳,尼古拉·阿隆索(Marcelau Nicoló Alonso)——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同盟西班牙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塞维尔《理智》周报的编辑(1871—1872);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710页。
- 马森纳,安德烈(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之一,1814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第355、399页。
- 马特维(马提阿什)·科尔文(Matthias (M 璺璺)Corvinus 1440—1490)——1458年起为匈牙利国王,1469年起同时为捷克国王。1485年维也纳成为他的驻地。1488年曾和伊万三世结盟反对波兰。——第318页。
- 马西米利安诺·斯福察(Massimiliano Sforza 1493—1530)——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摩尔人的儿子。——第385、449页。
- 马扎里尼,朱利奥·雷蒙多(Mazarini, Giulio Raymondo 1602—1661)——法国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1643年起为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执行巩固法国专制制度的政策。——第454—456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249、445、446、540、541、547、548、550—556、694页。
- 玛格丽特·泰莉莎(Margarite Teresa 死于1673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的女儿,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莱奥波德一世的第一个妻子。——第457页。
- 玛丽(勃艮第的)(Marie de Bourgogne 1457—1482)——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和继承人。——第384页。
- 玛丽——见玛丽(勃艮第的)。
- 玛丽·安东尼达(Marie-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1774—1793),路易十六的妻子,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373页。
- 玛丽·泰莉莎(Maria-Teresa 1638—1683)——法国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妻子(1660年起),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的女儿。——第456页。
-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 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1740—178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5—1780)。——第388、463、465—467页。
- 玛丽亚——见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
-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Maria da Gloria 1819—1853)——葡萄牙女王(1826—1828和1834—1853)。——第478页。
- 迈奥尔,爱德华(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非国教徒宣传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四十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积极参加反英国国教教会的斗争;议会议员(1852—1857和1869—1874),《非国教徒》报编辑(1841—1879),曾参加《共和国》报的出版工作。——第248、249页。
- 迈宁豪斯,亨利希(Meinighaus, Heinrich)——爱北斐特的旅馆主;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第639页。
- 迈耶尔,齐格弗里特(Meyer, Sigfrid 1840左右—1872)——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工程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1864年自己出钱在德国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国际会员;1866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665页。
- 麦格雷哥里,约翰(MacGregor, 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该行董事之一(1849—1856),在统计学方面著作甚多。——第247页。
- 麦卡特尼,乔治(Macartney, George 1737—1806)——英国驻俄国公使(1764—1767)。——第256—258、268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

- 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第154页。
- 麦克尼耳,约翰(McNeill, John 1795—1883)——英国外交家,驻德黑兰公使(1836—1839和1841—1842);1855年为调查克里木军需工作的政府全权代表之一。——第360—364页。
- 麦克唐奈,约·帕特里克(McDonnell, J. Patrick 1845左右—1906)——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芬尼亚运动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2年12月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540, 544, 603, 609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850年11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59年和1860年为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1864年选入贵族院。——第431页。
- 芒吉·吉雷(Menghi- Ghirei)——克里木汗(1468—1515),1475年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附庸,为了对其他汗国进行战争,曾同伊万三世结盟。——第315, 318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669, 672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了《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执政;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294页。
- 梅米约,弗朗索瓦(Mermillod, François)——瑞士制盒工人;第一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副主席。——第520页。
-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31, 476—478, 646页。
- 美第奇(Medici)——意大利家族,1434年至1737年(中有间断)统治佛罗伦萨。——第385页。
- 美第奇,玛丽(Medici, Maria 1573—1642)——法国王后,亨利四世的妻子。——第453页。
- 门德斯·德阿罗,路易斯(Mendes de Haro, Louis 1598—1661)——伯爵,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西班牙首相(1643年起)。——第456页。
- 门罗,詹姆斯(Monroe, James 1758—1831)——美国国家活动家,美国总统(1817—1825),共和党人,1823年发表

- 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后称门罗主义。——第477页。
- 蒙蒂思,罗伯特(Monteith, Robert)——英国官吏。——第246、247页。
- 蒙塔郎贝尔,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 Marc-René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十九世纪被广泛采用。——第397、488页。
-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167页。
- 米尔巴赫,奥托(Mirbad, Otto 生于1804年)——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城防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639、641页。
- 米尔纳,乔治(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673、719、720、733页。
- 米格尔·布拉冈萨(Miguel Bragança 1802—1866)——葡萄牙亲王,1828—1834年为国王,葡萄牙专制教权派的首领。——第477、479页。
-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1596—1645)——俄国沙皇(1613—1645),罗曼诺夫王朝的创立者。——第452页。
-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90—1848)——俄国将军,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军事史学家。——第213页。
- 米勒斯,茹尔·伊萨克(Mirss, Jules-Isaac 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立宪主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人,1861年被控从事证券投机活动而被送交法院。——第422页。
- 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Milos Obrenovic 1780—1860)——塞尔维亚公爵(1817—1839和1858—1860),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创立者。1815年领导塞尔维亚的解放战争。——第293页。
- 米尼希,布尔哈德·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弗尔·安东诺维奇)(Münich, Burkhard Christoph (Фридрих Антонович) 1683—1767)——伯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工程师,元帅(1730年起);军事委员会总裁(1730年起);在1735—1739年俄土战争时期任克里木和贝萨拉比亚俄军司令。——第463页。
- 米约或米洛(Millot, T.)——在美国的法国流亡者,职业是装订工人,国际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采取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第568。
- 米约,莫伊斯(Millaud, Moiss 1813—1871)——法国银行家和记者,曾创办许多家报纸和银行。——第422页。
- 密契尔(Mitchell)——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720页。
-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家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1853—1855)。——第206页。
- 莫尔蒂埃,爱德华·阿道夫·卡齐米尔·约瑟夫(Martier, Etouard - Adolphe - Casimir - Joseph 1768—1835)——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405页。
- 莫尔拉,托马斯(Morla, Tom 1752—1820)——西班牙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最高洪达委员,1808年投向法国占领者,曾任约瑟夫·波拿巴政府的陆军和海军大臣。——第231页。
- 莫拉戈-冈萨雷斯,托马斯(Morago Gonzales, Tom 1752—1820)——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雕刻工,西班牙的同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1),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709页。
- 莫莱(Maulet, J.)——第520页。
- 莫里,赛米尔(Morley, 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和1868—1885);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9年起是《蜂房》报的所有者。——第610、629页。
- 莫里茨(萨克森的)(Moritz von Sachsen 1521—1553)——萨克森公爵(1541年起),选侯(1547年起);1546—1548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时期任帝国军队总司令。——第450页。
- 莫里茨(萨克森的)(Maurice de Saxe 1696—1750)——公爵,法国元帅,德国人,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1—1748)的参加者;写有一些军事理论著作。——第465页。
- 莫纳雄(Monahan, L.)——第520页。
-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詹(Motterhead, Thomas J. 1825左右—1884)——英国织布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丹麦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30、539、542、544、682、685、718、720页。
- 墨尔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 William Lamb, Viscount 1779—184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00—1834)和首相(1834和1835—1841)。——第245页。
- 墨莱(Murrey)——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驻德黑兰的公使。——第362页。
- 默里,查理(Murray, Charles)——英国工联的领导人之一,职业是鞋匠,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全国改革同盟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八十年代积极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第720、733页。
- 姆罗奇科夫斯基,瓦列里扬(Mroczkowsky Walerjan 1840—1889)——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职业为摄影师;巴枯宁派,公开同盟和秘密同盟的成员。——第519页。
-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1831—1833年和1839—1840年进行反土耳其苏

- 丹的战争,为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391、478页。
- 穆罕默德·沙赫(Muhammed Shah 1810—1848)——波斯沙赫(1834—1848)。——第360、362页。
-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第538、678、695页。
- 穆斯塔法三世(Mustafa 1717—1774)——土耳其苏丹(1757—1774)。——第468页。
-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3、4、8、12、13、216、217、229、231、307、346、348、358、368、390、391、397、401、404、405、411、419、420、472—475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7、8、11、12、21—23、27、37、180、248—250、417、421、422、430—437、440—444、446、536、593、669、670、674、692页。
-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Nadir Shah (Khuli Khan)1688—1747)——波斯沙赫(1736—1747),统帅和征服者,1738—1739年对印度进行了掠夺性的远征。——第357、358页。
-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1833—1834年指挥参加葡萄牙内战(1823—1824)的分舰队,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第215、221、227、327、479页。
-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1808—1814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214页。
- 奈,米歇尔(Ney, Michel 1769—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410页。
- 奈克尔,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多次被任命为财政总稽核,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试图进行某些改革。——第373页。
- 奈穆尔,玛丽,奥尔良-朗格维尔女公爵(Nemours, Marie d'Orléans-Longueville, duchesse de 1625—1707)——纽沙特尔女公爵。——第344页。
-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403页。
- 尼德格尔,路易(Niedegger, Louis)——第519页。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30、206—208、220、221、358、373、374、477、646页。
- 尼耶尔,阿道夫(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1854年任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工程长官,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官,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第242页。

涅果累夫斯基,弗拉基斯拉夫(Niegolew - ski, Władysław 1819—1885)——

波兰政治活动家和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起是普鲁士众议院的波兹南议员。——第445页。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1868—1869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1871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69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织“人民惩治会”;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第594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总理大臣,外交大臣(1816—1856)。——第364—366、381、476页。

诺里斯,约翰(Norris, John 1660左右—1749)——英国海军上将,曾任波罗的海分舰队司令。——第274、280、285、302、327页。

诺思,弗雷德里克(North, Frederick 1732—179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财政大臣(1767),首相(1770—1782);1783年任波特兰联合内阁(福克斯—诺思内阁)的内务大臣。——第258、261—264页。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1左右—1866)——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的参加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

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639页。

O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73、685、720页。

P

帕尔马女公爵——见路易莎(波旁的),玛丽亚-泰莉莎。

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第206、412页。

帕罗特,罗伯特·派克(Parrott, Robert Parke 1804—1877)——美国海军军官,军事发明家;美国内战时广泛使用的火炮的制造者。——第489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204、245—247、250、263、268、293、294、357、359—366、374、375、381、412、415、417、418、425、427、674、678、702页。

帕宁,尼基塔·伊万诺维奇(Панин, 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1718—1783)——伯爵,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1747年任驻丹麦公使,1748—1760年任驻瑞典公

- 使。1760—1773年为皇太子保罗的老师。参加了1762年扶植叶卡特林娜二世上台当女皇的宫廷政变,1763年至1780年底实际上掌管俄国的外交部门。——第256—260页。
- 帕斯凯维奇,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31年夏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224页。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287页。
- 佩德鲁一世(Pedro 1798—1834)——巴西皇帝(1822—1831),葡萄牙国王,称佩德鲁四世(1826);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的儿子,葡萄牙女王玛丽娅二世·达·格洛丽亚的父亲。——第478页。
- 佩蒂,约翰(Pettie, John)——第646页。
- 佩尔蒂埃,克劳德(Pelletier, Claude 1816—1881)——法国民主主义者,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后流亡美国,曾任国际在美国的法国通讯员。——第665页。
- 佩克林顿(Pekington)——英国军队的上校。——第416页。
- 佩拉顿(Pellaton, S.)——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书记。——第520页。
- 佩莱格林-德鲁瓦(Pellegrin - Druat, A.)——第520页。
- 佩雷,昂利(Perret, Henri)——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雕刻工,在瑞士的国际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1868—1869),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1868—1873),《平等报》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巴塞代表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69年和巴枯宁断绝关系,但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和主义立场。——第519、533页。
- 佩里埃(Perrié)——第520页。
- 佩里埃,卡齐米尔(Perier, Casimir 1777—1832)——法国国家活动家,银行家,路易-菲利浦时期任首相和内务大臣(1831—1832)。——第423页。
- 佩利西埃,让·雅克(Pélessier, Jean - Jacques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以极端残酷著称;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岗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243页。
- 佩龙,沙尔·欧仁(Perron, Charles - Eugène 1837—1919)——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珐琅彩绘工,后为制图家;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员,《平等报》编辑(1869),《团结报》编辑和汝拉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519页。
- 佩佩,吉列尔莫(Pepe, Guglielmo 1783—

- 1855)——意大利解放运动的活动家,那不勒斯军队的将军;1820—1821年那不勒斯革命时期参加烧炭党,指挥起义军队;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第477页。
- 佩特罗尼,朱泽培(Petroni, Giuseppe 1812—1888)——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马志尼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年获释,《人民罗马》报编辑。——第550、551、555页。
- 皮阿,费利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0年9—11月出版《公社报》。——第419、420、422、423、445、593、594、682、694页。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5、245、246页。
- 皮尼埃(Pinière 或 Pinier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小铺老板,巴枯宁派。——第520页。
- 皮斯特尔(Pisteur, Fr.)——第520页。
- 皮特(Pitt, L. K.)——小威廉·皮特的堂兄弟,驻彼得堡的英国海外商馆的牧师。——第265—267页。
-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Pitt, William, the Elder,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1756—1761);首相(1766—1768)。——第257、258、264、375、377、466页。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54、258、259、264、265、470、474页。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第155、159、164—196、371、592、597页。
- 普尔斯基,奥雷利乌斯·费伦茨(弗兰齐舍克)(Pulszky, Aurelius Ferencz (Frantisek)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第205页。
- 普芬德,卡尔(Pfander, Karl 1818左右—187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

- 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70、635、636、649页。
- 普芬多夫,赛米尔(Pufendorf, Samuel 1632—1694)——男爵,德国学者,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的“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第292页。
- 普拉兰,沙尔·舒瓦泽尔公爵(Praslin, Charles, duc de Choiseul 1805—1847)——法国贵族,关于他谋杀妻子事件的审判于1847年举行,后自杀。——第46页。
- 普莱西德,玛格丽特(Placide, Margaret)——第520页。
- 普鲁斯,亨利·奥斯丁(Bruce, Henry Austin 1815—1895)——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68—1873)。——第540、674页。
- 普罗托,沙尔·欧仁·路易(Protot, Charles - Eugène - Louis 1839—1921)——法国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反对国际和马克思主义者;八十年代末为布朗热分子。——第683页。
- 普特卡默(Puttammer)——普鲁士波兹南省总督(1851—1860)。——第445页。
- ## Q
- 奇切鲁亚基奥——见布鲁内蒂,安吉洛。
- 齐米斯基斯——见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
- 钱伯斯(Chambers)——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208页。
- 乔治(George, J.)——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第733页。
- 乔治-弗里德里希(Georg - Friedrich 1539—1603)——1571年起为普鲁士公国摄政,霍亨索伦王朝法兰克尼亚-勃兰登堡系的拜罗伊特执政和安斯巴赫侯爵。——第338页。
- 乔治·威廉(Georg Wilhelm 1595—1640)——勃兰登堡选侯(1619—1640)——第340、341页。
- 乔治一世(George 1660—1727)——英国国王(1714—1727)汉诺威选侯——第270、326、373—375、461页。
- 切奥达也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死于1859年)——俄国将军,曾参加1812年战争,克里木战争时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官。——第219页。
- 切尔尼舍夫家族(Черныщевы)——第259页。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第720页。
- 屈贝克,卡尔(K Beck, Karl 1780—1855)——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金融资本家。——第31页。
- ## R
- 热拉尔,埃蒂耶纳·莫里斯(G ard, Etienne - Maurice 1773—1852)——伯爵,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后为元帅

- 和政治活动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401页。
-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652页。
- 荣克,海尔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6)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500、522、523、529、530、532—535、539、541、543、544、546、587、588、600、658、712、719、721页。
- 荣克,鲁道夫(Jung, Rudolf)——商人;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第640页。
-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ainville, François - Ferdinand - Philippe - Louis - 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2、37页。
- 茹尔德,弗朗索瓦(Jourde, François 1843—189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右翼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银行职员,国际法国支部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财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从那里逃脱,1880年回到法国。——第528页。
-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六十年代初彼得堡革命小组的参加者;1862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书记,1872年为抗议开除巴枯宁而退出国际。——第519、708页。
- 瑞略,皮埃尔(Jurieu, Pierre 1637—1713)——法国神学家,新教徒,专制主义的反对者。——第178页。
- 瑞日卡,扬(JizJan 1360左右—1424)——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333页。
- 若昂六世(Joao 1769—1826)——葡萄牙国王(1816—1826)。——第477、478页。
- 若米尼,昂利(安东·亨利希·本杰明诺维奇)(Jomini, Henri(Anton Heinrich Benjaminowitsh) 1779—1869)——将军,先后在法军和俄军中供职,瑞士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写有许多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第405页。
- 若斯特,让(Jost, Jean)——日内瓦钳工、机械工和铸工支部的书记。——第520页。

S

- 萨宾纳,卡雷尔(Sabina,Karel 1813—1877)——捷克作家,由于1848—1849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民主运动,被判处监禁,1857年释放后转到自由主义立场。——第594页。
- 萨博,伊姆雷(埃梅里克)(Szabó,Imre (Emerich)1820—1865)——匈牙利军官,曾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曾任陆军部长(1848),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曾参加1859年奥意法战争。——第448页。
- 萨卡兹,弗朗索瓦(Sacaze,François 1808—1884)——法国法官,保皇派,1871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593页。
- 萨克斯,亨利希·莫里斯(Saxe,Heinrich Morris 1696—1750)——伯爵,法国元帅,著有有关军事艺术的书籍。——第400页。
- 萨拉丁,优素福(萨拉赫-埃丁)(Sala-din,Jussuf(Salah ed Din)1138—1193)——埃及苏丹(1171—1193),阿尤布王朝的创立者。——第391页。
- 萨瓦亲王欧根(Eugen,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奥地利统帅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第397页。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第109、115、142、150页。
-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ailler,Auguste 生于1840年)——法国工人运动和 international 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棺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1870年9月第二帝国崩溃后,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巴黎公社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3);马克思的战友。——第531、533、535、538、543、545、599、600、603、609、699、700、733页。
- 赛拉叶,燕妮(Serailler,Jenny)——奥·赛拉叶的妻子。——第538页。
- 赛义德-帕沙,穆罕默德(Said-Pasha, Mohammed 1822—1863)——埃及统治者(1854—1863)。——第417页。
- 塞蒂(Setti)——国际北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第603页。
- 塞克斯顿,乔治(Sexton,George)——英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2年5—8月),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1872—1873)里反对改良派分子。——第603页。
- 桑德兰伯爵,罗伯特·斯宾塞(Sunderland,Robert Spencer,Earl of 1640—1702)——英国政治家,贵族,1685年任国务大臣。——第263页。
- 桑德威奇伯爵,约翰·蒙塔古(Sandwich,John Montagu,Earl of 1718—1792)——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海军大臣(1748—1751和1771—1782),国务大臣(1763—1765)。——第256、258、259、264、268页。
- 桑吉内德(Sanguinède,J.)——第520页。
- 桑吉内德,罗莎丽亚(Sanguinède,Rosalie)——第519页。
- 沙蒂永——见科利尼伯爵。

- 沙诺,让·巴蒂斯特(Chanoz, Jean Baptiste 生于1828年)——法国纺织工,国际里昂支部成员。——第524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69、70、649、651页。
- 沙维什侯爵,曼努埃尔·德西尔韦拉·平托·德丰塞卡,阿马兰特伯爵(Chaves, Manuel da Silveira Ponto da Fonseca, conde de Amarante, marquis de 1784—1830)——葡萄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拥护专制君主制;导致米格尔战争(1823—1834)的暴动的领导者之一。——第477页。
- 尚博尔,昂利·沙尔·波尔多公爵(Chambord, Henri-Charles, duc de Bordeaux 1820—1883)——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追求者,称亨利五世。——第22、34、37、420页。
- 尚济,安东·阿尔弗勒德·欧仁(Chanzy, Antonie-Alfred-Eugène 1823—1883)——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第十六军军长和卢瓦尔第二军团司令,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669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流放,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在麦茨被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11页。
- 舍尔瓦尔,茹利安(Cheval, Julien)(真名约瑟夫·克雷默 Joseph Crémi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第652页。
- 舍伐利埃,弗朗索瓦(Chevalier, François)——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是国际支部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委员会的成员。——第520页。
- 舍特耳,阿德里安(Schettel, Adrien)——法国机械工;左翼共和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里昂支部组织者之一。——第524页。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

- 法军总司令。——第227页。
- 圣克莱尔(Saint- Clair)——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爱尔兰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603、611页。
- 圣西门,昂利(Saint- 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79页。
- 圣西门公爵,路易·德鲁弗鲁瓦(St Simon,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1675—1755)——法国作家,以其记载路易十四宫廷史事的多卷本回忆录著称。——第267页。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帕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160、171、172、187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后侨居泽稷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49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643页。
- 施略策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Sehlo-zer, August Ludwig 1735—1809)——德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家。——第307页。
- 施奈德第二,卡尔(Schneider, Karl)——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652、653页。
- 施佩耶尔,卡尔(Speyer, Carl 生于1845年)——德国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国际会员,1870年侨居美国,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2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员。——第611、703、704页。
- 施塔克,卡尔(Starke, Karl)——格莱弗拉特的骑兵司务长;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第640、641页。
- 施泰尼格尔,奥古斯特(Steiniger, August)——德国军士;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第640、641页。
- 施泰因(Stein, A. F.)——十九世纪初叶普鲁士历史学家。——第331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关子。——第652、653页。

- 施托尔岑贝格(Stolzenberg)——波兹南的普鲁士警官。——第445页。
- 施瓦尔岑堡,卡尔·菲力浦(Schwarzenberg, Karl Philipp 1771—1820)——公爵,奥地利元帅和外交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3—1814年为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第406页。
- 施瓦尔岑堡,亚当(Schwarzenberg, Adam 1587—1641)——伯爵,勃兰登堡选侯格奥尔格·威廉的枢密官,奉行勃兰登堡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近的政策。——第340页。
- 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 Maximilien 1804—1872)——伯爵,普鲁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年3—6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内务大臣(1859—1862);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445页。
- 施韦泽,约翰·巴蒂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4—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反对社会民主工党;1872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530、569页。
- 施维茨格贝耳,阿代马尔(Schwitzguébel, Adémar 1844—1895)——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年被开除出国际。——第587、612、613、709页。
-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1859);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522页。
- 舒瓦洛夫家族(Шуваловы)——第259页。
- 舒瓦泽尔公爵,埃蒂耶纳·弗朗索瓦·斯坦维尔伯爵(Chausseul, Étienne-François, comte de Stainville, duc de 1719—1785)——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驻罗马大使(1753—1757)和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1758—1770年任法国第一大臣,同时兼外交大臣(1758—1761和1766—1770)和陆军与海军大臣(1761—1766)。——第466、467页。
- 舒扎-沙赫(Shudsha Shah 死于1842年)——阿富汗沙赫(1803—1809和1839—1841),英国的傀儡。——第363页。
-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曾鼓吹素食主义。——第643、644页。
- 斯福察——见马西米利安诺·斯福察。
- 斯科皮尼(Scopini, J. J.)——日内瓦钳工、机械工和轧钢工支部书记,后为副书记,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封

- 代表大会(1870年4月)的参加者。——第520页。
- 斯米特,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мит,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787左右—1865)——俄国历史学家。——第213、214页。
-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96、98、102、103、109、115、121、143、145、154、155、167页。
- 史密斯,阿道夫(史密斯·赫丁利)(Smith, Adolphe(Smith Heading- ley))——英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八十年代起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接近法国可能派,曾发表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污蔑性文章。——第528页。
- 史密斯,威廉·悉尼(Smith William Sidney 1764—1840)——英国海军上将。——第391页。
- 斯塔尼斯拉夫——见列申斯基,斯塔尼斯拉夫。
- 斯坦霍普,詹姆斯(Stanhope, James 1673—1721)——伯爵,英国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国务秘书(1714—1717),财政大臣(1717—1721)。——第287、291、294、327、374页。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52),殖民大臣(1858和1882—1885)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和1874—1878),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412页。
- 斯特凡大公(Stephen 1435—1504)——摩尔达维亚公(1457—1504)。——第318页。
- 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和1825—1828),后为大使(1941—1858)。——第417页。
-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Строгановы)——第259页。
- 斯图亚特王朝——曾统治苏格兰(1371—1714)和英格兰(1603—1714)的王朝。——第461、466页。
- 斯托克,约翰(Stock, John)——第705页。
- 斯托蒙特子爵,戴维·默里(Stamont, David Murray, Viscount 1727—1796)——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人,曾任驻维也纳公使(1763—1772)和巴黎大使(1772—1778),外交大臣(1779—1782)。——第261—264页。
- 斯维亚托斯拉夫·伊哥列维奇(Святослав Игоревич 死于972或973年)——伊戈尔的儿子,945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第307、308页。
- 斯温森,约翰(Swainson, John)——普雷斯顿的厂主。——第210页。
- 苏,欧仁(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17、23页。
- 苏比兹亲王,沙尔·德·罗昂(Soubise, Charles de Rohan, prince de 1715—1787)——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臣,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1—1762年指挥莱茵河

- 的法国军队。——第466页。
- 苏尔特,尼古拉·让(Soult, Nicolas- Jean 1769—1851)——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为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和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 1839—1840和1840—1847)。——第229、268页。
- 苏里曼一世·坎努尼(苏里曼大帝)(Suleiman I el Kanuni(The Magnificent)1495—1566)——土耳其苏丹(1520—1566)。——第449、451页。
-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左右—1867)——海地黑人共和国总统,1849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第12页。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1800)——伟大的俄国统帅。——第471页。
- 索瓦,阿尔森(Sauva, Arsène)——法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卡贝的追随者,美国伊加利亚派移民区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美国;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七十年代参加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第711页。
- T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第420页。
- 泰耳斯,威廉(Theyls, Willem)——荷兰外交官,十八世纪初在荷兰驻土耳其大使馆供职,曾为俄国政府执行各种外交任务;1711—1712年曾促使俄国和土耳其缔结和约。——第296页。
- 唐·卡洛斯——见查理三世。
- 唐森,查理(Townshend, Charles 1674—1738),——子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乔治一世的主要内阁大臣。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内兄弟。——第287、291、294、296、326页。
- 唐森,威廉(Townshend, William)——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733页。
- 陶恩青,博吉斯拉夫·弗里德里希·艾曼努埃尔(Taumentzen, Bogislaw Friedrich Emanuel 1760—1854)——普鲁士将军,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第409页。
- 特雷拉,于利斯(Trelat, Ulysse 1795—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第61页。
- 特雷斯塔永,雅克·杜邦(Trestailons, Jacques Dupont)——法国正统主义者。——第8页。
- 特龙普,科尔奈利斯(Tromp, Cornelis 1629—1691)——尼德兰海军统帅,海军上将;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65—1667, 1672—1674)的参加者;1676年起任尼德兰海军总司令。——第457页。
- 特鲁拉夫,爱德华(Truelove, Edward 1809—1899)——伦敦出版商,宪章主义者,欧文的信徒;1858年2月因发表

- 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辩护的文章而受审;曾出版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法兰西内战》。——第545页。
- 特罗胥,路易·茹尔(Trochu, Louis- 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意大利战争(1859),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1月),背叛地破坏城防;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553页。
- 忒伦底乌斯(Terentius 公元前195—159)——古罗马喜剧作家,他创作的喜剧流传下来的有六个:《安德里亚》、《宦官》、《姑》、《兄弟》、《波米奥》和《自虐者》。——第285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1832和1834),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9、21、42Q、527、551、597、607、629、687、712、730页。
- 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Ferdinand V le católico 1452—1516)——加斯梯里亚国王(1474—1504)和执政者(1507—1516),阿腊贡国王,称斐迪南二世(1479—1516)。——第384、385页。
- 帖木儿(塔梅尔兰)(Timur-i- lang(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统治毛危兰纳赫尔、花刺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第313页。
- “铁人”弗里德里希第二(Friedrich der “Eiserne” 1413—1471)——勃兰登堡选侯(1440—1470)。——第334、335页。
- 图尔恩-塔克西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Thurn und Taxis, Maximilien Karl 1802—1871)——德意志一小邦的领主王公(邦君);1867年以前享有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组织邮政的世袭特权;是《法兰克福总邮报》的世袭所有人。——第31页。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抨击了李嘉图的货币论,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第154页。
- 托尔斯泰,雅柯夫·尼古拉也维奇(Толстой, Яко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1—1867)——俄国文学家,1823年起侨居巴黎,1837年起为国民教育部的通讯员和第三局的密探。——第213、214页。
- 托雷,埃蒂耶纳·约瑟夫·泰奥菲尔(Thoré, Etienne- Joseph- Theophile 1807—1869)——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后来流亡英国;1860年回到法国,脱离政治活动。——第423页。
- 托伦,昂利·路易(Tolain, Henri- 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后为参议员。——第501、502、528、539、681页。

W

瓦茨拉夫四世(Waclaw IV 1361—1419)——捷克国王(1378—1419),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78—1400)。——第333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1861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之一。——第30页。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第529页。

瓦场,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党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洛桑代表大会(1867),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1884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1889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建人之

一(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595页。

万德里(Vindry)——法国染工,第一国际里昂支部成员。——第524页。

万萨德,皮埃尔·德尼(Viaud, Pierre-Denis 1820—1882)——法国工人政论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卢森堡委员会;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写有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国际会员。——第500、502页。

威德,查理(Wade, Charles)——英国共和运动的参加者。——第539页。

威尔克斯,华盛顿(Wilks, Washington 1826左右—1864)——英国激进主义政论家,《晨星报》编辑之一。——第249页。

威尔士亲王——见查理一世。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第139页。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 Francis 1796—1865)——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普罗维登斯城大学校长,教士。——第200页。

威勒尔,乔治·威廉(Wheeler, 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4—1865和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658、733页。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维尔腾堡国王(1816—1864)——第29页。

- 威廉一世,普鲁士亲王(Wilhelm I, Prinz von Preuen 1797—1888)——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441、445、646、673页。
- 威廉一世(奥伦治的) (“沉默者”),奥伦治亲王,拿骚伯爵(Willem I, prins van Oranje, graaf van Nassau, de Zwijger 1533—1584)——尼德兰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1572年被推举为尼德兰总督。——第451页。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第284、288、295、297、305、329、330、344、373、458、459页。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558页。
- 威廉五世(William V 1602—1637)——黑森-加塞尔邦的邦伯。——第340页。
- 威廉五世(Willem V 1748—1806)——1751年起为尼德兰总督,1784年被驱逐出国,1787年由于普鲁士干涉而复辟,1795年被法军推翻,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姐妹的丈夫。——第345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公爵,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231、380、399、411页。
- 威斯特,威廉(West William)——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伍德赫尔银行职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支部(纽约)书记,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562、563、565、566、568、606页。
-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Westphalen, Karoline von 1780—1858)——马克思夫人的母亲。——第654页。
- 韦尔斯利侯爵,理查·科利(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Marquis 1760—1842)——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印度总督(1798—1805),驻西班牙大使(1809),外交大臣(1809—1812),爱尔兰总督(1821—1828和1833—1834),曾残酷镇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231页。
- 韦济尼埃,皮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流亡者,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曾参加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于1866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682、712页。
- 韦梅希,欧仁(Vermersch, Eugène 1845—1878)——法国小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时期曾出版《度申老头》周报,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英国出版报纸《谁来了》,曾在报上对国际和总委员会进行诬蔑。——第699页。
-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

- 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 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529、534、678页。
- 维达尔,弗朗索瓦(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13、16页。
- 维登布鲁赫,路易(Wildenbruch, Louis 1803—1874)——普鲁士外交官,曾任驻贝鲁特总领事,1848年与丹麦作战时期,与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团一起被派往哥本哈根。——第66页。
- 维多克,弗朗索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一般认为《维多克回忆录》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的代名词。——第445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373、674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2页。
- 维克多·阿梅代一世(Victor - Amédée I 1587—1637)——1630年起为萨瓦公爵。——第454页。
- 维克多·阿梅代二世(Victor - Amédée 1666—1732)——萨瓦公爵(1675—1730)——西西里国王(1713—1718) 第一代撒丁国王(1718 & 1720—1730)。——第458—460页。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 1820—1878)——皮蒙特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441、552页。
- 维克里,赛米尔(Vickery, Samuel)——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年12月—1873年5月),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派进行积极的斗争,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1873)主席。——第720、722、725、733页。
- 维拉尔公爵,克劳德·路易·埃克托尔(Villars, Claude- Louis- Hector, duc de 1653—1734)——法国统帅,元帅(1733年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的参加者。——第463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辞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69、70、649、652页。
- 维隆,路易·德吉烈(Véron, Louis- 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第24页。
- 维斯康蒂,瓦伦蒂娜(Visconti, Valentine 1366—1406)——公爵夫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祖母;出身于米兰

- 名门贵族。——第448页。
- 维特根施坦,彼得·克里斯蒂安诺维奇 (Витгенштейн, Петр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1768—1842)——伯爵,俄国将军,后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3年4—5月任俄普联军总司令。——第409页。
- 维伊奥,路易·弗朗索瓦(Veuillot, Louis-François 1813—1883)——法国记者,天主教的狂热支持者,《世界报》的主编(1848—1860)。——第421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375页。
- 魏勒尔,亚当(Weiler, Adan 1841—1894)——德国工人,职业是细木工和硬木工,侨居美国,后来侨居英国;1861—1862年参加美国内战;从1862年起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会员(1865年起),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成员(1872年11月—1873年)和它的最后一任书记;英国工联运动的积极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1883年起);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改良派的斗争。——第720页。
- 魏斯,路易(路德维希)(Weiss, Louis (Ludwig)死于1898年以前)——瑞士首饰工人,约·菲·贝克尔领导的德语区支部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519页。
- 温采尔——见瓦茨拉夫四世。
- 文钦佐第二·贡萨加(Vincenzo Gon-zaga 1594—1627)——贡萨加家族的末代曼都亚公爵,1626年起执政;1615年起为红衣主教。——第453页。
- 沃尔波尔,霍雷修(Walpole, Horace or Horatio 1719—1797)——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儿子,作家和艺术理论家,他的书信和回忆录提供了有关英国乔治王朝的重要资料。——第258页。
- 沃尔波尔,霍雷修(Walpole, Horace or Horatio 1678—1757)——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弟弟,前者的叔父。英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员,曾任驻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外交使节。——第255、267、296页。
- 沃尔波尔,罗伯特(Walpole, Robert 1676—17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首领,曾任首相(1721—1742),在他执政时期完全形成了摆脱国王控制,依靠议会多数的内阁制,他以在议会中广泛行贿而闻名。——第287、288页。
- 沃尔夫,詹姆斯(Wolfe, James 1727—1759)——英国将军,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加拿大战争的参加者。——第467页。
- 沃尔弗(Wolff)——耶稣会教徒,列奥波特一世皇帝的神父。——第343页。
-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 1812—1895)(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德国政论家,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42页。
- 沃尔弗,路易吉(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540页。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1、42、482、483、493—495页。
- 沃尔迈纳,约翰·哥特弗里德(Wohlmeiner, Johann Gottfried 约生于1826年)——德国建筑师;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的参加者。——第640、641页。
- 沃伦,彼得(Warren, Peter 1703—1752)——英国海军上将;爱尔兰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的参加者,议会议员。——第465页。
-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Oudinot, Nicolas-Charles 1767—1847)——法国将军,1809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409—410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报(1855—1865)和《外交评论》杂志(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第204—205、246、247、251、370页。
- 乌朗特,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442页。
- 乌沙可夫,亚历山大·克列奥纳科维奇(Уш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Клеонакович 1803—1877)——俄国将军,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1855年在克里木任师长。——第219页。
- 乌兹别克汗(Usbeck Khan 1282—1342)——金帐汗国的统治者(1312—1342)。——第310页。
- 吴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Пис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国革命家,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土地和自由”社社员,1863年起流亡英国,后迁瑞士;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1868—1870),《平等报》编辑之一(1870—1871),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七十年代中脱离革命运动,1880年回到俄国。——第601页。
- 伍德赫尔,维多利亚(Woodhull, Victoria 1838—1927)——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1871—1872年企图夺取国际北美联合会的领导权,组织了一批由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支部,曾领导被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曾和自己的妹妹田纳西·克拉夫林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562、565—570页。
- 武赫尔,莱奥波德(Wucher, Leopold 死于1898年以前)——德国裁缝,第一国际会员,日内瓦裁缝支部主席。——第520页。

X

希尔德堡豪森,约瑟夫·马利亚·弗里德里

- 希·威廉,萨克森亲王(Hildburghausen, Joseph Maria Friedrich Wilhelm, Prinz von Sachsen 1702—1787)——德国元帅。——第466页。
- 希尔曼,胡果(Hillmann, Hugo 1832—1898)——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1869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第643页。
-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652页。
- 希尔斯,埃德蒙(Hills, Edmund)——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720页。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1844)——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任内务大臣(1812—1821)时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措施。——第249页。
- 西吉斯蒙德一世(老王)(Sigismund I 1467—1548)——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1506—1548)。——第337页。
- 西吉斯蒙德一世·卢森堡(Siegismund I Luxemburg 1361—1437)——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10—1437)。——第331、333页。
- 西蒙,莱维(Simon, Levy)——德国商人;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 审判案的证人。——第639页。
- 西蒙,茹尔(Simon, Jules 1814—1896)——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制宪会议成员(1848—1849) 国防政府的成员 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0—1873),1871年国民会议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之一;内阁总理(1876—1877)。——第429页。
- 西莫林(Simolin)——第261页。
- 西莫尼奇,伊万·斯切潘诺维奇(Симонович,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792—1855)——俄国将军,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32—1839)。——第360页。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150、154、201、202页。
- 席利,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499—502页。
- 小西塞罗——见布鲁内蒂,安吉洛。
- 谢尔本,威廉(Shelburne, William 1737—1805)——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妥协和从美国撤军。1782年在罗金厄姆的内阁中任国务秘书,同年罗金厄姆死后接任首相。——第262、264页。
- 谢米亚金,康斯坦丁·罗曼诺维奇(Семяк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Романович 1802—1867)——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任旅长,军团参谋长(1854年11月—1855年4月),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参加者。——第233、237页。
- 谢纳瓦尔(Cheneval, L. J.)——第520页。
- 休谟,罗伯特·威廉(Hume, Robert

- William)——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全国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会员和总委员会通讯员。——第531、533、567、568、665—666页。
- 许纳拜恩,弗里德里希·威廉(Hühnerbein, Friedrich Wilhelm 生于约1817年)——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639页。
- 雪恩哈耳斯,卡尔·里特尔(Schönhals Karl Ritter 1788—1857)——奥地利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和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第31页。
- Y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1862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30页。
-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Jaclard, Charles-Victor 1843—1903)——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1870年起为国际会员,马克思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第520页。
- 雅罗斯拉夫(智者)(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 978—1054)——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1019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在位期间编纂了雅罗斯拉夫法典,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智者”。——第309页。
- 亚德维加(Jadwiga 1513—1573)——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女儿,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二世·赫克脱的妻子(1535年起)。——第338页。
- 亚盖隆王朝——波兰王朝(1386—1572),立陶宛大公世家(1377—1572)。——第452页。
- 亚历山大(Alexander 1460—1506)——卡齐米尔四世的儿子,1492年起为立陶宛大公,1501年起为波兰国王。1495年与伊凡三世的女儿叶列娜结婚。——第318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358、405、473、474、477、478页。
- 亚历山大六世(俗名罗德里戈·波尔扎)(Alexander (Rodrigo Borgia)1431左右—1503)——罗马教皇(1492—1503)。——第384页。
- 扬森,卡尔(Jansen, Karl 生于1830年左右)——德国教师;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的参加者。——第640、641页。
- 叶卡特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1684—1727)——彼得一世的第二个妻子(1712年起),1725—1727年为俄国女皇。——第290、291页。
- 叶卡特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256、260—263、265、266、268、291、373、388、468—472、670页。
- 伊戈尔(Игорь 死于945年)——柳里克的儿子,912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第307页。

伊丽莎白——见法尔奈泽,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见伊丽莎白·华洛瓦。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1709—1761)——彼得一世的女儿; 俄国女皇(1741—1761)。——第465、467页。

伊丽莎白·都铎(Elizabeth Tudor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 都铎王朝末代女王。——第451、452页。

伊丽莎白·华洛瓦(法国的伊丽莎白)(Élisabeth de Valois (Elisabeth de France) 1545—1568)——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妻子(1559年起)。——第451页。

伊普西朗蒂, 亚历山大(Υψιλάντι, Alexander 1792—1828)——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莫尔达维亚1821年起义的组织者, 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 被捕并一直被禁到1827年, 因俄国出面干涉而被释放。——第477页。

伊万一世·卡利塔(钱袋)(Иван I Калита 死于1340年)——莫斯科公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儿子, 1325年起为莫斯科公, 1328年起为大公。——第310—313、319、320页。

伊万三世(Иван III 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在位期间统一了除普斯科夫外的几乎全部东北俄罗斯, 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并使俄国最后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第310、312—320、325页。

伊文思, 乔治·德莱西(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 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

师长。——第412页。

易卜拉欣·帕沙(Ibrahim Pasha 1789—1848)——埃及的统帅, 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 1824—1828年曾率领土军镇压希腊起义者; 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埃军总司令(1831—1833和1839—1841); 1844年起是同其父穆罕默德·阿利共同统治埃及, 1847年以后成为埃及的实际的统治者; 1848年被任命为埃及最后一个帕沙。——第391、477页。

尤里·达尼洛维奇(Юрий Данилович 1281—1325)——莫斯科公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儿子, 伊万·卡利塔的哥哥, 1303年起为莫斯科公, 1320年起为大公。——第310页。

尤利乌斯二世(俗名朱利安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 Medici 1443—1513)——罗马教皇(1503—1513)。——第385页。

尤伦堡, 卡尔(Gyllenborg, Karl 1679—1746)——伯爵, 瑞典国家活动家, 曾任驻伦敦公使(1715—1718), 1716年因与詹姆斯党人暗中勾结, 其在伦敦的寓所遭搜查并被捕。1718年起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739—1746)。——第272、292页。

雨果, 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穆岛; 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249页。

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Joachim Nestor 1484—1535)——勃兰登堡选侯(1499—1535)。——第335页。

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Joachim

- Hektor 1505—1571)——勃兰登堡选侯(1535—1571)。——第335—338页。
-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Joachim-Friedrich 1546—1608)——勃兰登堡选侯(1598—1608)。——第337、338页。
-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之一,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28、31、474页。
- 约翰第二(Johann 1513—1571)——新马尔克侯爵,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的弟弟。——第335页。
- 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John Zimiskes 约925—976)——拜占廷帝国皇帝(969—976)。——第308页。
- 约翰三世(Johan 1537—1592)——瑞典国王(1568—1592)。——第295页。
- 约翰·乔治第一(Johann Georg 1525—1598)——勃兰登堡选侯(1571—1598)。——第336页。
- 约翰·乔治第一(Johann Georg 1585—1656)——萨克森选侯(1611—1656)。——第454页。
- 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 1572—1619)——勃兰登堡选侯(1608—1619),普鲁士公爵(1618年起)。——第336、338、339页。
- 约翰·西塞罗(Johann Cicero 1455—1499)——勃兰登堡选侯(1486—1499)。——第335页。
- 约克,汉斯·大卫·路德维希,瓦滕堡伯爵(York, Hans David Ludwig, Graf von Wartenburg 1759—1830)——普鲁士将军,1821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409页。
- 约瑟夫·斐迪南(Joseph Ferdinand 1692—1699)——亲王,巴伐利亚选侯国王位继承人,西班牙王位预定继承人。——第459页。
- 约瑟夫一世(Joseph 1678—1711)——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05—1711),匈牙利国王(1687—1711)。——第458、460页。
- 约瑟夫二世(Joseph 1741—1790)——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80—1790)。——第467、469页。

Z

- 扎波略,亚诺什(约翰)(Zbolya, János (Johann) 1487—1540)——特兰西瓦尼亚都督,曾率领军队镇压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1526年被封为匈牙利国王。——第449、451页。
- 扎博克里特斯基,奥西普·彼得罗维奇(Жабокритский, Осип Петрович 1793—1866)——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234、237、239页。
- 扎哥尔斯基,扬(Zagorsky, Jan)——在瑞士的波兰侨民,加入和平和自由同盟委员会。——第519、521页。
- 扎姆佩里尼(Zamperini, J.)——意大利制帽工,第一国际意大利日内瓦支部成员。——第519页。
- 藻尔,亨利希(Sauer, Heinrich)——1849年5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第639页。
- 詹姆斯一世(James 1566—1625)——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国王(1603—1625),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1567—1625)。——第328、452页。

詹姆斯二世 (James 1633—1701)——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国王 (1685—1688)。——第459页。

詹姆斯·斯图亚特, 所谓的詹姆斯三世 (James Stuart, the so-called Stuart 1688—1766)——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儿子, 英国王位追求者。——第459页。

祖博夫, 普拉东·亚历山大罗维奇 (Зубов, Пла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第266页。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年侨居美国, 国际美国各支部

的组织者, 联合会委员会书记,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 (1872—1874),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 (1876) 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80、704、707、709、710、711、716页。

佐尔姆斯伯爵, 维克多·弗里德里希·冯·佐尔姆斯·宗南瓦尔德 (Solms, Victor Friedrich von Solms Sonnenwalde, graf 1730—1783)——普鲁士外交家; 驻瑞典 (1755—1757) 和彼得堡 (1762—1779) 公使; 彼得三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 1764年3月31日 (4月11日) 条约的发起人; 参加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准备工作。——第258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 艺术的保护神。——第392页。

奥德赛——古希腊神话中伊大卡岛国王, 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第270页。

B

波利菲米斯——古希腊神话中居住在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吃人的独眼巨人。——第270页。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420页。

L

劳孔尼——古希腊史诗中特洛伊城阿波罗神的祭司。——第429页。

N

纳尔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 转义是妄自尊大的人。——第422页。

S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 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276页。

Y

雅努斯——古罗马的神, 有前后两副面孔; 雅努斯的转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

——第688页。

亚奥鲁士——古希腊神话中风的主宰者，
亚奥利亚岛的统治者。奥德赛在漂泊中
曾在岛上受到接待。——第375页。

伊克西昂——古希腊神话中的拉皮特人
之王，由于犯了罪而被惩处在地狱里受
痛苦。——第420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00—109页)。

载于1854年3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5号。——第228页。

*《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7—124页)。

载于1854年3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0号。——第228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第539、540、545、594、684页。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

——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页)。

—Feargus O' Connor —Ministerial Defeats —The Budget.

载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8号。——第206页。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页)。

—Communication confidentielle aux différentes sections. —第534页。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1—169页)。——第505页。

*《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3—484页)。

—Declaration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70年5月4日用传单的形式发表。——第532、731页。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1页)。
 载于1868年6月6日《蜂房报》第347号。——第660—661页。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
 —Address In: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1864. ——第507、655、657、731页。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页)。
 —Statuts Généraux et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dition officielle, révisé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 London, 1871. ——第543、591、592、596、604—609、611—615、704、708—709、711、712、723、731页。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会议上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99—603页)。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tatuts et règlements. Londres, 1866. ——第524、533、542、547、614、688、690、698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1—78页)。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t a ful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Council... [London, April 17, 1872]. [传单]。——第601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页)。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70年7月以传单的形式在伦敦发表。——第534、535、669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
 —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 ——第535—537、668、669—670、672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59页)。
 载于1872年4月6日《解放报》第43号, 1872年4月15日《世界报》; 1872年5

- 月4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5/103期和1872年5月8日《人民国家报》第37号。——第601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93—394页)。
-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 Bureau Central de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
- 载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机密通知》1872年日内瓦版。——第593页。
-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纪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4页)。——第610页。
-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11—415页)。
- Mr. W. ashburn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Paris. To the New-York 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第540页。
- 《秘密的外交公文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0—177页)。
- The Secre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
- 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第228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
- Palmerston .
- 载于1853年10月22和29日、11月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1854年1月11日《人民报》第77—81号、84—86号。——第381页。
-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的男女工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1—493页)。
- The Look-out of the Building Trades at Geneva.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to the Working Men and Women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 传单还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并刊载在许多报纸上。——第533页。
-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
-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502、507、518、655、657页。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 1848—1849. Die Juni Niederlage 1848; Der 13 Juni 1849; . Folgen des 13 Juni 1849 .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第41页。
- *《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

- 495页)。
—The Fif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传单]也在许多报纸上发表。——第534、599页。
- *《致 每日新闻 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1—402页)。
载于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号和1871年6月27日《每日新闻》(被任意删节)。——第540页。
- *《致 派尔-麦尔新闻 编辑格林伍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7页)。
载于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号。——第540页。
- 《总委员会给 泰晤士报 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2—313页)。
载于1871年3月23日《泰晤士报》第27018号、1871年3月25日《东邮报》第130号等报纸。——第538页。
-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1—92页)。——第500页。
-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3—434页)。
载于1869年11月21日《雷诺新闻》第17号;1869年1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7号;1869年12月12日《国际报》第48号。——第530页。
- *《总委员会关于 蜂房报 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0页)。
载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第533页。
-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
载于1870年7月24日《米拉波报》第53号。——第534页。
-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5页)。
载于1870年5月14日《便士蜂房》第418号;1870年5月21日《平等报》第21号;1870年5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41号。——第532页。
- *《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6页)。
载于1870年5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1870年5月28日《平等报》第22号。——第533、599页。
- *《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
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第55号和1868年7月26日《人民论坛报》第7号。——第593、694页。
-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43—152页)。
—Offizieller Bericht des Londoner Generalraths, verlesen in öffentlicher Sitzung des Inter-

- nazionale Kongresses. [Braunschweig, 1872]. — 第710, 711页。
-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
- Le Conseil Général au Conseil Fédéral de la Suisse Romande. — 第530, 531页。

弗·恩格斯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133页)。
-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3期。——第41页。
-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87—689页)。
- 载于1871年7月29日《东邮报》第148号。——第541页。
-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纪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90页)。
- 第541页。
- 《国际在美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6—113页)。
- Die Internationale in America. 载于1872年7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7号。——第606页。
-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7—259页)。
- Zur Wohnungsfrage. 载于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第595页。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
- 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 — 第504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Leipzig 1845. — 第720页。
-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9—156页)。
- The Review of English volunteer riflemen. 载于1860年9月8日《军事总汇报》第36号。——第481页。
-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0页)。
- 第540页。
-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8页)。
- 载于1871年6月23日《每日新闻》和1871年6月24日《东邮报》第143号。——第540页。
-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3—404页)。
- 载于1871年6月29日《每日新闻》和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号。——第540页。
-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02页)。

- 载于1871年2月4日《东邮报》第123号。——第538页。
- *《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2—103页)。
- 载于1872年6月29日《国际先驱报》第13号和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等报纸。——第590页。
- *《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39页)。
- 载于1872年8月24日《解放报》第63号。——第605页。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
- 载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1870年9月5日》1870年不伦瑞克版。——第535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第591页。
- 《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
- Revue Mai bis Oktober .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68页。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
-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 Hamburg .1873 .——第614页。
-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61页)。
- 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th to 23rd September 1871 (Circular issu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London . 1871 . ——第590—592, 596, 608—609, 699, 701, 729, 730, 732页。
-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65—177页)。
-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Congress held at the Hague from the 2nd to the 7th of September .1872 .
- 载于1872年12月14日《国际先驱报》第37号。——第597, 730页。
-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6—219页)。
- 载于1872年12月21日《国际先驱报》第38号。——第717页。
-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1页)。

- 载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号。——第681页。
-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394页)。
- 载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第27088号,1871年6月17日《东邮报》第142号和1871年6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50号。——第540号。
-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9—530页)。
- 载于1872年2月24日《东邮报》第178号和1872年3月2日《国际先驱报》第1号。——第601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布·埃·《一八六 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About, E.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第440—447页。
- 阿尔诺德《即将爆发的战争》(Arnold, The Coming War), 载于《先驱》第5卷, 1854年1月21日第200号第59—60页。——第225页。
- 奥普尔, 阿·(Hautpoul, A.) 在全国立法议会的发言, 载于1850年2月17日《总汇通报》第48号第377页。——第12、17页。

B

- 巴枯宁, 米·《公民巴枯宁的回答。致 汝拉联合会简报 的编辑朋友们》(Bakou-nine M Réponse du citoyen Bakou-nine Aux compagnons rédacteurs du «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载于1872年6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0—11期。——第586页。
- 巴师夏, 弗·《经济的和谐》(Bastiat, Fr. Harmonies économiques), 第1版1850

- 年在巴黎出版。——第201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 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第367—382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英国》1854年沙洛顿堡版, 译自德文(Bauer, B. La Russie et l' Angleterre. Charlottenburg, 1854. Traduit de l' allemand: Bauer, B. Ru land und England. Charlottenburg, 1854)。——第367—382页。
- 鲍威尔, 布·《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e la Dictature occidentale. Charlottenbourg, 1854)。——第378页。
- 《北方危机; 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The Northern Crisis, Or imparti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zar, Occasioned by

- mynheer von Stocken's Reasons for delaying the descent upon Schonen A true copy of which is prefixed, verbally translated after the tenour of that in the German Secretary's office in Copenhagen, October 10, 1716. London, 1716). ——第270、272、287页。
- 倍倍尔, 奥·(Bebel, A.) 1871年10月30日和11月8日在帝国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71年第一届第二次例会》1871年柏林版第1卷第80、183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 I. Legislatur - Periode. Session 1871 Erster Band Berlin, 1871, S. 80, 183)。——第557页。
- 波特, 乔·《十九世纪初以来国家在其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进步》1851年伦敦新版(Porter, C. R.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in its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new edition. London, 1851)。——第245页。
- 勃朗, 路·《一个人和一个主义》(Blanc, L. Un homme et une doctrine), 载于1849年12月15日《新世界》第6号。——第177页。
-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1700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The Defensive Treaty concluded in the year 1700, between his late Majesty, King William, of ever-glorious memory, and his present Swedish Majesty, King Charles Published at the earnest desire of several members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第287、288、297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54年3月31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第21704号。——第426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58年3月26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58年3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952号。——第426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58年10月27日和29日对选民的讲话, 载于1858年10月28日和30日《泰晤士报》第23136和23138号。——第426页。
- 布让, 吉·《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史, 或为了建立欧洲各列强之间的和平而在曼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举行的谈判》1751年巴黎版第1—6卷(Bougeant, G. Histoire du traité de Westphalie, ou des négociations qui se firent à Munster et à Osnabrug, pour établir la paix entre toutes 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Tomes 1 - Paris, 1751)。——第455页。
- 布图尔林, 德·彼·《1812年拿破仑皇帝入侵俄国史》1823—1824年圣彼得堡版第1—2册(Бумурлин Д. П. История нашестви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аполеона на Россию в 1812-м году. Части первая-втор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23—1824)。——第213页。

D

- 德罗兹, 约·《在可以防止或控制法国革命的年代路易十六的统治史》1839—1842年巴黎版第1—3卷(Droz, J. Histoire

du règne de Louis ,pendant les années où l'on pouvait pr évenir ou diriger la r évolution française .Tomes 1—3 . Paris,1839—1842)。——第165页。

邓科布,托·(Duncombe,T.)1854年3月30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第21703号。——第209页。

杜普拉,帕·(Duprat,P.)1850年2月16日在全国立法会议上关于新军事管理体制的质问,载于1850年2月17日《总汇报》第48号。——第12页。

F

费希特,约·哥·《1807年和1813年的政治文摘》(Fichte,J.G.Politische Fragmente aus den Jahren 1807und 1813),载于约·哥·费希特《费希特全集》1846年柏林版第7卷(J.G.Fichte.Fichte's Sämmtliche Werke Bd. Berlin,1846)。——第595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致联合议会的信》,载于1850年1月11日《新普鲁士报》第9号。——第33页。

福克斯,查·詹·(Fox,Ch.J.)1803年5月24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尊敬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在下院的发言集》1815年伦敦版第6卷第484—529页(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Charles James Fox in the House of Commons.Volume London,1815,p.484—529)。——第373页。

H

黑尔斯,约·佩普,弗·荣格,海·《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Hales,

J.,Pape F.,Joung,H.The Federal Council.To the Editor of the 《Eastern Post》),载于1873年2月15日《东邮报》。——第722—725页。

亨尼格森《揭露俄国的秘密》1844年伦敦版第1—2卷(Hennigsen,Ch.F.Revelations of Russia.Volumes — London,1844)。——第213页。

J

[吉约姆,詹·](Guillaume,J.)1870年7月23日《团结报》第16号编辑部文章。——第535页。

K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纽约版(Carey,H.C.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New-York,[1835])。——第201页。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Carey,H.C.The Slave Trade,Domestic and Foreign;why it exists,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第1版1853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201页。

坎宁,乔·《就国王关于葡萄牙问题的通告的呼吁》(Canning,G.Address on the king's message respecting Portugal),载于《议会辩论》,由托·寇·汉萨德负责出版,1827年伦敦版新辑第16卷(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Published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 C. Hansard New series Volume London, 1827).
——第375页。

L

拉梅耐,费·(Lamennais, F.) 注明“巴黎7月10日”的文章,载于1848年7月11日《人民制宪报》第134号。——第421页。

李卜克内西,威·和倍倍尔,奥·(Liebknecht, W., Bebel, A.) 1870年7月21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关于弃权的声明,载于1870年7月23日《人民国家报》第59号。——第534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 ——第73—153页。

里沙尔,阿·和勃朗,加·《帝国和新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1872年布鲁塞尔版(Richard, A. et Blanc, G. L'Empire et la France nouvelle Appel du peuple et de la jeunesse à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 Bruxelles, 1872). ——第595页。

鲁基亚诺维奇 [尼·安·]《1828年和1829年土耳其战争记述》1844—1847年圣彼得堡版第1—4册,(Туркьяноечи [Н. А.] Описание Турецкой войны 1828 и 1829 годов. Части первая-четвер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44—1847). ——第213页。

鲁瓦埃-科拉尔,皮·(Royer-Collard, P.) 1822年1月22日在众议院的发言,载于1822年1月24日《总汇通报》第24号。——第173页。

M

马尔滕斯,格·弗·《十五世纪末至亚眠和约时期欧洲国家贸易和缔结和约的外交史概论》1807年柏林版(Martens, G. F. Grundri einer diplomatischen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Staatshandel und Friedensschlüsse seit dem Ende der 15-ten Jahrhundert bis zum Frieden zu Amiens. Berlin, 1807). ——第384—389页。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亚·伊·《1812年卫国战争记述》(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 И., Описан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в 1812 году). 第1版四卷集,183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第213页。

N

纳皮尔,威·《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Napier, W.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umes 1—6. London, 1828—1840). ——第214, 231页。

P

皮阿,费·《给法国名士的信》1858年伦敦版(Pyat, F. Lettre aux mandarins de la France. Londres, 1858). ——第419—424页。

皮阿,费·《自由、平等、博爱。巴黎的革命公社,1868年6月24日于巴黎》(Pyat, F.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Com-

- mun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24 juin 1868), 载于1868年7月5日《淘气报》第27号。——第593页。
- 蒲鲁东,皮·约·《人民银行(附卢森堡代表委员会报告)》1849年巴黎版(Proudhon, P. - J. Banque du peuple suivie d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s délégués du Luxembourg Paris, 1849)。——第177页。
- 蒲鲁东,皮·约·《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关于革命实践和工业实践的论文选)》1868年巴黎版(Proudhon P. - J.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 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 Paris, 1851)。——第164—196页。
-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Proudhon, P. - J.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第1版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155、174页。
- 蒲鲁东,皮·约·《信贷和流通的组织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年巴黎版(Proudhon, P. - J. Organisation du Crédit et de la Circulation, et 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e. Paris, 1848)。——第177页。
- 帕金顿,约·(Pakington, J.)1854年3月30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第21703号第7页。——第206页。
- 帕麦斯顿,亨·(Palmerston, H.)1843年3月1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43年3月2日《泰晤士报》第18233号第4—5页。——第364页。
- 佩舍,泰·和格普,卡·《新罗马。世界合众国》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Poesche, T. Goepp, Ch. The New Rome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World. Philadelphia, 1853)。——第200—201页。
- ## Q
- 琼斯,厄·《普雷斯顿的棉花法。——谁是真正的阴谋者?》(Jones, E. The Cottonlaw of Preston —Who are the real Conspirators?)载于1854年3月25日《人民报》第99号。——第209页。
- ## R
- 若米尼,昂·《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9年布鲁塞尔版(Jomini, A.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Bruxelles, 1829)。——第405页。
- ## S
- [萨博,伊·]《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两卷集)1857年伦敦版([Szabó, I.] The State Policy of Mod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57)。——第384—389、448—480页。
- 萨利,马·《关于亨利四世合理地经办国家、宫廷、政治和军事等事务的回忆录》(Sully, M. Mémoires des sages et royales économies d'Etat, domes - tique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de Henry le Grand)。第1版两卷集

163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389页。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第160页。

施泰因,阿·弗·《普鲁士勃兰登堡史。纪念和知识手册》第1—2册(Stein, A. F. Preussisch-Brandenburgische Geschichte Ein Handbuch zur Erinnerung und Belehrung. Theile 1—2)。第1版1811年在柏林出版。——第331—346页。

斯米特,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第1—3部(Smitt, F.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n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Theile — Berlin, 1839—1848)。——第213、214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2卷(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ome . Paris, 1802)。——第154页。

T

托尔斯泰,雅·《俄军在匈牙利的战况》1850年巴黎版(Tolstoy, J. Relation des opérations de l'armée russe en Hongrie. Paris, 1850)。——第213、214页。

图克,托·《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44)。——第154页。

W

[威克菲尔德,爱·吉·](Wakefield, E. G.)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839年伦敦版第1—4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 [E. G. Wakefield]. Volumes — London, 1835—1839)。——第139页。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 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第1版1837年在波士顿出版。——第200页。

威斯特,威·《第十二支部得到支持。——总委员会的决议》(West, W. Section 12 sustained — The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Council),载于1871年12月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3期第3页。——第565—566页。

威斯特,威·《对某些支部的自治的过多干预遭到正当谴责证明第十二支部是正确的》(West, W. Official interferenc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he several sections properly rebuked - section 12 vindicated),载于1871年11月18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7期第3页。——第562—563页。

威斯特,威·《国际工人协会美国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休会》(West, W. The Final

adjournment of the U S Central Committee of I W A.), 载于1871年12月16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5期第3页。——第566页。

威斯特, 威·《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对第十二支部代表的斗争》(West, W.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council versus the delegate of the twelfth section), 载于1872年3月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6期第3页。——第566—567页。

沃尔弗, 威·《全国各地特写补充》(Wolf, W. Nachträgliches 《aus dem Reich》),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4期第73—79页。——第41页。

沃尔弗, 威·《西里西亚的贫困和暴动》(Wolf, W. Das Elend und der Aufruhr in Schlesien), 载于《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第494页。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Urquhart, D.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London, 1853)。——第204—205页。

X

小博尔姆《帘幕拉开。5月15日案件的前被告小博尔姆先生献给农民、勤劳的工人和正直的公民的一盏反映1848年2月24日、5月15日和6月24日政治阴谋的明亮的魔灯》1850年[巴黎版](Barne fils Le Rideau est levé Grande lanterne magique des pà-tissiers politiques des 24 février, 15 mai et 24 juin 1848, dédié aux

paysans, aux ouvriers laborieux et aux honnêtes gens, par M. Barne fils, ex-accusé du 15 mai. [Paris], 1850)。——第22页。

Z

《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以简单明了的理由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这些理由要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全部摘自N.N.在1715年8月从出使莫斯科宫廷回国后奉国王陛下之命编写并向国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Truth is but truth, as it is timed, or Our ministry's present measures against the moscovites vindicated by plain and obvious reasons, tending to prove, that it is no less the interest of our British trade, than that of our state, that the Czar be not suffered to retain a fleet, if needs must that he should [have] a sea port in the Baltick, the whole extracted from a representation made by His Majesty's orders, and given 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y N.N. on his return hither from the Court of Moscovy, in August 1715 Humbly dedica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1719)。——第287、306、326页。

文 件

D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章程》(Programm und Statuten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载于《1869年8月7、8和9日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党的全德代表大会协商记录》1869年莱比锡版。——第591页。

《调查金条价格高昂原因的特别委员会报告, 根据1810年6月8日下院决定刊印》1810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 of the high price of gold bullio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June 1810. London, 1810)。——第154页。

F

《法兰西国防政府》(The French 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ce), 署名: 阿普耳加思、奥哲尔、埃卡留斯等。载于1870年12月30日《泰晤士报》第26947。——第668页。

G

《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1871年日内瓦版(Circulaire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s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1)。汝拉联合会代表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签署。——第

612页。

《公文集. 外交评论 新辑》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号。利文亲王和马士舍维奇伯爵1829年6月1日(13日)于伦敦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急电抄本(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 (New Series) Volume I, No. 1 London, 1843. Copy of a despatch from prince Lieven, and count Matuszevich, addressed to count Nesselrode, dated London, 13th (13th) June, 1829)。——第380—381页。

《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183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Persia and Afghanistan. London, 1839)。——第365页。

《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 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第206页。

《国际. 第十二支部的呼吁》(The International Appeal of section No. 12)。署名: 威廉·威斯特。载于1871年9月23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9期第3页。——第562页。

《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致马克思。1870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1967年莫斯科版第168—170页)

- (Комитет Русской секци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арксу .12 марта 870 .) (К .Маркс , Ф .Энгельс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 М . , 1967 , стр . 168—170) 。——第532页。
-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 Congress of Geneva) 载于1867年2月20日、3月13日和27日、4月3、10、17日《国际信使》。——第584、728—729页。
-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du congrès de Genève) 载于1867年3月9、16、23、30日、4月6、13、20、27日《国际信使》。——第584、728—729页。
- 《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1872年版(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i Lavoratori .Federazione Italiana .Primo Conferenza .Risoluzioni .1872) 。署名 :卡菲埃罗、科斯塔。——第606页。
- 《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1869年]伦敦版(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Geneva, 1866, and the Congress of Brussels, 1868 .London, [1869]) 。——第515页。
-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 1868年9月布鲁塞尔版。1868年《比利时人民报》附刊(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septembre

- 1868 .Supplément au journal «Le Peuple belge», 1868) 。——第522、729页。
-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年]日内瓦版(Programme et Règlement de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Genève, [1868]) 。——第516—521、612页。

H

- 《海牙代表大会少数派声明》(《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第166—167页)(Заявлени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Гааг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Гааг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I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1872 г.) Протоко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 М . , 1970 , стр . 166—167)) 载于1872年9月15日—10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7—18号。——第614页。

M

- 《美国中央委员会致美国工人书。1871年10月15日于纽约》(To the Working men of America 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 York, October 15, 1871) 。载于1871年11月4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5期。——第564页。

R

- 《人民大会》(People's Convention) 。署名 :斯滕顿等。载于1872年4月6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1期。——第567页。

- 《人民大会》(People's Convention)。署名:斯滕顿等。载于1872年4月13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2期。——第567—568页。
- 《汝拉联合会委员会——致伦敦总委员会》,1872年7月15日桑维耳耶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报告和信件》1972年莫斯科版第311—312页。)署名:施维茨格贝尔。载于1872年7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3期附录第1页。——第587页。

S

- 《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1870年9月5日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版[传单](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 Braunschweig - Wolfenbüttel. 5. September 1870)。——第672页。

Y

- 《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绍德封版(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Chaux-de-Fonds, 1867)。——第522、731页。
- 《1872年5月合众国即将成立保障人权的人民党》(The Party of the People to secure and maintain human rights, to be inaugurated in the U S A in May 1872)。署名:伍德赫尔等人。载于1872年4月6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1期。

——第567页。

- 《1872年5月合众国即将成立保障人权的人民党》(The Party of the People to secure and maintain human rights, to be inaugurated in the U S A in May 1872)。署名:伍德赫尔等人。载于1872年4月13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2期。——第567—568页。
- 《议员对三月十八日起义的调查》第1—3卷1872年凡尔赛版(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 Tomts — Versailles, 1872)。——第594页。

Z

- 《在瑞士巴塞爾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日至11日》1869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第524页。
- 《致国际工人协会美国中央委员会》(To the United States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I W A)。署名:第十二支部书记威廉·威斯特。载于1871年11月18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7期。——第563页。
- 《致司法大臣巴拉先生》(A Monsieur Bara, ministre de la justice)。署名:国际布鲁塞爾支部执行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载于1868年5月24日《人民论坛报》第5号。——第660—661页。

- 《中央委员会告工人团体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79—580页。
-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参加……》(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Central Council .18 Greek street ,London W 《Trade ,Friendly ,or any Working Men's Societies are invited to join...》.[London , 1865])。——第498页。
-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1871年11月5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6页)。载于1871年12月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3期第3页。——第565页。
-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06—609页)。
-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工人的呼吁书》[1867年伦敦版](Adress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Aux membres et aux sociétés affiliées et à tous les travailleurs .[Londres ,1867])。——第513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C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1854年3月27日第25033号。《一星期》(The Week)。——第209页。

J

《进步报》(《Le Progrès》)洛克尔出版,1869年12月25日第28号。《苏黎世社会主义者》(Les socialistes de Zurich)。——第531页。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达姆斯塔德出版,1863年5月16日第20号。《1863年4月7日对查理斯顿的进攻》(Der Angriff auf Charleston am 7. April 1863)。——第484页。

—同上。《查理斯顿计划》(附刊)。——第

490页。

P

《平等报》(《L'Égalité》),日内瓦出版,1869年11月13日第43号第1页。《国际的组织》(Organisation de l'Internationale)。——第530、531页。

—1869年12月11日第47号。《反思》(Réflexions)。——第530、531页。

—1870年1月1日第1号。《苏黎世社会主义者》(Les Socialistes de Zurich)。——第530、531页。

Q

《权力报》(《Le Pouvoir》),巴黎出版,1850年7月15日。《国民议会的逐渐削弱》(Affaiblissement graduel de l'

Assemblée nationale) —— 第24、27页。

R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 伦敦出版, 1854年4月1日第100号。《郎卡郡领导者的控诉》(Prosecution of the Lancashire Leaders) —— 第211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 1854年3月21日第21694号。《工资运动》(The Wages' Movement) —— 第210页。
— 1854年5月4日第21732号。《俄国人的失败》(Defeat of the Russians) —— 第226页。
— 同上。转载《国民报》(《National-Zeitung》)的文章。—— 第227页。
— 1854年11月13日第21897号。《来自克里木的俄国新闻》(Russian news from the Crimea) —— 第233页。
— 1855年9月29日第22172号。《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The Fall of Sebastopol) —— 第244页。
— 1855年11月13日第22210号。《避难者的权利》(The Rights of Refugees) —— 第248页。
— 1856年12月29日第22563号。社论。—— 第361、362页。
— 1857年1月2日第22567号。社论。—— 第361、362页。
— 1858年10月29日第23137号。1858年10月29日星期五伦敦通讯。—— 第427页。

W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纽约出版。
— 1871年10月21日第23号。《国际的对手》(The Rival Internationals) —— 第563、564页。
— 1871年11月25日第2号。《支部会议》(Meetings of the Sections) —— 第563—565页。
— 1872年3月2日第16号。《即将召开的联合大会》(The Coming combination convention) —— 第566、567页。
— 1872年4月6日第21号。《五月大会》(The May convention) —— 第566、567页。
— 1872年5月4日第25号。《评论》(Remarks) —— 第565、566页。

Z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 伦敦出版, 第7卷, 1859年7月13日第7号第65—68页。《关于俄国的报告书, 呈当今皇上。1837年内阁草拟》(Memoir on Russia,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Emperor Drawn up by the Cabinet in 1837) —— 第431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出版, 1848年6月18日第170号附刊。《时局观察》(Blicke auf die Zeitlage)一文的脚注中叙述了维登布鲁赫的照会。—— 第66页。
《总汇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 1859年9月9日第252号。《非官方人士》9月8日于巴黎 (Partie non officielle Paris, le 8 Septembre) —— 第431—437页。

文学著作

H

贺雷西《诗论》。——第427页。

S

圣经。——第378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75页。

期 刊

B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
——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至1852年出版,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至1850年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720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至1934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第527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
——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首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209、247、427页。

D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3年在

伦敦出版。从1871年2月至1872年6月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第675、701、722页。

F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ier Français》)——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政治性周报,从1867年6月起改为日报;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从1866年5月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为国际的机关报。——第513页。

《蜂房报》(《The Bee - 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有过几个名称。从1864年11月至1870年4月该报经常刊载国际的文件。——第522、533页。

G

《工人报》(《Arbeiter - Zeitung》)——一家周报,国际美国第一支部机关报,用德文在纽约出版;1873年2月1875年3月发行。——第619页。
《公社报》(《La Commune》)——一家月

- 报,国际新奥尔良支部机关报,1871年6月至1873年12月出版。——第540页。
- 《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机关报;1848年2月26日至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出版,由埃·巴莱斯特主编。——第22页。
- 《共有者报》(《El Comunero》)——西班牙共和派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马德里出版。——第548页。
-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1年在纽约出版;1851年海因岑和卢格加入编辑部。——第645页。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刊登过一些国际的文件。——第536、717。
-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s travailleurs》)——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72—1878年由詹·吉约姆主编出版。——第595、717页。
-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英国一家共和主义的周报,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伦敦出版,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间断地)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1873年间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717、722页。
-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在巴黎创刊,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该报是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422页。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6、9、13、60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第227页。
-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年至1857年在巴黎出版。——第23页。
- ## H
- 《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一家周报,1857年至1916年在纽约出版。——第485页。
-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1850年6月11日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报。——第720页。
- ## J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派的机关报。——第427页。
- 《解放报》(《La Emancipación》)——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第701页。
- 《进步报》(《Le Progrès》)——巴枯宁派

- 报纸,公开反对总委员会;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由吉约姆主编,在洛克尔出版。——第531页。
- 《觉醒报》(《Le Réveil》)——法国的一家周报,从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左派共和主义者的机关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该报曾刊载国际的文件和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第662页。
-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一家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481、484、490页。
- ### L
-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年至186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1860年8月至1862年3月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481页。
- 《劳动报》(《El Trabajo》)——西班牙共和派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埃尔费罗尔出版。——第548页。
-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法国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23、422页。
- 《联盟》(《La Federacion》)——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717页。
-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每周出版的英国画报,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0页。
-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论坛报》(《Il Tribuno》)——见《雄辩家论坛报》。
- ### M
-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527、528页。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13、528、540页。
- 《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59年至1874年在巴黎出版。——第443页。
- ### N
- 《纽约快邮报》(《New-Yorker 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为该报撰稿,恩格斯为该报撰写过许多文章,好多文章是他们合写的。
- 除了日报外,该报还发行另外一些出版物,其中的两种出版物《纽约每周

- 论坛》和《纽约半周论坛》,也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205、207页。
-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 Democrat》)——第565页。
-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570页。
- P
-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英国的一家日报,1865年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该报奉行保守的方针。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这个时期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文章《战争短评》。——第540页。
- 《平等报》(《L'Egalité》)——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第530、531、593页。
- Q
- 《权力报》(《Le Pouvoir》)——法国波拿巴派报纸,1849年在巴黎创刊,用此名称于1850年至1851年出版。——第23、24、27页。
- R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英国周报,1852—1858年由厄·琼斯在伦敦出版,该报是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之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第652、720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至1876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报纸的总的领导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该报经常刊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606页。
- S
- 《哨兵报》(《Die Tagwacht》)——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报纸,1869年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1869—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第531页。
- 《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n》)——丹麦的一家工人报纸,1871年7月至1872年5月在哥本哈根出版。——第560页。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周报,国际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第569页。
- 《圣路易斯每日新闻》(《St Louis Daily Press》)——美国的一家工人报纸,从1864年起在圣路易斯出版。——第655页。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第9、421、443页。
- 《世界报》(《The World》)——美国的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1860年至1931年在纽约出版。——第569、570、688页。
- 《首都报》(《La Capitale》)——意大利的一家激进报纸,1871—1872年在罗马出

版。——第556页。

《谁来了》(《Qui Vivel》)——一家日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第699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22、210、248、361、421、427、527、528、540页。

《团结报》(《La Solidaridad》)——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在纽沙特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535页。

W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美国的一家周刊,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出版。——第562—568页。

X

《先驱报》(《Herald》)——见《纽约先驱报》。

《协会报》(《La Asociación》)——西班牙共和派的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于里昂出版。——第548页。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刊,出版到1846年;先在里昂出版,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从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720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w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由马克思在科伦编辑出版;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42、482、493、639、645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ws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版到1850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41、43页。

《星期日信使报》(《Courier du Dimanche》)——法国资产阶级反波拿巴派的周报;1858年至1866年在巴黎出版。——第429页。

《形势报》(《La Situation》)——波拿巴派的日报;从1870年9月至1871年8月用法文在伦敦出版;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持反对立场。——第693页。

《雄辩家论坛报》(《Ciceruacchio il Tribuno》)——意大利左翼共和派日报,接近国际;从1871年7月15日起于罗马出版。——第556页。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2页。

Y

《意大利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 Italiano》)——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都灵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出版。——第547页。

《邮袋报》(《Felleisen》)——瑞士的一家杂志,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的机关报,1862年至1874年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出版,1868年8月起接近国际,刊登过一些国际活动的资料。——第537页。

Z

《真理报》(《La Vérité》)——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1870年10月至1871年9月在巴黎出版。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第527。

《正义报》(《La Justicia》)——西班牙共和派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马拉加出版。——第548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第23、420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

国资产阶级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著作。——第251页。

《钟声》(《Колоко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592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61、422、434—436、443页。

《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办;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22页。

已改名的地名表

A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第225页。
 阿克尔曼(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第220、321页。
 埃捷尔(萨烈马)岛。——第456、462页。
 埃克斯-拉沙佩尔(亚琛)。——第448、457页。
 埃劳。——见普略西什-埃劳。
 艾契(阿迪杰)河。——第348页。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346页。

B

拜达尔(奥尔利诺耶)。——第238页。
 彼得堡,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255、256、259、260、262、265、268、278、279、294、296、301、321、323、327、329页。
 波美拉尼亚(波莫瑞)。——第334、340—344、387、453、455、461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482、483、494、617、705页。

D

达果岛(希乌马岛)。——第462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345、404、463、470、622。
 蒂勒蒙(蒂纳)。——第395页。

F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405、474页。
 弗里施湾(格但斯克湾)。——第342页。
 阜姆(里耶卡)。——第348、349、475页。

G

格查茨克(加加林)。——第405页。

H

海尔斯贝格(利兹巴尔克-瓦尔明斯基)。——第404页。

J

吉尔真提(阿格里琴托)。——第547、550页。
 居斯坦杰(康斯坦察)。——第220页。

K

卡塔罗湾(科托尔湾)。——第348页。
 凯克斯戈里姆(湖滨城)。——第452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410页。

L

拉蒂斯邦(累根斯堡)。——第458页。
 腊古扎(杜布罗夫尼克)。——第349页。
 勒特岑(吉日茨科)。——第600页。
 里巴瓦(赖耶帕亚)。——第323页。

利库斯(大扎布)河。——第403页。
列维里(塔林)。——第277、279、327页。

M

马里恩韦德(克维曾)。——第409页。
默麦尔(克莱彼达)。——第321页。

P

普略西什-埃劳(巴格腊提奥诺夫斯克)。
——第401、405页。

S

施特廷(兹杰辛)。——第342、344、409、
455、461、635、636页。
施魏德尼茨(斯维德尼察)。——第493
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65页。
苏姆拉(苏门)。——第223、224页。

T

塔尔瑙(塔尔努夫)。——第493、494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405页。

W

维尔诺(维尔纽斯)。——第471页。

X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第220页。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腊)。——第223、
224、226页。

Y

亚波(土尔库)。——第394页。
伊万城(登布林)。——第323页。
因格里亚(伊若拉)。——第452、462页。